

在信徒的國度
伊斯蘭世界之旅

Among the Believers
An Islamic Journey

V. S. Naipaul

V. S. 奈波爾 | 著 秦於理 | 譯



臺北市立
圖書館藏書
H15文山分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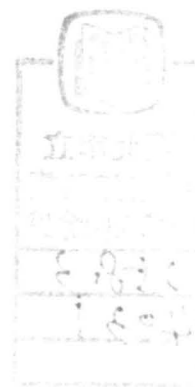
258.3

4031

而今，早期的世界歷史不過是由，直言之，一系列毫無關聯的插曲所組成，各個事件的前因後果與來龍去脈，往往與其地理位置般疏離遙遠。然而，從現在這個時間點開始，歷史已經融合為相互影響的完整體系：發生在義大利與非洲的事端，牽動著亞洲與希臘的情勢，各項事件息息相關，共同匯流投入某個單一標的。

——波利比奧斯（卒於西元前一八八年）¹，論及羅馬之崛起
（譯者：伊安·史考特—柯爾維特）

1 波利比奧斯（Polybius）：古希臘政治家、歷史學家、政治思想家，長期接受柏拉圖、亞里斯多德學說的影響，曾是阿哈伊亞同盟的知名政治家。他也是有史以來第一位系統化蒐集文獻與考察羅馬的政治制度，寫成一部長達四十卷的《歷史》（又譯《羅馬史》、《通史》），以探究羅馬興盛的原因，並闡述了他的史觀與政治思想。



目次

導讀 奈波爾的伊斯蘭「信仰之旅」與

「後殖民」知識分子的困境 蔡源林

9

〔第一部〕 伊朗：學生革命

一 死亡協約

21

二 阿里的正道

37

三 聖城

65

四 麥什德開出的夜車

95

〔第二部〕 巴基斯坦：夢裡鹽山

一 取代

129

二 喀拉蚩走馬幻影

153

可是，我擅長的還不光是吟詩作對而已。我在機械方面的天分也很了不起，我有幾項發明，朝廷裡文武百官都讚不絕口。我還設計了一個可以動者恆動的輪子，只要再添上一點小裝備，就可以一直轉動個不停。我也做手抄紙，還做出好幾種不同顏色的色紙；我也發明了一種新型態的墨水台；而且啊，本來我萬事具備，就要準備紡紗織布了，結果，還是當今聖上叫我歇手。皇上跟我說：「艾斯可，你還是專心寫詩就好。我若是要添新衣裳，就會差遣商家直接上歐洲去給我買來。」

——詹姆士·莫理爾：《伊斯法罕的哈吉·巴巴歷險記》
(*The Adventures of Hajji Baba of Ispahan*，一八二四年)¹

1 《伊斯法罕的哈吉·巴巴歷險紀》與《辛巴達》同屬於以穆斯林世界為背景的探險故事，作者詹姆士·莫理爾（James Justinian Morier）於一七八〇年出生在土耳其的伊茲密爾，年幼時，隨著家人遷居倫敦。莫理爾日後於英國擔任外交官，並勤於寫作。他曾經以隨員身分，出使波斯七年之後，寫成這部家喻戶曉的幽默探險小說。小說中的主人翁哈吉·巴巴，是個伊斯法罕的理髮師，一心想發財致富，他在無意間解救了公主，公主本當嫁給某個親王，然而，親王覬覦公主的財富，哈吉打敗親王，拯救了公主，兩人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

- 三 小阿拉伯 183
- 四 殺戮的歷史 193
- 五 海德拉巴德爵士樂 209
- 六 法之不治 227
- 七 基本的東西 245
- 八 喀格汗谷地 259
- 九 阿迦·巴布爾 293
- 十 夢裡鹽山 303

〔第三部〕

馬來西亞對話：原始的信仰

- 一 與夏菲的第一次對話：出樂園之旅 319
- 二 勇敢的女孩 345
- 三 麻六甲與雲頂高原之間 361
- 四 阿拉伯風潮 379
- 五 毀壞了的遊樂場 395

〔第四部〕

印尼：篡奪

- 一、摧擊 419
- 二 席托：重建過去 433
- 三 廢除傳統學校 449
- 四 豐饒女神 485
- 五 人格之斲喪 503
- 六 心理訓練在萬隆 509
- 七 互換式革命 533

〔再現部〕

信徒的社會

- 一 順服 547
- 二 伊斯蘭之冬 561

導讀

奈波爾的伊斯蘭「信仰之旅」與「後殖民」知識分子的困境

蔡源林

以歷史的後見之明來看，奈波爾的這部厚達逾六百頁的巨著可說見證了一個大時代的轉捩點。若視二〇〇一年的九一一事件做為當代西方文明與伊斯蘭文明衝突的歷史高峰，一九七九年的伊朗什葉派革命則是這場歷經二十年尚未解決之西方世界與伊斯蘭世界衝突的歷史開端。奈波爾正是受到這場上個世紀七〇年代末震撼世人的革命之觸發，決定來一場伊斯蘭國度之旅，以親身體會這場革命對伊斯蘭教信眾的日常生活影響，深入了解他們是如何看待這場革命所引發之宗教與政治的糾葛關係。奈波爾在這場前後長達半年的旅行中，接觸到上至政府官員與宗教領袖，下至販夫走卒與市井小民的各類階層，甚至還深入到尚維持游牧生活的少數民族地區。其間也晤談了許多背景與理念殊異的知識分子，有生活在中世紀知識氛圍的經學院毛拉，也有追隨原教旨主義的宗教狂熱信徒，甚至篤信共產主義的革命黨人，乃至充滿疏離感的世俗主義知識分子。他也碰到幾位當地的伊斯蘭教界領袖，日後成為叱吒風雲一時的全國性或國際知名政要，諸如：在伊朗共和政權初期與柯梅尼平起平坐的薩里亞特馬達理大教長、前印尼總統瓦西德、前馬來西亞副總理安華。此外，尚有大師級的伊斯蘭學者，如：伊朗的施拉吉、印尼的伊瑪杜丁（曾蒞臨台灣演講）等。為了深入了解穆斯林宗教領袖如何處理宗教傳統與現代化的問題，他親自拜訪這些要人，為他們留下生動的歷史證言。

奈波爾的第一站是伊朗，接著是與他自己的印度文化背景關係甚為「密切」的巴基斯坦，然後便是

東南亞的兩個穆斯林國家——馬來西亞與印尼。誠如本書標題所示，奈波爾這趟旅行不只是要去享受異國情調的伊斯蘭文化而已，其實他在一開始就懷著極大的困惑，以一個立足於西方世俗主義觀點（奈波爾雖然出身於千里達的印度裔家庭，但成長期間所受的是英式殖民教育，自牛津大學畢業以後就長期在西方生活並寫作）的知識分子，對用宗教信仰來發動革命並統治國家的伊斯蘭世界充滿著好奇，想要探索這個心中的謎題，乃是這趟旅行的一個主要動機。也因此他每到一個國家，便興致盎然地要求與當地穆斯林宗教領袖對話，而一幕又一幕信仰狂熱的說教與場景只有使奈波爾更加困惑與難耐，顯然，他的這場「信仰之旅」預示了西方世俗文明與伊斯蘭信仰文明之間深刻的矛盾與衝突的徵兆，時至今日猶震撼著世人。

奈波爾這本書在體裁上雖可說是報導文學作品，但他所採取的寫作方式既不像是新聞記者般的強調冷靜客觀、不帶主觀價值陳述的「事實」呈現；也不似西方文學浪漫主義傳統那種充滿異國情調、瑰麗綺思的遊記作品；當然更非學院派人類學家的民族誌作品。由於他在記述之初已有強烈的問題意識，所以雖然他的寫作帶有其一貫的細膩的寫實風格及冷嘲熱諷的筆調，但在寫到其無法接受的信仰教條或狂熱行為時，他還是會以其世俗人本主義的價值立場來予以嚴厲批判，這就是為什麼這本書會成為他最具爭議性著作的原因。奈波爾自己絕無意以客觀中立的第三者自居，讀者也無須將其視為純粹的報導文學。但這種寫法卻使得他的著作比尋常標榜忠實記錄的寫實主義更加「寫實」，因為奈波爾與穆斯林原教旨主義者之間的對話及事後他自己自省式的獨白，非常真切地呈現了西方文明與伊斯蘭文明的價值體系與思維方式的差異性是何等的巨大，這不只是單純的「文化震撼」一詞所能道盡的。也許嘗試從奈波爾的那種角度出發，我們才能更深切地觸及到引爆九一一事件與美阿戰爭的那種敵對雙方內在精神世界的激情。

奈波爾自承其原本對伊斯蘭文化相當陌生，他所具備的知識也不出一般西方知識分子的那種常識式的、教科書式的理解。但或許為了這趟旅行，他曾事前惡補過伊斯蘭信仰、神學與歷史各方面的知識，使他能夠在訪談穆斯林學者或觀察一般宗教活動時，掌握到一些關鍵要點。在記述其參訪各大伊斯蘭歷史聖蹟時，也會有一些相關歷史背景的旁白，當然這一切的材料最後還是被充分融入奈波爾式的反諷筆調，更加令讀者得到對伊斯蘭信仰的栩栩如生，但卻又充滿荒謬迷亂、時空錯置的圖像。對一些虔誠穆斯林信徒而言，很可能會認為奈波爾扭曲了他們宗教傳統的形象。從這點來看，奈波爾的著作確是研究後殖民主義「再現」問題的一個甚佳個案。

在掌握奈波爾的著作主題之前，有必要先對他的這趟旅行的歷史背景做一說明。觸發奈波爾伊斯蘭之旅的因緣，便是他在電視新聞上看到了伊朗什葉派革命的相關報導，一向對第三世界政治局勢關心的他，決定不放棄這個機會，去親身體會伊朗革命的浪潮。結果，這趟旅行使他得以見證了起源於一九七〇年代、迄今仍在持續影響全球局勢的伊斯蘭復興運動的洪流。一九七〇年代是伊斯蘭世界現代史的重大轉捩點。首先，因為中東阿拉伯產油國家在當時全球性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展現了其與歐美強權在能源問題上談判與議價的實力，使得一九七三、七九年的能源危機期間，西方工業國家見識到阿拉伯國家在經濟與外交上的重要性，也使得這些剛從西方殖民主義掙脫出來的新興獨立穆斯林國家感受到更大的民族自信心及認識到先前殖民霸權國家本身的弱點。接著，一九七三年的齋戒月戰爭，埃及以伊斯蘭聖戰做為號召，英勇地對抗以色列的現代化軍隊，一洗一九六七年六日戰爭潰敗之前恥，使得伊斯蘭信仰不但被認為是反動落後的古老傳統，反而使許多穆斯林統治者認為是動員民心士氣、對抗西方帝國主義與猶太錫安主義的有力意識形態。

伊斯蘭覺醒的熱潮在一九七九年伊朗革命達到了最高點。由於伊朗長期以來遭受西方帝國主義的欺凌，二次大戰後由於戰略地位重要，又有石油富源，成為美蘇兩強爭霸的角力場。一九五三年美國支持巴剎維國王復辟之後，企圖使其成為西方忠實的盟邦。像對其他第三世界國家所使用的同樣策略，美國

政府大量對伊朗進行經濟與軍事援助，以協助其現代化發展，但為穩定其政權，故支持巴勒維國王實行軍事威權體制，遍佈國內的情治系統大肆鎮壓伊斯蘭與共產主義的反對勢力，於是西方與以色列的經濟、科技與軍事顧問橫行國內，使巴勒維政權成為典型的殖民買辦政權。由於美國的強力背書，再加上各項現代化建設確實造成了經濟繁榮，而且又有著遍佈全國的軍警情治監控系統防止內部顛覆，故直到革命爆發前夕，少有國際觀察家相信這樣的政權會被如此史無前例的大規模群眾運動所推翻，而革命期間所造成的流血衝突相對而言又是如此的少。難怪後現代主義大師傅柯會讚嘆伊朗什葉革命是二十世紀文明的一大奇觀。當柯梅尼及其他幾位什葉派大教長順利接掌新成立的伊朗共和政權以後，伊斯蘭信仰的革命潛能才被西方及所有伊斯蘭國家深切體認到。緊接著的一九八〇、九〇年代，世人目擊著伊斯蘭世界一波又一波的反抗運動及恐怖主義行動在那些主要衝突點蔓延開來，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也憂慮著伊朗革命的骨牌效應，至此以後伊朗什葉派政權、利比亞格達費政權，以及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就被美國政府經常性地貼上恐怖主義國家的標籤，這也是近二十年來國際衝突的主軸，奈波爾的伊斯蘭之旅等於見證了這個重大轉變的起始點。他在德黑蘭跟隨著來自四面八方湧向德黑蘭大學廣場的群眾，目擊他們參與紀念什葉派殉道者阿里與胡珊的集體禮拜所激起的宗教熱忱，更加了解到正是這樣的受難意識與追求救贖的精神力量推翻了巴勒維政權。

有趣的是，奈波爾所拜訪的這四個國家均不是所謂阿拉伯穆斯林國家。眾所周知，伊斯蘭教起源於阿拉伯半島，包括先知穆罕默德在內的早期穆斯林信眾大多是阿拉伯人，《可蘭經》及《聖訓》也都是阿拉伯文寫成，但這表示阿拉伯民族以外的穆斯林在信仰上就不再那麼純粹或正統了嗎？奈波爾所看到的卻全然不是如此，令他感到訝異的是波斯人、印度人、馬來人等非阿拉伯民族，其對伊斯蘭經典與信條之遵奉同樣嚴謹，部分非阿拉伯信眾對信仰的狂熱甚至比起阿拉伯人有過之而無不及。其實，宗教信仰的邏輯並不等於世俗文化或民族主義的邏輯，某個宗教的傳播超越其創教者的民族疆域在宗教史上是

履見不鮮的，正如身為猶太人的耶穌，其所傳播的福音現今卻普遍為歐美各民族的基督徒所遵奉；本為印度人的佛陀所開啟的解脫之道，今日則為東亞各民族所追求與敬拜。若奈波爾看到非阿拉伯穆斯林竟也對由阿拉伯文所傳述的教義如此虔誠學習與課誦而感到訝異，並謂其拜服在阿拉伯文化之下而迷失了本有的傳統，這不免也是運用世俗主義的邏輯來看待宗教信仰現象了。

奈波爾的伊斯蘭之旅中有兩個反覆一再探討的主題。第一，那些信誓旦旦地聲言要回歸伊斯蘭正信的宗教虔信者如何去看待源自西方的現代文明。可以同時追求現代化科技與物質的繁榮，又可以保有傳統伊斯蘭的生活方式嗎？回歸正信與傳統，在伊斯蘭教的脈絡裡有其具體內涵，即回歸先知穆罕默德時代的以《可蘭經》啟示及先知本人的言行典範做為日常生活指南的生活方式。奈波爾所無法理解的是，何以一千多年前的事蹟和行為準則對這些生活在二十世紀的穆斯林信眾仍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呢？其實，對何謂回歸正信，在伊斯蘭世界中是存在著許多複雜爭辯的，大要可區別為較傾向保守與復古的原教旨主義派，和較主張調和傳統與現代的伊斯蘭現代主義派，但其間的複雜論述無法在此詳述。總之，奈波爾對這些複雜的教義論辯毫無興趣，或者他也並不清楚，而是以其一貫的世俗化現代主義立場，認為宗教傳統與現代文明在骨子裡還是自相矛盾的，並在他與那些高唱恢復傳統的穆斯林知識分子對話時，刻意要引導他們去認識到要想同時保有這兩者根本是自相矛盾的行為。他還特別揶揄巴基斯坦的當代伊斯蘭復興運動教父毛杜迪，一方面提倡以回歸正信來淨化社會，另一方面這位大教長在晚年疾病纏身時，仍必須搭乘現代交通工具飛機前往美國這個「知識國度」，尋求現代醫學科技來解除疾病之苦，最後病逝於波士頓，他嘲諷地指出毛杜迪的「信仰國度」根本無能解決現代生活的實際問題。奈波爾這樣的「傳統／現代」與「信仰／科技」二分的論述，源自西方文明的啟蒙論述，其實這種典型的現代主義觀點已經遭到許多批判與解構了。奈波爾的論述固然能夠符合於西方讀者對第三世界落後的刻板印象，並將落後原因歸咎於第三世界人們的意識形態偏執及非理性的宗教觀念，但穆斯林知識分子不見得會以

此種方式來看待事情，吾人做為東方世界的讀者，對這點亦應有較具批判性的觀點，不得完全掉入西方啟蒙論述的陷阱。

本書的第二個主題，引領我們進入一個連奈波爾自己都包括在內的歷史情境，吾人可將之歸結為：第三世界「後殖民」知識分子的困境，即對自己所出身的傳統社會之落後與封建充滿無奈，但面對西方現代文明之挑戰後，又覺得那種文明雖帶來新知識與新的生活方式，卻造成本土社會被殖民化及傳統社會文化與價值體系的崩解，美好的過去時光已不復存在矣。這種焦慮感與內在矛盾在那些西化較深的第三世界來自中下階層的知識分子更為明顯，他們在接受過西方式現代教育之後，對本土社會的落後都充滿無奈，態度較積極者或期待能奉獻所學，推動社會改革，但由於受制於傳統封建勢力、門閥或軍事威權統治者對社會資源的全面掌握，使他們不但無力推動改革，甚至毫無謀生出路，最後不得不選擇遠走他鄉，移民國外，謀求到西方社會追求發展，於是乎第三世界就這樣地提供了西方世界許多高知識水準的廉價白領工作者。後殖民知識分子的雙重困境便是：因為具備西方現代知識，故與自己的傳統社會與文化格格不入；但來到西方世界後，卻又因為自己尚殘留著的傳統文化的認同感及對故鄉的歸屬感，仍然與當地西方社會充滿疏離，無法在此尋找到本土社會所能有的那種秩序、安定與和諧。在政治上，他們成為西方殖民主義者與本土封建威權統治者的犧牲者；在文化認同上，他們又成了徘徊在本土的保守傳統主義與西方的現代主義之間的雙重邊緣人。這就是為何後殖民的文學創作中，充滿著這麼多流亡遷徙、無家可歸的錯置經驗與想像的交錯。

奈波爾自己就有相似的殖民時代之壓迫經驗和後殖民時代的流亡經驗，雖說他幸運地受過殖民母國所提供的高等教育，且日後由於在文學創作的天賦而享有國際聲譽，終可免於貧難煎迫的流亡生涯，但當他接觸到那些比他不幸的中下階層知識分子時，仍然勾起他早年生活的回憶，並不時地將他自己的疏離感與焦慮感投射到這些年輕人身上，而使他的筆下總是充滿著無奈與悲嘆的註腳，彷彿他能充分理解這些受過高等教育、在自己國家卻找不到出路的知識分子所遭到的身心煎熬。奈波爾以為也正是這樣的具有雙重異化經驗的知識分子，可能會在那些激進的革命意識形態中尋求生命最終的寄託。在伊斯蘭世界，這種中下層知識分子可能有兩種選擇：一種轉向最保守復古的意識形態，即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另一種轉向激進的反傳統與左傾路線，也就是無神論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在伊朗，奈波爾見證了這兩股力量的怪異結合推翻了巴列維王朝，但最後享有傳統威望的保守勢力，即什葉派教長們掌握實質統治權，左派勢力遭受鎮壓；在巴基斯坦，由於從獨立建國以來便是以伊斯蘭信仰做為國家意識形態，無神論共產主義難以立足，故同樣是保守伊斯蘭學者得勢，並與軍事將領聯合統治這個伊斯蘭核子強權。對於那些無法接受這兩種解決方案的知識分子，還有第三個選擇方案：移民國外。巴基斯坦便是這類第三世界知識分子悲劇的典型，透過奈波爾生動又充滿反諷筆調的敘述，讀來格外令人側目心酸。對那些無法忍受借用嚴苛的伊斯蘭正統教條來壓制人民之軍事威權統治的巴基斯坦民眾，充滿神奇的身心治療力量的蘇非聖墓，以及座落在遺世獨立的曠野中的神秘異端教派，又成為苦難的人們追求精神寄託的另類選擇。奈波爾的巴基斯坦之旅這一段寫得是如此的超現實，彷彿置身太虛幻境般，但在那片苦難的大地上，這些虔信者及其教團又是如此地真實與有血有肉，於是神話完全與人類實存的體驗交融在一起。

奈波爾的「後殖民」主題，最後引領我們來討論另一位後殖民大師薩依德對奈波爾著名的批判。對熟悉薩依德著作的台灣讀者來說，當獲知奈波爾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後，大概會記得他就是被薩依德嚴厲批判過的那位專寫第三世界遊記的作家。這裡有必要釐清奈波爾與薩依德之間論辯的主題，以便能夠更加突顯奈波爾著作的「後殖民」主題之歷史與文化情境。雖然這兩位後殖民大師確有某些相似之處，他們都出身於英國殖民地，一在巴勒斯坦，一在千里達，且都是相同的殖民世代，年齡相近，早年成長與受教育期間乃是大英帝國即將沒落的殖民統治末期，故接受的也還都是英式殖民教育，差別是薩依德

的大學以後教育是在美國接受的，奈波爾則在英國。他們對西方文學均造詣極深，兩人成年後都選擇在西方世界定居，並以西方學術界與文壇為其主要創作舞台，但同樣的都仍會從自己的祖國文化汲取創作靈感與材料。但他們創作主題與思想內容的相似處比上述社會背景的相似處更值得注意。二氏的著作清楚呈現出前述的後殖民知識分子之無力感與疏離感，並對自己的本土社會之保守主義文化與威權政治體制給予嚴厲的批判，他們基本上也都將自己定位為世俗人本主義知識分子，對宗教的原教旨主義極為反感。但就批判的態度上則有根本的不同，奈波爾是用一種冷嘲熱諷、冷眼旁觀的態度，與其批判的對象保持距離；薩依德則是充滿愛之深、責之切的情感，既批判又充滿同情的諒解，彷彿完全投入在他所描述的世界之中。結果，在政治上，奈波爾不過是一位帶點同情又鄙視的觀察者而已；薩依德卻成為實際的行動者。個人以為這種差異最重要的在於源自兩人的歷史經驗之根本不同，這個不同點足以理解薩依德批判奈波爾的主要論點。

薩依德認為奈波爾的著作，屬於康拉德以降的描寫西方殖民主義的寫實主義文學傳統，這個傳統的特出主題除了對殖民地的壓迫與不公充滿人道主義式的同情之外，便是對西方殖民者撤離後的後殖民社會之動亂、貧困、失序，以及本土民族主義統治者的腐敗與殘暴，充滿著生動的描繪與無奈的控訴，彷彿後殖民時代其實比西方殖民時代更加令人難以忍受。薩依德認為，甚至在後殖民時代的一些第三世界的作家，也同樣分享著西方作家的這種以「帝國之眼」來看待自己的後殖民社會的觀點，奈波爾正是一例。薩依德質疑這是對後殖民時代的第三世界民族主義的唯一再現方式嗎？為何這樣的再現方式仍然在後殖民時代的西方文壇一再地被再生產呢？是否這又是要滿足西方優越性心態的另一種表現形式呢？這個主題的反覆出現容易將讀者導入下列看法：反正第三世界人民若沒有西方殖民者所帶來的繁榮與秩序，根本上還是會陷入其固有的落後與封建的歷史停滯狀態。本土民族主義趕走了帝國主義之後，只是使得非理性的意識形態重新宰制這些落後的民族罷了！後殖民時代的第三世界歷史只不過又重新倒退到

其原始的野蠻狀態罷了！薩依德認為包括奈波爾在內的許多當代活躍於西方文壇的作家有著相似的心態，反覆一套相近的再現方式，並竟而美化了西方殖民主義的歷史遺產，全然忽略這些後殖民國家的動亂和貧困與西方強權持續的帝國主義政策干預有著密切關係的歷史事實。

薩依德對奈波爾的這種批判與定位是否公允，應由讀者在閱讀他的著作時自行評價。當然，奈波爾在本書中對穆斯林宗教狂熱的譏嘲是事實；他在著名的印度三部曲中對自己印度祖國人民的苛責也是事實；其中的部分段落流露出對英國殖民文化遺產的緬古懷舊之憂思，感嘆美好的過去時光之流逝不再，這種筆調令人聯想到一些台灣本土老一代作家在敘述日據時代所呈現的那種思古幽情。個人以為，薩依德與奈波爾的對立可以從其不同的出身背景與歷史經驗來理解。奈氏本人是印度移民千里達的第三代，與母國社會與文化傳統的疏離及西方殖民教育的深刻影響，對照薩依德自小仍成長於中東伊斯蘭世界，成年之後始定居美國的這種第一代移民，其對祖國社會文化與政治衝突都仍有置身其中的體驗，故兩人的態度與抉擇自然大異其趣。薩依德對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雖仍有嚴厲批判，但卻賦予其正面的歷史意義，視其為後殖民的伊斯蘭世界尋求民族解放的道路上，為擺脫西方文化霸權宰制所進行的文化自覺與建構想像的社群之「去殖民化」的實踐。奈波爾則對印度教的崇尚虛幻玄想，伊斯蘭教的標榜正信教條，除了嘲諷揶揄外，根本缺乏耐心去做同情式的了解。無論如何，撇開「政治正確性」的價值判斷，純就文學鑑賞的角度來看，薩依德與奈波爾都算是充分地表現了後殖民主義知識分子某種深刻的歷史自覺意識，並轉化為一種恰如其分的文學創作風格。

邁入二十一世紀的人類文明，一方面有人正忙著為全球的資本主義化高奏凱歌或重彈「地球村」神話的老調；另一些人則對近年來的國際局勢動亂發表憂鬱的預言或以聳動的「文明衝突」論來構思未來。這些西方社會科學所建構的兩極看法，似乎難以擺脫掉「我群／他者」的二元論世界觀，對人類心靈的複雜深度少有觸及。奈波爾的著作也算是對現今充滿族群衝突與意識形態對立的時代，提出了相當

寫實與深刻的人性證言。從這種對異文化的體驗中，吾人真切地感受到「他者」的可憎與威脅，如何超越這種源自心靈深處的恐懼，或許才是解決後殖民時代的文明衝突之關鍵所在。

（蔡源林：台灣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美國天普大學宗教學博士，現任國立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第一部]

伊朗：學生革命

一 死亡協約

薩德克原本應該跟我一道兒從德黑蘭出發，南下一百哩，前往聖城科姆（Qom）。我從未真正見過薩德克，一切安排都是在電話裡敲定的。我需要一個伊朗翻譯隨行，大使館裡就有人跟我提起薩德克的名字。

薩德克整天都有空，因為自從革命之後，他跟許多人一樣，頓時發現自己失業了。他有一輛車子。我們在電話裡交談時，他說，要去科姆，我們最好開他的車子去；伊朗巴士糟糕透頂，車速快得嚇人，開車司機根本不在乎。

我們談妥了價錢，包括使用他的車子、他的駕駛勞務與他的翻譯工作；而他開價也相當合理。他說，我們第二天早晨應該盡早動身，好避開炎熱的八月天。他會先載他太太去上班——她的工作還是保住了，接著就直接開車到旅館接我。我應該在七點三十分以前準備就緒。

他到的時候，已經快要八點了。他年近三十，個頭矮小，穿著搭配頗為細心，英俊，一頭悉心修剪的頭髮。我不喜歡他。我看他只是個出身不高、略略受過幾年教育的人，卻帶著某種冷嘲熱諷的驕傲，表面上畢恭畢敬，內心卻充滿憤憤不平，不喜歡自己現在在做的事情。就是像他這樣的人，毫無政治信念，只有滿心忿怨，才搞出伊朗革命的。跟他聊上一兩個小時，可能還有點意思；要跟他朝夕相處個幾

「科姆這個地方的人哪，整天談的就是宗教，不然就在判定誰還值得救贖，又是誰該下地獄去，除此之外，每個人都沉默是金，嘴巴都閉得緊緊的。你在這裡碰上的人，要不是先知的後人，就是律師……搞不好，哈吉兄，你還不知道呢，這裡就是大名鼎鼎的米爾札·阿布杜爾·科錫姆的住宅，他可是我們波斯人的頭號穆實特黑德〔聖人〕；這個人，倘若使出渾身解數的話，不管他要散播什麼樣的政令教條，民眾都會聽得俯首貼耳的。他的影響力就是這樣無遠弗屆，很多人都相信，要他顛覆皇上本身的威權，他也有這個能耐。全國臣民都會將皇帝詔書棄如蔽屣，連廢紙都不如呢。」

——詹姆士·莫理爾：《伊斯法罕的哈吉·巴巴歷險記》（一八二四年）

天，就沒那麼容易了，可是，木已成舟，我也只有繼續跟他耗下去了。

他面露微笑，可是，他帶了一個壞消息給我。他覺得開他的車子恐怕到不了科姆。

我不相信他。我想，他不過是臨時改變主意罷了。

我說：「開車是你的主意。我本來也只想搭巴士去科姆的。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之間發生了什麼事情嗎？」

「車子拋錨了。」

「你出門之前為什麼不撥個電話給我呢？假如你先打過電話給我，我們還可以改搭八點鐘開車的巴士。現在，我們連那班巴士也趕不上了。」

「我送我太太上班之後，車子就拋錨了。你今天真的想要去科姆嗎？」

「車子出了什麼毛病？」

「要是你真的想去科姆的話，我們可以開車碰碰運氣。我的車子只要能發動就可以走了，毛病就在怎麼發動車子而已。」

我們過去端詳那輛車子。他的車子好端端的停在路旁，離旅館大門不遠，讓我懷疑究竟有沒有拋錨。薩德克坐進駕駛座。他探頭喊住一個路人——某個在德黑蘭街頭遊手好閒的工人，我和那個人人在後頭就開始推車。一個拎著公事包的年輕男人，可能是個坐辦公室的，正在上班途中，也自告奮勇地過來幫忙。馬路開挖施工，塵土飛揚；車子同樣也灰撲撲的。氣溫炎熱，一旁過往的汽車與卡車排出的廢氣，更是火上加油。現在，我們順著車輛流動的方向推車，而非逆向使勁兒；這期間，薩德克一直氣定神閒地坐在方向盤後面。

人行道上陸續有人下來幫忙一陣子，接著就回頭辦自己的正事去。我突然想起來，是啊，我也該回頭辦自己的正事去。而像這樣——前前後後地幫薩德克推車——是到不了科姆的。好的開始，才是成功

的一半，開頭如果這麼黯淡，後面怎麼會有好結果呢？於是，當時我沒跟任何人打過招呼，事後也沒有一言半語，就離開了薩德克和他的車子，還有那群自動幫助推車的路人，自個兒回到旅館去了。

德黑蘭交通

我打了個電話給貝札德。當時也有人向我推薦請貝札德當我的翻譯。可是，聯絡他可費了我一番工夫：他還是個學生，在德黑蘭這個大城市裡，沒有固定的落腳之處。而前天晚上，在他來電之前，我已經選擇僱請薩德克了。我告訴貝札德，我的計畫是如何泡湯的，他也沒有推三阻四的拿翹，這一點我很欣賞。他說他還是有空，而且他會在一個小時內跟我會合。

他認為，我們不該自己開車到科姆，巴士比較便宜，我也可以順便多多見識伊朗人民的生活起居。他也說，我們出發之前應該先填飽肚子。現在正值齋月，這整個月裡，從日出到日落，穆斯林都封齋不逾；而像科姆這樣一個到處都是毛拉¹和阿亞圖拉²的城市，更不可能找到供應飲食的店家。這個國家有些地方，普遍洋溢著伊斯蘭的宗教激情，還有人因為封齋破戒而遭到鞭刑呢。

貝札德的言談方式，即使只是電話交談，都與薩德克不同。薩德克只是個社會地位逐漸上升的小頭銳面人士，說不定只比貧農階級高出那麼一兩階，卻費心裝出他比一般伊朗群眾都高明的樣子。可是，他並沒比別人好到哪裡去，真的；他那雙笑咪咪的眼睛裡，深鎖著多少伊朗的歇斯底里與困惑。貝札德

1 毛拉 (Mullah)：穆斯林對於伊斯蘭教高僧、學者、教師、教法專家的敬稱。

2 阿亞圖拉 (Ayatollah)：伊斯蘭教中什葉派對於知曉教義的法官的尊稱，其阿拉伯字源意謂著：真主的奇蹟徵兆。阿亞圖拉在伊朗更帶有特殊意義，意指該國之政教領袖。

卻能說明自己的國家，好壞和盤托出，語氣也還是盡量保持客觀。

而當他依照自己約定的時間，準時跟我在旅館大廳碰面時，我一看到他，就覺得寬心自在。他比薩德克年輕，個子也比較高，膚色也較為黧黑。他的教育程度也比較高，舉手投足不見一絲花稍，絲毫沒有薩德克的緊張與露骨的驕矜。

我們搭乘定線計程車——這是德黑蘭市裡行駛固定路線的計程車——前往德黑蘭南區的巴士總站。德黑蘭北區是這個城市格調比較高的地區，開展深入在一片棕色山丘上，山丘輪廓隱沒在日間霾霧裡；公園綠地與花園多半集中在此，遍植懸鈴木的通渠大道縱橫貫穿，昂貴的公寓建築、旅館與飯店。德黑蘭南區就還是個東方城市，居民稠密，空間狹窄，比較像個市集，擠滿了遠從鄉間遷入的人民；而民眾聚集在巴士總站前塵沙遍布、垃圾滿地的廣場上，就像一群鄉下來的烏合之眾。

車站內一間污穢的辦公室裡，有個人跟貝札德說，半個小時後會有一班車開往科姆。那輛巴士停在大太陽下，車上空空如也。車頂上沒有行李與包裹，車廂外沒有耐心卓越的農民在一旁守候，或是坐進車裡忍受蒸烤。這輛巴士看來要在廣場停上一整天。我不相信這班車會在半個小時後出發。貝札德也不敢置信。德黑蘭還有另外一處巴士站，提供空調車廂，還可以預定座位。貝札德找到一具電話，摸出幾個銅板，撥了電話，無人應答。八月驕陽益發熾烈，空氣中的灰塵更重了。

另外一輛定線計程車將我們載到一處位於德黑蘭中區的公車總站。一列長長的櫃檯上方，一塊告示板上寫著一連串偏遠的伊朗城鎮；這裡甚至每天發車一班，經過土耳其，前往歐洲。可是，早上開往科姆的巴士已經走了，下一班車還要再等上好幾個鐘頭。現在時間將近中午，我們一籌莫展，只好回到旅館，再想想看下一步該怎麼辦。

我們徒步前行；定線計程車一位難求。交通擁擠。德黑蘭，自從革命以後，就不再稱得上是個運作有效率的都會了；只不過居民有車可以代步罷了，而這座怠惰的城市——許多計畫戛然廢止，多少興建

到一半的建築物頂上停駐著一動不動的吊車——可以給人一種窮忙瞎攪和的絕望印象。

如此絕望也體現在伊朗人開車的瘋勁兒上面。他們開車的德性就像是從來沒見過機動車輛一樣。他們開車就像他們走路一樣；而德黑蘭的車流就因人人突如其來地停車、轉向而抽搐失序，車輛不見明顯分道，有如人行道上一群推推搡搡、挨挨蹭蹭的步行群眾。如此駕駛風格，不見得就有德黑蘭特殊的運氣保佑。每兩輛車就有一部的車門或是擋泥板給撞凹了，或是撞凹後再加以扳金修復。當地報紙（歸咎伊朗國王不曾為德黑蘭建設較為現代化的道路系統）上有一篇報導指出，車禍死亡是德黑蘭最嚴重的單一死因，每個月有兩千人因車禍而死或受傷。

我們來到一處十字路口，而我就是在那裡跟貝札德走失的。我一心想等到車流稍止，可是貝札德沒有等我。他只是自顧自地過馬路，分別依序處理每一輛即將迫近的車子，腳步有時停下，有時加快，偶爾打個手勢指明他行進的方向，而且就像個踩著一根細長倒木樹幹、通過一道森林峽谷的人一樣，他絕不回頭。一直到他通過馬路，安全抵達對岸，才回頭過來找我。他揮手要我過去，只是我動彈不得，手足無措。交通燈誌已經停止運作，車輛還是川流不息。

他了解我的困惑無助。他又重新穿越車陣，回到馬路這一邊接我——就像隻紅松雞母雞領著小雞涉水度過湍急的溪流一樣——他帶著我通過一個又一個、彷彿隨時可以將我席捲而去的險惡激流。他牽著我的手帶我過街，就像紅松雞母雞走在小雞身旁、較為下游的一側，抵擋隨時可以將那些小東西捲走的流水衝力。就這樣，貝札德讓我跟在他身側，走在比我稍前一步的距離，略略錯開行進方向，如此，即使有人飛車奔來，先撞上的也是他。

而當我們終於過了街之後，他說：「你一定要讓我牽著你的手走路。」

其實，我早就開始這麼做了。要是沒有貝札德，沒有他給予我的語言協助的話，我在德黑蘭只是個半瞎的盲人。而置身這些街道上，卻看不懂人家的語言，尤其令我深感挫折，街上處處飛舞著五色繽紛

的標語，招展著鐵畫銀鉤的波斯文字，你塗鴉過來，我反塗鴉過去，牆上還貼著革命海報與嗜血的漫畫。現在，多虧貝札德，路邊牆壁開口說話了，其他許多事物也多了一份意義，眼中這個都市也改變了。

剛開始，貝札德的評論還算中立，我還自忖這是他的正確考量，謹守本分，不願逾越他身為翻譯者的責任。可是，貝札德之所以中立，因為，他自己也困惑不解。他是個革命分子，他也樂見伊朗國王垮台；不過，席捲伊朗的宗教革命可不是貝札德想要的革命。貝札德是個缺乏宗教信仰的人。

這怎麼可能呢？出生在像伊朗這樣的國家，又在地方城鎮長大，他是怎麼學著擺脫宗教的束縛的呢？貝札德說，簡單的很。他的父母從來不以宗教來教養他；他也從來沒被家人送進清真寺過。伊斯蘭教是個複雜的宗教，既無哲學屬性，也不是純玄想的。伊斯蘭教是種經過真主啟示的宗教，有個先知，以及一整套規矩。真要虔信伊斯蘭教，一定要廣泛知悉這個宗教的阿拉伯起源，然後還要徹底了解這項知識。

然而，伊斯蘭教在伊朗就更複雜了。伊朗的伊斯蘭教分歧自外於主流信仰；如此分歧又肇因於先知在西元六三二年去世之時，因為繼任人選而引發的政治——種族糾紛。伊斯蘭，幾乎從立教之始，就不光只是一種宗教，還是種領土擴張主義。伊斯蘭教的早期歷史與羅馬帝國史驚人地相似，幾乎就是後者的快速放映版，同樣都是從城邦國家興起，擴大為雄踞半島的霸主，再進一步演變為帝國，彼此在每個階段都出現相當的緊張情勢。

伊朗的分歧日後轉為教條性的差異，因此，分歧之中又見分歧。伊朗人認定了一條繼承先知地位的特殊譜系。可是，這條伊朗譜系的第四順位者，第四伊瑪目，有一群死忠擁護者，他們公開宣示，與分歧後的主流信仰分道揚鑣；另外一群信眾卻對第七順位者情有獨鍾。伊朗境內只有一位伊瑪目，第八順位者（跟第四順位者一樣，遭人下毒謀殺）死後厚葬在本地；他的陵墓就設在麥什德（Mashhad），距離蘇俄邊境不遠，也是個朝聖的目標。

貝札德說：「那些人很多都被殺了，或是慘遭毒斃。」彷彿在說明他缺乏信仰的緣故。

伊斯蘭教在伊朗，什葉派伊斯蘭教（Shia Islam）可就更錯綜複雜了。要為遠古以來的仇恨注入活水，即使事隔千年，私人復仇的意念絕對不能鬆動，還要擬出一紙特殊名單，歷歷列舉英雄和殉教烈士和惡棍人等，茲事體大，只有加強教諭才能畢其功。而貝札德不曾領受過如此教誨；他只是躲得遠遠的。他充其量只受過他父親的不信教教誨罷了，而他父親是個共產主義者。貝札德的父親多談窮人，少提聖人。貝札德誠惶誠恐地銘記在心的回憶，只是他父親首次跟他講到貧窮的那一天——他自己的貧窮，以及他人的貧窮。

等待第十二順位伊瑪目

土耳其大使館外人行道上，兩個裹著頭巾、皮膚曬得焦黑了的草藥郎中席地而坐，展售他們染上色素的藥粉、樹根與礦物石塊。我在德黑蘭曾經看過其他的草藥郎中，以為他們不過就等同於印度的順勢療法巫醫。可是，這些郎中卻自稱傳承幾個赫赫有名的醫療權威名號——誠如貝札德在聽過他們對一群農民發表的促銷演說之後——他們竟然可以跟阿維森納、蓋倫與「希波塔特」⁴牽扯上關係。

阿維森納！對我而言，只是個名字而已，某個中世紀的歐洲人；我從來沒想到，他竟然是個波斯

3 伊瑪目（Imam）：什葉派宗教領袖，或是聲稱繼承穆罕默德的任何政教領袖。

4 阿維森納，蓋倫與「希波塔特」：阿維森納（Avicenna），九八〇—一〇三七，伊斯蘭醫學家、哲學家、波斯人，著有《治療論》、《醫典》等學術名著；蓋倫（Claudius Galen），古希臘醫師、生理學家與哲學家，從動物解剖來推論人體構造，再以亞里斯多德的理論加以闡述；「希波塔特」，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的訛轉，古希臘名醫，享有「醫學之父」的盛名，遺留同名文集一部，內容包括解剖、臨牀、婦幼疾病與預後等等。

人。這一條灰撲撲的人行道上的藥草攤子，竟然還延續著千年以前的阿拉伯榮耀，當阿拉伯的信仰揉雜了波斯與印度與其統馭的古典世界，穆斯林文明就成為西方世界的中心文明。

貝札德的反應不像我這般敬畏有加。穆斯林光榮的過去，他根本就無所謂，他也壓根不信這種地攤醫學。伊朗國王的建築，他同樣也不放在眼裡：伊朗中央銀行古色古香的波斯圖案，還有伊朗自稱早於伊斯蘭文化之前的亞利安榮光等等。在貝札德看來，波斯古蹟上的街道，以及君主國的古蹟，都不過是伊朗國王虛妄誇飾的局部表現。

他望著中央銀行，望著建築上的青銅與大理石，毫無熱情地說道：「那些東西對我一點意義也沒有。」他完全破除偶像與迷信了嗎？如果濼卻了他對伊朗人民的熱愛，他渾身上下還有什麼地方屬於波斯或伊朗嗎？難道他的政治信仰已經將他徹底洗腦得一乾二淨了嗎？

他的政治信念還未竟全功。德黑蘭經歷過一番革命，不過，尋常生活卻頗為離奇地照常運作，人行道上，置身於強力要求以血還血的標語與海報之間，販售圖像的小販安之若素。他們販賣放大的瑞士湖泊或是德國森林的彩色照片；他們販售著河川林木交織的夢幻風景。他們還賣兒童與美女的畫像，只是，畫中的女人啜泣，孩童也止不住淚水，大顆、凝膠狀的眼淚，直直垂落，滴淌在臉頰下頰。

貝札德，他的父親是位波斯文學教師，說道：「波斯詩歌裡充滿了哀愁。」

我說：「可是，為賦新詞強說愁，只為了流淚而流淚，貝札德——」
他彷彿根本無意討論眼前擺明了的事實，也無意傾聽任何藝術廢話，他堅定不移地說：「那些眼淚美極了。」

這個話題我們就此打住。然後，我們一邊走著，一邊從眼淚的話題重新兜回到革命上。我在德黑蘭許多地方都看到兩張海報。兩張海報尺寸一致，版面風格相同，顯然是為了成雙張貼而設計。一張畫面上是一小群農民在田裡幹活，不曉得是推著一輛獨輪推車，還是一具犁架——究竟為何，不太能從海報

上的素描明顯看出。另外一張海報上畫的是側面剪影，一夥群眾高舉著來福槍，彷彿在對彼此致意。兩張海報看來都在謳歌人民革命：一群覺醒後的勝利人民，勞動大眾找到新的尊嚴。只是，海報上方的波斯文字是什麼意思？

貝札德為我翻譯道：「第十二順位伊瑪目，我們正在等著您呢。」

「那是什麼意思？」

「意思就是他們正在等待第十二順位伊瑪目啊。」

第十二順位伊瑪目在伊朗是先知繼任人選譜系的最後一位⁵。那條譜系早在一千一百年前就斷線了。可是，第十二順位伊瑪目沒有死，他還存活在某個地方，等著重回故土。而他的人民正等著他；伊朗革命正是奉獻給他的大禮。

至此，貝札德就幫不上我的忙了；他無法讓我了解伊朗人民的狂喜，他只能就事實現況平鋪直敘。貝札德本身雖無信仰，可是他周遭環繞的都是信仰，他也可以了解其情緒之興奮。在他而言，光是那麼一句話就已經夠了——而他也確實如實陳述，毫無挖苦嘲諷——第十二順位伊瑪目就是第十二順位伊瑪目啊。

稍後，在我的伊斯蘭國家旅途中，在我逐漸熟悉艱深的史實與系譜發展之後，在這些歷史片段逐漸成為易懂能解的信條之後，我才開始稍微領悟穆斯林的狂熱。可是，當貝札德幫我翻譯革命海報上的波斯文字時，我確實是一頭霧水。

革命之前，伊朗人大筆揮灑在倫敦或是其他國外都市牆壁上的標語，從未提到這位隱而不現的彌賽

⁵ 第十二順位伊瑪目 (Twelfth Imam)，又稱隱藏的伊瑪目 (Hidden Imam)，是穆罕默德·阿瑪迪 (Muhammad al-Mahdi al-Hujjah)，他於西元八七八年失蹤。據信，他是被真主藏匿了起來，而且將會重現於世。

亞。他們總是寫著——用英文寫的——宣揚民主；揭露伊朗國王御用秘密警察的暴行；抗議伊朗國王的「法西斯」。打倒法西斯國王：那可是當年一再出現的標語。

當時，我並沒有緊盯著伊朗情勢的後續發展；可是，光是從倫敦和其他海外伊朗人的牆壁塗鴉看來，宗教一直要到伊朗國內抗議後期才逐漸參上一腳。伊朗革命爆發之後，我才領悟到，其間竟然有一位流放海外多年的宗教領袖——阿亞圖拉何梅尼，我覺得整個革命期間，他登場的時間相當晚。隨著革命進展，他的神聖義務與權威才與之增長，直到最後，外人看來反而會以為兩者始終與革命同行。

公開現身之後，這位阿亞圖拉不只能為伊朗人詮釋真主的意旨，先前所有抗議伊朗國王「法西斯」專政的不滿呼聲，拜何梅尼崛起介入所賜，全都消音無蹤，或淪為無足輕重的瑣碎囁語。而他也欣然接受自己的角色。正如他在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二日，刊載在《紐約時報》上，針對「全世界的基督徒」發言的廣告裡自許的一樣，他的角色就是扮演詮釋真主意旨的解說者。三個星期之後，他就結束在法國的流放生涯，回到伊朗。

何梅尼的廣告訊息中，一半是真主的賜福與祝賀。「全能真主賜福與祝賀福澤滿溢的耶穌……其榮耀之母親……祝賀所有神職人員……所有愛好自由的基督徒。」另外一半則是呼籲所有的基督徒為神聖的日子祈禱，並且警告那些「運用撒旦惡力支持暴君伊朗國王的基督教國家領袖們」。

而何梅尼就以真主意旨詮釋者之姿，以判別合乎、抑或違逆伊斯蘭教義之最後審判者自居，來統治伊朗。我到達伊朗幾天之後，他在收音機裡就這麼說了：「我一定要敬告諸位，先前在極權統治之下，罷工與靜坐抗議令真主十分歡喜。可是，現在的執政者已經換成一位穆斯林了，而且還是代表全國國民的。敵人正忙著對我圖謀不軌，因此，現在再發動罷工或是靜坐就為宗教所不容，因為，這樣就違背了伊斯蘭教的教義。」

這話聽來耳熟，即使在德黑蘭過了幾天，知識上還差可理解；其人身兼政治領袖與真主喉舌之特殊權威。可是，講到革命不只是革命，還是奉獻給第十二順位伊瑪目的大禮，而這位伊瑪目早就在公元八七三年銷聲匿跡，至今還神秘隱身在某處，這種概念，就沒那麼好懂了。此外，還有模仿二十世紀末葉的革命主題⁶——歌頌農民與都市游擊隊的海報、革命衛隊身上穿著的切·格瓦拉⁷外套等——就讓人迷惑不解了。

透過貝札德的翻譯，牆壁開口說話，德黑蘭感覺更加離奇。而德黑蘭北區——昂貴的歐洲一角，所費不貲地坐落在山丘塵沙與岩石之間，伊朗國王與大群中產階級，憑恃著原油出產的非創造性財富所創造出來的城區，感覺更像是一場幻夢。這裡摩天大樓與國際飯店林立，櫛比鱗次的店舖展售著國際名牌的昂貴商品；可是，這個大都會就接枝在德黑蘭南區上。北區就是從德黑蘭南區的社群，過於快速地演進蛻變而生。然而，德黑蘭南區遵從著真主的意旨，以及第十二順位伊瑪目，卻反過頭來重重地壓低北區。

旅行緣起

穆斯林構成了千里達島上一小撮印度人社群的一部分，而我正好出生在這個社群之中；可以說，我打從出生就知道有穆斯林這群人了，可是，我對他們的宗教幾乎一無所知。我自己的背景是印度教，而我從小時候就知道，穆斯林，即使他們的祖籍也是來自印度，很多地方都跟我們相仿，但是他們跟我們

⁶ 原文如此，作者此處所指的國際共產運動史實，如第一國際、第二國際等，應該都是發生在十九世紀中葉至末葉期間。

⁷ 切·格瓦拉（Che Guevara）：為二十世紀的革命英雄象徵，也有人說他是革命浪漫主義的最後偶像。出生於阿根廷，協助卡斯楚於古巴革命成功後，成為古巴家喻戶曉的英雄；然而他放棄高位，再度率領游擊隊，於一九六七年投效玻利維亞，策動革命，遭到擒殺，享年三十九歲。

就是不一樣。從來沒人教論我這種宗教的細節，或許，我家裡也沒有人真懂伊斯蘭教。印度教徒與穆斯林之間的差別，說來比較像是不同的群眾感受，本質頗為神秘；我們印度教徒與穆斯林的父祖們，從印度帶來的彼此仇視，已經軟化為某種鄉俗智慧，熟知對方之不牢靠與背信惡習。

我自己不是個有信仰的人，對於我成長期間接觸的儀式與典禮，也只是一知半解。在種族組成如此複雜的千里達，我的印度教其實只是附帶在我的家庭與其行事方式之上，附加在我自己跟他人的差別上；而在我的想像之中，宗教信仰之於穆斯林與其他教徒，可能也只是類似的附屬特質與隱私吧。

我對伊斯蘭教的了解，差不多就是外界對伊斯蘭教的認識。他們有個先知與一本《可蘭經》；他們相信真主只有一位，也同樣厭惡偶像；他們也有天堂與地獄的觀點，雖然總是跟我的觀念不同。他們有自己的殉教烈士。一年一度，他們總會將縮小的毛索洛斯基（mausolea）模型架在輪子上，推到市集遊街；男人頂著沉重的彎月「舞蹈」，彎月有時搖晃到這一邊，接著又晃向另一邊；鼓聲喧天，有時還會舉行儀式性的棍棒舞鬥。

棍棒舞鬥是在模仿某一場古代戰役，然而，遊行的出發點是為了追悼，紀念某次失利的戰鬥。那場戰役發生在哪裡？又是為何而戰？當時，我只是個孩子，從來也沒問過大人；許久之後，我才知道，那種節慶——不光是穆斯林，連印度教徒都會參加——基本上是什葉派的慶典，那場戰役跟先知的繼任人選有關，戰爭發生在伊拉克，遊行中特別追悼的人是穆罕默德的孫子。

就我這個教外人士從旁觀察，伊斯蘭教不若印度教抽象玄奧，比較直截了當。這個宗教包含了疑懼與獎賞，古怪地結合了戰爭與世俗的悲悼，教義中太多成分讓我想起基督教——在千里達島上就顯眼得多，也「正式」多了，因此，我也才能藉以了解伊斯蘭教。伊斯蘭教條，或是說，我眼中以為的教條，並不吸引我，其教義看來並不值得深入鑽研。爾後許多年間，即便行旅過境，除了童年時期在千里達耳濡目染的見聞以外，我的伊斯蘭教知識還是未見大幅增長。這個宗教的輝煌史蹟僅止於遙遠的過去；伊

斯蘭教不曾發像是文藝復興的盛況。穆斯林國家，不是淪為殖民地，就是專制國家；而且，幾乎所有的穆斯林國家，在挖到原油以前都貧無立錐。

上一個冬季，就在伊朗革命期間，到幾個穆斯林國家旅行訪問的主意突然襲上我心。當時，我在美國康乃迪克州，好幾個晚上，我正收看著電視新聞。伊朗動盪不但令我關注，某些電視節目裡應邀接受訪問的幾個旅美伊朗人，也同樣讓我好奇不已。

節目裡有個穿著蘇格蘭呢外套的男人，開口閉口馬克思主義論調，可是，他製造的印象卻遠比他的言語要複雜。他有些花稍，洋洋得意於自己能如此信手拈來、嫻熟地運用專門術語，就像在展現他操弄某種外國語言裡的慣用語的本事。他為他的伊朗革命感到驕傲——革命給了他某種榮光。可是，他也察覺到，這場革命的宗教面，在他的觀眾中，可就沒那麼光彩了；而他也企圖——借助於他的蘇格蘭呢外套、他的慣用語、他的風采——表現出他教養之高超絕不輸給任何一位觀眾，而且他也是以與觀眾同樣的方式教養長大的。

另一個晚上，另一個節目裡，一名伊朗女士蒙著她的頭，在電視上宣告大家：伊斯蘭教保護了婦女，並且給予她們尊嚴。她說，阿拉伯地區四百年前，女童往往淪於活埋；好在伊斯蘭教崛起，才遏阻了這種陋習。不過，我們並不都住在阿拉伯地區（那位蒙著頭的婦女也不住在那裡）；而且，自從第七世紀以後，朝代更替，世事多所改觀。女人，尤其是像這位對著我們說教的強悍女士，還需要伊斯蘭教所賦予的特殊保護嗎？她們還需要面紗嗎？她們還需要禁足於公共場所之外，也不准出現在電視上嗎？

這些都是湧上我心頭的疑問。不過，電視節目的主持人，每天都要對著受訪者提出事先套好招的問題，無心囉唆。他繼續下一個問題，詢問那位女士，請問她希望見到伊朗成為何種伊斯蘭國家？她心中理想的伊朗，應該跟沙烏地阿拉伯一樣嗎？此妹胸中早已蓄積充足的怒火，當下就發作起來；她的面容就在黑色四角布裡，她看起來就像個憤怒的修女，隨即她高聲嚴詞斥責。她說，這是許多人犯下的錯

誤；不過，沙烏地阿拉伯算不上伊斯蘭國家。看起來，她似乎在說沙烏地阿拉伯只是個公認的野蠻國家，伊朗的伊斯蘭國家將與其迥然有別。

我從電視上聽到的第三個伊朗人，則是在講述伊斯蘭教律法的美妙所在。不過，當時他在幹什麼？他在一所美國大學裡研讀法律？美國與美國所代表的文化究竟何德何能，吸引了這些伊朗人離鄉背井？他們說不出所以然來嗎？美國確實有其吸引力，而不光只是提供教育和技能而已，只是，沒有人會承認這種吸聚力；同時，委實令一個古老而驕傲的民族難以承認的是，如此吸引力之中還隱藏著一絲障礙——表現在花稍舉止、模仿、吹噓與拒斥之上。

裹著黑色四角巾的女人，因為美國教育，或者說，非伊斯蘭教育，而獲得能力與權威。而今，她站出來質疑她自己所長成的這種人有何價值；她甚至否定自己的某些天賦。這些美國電視上的伊朗人，全都非常在意他們的美國觀眾，給人的印象，似乎他們還意在言外。或許，他們無法闡述所有的感受；或許，有些事情，他們寧可帶過不表。（我一直到來伊朗以後，才明白裹著黑色四角巾的女人講到沙烏地阿拉伯的時候，究竟是什麼意思。其間牽涉到不同教派的彼此區隔，對電視觀眾而言，或許就太複雜了：阿拉伯人與波斯人分屬不同教派，各有不同的先知繼任譜系，彼此之間存在著歷史怨憎。）

我從一本備受好評、最近才翻閱拜讀完畢的伊朗小說裡學到的更多。人人都可以隱匿在平鋪直敘的聲明背後；虛構小說，表面上漫無頭緒與方向，隱藏的衝動反而無所遁形。這本小說——《外國人》（*Foreigner*），根據其美國出版公司描述，是第一本伊朗人以英文寫作的小說，作者是一位年輕女性娜惜德·拉克林（*Nahid Rahnin*）。小說出版於一九七八年，伊朗國王仍然在位。全書迴避了政治評論，書中迂迴抗議，政治上的限制驅策深化了激情。而這本小說，雖然放出純真的煙幕，其實充斥著婦女遭受到的暴行、她們的無助與挫敗。

敘述者斐莉是一位定居波士頓的伊朗女性，時年三十二歲。她在美國求學，嫁給一位美國大學教師，而且在一所研究機構擔任生物學者。斐莉一時心血來潮，回到德黑蘭度假兩週。她所回到的都市竟然車滿為患，而且還擠滿了「西方」建築（「西方」一詞，而非「嶄新」或「現代化」，可以窺見敘述者奇異的措詞方式）；可是，那並不是個富有魅力的都市。街道上可能盜匪層出；而老房子圍住的天井之中，家庭生活束縛既多，又骯髒難堪，還勾起斐莉的回憶，回想起親人意欲亂倫的接觸，女人家談起月經與強姦，還有女人聚在一道兒，聆聽一位穆斯林教士每個月的佈道演說，每當她們聽講到伊朗什葉派英雄的悲劇時，就一定捶胸頓足、嚎啕大哭的情景。

斐莉自己的家庭生活並不完整。她的母親跟另一個男人住在另外一個鎮上；她的父親再娶。斐莉決定縮短假期，提前回到波士頓。要回美國，她得先拿到伊朗的出境許可；要拿到出境許可，她還要先獲得她的丈夫允許。至此，她似乎已經陷入泥沼，再也無法回到潔淨有致、風光明媚的波士頓郊區了。

她出門去尋找她的母親，結果在一處破落鄉間小鎮找到一個哀愁而落魄的女人。她的母親需要幫助；可是，斐莉，這位來自波士頓的生物學者，更需要愛。找到她的母親以後，斐莉重新變得像個小孩一樣；她病倒了。她住進當地的醫院，她憂慮著醫院的水準，可是，負責診治她的醫生讓她安心。他說，醫院配備著現代化的醫療器材，而他本人則是在美國受訓的。他原本已經在那裡待了下來，可是，為了某些他不便詳述的苦衷（除了去到美國的伊朗人往往無法安家落戶之外），他寧可回國；而且，他說，回國一個月以後，他就經常藉著造訪清真寺與謁陵來紓解身心。

斐莉因為醫師的諒解而略受誘惑。住院期間，她也回顧省思自己待在美國的那段時間。她始終是個外國人，即使有丈夫與朋友相伴，還是覺得孤寂無依，不論是性生活還是社交生活，她總是茫然無措；做任何事情，她都說不上個所以然，也搞不清楚自己為什麼要過著美國式的生活。她工作勤奮，然而，現在即使是工作——實驗與研究，看來都成了無意義，只是為了工作而工作，只是為了進入社會而工作。她居留在美國期間，即使歷經求學、工作與婚姻，還是一片空虛的時光。然後，醫生又告訴她，她的胃

痛起因於一道潰瘍舊傷。「妳帶著這道潰瘍回國的，」那個醫生說，「現在你就沒有理由擔心這家醫院，我，或是妳的國家了。妳的病可是一種西方病。」

斐莉的美國丈夫先前經由斐莉召喚，抵達伊朗，前來帶她回家。他被人當成外國人看待，卻是個體面的外國人（如此公平待遇，也是這本小說的優點之一）：一個工作勤奮的人，也是個知識分子，能獨處而不孤獨，自給自足，由另外一個文明所造就的男人，迎娶一位伊朗女子則是他畢生唯一違反傳統的單一行為。斐莉再也不可能回到他身邊，回到一個與美國式空虛如此隔膜的人身邊。她會失去她的研究職位，可是她不在乎。

事實上，她即將棄絕過去充滿焦慮而全然表相的工作，以及她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身分。她會跟那個醫生一樣去參拜清真寺，時時敬謁陵墓；要去參拜與謁陵，她就得裹上黑色的四角方巾。她覺得自己從來不曾真的快樂過。棄絕塵俗（怪的是——多虧了小說作者的生花妙筆——外界俗事中還包括了她想過，卻始終未曾實現的研究點子）之後，她才能全心靜謐。

接著——雖然小說作者未曾多加著墨——斐莉與那個醫生捨棄知性與勤奮工作的生活，回歸傳統，彷彿兩人一同簽定了伊朗的死亡協約。浸淫在他們對於什葉派信仰的熱愛中，如此特殊，他們將重新發現自己的尊嚴與完整的自我，神聖而不能侵犯。他們不必再唯唯諾諾地盲從他人，擔憂自己的人生軌道將何去何從。他們不必再壓抑殿後，甚至不必屈居第二。而且，日子就這樣過下去。其他困守在精神荒地的人，大可繼續製造令那個醫生自豪於擁有的醫療器具，其他人也可以繼續供稿給醫學期刊，那個醫生同樣也將樂於閱讀。

這般一廂情願的期待——期待別人去繼續創造，期待那些外國人，意即他們所代表的文明，現代社會運作不可或缺的文明，持續運作下去——隱含在棄絕塵俗的動作中，也是棄絕塵俗的一大痛腳與矛盾。

二 阿里的正道

一九七九年八月，推翻伊朗國王六個多月以後，伊朗新聞裡多半還是跟處決有關。伊朗官方的新聞機構不斷統計，定時報告最新處決總人數。最新一波處決對象多為娼妓與妓院經理：現在看起來，伊斯蘭革命儼然翻臉，轉變出邪惡血腥的一面。據報，阿亞圖拉何梅尼已經將音樂列為非法項目。而伊斯蘭教中女性相關的教條也起死回生，重新執行。男女混浴已遭禁止；革命衛隊緊盯著裏海海灘上弄潮的人群，依照性別嚴格區分。

倫敦旅行社裡的工作人員對我說，現在大家都急著離開伊朗，沒有人想入境伊朗，飛機上說不定只有我一名旅客呢。其實不然。當天伊朗航空公司的班機取消了，轉乘旅客只好擠在英航飛往德黑蘭的班機上。

大多數乘客——機場大廳的國際大雜燴，經過登機門與航道篩了又篩，或多或少地濾淨為一小圈單一族裔乘客——都是伊朗人，他們看起來不像是急於逃離國內的伊斯蘭革命，或是趕著回歸祖國投入革命。女性乘客中沒有人蒙上面紗，也沒人覆上頭巾，其中還有一兩位婦女穿著打扮風姿綽約。每個人都 在倫敦店舖大量血拚採購，手上和肩膀拎掛著設計式樣不一的名店塑膠購物袋——莉莉懷特 (Lillywhite)、馬莎 (Marks and Spencer)、奧斯丁里德 (Austin Reed) 等等。

巴哈伊信徒的醫生

飛機上，我坐在兩個伊朗人中間。靠窗坐的中年女性，古銅膚色，留著一頭金髮。她的頭髮像是染的，皮膚也像是另行著色所致，烘托出既東方又古典的整體效果，像埃及人一樣；古典化妝品滿足表現出古典的美感概念。她不會說英語，行為舉止也不像個習於搭機旅行的人。機艙裡的通風孔讓她很不舒服，於是她就向坐在我左邊的男士訴苦。她魁梧高大，男士則瘦小袖珍。我心想，我怎麼坐在了丈夫和妻子之間呢？就主動向那名男子提議，我們可以交換座位。

他面露難色，用英語說道，他的家人散坐在這整排座位上；他的小兒子和女兒，還有他健美的太太。他雖不諳英語，卻還是微笑著原諒我的誤解。

他是個醫生，與家人才剛剛去過美國，探視十八歲的長子。

我體認到，我們一定會陷入某種東方的、印度式的談話，而我只有依照自己心裡的想法應對。我說：「這一趟旅行下來，開銷一定很大吧？」

「確實很花錢。就拿飛機票來說吧，每個人都得花上八百英鎊，除了我女兒以外，她還不滿十二歲。一過十二歲，你就得付全額了。你去過美國嗎？」

「我在那裡待過一年。」

「你也是醫生嗎？」

我想，此行前往伊朗，最好不要說自己是個作家。我說：「我是個老師。」接著，又覺得把自己貶得太低了，於是又補充了一句：「我是教授。」

「那樣很好啊。」接著，彷彿他從我的換位提議與我待在美國的時間裡汲取了一些勇氣，他說：「伊朗革命真糟糕。他們毀了這個國家，毀了軍隊，毀了一切。他們已經殺光了所有的軍官。德黑蘭原本是

個美好的城市。餐廳、咖啡館。現在什麼也沒了，所以我要把我的孩子送出去。」

革命爆發之後，他就把大兒子送到美國去了，孩子也適應得不錯，印第安那州一所醫學院預校已經錄取了他。不過，美國不只是一個求學受教育的地方；除此之外，對這位伊朗醫生，以及許多動盪不安的國家，例如，阿拉伯、南美各國、西印度群島與非洲國家等地驟然致富的暴發戶來說，美國還是個避險聖地。

醫生說：「我在那裡買了一棟房子。」

「你花了多少錢？」

「六萬四千元。四萬四是現款，剩下兩萬貸款。」

「外國人在美國也可以購買房地產嗎？」

「我跟你老實說吧。當初，我是用我哥哥的名字買的。」原來，他們是有備而來的，早在革命之前就選好了避難地點，移民過程也陸續開始。「可是，我已經將房子轉到我兒子名下了。房子現在是租出去給人家，月租四百塊美金，正好可以抵房貸。教授都賺多少錢啊？」

他們賺多少錢？我該講個什麼樣的數字，才不會讓這個剛剛為了一次家庭團聚，搭飛機就花掉六千英鎊的人感到荒唐無稽呢？我說：「四萬美金一年。那你每年賺多少錢呢？」

「我早上有政府的班要上，在一所醫院裡頭看診，每個月靠這份工作賺個一千五百塊錢。」

「我還以為他們在伊朗給醫生的待遇會比較高一些。」

「不過，我下午在自己的診所看診，你明白了吧。我自己的診所一年可以賺上三萬美金。」

「這樣說來，你一年年收入有四萬八囉。」

比起我自己開價的四萬塊，還要高上一截。

他頓時自衛地說道：「可是，我工作很苦啊。而且，我已經是個四十四歲的人了。唉，現在，」他

又追加了一句，抹去他所有的優勢，拉平了我們兩人高下有別的機運：「接下來，還會發生什麼事情，我也不知道了。這些穆斯林都是些怪人。他們抱著一種『老舊』的心態。非常『老舊』的心態。他們對少數族群是非常不留情的。」

那他自己又是什麼人呢？基督徒、亞美尼亞人、祆教教徒、還是猶太人？儘管我們的對話十分東方，我還是存疑在心，問不出口；到後來，他忖度我應該很安全，不會替他出亂子，就主動跟我說了。他是個巴哈伊信徒¹。我是聽說過這個名詞，除此之外，就一無所知了。

他提到革命與穆斯林的邪惡作為時，並沒有壓低嗓門。我猜想，他應該對同機共航的旅客們十分放心，此時，我應該就是置身於一群巴哈伊信徒之間。然而，從我身旁這位面容著色、頭髮染金的女人身上，卻看到更為深遠的、不安的疏離冷淡。

他說：「我們是國際性的信仰。我們在美國有一所靈曦堂；一所小巧精緻的靈曦堂。」

只是，雖說我們從金錢與工作打開話題，這位醫生對於他的宗教信仰卻不盡坦白。根據我後來向貝札德請教所知，巴哈伊信徒也有他們自己的秘密狂熱，而這股狂熱還是導源自伊朗什葉派的狂熱。什葉派教徒一心等候著第十二順位伊瑪目降臨；巴哈伊信徒則認為，十九世紀之間，第十二順位伊瑪目本人，或是他的副手與代理人，就已經來過又走了，而且，只有他們，巴哈伊信徒，曾經確認出他的本尊面目。貝札德還跟我說，剛開始，他們同樣支持革命，後來英國人為了跟俄國人競爭攫取伊朗的控制權，就對巴哈伊信徒大力賄賂拉攏，後來他們才轉向反革命的。

這話聽來玄異離奇——我也知道貝札德唯一重視的就是革命。不過，這也不完全離奇。早期什葉派教徒風起雲湧地在伊斯蘭帝國發起抗議，在種族如此紛異的阿拉伯帝國中，這群信徒不但抗議政治不公，也在抗議種族歧視；他們的信仰隨著抗議活動不斷蛻變衍發，始終擺脫不了政治色彩，或是十分容易受到政治操控。什葉派教徒自家認定一條先知繼任譜系，每年嚎啕哀悼他們的殉教烈士，這些人的正

當權益遭到抹煞，對於帝國當局一向心存疑慮。十九世紀的巴哈伊運動又顛覆了什葉派的活動。早先他們喊出的口號是「砍頭、焚書、毀廟、砸燒與大規模屠殺」；一八五二年，他們還企圖行刺國王未果。

政治上說來，雖說教條不同，巴哈伊運動卻頗為類似何梅尼之對抗伊朗國王。政治上，巴哈伊未獲勝算，教徒只有落得一旁涼快，或是說，一籌莫展，與其他穆斯林教派一樣，緊緊地擁抱著他們的信仰，苦苦地鑽研極端深奧難解的教條；啟示中再現啟示，分歧之內還有分歧。

話又說回來，講到迫害，這位醫生可就說對了。巴哈伊信徒妄稱他們認出第十二順位伊瑪目，是對伊朗什葉派最大不敬的褻瀆，最需痛懲；而在伊斯蘭革命成功之後，為了替正信伸張正義，群眾將歡天喜地的鳴鼓攻向巴哈伊信徒，三不五時就祭出「革命」處決。在美國找個地方避難，絕對有必要。

慘白德黑蘭

飛機在科威特技術性降落，補充油料；沒有人離機。四下雖然黑暗，破曉卻在不久之際。光明即將到來；黑夜就要遁去。而我們可以看到這座機場——由上往下看，好一幅電光熠熠的圖案——竟然建在漫漫黃沙之上。通風孔送出暖風。外面氣溫高達攝氏四十度，華氏一百零四度，真正的白日還沒開始呢。

1「巴哈伊信徒」英文稱 Bahai，意即「巴哈歐拉之追隨者」。「巴哈歐拉」係波斯文稱號，意為「上帝的榮耀」，也是創立該教的波斯貴族密爾薩·胡賽因·阿里（Mirza Husayn Ali）之尊稱。阿里出生於一八一七年，三十六歲之時獲得啟示，遂自命為巴哈伊教的先知，不為當時伊斯蘭教士所容，遂遭終生放逐，流亡各國，宣教不輟。《大英百科年鑑》上曾經統計，巴哈伊教是目前全球成長最快速的獨立性宗教之一。

空服人員說，到了德黑蘭就會涼快些了。從科威特再往東北方向飛上一個小時：沙漠更廣，四下星星點點地散落著淡綠色長條植被，地表上漣漪起伏，四處可見，沙丘偶爾還聚拔成山。

在我讀過伊朗國王打算如何建設他的國家的各種偉大提議之後，德黑蘭機場建築實在叫我失望。入境大廳分明是個大倉庫。牆壁上顯示著一塊塊空白的長方形區塊，周圍圍著一道紅褐色塵土——幽靈圖像框在幻影般的相框裡——不消多疑，那裡過去一定掛著伊朗國王與其家人或他的不朽功績的照片。現在，牆上、柱上釘著宣傳革命的散頁傳單與漫畫，壁上也還釘著貼紙與手寫的通知，重大事件也因此而有種古怪的簡略感。此外，阿亞圖拉何梅尼的彩色照片隨處可見，他的寶像就跟任何對頭形容他的方式一樣，何梅尼的雙眼確實眼神凌厲，輪廓則既富於肉感而難以掌握，面相偏又像個地痞流氓。

伊朗國家銀行設在機場的分行，粗糙的桌面、三名辦事員、成堆成疊的文件、垃圾遍布的地板，就像個印度市集上的小店家。櫃檯上一紙手寫通知上說：「親愛的客戶。真主至大。歡迎光臨伊朗伊斯蘭共和國。」一小片、一小片的棕色貼紙張貼在海關告示板上，提醒旅客各項物品允許通關上限。棕色貼紙禁絕了烈酒入境；這是伊斯蘭歡迎來客的方式之一。

行李運輸帶原本應當將我們的行李傳送出來，卻毫無動靜，停駐了好長的一段時間。而伊朗旅客（那個醫生與他一家大小也在其中）駐足一旁，提著扛著大包小包的倫敦購物袋，似乎變成另外一種人。他們在倫敦機場的時候，還是伊朗人，遠從富產石油、錢淹腳目的仙境下凡而來，揮霍狂買；現在則困在這個簡陋的入境大廳，耐著性子，跟著他們同胞一起杵在本國的背景畫面中，他們看起來就像是尋常的鄉下人，剛去了一趟城裡趕集回來。

那個海關人員臉上一小撮黑色毛刷小鬍子。他問道：「威士忌？」他講到這個字的發音，與他的微笑，似乎將這個詢問轉為玩笑。當我應答說沒有時，他就信了我的話，微笑著揮揮手，將我驅趕到廳外夏日白花明亮的天光下。面對著後革命時期，如狼似虎、貪得無厭的機場計程車司機，經過六個月的

縮衣節食，往日美好的回憶從來不曾讓他們如此龍精虎猛過；過去，全世界的推銷員都會到德黑蘭來，城裡的旅館房間永遠不敷投宿，從來也沒有司機會為了生意發愁。

這座城市的顏色，跟從飛機上俯瞰一樣，都是灰撲撲一片慘白。灰塵飛舞在路上，樹木蒙上一層灰，汽車的顏色也因而黯淡。磚石灰牆也同灰砂一色；未完成的建築物看來已遭廢棄而行將崩坍；牆壁上好似在摘錄這段革命時期一樣，畫滿了波斯文塗鴉，處處油印著何梅尼的玉照。

而就在城市外圍地區，某處看來像是一塊荒地的地方，我看到一頂卡其色的低矮帳棚，一列男人與蒙著面紗的女人排著隊，還有一些略似制服工作人員的男人。當時，我以為他們是鄉間難民，排隊領取些微的飲食與賑濟物品。可是，接著在看到一棟未完成的公寓建築前面、另外一頂帳棚與另一列排隊人龍之後，我才恍然想起，原來當天是選舉投票日，革命之後，第二度測試人民的意願。第一次是公民複決；人民投票贊成建立伊斯蘭共和國。這次選舉就為了選出「專家會議」，獲選人將制定出一套伊斯蘭憲法。何梅尼已經敬告民眾，投票給神職人員，讓神職人員膺選出線。

制憲當然不能沒有專家，因為伊斯蘭憲法可不能隨意轉借移植。世界上沒有這種東西存在，從來也不曾存在過。伊斯蘭憲法還有待組合，組成成品還得通過先知允准這一關。而麻煩就出在這裡，先知雖然依據神聖的啟示，在第七世紀建立了他的阿拉伯國家，治國方針卻總是獨斷決行。而這就是制憲一定需要教士參與的原因。教士或許對憲法一無所知——畢竟，憲法還不是個生根在穆斯林世界裡的觀念；可是，他們對於《可蘭經》與先知行事風格瞭如指掌，教士可以偵斷出憲法條文中違逆伊斯蘭教義的不妥之處。

我下榻在德黑蘭中區的旅館。這棟旅館在這個城市裡，算是比較老舊的。旅館隱身在一堵圍牆之內，大門旁邊還有間門房小屋，圓形車道上鋪著瀝青柏油，一小塊、一小塊的草坪上點綴著矮樹與喬木。旅館的戶外景觀維護得超乎我的想像，庭園裡甚至還停著幾部車子。可是，司機載著我駛抵的旅館

建築玻璃門上，卻鎖著鐵鍊。有人在建築物的另一邊嘶吼著，我們剛到的建築物已經關門停業了。那是這座旅館的舊樓；經濟大好的時候，他們在旁邊又蓋了一棟，現在只有新樓還在營業。

新樓大廳靠近櫃檯一角，幾個年輕人——旅館的計程車司機，原來外面停的幾部車子就是他們的——聚在一道閒坐無聊。角落以外，整個大廳空空蕩蕩的。大廳地板中央鋪著一條面積巨大的圖飾地毯，地毯周圍排著座椅、沙發，彷彿在等候群眾光臨一般。大廳兩邊都是玻璃牆，一邊看出去就是庭園，庭園裡栽種著灰撲撲的灌木與松樹，還有停在一旁的旅館計程車；另外一邊，稍遠處就是旅館圍牆，牆內到建築物之間還容納了一處鋪滿磁磚的游泳池，閒置無人，陽光下，池水激激耀耀，鐵椅堆疊在一旁敞開的棚子下。

旅館人員帶我住進一間房間，空間還算寬敞，扎實牢靠的木製家具，邊牆上貼著三到四呎高的木材面板。一端的玻璃牆面向德黑蘭北區，還有一扇開向陽台的玻璃門。可是，旅館房間的空調管漏水，水滴從出風口的橫條格子窗滲了出來，濕透了走道地板上鋪設的藍色地毯，髒污了一大片。

旅館的人——雖然他穿著制服，可是在氣氛如此慵懶的旅館裡面，實在很難將「小弟」職稱跟他搭在一起——指著走道上方的樓層說，「浴室」，彷彿只要解釋明白，就可以交代過去了。他另外又找了個人上樓進房來，他說漏水是空調凝結作用所致；經他這麼一說，水滴穿淌純屬正常現象，甚至不可或缺。接下來，他驟然截斷任何開脫說明，乾脆換個房間給我。

第二個房間的擺飾跟上一個房間一模一樣，窗外景致亦同。只是這間房裡的電視機上豎立著一張從中對摺的白色卡紙。原來這張卡紙是本週「國際」電視節目表——伊朗電視台的英語服務節目。這項電視節目服務早就停播了，而這張卡紙也是六個月前的節目表。由此可見，革命是突然闖進這家旅館的。

當時正值齋月，穆斯林封齋的月份；當天又是星期五，安息日；同時也是選舉投票日。德黑蘭不尋常地平靜，可是，我並不知道其中緣故；而當天下午，我出門上街閒步時，感覺自己走在一處浩劫席捲

過後的城市裡，主要街道上的店舖大門緊閉，還鎖上精鋼柵門加強保固。高樓之上，層層樓面上的市招，高聲宣揚著名牌進口貨——精工表、星辰表、勞力士、赤爾希的瑪麗官（Mary Quant）化妝品、愛華——在那個門窗深掩的午后，這些品牌，就像從德黑蘭的過去冒出來的名字一樣。

人行道上地磚殘破不堪，店招同樣破損寒愴，或是掉了幾個立體字母。塵埃污垢如此慷慨，散落堆積在裝有燈飾的招牌上，效果非常接近煙燻火烤；相形之下，革命期間付之一炬的高樓大廈，反而沒那麼引人注意了。建築工程似乎都停頓了，碎石與瓦礫各自成堆已久，看來已經融入了街景。

牆壁上張貼的還是鼓吹革命的海報，而人行道上的報攤，展示的也是有關革命的雜誌。有本雜誌封面上是伊朗國王和泳裝美女的組合照片；伊朗國王的頭像貼在一具穿著比基尼的女人胴體上，可是，比基尼的部分被黑色大筆一揮蓋掉了，避免違犯莊重高雅的原則。另外一則漫畫中，伊朗國王身著西裝外套，領帶鬆開歪在一邊，手上握著一管湯米衝鋒槍，坐在馬桶上，光著屁股，西裝褲堆垮在兩腳上。他身旁的行李箱上標示著目的地：以色列與巴哈馬；一只半開的帆布旅行袋中，半露出一瓶威士忌與一本《時代》雜誌。

幾個年輕人穿著緊身開領襯衫，閒晃在地磚殘破的人行道上。他們輪廓分明，個個面容俊俏，清晰顯現出特有的種族特徵；他們個頭都不高大，卻寬肩細腰，十分健美。他們都是祖上務農的工人，那天午后，他們周遭散發出一股虛榮與危險的氛圍；他們一定是因為公家舉辦的星期五禮拜活動而興奮不已。他們在衣著上，尤其是他們的襯衫，有種俗麗的意味，而根據我過去在印度的見聞看來，我總是將這種俗麗跟一些偏離傳統、驟然崛起的人物聯想在一起；這些人很篤定地以為，不論是自己的穿著，或是任何其他事物，他們都可以隨心所欲，我行我素。

午后的車輛與摩托車，絕對地發揚伊朗駕駛風格，絕塵而去。我湊巧目睹兩樁撞車車禍。一家店舖修改了店名，不再是來自肯德基的炸雞，現在是「我們的炸雞」，而那位美國南方上校的肖像也被塗抹

毀容到不成人形的地步（除了對那些還記得這位上校的觀者之外）。革命衛隊是荷槍實彈的年輕人，沒多久就不再令我心驚膽顫，他們不過是革命安息日的一景罷了。電影院外，人潮湧集；而且儘管正值齋月，觀眾還是照樣向還在開門營業、當地俗稱為「糖果店」（confiserie）的商店購買萬歲果和甜食零嘴。往北走上一大段路，穿過一條遍植懸鈴木的大道，這條長距離大道是伊朗國王的父皇鋪設的，大道盡頭就是皇家德黑蘭希爾頓飯店。不過，這間希爾頓的「皇家」風光不再，「皇家」兩字已經從主要幹道的路邊招牌上拿掉了，飯店進口處的「皇家」字眼也挨了一刀；可是，斬草不除根，飯店裡頭不論是餐巾、帳單、菜單與各項鍋碗瓢盆上，「皇家」兩字還是清晰地躍入眼簾。

飯店交誼廳裡，幾乎可以羅雀；廳內之冷清，侍者三五，客人零散，簡直近乎尷尬之無聲。伊朗人煮茶用的銅壺成為室內裝飾的一部分（多年以來，這種銅壺有一定的外銷市場，充作富於民族風味的裝飾品。大約兩年前，我就曾經在倫敦店舖裡，看到櫥窗展售好幾把這樣的銅壺，店家將銅壺改裝為檯燈燈座）。飯店已經不供應酒類飲料了；可是，時髦人士（與非基督徒人士）如果想要小啜合乎時尚的不含酒精飲料，還是可以選擇金橘花（一種以琴酒為底的雞尾酒）或是處女瑪麗（不含伏特加的血腥瑪麗）或是史溫吉（Swinger）。

墨利絲餐廳是希爾頓飯店裡的法國餐廳。餐廳裡裝潢得中規中矩，棕色調的壁紙、深色的護壁板，燭台式的燈光沿著牆壁輝映。一廂壁上的玻璃面板上，白色的字母嵌在小型弧線上，寫著：Vins et Liqueurs. Le Patron Mange Ici, Gratifiée à Toute Heure。大餐室容納得下一百人同時進餐，現在卻只有寥寥五個食客，而他們用餐也像交誼廳裡的客人一樣含蓄溫吞。我的湯濃膩得像一團咖啡色漿糊，接著上桌的鱈魚主菜也一樣。可是，餐廳侍者照常為你攤開餐巾，趾高氣揚地來回上菜撤碟，使得用餐氣氛更加令人尷尬不堪。

餐廳裡每一張餐桌都布置妥當，靜候嘉賓。每一張餐桌上都有一朵新鮮的玫瑰花，以及前革命時期免費紀念品：彩色的風景明信片（餐廳是在四年前，一九七五年完工的）；以及店家想當然爾，以為只要是光臨這類餐廳的食客都不可或缺的小本十頁便條紙，抬頭上寫著：墨利絲餐廳，德黑蘭之精選頂級餐廳，Le Restaurant le Plus Select de Tahrán。革命爆發六個月以後，這些小玩意兒——便條紙、明信片——依舊堆在桌上；庫存告罄之時，這些小東西用完了，就沒了。

飯店一旁的游泳池暫時謝絕使用，根據告示所言，以便使用化學藥品清潔泳池。可是，皇家希爾頓飯店原先預定擴建的一堵高大混凝土外牆，顯然已經停工，各項建築材料棄置一旁，起重機也閒置生鏽。侍者說，現在已經沒有「旅客」了，原本承包工程的建商也已經出國遠走。從希爾頓向外眺望，你可以看到德黑蘭北區其他山丘，以及其他尚未完成、空空洞洞的建築物，顯然不久前才匆匆停工的。德黑蘭北區這個「國際」城市，恐怕才建構到一半，就被革命硬生生地腰斬了。

而當我回到下榻旅館時，我想到，玻璃前門貼的革命海報上，有個無意間造成的象徵意象。海報是雙面印製的，面向庭園的那一面，直接了當地讚揚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領袖、游擊隊的榜樣——亞錫爾·阿拉法特，海報上的阿拉法特戴著墨鏡，頭上纏著紅白格子交織的頭巾。

海報翻過來，另外一面上就是一幅寓言式的繪畫，主題是鮮血與復仇。繪畫的前景是一幅寬坦的風景：一塊平坦、缺乏特色的土地被一條黑色的直線大道切成兩半，黑色道路中央還畫上斷斷續續的白色分隔線。一位蒙著面紗的婦女背對著觀者，半癱半倒地倒在路上，掙扎著使盡全身僅剩的氣力拚命將她的孩子往上高舉，彷彿要將孩子舉上穹蒼一樣。畫面中的婦女背上鮮血淋漓，黑色的道路上也處處濺血。而就在道路稍遠處，巨大的紅色鬱金香花叢，汲取了鮮血的養分，突破了畫著白色分隔線的黑色道路，突破厚重堅實的道路鋪面，冉冉地向上生長；就在鬱金香上方，天空中浮現出救世主何梅尼蹙著眉頭的尊容。

何梅尼拯救苦難信眾，也為信眾復仇。可是，那叢經他召喚升起、汲取了殉教烈士的鮮血滋養長成

的鬱金香，卻永遠地損毀了那條現代化的道路（還多虧畫家那麼仔細地描繪）；現在，那條穿越荒野的道路，哪裡也去不了了。

此外，這幅革命寓言畫當中，人性只剩下復仇一環。畫面前方受傷的婦女，身形微小，她身心所承受的巨大苦難，需要伊朗社會歷經過這番重大變動才能平反；可是，這位受害者卻蒙著面紗，毫無面目可言，畫家只想要觀者看到她的痛苦，此外一切，無人在意。

另外一幅選舉海報上，又是一夥沒頭沒臉的群眾，蒙著面紗的女人已經降格為簡單的三角形略圖了，群眾擊著某個特定政黨的候選人照片。某份報紙上，先知的堂兄兼女婿阿里的臉孔，經過超寫實手法勾勒，幻化為一張透明面目，映襯著一處地理風景。某一張海報上，何梅尼本人也淪落到沒頭沒臉，畫家勾勒出他的頭巾、雙頰、鬍鬚等外部線條，抵去他的面容五官，改換上一隻緊握的拳頭。

無臉無面似乎逐漸成為伊斯蘭主題。實際上，這也是我在街頭報攤上買的一份英文報紙《伊朗周刊》(Iran Week，刊物名稱的英文字體完全仿照《新聞周刊》(Newsweek))上抗議的主題。這份報紙²贊同革命，可是卻開始抗議，反對革命成功之後接踵而來的種種措施，所有因不合伊斯蘭教義而發出的禁令，舉凡全面禁酒、禁播西方電視節目、流行時裝、音樂、男女混浴，一直到禁止女人參與運動比賽、舞蹈等等。這本《伊朗周刊》封面上顯示著一間扭曲的起居室，鐵欄杆取代了牆壁。聚在起居室裡準備拍張全家福照片的一家人——父親、母親與兩名子女，身上穿著西方服飾，不過，他們的臉孔卻一概抹去，改換上一片空白。

面對救世主與復仇者，個人主義只有俯首拜服，盡量壓抑。可是，革命完成之後，在這個伊朗國王當年一手擘建的大城市裡，人民應該可以重新自由自在享受個人主義。這似乎就是這幀封面所要表達的訊息。

拜訪《伊朗周刊》

上午，旅館左側的高架道路上交通繁忙，川流不息。晨光中，輝映著北邊山巒，看來柔和可愛，可惜，薄霾一起，山色就迅速褪減。

我撥了通電話給《伊朗周刊》的編輯，他邀我立即過去晤談。然而，他說，我還是要留意謹慎一些，他們辦公室坐落的街上，有兩棟建築物門牌都是六十一號，假如我找到了正確的六十一號，一定要記著，如果搭電梯上樓的話，辦公室在六樓；如果是自己走樓梯上去的話，只要走到四樓就好。

旅館的計程車司機費了偌大工夫才在那條街上找到六十一號。而經過我們在伊朗車陣裡幾度施展伊朗式的迴轉之後終於找到的六十一號，卻非彼六十一。於是我們繼續尋索，早晨時光就這樣一點一滴地迅速流失；接著，我們終於找到第二棟六十一號建築。那個編輯說過，搭電梯就得六樓，假如我走樓梯的話就上四樓。可是，大樓大廳的告示牌上寫著，這家報紙的辦公室設在五樓，四下也看不到電梯的蹤影。計程車司機跟我就一層樓、一層樓地走上去。

辦公室出乎我意料之外地寬敞，一個長得挺有個性的女孩坐在前廳一張桌子後面。枉費我耗上好半晌才找到他們的辦公室，也辜負他自己輕率脫口而出的邀請，年輕的總編輯阿柏迪先生看到我顯然感到十分失望。可惜，事與願違，之前他還以為我是代表哪家英國或美國報紙過來跟他洽談的。他說他只能跟我談上十分鐘；我不該叫那個司機先走的。

可是後來進到他自己的辦公室，他主管的態度就放鬆柔和多了，而且還回復了伊朗化的風格，殷勤地差人奉茶，茶汁就斟在小小的玻璃杯裡送了進來。他說，倘若我要了解伊朗的話，就非往聖城科姆走

² 原文如此，這是奈波爾的措詞習慣，他將所有的雜誌都稱為「報紙」。

上一遭不可，還要與街上的人多聊聊。我說，我不會講波斯話；他說，一般伊朗民眾也不會說英語。就這樣，大家看著辦吧。

他的語氣再度柔化，說道——不過，我從他講話的方式揣測，接下來他這一廂就沒戲唱了——他可以試著找個研究員跟我碰個面。

就在此時，他們社內首席研究員走了進來。他答應會盡量給我幫忙。首席研究員接著說，地下工作整整讓他們人仰馬翻地忙了三年，而且他們到現在還是忙個不停。就一個波斯人來講，他算是不矮了，而且他貌相莊重，手上還拎著一只相當體面的真皮公事箱。可是，他不像他的總編輯那麼時尚稱頭，年輕的阿柏迪先生異乎尋常地英俊，而其主管行事風格當中，還帶著些許淘氣作怪的慧黠。

我問起《伊朗周刊》的封面。我說，伊朗的家庭，即使是中產階級家庭，都像雜誌封面暗示的一般「核心」嗎？我還以為伊朗家庭應該要比較傳統，應該比較像大家庭的組合。阿柏迪先生或許是想堵住我的嘴，不讓我提起穆斯林的多妻制度，他斬釘截鐵地說，伊朗的中產階級家庭，就跟雜誌封面顯示的一模一樣。

辦公室牆上掛著一幅畫著加勒比海與墨西哥灣的大地圖。我心中暗忖，這幅地圖掛在這裡，應該是為了彰顯古巴與尼加拉瓜，兩個國家分別代表舊的與新的革命中心。其實不然。阿柏迪先生曾經去過法屬圭亞那的首府開雲（Cayenne），替一家當時正針對監獄製作一系列報導的波斯雜誌撰寫有關惡魔島的文章。

他說：「一個人旅行真苦。你應該找個女孩子一路作伴。」

他前往開雲的時候，也帶了一個女孩同行：西印度女人真可愛。西印度人？阿柏迪先生帶著一個黑女人？他說：「我搞錯了。她不是西印度人。她是墨西哥人。」他微微抬起頭來，彷彿在追憶什麼，深黑的雙眼瞬間顯得空洞無神。

這就是這場革命最「何不食肉糜」的一端。儘管我已經在德黑蘭待上了一天，儘管他們勸我應該要去科姆朝聖，順便跟當地街上路人聊聊，我卻覺得這一端距離梅尼與市井常民甚為遙遠。果不其然，六個月後，在我就要結束伊斯蘭之旅、再度回到德黑蘭之時，《伊朗周刊》已經遍尋無著了。

回歸阿里的正道

第二天，同樣還是個國定假日——紀念伊朗第一部成文憲法的行憲紀念日，這部憲法只不過完成於一九〇六年——商店街上人潮熙熙攘攘的。

納迪爾皇帝（Nadir Shah）大道（一七三九年，率軍入侵印度德里的波斯國王就是這位納迪爾皇帝，他還偷了沙賈汗皇帝〔Shah Jahan〕的孔雀寶座，再加以肢解，寶座上的珠寶至今還是伊朗國家財庫的重要收藏）人行道上沿街叫賣的小販與陽光和灰塵，印度彷彿就在一臂之遙。福爾道西街³上，錢舖的兌幣亭子，一間間面向著英國大使館建築的空白外牆，氣氛有點像在紅燈區一樣，街上行人走來走去，不時出聲拉客，或是等著拉客店家招呼。

錢舖的匯率要比銀行好。他們自家掛出各國貨幣名牌，有些亭子還在玻璃窗上展示各國銅板與匯率表的傳真，可是玻璃窗後小亭子的內裝就與一般辦公室並無二致：辦公桌、辦公椅、電話、鐵製保險箱、一幅何梅尼的畫像。辦事員的態度完全符合亭子裡的氣氛。他們抬起頭來，他們說不，眼神隨即瞥向他處。他們不收我簽過字的旅行支票。只剩下納賽先生還有意問津，可是他不買則已，一開口就要買

³ 福爾道西（Ferdowsi）：波斯文化中最偉大的詩人，九五三～一〇二六，著有長篇史詩《列王經》，全書六萬餘字，記載了從神話時代到西元七世紀中波斯地方列代諸王的故事，是波斯文化中最重要之典藉。

下我所有的支票，而且，他還極力跟我推銷他辦公室牆上那條陳舊的絲質地毯，要價五百英鎊。

有些兌幣商人，名符其實地以牆壁上的空隙作為工作據點。有些人根本連據點都用不著，他們穿著比較體面細心，拎著手提箱，來來回回地走在福爾道西街上。

這條街的盡頭就在一處報攤附近，我看到一個面貌有別於伊朗人、看起來比較像印度人的中年男子。起先我以為他只是外出散步透氣，接著我才恍然大悟，原來他也是個兌幣商人。我上前跟他搭訕，而他表現得好像我也是在做換錢生意的。

他是個印度人，從孟買遷居而來的什葉派穆斯林，已經在伊朗定居了二十年之久。他不是來換錢的，他是買家；他上福爾道西街來就是為了買美金。人家跟他開價一美元對一百一十五里亞爾，這個匯率算是不錯的了；不過，他可是個嫻熟此道的生意人，只要他堅持不鬆口，一步也不退讓，只要他繼續在這裡露面，遲早也會引來一兩個活動兌幣商把價碼再往下修正一兩個里亞爾。

有個年輕人——看不出究竟是印度人、巴基斯坦人、還是伊朗人——朝我們走了過來，焦慮地駐足在我們旁邊。年輕人也來自孟買，可能是這人的朋友，或是大老遠過來投奔他的親戚。收購美金這一行，他從小到大就耳濡目染，而今他也幫得上生意的忙，已經可以獨立詢價作業了。

然後，好像他覺得有些說明不快一般，這個孟買來的人說：「以前的日子裡，這些小店的外幣是淹腳目啊，滿坑滿谷啊。這裡人根本不在乎什麼美金、英鎊的，大家都要里亞爾。」可是他也不追念過去伊朗國王的統治。「請你一定要原諒我講話粗魯。可是，那個伊朗國王是個混蛋。」

這是句重話，也激得那個年輕人卸除了他的焦慮不安開口交談。他將國外貨幣的話題擱在一邊，兩人開講的主題是伊朗國王如何多行不義必自斃，他們彼此呼應，交互贊同，你引我的話頭，我也接續你一語中鵠的真評，直到這條塵沙堆積、遍植懸鈴木的街道上，擦鞋匠與人行道賣銅板的也紛紛加入，他們的談興也同樣高張熱烈。

伊朗國王在位時，伊朗舉國上下，率皆王土，民脂民膏，率為王用。他從這個國家壓榨了幾十億的家當；他坐視外國公司將自己的國家劫掠一空；他引進成群外國顧問，把這裡擠得水洩不通。那些外國人支領高薪，住在大房子裡頭，美國人甚至還有自己的電視頻道，伊朗人民覺得自己的國家已經淪陷了。還有，伊朗國王從來就不在意宗教，那可是我們珍貴的什葉派信仰啊。

孟買佬兒說道：「現在就好太多了，」又說：「咱們現在又重新回到阿里的正道了！叫女人把面紗戴起來，不准她們再看電視，什麼酒也不准喝！」

除了他們的熱情叫我咋舌外，更令人驚訝不已的是，阿里的正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難道什葉派歷經一輪千禧年，除了阿里，就無法提出其他比較高明的教條嗎？那個出身孟買的中年人和他的一夥同伴，除此之外也說不上什麼名堂了，除此之外就無啥可以多說了；或許也是因為他們不敢說——除了這位阿里前雪前恥、回歸正信、推翻邪王魔君之外——革命成功後，真正的獎賞還遠在西天之外呢。

而這個孟買佬兒，還準備再讓我吃上一驚。他打算跟阿里的正道長相廝守了。他準備要離開伊朗，經歷二十年，在惡劣的伊朗國王暴政鐵蹄之下苟延殘喘，現在，他就要回孟買去了。這也是為什麼他要上福爾道西街買美金。他行將超量攜帶的空運行李——而我猜想，質量應該都相當龐大——恐怕在在都要以美金支付。

此時，他就像是換了個人說話似的，「我也不曉得，這裡接下來還會有什麼變故。」

信徒的社會

《伊朗周刊》只給我十分鐘。進了《德黑蘭時報》，他們卻差點兒要幫我安插一個職位。《德黑蘭時報》係最新發行的英文日報，他們辦報的座右銘是「真理優先」。辦公室新穎大方，設備齊全，而且忙

碌無歇，報社裡還有幾個美國人或歐洲人從旁協助。

編輯帕維茲先生是個印度裔的伊朗人，四十五歲上下，談吐溫和有禮。我們見面談話時，不時有人將長條校樣送到他桌上，請他處理。我心想，剛才我向他做的說明、解釋我來訪的原由，恐怕他一個字也沒聽進去。果然，我們的對話開始走樣了。

他說：「你是個穆斯林嗎？」

「我不是。可是，我不覺得這有什麼必要。」

「在這裡，伊斯蘭教可是個碰不得的敏感話題。」帕維茲先生背後牆上就懸掛著一幀大幅的何梅尼玉照，相片中人神情嚴厲逼人。

「我知道。」

帕維茲先生越過堆疊滿桌的校樣，對著我傾身詢問，說道：「基本上，你想要怎麼開價？」

「要什麼？帕維茲先生？」

「幫我們寫稿，你應該怎麼計算稿費呢？」

接著，我們就談不下去了。其實據我稍後側面得知，錢才是這間辦公室裡碰不得的敏感話題：報社阮囊羞澀，捉襟見肘。接著，我又被推到另外一張辦公桌前，推給年齡較長的賈福瑞先生，當時他打字機上還有一篇社論或是特稿等他撰寫，他卻停下手邊的工作來接待我，跟我談話。

賈福瑞先生同樣也是位印度裔的什葉派教徒，老家在印度北部的勒克瑙（Lucknow）。他說，他在一九四八年時，「相當突兀地」經人告知，身為一名穆斯林，他在印度空軍服役，是注定「前途無亮」的，於是，他移民到巴基斯坦。可是，身為什葉派教徒，他在巴基斯坦又碰上其他難關，旅居巴基斯坦十年過後，他又搬家到伊朗。而今，伊朗的局勢又害他憂心忡忡的。

他說話言簡意賅，所說的每一句話都是經過三思斟酌才開口的。「所有的穆斯林都有這種傾向，把他們所有的關愛欽慕灌注在特定的某個人身上。一九六〇年代，伊朗國王也是沐浴在萬民愛戴之下。現在，他們愛的是何梅尼。過去，我怎麼也想不到，終有一日，何梅尼竟然會篡奪伊朗國王的王位。」何梅尼在革命成功之後就應該下台隱居，放手讓執政當局自立做主，可是他不肯退位；結果，現在整個國家都把持在「狂熱分子」手上。

有人替賈福瑞先生端了一盤炒蛋跟一碟帕帕當（pappadam，印度脆烤麵包）進來。

我說：「現在不正值齋月嗎？」

他照舊以言簡意賅的方式說：「我不封齋的。」

以前，不論是革命前後，他都戮力支持何梅尼，因為伊朗國王在位期間的選擇變得比較簡單：你要不找個宗教去信，要不就擁抱無神論。伊朗國王統治期間，各種各樣的腐敗流毒都被他帶了進來，污染伊朗；貪污墮落、娼妓、雞姦不一而足。伊朗國王隔絕民情，不察民瘼；等到他大夢初醒，頓時醒悟國家局勢已經泥牛入海的時候，就太遲了。

賈福瑞先生說道：「即使在過去那些日子裡，我還是以為，伊斯蘭就是解決一切的方案。」

這下我可迷糊了。宗教——履行教義與儀典，就可以彌足政治上的缺憾？

我說：「解決什麼的方案？賈福瑞先生？」

「整個國家的情勢。伊斯蘭教義代表了四項精髓：手足同胞之愛、誠實正直、工作意願，以及勞動付出應得的適切報酬。」

我還是不懂。既然如此，為什麼不直接呼籲這四大訴求？何必迂迴取道，繞這麼一大圈子呢？為什麼講到這四項訴求就非將偌大的伊斯蘭教整個扯進來呢？

賈福瑞先生說：「這你就不了解了。」接著，他語調轉軟，繼續說道：「我這一輩子，一心一意就想看到真正的 jamé towhidī，這兩個字，我個人就翻譯為『信徒的社會』。」

又來了，又是阿里的正道這一套：夢想著整個社會完全支配在純正的信仰之下。可是，賈福瑞的信仰又比孟買佬兒的信仰深奧得多；在他看來，阿里的正道不僅止於叫女人重披面紗。賈福瑞先生的信眾社會，衍生自伊斯蘭教創教之初的美好時日，先知親手頒諭聖典，帶領他的子民衝鋒陷陣與靜默禮拜，那個時候，不論任何措施，不管世俗屬性如何，都圍繞著正信，只為純正的信仰服務。

而伊朗所欠缺的，就是如此那般的社會來解決沉痾。而且，賈福瑞先生根據他在印度養成的英國教育背景，以及他在人格上的另外一個面向，卻篤定地認為，只要有關單位信守本分，各司其職，這樣一個社會是可以長治久安的；換言之，要先讓何梅尼下台退隱，將毛拉們趕回清真寺去，讓政治人物與公職人員充分治事，國家就會重上軌道了。因此，雖然賈福瑞先生沒有直說明言，如果要實現他世界大同的夢想，教堂與政府就得加以區隔，政教勢必分離。賈福瑞先生已經被自己的信仰、教育背景，及其政治直覺，逼進自相矛盾、進退維谷的角落裡了。

至於那個從孟買搬家過來的人，事情就簡單多了。他歡欣鼓舞地迎接阿里的正道，接著，腳底抹油，馬上就溜了。賈福瑞先生則懊喪惋惜，美夢成真就在咫尺之間，不料卻被何梅尼給搞砸了。

而我，同樣也得體認到，所謂信徒的社會可容不下我。在這間報社辦公室裡——打字機、還沒分頁的校樣、英語、電話鈴聲此起彼落、「真理優先」等等——我一貫珍重的知性修為，在這裡找不到任何共鳴與強調；不論是在感性上，或是間或產生的理性上，我跟這個地方如果偶爾所見略同，也都只是巧合偶然而已。

報社樓下的開放空間裡，突然有人用著主管般的美國腔調向我喊道：「我可以為您效勞嗎？」

說話的原來是這家報社的某個「主任」，倘若說要為「Jane Towhid」服務的話，你怎麼樣也不會想到這號人物的。他年紀輕輕、面容英俊，髮鬚經過悉心修剪，唇上還留著一撮小鬍子。他用一根指頭勾住他的巧克力棕色外套，外套披掛在一邊肩膀上，將他淡黃褐色的長褲、灰棕色襯衫與大領結的寬幅領帶襯

托得更加出色。

他一定以為我不過是個印度裔什葉派信徒，略通英文，需要幾個里亞爾救急；而他就以其主管之尊，陪著我在大廳裡走來走去，連珠炮般地發問，對著地板皺眉頭，不管我說什麼，他都漫聲回應著「當然，當然」。直到他終於了解，我無意替他們的報紙撰文時，他驟然停步，不再陪著我瞎晃。我向他道別、說再見的時候，他還是滿嘴「當然，當然」。

不要忘了這位主任；不要忘了這間忙碌的報社辦公室；面對著打字機的賈福瑞先生；還有那位溫和的編輯，桌上待校樣稿不斷堆積，還差點就要僱請一個陌生人來幫他寫稿。六個月後，當我再度回到德黑蘭，那間辦公室已經人去樓空、荒蕪廢棄了。

伊斯蘭式的都市規畫

我還買了另外一份英文雜誌，這份刊物可是發行自聖城科姆。這份雜誌就是《和平訊息》(The Message of Peace)，而且正如其名稱所示，整本刊物充斥著狂暴的怒火。

《和平訊息》首先痛陳伊朗國王如何倒行逆施，接著數落西潮送來的「魔鬼」，以及西方科技的種種邪門歪道，甚至可憐的印度總理——垂垂老矣的德賽。老先生都難逃波及。德賽老總理禁酒（從穆斯林觀點看來，可以嘉許），可是他喝尿（從穆斯林觀點看來，斯可忍，孰不可忍？）。我買這本雜誌不是為了閱讀當期的熊熊怒火，也不是為了一詳何梅尼演說全文，或是一覽各個什葉派伊瑪目的生平傳

記。我買《和平訊息》，是為了拜讀其中一篇有關伊斯蘭都市規畫的文章。

天底下真的沒有這種事情嗎？顯然有；不但有，而且還迫切需要。伊斯蘭教義包含了全套的生活方式：世俗起居與屬靈信念絕對無法分離。職是之故，合於伊斯蘭教義的都市規畫不可或缺，除了抵禦過度享樂與偏重物質的工業社會歪風入侵之外，還要建立「一個以真主為中心的社會」。這樣的一個社會裡，婦女應當嚴加看管庇護。可是，問題來了！就是因為有這些問題，才更加突顯嚴守伊斯蘭教義，進行明智的都市規畫，絕對是必要的。同時，解決辦法也是人想出來的。

我們可以先假想一處廣場，同時再在廣場的四個角落興建完整的住宅區，每個住宅區都建有一所清真寺，一間醫療診所與一間育兒室；女人就該守在這些地方，忙她們自個兒的事情。男人出門工作去。他們在廣場中央地帶上班工作。而就在工作區域中心，還要再蓋一所規模宏大的清真寺，寬敞到足以容納所有的男性信眾。清真寺裡還要有個佈施賑濟中心，因為伊斯蘭教義極為強調佈施，其重要性不亞於禮拜、或是封齋、或是遠赴麥加朝聖。

大清真寺周圍將規畫為市集商圈，市集周圍再劃作辦公室工作圈，辦公室工作圈邊緣上再興建醫院、婦幼中心與學校，如此一來，男人出門上班時，可以順便送孩子上學，如果發生其他狀況，還可以立即奔往醫院或是婦幼中心。

居民倘若需要娛樂，女人可以串門子聊天；男人可以騎馬，或是學開飛機。「重點在於，我們絕不鼓勵任何可能會分散社區整體宗教意識的活動。」

除此之外，文中還列舉了一些伊斯蘭教的規定。廢水回收後，重新凝結的再生水，除了灌溉以外，一概不准盥洗飲用。「伊斯蘭教強力倡導清潔的觀念，而水正是潔淨人體的媒介。穆斯林只能用水來淨化水質，從宗教觀點看來，不論是用化學藥品，還是生物過程來淨化水，都是不可接受的。」

住宅區的房子應該一字排開，不得參差，如此安排，清真寺召喚禮拜的呼聲，才能直接登堂入室，

無須借助擴音器材。最後還有一項細節：「舉凡便溺設備，例如抽水馬桶等，安裝時需嚴加注意，切勿讓使用者正面面對麥加聖城，同時也要避免使用者背對聖地。」

信仰可以拯救一切？

德黑蘭北區山巒浮現在晨光中，然褪卻在日間輕霾之下，日落黃昏之際，只看得見一道淡藍紫色的山形輪廓。萬家燈火；這兒一道、那兒一處的閃著電光的招牌，兀自舞動著霓虹燈光。車流嘶吼。可是，一整天下來，不管周遭事物看來如何手忙腳亂，施工中斷的建築物上的起重機還是一動不動。

科技乃萬惡淵藪。《小就是美》(Small is Beautiful)一書作者E·F·舒馬歇，曾經如是說。《和平訊息》也大量引述他的說辭，用西方人自己講過的話來嚴厲抨擊西方世界。可是在德黑蘭，我們就置身於科技之中，科技圍繞著我們，有些科技早就伊斯蘭化了，或是用來宣揚伊斯蘭教義，就算這些技術與設備來自外國，也已經無關宏旨了。

旅館的計程車司機靠著車上收音機喃喃祝頌《可蘭經》文，幾度進出擁擠的車流，衝鋒陷陣；而當我們晚上回到旅館時，電視上正播出幾個毛拉講道的節目。某些現代化的商品與工具——車子、電視、收音機——還是少不了的；擁有這些必需品，也是合乎伊斯蘭教義的榮耀。可是，伊朗人一般咸信這些物品是中性的，無關於任何特定的信仰或文明；這些東西就像是大型國際市集裡的庫存品一樣。

這些東西只要用錢就買得到了。而在伊朗，錢已經成為真主真心祝福的賜禮，德行的獎賞。即使德黑蘭上下不事生產，伊朗對外貿易帳戶裡，每天還是會湧進七千萬美元，再依照需求提出來：提領享有

外國法律與機構保護的外國貨幣，以應推動伊斯蘭革命之需。

可是，還是有人心中感到一陣陣刺痛。當他們坐在空洞冷清的餐廳裡，再也吃不到往日菜單上提供的餐點時，心中難免一陣痛楚。他們做生意需要顧客，可是又忍不住痛恨光臨的客人。除此之外，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害得他們在我住的旅館裡也心痛難掩。革命之後，旅館老闆就絕塵而去，出國遠走高飛了。接著，旅館被一個革命科米塔（Komiteh）接管，攸關生計，樓下大廳裡的每個工作人員都得展現出自豪尊傲的神情（樓上就沒這回事了。有一天早上，整理房間的女僕比手劃腳地對我說，我無權使用旅館的洗衣機具；她會幫我洗衣服的。她說到做到。下午我再回到旅館時，只見我濕漉漉的衣衫長褲，沿著旅館走廊，一一攤掛展示在無人進住的房間門把上）。

某一天向晚之際，一位年輕英國記者尼古拉斯到旅館來看我。他一進旅館大門後，馬上就勃然大怒，為了旅館計程車資跟坐鎮大廳櫃檯的男人吵得不可開交。兩人在空洞冷清的大廳裡對陣互罵，爭執惡化得尤其快速。

身材高瘦，還留著一把小鬍子的尼古拉斯，早就因為連日工作過度而暴躁難耐；作為一名駐外通訊人員，每天漫長的工作時數，披沙瀝金地大量過濾他所謂的「非資訊」（disinformation），才能發出一定的稿量傳回報社。同時，他也開始為每天必須處理與報導的事件感到荒謬與憤怒。

坐櫃檯的那個人高頭大馬，挺著偌大肚皮，土黃膚色，一頭黑色鬚髮。他穿著一套西裝，驕橫傲慢。他的倨傲，與尼古拉斯的憤怒，兩相激盪之下，櫃檯先生昏了頭。承平時期的旅館生意門庭若市時的語言與態度又故態復萌了。

他說：「你要是不喜歡我們旅館的話，你走啊，你就不住啊。」

尼古拉斯怒不可抑，隨即還嘴道：「我運氣好，不必住在你們這種旅館裡。」

我接受旅館開出的計程車資，搭上他們的車子，好讓兩造息事寧人。

尼古拉斯將身子傾靠著櫃檯，雙眼卻投向他方。櫃檯先生著手開出派車單。雖然穿著體面，他其實是個農村出身的鄉下人，才剛剛花上一大筆錢送老母親赴麥加朝聖；現在，他可是整天為錢發愁，自己前景堪慮之外，幾個小孩的教育也令他心煩不已。過去景氣好的時候，他還供得起兒子去美國念大學，可是現在他就得另闢蹊徑了。

尼古拉斯差一點就要大動惻隱之心了。他也記得過去那段榮景，旅館客滿為患，他跟許多人一同擠在某家大飯店的跳舞廳裡，睡在行軍床上，五塊美金將就一個晚上。

他說：「整整七個月以來，這個國家上上下下，誰也沒有做上一點工作。這世界上還有什麼地方可以讓你怠工半年，日子卻照樣過？」

革命尚未結束。選舉結果顯示——雖然有關操縱選舉的指控不絕如縷——伊朗人民還是遵照何梅尼的囑咐，投票給一群毛拉與阿亞圖拉，讓他們加入負責制憲的專家委員會。某個男人因為與某個有夫之婦有染，姦情長達兩個月而遭處決。專司糾察職業團體中違反教義事項的革命委員會，鄭重警告女性理髮師（主要為亞美尼亞人），「不要再浪費青春了」，即刻禁止為男客修剪頭髮。某些驚魂甫定的地毯清潔商，打出一「伊斯蘭式地毯清潔」的廣告——地毯會在水裡連續沖洗三次。

價值五十億美金的F十四噴射戰鬥機訂單一筆勾消，他們的飛彈系統過於「複雜難用而不經濟」。除了勒令停建兩座尚欠十億美金應付款的德製核能發電廠之外，其他多項於前革命時期規畫的方案也都取消了。通往伊朗南部港口阿巴斯港（Bandar Abbas）一條六線道高速公路的工程合約，也從美國財團易手，改由伊朗承包商接手興建：「工程第一階段將率先興建兩線道。」破壞行動的傳聞層出不窮；以色列人始終刻意阻礙亞利安民族海運航線之「正常運作」；西北邊境上的庫德族人為叛亂團體；西南方的阿拉伯民族則蠢蠢欲動，有意對我不利。

政要演說全日無休。勞工與社會福利部長發表一則演說，照片還刊上報紙；他說，清真寺不只是一

個集合信徒共同信仰的地方，同時也是「推動反殖民地運動的基地，不但在思想上，亦或行動上，在在表現出伊朗人民的團結意志。」團結二字，同時也是《德黑蘭時報》上一大篇安息日特稿的主題：「伊斯蘭教何以深具革命潛力？」

團結，一致，禮拜時反覆躬身跪拜，唯一的正信，全民之必信，全民的信仰匯流歸結為單一的信仰，進一步稱神成聖，個體的人格與無助的缺憾，全都消抹在正信光環之下：只要團結、順服、隱沒，就可以直達天堂。

一名旅館櫃檯職員問我說：「你喜歡這間希爾頓嗎？」他不像其他職員穿得那樣講究筆挺。正業之外，他還做些銀幣的小買賣，這會兒，他正準備跟我推銷兩枚銀幣。

「希爾頓裡面空空盪盪的。」

「現在所有的飯店都沒人光顧了。不過，過兩個月就好了。現在政府裡面沒人管事。再過兩個月，我們就會有新政府。至少，現在我們都是這麼說的。」

他是個虔誠的信徒，旅館裡面其他工作人員也都與他一樣。電視上誦經講道，他一定準時收看，節目時間再長也不礙事。

他們在伊朗，開口閉口就是一致的信仰與行動，如此單一意志推翻了伊朗國王與其武裝部隊的統治。大家只要團結一致，毫無貳心，一切困難都將迎刃而解。可是，他們只是在愚弄自己而已。經過幾個世紀的專制獨裁，他們所真心篤信國家是別人的問題，國家可以攔在一旁，任其自生自滅，國家遲早會自己回復正軌的。而且，即使憑著他們的信仰，他們的國家還是每況愈下——不論旅館也好，城市也好，整國國家也罷，率皆急劇衰竭——可是，他們還是袖手旁觀，等待著周遭情勢自行好轉，轉變到跟過去一樣耀眼的榮景。

我當下就決定要前往聖城科姆走一遭；也就是在這個時候，我遇見了貝札德。他領著我通過車流，並且說道：「你一定要讓我一直牽著你的手。」這些話我聽了很受用，也解決了我的疑慮。我對波斯文一竅不通，又處於種種伊朗矛盾衝突之中，確實需要有個伊朗人伸出手來領著我。

然後，貝札德就替我翻譯革命海報上的標題大字：「第十二順位伊瑪目，我們正在等候著您呢。」而我更覺置身五里霧中了。

三 聖城

貝札德與我搭車前往科姆。我們幾經折騰回到旅館的時候，已經過了中午。儘管終日閒散，旅館的計程車司機還是對這趟長途沙漠旅行興趣缺缺。只有一位司機有意跑這麼一趟——他就是那個有天晚上讓我在車上聽了一大串《可蘭經》廣播的司機——可是，車資要七十美元。貝札德說，這真是漫天開價；他認識某個司機，不必花上這麼多錢，就可以載我們到聖城。

我們捱上一大段時間，專等候貝札德的司機。等他車開到了旅館，我們才發現，他的價碼已經比我們原先在電話裡講定的車資又漲了幾成。他身形矮小，不是容易相處之輩，他還特別聲明自己不是穆斯林。其實，那不是他的意思；他只是要說，他既非什葉派信徒，也不是波斯人。他還是個「部落成員」，屬於盧爾人（Lur），老家在伊朗西部的盧里斯坦（Luristan）。

科姆城內有一座知名的聖殿，供奉著什葉派第八伊瑪目的妹妹的墓龕；近千年來，科姆一直是信徒朝聖的聖地，同時也是好幾所神學院的所在地。何梅尼曾經在科姆授課與講道；伊朗國王被迫退位，何梅尼得以重回伊朗之時，他也在科姆建立指揮總部。他在科姆時，周遭往來伴隨的都是些阿亞圖拉，這些伊斯蘭高僧本身的地位就已經相當尊貴了，而其中一位隨侍層峰左右的人物——阿亞圖拉哈爾哈里，或許，此行我有希望與他會晤。

前往聖城

何梅尼負責接收政權，佈道傳教與賜福信眾，哈爾哈里則負責絞吊叛徒。他是何梅尼的絞刑法官。許多速審速判速決的伊斯蘭法庭都是由哈爾哈里召開主審的，最終判決都以處決結案，處決後還公開張貼生死前後對照的官方檔案照片：一幀行刑前，尚未送命的照片；一幀受刑人斷氣後，裸身平躺在停屍間滑動式停屍板上的寫真。

近日來，哈爾哈里連續接受外界專訪，刻意強調他身為一名法官的日常活動。德黑蘭繪影繪聲地傳說，由於他最近飽受高層冷落疏遠，他才要透過這些訪問，企圖重振名聲於不墜。他向《德黑蘭時報》的訪問者表示，他光在德黑蘭一市，「說不定」就判處了四百名人犯死刑。「他說，某些晚上，監獄還得將三十幾具或是更多的屍體，裝上卡車運送出去。他還宣稱，許許多多庫吉斯坦省（Kuzistan Province）叛徒的死刑執行書，都是經過他簽署發出的。」庫吉斯坦省就是伊朗西南部的阿拉伯省分，也是伊朗原油的產地。

他同時向另外一份報紙說，當年還有人企圖謀反——主要是在南韓大使館策畫的陰謀——打算營救伊朗國王的總理哈維達¹，以及一群前朝遺老與重要人士，越獄逃離德黑蘭看守所。而當他一聽說有人圖謀不軌，就當機立斷——要讓美國中情局和那些錫安主義者措手不及，重重挨上一記——提前審理他們的案子。「我花了一個晚上的工夫，看完他們的案子，就叫他們跟行刑隊報到。」他也對《德黑蘭時報》詳細說明哈維達是怎麼死的。第一顆子彈打中哈維達的脖子，沒打死他。接著，行刑者——也是一名教士——就命令哈維達雙手扶正腦袋；第二顆子彈正中腦門，終於打死他了。

我與一位通訊社特派員談到哈爾哈里的種種時，我問他：「他會答應見我嗎？」
「他巴不得跟你見面呢。」

而貝札德也認為安排和哈爾哈里見面不是難事。貝札德說，我們一到科姆，他就可以打電話聯絡哈爾哈里的秘書。

電話、秘書這些現代化設施似乎跟哈爾哈里不搭調。可是，哈爾哈里素來以走在時代先端自許。「他說」——這是根據《德黑蘭時報》披露的——「宗教領袖想要在伊朗落實穆聖先知的正道法統。過去在先知的時代，戰鬥只靠揮刀舞劍，現在，刀劍已經為幽靈式戰鬥機取而代之了。」F4幽靈式戰鬥機不是美國戰鬥機，也不是異國科學的產品，而是像刀劍一般的國際性武器，全球大市集庫存中的一環，只要下單訂購，就可以合乎伊斯蘭教義，協助宣揚伊斯蘭教威。

貝札德內心也有類似的困惑，雖然說他宗教信仰淡薄，他其實信奉的是共產主義，而且從小就被同樣加入共產黨的父親區隔遠離在宗教之外。貝札德的父親在伊朗國王統治期間曾經入獄監禁過一段時間，而貝札德克紹箕裘，繼承了父親的夢想，嚮往著「真正的」革命。諸如此類的革命尚未降臨伊朗；可是，貝札德咀嚼著所有他不斷學習內化的唯物辯證，逼著自己剝除何梅尼革命的宗教狂熱，勉力辨識著這場動亂之中還有哪些事件或特質，符合他心中真正的革命。就在我們開車南行，通過德黑蘭時——第一眼看來像個市集，再看就像一處村落屯居在遭到污染的沙漠上——當地就是曾經發生普羅平民起義的城市，也是他一心急著要指給我看的革命地標。

低矮的磚造建築，掩上塵沙的色澤；圍牆似乎尚未完砌；室內明亮，感覺反而跟牆上的灰泥一樣不

¹ 哈維達 (Amir Abbas Hoveida)：一九一九年出生在德黑蘭，及長負笈比利時布魯塞爾大學求學，取得政治與經濟方面的碩士學位，再轉赴法國索邦大學獲取歷史博士學位。哈維達原本是伊朗外交官，並於伊朗國營石油公司擔任主管，一九六四年至六五年間，首度以財政部長身分入閣。當時的總理遇刺身亡，他接掌閣揆，配合巴勒維二世致力改革伊朗，革命爆發之後，遭到處決。

持久。居民一波又一波地從鄉間地帶湧向德里蘭南區的平坦低地；一個個由傳統式的四角黏土磚房群聚組成的聚落，家戶低矮的屋簷相互銜接，乍看像個村落一樣。

我們經過一個大工廠的倉庫，每個窗口下方的牆壁上都晾著某種灰褐色的毛皮。貝札德對我說，這是一家布料工廠，也曾經作為革命的中心。當時政府軍衝了進去，許多工人都慘遭屠殺。

車子駛過煉油廠，煉油廠的煙囪不斷吞吐著火焰，過了這裡，我們就開到真正的沙漠了。此時，極目所至，幾無立木，而視野無限寬廣；沙堆、丘陵、小型山脈綿亙在前方。道路先爬坡上行，再俯衝到開闊的谷地。山丘和沙堆起伏極為柔緩，從遠處看去，或是掌握住某些特定視角，偶爾可以在棕色坡面上看到星星點點色澤極為優美的綠色色塊，許是高低雜草混生集成的草叢，彼此間隔得相當疏闊遼遠。

我們站在山丘上向左看，一邊就是地圖上詳加標示的鹽湖。遠看鹽湖小而潔白，彷彿整個湖面即將蒸發結晶，堆成鹽丘；白色的湖面還圍上一圈淺淡的綠色。貝札德說，有時候整個湖都映著湛藍的光澤。過去，伊朗國王的秘密警察經常用直升機載著許多屍體傾倒在湖裡。這湖實際上要比看起來大多了。我們慢慢開車通過時，湖區四周荒無人煙，我們距離圍圍著白色湖面的淡綠湖水還遠得很。經過淡綠湖水之後，土地就更加殘破不堪了。山丘不再渾圓，反倒是尖峰崢嶸地刺向天空。

這裡的確是沙漠，可是道路上卻交通繁忙；路邊偶見小店，賣些冷飲瓜果消暑。貝札德認為我們到達科姆之前，應該先行吃喝一番；科姆聖城可絕對不會鬆懈齋月封齋的教規，日落之前，城裡找不到地方解渴救飢。

我們在一個「巴士＋卡車」休息站稍作停留，休息站裡一家洋溢著地中海色彩簡陋的大型餐館，路邊月台上還有一個賣西瓜的小攤子。西瓜攤子上撐著一把棉布做的遮陽篷，篷底幾乎沒有半點陰影，而賣西瓜的人坐在攤子上，枕著手臂呼呼午睡。

我們搖醒他，跟他買了顆西瓜，他還借了我們一把刀與幾把叉子。貝札德將瓜從中對剖，再切碎瓜瓢，我們三個人——包括那個不請自用的司機——就圍著西瓜吃將起來，就像三個人公用一個盤子一樣。我看得出来，貝札德十分喜歡這樣一個服務與分享的時刻。我們可以說，其實這也是個屬於穆斯林的時刻；這正是穆斯林應當身體力行的分享德行——那個司機也理所當然地、大刺刺地跟我們蹲在一起舉火大嚼。可是那個司機是個工人；貝札德可是把西瓜分給人民，而且他還是在一片荒漠之間，舉行他自己的儀式。

月台上種了兩棵小樹。一棵樹皮早被剝了個精光，只剩枯樹一杆；另外一棵也奄奄一息。兩棵小樹中間躺著一位裹著黑衣、面有病容、蜷曲在陽光底下，遭到酷熱無情蒸烤的老女人，這正是距離德里蘭一個小時車程之外，地上一片無法解釋的人形垃圾。瓜攤上的報紙碎屑隨風捲起，飄浮飛掠過漫漫塵沙，飛上樹幹，就這樣牢牢糾纏在樹枝上。跨過大路，路邊一輛卡車踟躕不前，引擎廢氣不斷噴吐；同時間，車流逝者如斯，不捨分秒。

我們蹲在沙地上吃西瓜。那個司機不時吐出西瓜子，用力啐在馬路上。有為者亦若是，我也像那個司機一樣猛啐瓜子；貝札德也不遑多讓，只是啐的態度比較虔誠。接著，出其不意地，那個腦袋古板的小個頭盧爾人，什麼也沒說，猛地将叉子栽進瓜瓢，站起身來躍下月台。他吃完了；他已經吃夠了西瓜。他走過餐館前方骯髒的沙質廣場，進到餐館裡面，找地方盥洗。貝札德的分享時刻就此結束。

之前，我想像中的科姆應該是個建立在山丘上的聖城，城中應當處處可見巖峻高聳的岩壁石牆，投射出重重陰影，虔誠的信眾在岩石中穿鑿出窄小的巷弄，再就著兩側挖出一個個棲身小室或是石穴，以便居中冥想。科姆四平八穩地攤在沙漠中央，接近聖城的道路兩旁景致，無異於連接其他沙漠城鎮的道路；除了簡陋的小屋之外，就剩下加油站了。越接近聖城，道路狀況就越加整齊清潔，臨時搭建的工寮少了，人家的住宅多了。圓環交流道上還有一處花園，春花怒放——波斯花園總有一種突兀、封閉、綠洲一樣的特質。遠方一座金碧輝煌的圓形屋頂，閃爍在幢幢尖塔之間。聖城科姆馳名遠近的墓碑，就供

在這座圓形屋頂下的清真寺裡頭。

貝札德說：「那座屋頂是純金打造的。」

純金圓頂金碧輝煌了一百年。可是我們即將進入的城市，致富純為開採原油，整個城市像個重建組合過的大市集，除了純金的屋頂與塔樓外，這座城市毫無其他性格。

貝札德說：「我該怎麼介紹你呢？就說你是某個大報的特派員好嗎？哈爾哈里最喜歡駐伊朗特派人員了。」

「可是，那樣我就沒法兒跟他談些我想談的東西了。其實，我只是想跟他聊聊。我想要了解，他是怎麼演變成他現在這個樣子的。」

「那我就說你是個作家好了。我又該說你是從哪裡來的呢？」

這可就棘手了。說我是從英國來的，最符合實際情況，可也有誤導之嫌。說我是千里達人的話，只會令他迷惑，而且同樣誤導。南美洲可以考慮，只是說我來自南美洲，隨之引發的聯想也是不正確的。

「你能不能就說我是從美洲過來的？這樣子講，波斯人聽得懂嗎？」

貝札德說：「我就說你是從美國來的，可是你不是美國人。」

我們直奔圓頂清真寺，將車子停在墓碑外面的停車場上。下午才剛過了一半，鎮上要比沙漠還熱，純金圓頂看起來更是滾燙。那個盧爾司機雖然之前與我們共進西瓜聖餐，這會兒卻開始喃喃抱怨起吃食無著了。管他齋月不齋月的，他想要開車離開科姆，出城去找點東西祭他的五臟廟；他也想知道，我們到了科姆以後，究竟怎麼打算。

大路對面，墓碑入口處附近一個西瓜攤子旁邊，有一座德國設計的透明電話亭，貝札德過馬路去撥電話給哈爾哈里的秘書。

墓碑區四周的高牆上，飄揚著長條標語，有些標語直接以波斯文噴漆在牆上。其中有兩幅英文標語——「我們要共和」、「何梅尼是我們的領袖」——這兩幅標語一定是為了方便西方電視台攝影記者拍攝而設計的。第二幅標語顯然直譯自 *Khomeini e Imam*（何梅尼即伊瑪目），可是如此翻譯並未完整闡述原意，讀者只能意會到，伊朗人民效忠的對象（多虧前一幅標語幫忙），從伊朗國王轉移到何梅尼身上，卻漏掉了這位領袖在宗教上的神聖權威，以及這樣一位領袖可是引領人民上天堂的管道。一千一百年來，伊朗人民不斷地耐心等待第十二順位伊瑪目重回故土，「伊瑪目」三個字在伊朗承載了重大意義，而在聖城科姆，第八伊瑪目的妹妹埋骨之處，伊瑪目的意義尤其崇高。科姆宣揚的共和國，立國宗旨就在於搭建極樂登天的管道，以及摒斥所有非神聖的統治。

貝札德打開電話亭的玻璃門，手上握著電話聽筒，揮手示意要我過去。

我走了過去，他說：「秘書說哈爾哈里正在做禮拜。等他開齋之後，他可以在今天晚上九點接見你。」

現在時間不過三點三十分。先前我們跟司機說過，我們在科姆不過待上三、四個小時而已。

貝札德說：「你要我跟秘書怎麼說呢？」

「跟他說，我們會準時到的。」

接著，我們過去將這個壞消息告訴那個不耐煩的盧爾司機——抑或，其實對他來講，這是個好消息：他是論鐘點計費的。他嘟囔了些貝札德沒翻譯的話，隨即揚長而去，開車出城去找東西吃，留下我和貝札德在一旁傷腦筋，不知道在這樣一個昏昏欲睡、烈日焦烤的城市裡，該如何消磨接下來無所事事的五個半小時，其中五個小時裡還找不到地方消飢解渴呢。

墓碑對面的店舖裡展售著便宜的紀念品：浮印著何梅尼大臉的碟子、便宜的陶土瓦罐，還有些甜食：扁扁的棕色圓形蛋糕，軟軟的，看起來甜得膩人，蛋糕邊緣已經逐漸鬆開了。貝札德說，齋月期間，店家還是賣東西給旅客吃，可是利不及費，實在不必耗上這番蠢力氣，周遭旅人根本就寥寥可數。

一名老嫗不良於行，許是朝聖客無疑，自個兒緩緩地推著輪椅經過店門口。我們還嚇著了一個躲在亭子裡、小口小口偷吃棕色蛋糕的圓胖男孩，那蛋糕不過是他的部分存糧而已；可是經他判斷，我們應該不會對他不利，他又對著我們憨憨一笑（雖然說幾天以前，才有兩個人因為饑嘴破戒，挨了一頓鞭子）。

紀念品店裡也賣一種小型的黏土板，板子上打印著阿拉伯文字。黏土採自麥加與麥地那，這兩個阿拉伯城市（這可是當地人的獨門好生意）；小板子專供虔誠信徒禮拜之用，信徒匍匐躬身行禮之時，可以將前額貼抵在這塊黏土板上，接觸到神聖的土壤。而我猜想，墓碑牆上高處，藍白相間的亮面磁磚上，一定是書寫著某一段《可蘭經》引文。可是貝札德沒辦法翻譯出來；這段引文是用阿拉伯文寫的，他可讀不了阿拉伯文。

阿拉伯文！按理講，在伊朗看到阿拉伯文，不該出乎我意料之外，可我還是飽受震撼。因為在我心底某個角落，我是透過古典時期的歷史來了解伊朗的，我也對波斯文化的淵遠流長肅然起敬——征服埃及、對峙希臘、頑抗羅馬等等；而在我內心另外一個角落，我是藉著印度來認識伊朗的，印度，至少西北地方人士還是將波斯視為人類史上最輝煌的文明成就——就像過去歐洲人如何推崇法國一樣——波斯的語言、詩篇、地毯與食物，在在令印度人驚嘆。喀什米爾人說，波斯菜法爾西卡那（Farsi Khana）是最上乘的佳餚；當地人還說，切納爾（Charar），也就是從波斯移植過來的懸鈴木，或是梧桐樹（一度如此搶眼地描繪在波斯與印度蒙兀兒帝國時期的繪畫中），其樹蔭還有特殊療效呢。可是來到科姆，一定要扔掉這些不合時宜的觀念。在這裡，他們仰望崇拜阿拉伯人，就像抬頭瞻仰牆上那段文字一樣。

貝札德建議，我們應該進去參觀這尊墓碑。要是有人問了起來，我就說自己也是個穆斯林就好了。我說我恐怕裝不出來，我一進大廟一定會手足無措，舉止行為都會出差錯的。進入清真寺的時候，應該先踏出右腳嗎？是不是只有進盥洗室洗手的時候，才能先邁進左腳？還是順序正好相反？遜尼派信徒沐浴淨身時，是不是規定要從肩膀往下沖洗到手指？而什葉派信徒恰好逆向操作，水流從手指傾洩到手

肘？鞠躬或是行禮時，又該採取什麼樣的姿勢呢？關卡實在太多了，一不留神就會露出馬腳。即使我緊跟著貝札德，依樣畫葫蘆行禮如儀，看起來還是不能讓人信服。

貝札德說：「你可別指望跟我畫葫蘆。進了清真寺，我也不曉得該怎麼辦。我是從不進廟的。」

可是，我們還是可以在庭園裡走一走，遊園還不必脫鞋呢。庭園遼闊，光亮的，一邊是一座鐘樓，嵌著一面樸實無華的現代時鐘，鐘面上一個數字也沒有；另外一邊就是墓碑進門的地方，墓碑大門高聳，整個建築往內凹，四處閃耀著銀光，像個銀色的洞穴，抑或就像個中間挖開的銀色拱形圓頂一樣。其實大門上閃耀著發出銀光的不過是玻璃而已，成千上萬的小片玻璃，從各個不同角落捕捉與反射陽光。而我們總算在這裡看到前來朝聖的信徒了，臉龐被陽光烤得焦褐的農民帶著一家老小，不遠千里而來。他們沿著庭園圍牆，各別找露天小室，逕自就搭起營帳，每個小室都是過去某個知名人物或是皇家成員埋骨之處。同時，這些人也展現著不同的民族類型：正如古老的波斯，跨大陸遷徙時，不斷兼容並蓄各個部落與人種。

我聽貝札德說，某一群黃皮膚的蒙古人是土庫曼人。我幾乎不知道這三個字是什麼意思。我只有在 一本出版於一八二四年的英國小說《哈吉·巴巴》裡讀到過土庫曼劫匪，而我手上這本小說還是在旅館裡買的盜版，翻印自牛津的世界經典文學叢書版。此外，還有一次，我在倫敦的一間展售室裡，看到一幅繪製於十七世紀的印度素描，主題就是一個雙肩軛枷的土庫曼囚犯，犯人兩隻手銬在頸背上的一片木塊裡。所以說，中亞一帶的土庫曼人，其實曾經是一支令人喪膽的民族。他們又是如何融入波斯歷史之中的呢？這我就不得而知了。而且，這個民族往昔四出征戰劫掠的歷史，好像已經遠颺逸去，跟這些紮

營在墓碑旁邊垂頭喪氣的朝聖者，似乎一點都不相干。他們身型矮小、衣著襤褸、膚色焦褐，有如某種文明邊緣上的零碎雜屑，而此等文明本身，又已經長期退縮到世界邊緣之上。

清真寺附近有一棟兩層樓的黃褐色磚造建築，何梅尼曾經在此執教講道。樓房外型平平，毫不起眼；而今人去樓空，建築也空置了下來。貝札德與我漫步在市集裡。此時，正是大部分看顧攤子的小商家的午休時間。麵包攤上，一圈圈打了洞的甜麵包覺得老高，老闆平躺在靠牆的一層貨架或是櫃檯上，顯然就拿他的存貨當枕頭，呼鼾不已。貝札德買了一份報紙。天氣熱到鑲石流金；科姆城內乏善可觀；城內居民的生氣還隱而未現。我們開始四處尋找庇蔭，找地方坐下歇腳、殺時間。

我們來到一間小旅館。旅館裡面十分狹窄，卻是剛剛整修裝潢完畢的。櫃檯後面坐著兩個人，裝做沒看到我們的樣子。我們在前廳找個地方坐下；除了我們以外，廳裡空無一人。幾分鐘過後，有個坐櫃檯的過來要我們離開。齋月期間，旅館暫停營業；他說，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進門的時候，他跟同事未曾起身相迎。他說話的語氣如此和藹可親，讓你想發脾氣也難。

我們只好走出旅館，再度走進陽光與灰塵之中，再次經過紀念品店門口，棕色的蛋糕與阿拉伯黏土板，最後終於獲准落坐在「何梅尼是我們的領袖」標語對面空空盪盪的餐廳裡頭。餐廳不小，設計與裝潢卻敷衍草率，柱子上拼貼著大理石板。

這裡沒有東西可以入喉，瓶裝的「可樂」飲料，看起來像是足以穿腸破肚的化學鳩酒。餐廳裡還被烹調羊肉的刺鼻氣味薰得暖烘烘的。可是光是能避開日頭就能讓人情緒舒緩了；鬆懈後的疲憊隨即如潮水般襲來，我亟欲休息，貝札德則在一旁看自己的波斯文報紙，這樣也挺方便一分一秒地打發時間。

餐廳遠處、靠近上菜櫃檯的一個角落裡，幾個人圍坐一桌，原先，我猜想他們應該是一家人：一名父親帶著兩個兒子，還有一個小女兒，裹著一襲長長的黑色衣衫與面紗。我心想，這麼小的女孩，竟然就已經戴上面紗了。可是她活躍得很，喋喋不休，一張嘴從沒閉上過，偏偏一旁家人還十分捧場，好像

不管她講什麼，他們都覺得很有趣的樣子。三不五時地，那個男人還會朝著我微笑，彷彿邀我一同加入欣賞的行列。小女孩忽而在一處平台上尖聲嘶喊些什麼，忽而縱身躍上幾級階梯，衝到上層長廊，再駐足尖叫些什麼，引爆樓下觀眾另一波笑浪。她又步下樓梯，讓其他家人看看她從樓上拎了什麼好料過來。然後她轉過身來，對著我和貝札德走來，就在這個時候，我們才看到她的臉。

她可不是什麼小女孩。她個子很矮小，約莫四呎高，非常老，說不定還已經瘋了。她秀給我們看她從樓上帶下來的好東西——一盤白米，上面還鋪著一片菱形的棕黑色羊肉片。她究竟是因為人家給了她這盤米和肉而歡喜，還是在跟我們抱怨？貝札德什麼也沒說。她說話的時候，他只是靜靜聽著，可是他什麼話也沒對她說。然後，她就走了出去。

我對貝札德說：「我還以為他們是一家人呢。我以為這是他們家開的餐廳呢。」

貝札德說：「喔，不。他們不是這家餐廳的老闆，他們只是工作人員而已。」

組織井然的神學院教育

我們走出餐廳，再撥一次電話給哈爾哈里的秘書，問他可不可以將見面的時間提前。現在時間是五點過半，四周涼爽了一些，街上人多了些。我們的司機回來了，他什麼吃的也沒找到。

貝札德撥了電話。然後，就在他跨出電話亭之時，他與兩個留著鬚子、穿著毛拉道袍的年輕人攀談起來。我本來還沒看到他們兩人迫近，我兩眼只是專注在貝札德身上。

目前為止，我只在電視節目上看過毛拉，黑白畫面，大部分畫面只拍攝到他們的鬚鬚與頭巾。現實生活中的毛拉道袍之楚楚有致，讓我暗暗吃驚。道袍加身，這兩人就從街頭人潮中脫穎而出了：黑色的頭巾，白色無領長衫，底下再穿著顏色淡綠或淡藍的及地長服，同樣無翻領，胸口縫上兩顆釦子，外面

再罩上黑色棉質的無袖斗篷——類似牛津或劍橋或蘇格蘭的聖安德魯斯學院的學者或研究員穿著的斗篷。不消多疑，此地就是那些大學裡各類教士行頭的發源地，而這些大學於中世紀時期都是神學研究的重鎮，正如科姆仍舊是伊斯蘭研究中心一樣。

我看著貝札德領著那兩名毛拉過來時，深感如此裝束，或許自始至終都甩不開引人注目的意味，象徵著優異的資質，同時也投射出具體的尊嚴感與拉長身高的視覺效果。這兩位毛拉其實都不高，實際年齡也比他們的鬍子所暗示的要年輕得多。

貝札德說：「你說你想跟學生見面談談的。」

之前，我們確實在車裡商量過，可是不知道該怎麼著手。

貝札德又補充一句：「哈爾哈里的秘書說，我們可以提前到八點鐘過去。」

我確信，其實我們隨時都可以過去，之所以要我們一再等待，只為了讓哈爾哈里有尊嚴，讓他做足面子而已。

那兩個年輕人來自巴基斯坦。他們想知道我究竟是什麼人，而當貝札德跟他們說，我來自美國卻不是美國人時，他們看起來十分滿意；當貝札德更進一步告訴他們，我一心一意想要多加了解伊斯蘭教義時，他們的態度當下立即轉變為十分友善。他們說，他們宿舍裡有些英文書籍，我應該會覺得合用。我們應該先去他們宿舍，然後再到他們的學院，見見來自許多不同國家的學生。

貝札德安排我們一行人統統坐進車裡。他讓我坐在盧爾司機旁邊，司機見著毛拉的頭巾、長服與虬髯鬚鬚，難掩敬畏之情；貝札德自己就跟那兩個巴基斯坦人坐在後座。他們引導司機，將車子開到一條出人意外地愉悅的住宅街上。可是他們遍尋不著先前說要給我的書，於是我們就再度轉進，不是去他們的學院，而改道一訪學院對面的行政大樓。

在行政大樓裡，我們遭到權威人士嚴格的盤查：一個穿著裝束與那兩個年輕學生一樣，只是頭上不

裹頭巾，改戴了毛帽的中年人。他可不像學生那麼容易打發，貝札德沒法兒簡單說明幾句就敷衍過去。其實，他可是滿腹狐疑的。

「他是從美國來的？」

貝札德與那兩個學生現在都緊抓著貝札德捏造的故事不放，異口同聲地說：「可是，他不是美國人。」戴著毛帽的男人說：「他不用跟學生談。跟我談就好了，我可以跟他講英文。」

他也是從巴基斯坦來的，清瘦消瘦、憔悴的臉龐，直追巴基斯坦的建國者真納先生的尊容。他雙頰凹陷，嘴唇因為連日封齋而焦枯蒼白。

他說：「我們在這裡也出版了一些書和雜誌。所有你想知道的資訊，都在這些書和雜誌裡頭。」

他跟一個學生用波斯語或是烏爾都語交代了幾句，學生就轉身離開，回來的時候，手上多了本雜誌。那本雜誌就是《和平訊息》的第一卷第一冊。

喔，原來，那些撻伐西方民主國家妖魔邪道的文章，還有吹捧頌揚什葉派各個伊瑪目的聖徒傳記，就是在這裡粗製濫造、大量生產寫就的。原來，他們就是在這裡閱讀舒馬歇與湯恩比，再引述他們關於科技與生態學的話來數落西方世界。

我對那個戴毛帽的男人說：「可是，我看過你的雜誌。」

他大為震驚，看起來深疑不信。

「我已經拜讀過第一卷第二冊了，裡面有篇文章提到合乎伊斯蘭教義的都市規畫。」

3 真納 (Jinnah)：全名為 Muhammad Ali Jinnah，一八七六～一九四八，印度穆斯林政治家，巴基斯坦的締造者。一九〇六年加入印度國大黨，一九一三年加入穆斯林聯盟，支持印度教穆斯林統一直至一九三〇年，後因反對甘地的不合作政策而退出國大黨。由於他鼓吹建立單獨的穆斯林國家而導致一九四七年創建巴基斯坦，他成為第一任總督。

他看起來還是不得要領。

「那本雜誌是我在德黑蘭買的。」

悻悻然地，他打個手勢叫我們進去。我們一一脫鞋後魚貫進入他的辦公室。寬闊的大理石台階，寬闊的迴廊；廳室寬敞，地板上鋪著地毯。

戴著毛帽的男人——看樣子，應該是某某主任吧，我在心裡暗暗忖度著——坐進他全新的角鋼辦公桌後面。兩個學生中，一個學生坐在他左邊，另外一個學生與我跟貝札德三個人，就坐在靠牆的一排椅子上，遠遠面對著主任的辦公桌。接著，就在這樣正式的氣氛下，我們開始對談。

坐在主任左邊的學生先開口，他說，伊斯蘭教是唯一能夠讓人活得有人性的東西。他說話的語氣溫柔而篤定；如果要了解他究竟在講什麼，一定要先試著從他的角度去理解，這個世界在先知獲得天啟之前，是個何等混沌無章的亂世。

主任在挖鼻孔，對這個學生講的話似乎頗表贊同。他的辦公桌上擺著幾具橡皮圖章、一顆新的地球儀、一把訂書機、一具設計新穎的電話機。書架上並肩站著幾個箱型的檔案夾、一本《牛津英語辭典》，還有一本波斯—英語辭典。

他們跟我說，科姆一城就聚集了一萬四千名神學學生（可惜，我們偏偏挑了白天最不恰當的時間進城，街上幾無人煙），修業最短期限為六年。

「六年啊！」

主任微笑著回應我的驚嘆。「六年算什麼。有些人可以花上十五年、二十年、三十年都鑽研不完呢。」

這麼長的日子裡，他們都在學些什麼呢？這裡可不是個研究與學習新知的地方。他們都是些研究信仰的人。這個題目究竟有什麼奧妙，需要皓首窮經、潛心學習這麼多年？嗯，先要學習阿拉伯文；再學

應用在各個層面的阿拉伯文法；還有邏輯與修辭；還有法理學，伊斯蘭教的法理就自成一個學習科目，而法理學原理又是另一個項目；還有伊斯蘭哲學；還有伊斯蘭科學——相關先知與其周遭同伴的傳記、系譜發展、「相互關係」與傳統等等。

原先我還以為神學院的教育應該比較不拘形式，比較著墨在身教上：老師是個聖人，學生比較像是門徒或追隨者。我沒想到神學院教育竟然是這麼有組織的學習方式，或是隱隱暗示著如此過時的古典學習方式。我開始了解，或許這麼多年的學習是有必要的。在這個地方，信仰還是牢牢地束縛著俗世。而且就跟中世紀一樣，人生而有涯，神學研究可遙遙無涯。

科姆這些偉大的導師當中有一位學者，至今還是講學不輟，一日領導信眾禮拜五次，針對一本討論什葉派信徒觀點中的伊瑪目的知名作品，創作了高達二十五卷評論文集，某些早期撰寫的評論，日後也成為評論的材料。二十五卷當中，已經出版了七卷，剩下的十八卷，刻下正交由一整個師的學者通力合作——無疑的，學者一定是彼此對照勘校他們聽講的筆記；還在倚賴中世紀傳抄書信的古典方法——以應出版之需。何梅尼關於法理學與伊斯蘭哲學的講座素來馳名中外，他同樣也就各個不同主題創作了十八卷巨著。

然而，如此規律的生活，禮拜與講學，評述與再加闡述，卻在伊朗國王統治後期差點毀於一旦。何梅尼遭到放逐；安全部隊進占科姆；甚至連遠道從巴基斯坦而來的學生都受到秘密警察的迫害。

坐在主任左邊的學生說話音量驟然降低，他說道：「要不是多虧了這場革命，伊斯蘭教在伊朗早就被抹乾拭盡了。」

兩個學生都是出身普普通通鄉間城鎮的神職家庭，從小就認定自己日後注定要擔任毛拉。今年只是他們負笈科姆求學的第八年。他們現在修習的課目是為期兩年的阿拉伯文，還有邏輯與修辭（修辭只是一種鋪陳論證的古典方式）；不過，他們可不搞文學。他們的研究並不涉於歷史，可是如果學生私底下找

書看看，也沒有人會講話。他們來到科姆，最主要的是為了學習伊斯蘭哲學。其他大學對於這個主題的研究，都不會像科姆這麼深入貫通；他們到過科姆，這個何梅尼一度講學，同時也是馬拉席與沙里亞特馬達里（兩人都是知名偉大的阿亞圖拉教師）開釋學子的地方，日後再回到巴基斯坦的故鄉，他們就會在什葉派信徒之間備受尊崇。

透過貝札德的翻譯，坐在貝札德左邊的學生說：「我認為這個地方就相當於柏克萊和耶魯。」

我對貝札德說：「他拿這兩個地方相比，聽起來實在不倫不類。」

貝札德說：「柏克萊和耶魯不是他說的，是我說的，這麼講比較方便你了解。」

那三個巴基斯坦人，兩個學生加一位主任，自個兒交頭接耳一番後，坐在主任左邊的學生就拿起電話聽筒開始撥號。

貝札德說：「他們想要你跟他們的老師見面。阿亞圖拉施拉吉。他現在正要打電話給他，跟他約個時間。」

我在心裡還童心未泯的一角，再度小吃一驚，我們無意間步入這樣一個中世紀的學究世界，要跟阿亞圖拉敲時間，跟這種偉人定約會，竟然也是用電話通知。同時，自己也因為即將見面施拉吉而緊張不安——就像是突然天降良機，可以跟彼德·阿伯拉德⁴，或是索斯柏立的約翰⁵，或是跟其他幾個名氣沒那麼大的中世紀學者辯論一樣（假如這種事情還有發生的可能的話）。我對施拉吉的學養一無所知，見了面還真不知道該跟他說些什麼呢。

撥電話通報的學生放下手中摩登的聽筒。先前他臉上羞怯與虔誠的表情一掃而空，現在他可是喜上眉梢。他說：「今晚七點，阿亞圖拉施拉吉可以見你。我一向他說明你的來歷後，他馬上就決定要見你了。」

主任一直緊繃的面容終得稍緩，彷彿施拉吉心無芥蒂的準備要接見我，終於讓他鬆了一口氣，不再擔心——這下子，招待我在他自己的辦公室裡坐坐，跟這兩個天真無邪的學生聊聊，就不會給他惹來什麼亂子了。方才談話之間，他不斷地摳鼻子，摳挖之勤快，我不由得遐想，齋月封齋不但害得他雙唇焦枯慘白，連帶也影響了他的鼻孔，攪得他如此心神不寧。現在，他心上大石終於落地，提議要帶我們到整棟建築四處走走。於是我們全員起立，正式面談告一段落。

我們離開他辦公室的時候，我還試著詢問，此地學生的學雜費與生活開支情況如何。可是，我卻問不出直接明快的回覆；事後，還是貝札德直接了當一邊囑咐我切莫再多問下去，一邊說，不管學生修業期間有多長，科姆當地的宗教基金會都會支應學生的就學與生活開銷。

寬廣的走廊對面一間辦公室裡，有個書法家正在振筆疾書，謄寫《可蘭經》。他年紀四十開外，穿著長褲與襯衫，坐在一張桌面傾斜的寫字桌前。他運筆穩定，毫不鬆懈，手勢雖然不倉促，卻不顯優雅；可是他並不介意我們駐足旁觀，看著他將寬幅筆頭往黑色墨水裡蘸一下，孜孜不倦地寫下去。他的臉上標誌著過去遭受過的壓制脅迫；可是，他現在心平氣和了，蹲在他摩登安全的小房間裡，安分地抄抄寫寫。

主任拿出幾張照片讓我們端詳，那是兩年前在科姆舉辦的穆斯林大學首長會議。再一次，雖然我不該再感到意外或是驚訝了，卻還是感到驚奇不已：這些照片再度驗證這樣一個次世界的存在；或者說，平行於西方社會之外的世界，隱藏在伊斯蘭面具之下這樣一個中世紀學者的世界，仍然完整無缺地保存

4 彼德·阿伯拉德 (Peter Abelard)：十二世紀有名的法國哲學家，一〇七九～一一四二，也是穆斯林哲學方法的創始人。

5 索斯柏立的約翰 (John of Salisbury)：英國哲學家與人道主義者，一一一五年出生於索斯柏立，卒於一一八〇年，曾經遠赴巴黎求學，師事法國哲學家彼德·阿拉伯德，日後擔任法國夏特地區主教及教。他是十二世紀文藝復興時期文學界獨領風騷的人物，為後世尊為當代代表性學者與拉丁文大家。

在二十世紀末葉。主任還說，開羅的愛資哈爾大學校長參觀過科姆的神學院之後，印象深刻，感動之餘公開宣布，科姆的學生素質如此優異，如果要轉學愛資哈爾，可以直接平轉，無須任何降級補修措施。

我們拾階而下。樓梯牆邊堆著一落落該中心近期發行的出版物——不只是《和平訊息》而已，還有兩種平裝本新書，都是用波斯文寫成的。其中一本主旨在於記述先知的女兒法蒂瑪（Fatima）的生平，日後她嫁給先知的堂弟阿里，即什葉派信徒的英雄；這本書標題即為《伊斯蘭的女性》。另外一本新書，或者說小冊子還比較恰當，深褐色的封面；主任說，這本書的作者是個在英國待了一年的伊朗人寫的，書中記載他在英國過的一年，一年間他顯然深受刺激，書名就叫做《西方有病》。

與阿亞圖拉的對話

施拉吉的寓所位在科姆城的另一端，退居在一條泥土巷道裡面，巷弄兩邊牆壁上空盪盪的。巷弄地面從兩邊逐漸下降，中央形成一條溝槽，可是溝中沒有積水，只有堆積著厚厚的一層灰塵而已。

我們敲敲牆間一堵緊掩深鎖的門；巷道裡的孩童嘲笑著那兩個巴基斯坦學生，恐嚇著他們說，要是他們一進去，施拉吉一定會大動肝火，給他們好看的。這好像已經成為一種傳統的戲謔型式，經過特准的嘲弄，無礙信仰，一點也不會對伊斯蘭教不敬；穿著學生道袍的神學生，就像歐洲中世紀時期的「教堂執事」一樣，是公開現成的笑柄。話雖如此，此刻對那兩個巴基斯坦學生還是挺難堪的，他們一面發出噓聲，趕開那幾個無聊小童，還要力持尊嚴，不能對貝札德與我失禮，另外還要屏氣凝神，面對接下來更莊重的會面。

門開了。我們走進一處玄關，脫鞋，步上鋪著地毯的階梯，通往一條迴廊，迴廊圍繞一個四周築壇的庭園，庭園地面上鋪磚，還種了幾株榕樹。庭園整個籠罩在白色涼篷下，濾過陽光，柔化色彩，就這一樣，驟然間，圍牆外的灰塵與熱氣，仲夏季節的沙漠酷暑，進了這道門後，氣候頓時轉換得溫潤宜人。我想駐足片刻，好好端詳那幾棵榕樹。可是，轉瞬間驚駭取代了好奇：鋪了地毯的迴廊上就在幾呎前方，一個打著赤腳的男人，肩上掛著一柄以色列製的手提式輕機槍，此人即施拉吉的保鏢。他待在迴廊上巡邏。我們轉進右側一間同樣鋪著地毯的房間，房裡空無長物，我們安安靜靜地坐在一架電扇旁邊等候名師。巴基斯坦學生面露微笑，既期待，又歡欣鼓舞的。

「他要來了，」貝札德低聲對我說道，「站起來。」

我們一致起立。儀式有助於營造出場的氣氛，而施拉吉出場的架勢令人印象深刻，一派皇家氣息。他高頭大馬，滿臉橫肉，頰下一落美髯，與唇上短鬚，修剪之精到，讓人猜不出他的年齡。他穿著淡黃褐色的長服，頂上縫著兩顆釦子；而他的黑色斗篷則用最最精薄的棉布剪裁製成。

那兩個學生似乎非常傾慕這位大師，忙不迭地趕上前去跟他躬身敬禮，捲起了一股黑色袍服與頭巾的波動。而他，讓他們親吻他的手，似乎在賜與他們禮拜結束後的祝禱一樣。接著，我們重新坐定。他什麼也沒說，臉上只是微微笑著。學生也不敢貿然開口。

我說：「非常感謝您撥冗接見。您這兩位高徒說，您的學問涵養都十分高深廣博。」

貝札德將我的話翻譯給施拉吉。施拉吉開口緩緩地回應，他講話很慢，如音樂般悅耳，語調之抑揚頓挫，聽在我耳中十分新奇。他說了好長的一段話，貝札德卻翻譯得很簡略。

「多謝他們把我講得這麼好；也多謝你講得這麼客氣。」

施拉吉又多說了些話。

貝札德翻譯道：「教育一定要盡早開始。孩子再小，也不嫌過早。我希望孩子能在襁褓期間就送到學校受教育。每個人的腦袋裡都有一部錄音機。希特勒就有這種觀念了。」接著，貝札德自己又補充了一句：「他想知道，你是信什麼教的。」

「我該怎麼講呢？」

「你一定得跟我講你究竟信什麼教。」

我說：「我還在尋覓當中。」

施拉吉神情平和，一雙大眼睛帶著笑意，上下打量著我，再度開口，說起話來又慢又長。他咬字清晰，發音優雅，語音的旋律感十足。他那張雙唇飽滿的嘴巴，張得老開，展現潔白無瑕的牙齒。

貝札德說：「他想知道，在你開始尋覓之前，你是信什麼教的。你出生的時候，家裡一定有著某種信仰。」

這下，讓我擔心緊張的就是這兩位巴基斯坦學生了。之前我們跟他們說，我是從美國來的，卻不是美國人——這麼講不盡然違逆實情，主要是為了簡單交代。假如現在讓他們知道，其實我祖上來自印度，我心想，恐怕會越描越黑，徒增困擾；再說，印度——巴基斯坦次大陸上，印度教徒與穆斯林之間彼此對立，歷史宿仇之深，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化解的。如果據實相告，他們一定會覺得遭我愚弄；而他們對我一直這麼開放，如此禮遇，還安排我跟他們偉大的導師見面，即使到現在，兩人的目光還是牢牢地注視著施拉吉，眼神中洋溢著如此幸福，而非順服，更不是畏懼。

我向貝札德說：「你可不可以跟他說，我從來就沒有任何信仰？跟他說，我是在離印度很遠的地方長大的，是在美洲長大的，從小就沒人灌輸我任何宗教。」

「你可不能跟他這麼講。就說你是基督徒好了。」

「就這麼跟他說吧。」

而當貝札德一開始回他話，當下我就後悔自己為什麼要讓我替他扯謊了。我這番含糊其辭，壓根兒不過施拉吉；他感覺的出來，其中有所差池。我也下定決心，在接下來的伊斯蘭之旅中，再也不要因為緊張或是為了跟對方簡單交代而弄巧成拙，把事情搞得益加複雜來搬磚砸腳，導致對方也對我虛以委

蛇。如果撇開緊張情勢不談，事後回想，當初如果據實相告，結果說不定更有趣——更有助於我了解伊斯蘭教教義——看看施拉吉將如何回應一個毫無信仰的人，或是施拉吉將如何開釋像我這樣一個出自「偶像崇拜——神秘主義——靈魂學說」成長背景的人。

施拉吉又以他特殊的、富於旋律的方式開口說話。根據貝札德稍後跟我說，那就是毛拉講話的方式，他的口音跟腔調都比較偏阿拉伯，而不像是波斯人。他把「伊斯蘭」說得像「伊斯——郎」；而「阿拉」在他嘴裡變成一個三音節字眼，必須張嘴發音，語音渾圓的「喔——羅——阿」。

他問道：「你是哪一種基督徒呢？」

我思忖著：「新教徒。」

「那麼，你就跟真理比較接近了。」

「怎麼說呢？」

「天主教徒比較不知變通，不通人情。」

他其實不是這個意思。他只是將什葉派與其他穆斯林的分歧，牽強附會在基督教徒的派系分立之上。什葉派信徒不顧其他穆斯林的異議，自行創建一條繼任先知的順位排序，這一派信徒總是將自己看做四面楚歌、遭到其他教派圍剿的少數弱勢。

接下來的對話，正如我先前所疑慮的一般難以接續。我問道，他的研究項目當中不包括歷史，伊斯蘭文明的歷史呢？他誤會了，他以為我問了個有關穆斯林神學的問題；而他說，他當然深諳伊斯蘭的歷史：先知首度將天啟訊息傳達給村子裡的鄉親分享時，那些人不信他這一套，他只好搬到另外一個村落去。而且，屢試不爽的是——不管我如何誘導，要請他談談穆斯林國家在科學發展上的需要，或是企圖請他講講，他對何梅尼革命之後的伊朗有何觀感——我們總會滑進他的神學講演之中，聽他侃侃高談，混淆問題的重點。只要擁抱正信，科學自然就會昌盛；先知也說過，人民應當行萬里路，讀萬卷

書。只要正信抬頭，自由（這裡專指成為伊斯蘭教徒與什葉派信徒的自由，以及臣服於神聖統治的自由）就會水到渠成；同時，凡事萬物都會跟著自由接踵而來（這一項自由理念就跟他第一個自由理念相互衝突了）。

接著，兩造沉默以對了好一陣子。

我說：「你看起來神閒氣定的。」

他說：「多謝你美言。」他並沒有回敬我的奉承。

我想要抽身走人了。

我對貝札德說：「請你跟他說，我覺得自己占用他太多時間了。」

施拉吉臉上一貫的笑容不變，答道，「我一直到今天封齋結束前都有空。」

當時不過晚上七點半。我說：「請你問他，他什麼時候才會開齋？」

貝札德說：「我不能問他這種事啊。你忘了。我也是穆斯林啊，我應該要知道他什麼時候才能開齋的。」

有人正好推門進來，是個信仰虔誠的土庫曼人，頭上裹著白色頭巾，這人經過齋月隱居而面色蒼白，卻不像先前我們看到紮營在墓碑庭園裡的那一家土庫曼人，身形瘦弱，臉龐被太陽烤得焦乾。這個土庫曼人身邊還跟著一個同樣蒼白的小女孩。施拉吉親切熱絡的迎接他們。我們覷個便，再度起身，就此告別。兩個學生再次匍匐跪倒在施拉吉面前，親吻他的手背。施拉吉微笑著。我們這批觀眾晉見完畢之後，那小女孩又趕緊衝過來，親吻他的手。

罩在庭園與榕樹上的遮蔭篷已經收了起來。此時天光金澄，身影輪廓不再像剛來的時候那般分明清晰了。我們的鞋子整齊排列在階梯最下方等候著我們；玄關外的一個小房間裡，打著赤腳、肩上扛著手提式輕機槍的保鏢，現在正彎下腰去跟另外一個小孩玩遊戲。

走到圍牆外的塵土巷子裡，巷子裡的塵土彷彿與黃昏天光融為一色，那兩個巴基斯坦學生興高采烈地轉身看著我，其中一人說：「你覺得他怎麼樣？」

他們覺得這次會面非常順利。他們還邀請貝札德與我跟他們共進晚餐，一同開齋，我們也可以嚐嚐學生平時吃的清淡餐點。可是這樣的邀請（從學生描述的餐點如何清淡可知）只是口惠，只是一種示好的姿勢，一種他們跟我們分手的方式而已，目送我們鑽進計程車裡，再回頭繼續他們被我們打斷的齋日下午的例行作息。

巷弄與街道盡頭，舉目所見，盡是些熙熙攘攘、裹著黑袍的人影，好似一幅古老的牛津街景版畫。可是這裡的道袍裝束可不是借來的，這些行頭歸屬於這裡，仍舊有其意義；伊斯蘭稱霸的中世紀時期仍然在這裡延續存活，還有當年令黑暗時期的歐洲人目眩神迷的伊斯蘭高等教育組織，在這裡也仍舊欣欣向榮。

然而，此地街頭比起古老的牛津，還要多上一層意義。這個沙漠城鎮——空白的圍牆環繞著四周築著花壇的庭園，行道樹成行栽植在筆直的人行道上，還有栽植茂密、封閉在周遭車水馬龍之外、自成一景的花園，正巧就是我在世界另外一端的中南美洲所見到的城鎮模式，打從墨西哥東南方的猶加敦，一直南下到阿根廷的彭巴草原，這樣的城鎮屢見不鮮。這種建城模式一定是經由西班牙人向外傳播的：阿拉伯人征服波斯後，才不過八十年，就在西元七一〇年與七二〇年間拿下了西班牙，併入中世紀偉大的穆斯林世界版圖之中，加入當時稱霸全球的偉大文化。而西班牙人在遠征美洲前，就已經開始排斥穆斯林世界了，並且從如此極力摒斥之中，產生無窮的活力與其反伊斯蘭之宗教狂熱。可是在伊朗這裡，五百年以降，當年中世紀的穆斯林世界仍然殘留在這裡，對於自家舊日輝煌歷史梗概，只有模糊約略的印象，而自己國家曾經對人類歷史有何貢獻卻一無所知（正如《和平訊息》雜誌中，那篇探討伊斯蘭都市規畫的文章所顯示的）；他們同樣也不知道，伊朗竟然間接地影響了遠處某一塊大陸的命運。

我們分手的時候，巴基斯坦學生還指點了我們的盧爾司機如何前往何梅尼的絞刑法官阿亞圖拉哈爾里的官邸。就在我們驅車前行之時，貝札德說：「你知道為什麼我不能告訴施拉吉，你在成長過程中沒有任何宗教背景嗎？當時他就是想要套你的話，看你究竟是不是共產黨員。要是我對他說你沒有任何宗教信仰的話，他就會以為你是共產黨員，這樣對你會非常不利。」

遭阿亞圖拉戲弄

哈爾哈里的官邸坐落在一條死胡同巷子底，門前道路顯然剛剛建成不久，行道樹還是青嫩幼樹。時間接近日落，沙漠黃昏五光十色的。官邸前方有人持槍巡邏，我們把車停在兩棟房子的遠處。貝札德先過去跟某人交談通報，再揮手叫我過去。哈爾哈里的房子新穎，水泥建材，占地不大，房子並沒有緊挨著人行道，屋前還有一小塊經過鋪面整理的空地。

我們在一處陽台，或是迴廊上，先讓一個個子不高卻虎背熊腰的年輕男人搜身。男人身穿藍色的緊身運動衫，雙手沿著我們的褲管搜尋而下，或者只是粗暴地拍擊我們的雙腿；接著，我們進入一間鋪有地毯的小房間。房裡坐著約莫六到八個人，其中還有一對非洲夫婦，兩人盤腿靜坐在地毯上，上身挺得直直的。那個先生穿著暗灰色西裝外套，不容易猜出他是哪裡人，可是從他太太的穿著，我判斷他們應當是索馬利亞人，來自非洲西北一隅的民族。

我原先沒料到會有這樣一群人，以及這樣一所小型法庭。本來我還巴望著能跟哈爾哈里，這個顯然已經大權旁落、可能還備感冷落的人，進行一段比較私密的對話。

絞刑法官，代表恐怖革命的形象，不分男女老幼，一律以伊斯蘭教法典發落。可是，這個留著鬍子的小個頭男人，身高大約五呎，身前先走著一個畢恭畢敬的請願者，此刻，這人正從裡面一間內室走了出來——就是那個處決無數的法官本人——肥胖而快活，眼鏡後面兩隻眼睛愉悅地骨碌亂轉。他走動的步伐僵硬而缺乏彈性。他皮膚光潔，頭上戴著一頂無邊便帽，不裹頭巾，身上也沒套著教士道袍或斗篷；而且，他看起來有點不修邊幅，上身一件下擺特長的棕色條紋外衣或襯衫，皺得一塌糊塗，外衣底下搭著一兩件棉質上衣，外衣下擺還垂在白色的寬鬆長褲上。

如此邋遢的衣著習慣——表現在這樣一個矮胖男人身上，假使他也能生得跟施拉吉一般高頭大馬，或許他也會仿效他展現高階教士的架勢——說不定這是哈爾哈里刻意營造，或是故意引人稱讚的個人風格；他一出現，整屋子的伊朗人就開始面露微笑。那個非洲人雙眼閃著光，敬畏有加地凝視著他，而哈爾哈里對他也特別禮遇，特意地跟他問好、歡迎。在對非洲人溫柔相待之後，哈爾哈里對貝札德與我可就凶了。他的態度如此遽變，顯然是刻意為之，分明就在作戲，正如一個小丑展現他要賣之外的另一面。如此矯情並不讓我困擾，他的行徑反而可以讓我確定，我光是坐在這個房間裡，代表著另外一個遠道而來的陌生人，就已經讓他的身價抬高了。

他說：「我忙得很，哪來的時間接受訪問？你們要來之前，怎麼不先撥個電話呢？」

貝札德說：「我們打了兩通電話。」

哈爾哈里沒搭腔。他又帶著另外一個請願者跟他一同進入內室。

貝札德說：「他這下就要決定了。」

可是我知道，他早就拿定主意了，他抗拒不了有人遠道而來採訪他的誘惑。當他再度從小房間裡走出來引領下一個請願者進去之前，他又說了，語氣同樣的粗魯懷疑，「先寫出你的問題來。」

這又是他為了抬高姿態、擺架子的招數，可是這下可難倒我了。我一直想請他談談他的生平，我想要進入他的內心世界，從他的出發點來探知，在他眼中這個世界究竟是什麼樣貌。不過，我心裡盤算的是一段對話；在他開口說話之前，我也不知道自己想問他些什麼問題。然而，他的要求，我還是得照

辦：一屋子的伊朗人跟那對非洲夫妻都等著看我遵照他的指示行事。我該怎麼辦才能讓這個絞刑法官除了打官腔之外，再稍稍顯露一些人性呢？我又該如何讓這個一半是小丑的中世紀學究，闡明自己的狂熱呢？

一時刻，我也想不出什麼石破天驚的問題；我決定乾脆開門見山吧。於是，我掏出一直帶在身上的旅館便條紙，撕下一張，在上面寫道：「你是哪裡出生的？什麼因素讓你決定要投入宗教研究呢？你的父親生前擔任什麼工作？你在哪裡就學？你第一次佈道是在哪裡？你是如何成爲一位阿亞圖拉的？你最快樂的一天是哪一天？」

好半晌過後，當他終於再度從內室走出，看過貝札德手上的問題清單之後，這些問題似乎讓他還滿開心的，接著他盤著腿一屁股落坐在我們前面。我們三人幾乎就要名符其實地「促膝而談」了。剛開始，他要言不煩地回答問題——他出生於亞塞拜然。他的父親是一個信仰非常虔誠的人。他的父親生前務農。

我問道：「你曾經幫忙令尊分攤農事嗎？」

「我小時候就要幫忙看羊。」接著他開始耍寶了。他故作姿態地提高音量，說道：「而今，我也知道該怎樣給羊砍頭。」房間裡所有的伊朗人，包括幾位他的保鏢，哄堂大笑，各個前仰後翻的。「我什麼事都要做呀。還要把東西拿出去賣呢。我什麼都知道。」

可是那放羊的孩子又是怎麼變成一位毛拉的呢？

「我學了三十五年的伊斯蘭啊。」

就這樣一語帶過。他無意再多加著墨，不打算多說些自己奮鬥與崛起的往事。他不過就是這麼走了過來的；過去的經歷，可不是什麼他願意回頭省思的當年勇。儘管他浮誇虛矯（「我非常聰明，非常有智慧」），關於過去，他並不感興趣。他比較樂於吹噓他現在掌握的權力，或是自己跟層峰如何親暱。

此時，他將紙上的問題撇在一旁，就這樣自說自話起來了。

他說：「你知道嗎，我當年就是阿亞圖拉何梅尼的入門弟子，後來我又成爲何梅尼兒子的老師。」他握起拳頭在我肩膀上捶了一計，接著又裝出頑皮的語氣，逗著在座諸位伊朗人開心，他說：「所以囉，我可沒法子說，我跟阿亞圖拉何梅尼『非常』親近。」

他嘴巴大張，就這樣保持開咧著雙唇，接著迅速爆出狂笑，好像笑得喘不過氣來一樣，讓我清晰地看見他的牙床、他的舌頭、他的咽喉。他好不容易止住爆笑，回復平靜之後，又搖著他的右手，快速地在來回揮舞著，他說：「整個國家就要由毛拉來治理了。我們的伊斯蘭教共和國眼前有著一萬年的好光景。馬克思主義者可以繼續遵行列寧路線。我們只要跟著何梅尼的指示走。」

他停嘴無言片刻，雙眼緊盯著我，重新盤腿坐正，神態逐漸莊重起來，透過鏡片抬眼看著我。接著他打破自己營造的沉默，又說道：「你知道吧，哈維達是我殺的。」

原來，他繃起臉來，不苟言笑，也是為了取悅整個屋子裡的伊朗人。而那些伊朗人蹲在地毯上，通通笑得東倒西歪，不可開交。

那是最貼近他的舊聞了，他擔任革命法官的作爲。他曾經在多次接受訪問時，詳細敘述他如何判決伊朗國王的總理死刑的故事；現在，他還想再跟我們重溫這段輝煌往事。

我說：「你親手殺了他的嗎？」

貝札德說：「不，他只是下令行刑而已。真正動手殺哈維達的是另外一位知名的阿亞圖拉的兒子。」哈爾哈里說：「可是，斃了他的那把槍在我這裡。」彷彿那是僅次於親手槍斃哈維達的第二等好事。

伊朗人又各個笑倒在地毯上，滿地打滾。連那個目光閃閃、眼神從未稍離哈爾哈里的非洲人都忍俊不住，開始微笑。

貝札德說：「某個革命衛隊的人把槍給了他。」

我說：「你現在手邊還有這把槍嗎？」

哈爾哈里說：「槍就收在我隔壁房間裡。」

原來，自始至終，一屋子伊朗人的哄堂笑聲當中，他一直拿我當他尋開心的對象，做他的傻子。

已經到開齋的時候，不能再蹉跎時光了，所有的訪客一一離開，只留下那對非洲夫婦。幾個年輕人上菜到陽台地毯上，擺置餐具吃食。哈爾哈里打發我們離開之後，彷彿就忘了我們的存在。甚至在我們穿上皮鞋、步向大門之前，他就跟那對非洲夫妻並肩坐下用餐了。晚餐頗為盛大；這個小丑吃東西倒是一點也不馬虎。

而我們的盧爾司機終於可以開飯了，貝札德也會跟他重演分享飲食的聖餐時刻。我們開車回到科姆城中區墓碑附近一帶，他們就在下午稍早我們進去歇腳的餐館裡用餐，餐室裡瀰漫著燒烤羊肉的氣味。

他們點了米飯，就著羊肉以及扁平的波斯麵包吃將起來。餐館也只能供應這幾樣餐點。我撇開他們兩人，自己離開餐館，跟附近的小攤子買些堅果和曬乾的水果。我沿著河岸漫步，穿過在岸邊紮營的朝聖人家，坐在暮色四合的河岸堤防上，吃著自己的晚餐。堤防對面路邊的水果攤上，燈泡發光照耀著西瓜及其他水果。經過白天烈日曝曬，一景一物率皆失去色彩的景色相比，這一幕夜景真是新鮮清爽。

當我再回過頭，散步走回對岸河邊的餐館時，路過一家燈火通明的鞋店，店裡陳列著一幀大型的何梅尼彩色玉照。我再次駐足，專心端詳他那張無法預料的長相：皺摺深陷的前額、那對眉毛、凌厲的眼神與厚實而富於肉感的嘴唇。我湊著店家輝煌的燈光，兩眼細看手裡捧著即將送入嘴裡的堅果與其土耳其葡萄乾，這下我才猛然發現，果子裡竟然暗藏一根圖釘。要不是我在何梅尼的畫像前面稍事停留，這回，我的嘴巴恐怕就會被暗釘戳傷了。其情其狀，我寧可掠過，不予揣測。同時，我這個不信教的頑劣分子，前往何梅尼的聖城科姆遊歷的一天，就將結束在這一遭惡質而有驚無險的意外上。

回轉德黑蘭的高速公路上車流繁忙。天上一輪孤月，可惜，車輛與巴士的燈光抹煞了景致。間或可見沙漠和月光及丘陵的輪廓。貝札德累了，打盹小睡，醒過來時，他請司機扭開車上的收音機，好讓他收聽新聞。

對貝札德而言，新聞播送了一連串的壞消息。伊朗的左派報紙《阿言迪更》(Ayandegan)——貝札德每日必讀，也向我提起過的報紙——日前經德黑蘭市的伊斯蘭檢察官下令關閉查封。檢方指控這家報紙張揚渲染「伊朗的革命穆斯林之間，瓦解向心力的意識型態與信仰」，企圖於「伊朗國內各個不同的穆斯林團體之間，製造異端」——此處所謂「團體」，指的是伊朗的少數民族與什葉派信徒。該報還捏造發行份數，並於國內某些地區發行刊張不完整的報紙，以利節約新聞用紙，「俾便散播圖謀分化國家之不實資訊」。該報社一切資產悉數轉移至「扶貧基金會」，革命衛隊已經進駐其編輯辦公室。

不管施拉吉與哈爾哈里如何夫子自道，貝札德還是將這場革命當作是他自己的革命，從一種群眾運動中，探看出另外一種群眾運動的可能，甚至開啟下一次運動。而今，革命已然逆轉，情勢對他相當不利。可是搞革命就要有耐心，而貝札德也從他同樣熱中革命的父親身上體會到耐心之重要。這份左派報紙遭到查封，造成的損失不可低估——倘若這份報紙是為了我的革命而發聲的話，這陣打擊可以粉碎我所有的意志——可是，貝札德只是將他的失望埋藏在內心深處。

他聽完新聞後，不再閉目養神。月落大漠，我們的車子在行進之間，他偶爾心不在焉地出神思索。我們再度經過右側的白淨鹽湖，來時路上他說過，伊朗國王的秘密警察曾經用直升機將屍體空投到湖裡；左側的公墓埋葬了許多革命烈士，假如我們可以趕在太陽下山前回來，應該要下車參拜一番的；接著，右邊就是德黑蘭煉油廠，高聳的煙囪吐出跳躍的火焰——伊朗連睡夢中都在賺錢。

我們回到旅館時，已經將近子夜。車子一直開到旅館門口，那個盧爾司機才猛然跟我們攤牌，一五一十地算計此行應當額外支付的車資——他一定在心裡盤算斟酌了好幾個小時。他不但按照里程與時數

跟我們計費，深夜遲歸的額外時數也要加成計算，結果，總合起來的費用還高過先前我們拒絕的旅館計程車司機開價。不過，這一整天的行程也比他原先預期的要漫長難耐，他飢腸轆轆，卻不得中餐果腹。來回路上，我一直盯著他略呈方形的小後腦勺，端詳了許久，越看就越讓我心生溫情；而當他終於捱到放飯的一刻，他對於羊肉和米飯之熱愛，如此真摯，感人至深；他轉過頭來，頂著一張峻瘦而面有難色的臉跟我計算額外車資時，又是這麼令人心動。浸浴在車廂裡陰暗的燈光下，他完全體現了貝札德理想中溫和又良善的勞動同志形象，於是我二話不說就如數照付了。

四 麥什德開出的夜車

貝札德的老家是一處鄉間小鎮，那是座波斯著名的古老城鎮。他的父親是位波斯文學教師，至於他的母親，貝札德倒是從未多加著墨——他提到她的時候，不過就說她是他媽而已——而我揣想她的出身背景應該更為乏善可陳。他在一所美國學校念了幾年書，英語講得很好，聽不出特殊的腔調或口音。貝札德今年二十四歲，在德黑蘭一所研究學院攻讀科學學位。他的態度隨和而有教養，還帶著某種波斯人特有的優雅。他的身材如玉樹臨風，體格結實而靈活。他熱中滑雪與登山健行，同時他的泳技也不可輕視。

如果我們將他的鄉下背景先撇在一旁，光是過去在美國學校求學的經驗，現在又是首都一所科學學院的學生，以及他所熱愛的各項運動嗜好等等，我們可以說，雖然貝札德出生到現在幾乎一直活在伊朗國王統治之下，他的世界已經為他敞開了一扇大門，讓他眼界大開，賦予他的視野，則是他的祖父母那一輩終生無緣一窺的。

可是那只是我的看法。我的年紀是貝札德的兩倍，我出生在靜止乏味的殖民時期，人生的前十八年都繭居在千里達島上。當年在千里達，經過統計，只有八十種工作可資選擇，令我深深體會到農業殖民地上，民生之貧困與精神上的種種限制。因此，我只要踏上像是伊朗這樣的地方，總是可以隻眼獨具地

體察到社會的轉變。貝札德可就不敢苟同了。他出生於一九五五年的伊朗，他將國家的財富視為理所當然，他將他的社會之擴張視為理所當然；他只得到伊朗社會上仍然殘存的不公不義。

我將他視為出人頭地的一代，甚至可以說是幸運的一群。他卻執拗地認定自己貧無立錐，同時為了佐證，還特別強調他連一件外套也沒有，天氣一冷，就只能穿著套頭毛衣過冬。貝札德關於貧窮的概念來自他的父親。這位波斯文學教師曾經加入共產黨，在伊朗國王執政期間還因此入獄服刑一陣時日。而他對於貧窮的觀點，截然不同於我在二十五年前住在千里達時的體驗。

當他還是個小朋友的時候——當時應該是六〇年代中期——有一天，貝札德問他的父親：「我們家為什麼沒有車子呢？我們家為什麼沒有電冰箱呢？」他的父親就趁這個時候機會教育，向他說明貧窮與社會缺乏公義的現狀，而且還趁機灌輸他革命的概念。「革命」在貝札德家裡取代了宗教，成為一個鼓舞人心的意念。然而，就像宗教一樣，小貝札德還因為孝順而更加強化了他對於革命的狂熱。此外，貝札德堅持自己的信念，就像科姆的毛拉堅持正信一般嚴苛。他看待與評論其他人民與國家時，端賴對革命根性如何。除了他情有獨鍾的波斯文學之外，他只閱讀革命作家，或是他一心認定為革命派作家的作品，例如，蕭洛霍夫、史坦貝克、傑克·倫敦等等，而我也無法確知，他究竟能不能分辨這些作家不同的創作年代。

兩種革命

科姆之行過後兩天，我們一同走在德黑蘭中區時，貝札德告訴我，西方世界裡，根本就沒有真正的自由。工人都備受壓抑，剝削勞動以換取微薄的生活所需。全世界真正的自由只有出現在蘇聯，從一九一七年以降，一直到一九五三年間。

我說：「可是這段期間，人民受苦受難，多少人坐牢或是遇害。」

他聞言即刻翻臉反駁道：「哪一『類』的人？」

他沒有宗教信仰。可是，由於他成長在伊朗國王統治下，在他心裡，替純真與苦難百姓伸張正義的觀念與懲罰奸邪是一體兩面，絕對不可分割的。他夢想中的史達林統治，不過是其他人夢想中奉行阿里——先知的唯一真正繼位人——正道的翻版而已。

我說：「你的朋友裡頭，現在有沒有人改變立場，覺得自己應該回頭當穆斯林呢？」

「是有那麼幾個。可是，他們也不曉得自己究竟是什麼人。」

他帶著我參觀這座革命城市。就在這條行道樹遍植的林蔭商店街上，伊朗國王的部隊就在那棟燒得焦黑的大樓裡，就射擊定位（大樓燻黑了的窗口，對照處處煙灰污漬的街道，乍看還不太注意得到），部隊對著示威群眾開火。而就在這裡，有個人就死在這個門口。喪命六個月後，他的血跡只能隱約可見，不過是骯髒的混凝土地板上，幾塊乾涸發黑的斑點罷了。血跡周圍兩處，有人拿毛筆，蘸著揮發性的墨水，寫著私人筆記大小字體的波斯文字：「此乃烈士之血」。「烈士」是個不折不扣的宗教性頭銜，可是，貝札德還是可以讀出這種字眼的政治意味。

原先的伊朗國王大道，現在已經更名為革命大道，整塊圍著鐵欄杆的德黑蘭大學校區對面，幾家出版公司（龍蛇雜處地混雜著幾間花柳店家），人行道上許多小販擺著書報攤、卡式錄音帶攤子跟版畫攤子做生意。卡帶多為何梅尼和其他幾個阿亞圖拉的演講錄音帶；而且，儘管何梅尼下令禁止音樂創作與演出，攤子上還是展售著流行的波斯與印度歌曲。有些書商賣些波斯文寫成的書籍，闡述這次革命始末、其理論家與殉教烈士事蹟等等。有些書攤則穩穩地疊著成堆的共產主義文學作品、波斯文的平裝本，還有遠從蘇聯進口的精裝本英文列寧與馬克思著作。這一場革命看來已經注入另外一種革命了。

攤子上賣有革命紀實的寫真紀錄。寫真集裡在在強調死亡、流血與復仇。相簿裡收錄著伊朗國王當

政期間遭到屠戮的無辜人民死狀；還有暴動期間的照片：街頭的流血事件、停屍間的屍體、染血書寫的標語塗鴉在白色磁磚上；最後是革命成功之後，待決人犯的檔案照片，以及行刑後確定斷氣的紀錄照片，一頁接著一頁，屍體連著屍體。其中有一具屍體，正是伊朗國王的前任總理哈維達；某個夜深時分，哈爾哈里匆匆下令即刻行刑，哈維達連挨了行刑隊的兩顆子彈，一顆射中頸部，一顆正中腦門。相片中，他年邁多皺的脖子上，還可以清晰看出第一顆子彈的黑色彈孔。

這些相簿都是這次革命的紀念冊，出版公司競相印刷出版以爭奪市場。然而，伊朗人多愁善感的另外一面，也可以在這條人行道上看到，體現在版畫小販的存貨中：夢想中，水草豐美、湖畔垂柳的國度；孩童與美女栩栩如生的畫像，臉頰上滴落著大顆大顆、不可思議的淚珠。貝札德摯愛這些淚珠。

德黑蘭大學校區裡的建築，是當年伊朗國王的祖父出資興建的，校舍樓面都被標語塗鴉得面目全非。大學可是德黑蘭市人文最為薈萃、知識分子相約聚會最盛之處，而且，即使是一個像今天一樣的日子裡，平常無波，沒有任何預定活動，大學裡還是擠滿了討論團體。貝札德說：「這裡整天都是這個樣子。」他們究竟整天都在討論些什麼？他說：「還不都一樣。伊斯蘭教、共產主義和革命。」校園看來平靜無事；我也很難將這些穿著牛仔褲和花稍襯衫的年輕男人，與馬路對面陳售的書本和寫真集裡頌揚的嗜血畫面聯想在一起。

可是，街頭氣氛還是充斥著暴力陰影，而我們剛剛步出校區大門，就目睹了一樁暴力事件。一個穿著白襯衫的矮個頭學生，臉上架著眼鏡，笨手笨腳，拙劣地將一張張傳單貼在校區大門的鐵欄杆上面。傳單內容主要在抗議政府下令關閉左派報紙《阿言迪更》報。人行道一端一處小吃攤子上，有個工人慢條斯理地踱步過來，舉筆在傳單上畫了幅榔頭與鐮刀的蘇俄國旗，再在整張紙上畫個大型的X，接著，他當著滿街圍觀的群眾面前，摔了那個學生兩記巴掌，然後他又不慌不忙地重新貼牢那張面目全非的傳單，猛力釘死在欄杆上。

那個學生急忙矮身閃避，護著他的眼鏡和眼睛，躲到一邊去。圍觀眾人之中，沒有人出手相助。甚至連貝札德都袖手旁觀，他只是連聲說道：「你看到了吧？你看到了吧？」彷彿要我替那個學生主持公道一樣。

這兩種革命似乎匯流合一，何梅尼的革命，以及貝札德眼中真正屬於人民的革命。可是兩者之間迥然有別。上個週末，貝札德跟幾個討論團體裡的朋友一塊兒下鄉，進行一些「建設性」的工作。結果，他們碰上一群革命衛隊，惹了些麻煩，吃了點苦頭。現在，每個村落都有地方專屬的科米塔，由荷槍實彈的年輕人組成，在伊朗許多地方，他們就代表法律。革命衛隊、穆斯林都不准共產黨員滲入他們的村落。

這些好戰穆斯林究竟是什麼人？貝札德說：「他們都是些『流氓無產階級』。你知道這個專有名詞吧？」村落裡的革命衛隊，就跟剛剛賞了那個學生兩巴掌的工人一樣，都是「流氓無產階級」。這個教條字眼對貝札德助益良多，讓他重拾自己對人民的信心。

大學裡的團體禮拜

第二天早上，大學校園就是一副截然不同的景象了。第二天是星期五，適逢伊斯蘭教的安息日，而這已經是連續第三個星期五，校方將在大學操場上舉辦大規模團體禮拜。

貝札德和我從旅館出發，走到革命大道的時候，好像半個德黑蘭市的居民都跟我們走在同一條街上。這些人不是搭乘卡車或是巴士載過來的；他們可是一步步走到這裡的。大學校區外圍群眾熙熙攘攘的；車輛小心翼翼地牛步前進；步行群眾中還分散出幾個小型團體，一邊走，還一邊窮嚷著，口號聲混雜在一陣低沉的喧鬧聲中，只能隱隱約約地聽見。

我們經過人行道上的書報攤和賣版畫的攤子，走到街角盡頭時右轉，再度沿著大學校區的欄杆走。這條上坡街道，銜接德黑蘭北區，寬闊的側街上，懸鈴木沿著狹窄的小水道栽植，亭亭有致，水道裡流水湍急。大學校區欄杆外，留著一把鬍子的書籍小販，一手一本小冊子，高聲叫賣著：「來買反共、反帝的好書啊！」

貝札德憐憫地說道：「跟他們講起來，反共和反帝還不都一樣。」

我們走過那個男人，繼續沿著大學欄杆前行。這時候，貝札德一把將我拉了回來，他說：「我們現在一定要遵守伊斯蘭教律。路的這一邊是給女人走的。」

我們於是穿過馬路，順著流水湍急的小水道，走了一個小時左右的上坡路，然後就在專供男性行走的（至少我們是這麼想的）特定人行道上，貝札德跟我站在一株懸鈴木狹小而疏鬆的樹蔭下，我們兩人眼睜睜地盯著革命大道上湧出大群民眾，女人裹著黑色面紗，一身黑色長服，走在一邊街道上，男人在另一邊。一個個熾熱、狂喜的男人蹲在水道旁邊，汲水進行儀式性的盥洗，再匆匆忙忙地提步疾行，趕上隊伍；水道旁彷彿正在上演一場宗教狂熱比賽，或是人們競相展現他們對於宗教的赤誠投入。只要貝札德跟我停頓交談，耳邊馬上可以聽到急促的腳步聲音，步行群眾閒談的語音，偶爾還夾雜著嬰孩的嚎啕聲。大學操場上揚起一陣濛濛塵霧。

三不五時地，群眾高呼著團結的口號；我還看到一群信眾身著傘兵偽裝軍服，扛著G三步槍。此時，革命衛隊出動了，維持群眾前行的秩序，把男人從女性信眾間攆出來。偶爾，我還在人群中看到一個庫德族人，或是一個穿著庫德族民族服飾的男人；鬆垮無比的印度粗棉服裝，腰上束著一條帶子，長褲褲管寬闊，逐漸縮細而下，緊箍在腳踝上。偶爾，在我們這一邊人行道上，大出意料之外地，我竟然看到一個矮矮胖胖的年輕女人，緊身牛仔褲繃在身上，蹬著高跟鞋，顯然另有要務待辦。她踩著高跟鞋，盡快地奔走，旁若無人，一雙美目中誰也不放在她眼裡。

人群不斷聚集，此時，男人與女人分成兩股截然有別的人潮，男人繼續移動，女人則慢了下來，擠成一團，卡在前面專供女性進入的大學校門口。佈道演說開始透過擴音器傳播，演講者語音清晰而熱情澎湃，更加鼓舞了群眾的狂熱。女人那一邊的人行道逐漸飽和，女人就著街道上的報紙或是便宜的地毯，席地而坐，剛開始先坐在遮陽庇蔭的懸鈴木樹下，接著到處都坐滿了人。女性信眾的人潮侵入我們這邊的人行道，或者該說，我們自以為為男性專用的人行道。她們完全無視於我們的存在，只是自顧自地低頭搜索她們的提籃，逕自在我們腳邊攤開她們的地毯、碎布或報紙。然後，在她們脫離這一股無名無姓、黑紗黑衣、叫人咋舌的信眾人潮，各自落坐之後，仔細一看，才知道她們都是些農婦，塵滿面，鬢如霜，固執凶猛地維護自家臀下這一小块街道或是人行道。

一個革命衛士走了過來，粗聲粗氣地跟貝札德和我交代了幾句話。貝札德說：「他說，我們一定要騰出地方來，讓這些女人參加禮拜。」

革命衛士身上的切·格瓦拉裝束——深色太陽眼鏡、荷槍實彈——頂著全副革命行頭，執行維護禮拜秩序的勤務，這兩者之間格格不入，此時此刻，令我怒火中燒。可是，貝札德只是溫和地說道：「讓我們跟人民走在一起吧。」

我們就跟街上的行人走在一起，加入川流不息的腳步聲中，然後，貝札德說了：「我喜歡跟人民走在一起。」接著，他又說了：「這可不是什麼宗教場合。這是政治場合。」

大群女性信眾擠在入口大門的周圍，一片黑鴉鴉的黑色面紗與長服，進了門的婦女動彈不得，門外的女人則等著進去。女人的黑衣黑紗團塊，揚起陣陣灰塵。身著戰鬥服裝的軍人背著步槍，站在大學校區北端的十字路口上，維持路口淨空。大學北側這一邊是保留給男人的，可是人潮早就漫過人行道，氾濫到馬路上了。校園每一道大門都有衛士駐守。貝札德帶領著我，挨到北邊某一扇大門（規畫給男性信眾進入校園的大門，遠多於讓女性進入的大門）邊上，跟革命衛士交代完畢，回答衛士尋常的問題——

是的，我是個穆斯林——好容易才放行進入校園。

貝札德想要多看看這些群眾。我心裡卻擔心，萬一我們正好碰上禮拜開始，那該怎麼辦。貝札德了解。他說，要是我們在禮拜開始時離開，看起來可就突兀了；可是若我們留下來參加禮拜，手足無措的德性一定更難堪。不過，禮拜還要再過一會兒才會開始，現在還只是演說而已，講者會沒完沒了地一直扯下去，就像現在這一場開鑼暖場演說一樣，講者是個位階平平的阿亞圖拉，份量太輕，根本沒有翻譯的必要，可是他的聲音還是透過擴音器，沒完沒了地隆隆作響。

真正的群眾聚集在操場中央，圍繞著大學裡的清真寺。可是進了校園大門沒幾步遠，信徒就湊著每一棵小樹或灌叢遮光不全的樹蔭，坐下來準備禮拜。有些人攤開手帕，或是摺妥碎布蓋在他們頭上；有些人頭上戴著報紙折成的遮陽帽，或是馬糞紙裁就的小帽，活像是露天運動場上的觀眾。

兩個工人快步跑了過來，邊跑還一邊在作戲，展現他們的宗教熱忱。他們跑著跑著，還故意將我們推擠到一旁，其中一個工人嘴裡嚷著：「伊朗國王的爸爸當年要是知道這間大學有一天竟然會變成這樣子，他一定連想都不會想要蓋大學的。」

麥克風前的阿亞圖拉要求坐在地上的人大眾開口詠唱聖歌，信眾一而再、再而三地回應，歌聲淹沒了揚聲器擴大的演說聲。聖歌的主題不外乎團結。團結、聯合、抹去個人特性，泯沒在廣大的民眾團塊之內；群眾的喜悅，登時轉化為令我感覺沉重的箝制——倘若這只是因為我從來未曾跟上百萬的民眾，一同擠在封閉的空間裡，那就罷了——然後，我們穿越人群，找到東邊一處出口全身而退，離開大學校區，沿街走回旅館，看到周遭還有人煙，還有人在幹些其他營生，我心裡頓時舒暢開懷。

我們在旅館的食堂點了些餐食果腹。廚房裡一具收音機高聲咆哮，大學裡的禮拜演講還正在興頭上嚷著呢。

食堂裡除了我們，就只有一桌哪裡也去不了的義大利人，他們已經在這間旅館裡待了好幾天。他們的住宿費用一定是由公司支付的，自己口袋裡可能身無分文。他們個個優雅有禮，年紀都三十好幾，而且都穿著陰柔的義大利式裁剪縫製的長褲：緊貼的褲管、高腰，把每個男人的臀部襯托得渾圓有致。他們幾乎足不出戶，每一餐都在旅館裡打發；可是，他們的神采與對於服裝樣式的講究與日漸減，每用過一餐就每況愈下。這家旅館一度以美食號召饕客，革命之後就再也找不到像樣的大廚了。

然而，經過長途步行跋涉，煥發著宗教狂熱，不彈烈日曝曬，耐心長時間等待之後，聚集在大學操場的群眾，還有我們身著制服的侍者，究竟聽到了些什麼金玉良言呢？

「伊朗人要力保伊斯蘭之薪火不滅。」
這已經是老調重彈了，信徒過去都聽過這些話了，可是，熟悉就像儀式一樣。佈道者還是備受愛戴的阿亞圖拉塔立卡尼，他也是主持禮拜的領袖。也就是這位塔立卡尼，將德黑蘭大學裡群體禮拜判定為團結革命示威，一如當年，先知結合了各個沙漠部落一樣的團結。塔立卡尼年高耄耋，幾個星期後他就溘然長逝了。一般人以為，即使連左派分子都同意，他算是少數幾位溫和而充滿智慧的阿亞圖拉了；可是在他過世之後，內情才水落石出，原來這些時日以來，他一直擔任革命委員會的頭子。

阿亞圖拉塔立卡尼正說到，當年先知曾經預言，波斯人，身為薩爾滿的後裔，理當「在滾滾濁世偏離正道之際，起而充任伊斯蘭的先鋒」，這時候，先知心裡說不定就已經料到，伊朗革命就在旦夕之間了。

西元六三七年，先知歸天後不過五年，阿拉伯人就開始侵入波斯，而波斯往日所有的光輝榮景，甚

1 薩爾滿 (Salman-e-Farsi)：直譯即為「波斯人薩爾滿」，他成長於伊朗伊斯法罕的村落地帶，其父為村莊酋長，家道一度殷實，日後中落，流落到庫巴 (Kuba) 一地為奴。先知穆罕默德遷移麥地那之後，某次巡行經過該地，薩爾滿就帶了些菓子去敬獻先知與其隨從，後來，薩爾滿也成為先知最早期的追隨者。

至就在皈依伊斯蘭教之前的歷史，率皆沉淪為黑暗時期。波斯的榮耀還是保存了下來，而今，波斯人逐漸認定自己是信仰最為純淨的穆斯林。關鍵就在於他們根深柢固地熱中什葉派信仰，以及對所有非什葉派人物不共戴天的仇恨。

聖城麥什德

伊朗的阿亞圖拉與各級高階教士，每個人都像中世紀英國國王的直屬臣下一樣，碰到齋月就會分散各地，尋處避靜，平常就要緊緊地挨著個人權力的源頭。何梅尼坐鎮科姆，發號施令；哈爾哈里寸步不離科姆，就顯得跟何梅尼十分親近。塔立卡尼在德黑蘭帶領信眾禮拜。然而，沙里亞特馬達理在麥什德，遠距德黑蘭東方五百哩之處，靠近蘇俄與阿富汗邊界，調教他那群土耳其裔的追隨者。據聞他現在滿懷愠怒，對於專家會議的選舉結果大表不滿。

麥什德是個栽培阿亞圖拉的好地方。麥什德有個陵寢，要比第八伊瑪目的妹妹埋骨於科姆的墓碑還要神聖；麥什德的墓碑下面，埋的可是第八伊瑪目日本人呢。第八伊瑪目去世於西元八一七年，正是他獲得提名繼位，擔任統理整個穆斯林世界的大君主後一年；什葉派信言之鑿鑿，說他是慘遭阿拉伯的暗夜統治者之子哈龍·阿爾——拉什德下毒謀害身故的。朝代傾軋、宮廷密謀，伊斯蘭大帝國之中，波斯王朝的興衰更替，統統都是什葉派神學探討的玩意兒。

當天，貝札德和我應該啟程前往麥什德，可是好事多磨。首先，貝札德的母親好像有意到德黑蘭來看兒子；接著，貝札德的女朋友要進城來度週末。女朋友可非同小可。她芳齡二十五，修到一個經濟學學位，偏偏在後革命時期的伊朗找不到工作；而且，就我了解，她還躲到鄉下避了一陣子風頭。然後，離奇的是，如今她竟然轉進麥什德了。

到頭來，我們還是可以一同前往麥什德；打道回府時，貝札德與他的女朋友再結伴同往德黑蘭。可是，齋月期間，大批旅客湧向麥什德，每天上午七點不到，火車站前的長龍，已經在排隊購買兩天後的車票了。於是我們決定改搭飛機，而且運氣還不錯，我們捱到機場開門時，竟然買到最後兩張第二天飛往麥什德的機票。

那兩張機票可是頭等艙的座位，而貝札德（聲稱自己手上那只小行李箱幾乎塞滿了他所有的行頭）就這樣大刺刺地攤在寬闊的坐椅上，一點也不害臊。機上還有空中小姐服務，臉上沒掛面紗：至少在空中，在伊朗航空的班機上，前革命時期的風格還是大行其道。

我們飛越一片棕色大地。德黑蘭東邊綠意盎然的平緩平原迅速退出我們的視野；沒多久，我們就飛在一片濯濯童山之上，忽而可見蜈蚣一般的山脊，忽而山頂陷落成圓坑，忽而山勢起伏有致、陡峻參差，忽而看見高大平滑的山坡，融雪在坡面上切割出一道道水脈。山脈的紋理與型態不斷地改變，色澤從黃褐色一直變化到暗紅色到暗灰色。偶爾看見綠色的塊狀區域，或是看到蜿蜒深入谷地的山路，或是看到一條筆直穿越棕色荒地的大道，都叫人驚艷不已。從空中俯瞰，地上所有適宜人居的地方都一覽無遺；這是塊古老的陸塊。飛機飛離德黑蘭一個小時以後，田野就比較常見了，灰撲撲的綠野襯在棕色土地上，或是淡紅色的地表上，突現一塊灰撲撲的綠地；接著，我們飛越山脈，前方開展了一片寬闊的平原，這裡就是麥什德；遙遠而孤立，麥什德就這樣盤踞在世界這個古老的角落裡。或許自古以來，這裡就是商旅聚集的地方，或許早在伊斯蘭教崛起與第八伊瑪目降臨之前，就是個朝聖的中心。

儘管名號如此，奧瑪卡宴姆凱悅飯店還是照常營業。多虧上流階級的朝聖香客絡繹不絕的造訪，飯店還能維持其美國國際式的華麗裝潢：恢弘的大理石大廳、精緻的燈光照明、一座游泳池（男客與女客分開使用不同時段）、一間露天咖啡座；陽光充足，周圍以玻璃帷幕隔離在綠意豐富卻還不成蔭的花園之外，飯店裡還有一間燈光較為陰暗、地板上鋪著地毯的正式餐廳，餐廳裡站著一位全身制服齊備的領

班。真是離奇，如此風格的大飯店矗立在麥什德這樣一座聖城之中；更離奇的還在後頭，如此飯店背景之下，我還在房間裡發現一只紀念品——一小塊麥加或是麥地那的黏土，雅致大方地疊在一條棕色面巾上面——這是阿拉伯的聖土，凱悅飯店敬贈。

可是，在我看來格格不入的事情，貝札德卻處之泰然。他在餐廳裡對我說：「你看我們旁邊那一家。那個老太太是挺虔誠的，或是說，她的信仰真的很堅定。其他人都不是這麼回事。那個女兒和女婿是為來這家飯店游泳、休閒及吃吃喝喝的。齋月期間，只有觀光客可以照三餐吃喝。他們就是因為這樣子，才能坐那裡吃東西，他們在麥什德是觀光客。」

所以說，奧瑪卡宴姆凱悅飯店還是活在舊日的榮寵之中——飯店的書店裡還有幾本對伊朗國王歌功頌德的英文書。可是，跟凱悅連鎖的其他幾家飯店運氣就沒這麼好了。我在飯店房間裡面瑣瑣碎碎的飯店宣傳文件當中，就翻到一本派頭十足、專門促銷裏海皇家凱悅飯店的小冊子，文宣讀來就像有個美國人在悲傷地訴說往日美好的時光，而今人事全非再也難以追尋一樣。還記得過去裏海沿岸一帶沒有聚會場所嗎？還好，現在有了凱悅！

貝札德女朋友的電話怎麼就是打不通，聯絡不上。我們用過午餐之後，就出門上街走走。伊朗國王委實花了大錢美化麥什德市容。城鎮另一端，陵寢附近龐大的公共工程尚未完工。清真寺的半球形屋頂、塔樓和庭院，就集中在一片廣大、塵埃盈蹀、烈日焦烤的廣場上。

我們在廣場欄杆裡頭，還沒進入庭院的空地上，看到一個醉漢被革命衛士或是警察押解進入一棟警政大樓，旁邊圍觀了一小群民眾。貝札德講到，這個人說不定會被判處鞭刑，不過不會在公開場合行刑。革命之後，伊朗各地重新公開鞭笞示眾，這也是復興伊斯蘭教運動的一部分，可是大眾觀感卻未獲預期效果。

「效果不好嗎？」

貝札德說：「民眾對那個負責鞭打的人都起了很大的反感。後來，負責鞭打的人要做什麼都挺麻煩的。」

清真寺與墓碑的庭院擠滿了山地居民，紮營棲息在地下墓室上方的露天小屋裡，半坐半躺在遮陽陰影之下。這些人身形矮小，被太陽曬得乾扁多皺，看來窮困無著，說不定比我們在科姆見到的朝聖客還要赤貧。

看著這些山地面孔，感覺中亞離這裡更近了些。然而我們一跨進庭院，馬上就看到一幅新奇景象：一個身材高挑的女人，臉上猶戴輕紗半遮面，身上穿著一件鑲著荷葉邊的鮮黃色短裙，走路時躬著背，香肩時而往後仰起，蹬著高跟鞋的腳步，每一步都經過考量，如此精準而穩定，每跨一步，她鮮黃可愛的荷葉裙子跟裙底的襯裙，就高高地在她大腿根上晃呀晃地，時而緩緩地盪到一邊，接著又搖曳到另外一邊，簡直就是舞孃出場，有如一場表演。萊蒙托夫²與托爾斯泰的高加索世界，竟然還留在這裡！

貝札德也說不上此妹是出身何方的神聖，他只知道她是來自鄉下村落，貧窮不文。我們看著她穿過庭院，身邊還跟著一個年老的蒙紗婦女，另外還有一個男人；我們還看她進了陵寢入口處的一所小亭子，脫下她的高跟鞋，交給一旁的陪從。我們等著她出來，可惜沒有等到；小亭子有一扇通往陵寢的側門。這麼多人遠從山區而來，這麼多人歷經艱苦跋涉；然而，這樣一趟旅程，至少到了旅程終點，村莊女孩還是會穿戴上她最新穎顯目的荷葉裙。

貝札德說：「你知道他們在祈求些什麼嗎？他們要的是錢、一份工作，跟一個兒子。」

2 萊蒙托夫 (Lermontov)：俄國小說家與詩人，一八一四～一八四一，於俄國另外一位大詩人普希金在一八三七年遇害身亡時，寫詩〈詩人之死〉憑弔，指出真正的凶手是沙皇宮廷貴族，因而遭到流放高加索。主要作品有長詩〈童僧〉、〈惡魔〉與長篇小說〈當代英雄〉等。

紀念館裡，就在通往這位伊瑪目陵寢古老的銅製柵門上，我們觀察到一項同樣古老、後人卻還是奉行不墜的禮拜遺風。每當訪客進殿來膜拜，或是對伊瑪目有特殊請求，他就會在這扇柵門上結上一縷布條；而柵門上較低處的支柱或是橫撐——銅質的細長圓柱頂著銅質圓球——都被厚厚地纏上一層又一層的祈福布條。布條脫落之時，也就是信徒禱祝應驗之日；甚至就在紀念館裡面，穆斯林也就著布條使勁兒揩手，就算讓一兩縷布條鬆脫也好，好讓某位穆斯林同胞心願得償。柵門後的地板上，處處散落著這樣的布條，沾灰集塵，凌亂不堪。柵門較低處，不耐長年經人群撫觸，某些銅質欄杆已經缺落無跡了。

有些信徒祈求的願望特別難以達成，就會將一把便宜的掛鎖（大部分都是中國製的），穿過銅質圓球上的小洞，高高地鎖在門上。掛鎖沒鑰匙怎麼打得開呢？難道信徒會事先扔掉鑰匙嗎？難道這樣沒有引誘神明庇祐之嫌嗎？貝札德也無法確定。他想，比較可能的情况是，信徒會將鑰匙交給某個朋友保管，這位朋友說不定哪天也會來到麥什德朝聖，而且說不定在這許多掛鎖中，瞎貓就是會撞上死耗子，開鎖還願，不負所託。

阿亞圖拉沙里亞特

貝札德沒有他女朋友的地址，手上只有一個電話號碼，電話打過去總是沒有人接聽。午餐的時候沒有人，如今已是傍晚時分，照樣空響無著。

而他幫我打的電話也同樣連絡無著。有人跟我講了一個麥什德大學裡研究伊斯蘭教的學者姓名，可是這位學者一接觸到外國人就緊張。他說，他已經轉調到德黑蘭去了，現在正忙著打包收拾，無暇見客。而當我提議邀請他過來一同喝杯咖啡，他又說自己偏頭痛，正疼得厲害，現在還仰天平躺著休息呢。過兩三天，他身子骨或許就爽快多了；我應該趁著早上再撥電話給他。

就這樣，有別於我們原先的計畫，貝札德和我到了晚上還是得相處在一塊兒。吃過晚飯，又撥了幾通電話之後，我們就前往阿亞圖拉沙里亞特馬達理於齋月期間的總部。這位阿亞圖拉的秘書說，阿亞圖拉只在禁食結束後，意即晚上十點至十一點之間會客。接著他就開始講道，然後回房歇息，睡醒起身，再準時為上午四時三十分的封齋前餐進行禮拜。齋月之於虔誠信徒，就是如此規律的開齋與封齋與睡眠與開齋的作息方式。

笑容滿面而友善的餐廳領班，一聽我們說要出門上街，就好心提醒我們：「要小心。外國人在麥什德這種地方，隨時都可能碰到一些不好的事情。」領班的警告既合宜又充滿善意。可是領班為了表示禮貌，又補充說明了一句：「可是，您老就安了。印度人都不會有事的。埃及人、巴基斯坦人都沒問題。美國人、德國人就要小心了。伊朗國王把他們那些人帶進伊朗，讓他們在我們的國家作威作福。他真是壞透了。」語畢，他又微微一笑，唇上短髭往上翹起，兩眼晶亮鑠鑠，又說：「或者說，他實在是笨死了。」

沙里亞特馬達理預定會客的屋子，深掩在主要幹道旁邊，一條曲曲折折的小巷子裡。遠離夜間的車流與燈光之後，屋宅幽靜而晦暗。信徒的腳步聲消失在巷弄小道上的泥土灰塵之中，可是此時此地沒有成群民眾，不必慌忙。

大門有警衛駐守，兩個年輕人坐在門外兩張椅子上，意態十分閒散，也沒露出他們的槍來。貝札德上前跟他們說明過後，我們獲准進門。而跨過門檻之後，就像踏進一處小小仙境一般：四周封閉的花園裡，白熾燈泡閃爍著電光，映照著結實累累的桃樹、各色花朵、玫瑰，以及一畦一畦的草坪。地面近端鋪上一片地毯，上面跪坐著幾個正在禮拜的人；沿著花園一邊鋪著一條紅色地毯，一直走到一堵爬滿長春藤的高牆。離我們較遠的一端，過了一座清淺、鋪上磁磚的池子，搭著一頂帳棚，燈光更形輝煌，地毯上盤腿坐著不少人。

我們脫下鞋子，直接走上紅地毯，走過池子，落坐在一張黑色椅墊之前，沙里亞特馬達理進入帳棚之後，就會躺坐在這張墊子上。帳棚旁邊的屋宅猶新，混凝土建築加上玻璃窗框，磁磚台階兩旁豎著現代化的鍛鐵欄杆。這棟房子或許是沙里亞特馬達理自家住宅，或許是某個宗教基金會的房子，所需費用來自信眾捐輸贊助，貝札德也搞不清楚。一個老人領著一個年輕人，在帳棚裡四下巡迴，供奉信眾茶湯、砂糖及開水，地毯上還擺著幾碗堆得高高的砂糖。

貝札德說：「沙里亞特想讓自己人氣更旺，他現在正抓緊著他的機會。何梅尼為了治理國家，忙得分身乏術，於是，沙里亞特就待在麥什德，讓自己更加受信眾歡迎。」

沙里亞特馬達理揭帳進棚之時，我們全都站了起來。面對這樣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先生，實在很難將任何政治上的狡詐陰險跟他畫上等號。沙里亞特馬達理走上紅地毯，臉上看來笑容可掬，又可能不是微笑，說不定只是他的眼鏡、鬚髮與嘴唇的動作所綜合營造的效果。他白鬚皓然，臉色白裡透紅，怪的是，他的臉形輪廓竟然如此酷似蘇格蘭人。他身上穿著的教士道袍，精美得無懈可擊。沙里亞特馬達理相對於許許多多挺著大肚皮、污穢邋遢的毛拉，其中多人（就像鄉言傳說中的一樣）還妻妾成群，他就個王子一般地脫穎而出了。他的黑色長袍是以非常纖薄的布料裁就的，頂端還繡著或只是繫上優雅的絲帶以為裝飾，長袍裡明顯可見淡黃褐色的長服。

他人如其貌，就是一個博覽中世紀群籍的學者。一九二〇年代間，當他在科姆投入一位知名的神學家門下，主修的就是哲學與天文學這兩項。多少個世紀以前，天文學就已經成為穆斯林智慧發展的一部分，然而長久以來，天文學備受冷落，現今與哲學相互結合，匯成神學研究的一支。

他一坐上他的黑色椅墊，群眾立即奔跑過去親吻他的手背。有兩個人隨即站出來，控制群眾，引導大家排成一條長龍，排出帳外，一直排到爬滿長春藤的高牆下，隊伍再轉個彎，延著紅地毯排下去。男孩和男人捧著沙里亞特馬達理的右手，湊上他們的嘴唇，他們的額頭與他們的雙眼。有個男人還連親了

沙里亞特馬達理兩次，第二次是為了擺姿勢讓朋友幫他拍照。四周相機甚多，鎂光燈閃閃熠熠的。

沙里亞特馬達理臉上似乎一直帶著微笑，彷彿根本無視於匍匐在他跟前的人們，也不在意他們如何拿著他的手又吻又湊又貼的。他的心思早就轉移到面前的請願書上了——那是先前兩三個不把控制群眾秩序者與毛拉放在眼裡的人直接交給他的。強烈的燈光下，他微微前傾的身子，身上淡淡色系的袍服、群眾仰望的頭頸、眾人的頭巾、鬚髮，全都襯托在背後那一堵無窗的牆上：此情此景的圖案效果太強烈了，簡直就像是經過刻意擺設的。

像這樣的信仰——信仰中的信仰，遵循著某個良善好人指導的信仰——已經推動與完成了革命。沙里亞特馬達理在這場與何梅尼為敵的衝突中已經漸居下風，敗相畢露，淪為他人信仰的戰俘。可是，他一度也是革命的領導人物，甚至連貝札德都不敢在他跟前逗留。

沙里亞特馬達理開始提筆行文在請願書上時，預備親吻阿亞圖拉手背的隊伍就停駐不前了。當這位阿亞圖拉開始振筆疾書時，要再抬起他的手來親吻就困難多了——雖然說有一兩個信徒還是如此嘗試。我們兩人上身挺直地坐在前排，兩人坐在這裡，卻講不出什麼此行有何明顯的目的。我們既不請願，也沒帶著照相機，我們也不打算親吻阿亞圖拉的手。我們開始吸引旁人狐疑的目光，連沙里亞特馬達理自己都三番兩次地抬眼，對我們投射出詢問的眼神。貝札德心想，該是起身走人的時候了。我們尋回了自己的鞋子，就取道走回花園後方。後門還有毛拉魚貫而入，其中還有一位盲人。他走在紅地毯上，踩著極為細瑣的步子，卻兩手前伸，大幅度畫著圈子，摸索前進。來往行人誰也沒對他多看幾眼，人群只是避開他畫著圈圈的雙手，任他自行蝸步。花園另外一邊，彷彿伸手不見五指之中，女性信眾聚集在她們自己的特區中。

我們一直等到沙里亞特馬達理開始講道。然而，儘管布景金碧輝煌，花園、流水、燈光，桃樹上映照著毛茸茸的青綠果實，儘管沙里亞特馬達理本人氣宇軒昂，光鮮非凡，他卻沒有什麼話好說。伊朗國

王壞透了，他做的事也壞透了。他竟然廢止了一夫多妻制，嚴重損害了伊朗婦女的權益。伊斯蘭教對婦女保護周延，尤其是在離婚的關卡，對婦女的保護更完善。這些話早經多次吹彈，隨便哪個毛拉都可以講得頭頭是道。

不過，這種場合就是這個樣子——某個齋月晚上，聽了一場阿亞圖拉講道；而當我們離去之際，經過那兩個荷槍守衛，走進小巷子裡，才發現巷子裡人山人海，都是些剛剛到達的信徒。

大街上人來人往，擠滿了車輛與速克達機車；一家販賣各式各樣伊朗乾果與堅果的店舖裡，螢光燈管與透明玻璃相互爭輝；空氣中揮之不去的廢氣，聞起來像是廚藝差勁的炊煙。

我們再一次回到旅館，貝札德再接再厲，又撥了幾通電話給他的女朋友，還是杳無回音。翌晨，他再也掩飾不住滿懷的沮喪，也不再相信電話線可能故障了。

他說：「我希望她沒做出什麼傻事來，遭到逮捕。待在麥什德這樣的城市，到處都是革命衛隊，她的處境實在非常危險。」

「他們為什麼要逮捕她？」

「她是個共產黨員。」

我這邊約見的學者，那個業經調職德黑蘭，忙著收拾行李，偏偏還犯上偏頭痛，現下正仰天躺著的學者，今天早上頭還是疼得不得了。

他說：「你知不知道《伊斯蘭百科全書》這本書？那是荷蘭人出版的。所有關於伊斯蘭教和麥什德的資料，只要是你想知道的，書裡都找得到。」

管你頭痛不頭痛，我跑這麼大老遠的一趟，來到麥什德，可不是為了讓人家叫我走開，或是打發我去找本舊書來讀的。

那個學者說了：「我的記性不好。你去過伊瑪目陵寢了嗎？看過紀念館了嗎？圖書館去過了嗎？去福爾道西的墓碑看看。對了，去參拜一下福爾道西的墓吧。」

而我們也就遵照指示，前往該地一遊。福爾道西的墓碑離麥什德市中心幾哩遠，位於一處開闊乾燥的平原上，只要稍加灌溉就會展現一片綠意。這樣一位偉大的波斯詩人就埋骨在如此荒寂偏遠的地方。福爾道西在阿拉伯人征服波斯後四百年間，還是堅持不以阿拉伯文寫作；而根據貝札德告訴我的，詩人還獨力對抗阿拉伯文化加諸於波斯文化的箝制。

墓碑並不如我所想像的古老。墓碑其實還新泥未乾，建在伊朗國王治下。墓碑是一座大理石方塔，角落上再佐以伊斯蘭式的四根巨柱，顯然可見伊朗國王企圖重建前伊斯蘭時期的伊朗榮光。通往地下墓室的階梯旁邊牆上，舊式風格的雕刻，歷歷刻畫著福爾道西史詩中一幕幕知名的場景。可惜，牆上題字全都被毀得面目全非；只要是提到伊朗國王或是皇室家族或是前朝王政的種種，就一概磨毀。浮刻文字如果高於平面，就被粗暴地抹上一撇水泥或是泥灰。大理石牆上還是到處貼滿了何梅尼的照片。

彷彿，那個學者極力推薦我一訪福爾道西之墓，恐怕不是為了緬懷福爾道西，而是要我見識一下人民的怒火何等高張，這個墓碑就是證據。來到此地，我所看到的就是人民的怒火——在這個富饒、致力重建過的城市中，要比德黑蘭清晰突顯的多。當我們回到麥什德時，祝融肆虐後的建築（大樓裡還有個百老匯戲院，樓面搭得像拉斯維加斯一樣，還標上幾個英文字母），皇室成員塑像早就被破壞殆盡，只留下幾遭損毀焚燒的雕像基座枯立在花園裡，所有伊朗國王時期興建的，表現出波斯波利斯或是前伊斯蘭時期的伊朗文化主題的建築也無一倖免。聖城同時也是一座憤怒之城。

午餐的時候，貝札德就快活多了。

他說：「我聯絡到我女朋友的姊姊了。她沒事兒。電話是故障了沒錯。我跟接線生說了，他就給了我她姊姊的電話。今天晚上我就會過去跟她們見面。我還真是替她擔心。」

「她姊姊也是個共產黨員嗎？」

「我的女朋友是她家族裡唯一的共產黨員，其他的家人都是穆斯林。」
「你要不是共產黨員，就得專注於宗教。伊朗人沒有所謂中間路線，或是其他途徑。」

用完午餐，我們決定先去火車站預購第二天出發回德黑蘭的車票。可是計程車司機跟貝札德說，火車站的票務辦公室早上六點開門，十二點就關門打烊了。

貝札德說：「那麼，我明天一大早六點再去排隊好了。」

我說：「那個司機講的話，你覺得是真的嗎？」

「他為什麼要跟我扯謊呢？」

「我不是那個意思。我只是想知道，他講的話對不對而已。」

我們沒上火車站去。我們又去陵寢走了一趟，還去了圖書館。圖書館沒開。

貝札德說：「我們現在該做什麼好呢？」

「我們去火車站看看好嗎？」

我們到了火車站，票房還在營業，販售前往德黑蘭的火車票。貝札德沒有多說什麼。每一間分隔車室裡都有四張臥舖。我心想，我們應該可以將四張臥舖都買下來吧。貝札德看起來不表異議，可是他接著說：「你不喜歡貧民階級的人，是嗎？」

貧民階級！搭乘頭等艙旅行還算是貧民嗎？我還是屈服在他的威迫之下，我們買了三張車票，貝札德付了三分之一的票款，幫他的女朋友買了一張票。

火車上

我們的火車，不知是製造於德國或是瑞士，停靠在月台上。雙層玻璃車窗外圍的一扇窗板，不曉得

是被人扔了顆石頭還是磚塊，被砸得支離破碎地。貝札德說：「都是因為革命。」
我們找到了我們的車室，卻不能先上車等候。火車開車以前，車室裡不會有空調，近乎密閉的車室悶熱得令人難以忍受。另外一間車室裡則呈現一幅家庭景象——畫面中有一只綠色塑膠水桶，桶子裡還盛著水——這一幕點醒了隱藏在我心中關於我們自己的空臥舖的焦慮。可是，我還是將焦慮收斂起來，隱而不宣。我們步出車廂，重新回到月台上，躲在挑高的懸梁式混凝土屋頂下乘涼，順便等候貝札德的女朋友。

此時，貝札德幾乎立即就將我撇在月台上，自己走開了；他說，火車開車之前，他就會趕回來。只是車都開了，他還是不見蹤影。我一個人坐進車室裡，就在火車起動之前，貝札德的女朋友才出現。她個頭瘦小，戴著眼鏡，皮膚粗糙（或許是受到夏季炎熱蒸烤的緣故），面容說不上漂亮或是平庸。她穿著一條藍色長褲，一件襯衫。陪著她到火車站送行的家人還不只一位姊妹，看樣子，她好像把全家人或是大部分的家人都帶到車站來了。她的家人！這些虔信宗教的信徒！我開始約略了解，貝札德在這個週末所遭遇的重重困難，以及他始終對我和其他人極力欺瞞是所為何來了。

火車離站之後，貝札德終於回到車室來。他一直沒向我介紹他的女朋友，也一直不告訴我她的芳名；他只是代替她向我致歉，說她不會講英文。女孩跟我致謝，眼神卻一再避開我的視線。古老的禮教限制還是牢牢地禁錮著她，同樣也束縛著貝札德動彈不得。

然而，有女同車，穿著褲裝，不戴面紗，自在隨和，一雙腿上下下不住地變化坐姿，這樣或許是浮躁了些，卻也讓我輕易忘懷伊朗各地裹著頭巾、蒙著面紗的婦女，也忘了這一天其實是什葉派信徒行事曆上最為靜默沉寂的一日——今天正是阿里的忌日。早上醒來的時候，奧瑪卡宴姆凱悅飯店床頭擺設的收音機裡，暫停播放任何音樂。

火車開到麥什德城市邊緣，經過一處平頂黏土磚房聚集而成的村落。幾個村莊男孩站在鐵路路基下

方，一見火車開來，隨即猛烈卻也不含惡意地對著火車拋擲石塊。他們發動猛烈攻勢，只因為火車飛馳而過，他們也想彈不虛發，盡量擊中車廂。貝札德曾指出，某一節普通客車上破碎的窗玻璃是革命的傑作之一，說不定實情也確實如此；說不定村童對於這項運動的愛好，追本溯源，就衍生自那段階竿而起的時期。可是，我暗自慶幸，還好他專注於陪伴他的女朋友，沒看到這一幕。

跟女朋友在一塊兒的時候，貝札德就像個孩子一樣舒坦自在，兩人窸窣窸窣地、沒完沒了地聊著。而且兩人一上車沒多久，馬上就玩起牌來——她還帶了一副撲克牌上車。貝札德說，這個女生只會玩一種牌戲，多謝他還想起我就坐在旁邊；那項牌戲極為簡單容易，兩人玩了又玩，反覆玩到乏味為止。

車窗外，山脈、丘陵與灌溉平原構成的無垠風景。丘陵相互不連結，火車在山丘之間蜿蜒穿梭。收成過後，田野呈現一派金黃氣象；午后向晚，遠方的丘陵投射出暖洋洋的棕褐色。水道縱橫，有時候某些水道就從陸上直接開挖下滾，兩旁挖出小型的堤岸；只可惜，值此盛夏溽暑，水道枯縮成微微掀起漣漪的細小河流，水面不過兩呎寬、幾吋深而已。成群羊隻咀嚼著田裡的殘株。有時，車窗外還可以看到打麥去糠的農人。可是現代化的道路和車身上漆著亮麗色彩的卡車總在不遠之處，架著高壓電線的鐵塔一路伴隨著卡車，呼嘯穿越這片平原。

泥黃色的村落中，有些房子還頂著黏土砌成的半球形屋頂（顯然，此地不易取得製作橫梁用的木材），屋頂底部架設傾斜的水管，引導屋頂積水傾洩。從火車車窗看出去，圓形屋頂似乎聚集在一起；傾斜的排水管在黏土牆壁上投射出更為斜長的黑影，遠看讓人聯想起迷你炮管；而村莊圍牆角落裡還矗立著幾棟圓形高塔，活像是瞭望塔一般。山丘漸漸平緩，丘陵間的凹凸起伏與皺摺，就跟人體皮膚上的皺紋一樣。沙漠緩緩開展。地上處處挖掘了水井，井口圍起低矮的土牆，猶如巨大的鼯鼠丘；而且經常就在一片荒瘠之中，乍然發現一堵堵的泥牆，圍圍住叫人驚艷的新綠白楊樹叢。

夕陽落在貝札德那一側車廂外。塵滿大地，貝札德說，沙漠就不遠了。我說，一路行來，這片土地耕耘得頗具良效，村莊道路和電力設備都顯現了一番建設。貝札德則大表不以為然。他身邊挨著女朋友，有女在旁，他更展現出洞燭不義惡行的慧眼，憤慨對抗社會不公的熱情，維繫著他們倆的感情。他鄭重對我宣告——還不辭辛勞地將他所說的話翻譯給他的女朋友知道——伊朗境內百分之七十五的村落都缺乏聯外道路與電力。

可是這個國家幅員廣大，開發困難重重，村莊彼此分散得老遠。而且即使貝札德說，我們現在開到乏人灌溉的沙漠地帶了——而且儘管他扭亮車室頂上的燈光，車窗玻璃反射室內的影像，疊映著窗外逐漸褪去的景色——我還是在平坦的平原上，看到成條或是成塊耕作的田野，一直到天色完全黑了下來，才從我的視線中遁去。

貝札德的女朋友一直等到夕陽西下——或許是齋月的習慣使然吧——才端出吃食來分給我們。她的愛迪達背包裡，沉甸甸地塞滿了裝著餡餅和甜甜圈的塑膠袋。貝札德還說，這些好料他以前也沒嚐過。此外，還有些曬乾的無花果及其他幾種乾果。她本來就是要將這些食物從麥什德帶到德黑蘭去跟朋友分享。我吃了些曬乾的果實，是某種小型的無花果，表面多皺而龜裂，外皮是黏土的顏色，內實卻柔軟而甘甜。如此果實，感覺像是出產於我們一路行經的土地，我不由聯想起陽光、沙漠以及圍圍在牆內的花園。貝札德吃了一個甜甜圈，他的女朋友則吃了一塊小麵包。

她傾靠著車窗，將左腿平伸在座椅上，翻開一本嶄新的波斯文小冊子，埋首閱讀。小冊子黃色的封面上還印著一顆紅星，以及一幅紅色的蘇聯國旗。貝札德說，這本小冊子是剛剛由黨部發行的；這個黨可是個獨立運作的黨，不受莫斯科支配，出版這本小冊子是為了解釋黨部為什麼沒有參加這次的選舉。

貝札德的女朋友似乎毅然決然地翻閱著這本小書，可是小冊子的內容顯然不能引她入勝。她停下翻頁的動作，將小書面朝下地擱在座位上，接著就跟貝札德交頭接耳起來。她將腿從座椅上放了下來，兩人就又開始玩起牌來，同樣簡單乏味的遊戲。

火車進站稍停。貝札德在麥什德車站時，還責難我對於「貧民階級」的態度有問題，因此也免了我買下第四張臥鋪的車票。而這會兒，他跟女朋友吃吃傻傻地憂慮著，該怎麼將陌生人擋在外面才好。他於是將靠著走道窗戶上的車窗窗簾放了下來。

火車又開動了。車室門上響起敲門聲，而幾乎就在敲門的同時，敲門的人就迫不及待地推開了門。原來是臥鋪車廂的車掌。他順手拋入幾個藍色的寢具袋子：一床毯子、一個枕頭、床單，以及一個枕頭套。

敲門聲再度響起。貝札德掀起窗簾的一端一窺究竟，我也掀起另外一端。門外站著一個矮小的年輕男人，身著軍服，擎著一柄左輪手槍。他推開車室的門，跟貝札德講了幾句話，就關門離去。他腳上一雙黑色的靴子。

我說：「軍方的人嗎？」

貝札德說：「他是科米塔派來的。他說我們不可以玩撲克牌。你知道他怎麼叫我的嗎？他竟然叫我『兄弟』；竟然拿我當他伊斯蘭教的弟兄。我們不可以玩牌，這是新的規定。」

如此震驚之後，他轉而怒氣沖沖。他的女朋友也一樣。她什麼也沒說，只是將臉繃得緊緊的。現在，貝札德不能不面對他身為男性的角色了；而我恭逢其時，不幸在同一個車室裡目睹他遭人羞辱的經過，於是他轉而對著我，用英語滔滔不絕地發洩他的憤慨。

「我不在乎這些撲克牌，我在意的是權力。他那麼做不過是要向我展現他的權力而已，讓我看他們的權力。我不懂，穆罕默德怎麼會知道什麼撲克牌的撈什子。在他的年代裡，撲克牌都還沒發明出來呢。」

我說：「可是，穆罕默德曾經明白表示過他反對賭博。」

「他是這麼說過。可是，我們並沒有賭錢啊。」

「那個科米塔派來的人又怎麼知道你們有沒有賭錢。」

「他知道。他當然知道我們沒賭錢。」

我自己內心所感受的驚撼也逐漸強烈起來。這趟旅程因為那個穿著卡其制服的男人而改變，他親身在我們的車室裡，為這片土地增添如此不理性的成分。之前，我還就著黃昏天光興致勃勃地端詳，此時，看起來卻這麼不協調與荒謬：卡車、道路、高壓電塔與村莊，現在回想起來，都不再是那麼回事了。

貝札德說：「你明白我一直在跟你說明的情況了吧。那種權力是屬於人民的——工人與農民大眾。上層階級都只想跟你炫耀他們的權力而已。」

我心想，現在可好了，權力確實回歸到人民身上，而剛剛發生在車室裡的一幕，不過就在展現那種權力罷了。

我說：「那個科米塔派來的人算是出身上層階級的嗎？」

「他的確屬於上層階級。軍方永遠只會替上層階級服務。那也是我為什麼要叫他做上層階級分子的原因。」

我們不再爭辯。而我們之間，誰也不想再辯下去；他的反覆辯證聽在我耳中，就跟科姆的阿亞圖拉施拉吉夫子自道一樣艱澀。

他不想再玩牌了，他的女朋友就只會那麼一百零一種撲克牌遊戲。而今，他們就像兩個不准玩牌的小孩一樣。撲克牌散在兩人座位中間，還是沒收疊起來。女孩只是將手上的牌往座墊上一攤，順手比了個像在嘆氣的手勢。她原本就已經繃起來的臉，輪廓線條開始變得僵硬嚴峻。我想，要是他們小倆口可以獨處的話，說不定兩人都會自在多了，尤其是貝札德，他一定會比現在輕鬆許多；要是沒有我這個電燈泡，全程見證他們的一舉一動的話，那該多好。我為他的驕傲自尊焦慮不已。

我說：「那個科米塔根本無足輕重。不要管他，你不必無役不與，你只要不錯過最重要的一戰就夠

了。」

這話說來確實能夠安定人心。他說了：「我不是真的那麼在意那副撲克牌，也不會拿著撲克牌小題大作。可是萬一他們注意到書的話——萬一他們問起我女朋友為什麼要看這種書的話——」他話頭就此打住，沒把話講完。

那本她不過翻了幾頁的小書，還是面朝下地攤平在坐墊上。即使在她剛剛將書平攤攤在座位上時，我就有種感覺，她似乎故意在展現小書黃色封面上的紅星與蘇聯國旗，好像她存心讓往來經過車室走道的乘客注意到這本小書一樣。

她還是一言不發，接著她做出女性慵懶疲倦的姿態，將撲克牌收了起來。

貝札德又說了：「你知道他們要跟我們過不去了吧，是吧？他們看到我的女朋友」出於舊式的束縛，他仍舊規避不提她的名字，「沒有裹上黑色的頭巾。那就是為什麼他們一定要讓我們感受到他們的權力。」

她站了起來，對著走道點點頭，然後與貝札德走了出去，爭取一點兩人獨處的時間，同時也是跟一些守舊人物挑釁：當他們看到在舉國皆在阿里的神聖日子裡，竟然有個女孩不戴面紗、穿著襯衫長褲，斯可忍，孰不可忍？

他們兩人離開車室好一段時間。

當他們再回到車室裡來時，貝札德說：「送寢具來的那個人——我想，一定是他舉報我們的。他看到我們玩撲克牌，就去通風報信。」

他摯愛著人民。可是在伊朗，現在究竟誰才是人民？

接著不到一個小時，女孩說她想睡覺了。貝札德問我，我們三人該如何分配臥舖。我心裡考量到她的隱私，就建議說，她應該睡在上舖，我可以睡在她的下舖，貝札德可以睡在我對面的下舖，而他上方

的上舖應該要拉下來，這樣女孩子才不會在窗玻璃上映照出身影走光。

她了解我在講些什麼，而且幾乎馬上就開始往梯子上爬。

貝札德說：「可是——」

然後，順著他的目光，看著她站在梯子上最低的一級橫槓上，我才第一次注意到，原來她的左腳不良於行，本來我還以為過於好動的左腿，原來要比右腿短一截，而她的左臀也略略顯得萎縮。

她還是堅持爬上梯子。而貝札德並沒有睡在我對面的下舖，他也睡在上舖，靠近他的女朋友。他上床沒穿睡衣；要不是沒有睡衣，就是他出門前沒有將睡衣打包放進他的小行李箱裡。總而言之，在伊朗，像他這個樣子，還真是膽大驚人。

火車在深夜時分穿越山脈與沙漠。天亮後車窗外又見土牆圍圍的水井，灌溉溝渠，泥牆裡養著青綠樹叢和花園，農人在精緻、富饒的田野間辛勤耕作；村莊處處；德黑蘭市區外圍一帶的景致。一名車掌送茶進來，茶汁盛在玻璃杯裡，示意我們必須以傳統波斯方式飲用：先在嘴裡含上一堆砂糖，再和著茶水吞嚥下去。

貝札德一夜睡不安枕，輾轉難眠。就在我們幾乎要進入市區時——破舊不堪的房子後面，竟然也裝設了空調壓縮機組——我們看到那個科米塔塔站在走道中間。他個頭非常瘦小，孩子氣十足，不慌不亂的。當他探頭看進窗內時，顯然對於前天晚上他突兀地闖進我們的車室毫無印象。

貝札德的女朋友跟我說再見。自始至終，我們同車共處這許多鐘點以來，她從來沒有正眼直視過我。我們下車登上德黑蘭車站的月台，我讓他們兩人走在前面；她瘦小而跛行，他則高大而身手矯健，他對她悉心保護，同行時還微微傾向她那一側。朋友在車站等著她，他們將她帶離開他的身邊。他們都是些熱中革命的年輕人，一群危險分子；在他們而言，就在那一天，他們重新回歸的城市，正是一座遭逢災禍的城市。

革命理念的衝突

那個週末，德黑蘭街頭暴動不斷，穆斯林與左派分子之間衝突頻傳，左派遭到嚴重創擊。

一個星期前，當貝札德與我一同搭車從科姆回到德黑蘭時，我們曾經在車上的收音機裡聽到左派報紙《阿言迪更》遭到政府查禁關閉的新聞。接著一週之間，左派支持者不斷抗議，騷動規模日益擴大，穆斯林團體遂起而反制。

上個星期五，在德黑蘭大學的禮拜活動結束後——那個時候，貝札德出於自身的革命情懷，見到信眾規模如此龐大，還將禮拜活動當作一個政治集會，而非宗教場合——數百名穆斯林就齊步邁向《阿言迪更》的辦公室。該報有三十名印刷工作人員被囚禁在辦公大樓內，不得進出；現在，革命衛隊將他們轟了出來。被革命衛隊掃地出門的《阿言迪更》工作人員中，有五人受重傷，隨即被送到軍醫院急救；有二十人遭到逮捕。星期天，左派分子在德黑蘭大學發動一場示威，現場爆發嚴重衝突，棍棒刀刃齊飛，更多人受傷。星期一當天，正當我們準備從麥什德搭乘火車回到德黑蘭時，穆斯林團體衝進貝札德所屬的共產黨組織總部，把每個人都轟了出去，扔出所有的文件，沒收所有的武器——手榴彈、迫擊砲、過濃催淚瓦斯的濃毒罐、比利時與俄國製的步槍。

貝札德和他的女朋友回到德黑蘭聽到的就是這則新聞。我稍後得知他們是從守在火車站等候這個女孩的朋友們那裡聽到這個消息的。可是經過前天晚上遭軍方羞辱之後，貝札德對我卻隱而不宣。他送我回到旅館後，對我的責任就此告一段落，隨即任由自己在《德黑蘭時報》上尋索相關資訊。

片段式的新聞：一成不變的措詞，一成不變的言語，所有細節都留給讀者自行想像。可是，不過稍過片刻，在我前往洲際飯店用自助午餐時，新聞播報所呈現的真實性就幾乎無法令人信服。

一棟摩天大樓，還有著花園和雕像，一輛車頂上閃閃光燈不停閃光警示的車子，擋住一條側街出入；穿著迷彩戰鬥服裝的男人，手裡拿著槍；摩天大樓建地四周一個角落裡堆著幾層沙包，上面還架了一柄機關槍。而越過繁忙的車道，從建築物裡驅散出來的共產黨徒——那些穿著長褲和開襟襯衫的年輕人，看來像是在都市裡打零工的。波斯式的戰鬥配置，雙方人馬都在觀望等待；熙熙攘攘的人們照常在城市裡營生，一如往昔，農民在田裡鋤草翻土，自個兒幹活忙去，一旁兵丁將帥廝殺得暗無天日，戰得你死我活，決定誰能統治這塊地方。

那天下午，我在福爾道西街頭，也就是兌幣商家雲集之處，聽到警車蜂鳴，接著是一輛呼嘯而去的露天貨卡，卡車上載滿了持槍的穆斯林，後面還跟著一輛像是警車的車輛。稍後，先前的伊朗國王大道，現經正名的伊斯蘭共和國大道上，警笛一而再而三地響起，而我又再度看到那群持槍的穆斯林。四下不曾發生任何值得他們下車處理的緊急事件，他們不過是沿著市區街道飛車奔馳，警笛就是他們的戰鬥號角；他們這樣窮忙一場，正如貝札德說的一樣，只是為了炫耀他們的權力罷了。

兩天過後，到了我在德黑蘭度過的最後一夜，我又跟貝札德短短會晤了幾分鐘。他被太陽曬得面色黧黑，他一直跟那些遭到驅逐的共產黨員站在一起，站在沙包與機關槍對面的街道上。他面容悲悽，神情卻十分平靜。他已經找到了他的戰役。我問起他的母親，她稍早抵達了德黑蘭，現在正跟兒子住在一起。可是古老的束縛仍然緊綁著他，他對自己的母親不過輕輕描淡寫幾句；對於他的女朋友，更是隻字不提。

如此情懷，如此勇氣；然而，在伊朗無可避免的是，他的革命理念跟敵人的理念一樣簡單，說穿了，也不過是敵對理念的一個翻版罷了。兩造都有賴於某些真理的開啟，以及刻意解讀某些歷史事件；兩造都要求追隨者接受絕對的信仰；兩造也同樣生根滋養於同樣的熱情：正義、團結、復仇。

外來文明與正信的衝突

我即將啟程前往巴基斯坦。我原本計畫搭乘巴士循線旅行，走過伊朗的南部與東部地區，沿途造訪地名優美的古老城鎮：伊斯法罕（Isfahan）、克曼（Kerman）、雅茲德（Yazd，該城係祆教重鎮。波斯人在前伊斯蘭時期，祆教為其大宗信仰，祆教教徒長期遭到流放，他們移民印度的後裔，被印度人稱為「帕爾奚斯」〔Parsis〕，意即「波斯人」）、扎赫丹（Zahedan）等等。可是，科姆與麥什德已經讓我徹底領教盛夏炎日之際，沙漠之旅的萬種風情，我可沒那個雅致再在某個不起眼的地方，碰到科米塔查房；而我始終還是等不到有關通過巴基斯坦邊界的確定答覆。我還是決定搭乘飛機，直飛喀拉蚩（Karachi）。

往喀拉蚩的飛機航次不多。我選定的那一班飛機預定在上午七點三十分起飛，而巴基斯坦國際航空公司堅持旅客於起飛前三個小時報到。我準時到達，心想自己做了正確的事情。我手上不過提著一只小型的雲雀牌行李箱，隨即迅速通過一切檢查關卡。半個小時過後，東方剛剛破曉，票務櫃檯前就排了一列長龍，前進十分緩慢。

就像在倫敦機場一樣，飛往伊朗的班機總是擠滿了拎著大包小包的伊朗人，他們剛剛才周遊歐洲或是美國，大肆血拚一番，現在，巴基斯坦的季節性工人也將德黑蘭機場擠得水洩不通，他們同樣也在伊朗採買完畢。他們準備帶回家返鄉探親的東西還真不少：盒子、箱子、大型卡紙箱子，上面緊緊繫著繩子固定、棕色的紙箱子上打印著名品牌的字號——愛華、赤井、東芝、國際牌等等，都是這個全新的國際大市集裡的商品，不涉任何一種學習、努力或是文明的商品，不過是純粹的商品，不過就是俗世間的一種獎勵。

預定於七點三十分起飛的飛機，一直到上午十點都還沒開到登機口。十一點二十五分飛機終於開始滑行，卻又因故再次停頓了一個小時，好讓伊朗空軍駕著美國製的幽靈式戰鬥機升空。我本來以為他們只是進行例行訓練，事實上，他們是奉了何梅尼的命令起飛，空對地攻擊西部的庫德族叛軍。當天稍晚，我在喀拉蚩又聽到新聞報導說，兩架幽靈式戰鬥機墜毀。聽來奇怪，這段新聞尤其令人感覺不舒服：如此精良、極具致命攻擊力道的戰鬥機，訓練不足的飛行員置身其中，卻如此脆弱，不堪一擊，淪為半個受害者。然而，那天早上，遵循著真主與第十二順位伊瑪目意旨出擊的人，卻是不折不扣的殺人兇手。

隨著幽靈式戰鬥機之後，何梅尼的伊斯蘭教法官阿亞圖拉哈爾哈里去到了庫德斯坦省。十天，就在科姆，哈爾哈里還拚命吹噓他跟層峰如何親近。哈爾哈里分秒必爭，頂著八月溽暑，馬不停蹄於各個地方，行旅間，他已經判決處死四十五個人。他花了三十年的時間研習伊斯蘭教法，面臨援引伊斯蘭律典下筆判決時，他絕不猶豫迷惘。當他坐鎮某個庫德族城鎮時，有個獄中服刑人的家屬前來喊冤，抗議服刑人被拔了三顆牙齒，兩顆眼珠子也給剝掉了。哈爾哈里下令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當場就拔了施虐者三顆門牙。原本義憤填膺的家屬頓覺不忍，要求赦免加害人，讓他保住一雙眼睛。

那就是伊斯蘭式的司法正義，速審速決，直接處罰在人體上，效果令人滿意，正好符合單純信仰的需要。可是，過去從來沒有人告訴過我們，這同樣也是伊朗人的需要。這項特殊的革命承諾經過模糊與蒙混；接下來，我們讀到的泰半只是打倒法西斯伊朗國王。只有伊朗人跟幾個國外學者知道，當何梅尼還是小孩的時候——當時伊朗還在卡筭（Qajar）王朝統治期間——何梅尼的父親被一名政府官員殺害，兇手遭到公開絞刑示眾；何梅尼的母親帶著他去目睹行刑過程，事後他的母親對他說：「現在，你可以心平氣和了。大惡狼已經自食惡果。」

一九七九年一月，何梅尼在《紐約時報》上刊載大幅廣告，其時，他仍然流放在法國。廣告中，何梅尼呼籲「全世界的基督徒」，似乎在對著另外一種同樣高度文明的人民提出訴求。同年八月間，何梅尼在耶路撒冷日（也就是他派出戰鬥機去轟炸庫德族人的那一天）的說法，就跟先前判若兩人了。

他說：「全世界各國政府都應該了解，伊斯蘭是舉世無敵的。伊斯蘭將橫掃全世界所有國家，百戰

百勝。伊斯蘭與《可蘭經》的教諭就要宰制全世界了。」

這些話當然不會講給《紐約時報》的讀者聽到。而下面這段話，當然也不能讓西方人聽到，這是何梅尼在齋月的最後一個星期五（這也是一個絕佳範例，佐證科姆的伊斯蘭學究代代相傳的中世紀「邏輯與修辭」精髓——幾個關鍵性字眼不斷重複，經過各種不同的排列組合，最後終於完全扭曲）的演說。他說：「民主人士講到自由的時候，背後都是受到一些強權國家的教唆。他們只是想引導我們的年輕人向下沉淪……假如說，這就是他們真正的目的，那麼，沒錯，我們就是反動分子。你們這些不管講到什麼都堅決要求娼妓與自由的人，自稱為知識分子。你們將道德墮落當作自由，嫖妓也是自由……那些要求自由的人，要的只是上酒家的自由，找妓女、賭錢、抽鴉片的自由。可是，我們寄望於我們的青年能夠開創一個歷史的新局。我們不要知識分子。」

那就是他對信徒發出的攻心喊話，那些貝札德稱為流氓無產階級的人民。何梅尼要的，只是他們的信仰。可是他也知道，伊朗出產的石油，對於那些倚賴機械動力的國家而言，價值不可輕視，而他也可能以恣意派遣戰鬥機與坦克去征剿庫德族人。何梅尼自命為真主旨旨的詮釋者、信眾的領導人，他體現了所有伊朗人民的困惑，更進而將這種困惑吹噓為一種榮耀：中世紀期間，一度享有高度文化的人民，一朝大夢初醒，掌握了石油與金錢，意識到權力與褻瀆，感知周圍籠罩著另外一種新穎的強大文明，一種他們無法支配的文明。伊朗人只能不斷排斥抗拒，同一時間又深深倚賴著這種外來文明。

〔第二部〕

巴基斯坦：夢裡鹽山

一 取代

阿里的正道已經重返伊朗，伊朗舉國也即將分崩離析。旁觀者清，局外人自然可以察覺其中關聯。可是，信仰堅定的人還是能混淆視聽，將這些重大事件定義為互不相干的獨立事件；即使他已經準備要溜之大吉了，還是可以面不改色地歡慶伊斯蘭教的勝利。我們也可以同樣的方式看待巴基斯坦。我們可以將巴基斯坦看做一個分裂的國家，經濟發展停滯，國政獨裁專橫，富有才能的人民不知如何安其手足，幾近歇斯底里。可是，巴基斯坦建國在三十餘年以前，一直視為印度穆斯林的祖國，世人也因為這個原因，將巴斯斯場當作復興伊斯蘭教的先鋒而備加珍愛。

《德黑蘭時報》在一篇文章中將這兩個國家串聯在一起：「巴基斯坦建國的歷史和伊朗的伊斯蘭革命，在在顯示宗教的力量與俗世狂熱之空洞。世界如何運作純屬科學研究範疇，而社會事務應當如何監督運籌則為政客關注的焦點，可是，整體觀之，兩者究竟代表什麼意思，則是伊朗與巴基斯坦關心的重點。伊斯蘭教義中，政治與宗教是不可須臾分離的。伊朗與巴基斯坦可以攜手並進，身體力行，向世人證明，伊斯蘭教不只是一種過去盛極一時的宗教，並非只能照章頒演古老的宗教儀式而已。」

這就是信仰的邏輯。該文作者坦承，伊朗與巴基斯坦兩國共同缺乏的就是科學，經營一個二十世紀國家所需要的能力，作者卻也嚴詞摒斥科學；接著，再天外飛來知識性的一筆，言詞模糊（「整體觀

貢札羅：倘若我在這座小島上播種造林，闢下——

安東尼歐：他只會亂灑些蕁麻毒籽。

賽巴斯欽：要不就是酸模雜草，要不就是錦葵野花。

貢札羅：倘若皇上來到島上，又要我如何是好？

賽巴斯欽：沒酒喝就醉不倒。

貢札羅：倘若一國，由我做主稱王，

我必要一反尋常，

民生萬物皆廢枉，

馬車行人禁交通，

法制行政死胡同，

讀書識字枉費工，

窮人富人共貧窮，

各項服務都充公，

契約、繼承、國境、地契、

耕耘、釀酒全取消，

稻麥、金屬不准用，

酒水油米都不要，

人人不就業，各個懶逍遙；

女人免勤奮——依舊保純真；

王權也勾消。

賽巴斯欽：可他還是要做主稱王。

安東尼歐：他那個王朝的尾巴忘了腦袋。

之，兩者究竟代表什麼意思」）地說，他還將信仰推崇為逾越一切的成就。要在文章裡自圓其說——文中也無意同時提出世界各地的混亂現狀作為反證（「顯示宗教的力量與俗世狂熱之空洞」）——作者只有掛一漏萬，留待讀者自行探索。

作者提到「巴基斯坦建國的歷史」，可是卻不曾深入這段歷史，而且他也刻意無視於這段歷史的本質：巴基斯坦於一九四七年正式宣告建國之後，多少人流離失所，引發大規模的居民外移；建國以來，一直缺乏足以代表人民的政府；信仰的國土沉淪為劫掠之地，地方割據猖獗；一九五八年，全國淪於軍政府管轄；一九七一年，國境遠端孟加拉分離獨立，血流漂杵的一段歷程。文章中隻字不提巴基斯坦再度落入軍政府手中，全國再度戒嚴；該文隻字不提該國唯一經過民選肯定的總理布托先生，於一九七七年遭到軍政府貶斥下台，旋即以謀殺罪名遭到逮捕，並以死刑定讞，監禁十九個月之後，以吊刑處死；該文隻字不提這次處決不過執行在四個月之前，震驚巴基斯坦上下，人民更加不知所措，進一步地惡化與分裂了國家。

這段歷史的種種，期間所有俗世的挫敗與痛苦，都因為信仰的邏輯而煙消雲散。

信仰的力量

伊朗的沙漠綿亙，銜接巴基斯坦的沙漠。從三萬呎的高空俯瞰，伊朗的荒地與巴基斯坦的俾路支顯現出棕色與黑色，不過色度淺淡，比較接近光澤，而不像是色彩。

俾路支還出產一些天然氣，可是巴基斯坦的沙漠無油可掘。伊朗盛產原油而多金；偏偏在巴基斯坦這裡，沙漠就是沙漠。伊朗人口三千五百萬，一天光靠原油輸出就可以賺進七千萬美元；巴基斯坦人口是伊朗的兩倍，每個月卻只能憑著出口稻米、皮革與棉花，賺進一億四千萬美元。伊朗才剛剛在美國聯

邦法院打贏官司，贏取一紙賠償判決，得以向美國貝爾國際公司索取三千萬美元；巴基斯坦一年之間，只能在幅員遼闊的信德省道路系統上花個兩千萬美元。伊朗可以一口氣訂購數十億美金的軍事設備——石油將金錢化為開水；此間消息指出，巴基斯坦有意向伊朗商借一筆一億五千萬美元的貸款。

巴基斯坦這裡——世界逐日縮小再縮小——新聞中說，一筆總額十四萬美金的獎助金，即將分發給三十個巴基斯坦體育活動組織。巴基斯坦國土面積大於伊朗，經濟上卻是個侏儒，而這一點也反映在報紙上的廣告欄裡，林林總總的廣告，包括招攬保險、熱帶服飾、電視機、某種棉花殺蟲劑（與英國梅與貝克公司合作生產）、水泥、電流穩定器、黃銅製三角鐵與敲擊桿、某種美容香皂、某種品牌的刮鬍刀片等等。

精緻繁複的經營模式，歷經發展衰退的經濟，有時可以顯見整個民族都在遊戲人間一般。喀拉蚩數一數二的英語報紙《黎明報》上，刊印了一幅跨雙欄、占了四吋版面的廣告，廣告主係隸屬巴基斯坦國防部下的國防科學與科技組織（總部），廣告中鉅細靡遺地說明該單位將出售一台電冰箱與四只碗櫃（「木製碗櫃，門上嵌以玻璃面板，並以絞鏈銜牢」）。

該報還用上八吋寬的版面，報導政府部門宣布將施行「青年技術發展計畫」。那究竟是個什麼樣的計畫呢？政府將提供兩千盧比，即兩百美元，給一千所鄉區學校，購買工作台與手工工具。八吋寬幅的

1 布托 (Bhutto)：全名為 Zulfikar Ali Bhutto，一九二八～一九七九，巴基斯坦政治家、總統（一九七一至七三）和總理（一九七三～七七）。於一九六七年創建巴基斯坦人民黨 (PPP)。一九七一年東巴基斯坦獨立，成立孟加拉國，他出任巴基斯坦總統，一九七三年任總理。他進行社會經濟改革，但遭到右翼伊斯蘭政黨的反對。一九七七年大選後，齊亞·哈克將軍 (General Zia ul-Haq) 奪取政權，布托被逮捕，以貪污謀殺罪受審，一九七八年被判處死刑。雖然世界上一致要求赦免，但終於在一九七九年執行死刑。他的長女班娜姬 (Benazir，一九五三～二〇〇七) 繼任巴基斯坦人民黨領袖。

版面，就為報導這樁計畫？記者要灌水到什麼程度，才寫得滿這八吋的版面？就像這樣：「……本項訓練計畫將適度調整，以配合各地方社區之迫切需要，並且滿足學員之興趣，藉以從本計畫中引導出最大利益。政府官員解釋道，該項計畫將以標準核心觀念為基礎，含括經過妥善界定，各項社區導向之技能……」

整個社會人人叫窮之時，就是祭起生花妙筆、化腐朽為神奇的時候了。農場機械化逐步開展：那就是《黎明報》上撫慰人心的頭條標題。接下來的報導：「此間於昨日獲知，信德省地區農業機械化方案已逐步開展，有關單位已於田野間布置多項機械設施以利發展……」

可是讀到沙烏地阿拉伯的招工廣告，工資每個月兩百美元，就沒那麼有意思了。「報名者無論婚姻狀態如何，均將視同單身錄用。資方將提供單身空調宿舍，基本上兩人一間，附帶必要家具與公共炊煮及盥洗設施，以上各項福利將以合理之房租費用自工資中扣除。」巴基斯坦的經濟就靠著諸如這類的境外薪資，及其稻米、皮革與棉花出口，苟延殘喘撐下來。

然而，報上還是披露了巴基斯坦自製的「伊斯蘭」核子彈；社評版面還有一篇長文，針貶反對這顆自製核彈的「國際錫安主義」。巴基斯坦雖然窮，卻是個信仰的國度，上下執迷狂熱於信仰。甘地夫人出賣K B G情報，漁利以色列——這可是《黎明報》駐倫敦特派員的一篇報導。甘地夫人還擔任印度總理時期，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曾經傳遞某些情報給她，而她轉手將這些情報交給當時的以色列外長摩西·戴揚（Moshe Dayan），他就給了她六百萬美元。這則報導來源出自某個烏干達外交官所著尚未出版的書中，而烏干達在阿敏（Amin）治下，早就歸屬成為穆斯林世界的一員了。

不管這項猶太—印度—蘇聯的秘密交易如何演變，虔誠的巴基斯坦還是孜孜不倦地準備前往麥加朝聖。泛伊斯蘭汽船公司已經籌備了十二趟航行班次，搭載信徒前往阿拉伯的朝聖港吉達（Jeddah）。「甲

板級來回船票美金二百八十元，包括五十七元餐點費用；頂級艙房船票四百二十元，其中包括餐費五十七元。」；而身兼巴國總統與戒嚴法執行首長的齊亞將軍，還諭令各地方省長與聯邦政府部長需輪番前往港口，為每一班朝聖汽船送行。齊亞將軍本人則將靜悄悄地搭機前往阿拉伯，花上一天左右的時間，低調地體現他個人的虔信熱忱（而且將軍回國時，還會帶回一筆規模保守的沙烏地貸款，金額約在一億美元之譜）。

檯面下，就像伊朗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接連生事的局勢一般，巴基斯坦國內也是繪聲繪影的。巴國中不同人等紛紛起而呼籲實行更為嚴格的伊斯蘭律典，喀拉蚩大學校園裡還發生槍戰，左右派學生端著輕機槍對幹——同樣的字彙在不同的國家都得另行定義。這裡所謂的右派分子，是一些反對布托先生的人，並且以伊斯蘭教來詆毀他；而左派則是一群為他哀悼的人，一心期望將他的政敵拉下馬來。

走在伊朗，你會覺得，儘管人們痛訴伊朗國王如何倒行逆施，金錢的力量還是無遠弗屆。錢，以及所有用錢買得到的進口貨品與工具，造成伊斯蘭教勢力龐大的幻覺。一天七千萬不勞而獲的美元進帳，讓這個國家人心沸騰，從而醞釀出革命的意念。而在巴基斯坦，窮困無錐也能營造出相同的效果。貧窮的張力與政治上的困境，與信仰的張力結合在一起。以宗教立國，獨立三十二年來，作為印度穆斯林的祖國，巴基斯坦持續處於沸騰動盪之中，而伊斯蘭教的議題從不缺席：國政上每每遭逢挫敗，就會一再、再而三地回歸到信仰的主張上。

獨立建國之後

分離建立印度穆斯林國家的意念一旦成形，就沛然莫之能禦。這個理念最先於一九三〇年提出，發

起人是一位備受尊崇的詩人——穆罕默德·伊克巴爾爵士（一八七六～一九三八）²，在全印穆斯林聯盟演講中提出，印度大陸分裂之前，這個組織是最主要的穆斯林政治組織。

伊克巴爾的論點就像這樣。伊斯蘭不只是個倫理上的理想，還是「某種政體形式」。對一個穆斯林而言，宗教不光是個人的良知，或是私下從事活動，這跟基督與歐洲人的日常生活關係是完全不一樣的。伊克巴爾主張，這個世界上從來就不曾出現過純粹以基督教立國的政體；而在歐洲，經過馬丁·路德的宗教革命以後，「耶穌放諸四海皆準的倫理道德」已經被「道德與政體的國家體制取而代之了」。伊斯蘭教中，無論如何都不會出現一個馬丁·路德來造反，因為伊斯蘭教沒有像基督教的教堂神職令人反感，讓穆斯林反彈到揭竿而起的地步。同時，我們還要考慮到，「正如《可蘭經》中所揭示的，穆聖先知本身宗教歷程的本質……那是從個人親身經歷中，創造出一種社會秩序。」

接受伊斯蘭教，也就是接受某種「法定觀念」。這些觀念——雖說源自個人接受天啟，卻不可為理性所蔑視——都具備了「重要的公民意義」。「職是之故，伊斯蘭教的宗教理想，正與其創發的社會秩序息息相關，環環相扣。排斥其中一端，終將導致排斥另一端。因此，穆斯林作夢也無法理解，世人怎能依照民族血統建立不同政體，如果這意味著揚棄伊斯蘭的團結教義，這根本就是完全不可思議的事情。」

其實，伊克巴爾不過是以非常哲學的方式說明，倘若印度大陸不分裂的話，伊斯蘭教於此地的廢棄就岌岌可危了，這個宗教總有一天也會走上基督教在歐洲的路子，政教分離，大權旁落，榮寵不再。穆斯林倘若堅誠自己對伊斯蘭教的正信，穆斯林政體就不可或缺，需要建立一個穆斯林國家。此外，伊克巴爾更大力倡言，印度裔穆斯林尤其需要這樣一個穆斯林國家，因為，「或許世上只有印度這樣一個國家，群策群力之下，其伊斯蘭教發展運作得最完善。」而伊克巴爾的解決之道也很簡單：印度西北部居民大多數為穆斯林，應該分離於印度大陸之外，獨立成為一個單一穆斯林國家。

十七年之後（也是伊克巴爾辭世九年後），獨立美夢終於成真——除了居民多為穆斯林的西北部之外，還加上遠在千里之外、居民多數亦為穆斯林的孟加拉省東部。可是穆斯林獨立建國之際，引發雙方邊界上的血腥浩劫，數百萬人慘遭屠戮，還有好幾百萬人被迫遷徙。而只有在稍後，事態才逐漸明朗，原來這個巴基斯坦建國計畫，表面上看來合乎邏輯，符合穆斯林的需要，卻隱含著一個極為簡單、可是卻要命透頂的缺陷。

只有那些感到自身遭受莫大威脅的穆斯林，才會激發出最為強烈的穆斯林熱情，而這些穆斯林卻一直滯留在次大陸上當印度人。他們不但沒有全數移民到巴基斯坦，動身走人的穆斯林連一半、甚至四分之一都沒有。成立最久、經驗最為豐富的穆斯林政治組織持續扎根在印度，無意遷至巴基斯坦老店新開。印度籍的穆斯林政客，極力鼓吹巴基斯坦獨立的積極人士，只要去了巴基斯坦，一夜之間頓時流失選民。他們的訴求與聲譽都逐日萎縮，人生不再具有崇高的意義；而巴基斯坦在獨立後，成為一個令他們感到陌生的國家，他們也不敢在這裡輕試選戰的洗禮。政治生涯既然無法在新國度發展，機關與政府依舊肅規曹隨，大抵遵循英國人留下來的那一套。

巴基斯坦國內開始使用一個特殊字眼——莫哈吉爾（Mohajir），外國人，專指從印度遷徙入境的移民。尤其是在信德省地區，喀拉蚩已經變成一個莫哈吉爾城市了，地方憎惡逐漸堆積為分離主義情結。

這個新國家中，只有武裝部隊興隆發達。剛開始，外界將軍方視為伊斯蘭國家的捍衛者，接著為可能的擴張者。然後，大家逐漸明白，他們是這個國家裡唯一稍有組織的團隊。他們開始當家做主，國家

2 穆罕默德·伊克巴爾（Muhammad Iqbal）：伊斯蘭教哲學家、詩人、社會活動家。生於印度。一九〇五年在英國牛津大學研究哲學，後又在德國慕尼黑黑大學研究波斯神秘主義，取得博士學位。一九〇八年在拉合爾擔任教授、律師，並從事詩歌創作，在穆斯林知識分子中有很高的威信。一九三〇年被選為全印穆斯林聯盟主席。翌年出席在倫敦召開的英印談判圓桌會議。他用波斯語和英語寫過大量的詩歌和哲學著作。其哲學的代表作是《伊斯蘭宗教思想的重建》。他的思想深獲印巴兩地廣大的穆斯林尊敬，巴基斯坦亦設置了伊克巴爾研究院和伊克巴爾大學，出版了很多關於研究伊克巴爾思想的著作。

之中，自成一國。武裝部隊主要根據地在西北部，夾帶著西北地方特有的文化偏見，他們隨即逼迫東巴基斯坦進一步分離為孟加拉。巴基斯坦何其有幸，終於產生了一位全國性的領袖布托先生，他出身信德省，也是該國第一位本土化的領袖，局勢看來似乎如此。布托是個民粹主義者，他極權統馭巴基斯坦將近六年。之後，他遭到軍方推翻，並處以絞刑，再度撕裂這個早已苦於地方軍頭割據的國家。

禍不單行，劫難相連。孟加拉的穆斯林成立了孟加拉共和國，西巴基斯坦居民牢牢掌握著巴基斯坦，比哈爾邦的穆斯林則一無所有。這些人從印度東部的比哈爾邦移民到巴基斯坦共和國的孟加拉省，可是，他們在語言與文化上都比較接近西部的穆斯林。孟加拉獨立之後，新的共和國不要他們，巴基斯坦也無意伸出援手收容他們，他們淪為失落的一群，被他們建立穆斯林政體的美夢遺忘在地獄邊緣。

巴基斯坦整個國家都不斷地枯萎，信仰卻日異茁壯。任何挫敗只會導回加強信仰的舊路子。這個國家建國初衷原本就是為了獨立為穆斯林的祖國。祖國如果一敗塗地，絕對不會是因為這個夢本身就有一點，或是信仰本身有所不足之處；問題只會出在人民信心不足，辜負了正信而已。接著，就有人登高一呼，提出再度淨化信仰的要求。而在追求伊斯蘭之絕對價值的過程中——建立一個純屬信徒的社會，人民進退行止完全合乎宗教禮拜的直覺——國民因此無法擴展視野，看不出祖國建國的政治起點為何。他們忘卻了，巴基斯坦國父真納先生的俗世企圖，而他（措詞未若伊克巴爾那般富於哲思與文謔譎）不過想要搞一個地方來讓穆斯林身邊不會擠滿了成群的非穆斯林而窮於應付。建國之後，就連伊克巴爾也被拋諸腦後。巴基斯坦開始大言不慚地自誇自道：獨立建國是為了在人間開闢一片淨土；巴基斯坦是自先知及其左右追隨者以降，第一個真正以伊斯蘭教立國的國家。

就在我即將結束造訪巴基斯坦的行程之前，遇到一個中年男人，他身為國家公僕，公餘寫詩自娛。他將我找了出來，主要是為了送我一本他寫的書。可是他滿心關注的，都是眼前國家的情勢，而無絲毫賦詩作對的靈感。他開口閉口談的都是巴基斯坦，滿腔怨怒，偏偏又抓不到出氣的重點，惱得他幾乎淚

沾雙頰。

「我小時候是在印度長大的，」他說：「當我聽說我們終於有了巴基斯坦，我無法跟你形容我心中如何百感交集。巴基斯坦獨立建國成功，對我來說就像真主降臨一樣。」

可是建國成功之日，不正也是一連串挫敗伊始之際嗎？倘若當初巴基斯坦建國只被視為一項政治上的成就，革命尚未成功，尤須日後逐步累積建設，而不被看做信仰上的空前勝利，宣布獨立之時，就已經功業完備了，現下的局勢會不會就好得多了呢？難道這不就是伊克巴爾演講中的大漏洞嗎？伊克巴爾在演講即將結束之時，說道：「過去，我從穆斯林的歷史中學到一個教訓，」他接著又說：「穆斯林歷史中，每每在面臨存亡關頭，總是伊斯蘭教挽救了穆斯林，而非穆斯林維繫伊斯蘭教於不墜。」倘若穆斯林略加收斂對於救命宗教的盲信，坐下來面對現實，腳踏實地，圖謀救亡振衰之道，眼前的局面會不會就好多了呢？難道這不是人類文明演變的不滅根基：從高唱道德倫常的理想狀況，落實到建立社會法制與體系嗎？

那詩人對我無法苟同。穆斯林政體自然而然應當從信仰中浮升而出。只要堅定信念，篤信巴基斯坦就是真主，國家就會步上軌道，蒸蒸日上。

那麼，又是哪裡出了岔子呢？

他說，人性本惡。信徒沒有依照正信規範來過日子。

在巴基斯坦，不管你講什麼，歸根結柢總是諸如此類的一句老話。

伊斯蘭政府治下

某個午后，將近黃昏之時，喀拉蚩以東一百哩以外，信德省內部一座灰沙撲撲的小村莊裡，我跟一

所神學院裡的毛拉納³，意即教師，晤談了一會兒。那是一所頗為知名的神學院，但不知道為了什麼，這所學校在布托先生執政期間就一蹶不振，任其荒廢了。

校舍是由日曬風乾的磚塊砌成的，頹圮破敗，乍看像個村莊建築，像是一堵農舍。此地毫無科姆的恢弘氣派，沒有角鋼書桌，沒有現代化的電話機，也沒有樓面鋪就地毯的屋舍。訪客招待所不過是一間圍著土牆的單人小屋，牆內還有一處庭院，一牆一簷都是用日曬泥磚堆成的，還砌得參差不齊，一磚一瓦都將回歸塵土。客房天花板上裝有一具風扇，房內三張吊床，寢具收束捲在一側，牆壁上凹進一角，擱進三層櫃子；就這樣了，除此之外，屋內一無長物。鋪磚地板上空空如也。潦草裝設的窗戶和前後兩扇門，兀自敞開著迎接灰塵。我們就在離印度河不遠處，水面下的伏流透過河床滲流而出，滋養了田野雜樹，可是舉目所見一草一木似乎都是頂著塵土發芽生長。

那位毛拉納的宿舍要比招待所嚴密避塵一些，卻也同樣乏善可陳。他原本大刺刺地躺在他的吊床上，見到我才坐起身來跟我談話。他裹著頭巾，滿面于思，垂垂老矣，卻還矍鑠有神，而且講話犀利，不求溫柔敦厚。當時夕陽西下，房中已經暗暗無光了，點上一盞燈光非常微弱的燈泡之後，只將屋內照得更加幽暗。毛拉納置身於灰塵與其農家擺設之中，卻因為宗教熱情的鼓舞而異常活躍，其熱切有如心懷不共戴天之仇一般：發揚正信的熱情隨即衍伸變化，其實這種熱情也極易於操縱演變，擔憂伊斯蘭教四面楚歌的險境，我們必須發動聖戰、征討敵對奸孽的邪念等等。

他要我談談自己以及我的伊斯蘭之旅。我跟他說，我剛剛去過伊朗。

他說：「何梅尼是個好人。他非常伊斯蘭。」

「你為什麼會這麼說呢？」我原本還以為，以他如此自奉正統，言語間又如此凶猛好鬥，應該不會認可何梅尼的什葉派伊斯蘭信仰，並斥之為偏離正道。

他說：「何梅尼下令禁止女人在電視上拋頭露面。」

自從伊朗革命之後，那就是他僅知的伊朗現況了。

他說：「我們這裡還沒出現真正的伊斯蘭政府。」

他怎麼能這麼講呢？巴基斯坦政府已經規定公務員每天定時中斷公務，以便進行禮拜了。政府也依照《可蘭經》經文規範，立法通過鞭刑，以及擲石致死的死刑。現在有關單位還在探討，是否應開徵一項《可蘭經》稅，以籌款賑濟貧民，作為佈施。巴基斯坦總統才剛剛去過麥加朝聖。這個毛拉納還覺得巴基斯坦政府施政有何不足之處嗎？

他說：「他們還沒廢止銀行裡的利率政策。」先知當年曾經明言高利貸為非法行徑，因此，靠著利差營運的銀行系統有違伊斯蘭教義。

那麼，他心目中理想的銀行體系又該是什麼樣子呢？而依他之見，國家財政又該如何經營呢？

他不曉得。他從來也沒想過這個問題。可是這不干他的事，他一點也不在乎。他說：「只要巴基斯坦人都依照伊斯蘭教誨去賺錢，一切就水到渠成了。」如此想法令他沾沾自喜——他任教的學院裡，邏輯是一定要教的，而他放慢語調，再三重複。

他也算得上半個政治人物，在當地還有一些影響力；而在他對政府諸多批評中，不消多疑，其中當然也夾帶了不少個人私怨與不滿。可是你也不能說他曲詭無誠，畢竟，他言行思維率無踰矩之處。他的世界已經縮水到現在這幢坐落在頹圮村落裡的小屋之內，一旦舉國上下尊崇正信，即使就連這棟小屋也要傾頹坍塌，他也早就做好心理準備了。

離這裡幾哩遠的地方，就著即將四合的暮色，村農在一片犁過的田地上，放狗出來逗弄著一隻熊。主人抱著汪汪吠叫著的狗兒，頸上繫著鐵鍊的黑熊，匍匐在犁開的土地上，四處聞嗅，唾液垂涎。主人

3 毛拉納 (Maulana)：巴基斯坦、印度等國對於波斯語和阿拉伯語學者的稱號。

將狗施放到田野上，一共四隻。牠們四下跳躍，狠狠咬住黑熊，拚命撕扯，圍觀群眾高聲叫好。可是熊掌力大，摧枯拉朽易如反掌。黑熊使勁兒自衛，群眾再度嘩然；此後，只要黑熊就地打滾，每滾上一回，群眾就叫好一次。然後，那熊仗著脊骨靈活，田地上坐正了，又撲通前傾，逐步擠壓那兩隻先前被牠擊退、後來又被牠困住的狗兒，牠先一屁股坐在一隻狗兒身上，再度前撲，擠死另外一隻。枉死的狗兒從熊兒棕黑夾雜的皮毛間探眼望出，眼神驟然間有股空白的溫和。被熊坐在屁股下面的狗兒，背脊顯然已經寸斷。此時，狗主下場解救另外兩隻還一息尚存的狗兒，兩犬嘴裡還牢牢咬著先前牠們唾進犬齒的熊身不放。

這場熊狗相爭為時不過三分鐘，算是一種鄉野娛樂，而且就像他們的信仰一樣，同樣屬於往昔沙漠人家完整而古老的生活。

一覽喀拉蚩

英國人進入信德省稍晚，一直到一八四三年，才在距離方才熊狗大戰不遠處爆發小規模戰鬥，接著，信德就在英方統治下過了大約一百年。信德省原住民建立的城鎮退居內陸，棲踞在印度河畔。一八四三年之際，喀拉蚩不過是海岸邊上一個漁村而已。一九四七年，英軍撤退之後，喀拉蚩已經是一個現代化的港口，也是新成立的巴基斯坦穆斯林國家西半部的主要城市。當時喀拉蚩人口總計三十萬，其中三分之一為印度教徒，或是非穆斯林居民，而他們奉令都得出境；然而，邊界另一邊還有數以萬計的印度裔穆斯林等著移民入境。而今，建國三十餘年之後，經過印度裔穆斯林大舉遷入，以及巴基斯坦境內各地不斷湧進的人潮，喀拉蚩人口已經成長到五、六百萬之譜——誰也不曉得真正的數字為何。

我曾經在一九六二年短促地瞥見過喀拉蚩，而在我的印象中，喀拉蚩像盞走馬燈一樣幻化不定。當時我的目的地是印度，我祖上慎終追遠的發源處，那也是我第一次回訪祖國，行程上盡量輕簡。我從亞歷山卓一路搭乘貨船到孟買，沿途曾經停靠在喀拉蚩的港口。

喀拉蚩碼頭上竟然看得到非洲人，實在出乎我意料之外。經過一八四三年英屬殖民地合併之後，奴隸的後裔就恢復自由身了，他們遂流入市井之間，或長或短地，就在這裡待了下來。碼頭上還站著一輛駱駝拉的馬車，也讓我大開眼界，馬車車架得高高的，再沿著斜角搭下來。還有一家旅館雇了兩個侏儒，穿著白色的制服，頭上裹著綠色的頭巾，站在門口迎賓。

非洲人、駱駝馬車、頂戴著綠色頭巾的侏儒，全都是不可信賴的殘餘印象。反而比較接近神經質的暗示，我因為初次親履這塊次大陸而焦慮膽顫，每每見到英國殖民統治的殘跡（殘留在建築物與各式名稱之上），隨即產生的困惑不快，神經焦慮伴同抑鬱不樂，再加上燠熱潮濕，將我的體能狀況逼到某個瀕危極端，接著不到兩個小時，我就寧可躲回船上納涼休息了。

而今，漂浮縈繞的記憶重新對焦，結果，記憶竟然毫無差池。喀拉蚩碼頭上的確有非洲人擔任碼頭工人。主要道路上雖然機動車輛來往不停，此地確實也還保留著駱駝馬車。駱駝高高地昂著瘦長的面頰，闊步走在路上。牠們不停開合換氣的大嘴，還有渾圓而裂蹄深陷的大腳，俐落簡潔地踩著步子，每隻駱駝看起來都像是凱旋歸國一般，顧盼自雄，就好像面帶微笑的運動員將挺胸湊近終點線一樣。

街上不光只有駱駝，還有驢子，牠們倒被我忘了個乾淨。雖說我從來沒見過這麼嬌小的驢子，同樣步履輕快而容易親近，如此嬌小，再加上想像力逗趣，印象中，牠們還要再小上一號，個子就跟愛爾蘭長毛獵犬一樣，性情也如出一轍——幾乎如出一轍啦。這些驢子的臀部與後腿被韁繩磨得發黑，也像狗の後半身一樣苗條；驢腿則纖細瘦長。驢子得以閒在一旁休息時，就靜靜地站在一旁，兩兩成雙，站在寸草不生的地上；而在牠們親愛討喜地快步疾行一陣子之後，各個面容看起來好像很傷感，倘若友伴解散的話，落單的小驢子看起來就更悲哀了。

而大都會飯店確實也雇用過侏儒門房。他們現在已經不那麼顯而易見了，可是這並不意味著他們遭遇了什麼不測，他們（根據人家告訴我的）已經轉入室內工作而已。大都會大飯店所在的俱樂部路上，人來人往比一九六二年時還要熙熙攘攘，兩名侏儒也不復當年青春，時間也在大都會大飯店留下滄桑的痕跡。這家飯店不再是喀拉蚩首屈一指的觀光旅館，洲際大飯店已經後來居上了。而許多其他新時代的飯店——喜來登、凱悅（即使歷經伊朗動盪，還是不遺餘力地開發伊斯蘭市場），以及假日飯店等等，都如雨後春筍般紛紛竄起。

我一心想要一覽這個人口高達五百萬的都市，可是，計程車服務中心派給我的這個男孩，或是說年輕男人吧，卻另有打算。他想帶我去見識一下喀拉蚩市區以外十七哩的裘坎迪陵墓⁴；那我當然有必要嚴詞拒絕了。

這個司機個頭矮小，面如滿月，神態任性，又近乎匪類。他穿著一件深藍灰色外套，寬鬆的棉質長褲，搭著一件拖長著下擺的襯衫。他給我一種居心叵測、意圖不軌的印象，像個較學生，鄉氣可掬，偏偏沾染著都市的虛榮。可是他言談之間的作風又無可挑剔。

我說：「我想你還是個學生吧？」

他喜歡這一套。他說：「我的故事太悲哀了。因為過去太傷感，我就不跟你多說。我會帶著你參觀喀拉蚩的。」接著他嘆了一口氣。

我們沒走多遠，他就將車子停在英國人建設的舊城區裡一條美侖美奐的住宅街道上。我們車子對面是一長條住宅圍牆，牆垣上還圍起一條帶刺鐵絲。

那司機頹然伏身在駕駛盤上，像個驟然感到疲倦難堪的人一樣，嘴裡說道：「這裡就是布托先生的房子。」

要是早知道，這裡我寧可避而不見。這棟房子的一家之主，四個月前才剛執行絞刑處死，他的太太和女兒還住在這裡。可是正如我業已體會到的，要在巴基斯坦避開對於布托先生的追慕與嚮往，那可不容易。布托漫長的牢災期間每況愈下的監禁條件，他從容赴死的雍容神情，以及政敵恨之欲其死的激烈手段，在在令巴基斯坦人動容。處決布托一事，早已超脫政治領域，而今已經蛻變得像是一樁聖人或是殉教烈士傳奇，而且還是一段穆斯林傳奇，混雜了虔誠的信仰、義憤，還有復仇的寓意。

司機告訴我，布托下獄暫居在拉合爾之時，他們將他關進一間小牢房裡，每天不分晨昏，熱辣辣的陽光總是斜射進來棲遲不去。他跟他們要一杯煮過的開水飲用，結果他們用熱水瓶送進一罐滾水，一直要耗到初晚，開水才涼到可以讓他入口的溫度。他日子過得儉約，每天只吃一餐沒發酵過的麵包；可是他每天都要在一同入獄的難友身上花個兩千盧比，折合兩百美元。他自己動手洗衣服，你要知道這個人過去可是標準的絨褲阿舍啊。而隨著他的監禁條件逐步惡化，他吃的食物品質也每況愈下。

當他被移監到拉瓦平第（Rawalpindi）的時候——後來，他就是在那裡被絞刑處死的——獄方得不時更換看守他的獄卒，因為獄卒一跟布托先生熟稔之後，馬上就過於同情他的際遇。後來他們還是找到了一個敢對這個業已遭到罷黜的人粗聲粗氣的獄卒。「你分明就再沒幾個日子好活了，幹嘛還要看什麼《時代》啊，《新聞周刊》的？」他即將赴死之際，全身已經瘦到只剩下三十六公斤了。當他們過來要將絞刑刑人服裝套在他身上時，他說：「我只要穿我自己的衣服就好。假如你們之中有人要把那套絞刑服裝套在我身上，就讓他試試看吧。」某一則故事中，他是自己走向絞架台的。當時他兩隻手還被銬在

4 裘坎迪陵墓（Chaukandi）：一支源自印度北部拉吉普特（Rajput）當地部落的薩滿斯（Sannas）族人，於十四世紀中葉改宗

伊斯蘭教，隨即成為信德一霸，薩滿王朝隨著歷史衰落，但是他們的陵墓卻保留了下來。薩滿斯人的傳統墓碑，總是切割為精準的四角方形石碑，「裘坎迪」意即「四角」。

一起，他要人幫他解開手銬。他說：「手腕磨得疼啊。」另外一則故事裡，他是給獄方用擔架抬到絞架台上的。第三個故事則說，他是在牢房裡被人暗殺的：獄中一名囚犯大清早就被搖醒，獄卒要他去清洗一具剛剛絞死的屍體，他匆匆趕到牢房去，就看見布托先生已經斷氣多時了，渾身冰冷僵硬，身上的衣服還得用撕的才脫得下來。這紛紛耘耘的傳說，不過是四個月以前的事情。

那司機不再趴在方向盤上，說道：「我會帶你整個喀拉蚩走透透的。」

我們開車到海邊，防波堤海風習習，泥質海灣邊一帶反映著陽光的平緩海灘，海灣遠端矗立著一棟嶄新的公寓建築：經濟停滯期間顯現的金錢力量，喀拉蚩近年來曇花一現的房地產熱潮。司機說：「現在流行的是公寓，平房沒人蓋了。」

沙灘上有幾個攤子販售玩具與紀念品。我想到民生問題，於是問他：「你過齋月也封齋嗎？」

「不。我跟真主發脾氣。你是穆斯林嗎？」

「不。」

「那些穆斯林壞透了。他們撒了太多的謊。穆斯林撒了太多太多的謊了。這個故事太悲哀了。我不會告訴你的。」

我們沿著海岸線又往前開了一段距離，他指著路的盡頭一幢高大的建築要我端詳，建築外牆嵌上大理石石板。「你猜猜看那是什麼建築。你猜猜看，再跟我說。」

我說：「那不是一間大飯店嗎？」

「那是一家賭場，是布托先生執政期間蓋的。」

建築物顯然尚未完工，旁邊一堵混凝土框架工程也停擺了。

「那是員工宿舍，也是布托先生時期蓋的。現在已經沒有賭場了。不能賭錢，不能賭馬。這個政府真是爛透了，他們『什麼事情』都要反對。」

我們又開到另外一個住宅區，有寬廣的廣場、花園、高楣寬敞的混凝土住宅。「有錢人都住在這裡。外國人、阿拉伯人。有些巴基斯坦人也住在這裡。那棟房子是阿杜達比親王的房子。」那是棟大房子，占地遼闊，周圍圍起高牆保全。「房子裡有五百個傭人。一整年下來，這個房子只會用上一個月。阿杜達比親王一年才到巴基斯坦待上一個月打鳥。那種鳥，巴基斯坦太多了。現在，我再帶你看我家的房子。」

「你也住在這裡？」

「我會帶你看我家的房子。我跟你說過，我的故事太悲慘了。」

開過幾條街以後，這裡的住宅占地面積就縮小多了，我們停在一棟房子前面。我們被隔在圍牆外面，只能看到上層的樓房。司機按了按喇叭。無人應答。他要我稍候一下，自己從駕駛座上下車，拉開嗓門吼了起來。他一手推開大門，一幢裝飾過度的混凝土房子隨即映入眼簾，這房子其實沒有看起來虛張聲勢地高大。沒有人從屋子裡出來應答。不過房子圍牆對面街上一棟樓房深處，在綠意盎然的花園裡，有個傭人探頭出來。那個傭人跟司機兩人熟稔地用烏爾都語聊了起來。

司機回到車裡，信口說道：「房子裡一個人也沒有。總統被帶走了。總統都走了。」

「誰把他們帶走的？」

「政府啊。還會有誰？我父親過去是跟舊政府的。」

真的嗎？布托先生當政期間，有一項令人詬病的罪狀就是他摧毀了巴基斯坦的社會平衡，他引進了一群下層流氓無賴，任他們作威作福。難道這位司機的父親也曾經跟著布托雞犬升天過？這棟房子雖然也坐落在高價地段，房屋本身卻不顯眼，建築物現況當然不若當年恢弘氣派，尤其是看在起造屋主的眼中。那司機對這棟房子知之甚詳，他也認識對街人家的傭人。他的父親碰到了什麼遭遇？司機說，現在照顧他老母親、兩個姊妹及一個弟弟的重擔，全都落在他一個人的肩膀上了。他只得輟學，改行開車。這計程車也不是他的。計程車公司的經理一個月給他三百五十盧比，就這樣了。

然而，跟我講過他的傷心往事，又向我證明了他昔日闊綽富裕的家當之後，他臉上也不會顯得非常不快樂。他帶我去參觀一所現代化的清真寺，寺廟上方還頂著一尊巨大的混凝土穹頂（「一根柱子也沒有，」他與有榮焉地說明），旁邊還有座塔樓，形狀像是教堂的尖塔。他帶著我參觀巴基斯坦建國者真納先生的墓碑，然後又跟我講了個與這位領袖有關的悲慘故事（又是一段令人神傷的故事），巴基斯坦剛剛成立不到三個月，建國領袖隨即謝世。司機說，假使真納先生還活著，今天巴基斯坦的情勢就不會這麼不堪了。

故事叫人低迴，墓碑卻讓人印象良深；司機非常中意。他喜歡喀拉蚩市內新穎高大的建築，他喜歡現代的風格。他跟我說，巴基斯坦的建築師是全世界最優秀的。阿拉伯人總是巴望著聘請他們過去，替他們蓋清真寺。

「我們是巴基斯坦的穆斯林。穆斯林們最愛真主。我愛真主。」

「可是先前你還對我說，你跟真主生氣。」

「生氣，沒錯。可是真主就是真主。真主跟人不一樣。現在，我要帶你看看真正的巴基斯坦。」

我們隨著繁忙的車流，開進喀拉蚩舊的商業區。速克達機車呼嘯而去，陣陣廢氣在燥熱的空中帶起一抹灰棕色澤。

我說：「你父親以前是做什麼的？」

他佯裝聽不懂我的問題。

「他是個公務員嗎？」

「我跟你說過啦，他是跟舊政府一道兒的。」

他把這種情況講得跟一份正職一樣。可是他言盡於此，不願再多說，而我始終無法探知，究竟他父親也曾經從政，抑或只是在因緣際會之間，隨著布托先生平步青雲，享受過一陣子榮華富貴。

他將車停在一個香水專賣店前面，買了一瓶香水和指甲花油送給他的妹妹，祝賀齋月結束的節慶。指甲花油是用來染紅妹妹的手掌，也是為了慶祝節慶的禮物，這也是這個長子善盡家庭責任的一面，雖說他也被姊妹與母親寵愛到任性無羈的程度。他告訴我，那是喀拉蚩市內唯一可以買到這些奢侈品的店舖。他在店裡盤桓了好長一段時間，他跟店員、老闆似乎都熟。

街上穿著信德地區工作日傳統服裝的非洲人，讓街景平添幾許天方夜譚的氣氛，街道建築風格奢華奇麗，洋溢「東方」色彩。其實，街道兩旁建物不過是結構簡單的混凝土建築而已，集合而成喀拉蚩的市集，「看看真正的巴基斯坦」，可是，市集樓面都裝飾得令人目眩神迷：鐵欄杆圍起的露台、薩拉森式的拱門、科林斯式或多利斯式的梁柱、哥德式或是仿哥德式的窗戶等等。所有可能出現在英國統治末期的建築風格，全都一股腦兒地湧現在這裡，讓人眼睛為之一亮，彷彿走進一年一度的各式建築慶典，絕對不容許遺珠之憾。沒多久，我就發現了這條街上的哥德式窗框，乍看是挺令人迷惑的，不知其靈感源自何處。原來，不遠之處，就在喀拉蚩商業區中段，矗立著一座英方興建的維多利亞時期哥德式紀念館，名稱就叫做「彌爾衛德塔」。這座塔蓋來是要做什麼用的？

司機說：「塔就是塔嘛，就像巴黎那座塔一樣嘛。」

接著，他帶我到碼頭附近由官方經營的接待中心，讓我看看那些準備前往麥加朝聖的穆斯林旅客。接待中心裡整齊清潔的可比軍營，耄耋高齡的老人家來來回回地走在清掃得一塵不染的長廊上，讓我聯想起舞台上，人工布景前方衣著裝扮光鮮體面的各個角色。這些老人來自巴基斯坦各個省分，各自穿著家鄉特有的傳統服飾：旁遮普、俾路支（頭巾樣式與前者略有別）、信德省（頭上戴著扁平小帽），還有來自阿富汗前線的帕坦人等，他們臉上的表情皆平靜而滿足。就這些人而言，不管外面發生什麼事情，現在又是誰在當家做主，天堂終於伸手可及了。

司機又說了：「要不是我們看起來都像巴基斯坦人，本來是不准進去的。假若你是美國人，我就

不會帶你過來參觀了。」

就如同這些進香客一樣，我的司機也從熱情轉為平靜。在我們參訪過清真寺、真納先生令人難忘的白色墓碑，以及朝聖接待中心之後，他的宗教情懷爬升到完全相反的曲線高峰。一開始，他對真主有怨，表現得像個不動於心的穆斯林；現在，他又恢復得像個道地的穆斯林一樣，充滿法喜而無憂無慮。不過，他的悲慘故事還是揮之不去，而我心中也不無疑問。可是實情可能就是這麼一回事，稍後我也相信他的故事大致上不是假的。我相信，他的父親曾在布托先生執政時期快速竄升過，晉升到可以在某個阿拉伯親王別墅旁邊置產，跟皇親國戚當鄰居，可是隨著布托先生下野，他所有家當也都付諸流水，自己也身陷囹圄或是流放遠方。好一齣貧農崛起的戲碼，布托先生的悲慘歷程中稍微穿插一些變化，穆斯林政體中一段匪類從政的插曲。實際上，樓起樓垮之中，唯一的教訓（也是永恆的慰藉）就在於掌握信仰。

靠人力輸出的經濟

「現在，我要帶你看看真正的巴基斯坦」，這話說得妙，四兩撥千金地迴避了歷史上許多難堪的場面。一九四七年以前，此地並無所謂的巴基斯坦，只有隸屬印度治下的信德省與一座英國人建設的城市喀拉蚩。殖民地的過去依舊殘存在建築物和地名之上：俱樂部路、蕭瑟小屋路、克里夫頓、麥克尼爾路、日德蘭半島運輸公司、雅各運輸公司、阿比西尼亞運輸公司、克雷登公寓、內皮爾兵營、軍人市集等等。地方名稱中，還可以找到純粹的印度遺跡：坦米爾人區、藍斯瓦密、達達坡伊努若吉路。莫提拉尼赫魯已經從某路段名稱中除名了，可是這附近還是保留了一座「甘地花園」。

而就在某個下午，我從洲際大飯店沿著一條兩哩長的路，信步走過一塊紅樹林沼澤新生地，走到齊納溪與內皮爾堤防橋，出人意外地，就在溪畔，緊挨著橋邊，新的碼頭建築工事之間，我竟然在一堵牆上看到一塊紀念橫匾，上面還寫了幾個印度教的名字。

這堵牆建於一九四三年——早在巴基斯坦建國元年前四年，橫在一處印度浸浴河壇、浴洗河階之前，出資興建的則是印度教慈善浸浴河壇協會。牆壁兩側挖空，裝上兩扇木頭門，門上依舊保留了舊日的說明指示：「此門專為印度教婦女入口，此門專為印度教男士入口。」一扇門上雕了尊大象用兩隻後腿立起的紋章，另一扇門上則雕了幾頭祥瑞的天鵝。

浸浴河階至今猶在，站在內皮爾堤防橋上就約略可以窺見（雖說婦女浴場四周還是用混凝土牆圍了起來），河階較低處已經被港灣油膩的廢水染黑了。比較高的台階上還擺著幾張石椅。這一邊面向水波以及齊納溪對面紅樹林的牆壁上，被人漆上明亮的綠色；蒙兀兒帝國風格的穹頂上棲著幾隻鴿子。內皮爾堤防橋體上還有一塊石頭，記載著此橋完工於一八六四年，一旁還鑄上當年英籍工程師的大名。

一個年紀在十二歲上下的男孩跑到橋上來跟我說話。他已經在一旁觀察我一陣子了。他對著遠處骯髒的浴場河壇點點頭說：「穆斯林不可以去那裡。印度教徒可以去。波斯人、英國人都可以。可是穆斯林不准去。」對他而言，這道禁令是浴場河壇上最重要的一環。他是個印度教徒，過去信德印度教民滯留在巴基斯坦的後裔，可是他對這段歷史毫無芥蒂（一個星期左右，我還會在飯店裡一場穆斯林婚禮的婚宴上見到他）。

這一處河浴場地不巧就擋在新的碼頭建築區內。後來我還遇到出面干預工事單位、反對拆遷這所浴

5 《蕭瑟小屋》(Bleak House)：英國文豪狄更斯著於一八五二至一八五三年間的知名小說。

6 內皮爾(Sir Charles James Napier)：英國將軍，一七八二～一八五三，曾參加半島戰爭與一八一二年的美英戰爭；一八四三年至一八四七年間曾任信德總督；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四九年間擔任英軍總司令，指揮第二次錫克戰爭。

場的人。他說，這處河浴早就算不上是真正的浸浴河壇了，那裡只剩下兩個維護清潔的員工，而他們也早已將這裡當作自己的家了。有人曾經提議在浴場的穹頂上加裝霓虹燈，招徠顧客，增加營收，以提供浴場維護的費用；可是出面拯救這所浴場的人認為，還是讓這個地方維持原狀就好，繼續任憑港口污染的河水不斷淘洗，自生自滅。

印度教徒幾乎都已經消失了。可是，那也是陳年往事了。印度教民離去之後，還發生過更大規模的驅逐行動。喀拉蚩湧進數百萬的移民，已經變成一個徹底的巴基斯坦都市了，已經不再只是信德省的重要都市。信德省容納了大批來自印度的穆斯林，而信德當地於巴基斯坦境內所建立的穆斯林政體，並不能抹去信德人心中的委屈，他們自覺家鄉遭人入侵，有如再度遭到殖民統治，他們的語言與土地都飽受威脅。而今，為了反制信德人甚囂塵上的分離呼聲，當局已經開始商議將喀拉蚩從信德省分離出來，規畫為聯邦管轄之下。

建立穆斯林祖國的美夢成真，卻也留下許多離奇的後果。其中最離奇的莫過於此：這個國家竟然被某些人當成真主本尊降臨，視為帶給虔誠的信徒最為完整的俗世報價，巴基斯坦主要不是運作在農產品外銷利潤上，也不倚賴國內二流或是次級工業的生產所得，這個國家主要還是靠著輸出國民維生。報紙上的廣告標題美言為「人力輸出」。

建立巴基斯坦成為純粹的穆斯林政體——猶如真主降臨人間——的理念，從未轉化落實過，從來不曾變為任何一個政治或是經濟組織。巴基斯坦——從海岸到喜馬拉雅山麓，上下一千哩幅員的國土，其經濟主要還是靠著小額匯款撐起來的。喀拉蚩的房地產榮景有一部分也是靠著巴基斯坦外勞的海外工作所得維繫住市場，「巴勞」遍布全球打工，合法或非法都大有人在。他們不僅越境到其他穆斯林國家、阿拉伯半島、波斯灣區各國、利比亞，甚至還遠赴加拿大和美國，以及許多歐洲國家。

這門生意倒是經過縝密的安排。就像是會計師研究稅法一樣，巴基斯坦的人力輸出專家也對全球各地的移民法規痛下工夫，針對各國不同限制，巧妙派遣巴基斯坦移民大軍分頭並進：觀光簽證的時效可以延長（大部分的歐洲國家）；撫養親屬可以隨同或申請入境（英國）；學生簽證可以轉換成一般簽證（美國與加拿大如此規定）；政治庇護只要申請就可以核准（奧地利與西柏林）；而就在北極圈下（芬蘭），巴基斯坦人入境仍不需簽證。每一班飛離巴基斯坦的飛機也擠得滿坑滿谷。對應如此龐大的出境人潮，喀拉蚩機場早經妥善規畫。有些人可以順利抵達彼國，有人則礙難入境，原機遣返。《黎明報》上的一則新聞，德人槍擊四名巴基斯坦人：非法入境。特稿還是發自土耳其——居民外移路線上的一個據點。然而這則人道槍擊（巴基斯坦男子一腿中彈）與官方破獲一整群非法巴勞移民的新聞，卻被報方擋了下來，延遲見報。

巴基斯坦移民一出國門，隨即投入民權組織的慈善救濟網中。不管飛機將他們載到哪裡，他們落地之後隨即尋求該國的法律保護。他們或是他們的代表，準確無誤地說出窮國與富國之間的差別，北方國家與南方國家之間的差距。他們高言聲討種族歧視之罪惡，竭力強調人類一家、兄弟友愛的精神。他們訴諸異國文明倡導的理想，卻在祖國揚棄嫌惡那些西方國家的美德。

可是從虔誠的信徒眼中看來，其中並無任何矛盾。家鄉就是家鄉，祖國跟外國不一樣；外人的普世價值觀點，講得再舌燦蓮花，也只是徒然如蜉蝣撼大樹。穆斯林政體就像是真主本尊，超然於俗世之外，歷代不斷淨化與夙夜匪懈地捍衛。誠如《德黑蘭時報》述及這一波伊斯蘭風潮之時有言：「伊朗與巴基斯坦經過改革與精進，以切合現代人衷心服膺神聖的《可蘭經》與遜奈⁷（古老的，正道），這兩個國家釐清了國政目標，虔誠攜手合作，必能向全世界證實，伊斯蘭教確實為一套完整的生活方式。」

7 遜奈 (Sunah)：即「聖行」，指穆罕默德創教過程中種種行為，及其所默認的弟子的行為，日後成為伊斯蘭教對這種行為的專稱。

二 喀拉蚩走馬幻影

巴基斯坦在穆斯林世界享有高度的聲譽。外界將該國奉為二十世紀的伊斯蘭先鋒，同時持續報導巴基斯坦一系列遵行伊斯蘭教義的「實驗」。報導中指出，巴基斯坦目前正在初步嘗試施行伊斯蘭律法，開徵《可蘭經》上明白規範的佈施稅，終有一日，這項稅則將足以支應全國的伊斯蘭福利制度；此外，巴基斯坦也將開辦不抽利息的銀行體系。

我想深入了解這種種實驗的內涵與進展。不過等我在喀拉蚩待上幾天以後，就明白體會到，光靠自己摸索，恐怕皮毛都沾不到，我一定得找人協助引導。《德黑蘭時報》上說過，巴基斯坦現在已經出現一家奉行伊斯蘭教義的銀行，「於偉大的巴基斯坦穆斯林學者毛拉納毛杜迪支援下成立。」可是我在喀拉蚩觸目所見，只見得哈碧銀行（Habib Bank）的綠色招牌。喀拉蚩市中心的哈碧銀行總行建築是一座混凝土高塔，風格直追紐約市摩天大樓的壯觀氣派；而且，哈碧銀行剛剛才在歐洲又開了一家分行，該行還在報紙上刊登分行開幕營業的慶賀廣告，自稱分行得以成立，「全憑阿拉賜福」。可是，哈碧可不是一家「實驗」銀行。

落實教義的具體行動

我需要協助，於是就去拜訪巴基斯坦政府新聞局官員迪恩先生。他的辦公室深藏在一座混凝土倉庫裡，這座倉庫又位於一處看來老舊的英軍兵營中。

走過一條寬敞的中央迴廊，推開一道類乎酒館專用的旋轉門，就到了迪恩先生的辦公室。腳下的棉質地毯破損不堪，紅白相間的圖案幾經日曬灰塵侵漬而嚴重褪色。辦公室牆上塗著赤赭色的水性塗料，一片片地剝落，猛然現露牆上的石灰；門窗的木工極為粗拙，窗框上還加裝菱形圖案的鐵窗以茲保護。有人正好騎著速克達機車從窗外疾馳而過，噪音揚起，足以撕裂耳膜，留下一陣淡藍色的廢氣雲霧。牆頂挖了兩個小窗，意在排出室內熱氣；天花板上，一具吊扇，扇葉費力地迴轉著，吊扇下一套政府配給的陳舊沙發組，我一坐下去才發現，沙發已經有點搖晃不穩了。想來這個政府也是小本經營，勉強度日啊。

迪恩先生覺得我的詢問委實有趣。他對我相當禮遇，之前還派了一輛公務小巴士——他管那輛小巴叫「四個輪子的玩意兒」——到旅館接我。可是他業務繁忙，那天早上他主要的心思都放在即將前往麥加朝聖的進香客身上——這檔子事經政府諭令，其重要性不可輕忽。此時，他正一一檢視前天才在碼頭上拍的官方攝影照片。顯然，其中幾張照片的效果令迪恩先生不甚滿意。而現在，伊斯蘭法庭、伊斯蘭銀行、伊斯蘭實驗？看起來，他也是丈二金剛摸不著腦袋。

難道說我看錯報紙了？

迪恩先生說道：「大家的確會談到這樣的事情，」他流露出疲憊的公務員臉上常見的倦怠神情，「可是成天嚷著這些議題的人，只會動嘴，卻巴望著別人動手。」

巴基斯坦國內確實有個伊斯蘭意識型態諮詢會，每個月定期召開十天的研討議程，不過他們開會地點在伊斯蘭馬巴德，那是首都，遠在北部。侷限在喀拉蚩地方，迪恩先生不曉得該怎麼幫我。他已經是坐五望六的人了，穿著一條灰色長褲、一件白襯衫，背後牆上掛著的那條條紋領帶，換個國家的話，還可能是某個俱樂部的制式領帶。

迪恩先生的同事薛汪尼先生走了進來。他個頭比較高大，肌肉也比迪恩先生鬆弛，皮膚光滑，身上穿著一件短袖運動衫。迪恩先生向他解釋過我所為何來之後，薛汪尼先生就猛盯著我端詳。他用烏爾都語跟迪恩先生說道：「可是他看起來好像庫塔布啊。我剛才走進你辦公室的時候，心裡還在納悶，『那可不是庫塔布嗎？』」迪恩先生經他點了這麼一下，又好奇地湊近我瞅著，再滿懷傷感地說，是啊，我看起來還真像庫塔布。他們告訴我，庫塔布是個巴基斯坦畫家。

薛汪尼先生說了：「您貴庚啊？」

我說：「今年四十七。」

「我四十八了。我還比你健康呢。不，你否認不了的。你兩眼無神。你那雙眼睛像一對老頭兒的眼睛，顯示你維他命不足啊。」

迪恩先生說：「他想要看看落實伊斯蘭教義的具體行動。」

我想，迪恩先生措詞十分高明。

薛汪尼先生應聲答道：「那他該去讀《可蘭經》。你可以看馬爾馬杜克·皮克塔爾¹的譯本，那是

¹ 馬爾馬杜克·皮克塔爾 (Marmaduke Pickthall)：生於一八七五年，原名威廉·皮克塔爾 (William Pickthall)。皮氏成長於盎格魯基督教神職人員家庭，及長後曾廣泛旅遊阿拉伯世界與土耳其各地，並於一九一七年宣布改宗伊斯蘭教，隨即成為英國穆斯林之領袖。一九二八年起，皮克塔爾以兩年的時間翻譯《可蘭經》經文，然而由於穆斯林學者素來堅持《可蘭經》係不可翻譯的，皮氏同樣也稱其譯本為「意譯本」。

最好的英文譯本了。」

迪恩先生說：「皮克塔爾恐怕是詮釋多於翻譯吧。」

薛汪尼先生進一步強調道：「你應該要了解《可蘭經》裡的哲學。」

我則緊緊抓住迪恩先生高明的言語，說道：「我想看看落實伊斯蘭教義的具體行動。」

薛汪尼先生又說了，許多人自稱是穆斯林，其實真正的穆斯林寥寥可數。伊斯蘭教是一套完整的生活規範，正因為如此，對許多人就難如登天了。我提到伊朗，薛汪尼先生隨即以父兄般的慈愛語氣，寬宏大量地說道，伊朗的什葉派信仰已經偏離了伊斯蘭教的正道。

有個男人帶著幾張照片進入辦公室。迪恩先生瞥了一眼，退出談話，一張張地查看那些照片，登時勃然大怒，語氣強烈地數落那個送照片進來的人。

薛汪尼先生絲毫不受到辦公桌一端的斥責喧鬧影響，窗外呼嘯而去的速克達機車也聽若無聞，問我個人有沒有信仰。我說沒有，而且意外地發現，他對我反而更加欣然相待。他說，沒有信仰意味著我心無偏見；這一點對於研究伊斯蘭教很重要，你不能先戴上有色眼鏡。

送照片進辦公室的男人轉身離開，迪恩先生也跟著他出去。

薛汪尼先生說：「像你這樣的一個人，我現在就先替你預告，你的伊斯蘭教調查大功告成之日，也就是你皈依為穆斯林的一天。」

迪恩先生回到辦公室，薛汪尼先生對他說：「我剛剛才跟他說，他會改宗伊斯蘭教，也會成為一個穆斯林。」

迪恩先生對著我微笑，英俊的臉龐仍然難掩對於公事的焦慮。接著他與薛汪尼先生商討，該怎麼協助我深入理解行動中的伊斯蘭。我連續聽他們提到「意識型態諮詢會議」好幾次。我深感歉意，覺得自己給他們兩位添麻煩了，拿著與公務無關的事情來浪費他們的時間。可是迪恩先生說：「你的事情有別

於平常本地記者向我們要求的協助。」就這樣，他們兩人繼續商討下去——他們該如何向一個旅客顯現伊斯蘭教的真義呢？

他們決定了，朝聖。明天早上另外一船朝聖客就要啟航前往吉達港，他們部門裡的同仁奉命前往採訪，我可以跟著他們去。薛汪尼先生以為這真是個再好不過的辦法了：除非我真的親眼目睹這些朝聖客，跟他們親身交談過，我永遠也無法了解他們信仰的深度。還有清真寺，他們又敲定了另外一個主意。當天晚上我就該上喀拉蚩的清真寺參觀一趟。薛汪尼先生說，擇期不如撞日，今天晚上就是最好的時機了，因為就在西元六一〇年齋月（Ramadan，即伊斯蘭曆的九月）的這一天晚上，穆聖先知首度於夢中接獲天啟：「今天晚上做的禮拜，勝過平日夜裡一千次禮拜。齋月在伊朗的什葉派信仰中，是個追悼默哀的月分，未獲認定為先知繼任人的什葉派英雄前仆後繼，壯烈殉教，天地變色，草木也為之含悲。對巴基斯坦的遜尼派穆斯林而言，齋月就沒那麼悲情了，這是個接獲天啟的月分，也是奠定這個宗教的月分。」

節目就這樣定了下來：今晚，先由薛汪尼先生帶著我往清真寺走一遭；明早，再到碼頭上親炙麥加朝聖團的進香客。

薛汪尼先生跟我說：「我要跟你講個故事。聽著：從前有個英國領主，他有兩個兒子。剛開始他們

2 天啟之夜就是「蓋德爾」夜，即伊斯蘭曆上的九月二十七日夜。阿拉伯語「蓋德爾」有「前定」或「尊貴」之意。根據《可蘭經》記載，阿拉說：「我在那高貴的夜間已降示它，你怎能知道那高貴的夜間是什麼？那高貴的夜間，勝過一千個月，眾天神和精神（哲白依勒天神），奉它們的主的命令，為一切事務而在那夜間降臨，那夜間全是平安的，直到黎明顯著的時候。」（第九十七章高貴（蓋德爾））因此，這一夜也是齋月裡最熱鬧、最融洽歡樂的一夜。穆斯林會隆重歡度，誦《可蘭經》、贊聖詞、禮拜祈禱、祈求阿拉賜福於人間，解除人生痛苦，使全世界得到和平，國家太平、社會安寧、家庭平安、個人健康幸福等等。

就跟你一樣，他們以為他們可以來此一遊，順便了解伊斯蘭教，於是，就動身旅行。他們先到印度的阿杰梅爾（Ajmer），參訪那裡有名的穆斯林陵寢，然後又跟著一個穆斯林教師研習。那個老師恰好也有兩個女兒。英國領主的兩個兒子就皈依為穆斯林，還分別跟老師的兩個女兒結婚。將來你成為穆斯林的時候，你就會記得這個故事了。」

英國領主，雙喜臨門，親上加親，阿拉伯親王一個月用上五百個傭人侍候；在喀拉蚩——駱駝、侏儒及非洲人已經司空見慣了——天方夜譚還出現得真快。

迪恩先生又用公務車將我送回旅館。迪恩先生來自印度；巴基斯坦分裂獨立後不久，他全家也從德里移民到這裡。過去，他不論在公務上或是私人旅行上，都有許多機會可以讓他回德里去看看。可是基於某些他不願多加詳述的理由，他寧可避而不歸。他已經遠離印度了，過去就當作過去吧，舊傷何必再挖開來灑鹽呢。

到了晚上，薛汪尼先生帶著新聞局裡一位新進同事過來接我，我們就搭公務車同往喀拉蚩幾所清真寺走訪。新進同事緘默寡言，薛汪尼先生一個人喋喋不休地猛唱獨角戲，我倒覺得這是他自己拿來打發漫長夜間禮拜的方式：逛遍一所又一所的清真寺，其間還可以恣意侃談宗教信仰，開導一旁自告奮勇、靜坐聆聽的聽眾。

清真寺裡燈火通明，人山人海。裝飾性的螢光燈管，燈柱閃爍著藍白交替的光芒；牆上懸掛著一串串的彩色燈泡，像是一張張閃耀發光的地毯一樣。寺裡此起彼落地用阿拉伯文吟誦著《可蘭經》經文，不換氣也不停頓——某些毛拉趁機炫耀他們如何嫻熟經文，他們可以如此快速地朗誦經文，他們一口氣可以頌讀多久——吟誦之後，再用烏爾都語加以解釋。每到一所清真寺，薛汪尼先生就像蜜蜂採蜜一樣，總要隨緣跪下禮拜一番。只要機會允許，他也會加入聚會信眾跟著行禮如儀。

我有種感覺，比較富裕地區的清真寺裡頭，信徒不會聚在一起，他們各自獨立禮拜。走到比較貧窮的地區，清真寺裡就洋溢著社區的氣氛。在一個低收入地區的清真寺裡，毛拉一邊吟誦著經文，寺方一邊散發糖果甜點，成群孩童蜂擁而上，擠向那個負責分發糖果的人，那人雙腿似乎已經不聽使喚了，雙臂高舉著卡紙糖果箱子，任憑大批孩童擁簇著他，許多雙小腿齊力奮進，一路將他推擠過中庭，彷彿螞蟻雄兵傾巢而出，驅使著外人看不見的輪子，架著一隻死蟑螂推著走。這樣混亂的插曲，並不影響這個場合的莊嚴隆重；同時，這個場合也是社區性的，小孩和糖果都是禮拜的一部分。

伊斯蘭教為每個人的救贖所繫，穆聖先知的行誼也融入信仰之中；此外，伊斯蘭教藉著不計其數的公共活動與場合，維繫與整合了社區。團結、信仰與紀律，三者合一，構成伊斯蘭教的主旨。這是薛汪尼先生跟我說的，而且還要過了一陣子我才知道，原來這話是他轉借自巴基斯坦建國者真納先生的名言。然而，如此熱絡的社區意識之下，還是隱藏著某些不足為外人道的憂慮——對於來世憂心忡忡的焦慮。這層焦慮非常重要，人人都無法豁免，也是將信仰的各個層面緊緊鎖定的關鍵因子：信徒無法釋懷的是，大限之日一到，面臨最後的審判之時，究竟會上刀山下油鍋呢？還是榮享天寵？薛汪尼先生說，由於他畢生虔誠實踐教義，他早已窺見他的來世了，真正虔誠的信徒都有這種「天眼」，可以看得比一般人遠。

一個晚上下來，薛汪尼先生的歡快言行逐漸冷落，再也提不起解說的興致。他匍匐參與禮拜的時間越來越長，接著就像個抱怨時間快要來不及的人一樣，他趕忙地將我送回旅館，自己匆匆離去。這是天啟之夜，這一夜的禮拜活動何其重要，薛汪尼先生打算竟夜禮拜，一直到翌晨禁食開始為止。作為一個虔誠的穆斯林，隨時都有些特殊的行程與要務待辦，一舉一動都得遵循特殊規定，整天活在信仰的狂熱之中，隨時牢記這種信仰異於其他宗教的特色所在。

可是，地球不曾停止轉動，世界照常運作，不斷進展。那天晚上又醞釀了另外一則天啟，早上就曝現在我們眼前，官方報紙《晨間報》上的頭條新聞：「揭發任憑巴基斯坦為外力操縱之陰謀：班娜姬意

圖爭取美援，發動政變——致穆爾塔札信函影本東窗事發。」

報紙上動用了六欄版面披露的，不過是布托先生的女兒班娜姬寫給她旅居倫敦的弟弟穆爾塔札的幾封家書。這些信件都是從那個計程車司機指給我看的，其中一封寫於布托先生以絞刑處死後九天，另外一封則寫於行刑前四天。這些信件充其量不過是家書往返而已，曝刊在大眾傳媒上，其實是一種侵權行為。信中不過是姊姊建議弟弟如何著手提出訴願或是施壓，以營救他們的父親。考量當時的情境，其實至為允當明快。《晨間報》應負的舉證責任在於——根據報方指出——班娜姬·布托為了答謝美國人出面營救她的父親，甘願放棄跟終止巴基斯坦發展核武的計畫。《晨間報》將這幾封手寫的信件影本刊在報端以資佐證，偏偏影印效果模糊難辨，編輯部又未曾提供繕寫謄本對照。而且說穿了，這則見報消息根本就是羅織誣賴。

這正是奉行信仰生活的另一面。這種信仰的各項規定多如牛毛。可是，政治上卻毫無限制。信仰對於政治活動毫無規範，因為信仰只是為了產生更多信徒罷了；任何世俗的縱橫捭闔都不在信仰規畫之中。對任何公共政治生涯中人而言，伊斯蘭教就是目標，就是工具，就是豁免於一切刑責的護身符。

狂熱的信仰

薛汪尼先生一定是足夠我了，或是另有繁忙公務纏身。第二天早上當我到達迪恩先生辦公室時，我才發現新聞局派了另外一位同事帶我去碼頭參觀即將啟程前往麥加朝聖的進香客。

這位同事是位年輕女性，裹著綠色的紗麗。她非常苗條，瘦得幾乎可以纖細形容，而她的英語也十分標準流利。不尋常的是，她竟然還在喀拉蚩大學修了個新聞學學位。畢業後，她通過了巴基斯坦公務員考試，接著又經過八個月的在職訓練。當初她並未選擇進入新聞局服務，是被相關單位分發到這個部

門的，而這份工作也令她深感挫折。待在新聞局，她只能做些人家交代她做的事情；對於這樣一位擁有新聞學學位，也有志於正規創作的女青年來講，真是大材小用了。

這些話，她都在迪恩先生的辦公室裡開誠布公地跟我說明，說來，她也並不是為了要博取我或是迪恩先生的任何好感。她就跟她纖細的肢體所顯示的一樣不快樂和緊張。儘管聯邦政府的鐵飯碗在巴基斯坦非同小可，我還是很納悶，她幹嘛還繼續窩在這個淺灘裡呢。我問她，她丈夫在哪裡高就？她說，她們家一家青壯都是吃公家飯的或是軍人，而她先生過去也在軍中任職。過去？是的，她先生已經過世了。「他死於某一次直升機墜毀的意外中。」

現在，她家還會給她一些財務上的支援，可是她需要錢，才會一直守著這份差事，而且孩子的教育尤其花錢。她在家裡已經開始給孩子雙語教育了——英語和烏爾都語，因為你到了外國——她指的是沙烏地阿拉伯與其他穆斯林國家——不會說英語的話，是找不到工作的。

哦，原來她現在就已經開始訓練她的孩子準備離開巴基斯坦，移民到其他國家去了嗎？

她說：「我不得不啊。我們在巴基斯坦是少數弱勢。我們不是穆斯林。」

她身上裹著紗麗。難道說這代表她是個印度教民或是波斯人嗎？

我還沒來得及發問，她已經先說了：「我們也是信服穆聖先知的。可是三年前，政府就宣告我們是非穆斯林。我們算是阿默德教派信徒³。」

「不過，他們為什麼要宣告你們為非穆斯林呢？他們是受到什麼壓力嗎？」

「這你就得去問班娜姬·布托了。班娜姬會跟你說明，她父親為什麼要把我們排除在穆斯林之外。」

3 阿默德教派 (Ahmadis)：又稱阿默迪亞派 (Ahmadiyya)，是由阿默德 (M.G. Ahmad，約一八三九—一九〇八) 在印度創始的一個伊斯蘭教派。這一教派以熱心傳教為特點，正統伊斯蘭教不承認它。阿默德教派活躍於亞洲、非洲和歐洲各地。

以前他對我們還很友善，沒想到他一翻臉就做出這種事情來。」

她說，這個教派是從一個名喚阿默德的男人開始奠基發展的，這個人出生在前一個世紀的印度北部。一九〇六年（她搞錯了年分，其實是一八九〇年；不過，我也是過了好幾個星期才知道的），這個人綜合分析許多出現在他眼前的跡象之後，突然領悟到，他就是馬赫迪（Mahdi），也就是真主應許的救世主。他是個信仰虔誠的人，怎敢妄自僭越，於是他費盡工夫駁斥這樣的妄想，可是神跡天啟還是不容詆毀。有些穆斯林篤信，不到世界末日，救世主不會現身的；但另外一派對於先知的詮釋則以為，每當伊斯蘭教墮落變質，救世主就會重返人間，而一九〇六年間，伊斯蘭教確實已經墮落沉淪了。

我說：「所以你們就跟伊朗的巴哈伊信徒差不多囉？他們同樣相信，隱匿的伊瑪目或是某個諸如此類的人物，也曾經在上個世紀現身過。」

可是，她從來沒聽說過巴哈伊這個教派。

她本身是後天改宗阿默德的。她也跟我說，阿默德信徒之間也有分歧。有些人——就拿她自己來說吧——信服救世主的繼任人，其他同宗信徒則不以為然。

可是，她身為一個穆斯林，心態又經過何種變化，轉而接受救世主的概念呢？穆斯林恨透了這種邪念。穆斯林堅信穆罕默德就是最終的先知；而某個印度人自稱為救世主，如此惑眾妖言近乎完全推翻穆罕默德定於一尊的信仰，因此也近乎於連根動搖穆聖先知的不朽地位。作為一個穆斯林，剛接觸到這種異端的時候，她一定也覺得驚駭莫名吧。她又是怎麼應付這個信仰上的大跳躍呢？

喔，她說了，因為她父母親的信仰並不一致。她的雙親，一方為什葉派信徒，另一方則是正統的遜尼派。可以這麼說，她從小耳濡目染，對於異教信念具有高度的包容力。之後，她嫁給一個阿默德信徒，因此，她有必要改宗，加入阿默德教派。接著，她就全面接觸到這種「異端邪說」，夫家盯著她從深入理解到欣然接受。她的丈夫不厭其詳地跟她解說、教諭，而今，她就像個虔信多年的阿默德信徒一

樣，每當她提到救世主阿默德，語音就略為顫抖：這麼好的人，這樣虔誠的人，受到救世主重責大任的驅策，怎麼樣也不能否定真主賜給他的許許多多神蹟。

這種異端——這也只有穆斯林才會奮力反駁了——現在已經完全掌控了她的生活，甚至還有可能迫使她離開穆斯林的祖國。在這間政府辦公室裡，牆上水泥漆片片剝落，沙發椅腳搖晃不穩。面對這樣一位身著綠色紗麗的女子，擁有喀拉蚩大學的新聞學學位，在這樣一個穆斯林國家裡擔任公職，已經相當耐人尋味了。可是就在喀拉蚩的表象之下，就在這些表面上容易理解的浮光掠影之下，潛藏著堅定的信仰，而信仰的狂熱，往往以許多不同的面貌呈現，每一次正面遭逢到如此熱切的信仰，幾乎總是讓我感受到某種走馬燈一般連續變化的幻影特質。

幻影持續不斷變化。我走出辦公室，站在中央迴廊上等候穿著綠色紗麗的女子。我滿心咀嚼著自己剛剛聽來的歷史，篤定地以為再過一會兒，我就會跟著她一塊去到朝聖碼頭，因此當我被一個不會說英語的男人領著往前走時，自己並沒留意他到底要帶我上哪兒去，也不曉得我已經跟她分開了，錯過了約定一同搭乘公務車的時間。我渾然不知那個男人把我帶到另外一個部門與另外一間辦公室裡，最後才發現自己走到一間封閉的大辦公室裡面，裝潢要比迪恩先生的辦公室氣派多了。辦公室裡有個較為資深的男人，隔著案牘堆積紛亂的桌面，面對著另外兩、三個男人，他們安排我就著辦公室一角坐下，頂著一具空調機組的送風口，我坐進一套沙發中的一座椅子上，塑膠皮面的沙發當然強過迪恩先生的棉布沙發。

這間是阿默德的辦公室（阿默德，不是阿默德，那個我稍早才聽說過的，屍骨早已成灰的預言家）。他的辦公桌旁邊擺著一只立地櫃子，桌上有五具電話機，連阿默德自己都搞不清楚究竟是哪一具電話響了起來。經過幾度官僚交涉往返，其中詳情我實在沒有立場可以參透，他們竟然將我轉手交給這間辦公室的阿默德處理。迪恩先生與薛汪尼先生這兩個忙得不可開交的人，就這樣靜悄悄地將我移交給

阿摩德；而裹著綠色紗麗的阿默德教派女子也就跟著他們走了，再也不見芳蹤。

結果，我最後是跟著兩個阿摩德辦公室裡的男同事一同前往碼頭，可是他們兩人的英語都不靈光，而且他們寧可自顧自地用烏爾都語交談，也懶得搭理我；到了碼頭上，他們馬上全神灌注於部門公務，朝聖客的送行活動具有如此高度的官方性質（俾路支省省長也將蒞臨），兩人因而戰戰兢兢，不敢稍懈。我只好像鴨子聽雷一般地在一旁全程參觀，彷彿從遠處觀望一樣：白色的朝聖大船原來是英國製的，陳舊髒亂，船身沒刷上白漆的地方污穢得不忍卒睹；船艙裡擠得滿滿的臥鋪與包袱，霎時間，老翁與老嫗看起來就像是難民與進香客，有人狀似懺悔，有人又像是滿心期待；甲板上已經堆起一落落的垃圾了；上層狹窄的甲板上，幾個老人家——無視於大驚小怪的官員在一旁吹鬍子瞪眼睛的，你虔誠？我比你更虔誠——一旁兀自盥洗淨身，準備晨禮。禮拜活動在伊斯蘭教中，總是一種正確而令人安心的肢體行為。

俾路支省的省長拉興穆丁將軍終於到了。埠頭上，穿著蘇格蘭呢制服的風笛隊，吹奏出尖銳的音符，走在前方為將軍開道。巴基斯坦全盤接收英國軍方的風格，適切地襯托出高階武官的威嚴，而大將軍戴著尖頂軍帽，臉上架著一副深黑墨鏡，軍服上星光耀眼，腋下還挾著一柄權杖，凌駕在前往麥加的朝聖人潮之上。他所代表的朝聖行程，年代比伊斯蘭教還要悠遠，源自於古老的阿拉伯部落崇拜，再經由先知融入伊斯蘭教的實務中：層層相疊的歷史就在這裡一片片地綻現。

港務官員上台演說，擴音器將他的話語帶到船艙的每一個角落，船下的埠頭也歷歷可聞。埠頭上搭起一具帳棚，風笛手和隨同將軍出巡的士兵，全都集合在裡頭。帳棚外，一小群工人也群聚在一旁。將軍的演講稍微長了點。服膺總統諭令而舉辦的官方朝聖送行儀式，至此禮成（兩天後，《黎明報》上就著官方釋出的新聞稿，整整寫了九吋寬的報導版面），阿摩德先生的手下就將我送回他陰暗而空調十足的辦公室了。

此後，我再也沒見到過迪恩先生與薛汪尼先生，也無緣再見那位身著綠色紗麗的女子，或是寡婦。她的故事讓我極為迷惑。可是政府已經將她的阿默德教派視為非法組織，許多人也跟著對他們憎惡側目，而我一直要到即將離開巴基斯坦之前，才有機會再深入了解他們一些。

阿摩德接手打理我的參訪事宜。那天早上，他對我的興趣可以說是純屬公務要求——當時巴基斯坦還在全國戒嚴狀態，大家對外國人都提防有加，還有巴基斯坦的核武計畫更需要保密防諜——不過我一回到他的辦公室，他的態度就全然改變了。他坐在辦公桌後面，面對著他的部屬，仔細地端詳著我；就這樣通過了他的考核。

先前，說不定他已經接獲報告，有個外國訪客前來探詢有關伊斯蘭機構的問題。故事聽來新鮮，可是當他確認了我的求知熱忱之後，就轉變得相當熱切。這也不足為怪。再過幾年，阿摩德就六十歲了，他是個幡然悔悟的穆斯林。他自己說，年輕的時候，他日子過得頗為放蕩，貪聲逐色，一直到馬齒徒長之後才虔心於宗教，此後即充滿法喜。他深深敬畏著自己的信仰。他不光是想要討論他堅毅的信心，就像薛汪尼先生一樣，他還要找個見證，找個代表另外一邊的證人，代表他揚棄的那一邊的人來替他見證。

他動作矯健，筆挺而富於精力，即使不復年輕，卻還是瀟灑迷人，黧黑的膚色，鷹勾鼻，嘴巴下唇弧線飽滿。他是個信德人，而且還自稱（或許過於浪漫了吧）他是先於亞利安移民的信德原住民，他的祖先營建了偉大的遠古城市，諸如摩亨佐—達羅⁴與哈拉巴⁵，創造了印度河谷文明，直到紀元前一千

4 摩亨佐—達羅 (Mohenjo-Daro)：巴基斯坦信德省印度河流域古城址，有史前城牆，為世界性歷史遺址，位於喀拉蚩東北約三百二十公里。西元前二三〇〇至西元前一七五〇年已有人居住。自一九二二年開始發掘。遺址占地一百公頃。

5 哈拉巴 (Harappa)：巴基斯坦旁遮普省拉維河故道的歷史古城，位於伊斯蘭馬巴德以南約八百公里。古城存在於約西元前二二〇〇至西元前一七五〇年。

五百年前才遭到亞利安人後來居上，侵略征服。他說，巴基斯坦大多數民眾表現得好像只有在巴基斯坦建國元年，即一九四七年之後，這個世界才正式開展。然而，他的信德先祖與家系，讓他多了另外一種世界觀。

他對歷史的情感，還是不能與他對伊斯蘭教的珍愛相提並論。伊斯蘭教是全世界最年輕的重要宗教——最年輕，因此也進化得最完備。他並不譴責過去的宗教，他只是將這些宗教視為人類精神發展上的不同進程。只要你將這些根據天啟所創的宗教放在一起比較，就會導出相同的結論。他說，就拿摩西來說吧，全是戒律，太過嚴苛了。耶穌則充滿了悲天憫人的情懷。阿摩德說：「在一個還有非洲人和黑人的世界裡，這種情懷是行不通的。一個土著給你一巴掌，你還把另外一邊臉頰湊過去，只會讓那個粗人火上加油而已。」伊斯蘭教高妙的地方，就在於調和鼎盛，兼有戒律和悲憫的優點。我若要見識伊斯蘭教最上乘的事功，或是了解這個宗教大能所及的慈善事業，就該深入信德省內地，參拜幾座古老的陵墓，而他可以替我安排行程。他特別強調，那裡有個地方，跟某個穆斯林聖人與神秘家有關，他格外期望我能撥冗一訪。我可以藉機參觀某個共同生活的修士團，其中不乏專業人士，他們捐棄了俗世凡塵，跑到沙漠裡來侍奉與餵養貧民。

就這樣，一個下午的時間，阿摩德一口氣連珠炮一般興奮地傾訴衷曲，扼要地說明了他的信仰、他的態度，以及他替我安排的計畫。他開車送我回到洲際大飯店，我們又在停車場裡盡興而談，一直到日落時分。最後，他對我從未料及的溫柔，將他的食指捺在我的額頭中央，說道：「要開竅就在這裡。假如你是個生意人的話，你就會得高血壓。可是你是知識分子，你關心的是真理，所以，真理就會到你那裡，進到你的眼睛裡。你的眼睛一定要多多休息保養，你要多看一些綠色的東西。」

又是我的眼睛！偏偏第二天早上，我眼鏡的鏡片脫落，砸破在旅館房間的磁磚地板上。結果，阿摩德一大早就得先帶我去眼科醫院驗光、配眼鏡。

我們的友誼建立得突然，可是我卻覺得十分踏實；而隨著友誼的開展，我更加倚重阿摩德的幫助。我之於伊斯蘭機構與實驗的探尋——如此探尋將我帶到阿摩德的跟前——持續進行著；而在接觸過其他人詮釋的伊斯蘭教義之後，我又回過頭來跟阿摩德先生請益，畢竟，他是我在巴基斯坦唯一遇到的理性中人。

摩爾札先生的訓誨

有人向我推薦摩爾札先生，把他拱進全巴基斯坦最傑出人士之列，其靈性與智慧堪稱全國深邃奧妙之最，只要我向他請益，他一定能夠回答我所有關於巴基斯坦國家體制伊斯蘭化的問題。可是，跟我介紹摩爾札先生的那個人，甚至連這次會面都是他安排的，也是摩爾札先生的遠親。由是，當我好不容易在這位偉人空調十足的辦公室裡榮膺天顏時，感覺就像他基於家族情誼對我施以小惠一樣，而當終於輪到我聆聽他高言訓誨之時，又恍如置身祈禱會一般。

摩爾札先生辦公室裡藏書甚眾，汗牛充棟，牆上許多褪了色的英語政治書籍，出版於一九三〇與一九四〇年代，顯示他曾經在英國求學一段時日。兩個神情專注的年輕人坐在摩爾札先生辦公桌前，上身前傾，雙眼圓睜，炯炯有神；而摩爾札先生輕聲細語地說明，正在跟這兩位「年輕的同事」交換一些意見。原先我還真的以為這兩個年輕人不過是他的同事而已，稍後我才知道，如此謙辭正是摩爾札先生在公開場合展示的謙沖自牧。那兩人就跟我一樣，也是經人介紹前來汲取一些智慧嘉言的。

事實上，意見根本無從交換。摩爾札先生一個勁兒地以低沉、沉穩的語音，綿綿互長、不歇不竭的叨叨絮絮著：我們正處於撒旦猖狂的時期，世人無意於追尋真理，大學教授也不在乎真理。我們現在接觸到無限量的資訊，可是資訊氾濫跟缺乏資訊同樣糟糕。誰也無法預知未來，我們周遭充斥著「無法評

估」的東西；托爾斯泰看待歷史的觀點是對的。難道說，摩爾札先生是巴基斯坦上下唯一還關心歷史的人嗎？這一切要將巴基斯坦帶往何處？這一切終將所有人帶回眼前的撒旦惡質，所有人都會領悟到重返伊斯蘭正信之迫切。

年輕人起身告辭，喜悅得雙眼發直，而摩爾札先生更加地彬彬有禮，跟他們告別的語氣溫和得像是感恩祈禱一樣。接著就輪到我接受他開導啟發了。可是摩爾札先生不跟我談托爾斯泰，他跟我提到的是個默默無名的阿拉伯人。「第十世紀時，有個阿拉伯學者——他或許是阿巴斯王朝最偉大的哲學學者——去世於西元一〇一一年，因此，他著作年代落在第十、十一世紀之交，後人多半將他視為第十世紀，而非第十一世紀的學者。他說，先知和一般人不一樣。」

可是我來見摩爾札先生不是為了要聽這些老生常談。我來拜訪他是為了請教伊斯蘭教義應當如何施行在國家體制、政府施政與法律制定上面。

摩爾札先生說：「你先聽我把話講完。」他最受不了被聽眾打斷話頭了。接著，他又嘮嘮叨叨地繼續說下去：真主藉著先知傳諭，宣達真主意旨，終有一日，天下即將太平，海清河晏之日，就是世人無須先知開導之日，伊斯蘭教就是出於如此理念而問世的。

那又告訴了我們什麼？也就是說，巴基斯坦的法律制度與政府機構尚未符合真主規範。儘管摩爾札先生聲譽隆重，坐擁書城，他的思維卻無法超越這一點。他的教育背景只是他虛榮自矜的一端，可是他的言談不過就像個哲思至為單純的毛拉。事實上，摩爾札先生自奉為極端純淨的伊斯蘭教化推行者，個人也有暗藏著政治企圖。攆掉布托先生、壓制布托先生的黨羽，伊斯蘭化的軍政府上台之後，摩爾札先生有望更上一層樓，盡窮千里日。

我說我得走了。摩爾札先生十分不捨，他還有很多話要跟我開導。他問我要不要搭他的車子回去，我接受了。就在我們等著他的車子開來時，他又試圖重組自己一個人的專訪獨角戲。他說：「我想，你

心裡一定很納悶，我為什麼沒待在清真寺裡，反而跑出來做生意？」

「我沒那麼想啊。」

「可是，你不久就會明白的，伊斯蘭教義裡頭，生活和信仰是不可分離的。伊斯蘭教是一套完整的生活規範。」

他拿出幾顆祈禱用的小珠子，開始咯嗒咯嗒地前後撥彈著，嘴裡一邊喃喃祝禱。我從他的左耳看過去，又從他的右耳看過去。咯嗒咯嗒，咯嗒咯嗒，珠子前後撥弄著，接著他說：「真主令我目眩神迷。」我從他的左肩看出去，再從他的右肩遠望後方。咯嗒咯嗒，珠子前後撥彈著。我就這樣任他在嘴裡喃喃自語，一直等到車來。

一個報社編輯的理念

報社編輯薩拉胡丁先生之於摩爾札先生不遑多讓，同樣也令譽高懸，主張採取強硬路線施行伊斯蘭教義。可是他沒有摩爾札先生的神秘與知識上的癖性，我反而欣賞他的坦率直言。

巴基斯坦全國識字率不過百分之十五，報紙的發行量十分有限。英語報紙《黎明報》（根據與該報對峙的友報《晨間報》同仁相告）發行量只有三萬份；《晨間報》本身，於布托先生執政期間，發行量一度下跌到四千份，而今又逐步回升，即將突破一萬份。薩拉胡丁先生負責編輯一份發行量約為三萬五千份的烏爾都語報紙，他講起話來的份量當然就有力得多了。派來接待我的編輯部助理跟我說，薩拉胡丁先生在布托先生當權期間，曾經坐了三個月的牢。助理說，薩拉胡丁先生是個有原則的人。

薩拉胡丁先生的辦公室位於喀拉蚩市中心，一棟四或五層樓混凝土建築，建築物外觀看來還算新穎。從市集街道上拐個彎，轉進一條殘破而凹凸不平的泥土路上，黑膚小童在街上踢著足球戲耍，某個

貧民不知怎地，烈日下兀自倒臥在一台自製的箱型手推車上。樓房前的庭院地上碎石散布，崎嶇不平。電梯門就直接堵著庭院，沒門沒進的，一腳直接踏進電梯，感覺委實古怪，甚至還有些超現實。

可是這電梯還管用，一路直上樓房頂樓。頂樓陽台像是一般接待室的諧仿（像是延伸至樓外街景的現代都市諧仿），陽台上三張藤椅竟然都沒了底。辦公室裡架起幾面半人高的隔間，隔出幾間辦公小隔間，隔間一間連著一間。編輯小房間兩邊的門都開向辦公室，其中某個房間裡，幾個謄寫員正在奮力揮毫，將各版新聞寫在透明紙上，俾使稍後送廠印刷。蒼蠅嗡嗡地盤桓在小窗玻璃上，牆上一幀真納先生的鉛筆素描畫像。

薩拉胡丁先生個頭矮小，只有四十出頭。臉上一把黑桃形狀的小鬍子，鬍鬚灰白交雜，一張一絲不苟的嘴巴，還有一對炯炯有神的黑亮眼睛。我試著揣想他繫獄監禁之時，又是何等樣態：我想，牢獄也無法澆熄他的怒火。薩拉胡丁先生出生在印度，十二歲才移民到巴基斯坦。

他說，其實穆斯林在印度也可以自由禮拜。巴基斯坦建國不光是為了宗教禮拜的自由而已；巴基斯坦建國主旨在於成立一個伊斯蘭國家，全國施政一律奉行伊斯蘭教義。這是什麼意思？古往今來，真的有伊斯蘭國家出現過嗎？他說：「這個立國二十二年的國家，隨時都存在於先知與前四位哈里發之時。」所以說，又來了，他所倡導也就是這麼回事——這些人不但夢想著早期的伊斯蘭國家，先知的創發先跡，同時還隨時惦念著先人如何循循善誘穆斯林，遵循真主意志的統治；歷史與神學的融合，匯成一股合金，打造出信仰牢不可破的金鐘罩。過去那段純淨年代還會重返塵世，穆斯林將重新活在如此純淨的氛圍中。他們一言一行只要切實地循規蹈矩就好了，而規矩早就清楚地擺在一邊兒了；規矩就詳細地刊載在聖書和傳統中。伊斯蘭教多如牛毛般的規矩傳承，並不是為了圖利真主，薩拉胡丁先生如是說了；而是為了保全信眾。沒有順服遵從，何來自由；遵守規矩，才能享受自由。

然而——在他位於喀拉蚩的辦公室裡，隨時都有人進進出出，過來跟他商洽相關報紙編輯的公務，有人還帶著大把的巴基斯坦盧比進來。而隔壁辦公室裡的長條桌子上，謄寫員伏案疾書，製備版面，下一步就可以上機拼版印刷了——那就是薩拉胡丁先生的主張：建立伊斯蘭國家，及其特殊的自由。他曾經在布托先生掌權期間下獄，而我感覺，他已經準備再度入獄了。

他給了我幾本宣導小冊子以茲紀念。某些小書樣式陳舊，我猜想，初版應該在當年巴基斯坦還處於歐洲殖民統治之下，伊斯蘭教一貧如洗、政治上更毫無置喙餘地之時，穆斯林的宣教機構初次印行流通的宣傳冊子，當時他們需要盡可能地爭取歐洲人的同情與支持。

《可蘭經與現代科學》係由一名法國人所撰，文中揭示穆聖先知生前就已經預料到許多現代歐洲人的發明點子了。《伊斯蘭教——開啟與終結的宗教》（《伊斯蘭教之魅力》與《伊斯蘭教，吾人之選擇》兩書之綜合簡要版）一書則言之鑿鑿地演證，世上所有其他的宗教，於其聖書經文之中，率皆預測了穆罕默德即將降臨人間。此外，我還拿到了一篇拿破崙之於伊斯蘭教的禮讚，以及他對於伊斯蘭教之嚮往：「吾人僅能期盼，來日不遠，吾人將聯合各國賢明智慧人士，遵循《可蘭經》中之金科玉律，奠定一套完整劃一的體制。《可蘭經》蒼萃真理，一部經書即足以引領全人類永享幸福。」

拿破崙後面還跟著一連串維多利亞時期英國名人，「政治家與外交官」等的頌詞，這些人各有頭銜，且來頭都不小，他們的名氣顯然在穆斯林世界還是響叮噹的，聽在家鄉同胞耳中，可就沒那麼想當然爾地如雷灌耳了。例如說，這位阿爾—哈吉助爵黑德利·阿爾—法魯克（一八五五年～卒年不詳），係「貴族、作家與政治家」，曾服役軍中，亦為工程師，同時也是《索斯柏里期刊》之編輯；阿布拉·阿契柏德·漢彌爾頓爵士（一八七六年～卒年不詳），「政治家與從男爵」，同樣曾在軍中服役（「官拜皇家軍團陸軍中尉」）；賈拉魯丁·勞德·布魯登爵士（生卒年未記載），「政治家與從男爵」，畢生志業不詳（「英國從男爵與享有廣泛聲譽之公眾人物」）。在他們之後，小冊子又攀附了一位英國學者，哈隆恩·馬斯塔發·里昂教授，藝術碩士、哲學博士、法學博士、FSP，「是一位真誠可靠的地

質學家」與「能力極高之語言學家」，於波多馬克大學（美國）取的藝術碩士學位，並於一八八二年為《曼島檢查報》製作《人類語言之語源研究》系列文章時，接受伊斯蘭教。

這組白種穆斯林成員陣容中，唯一的美國人是穆罕默德·亞歷山大·盧梭·衛柏，「外交官、作家與記者」，《聖約瑟夫報》、《密蘇里共和報》編輯，出生於一八四六年，去世於一九六一年，享壽一百一十五歲；「哥倫比亞國度」，哈德遜河流域出身的馬克·吐溫式人物，此人拒斥「正宗長老教會傳教士的滴滴答答，或者較為正式的說辭——瞎謊胡說」，改宗伊斯蘭教，並於其漫漫無涯之長壽年歲中，致力於伊斯蘭之宣教工作。

伊斯蘭化的困難

我透過了薩拉胡丁先生引介，認識了卡立德·依沙克。卡立德·依沙克是喀拉蚩市裡少數幾位領先群倫的律師之一。他的訴訟事業如此成功，所以得以花上大量時間投身於公眾事務。他同時也是一「伊斯蘭意識型態諮詢會」的成員，該會每個月定期於首都召開十天議程，研擬出合乎伊斯蘭教義的行事方式；他也在某個政府委員會中軋了一腳，該會成立宗旨在於視察——我覺得有些力不從心——遏阻貪污腐敗。

他也是從印度遷來的移民。個子高挑，身材孔武有力，年紀剛過五十。他言語間不脫一般律師習性，流露出緩慢而乏味的幽默感，眼神透露出任性善變的性格，以及對於小道傳聞軼事之鍾愛。如此態度反而跟他對於信仰的熱情搭配得頗為合宜。我隱約感覺，對他而言，伊斯蘭教不只是種個人信念而已，在卡立德·依沙克眼中，這個印度次大陸上的穆斯林、伊斯蘭教，即使在巴基斯坦還是無法真正立足生根，而伊斯蘭教是他的文明與文化，也奠基他心目中對自己的定義，作為一個人與律師，這是他必

須奮力服務與保護的。

薩拉胡丁先生曾經對我說，卡立德·依沙克藏書浩瀚，冊數多到不可思議的地步，而且他每個月還持續花上兩萬巴基斯坦盧比，折合兩千美金，購買書籍。即使薩拉胡丁先生事先提醒過我，我真見到他的時候，還是吃了一驚。

我們的車子開進他的院子裡時，我說，他的房子真大。而他以其律師特有的精準方式，答道「是的，房子不小，卻還是不夠大。」他說的是真話，房子不夠大。書籍填滿了一間又一間的房間，一層層的書櫃，書櫃前還有書櫃；一碼一碼相連的書架，書架前面還立著書櫥。某個寬敞的大房間裡，專室收藏連篇累牘、裝訂成冊的《可蘭經》經文注解，真像是龐大的阿拉伯墓碑。「而且啊，」卡立德·依沙克補充說明道，「這裡除了經文注解之外，還收有注解的注解。」他不曾「掛萬漏一」，他什麼都買齊了。

然而，他內心信仰之虔誠，真能及於其收藏狂熱之萬一嗎？他也挺有幽默感的，我心想，我應該可以問他這個問題吧。他說：「我不會說自己內心非常虔誠。可是過去三十三年來，我從來不曾錯過任何一次禮拜。」換言之，就是從巴基斯坦建國前一年的一九四六年以來；而他話中所指的是一日五次的禮拜。

我們坐在他的辦公室裡，其實不過是在藏書棧房中清出一片空地。寬敞的房間裡，擺著一張大桌子，桌子一端擱著幾把椅子，像是剛剛開完董事會議一樣。我們對坐在吊扇之下，風扇旋轉發出沉悶單調的聲音，掩蓋住街道上速克達機車與拼裝計程車往來呼嘯的噪音。

他簡單解釋自己對於伊斯蘭教的熱情。「我們的人民，情緒上是相當排斥西方的。物質上，有些東西我們或許還得倚賴西方供應。我們的人民或許會出國去改善生活水準，可是不管他們在國外待的時間有多久，他們總是想要回國，落葉歸根，就算是回國來死在家鄉也好。」而就是出於如此厭斥外在世界的情結，卡立德·依沙克在心中醞釀出某種需要——巴基斯坦需要建立特殊伊斯蘭教化的機構，這一類機構不是為了因應西方人的需要，也不是社會主義的機構，而是因應人民情感所需的機構。

外人倘若要了解那些情緒上的需要，就得先理解伊斯蘭教義中人人平等的原則。「這裡的傭人雖然要端茶、送點心給我們，但那只是他的工作。可是他也知道，在另外一個場合，我們就可以跟弟兄一樣熱絡，平起平坐。」而那就是清真寺的功能，每逢星期五，每個人不論出身背景與狀況，都齊聚一堂靜聽毛拉講道，人為訂定的法律假如有違反《可蘭經》經文教諭之處，就不值得遵守。

所以說，這項伊斯蘭教的創舉還真驚人，這也是經過精心規畫的改革突破，其唯一憑恃的指導原則唯有《可蘭經》而已；改革之後的國家機器，仍將於現代世界中運作，這樣的巴基斯坦政府，確實是前不見古人的空前創新產物，這將是一種高度知性的創舉。巴基斯坦人真的有這種本事嗎？巴基斯坦國內真的有如此的知性生活存在嗎？卡立德·依沙克坦白說道，沒多少知性；書籍昂貴，而電視節目一開始播放，巴基斯坦社會少得可憐的知性生活就宣告終結。

截至目前為止，意識型態諮詢會究竟完成了哪些議程呢？沒多少，卡立德·依沙克似乎意有所指。他們還在試圖解決銀行利息的問題。他們也曾經跟政府提議，要求政府規定每個人都穿同樣的服飾、開同樣款式的汽車，可是這個議題沒有得到多少回應。

卡立德·依沙克也說，困難還是存在著。首先，主張伊斯蘭化者之中，還有些「現代派」人士。這些人多半年事已高，或是為了某些私人的理由，放棄俗世的生活，轉為虔誠信仰。他們不過讀了幾本跟伊斯蘭教有關的書，就以為自己一通百通，什麼都懂了，其實他們懂的太少了。這些人實際上只是一群搞神秘主義的，對於國家機構一無所知。（我心想，他是不是在批判摩爾札先生呢？）此外，還有毛拉。巴基斯坦軍事政府打算全面伊斯蘭教化之後，就向毛拉取經去了。

「那些毛拉其實根本什麼也不懂。他們只曉得全盤信任『那個好人』或是『某幾個好人』。我跟這些人談過話，真的認為他們有很多人根本就不著邊際，他們連為什麼我們需要伊斯蘭教化的機構都沒有半點概念，根本就聽不懂我們在討論些什麼。」

我私下忖度，聽此君一席話之後，巴基斯坦就沒有什麼值得我探看的伊斯蘭實驗了。迪恩先生一開始說的話還真講對了：伊斯蘭實驗，就是一些大家整天動嘴嚷嚷，然後等著別人動手開始的事情。巴基斯坦國內確實有著偉大的伊斯蘭教創舉，可是僅僅存在於理想之中，既足以表達高度虔誠的信仰，也體現出生活在穆斯林祖國裡的穆斯林高度的政治不安全感。

詩人穆罕默德·伊克巴爾在一九三〇年呼籲印度的穆斯林分離國土、建立一個穆斯林國家時，曾經提到，穆斯林政體或是某種社會秩序，都應該是「以伊斯蘭教的團結大義為基礎」，自然而然地躍升脫穎而出。諸如此類的政體確實也存在於巴基斯坦，可是現在大家朗朗上口的伊斯蘭國家，卻遠較伊克巴爾所提倡的穆斯林政體抽象。這個伊斯蘭教國家不能單憑政府機關立法公告周知而已；這樣的國家需要憑著想像力架構，而信仰在架構過程中幫不上什麼忙。這個節骨眼上，信仰只能針對情緒上的需要，提供幾個否定與禁止的答覆：禁止飲酒、禁止女性拋頭露臉、禁止銀行支付與抽取利息。然而，不多久，巴基斯坦國內又將額外頒布其他幾條禁令：禁止政黨活動、禁止民選議會、禁止妖言惑眾、禁止依法審判。因此，現存的機構與體制紛紛遭到宣告為不合伊斯蘭教義，即刻限令解散或是停止運作；此時倡導信仰，只因此刻只有信仰還是完整的；而在這樣真空狀態之下，唯有軍方才能統治。

卡立德·依沙克開車送我回到洲際大飯店。車子開到俱樂部路上時，他將車子調轉到喀拉蚩賽馬場，那裡是殖民時期英國人蓋的俱樂部。

天色已晚，燈火昏暗，四下寂靜，橋牌室裡只有幾個老人。可是室外寬敞的陽台，鋪設著老舊、暗沉、起伏不平的木磚地板，環繞著整棟建築物，陽台上卻空無一人。英國人建設了喀拉蚩這個都市，以及這座賽馬場。此時此刻，這間俱樂部，仍然感覺像是他們的；可是，他們的幻夢，他們建立大帝國的幻夢，卻已經遁入轉化為另外一種幻想。

穆斯林的國度

阿摩德先生請我到他家吃飯，我也依約下樓到洲際大飯店的大廳等他來接我。而當我在沙發上坐下，有個先前我根本沒注意到的年輕人即刻從原來的座位上起身，迅速地朝著我這邊移動，重重地挨著我身邊坐下。他的動作之迅速、粗暴，跟我又坐得這麼靠近，我還真被他嚇了一跳。

他身上穿著巴基斯坦長衫，寬鬆的棉質長褲，身型矮胖，一張圓臉就跟那個開車載著我走遍喀拉蚩的計程車司機一樣。他的英語生硬，口音濃重而難以辨識。「自助餐廳」——他講的是這個意思嗎？

「自助餐廳，」他低聲地說道：「自助餐廳在哪裡呀？」

我做個手勢，跟他指了指飯店的咖啡廳方向。可是他意不在此，他說：「這裡還有些什麼嗎？樓上有沒有餐廳？」

「都是房間。」

「房間。只有房間？你住在這裡嗎？」

「只住幾天而已。」

「只有房間？哦？游泳池呢？游泳池在哪裡？你知道游泳池在哪裡嗎？」

「游泳池已經停止營業了。」

「停止營業了。伊斯蘭政府把游泳池收起來的。」

大廳裡忙碌異常。國外航空公司的機組人員來來往往；他們是洲際大飯店的主要客源。一個年輕的德國女孩走了過來，臀部豐滿而性感，金髮全梳在一側，紮成一條馬尾辮子，吸引了這個年輕人注意的目光。

他說：「女人真是真主賜給男人的禮物。你說是不是？」

「沒錯。你經常到這裡來嗎？」

「不，我是第一次來。」

後來我才知道，他剛進這間飯店大廳不過二十五分鐘而已。他是跟著一個朋友一塊兒來的。那個穿著棕色鄉村外套、坐在另外一張椅子上的男人，年紀看起來比較大，身材也比較清瘦。

我身邊的年輕男人對我說：「我們是來這裡看人的。」

他說他是個學生。我問他學些什麼。他又改口說，其實他是個看店的；他的家人都希望他學醫，當醫生好賺錢。他今年二十四歲，老家在蘇庫爾。據他說，喀拉蚩往西北方向走上四百哩（其實沒那麼遠）就到蘇庫爾了。他和兄長一同南下喀拉蚩，「來做點小生意。」他的生意已經收起來，因為他覺得有些乏味；而坐在另外一張椅子上的朋友，也是從蘇庫爾來的，他在喀拉蚩比較有經驗，就提議說兩人可以一塊兒上洲際大飯店來「看人」。

值此齋月，他們兩人一整天下來還是持續封齋，沒有破戒（洲際大飯店咖啡廳門前有張告示，每日封齋期間，本廳恕不招待穆斯林），他的朋友看起來好像已經筋疲力竭，幾乎就要睡著了。他的雙眼半睜半閉，三不五時地頓首打盹兒。我說：「你的朋友都快睡著了。」我以為這個年輕人跟我回答道：「我的朋友瞎了，看不見。」情況看起來確實也是這樣。可是那個年輕人只是在說：「我的朋友不會講英語。」

而他這個朋友今天看人的運氣竟然這麼好。一群法國人，一男兩女，步出電梯。那個男人其實是三人之中真正的美男子，修長，一身白色衣裝，緊身運動衫的毛巾式的織紋，對稱著平滑的斜紋寬幅長褲。男人站在一旁，兩名友伴中的一個女人就坐在蘇庫爾鄉下來的愛暹男人身邊。

他猛然驚醒，儘管睡眠惺忪，還是扭著身子，一寸吋地挨過去，一直到他能一親芳澤才打住。他深

諳在洲際大飯店裡看人的奧妙旨趣；他知道，外國人跟他們忝不知恥的女人，那些非穆斯林，可以在公開場合任憑他吃豆腐。女人從提袋裡抽出幾張彩色照片端詳。蘇庫爾來的鄉下人也湊過去，傾靠著女人的肩頭，跟著看人家的照片。可是照片或許沒他想像中精彩，於是睡意又襲捲上身。他兩眼發直，茫茫然地凝視前方，疲乏過度，無心也無力仔細品味進出電梯的人流。

我將阿摩德先生介紹給這兩個人認識，真是個錯誤判斷，不智之舉。阿摩德先生是巴基斯坦人，不是外來的觀光客，蘇庫爾鄉下人的舉動令他十分不快。我們上了他的車子以後，他說，那兩個出身蘇庫爾的人（起先，他跟他們鄭重其事地打招呼，以為那兩人是我的朋友）都是泥腿子，十足土氣。那種人會專門跑到洲際大飯店來看臉上沒蒙面紗的女人，看些穿著比基尼的女人。有些有錢的巴基斯坦人也會到這裡來做同樣的事情，他們會跟飯店租個房間，正對著游泳池，由上往下看個過癮。而巴基斯坦人——也是穆斯林——同樣助長了這股歪風。有些巴勒斯坦人（聽起來像是靠著政府津貼過日子的游擊隊，可是阿摩德並未肯定）會帶著歐洲女人來到喀拉蚩，這些女人就穿著比基尼在洲際大飯店游泳池附近廝混；話就是這麼傳開來的。

阿摩德對於那兩個出身蘇庫爾的鄉下人一點好感也沒有。就是這些人——田莊赤腳竟然還懂得上洲際大飯店來看人，兩人竟然如此大膽，沉著應對門房狐疑的眼光，自以為天下事他們無所不知——日後會變成共產黨的就是這種人。政治在巴基斯坦就是這麼簡單。

阿摩德說：「現在這個世界真是亂七八糟，每個人都方寸大亂。許多人的生活都已經失去對稱和平衡了。」

我將他的批評視為卡立德·依沙克所說的，巴基斯坦人在情緒上對於西方世界的排斥。這種排斥當中，有多少成分是自欺欺人的呢？有誰又能真心去排斥這樣一個包羅萬象的文明，他們如此高度倚賴的文明呢？

阿摩德心裡也左右擺盪不定。他說他自己其實不喜歡出國。每次出國，他總是「精神緊張」，總是受到「時間因素」的作祟。當他身在國外，待在某個大都市裡，總是受到要求準時的支配。這種要求使得他精神負擔沉重，折磨著他，害得他身不由己。接著他說：「可是，我們這裡的人要是講到對於西方世界的排斥的話，通常他們唯一在意的只有那麼一樁，就是女人。」

講到女人的話題，阿摩德先生馬上敏感緊張了起來。他認為自己是個自由派，然而，穆斯林的焦慮大幅削弱了——或許多於他自己所能察知的程度吧——他的自由開放態度。由於他直到中年才幡然悔悟，虔心宗教，穆斯林意念中的責任感就將他壓得透不過氣來。我相信，在他內心深處一定臨淵履薄，唯恐遭到當年尋花問柳的不堪過往的報應；而他兩名活潑可愛的女兒，身受開放式的教育，尤其盤據在他焦慮的重心上。孟加拉危機期間，巴基斯坦軍人蹂躪孟加拉婦女的新聞，讓他極端痛苦。對穆斯林而言，強暴之於婦女，不光是皮肉肢體遭到暴力侵害而已；強暴犯行也毀了受害婦女的名聲，毀了她的一生，而她全家人也名聲掃地。阿摩德說：「強暴傳聞持續了兩個月，兩個月以來，我都睡不著覺。」

他的房子位於喀拉蚩許多新建住宅群中。那是一棟混凝土大房子。可是，儘管阿摩德先生位高權重，他的生活起居還是相當簡樸。起居室也做餐室用，僅以天花板一盞吊燈照明，看來空乏無趣；室內只有一套基本必須的家具，以及兩架電視機，其中一架故障待修。

阿摩德先生的兒子走了進來。他二十來歲，是個醫生，就在當地一處醫院看診，無意出國發展。他說，他只想要為巴基斯坦人民服務，而我也相信他此言不假。他身材比他父親小上一號，臉色也較為蒼白，五官特色比較傾向亞利安，是個溫文爾雅的紳士，穩重內斂，一如他父親的興高采烈。他十分滿意地讓他的父親代替他發言與回答詢問。

阿摩德還像在對公眾發表他的信仰聲明一樣，而他的語音也繞梁盈室。他說：「我要我所有的孩子都在醫院裡工作、服務，當醫生、護士，甚至在醫院掃地板也好。因為只有在醫院，你才能減輕別人的

苦難。」

阿摩德先生說，他並沒有強迫兒子信教，他讓他自由選擇。這個兒子流露著一股專屬於十九世紀的誠摯熱切，心中對於信仰的疑問也一直揮之不去。

他說：「剛開始，人類膜拜石頭、火焰。而今我們回顧這些儀式，只覺得好笑。難道將來的人類看到我們現在奉行的這些儀式，不會覺得滑稽嗎？」

阿摩德讓他說完這些話。接著，他再度替兒子發言：「每次要是有人上門來，打著宗教的名號向他勸募時，你知道他跟人家怎麼說嗎？他跟他們說，還是勸人捐血給病人比較有意義。」

那個兒子點點頭，雙眼下垂，默認父親講的話，卻不敢承受他的讚美。

晚餐是由阿摩德先生的太太一手烹調的。餐桌上只有我與阿摩德先生兩人用餐，兒子只是在一旁陪坐；同樣負責陪坐的還有另外一個男人，他剛剛才到達。我們的談話就此轉向，彷彿這樣在巴基斯坦是個常例似地，話題又轉向巴基斯坦的情勢上。

阿摩德說：「我可以用兩個句子就跟你完整交代這個國家的來龍去脈。這個世紀的第一個二十五年間，印度的印度教民以為，凡事只要出了岔子，一定是外國人或是外國勢力搗蛋。接著，第二個二十五年間，印度的穆斯林覺醒了，他們心中產生雙重仇恨，他們既恨外國人，也恨印度教民。因此，巴基斯坦這個國家不過就是建立在仇恨的基礎上而已。人民還沒準備好接受巴基斯坦，而不夠格的人民當然也不配要求。」

這話就像許多保守的穆斯林講的一樣：身為穆斯林，印度的穆斯林還不夠純淨，不配待在一個穆斯林國家裡。

阿摩德繼續說：「接著，印度教民離開巴基斯坦後，來自印度的穆斯林就開始分配人家留下來的財產。許許多多從印度移民到這裡的人，不勞而獲地發了筆小財。巴基斯坦建國之初，大家就是這種態度。到現在，這種心態還是不改。可是現在我年紀也已經太大了，用不著不開心。你也曉得，船到橋頭自然直，年紀一大，你就不會再去操心某些事情，留給年輕人去煩心吧。我已經五十九歲了，到了這個年紀，就像分期付款一樣，可以準備大限歸西了。」

此時，屋子裡來了個非常高大的人，看起來像個頭小、身材卻大得不相稱的農民，而阿摩德先生的惱怒也一掃而空。他站起身來迎接他的客人，殷勤地請他入室。新到的訪客碩大無朋，身高超過六呎，體型像個摔跤力士一樣。偏偏魁梧的身材上頂了張不搭軀的娃娃臉，這張臉上未曾留下熱情、怨恨或期望的刻痕。他身穿巴基斯坦鄉間服裝，不甚新穎，頭上戴著一頂扁平的信德地方傳統帽子。以其身量之大，他行動算是靜悄無聲了，走路步伐也不大。他一句英語也不會說，其實大部分時間他都緘默無言；而當他就著餐桌坐下時——他還留意身子不要靠到桌子——感覺上仍然遠在天外一端。

阿摩德說：「你還記得我跟你提過信德省內地有個陵墓，我要你一定要找個時間過去參拜嗎？我還跟你說，那裡有些人寧願放棄俗世的榮華富貴，專心侍奉窮人，你還記得嗎？他就是從那裡過來的。」

可是，他那張臉不像是某個看破紅塵、寧可侍奉貧民的人，反而像是某個茫然若失、耐著性子等候的人。從他那張臉看來，彷彿已經逸失了某些人類基本的特質。

阿摩德先生說：「我要跟你講這個人的故事。他的腿上長了顆毒瘤，醫生說那是惡性腫瘤，他們束手無策，什麼忙也幫不了他。他就去找那些民間順勢療法的人求救。他們要替他注射蛇毒，所以他得讓毒蛇咬上一口。」

我驚嘆了一聲。

阿摩德先生的兒子說：「被蛇咬上一口就相當於一次注射。」

（幾個星期以後，我在報上讀到一則新聞，警方正在追緝某個專精於蛇吻式毒液注射的傢伙。）

阿摩德說：「可是他受不了伸手被蛇咬上一口的想法。就這樣，他回到他虔信的那座陵墓去，不停

的禱祝。他連續做了幾天的禮拜。有一天，他終於鼓足了勇氣，拿出一把尖刀，自個兒就將那瘤剷了下來。從此之後他就沒事了，完全康復。」

阿摩德不知是用烏爾都語還是信德語，說了幾句話，那高大人物隨即撩起他寬鬆的褲管，露出堅實如象腿般的大腿內側。傷口的疤痕呈不規則形狀，癒合的表皮擠出一條條皺紋，浮現著光澤，總計有六吋長，約一吋寬。

阿摩德的兒子湊了過去細看。

幾乎就在同時間，他說了：「這不是惡性腫瘤，這是顆良性瘤。看到了沒，他額頭上還有一顆呢。」腫瘤切除的疤痕還在那裡；壯士斷腕的壯舉，大家記憶猶新。可是，尷尬以及那位聽不懂英語的安靜巨人只有攔在一旁，撇在重新加溫過有關巴基斯坦現況的討論之外。

阿摩德說：「在我們這裡，人人彼此愚弄。政客、公務員、所有的人。」

然後，阿摩德跟他另外一名訪客——此人截至此時一直惜言如金——兩人都同意，人們會轉而訴諸伊斯蘭教義，因為大家已經黔驢技窮了，所有其他的手段與措施都失敗了。即使在大學裡，這一波伊斯蘭風潮也席卷了校園裡的學術生活。

可是，我不禁問道，難道那不正是巴基斯坦這類地方的特殊侷限嗎？而今在巴基斯坦，還有人不以為自己就是一個置身於穆斯林國度的穆斯林嗎？而巴基斯坦的現狀難道不是信仰一手造就的嗎？難道經過伊斯蘭歷史上的幾個世紀，還不足以明證伊斯蘭教在歷史上已經經過試煉了嗎？

阿摩德神色轉而嚴肅。他說：「不，伊斯蘭教從來就不曾經過試煉。」

三 小阿拉伯

喀拉蚩東邊四十哩遠處，有個小城名叫班布合爾（Banbhore），此地也是個歷史悠久的港口，年代可以追溯到西元前一世紀。班布合爾的重要性日漸提高，因為近年來該地經過考古挖掘，發現了一處清真寺遺跡，一般咸信興建於伊斯蘭曆上第一世紀，就在信德省經阿拉伯人於西元七一二一年征服後不久，亦為印度次大陸第一座清真寺。阿摩德趁著齋月最後一個星期五，也是齋月的最後一天，帶我前往班布合爾一遊。

齋月即將結束，夜空浮現新月之際，也就是開齋節公告欽定之時。齋月原本應當在星期四結束。可是政府的觀月委員會未能觀測到新月，因此巴基斯坦今年的齋月就延長了一天。那位報社編輯薩拉胡丁先生還得先壓下他的開齋節特刊，火速拼湊出非節慶的評論版面。倘若政府將這個星期五排定為開齋節的話，阿摩德恐怕就要忙著應付川流不斷的訪客，或是疲於奔命地四處出訪，哪來這般閒情領著我參觀班布合爾呢。

我們也不是一出門就直奔班布合爾。我們先到一座清真寺裡去找一些阿摩德認為我不能錯過晤談的人，但他們不在那座寺裡。接著，我們開車繞著喀拉蚩的新開發住宅區晃了一圈。時間逐漸接近晌禮，阿摩德開始心慌意亂，最後他決定將車開回他家附近的清真寺。

我問他，他真的相信人死後會有來生嗎？

他說：「喔，當然相信囉。」他睜大雙眼，用力地點著頭，就像先前他說伊斯蘭教尚未經過歷史試煉時，也同樣睜大雙眼，用力點頭。「喔，當然囉。我對來生是很好奇的。你知道，我在某些方面就跟個小孩子沒兩樣。」然後，他搜索枯腸，想要再深入說明他的信仰。「人雖然會死，可是只要我還記著他們，他們就永遠活在我心中。只要我還記著他們，我就不能說他們已經消失了。」換言之，他期望後人不要忘記他——只是，要記在心裡——直到記憶的作用消失為止。頭腦簡單的人心中自有其主張，他們相信人死後有個天堂，天堂就是這個世界的翻版，天堂裡凡事萬物都依循著天理正軌發展，這種情況在女人身上尤其明顯。可是，事實上阿摩德告訴我（抑或這是我所了解他所要講的），天堂裡的女人沒有月經的困擾，她們進了天堂以後就獲得淨身了。

我挺想了解更多他這種「淨身」的觀念，可是我覺得，阿摩德對於女人和性的話題十分敏感，或許會將我的好奇當作猥褻。於是我便按下不表，不多追問，心想來日方長，過一段時間再提也無妨。

阿摩德家附近的清真寺坐落在一條炎熱、飛塵滾滾的街上，混凝土建築物外觀猶新，寺廟卻不起眼，四周圍著幾堵顏色赤赭、近乎巧克力色的外牆。寺外的街道上，信徒摩肩接踵而來，隨身攜帶的祈禱毯子鋪滿了地面。此時正值安息日的主要禮拜，毛拉吟誦《可蘭經》的程序已經完成。阿摩德從車子裡取出跪拜用的小地毯，頂著白花花的大太陽，跟著街上的群眾一同跪地膜拜，我則待在車裡等著。

稍後，我們開車行經喀拉蚩市區時，我瞥見幾張印刷海報上嘶吼著：我們願為巴基斯坦拋頭顱，不為孟加拉灑熱血。

阿摩德沒告訴我，海報究竟是哪個團體張貼的，可是那些內容暗示著國家進一步分裂與仇恨的海報卻令他義憤填膺。他說：「他們什麼熱血也沒灑過。假如沒有巴基斯坦的話，我現在只不過是個三等科員而已。可是一等到我們有了巴基斯坦，像我這樣的人，自然而然就有工作可以做了。」稍後，他又說道：「這裡就算過了兩百年，還是會像現在一樣。」又過了一會兒，淤塞滿懷的怒火持續發酵，轉為某種寡歡抑鬱，他又說：「當年我還年輕的時候，人家跟我說，印度斯坦就是我的家園，那是全世界最美好的國家。詩人穆罕默德·伊克巴爾也這麼跟我說的。然後，一九三〇年代的某一天，我又聽說，印度斯坦不再是我的國家，過去我視為兄弟的人，現在變成了我的敵人。接著人家又對我說，現在，巴基斯坦是我的祖國。然後，我又發現我的國家縮水變小了。現在我覺得國家又縮小了一碼。」

一九四七年巴基斯坦建國以前，阿摩德在皇家印度海軍服役了七年，那一支海軍隸屬於英國，捍衛猶未分裂的印度大陸。一九四六年孟買海軍叛變時，他也有份。可是三十年過後，他回顧起自己的海軍歲月，既不見好漢提起當年勇，也不帶有政治意識，那段日子反而是一段罪惡的回憶。當年他飲酒無度。「威士忌一瓶不過三盧比，啤酒根本就是免費的。」那段日子裡還有女人。「以前，我的朋友和我都會組成合作社——我們會合買一個女人過夜，輪流跟她做愛。」

我心想多聽他講一些那一類合作社的事情。別的不提，光是「合作社」三個字就叫我興致盎然。可是今天適逢安息日，阿摩德悔悟的情緒油然而生，他不斷地追思往日輕狂，折磨自己；此外，看起來他也為了國家的前景折磨著自己。

我說：「馬齒徒長，情慾消褪，年紀大了就不會再那麼衝動了。」

「你這麼想嗎？你真的這麼想嗎？」

我喜歡他這樣的反應。

他車開得飛快；他總是開得這麼快。他開車的方式顯露出某種解放抒懷的成分，就跟他說話時的意興揚揚一樣。喀拉蚩市區鬧極無垠。這個城市發展在一片平坦的沙漠上，四處可見新開發的住宅社區，有些房子還高軒巨梁的；匯款經濟還是可以營造出一派富國景象。最後，我們終於開進沙漠中。中午剛過的炎熱，眼前一望無際，只有幾株無用雜木形成的低矮灌叢。沒有印度河谷與湖沼水庫，喀拉蚩將只

是黃土一坯。

我說：「你剛剛講的『合作社』究竟是什麼意思？」

他憤怒地回答，跟我解釋，同時也痛懲自己。他說：「當初我們搞合作社，出於邪念多過給彼此找樂子。」

他言止於此，沒興趣再多說下去。至此，我沒法子再問下去，只有暗自抱怨，早知道就遵循著我剛開始的直覺，壓下這個話頭，等過一天再說。

班布合爾古城

沙漠。信德省這塊土地年代悠遠：離開喀拉蚩十七哩遠之後，我們來到一處遼闊的荒地，荒地隆起的高地上，是一座面積綿亙許多英畝的古代墳場，墳場上的墓碑蓋有年矣，年代都在三、四個世紀以前，經過雕砌花飾的軟質岩石，塊塊相疊，堆砌成一座座小型的階梯式金字塔。這是一項已然失傳的傳統，這些金字塔過去或許是建來紀念某些古老神話的，而今在現代的巴基斯坦，墳場不過是沙漠一景罷了。

現代的巴基斯坦。馬路經過一大片巴基斯坦煉鋼廠保留地，這是該國第一項大型工業發展計畫：建立一座煉鋼廠，開濬一座新港口，這項計畫引發了強烈的爭議（這也是我事後才發現的），每天都要消耗掉數百萬美元的投資，建廠完工之日，說不定根本就沒有經濟效益，因為所有的原料都要靠進口。現在負責建廠的是俄國人。道路的另一邊，再走上一段距離，就是幾棟專供俄國人住宿的公寓。可是計畫中這座港口將命名為賓夸辛姆（Bin Qasim）港，賓·夸辛姆就是征服信德省的阿拉伯將領，也可以說是帶著伊斯蘭教登陸這個區域的第一人。

經過港口之後，我們的車子還是奔馳在通往班布合爾廢墟的大道上，我又目睹了一樁比較不尋常的離奇怪事：一行又一行的兩房小屋構成一大片模範村莊，每一間小屋上方都頂著一座紅磚屋頂，外面圍著混凝土外牆，小屋卻空無一人，半點人跡也沒。這些住屋自從六年前完工之後，就一直空在這裡，現在已經開始漸漸崩毀了。難道是因為這些房子的位置距離當地社區過於遙遠嗎？難道當地人不想生活在家家筆直看齊、戶戶紅瓦屋頂的官僚幻想當中嗎？阿摩德含糊其詞地帶過，不想多加說明。他只是簡單地說，因為政府未曾「分配」這些住宅而已。

六年前，這些住宅就已經興建完工了。當時應該還是布托先生執政期間，許多人無法忍受布托先生的施政方式，阿摩德也是其中之一。一九七一年，布托先生取得政權時，阿摩德還曾辭去政府工作。布托先生「記仇記恨」，而布托先生自認與阿摩德的家族還有一筆帳沒算清楚，因此，阿摩德就掛冠求去，反正他遲早都會被布托先生炒魷魚的。當初，政府機構裡有兩千人是布托先生想要撞出去的，攆人名單上，阿摩德就赫然在列。阿摩德說，辭職時，他口袋裡只有幾個盧比而已。他家又正在蓋房子，建屋開銷早就將他的積蓄花得差不多了，他只好借貸度日，靠著借來的錢過了一年，間或多為鄙事，打些零工，直到一名大實業家請他擔任顧問為止。

他針對政府部門的相關步驟，提供那位實業家建議。之前的顧問自誇花了大筆金錢賄賂打點。阿摩德堅決不肯行賄。他運用自己的權威，以及對相關法規的嫺熟理解，協助實業家順利推動各項計畫。老闆既驚訝又感激，阿摩德的薪水隨即調高到難以置信的幅度。他將自家房屋修葺完畢，還清了所有債務。接著，他感覺自己生命活躍的時日已近盡頭，他以為該是替別人打算的時候了。那也說明了為什麼（在布托先生垮台之後）他又回到政府部門服務，現在他的收入只是當年替實業家當顧問時的四分之一而已。阿摩德至今猶然敬佩與關愛那位實業家。阿摩德說，他也是一個信仰非常虔誠的人，一個出自內心的穆斯林，信守著《可蘭經》的訓示，固定從他的財富中提撥若干百分比，捐獻給慈善機構。

主要道路旁岔出一條砂質小路，通向班布合爾。距離其實不遠，只是小路迂迴，又在海岸植被中再度分岔。阿摩德還得停下車來，向一個打著赤膊的農人問路，農人拖著剛剛砍下來的樹枝。我們此行一心探訪考古出土的圍墾古城，城外一圈半圓形的稜堡，突然感覺非常遙遠：阿拉伯帝國東界上，一處簡樸的屯墾地，一個可堪流放人犯的地方。

古人在溪邊建城，滄海桑田，古城遺址現在距離水邊有一小段距離。溪流水道逐漸擴展，經過一段距離之後直奔入海。水道中央，鹽田淺灘處處浮現。一塊白色的陸岬，看來雖然極端炎熱，高溫難耐，岬角上卻搭建了幾間鹽田工人的臨時住宅；遠處某片沙洲上堆著幾座小型白色的海鹽金字塔。

這座古城恐怕永遠也無法發展成一個富足繁榮的城鎮。博物館的展品當中只有一枚金幣，其他錢幣都是些品質低劣的青銅玩意兒，嵌在灰白色蜂窩狀的堅硬黏土模子上。可是這裡出土了一座清真寺，或曰那座清真寺樓面布置的遺跡，起造時一逕師法伊拉克庫法清真寺的規模，那就是班布合爾的無價之寶。

伊斯蘭教建教伊始之際，庫法(Kufa)這個地方總是跟接獲正信指引的穆斯林林休戚與共。庫法是歷史上阿拉伯人初次征服阿拉伯半島北部，並駐兵屯墾的軍事據點之一。穆聖先知的堂弟兼女婿阿里繼任為第四任哈里發後，自西元六五六年至六六一年間，統治伊斯蘭帝國的根據地也在庫法，先以武力征服，再灌輸以伊斯蘭教，這就是阿拉伯勢力擴張的典型。由是，班布合爾，重演庫法發跡的軌道，在伊斯蘭曆的第一世紀之間連結信德與巴基斯坦，共同迎向榮耀的將來。而班布合爾的清真寺，倘若真如史料記載一般，想必輝煌懾人。清真寺遺址保留完整，有關單位就著地板僅存的幾塊舊磚，重新鋪設地磚。

古城遺址地上，隨處可見繪飾陶器的碎片。此外，混雜在塵土之間同樣隨處可見，甚至比陶器碎片還要常見的是骨頭碎片，純白、潔淨而鋒利。阿摩德說，那是人骨沒錯。可是，數量如此龐大！人骨碎屑不僅僅存在於表土層面，挖掘坑道顯示人骨與土壤一路混雜深入地底，骨頭就像是某種建材一樣。難道這座古城是蓋在一處大墳場上面嗎？可是為什麼這些骨頭都碎裂得有如齏粉呢？倘若阿摩德所言不虛，這些骨頭確實是人骨，那麼班布合爾又蘊藏著另外一重未解之謎。

我配合阿摩德，謹守著齋月封齋禁食的規範，他反而備感困擾。他一再、再而三地自責，說他事先應該帶著飲料讓我飲用。話雖如此，可是當我們一離開班布合爾，他似乎又不急著趕回喀拉蚩。平常習慣開快車的他，現在反而小心慢速駕駛。我心想，是不是他自己都厭倦了如此漫長的日間封齋，還有班布合爾的海鹽與烈日。沒料到我們的車子開過巴基斯坦煉鋼廠（現在稱為賓夸辛姆煉鋼廠以紀念那位阿拉伯征服者），阿摩德突如其來地將車子駛離路面，停在一片低矮的灌叢下。我以為他打算要稍事休息。錯了！他只是沿路探查，想找個可以停下來禱告的地方而已。他說：「你可不能把車子停在路邊。那些巴士還有車子裡的傢伙，可不會放過近車擦撞你的機會。」

我將他的禮拜小地毯遞給他。他快步走到路邊，上身挺得筆直，即使身著藍灰色的巴基斯坦傳統服裝——拖長著下擺的襯衫與鬆垮的長褲，他看起來還是像個軍方人士一樣。接著，他無視於過往繁忙的交通車流，花上偌長時間虔心禮拜。禮拜完畢，他回到車子裡時表示，假如他白天錯過一次禮拜的話，晚上睡覺的時候，他就會翻來覆去的睡不安枕，然後他的太太就會把他搖醒，叫他起床補做禮拜。

虔信的實業家

禮拜完畢，我們再度高速急馳回到喀拉蚩，不先回阿摩德家，反而直奔過去曾經受聘顧問的大實業家住宅。實業家住某個較為富裕的「協會」當中，建築用地一側伸出一條寬闊的混凝土車道。草坪前方種著一系列羅比親王海棗，草坪接連著一處與住屋同寬的地壇。

地壇上一具安樂椅，安樂椅上躺了個年事已高的老人，老人穿著棕色的袍子，他已經癱瘓不遂了。他就是爺爺，一家之主，一度也是公司的主腦。兩個年幼的孩子是他的孫子，穿得像兩個小阿拉伯人一樣，奶油色的袍子，頭飾上還繫著黑色的帶子。他們才剛剛跟著父親從麥加回來，顯然他們這趟朝聖之旅，風光無限不在話下。他們的父親個子高挑，一身白衣——朝聖者的服裝顏色，頭上還帶頂無邊小帽。他五官溫和，語音也同樣平和。他正如阿摩德先前所形容的一樣：穿著朝聖者的衣裝，看起來除了是個商場中人之外，更像個虔誠的教徒。

他、阿摩德與我三人同坐在草坪上。阿摩德還特別為了我請主人家端出飲料來招待。傭人端出三個大玻璃杯，杯裡盛著深紅色的液體。液體的顏色令我頭皮發麻，我將舌頭探進杯中，嚐不出滋味來，接著為了避免拂逆人家待客的好意，我說，我可不可以改喝可口可樂呢？

阿摩德十分震驚，語氣明顯不悅地說，這等紅色液體可是極為珍貴、專為恢復封齋過後的體力調製的，是擷取多種特殊藥草的精華煉製的，非常昂貴，市面上一小瓶就要價二十三盧比。聽他說明過後，其實我也想嚐嚐；可是經過阿摩德點出這等好料的市價之後，我要是再回頭飲用，豈不加重自己在人家眼中粗俗無知的印象。就這樣，目瞪口呆的傭人端來可口可樂。而自始至終，在這場因為我的飲料——其實我並不真的那麼需要飲料解渴——而引發的喧擾之中，戴著無邊小帽的男人，一直溫和體貼地微笑著。

我恭維他家房子如此堂皇優美。他說，自從他從麥加回來以後，房子看來就更適意了，許是因為周圍綠意盎然的關係吧。我跟他問道，麥加的旅館設備如何。我想聽他談些新起的阿拉伯與穆斯林財富所營造出來的效果，可是他只是淡淡地說起，清真寺與卡巴聖堂附近的旅館比較昂貴，遠一點地方的旅館住宿就便宜多了。

他們全家是從孟買遷移到巴基斯坦來的，他們的家族企業在孟買市還留有一個分支機構。可是穆斯林在印度，「要挺身而出的話，不會受到鼓勵的。」有些人是「挺身而出」了，但一般而言都不會「受到鼓勵」。搬到巴基斯坦以後就容易多了，一切環境都是新穎的，大家重新開始，機會也增加許多；可是巴基斯坦至今仍然缺乏「基礎建設」。

我問他，遷到巴基斯坦跟當年住在孟買有什麼不一樣嗎？他說，在他而言，身為商場中人，實在沒有兩樣；生意就是生意。可是當你住在印度時，或是在某些其他國家，你怎麼樣也不能確定，你吃的肉是不是依照正確方式屠宰的；你還得四出詢問，提問還不見得會得到回應；有時候，你只有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住在巴基斯坦就不會有這種問題了。有時候要是你不在國內，卻想要上清真寺參拜，偏偏清真寺不是那麼容易找得到的，你還得四下探聽。這裡，一到禮拜的時間——他一邊說著，一邊比手勢，指著草坪的一端，接著又指向另一端——這裡，只要一到該禮拜的時間，這一邊就會有個穆安津出來宣禮，那一邊也會有個穆安津提醒大家禮拜。在巴基斯坦，絕對沒有找不到清真寺的問題。

他比我原先預期的要氣定神閒多了，也沒有我想像中的複雜。可是，阿摩德講到這位實業家，語氣中推崇他虔誠向教、身體力行教義以作為一個良善穆斯林的成分，遠多於他經營企業之高明與否。遵守規矩與框架才有自由可言，那位報社編輯薩拉胡丁先生也曾經這麼告誡過我。

而薩拉胡丁先生也曾經跟我說過，在伊斯蘭的調教下，才能培養出完美的孩童。這位實業家身型較為渾圓的長子，似乎就臻至如此完美的境界。男孩的父親說道，這孩子已經兩度前往麥加朝聖；而就在這個齋戒的月分，現在已近尾聲，這孩子還是秉持著嚴格得異乎尋常的自我規範，達到教義上的標準。而那個穿著阿拉伯服裝、臉上帶著酒窩的男孩，佯裝不知我們正在談論著他。男孩站在地壇邊上，扳弄著一截黑色的橡膠水管——只是平常的孩童戲耍，他的神色逐漸莊嚴內斂，微微地蹙起眉頭，仍舊打理

著他所關注的皮管要務，像個小阿拉伯人一樣。

時間將近晚間七點。家中其他成員和女人家們紛紛走出屋外，踏上地壇，圍繞在癱瘓的老爺子安樂椅周圍。夕陽雖好，只是將近開齋，我們起身告辭的時間也到了。

巴基斯坦逐漸向阿拉伯靠攏，還是令我感到相當離奇：小男孩穿著阿拉伯服裝，巴基斯坦煉鋼廠計畫以阿拉伯征服者的名字命名。詩人伊克巴爾在一九三〇年間提議創建專屬印度裔穆斯林的國家時曾經說過，印度的伊斯蘭教非比尋常，「在最有利條件下……將是一股群眾力量的力量。……因此，我強烈要求建立一個強固統一的穆斯林國家，以謀求印度與伊斯蘭教的最大福利。」他還說：「對印度而言，這個國家意味著安全與和平……；對伊斯蘭教而言，則是天賜良機，可以一舉摘除阿拉伯帝國主義硬要強加於宗教之上的標籤。」

可是自從一九三〇年代以降，世界不知經過幾回翻騰變遷；有人說，阿拉伯半島又重新登上世界舞台了。一九四七年以後，巴基斯坦也幾度棋盤翻新。而今，巴基斯坦追尋的不僅是伊克巴爾所鼓吹的穆斯林政體，而在徒勞無獲地追尋不可能的純粹信仰之後，這個國家又回頭招喚其阿拉伯起源，令人費解，同時間又具體實際。而當你造訪班布合爾——阿拉伯帝國初始崛起之際，遙遠的屯墾據點——之時，你正走在萬人骨塚上。

四 殺戮的歷史

想像中，阿拉伯人於第七世紀之間，受到先知聖言的鼓舞，策馬湧出阿拉伯半島，東征西討，掃蕩欲振乏力的帝國，強制國民改宗這種新的信仰。他們征伐的節奏迅速：向西推進，他們在西元七一〇年侵略了西哥德族人建立的西班牙王國；同一年，阿拉伯大軍在東方也有斬獲，他們移師通過波斯，直搗信德當地恢弘的印度——佛教帝國。阿拉伯勢力版圖擴張上，如此均衡對稱，強化了這種自然能量般的印象，信仰猶如火山熔岩流般外溢。可是，阿拉伯人撰述的信德征服史中——記載在一本名為《察克納瑪》(Chachnama)的書裡，我在巴基斯坦買到一本平裝版，係重新刊印自一九〇〇年出版於喀拉蚩的英譯本——這段歷程就沒那麼天翻地覆、血流漂杵了。

當時阿拉伯人不得不拚命搏鬥。他們在西元六三四至六四四年間，第二位哈里發或曰先知繼任人統治期間，首度將注意力轉移到信德，接下來的六、七十年間，阿拉伯人十次揮兵東伐，都未能擒獲此地。正如《察克納瑪》中清晰申明的，入侵最終的目標，不在於宣教改宗與推廣信仰。入侵信德是一樁擴展商機和帝國版圖的壯舉大業，進攻不能不顧收益利潤。復仇只是次要動機，投降歸順的人民無須改宗伊斯蘭教，卻強制進貢與納稅，財寶、奴隸及女人一概充公。

伊拉克總督哈嘉吉(Hajaj)坐鎮庫法，遙控入侵攻勢。就在戰鬥進行到一半，雙方猶然酣戰之

際，哈嘉吉接獲信德敗王的項上人頭，外帶六千奴隸與兩成劫掠自信德王室的財物寶藏，此時，他「腦門貼地，感恩禱祝再三，兩度五體投地敬拜真主，接著他讚頌真主：『下官今日有幸獲賜所有之寶藏，不分出土或仍然深藏地下，以及其他財富與俗世之王國。』」哈嘉吉召集庫法所有男女老少，一同聚集在鎮上知名的清真寺中，總督登上講壇，宣告周知：「各位敘利亞與阿拉伯的父老兄弟姊妹們，好消息，好運道，恭喜大家，我軍拿下北印度與大筆的財富……這財富也是全能至大的真主賞賜他們的。」淪陷區民眾可以自由改宗伊斯蘭教。可是征服者係阿拉伯人，俗世的王國臣服在他們的掌握之下。

信德征服史與西班牙征服墨西哥和秘魯的歷程有諸多相似之處，這並不只是巧合而已。阿拉伯人出馬征服西班牙約莫就在信德遭劫的同時，阿拉伯人在西班牙留下鮮明的印記。八百年後，西班牙征服者登陸新世界，他們就像歷史上的阿拉伯人一樣，緊抱著他們的信仰，盲信狂熱、頑強橫行、貧窮而貪婪。在許多方面，《察克納瑪》十分近似貝爾罕·迪亞茲·戴爾·卡斯提祐（Bernal Diaz del Castillo）所著的《新西班牙征服史》（*The Conquest of New Spain*）。卡斯提祐是一名西班牙軍人，晚年高掛軍刀，寫下他自一五一九年起追隨柯帝茲¹征剿墨西哥的親身經歷。兩部歷史著作的主題如出一轍：負有強烈使命感的帝國強權出擊，挾帶著對於這個世界的廣泛知識，遠征掃蕩某個遙遠的文化體，弱勢的被侵略者只能掌握對自身的了解，邊論試著探索他們被迫迎戰的對象究竟是何方神聖。征服世界的出擊者，奠定了可長可久的體系，世界觀也較為海闊天空，人民為了某個比較宏大的理念而結合在一起。遭到征服的人群，眼界較窄，懂得也比較少；他們受限於層層階級，或是即將崩潰、分崩離析的社會制度，淪為外力的俎上肉。同時值得玩味的是，不論是西元一五一九年的墨西哥或是西元七一〇年的信德，人民都因為即將遭到征服的預言而軟弱喪志。

然而，《察克納瑪》與《新西班牙征服史》之間還是有一項差別。西班牙人貝爾罕·迪亞茲寫的是「一連串親身經歷的事件」；《察克納瑪》則是一本阿拉伯或是典型的穆斯林作品，一個「歡樂的征服故事」，而且還是寫於信德劫掠之後五百年。作者是個波斯人，他的史料來源則是本於一部手稿，數世紀以來妥善保存在征服者的家人賓·夸辛姆的家人手中。

歷史事件與撰述之間相隔了五個世紀，經過五百年，這位波斯敘述者心中未曾介入一絲道德判斷或是歷史觀感，沒有新的疑惑，也不感到新的悲憫，無法分辨什麼是殘酷的，什麼是不殘酷的；然而，諸如此類的觀念，是連那個西班牙軍人貝爾罕·迪亞茲都能夠體會到的。可是對那個波斯人而言，他在二一六六年寫道，阿拉伯四出征服——「征服庫拉山（Khurasan）、亞杰姆（Ajam，波斯）、伊拉克、夏姆（Sham，敘利亞）、拉姆（Rum，拜占庭）與信德」——皆屬輝煌榮耀之功績，皆為宣展偉大文明的故事。征服史可以作為賞心悅目之讀物，因為征服是「基於屬靈之絕對正當，以及現世之優異表現……不論博學的哲學家與慷慨大度之君王率皆極力褒揚自豪；因為凡人均可以認定阿拉伯人民信仰之正信，進而精益求精，臻至完美」。這本書極力讚譽的征服當中，留下一個反諷：這些文字付梓不過幾年，蒙兀兒大軍就兵臨波斯與伊拉克城下，《察克納瑪》書中稱頌不已的阿拉伯文明，即將遭到蒙古人摧毀，奄奄一息達數世紀之久。

《察克納瑪》一開頭先講述信德本地改朝換代的歷史，交代這個即將為阿拉伯人推翻的王朝的來龍去脈。這一段敘述當中，年代與日期寥寥少見，敘述本質上還有些神話故事的意味。察克一手建立王朝。察克原本是個婆羅門的苦行修道僧，與兄長同居在一處鄉間廟宇中。有一天他去到皇帝宮殿毛遂自薦，願意充當宮廷內臣的書記兼秘書。察克高大英挺，相貌堂堂，談吐優雅，又寫得一手好字。他先是擔任通訊文書人員，內臣逝世之後，他就升官遞補為內臣；接著，他更上一層樓，當上了宰相。

1 柯帝茲（Hernan Cortés）：西元一五一九年，柯帝茲於當今的墨西哥城打敗了阿茲特克帝國，征服且屠殺了數百萬人，成為墨西哥的征服者。

事情發生在某一天，平常深居宮殿內院，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皇后，無意間見到這位婆羅門宰相。皇后一眼就愛上了他，並且對他大膽示愛。察克驚悚難堪，對皇后說，為人在世有四物，萬莫輕信或慢侮——水、火、風潮與君主。可是皇后切切懇求，她說，只要讓我一日見上卿一面就好。兩人爭執到最後，皇后如願以償。婆羅門苦行僧察克自此成為皇后的入幕之賓，他在信德當地的威權與日俱增，可謂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又過了幾年，皇上病篤，幾近瀕危。皇后無出，擔憂將遭到皇親罷黜與羞辱，於是她透過察克訂購了五十副鐵鍊，偷偷地運進宮殿裡。皇上病死，消息卻封鎖得滴水不漏，連御醫也被擋在門外。皇后假借皇上名義，傳令召集所有可望繼承王位的親王入殿晉見。王室成員一到，隨即鐵鍊枷鎖上身，下獄囚禁。接著，皇后再召集皇上貧窮的親戚進殿。這些窮親戚滿心怨懟，每個人都與某個富有的繼任者懷有宿仇，而今，他們機會來了，皇后假傳聖旨，應允他們復仇的權利，他們可以持刀砍下跟他們有仇的繼任人的腦袋，並且接收其財產。

繼任人都死光了以後，皇后再度降旨，欽點察克為其攝政王；接著昭告天下，皇上駕崩了。皇后以優渥禮物籠絡國內有權有勢的貴族，接著她就替察克加冕登基，民眾隨即蜂擁到殿前，為察克歡呼。駕崩的皇帝有個兄弟（他本身也是鄰近某個國家的統領）卻礙難苟同。他騎馬直入信德，宣稱王位應當由他繼承，並且挑戰察克一對一單挑搏鬥分高下。察克說：「我是個婆羅門。我們婆羅門不與騎馬作戰這一套。」於是那死了皇帝哥哥的鄰國統治者翻身下馬。察克一躍上馬，揮刀砍下挑戰者的腦袋。大勢至此底定。

權力就是權力；榮登大位的首要任務就是牢牢掌握權力於不墜。一日為王，就可以從心所欲，不受任何規章拘束。察克為王，就像任何一個皇帝一樣，隨時要安撫他的臣民，從上到下，從貴族到賤民都不例外。而為達安撫目的，任何手段都不見外。「為王之道，首重奸巧邪計、欺詐拐騙，以殲滅與順服強敵將過於盛大而無以力克，只有捐輸賠款以謀和平。」

「切記，為因應不時之需，為王者必將搜括財寶，深埋地下，因為無銀餉則無以召集兵士……無以發動戰事……俾令兵丁將士為國捐軀，為榮譽殞命。此外，誘以財貨，來犯敵軍可以輕易撤退。金銖在握，凡人皆可滿意解決世間一切爭端，金銖可以退敵，可以翦除仇家。同時間，但憑金銀財寶，凡人亦可妥善打點其通往來世之旅程。」

皇后沒多久就在故事裡消失了，察克統理全國四十餘年。首度擊退阿拉伯人進犯的也是察克，阿拉伯人初次企圖走海路，從迪巴爾港（Debal，或許就是現在的班布合爾）推進海上攻勢。察克薨，傳王位予察克之兄；兄薨，再傳位予察克之子達哈爾。

一日，有人向達哈爾推薦某一位道術極高的婆羅門占星家。既然古有明諭，為王需察納雅言，親近足智多謀的婆羅門，達哈爾就跨上大象，一訪這位有名的占星家。占星家極口讚頌達哈爾，前途不可限量，一片光明遠景；然而，占星家為達哈爾的妹妹占卜前景時，卻為達哈爾的運道蒙上一片烏雲。占星家說道，娶了達哈爾妹妹的人，將會統治這個國家。達哈爾困惑無解。他的宰相（此人是佛教徒）有個解決辦法：既然為王首要之務即在於保全王位，達哈爾應當迎娶其妹。宰相說道，天下有五狀況，一旦失勢無光，則其「樣貌感傷」：君王喪國、首輔去位、聖人無徒、落髮脫齒，還有年老婦孺乳乾垂墜。

宰相的建言令達哈爾家驚駭狐疑。宰相回到家裡，牽來一頭羊，將泥土與芥菜種子揉雜在羊毛中，再澆水灌溉羊身。過數日，芥菜子發芽，羊身遂轉為綠色。接著宰相將羊趕到城裡去，好奇人群莫不逐羊探看，傳說紛云。然而三日以後，驚異不再，綠毛山羊亦視為稀鬆平常。宰相再度進言道：「皇上明鑑，天下事，不論正邪，皆僅供凡夫俗子叨唸三日。三日既過，則無人在意其正邪與否。」由是，達哈

爾遂與其妹舉行婚禮，兩人在名義上完婚。

雖說這樁兄妹聯姻事件與信德國祚沒有什麼重大關聯，大致上也是子虛烏有的。可是從這位波斯—阿拉伯敘述者的角度看來，卻足以強調信德王國道德墮敗，以及察克王朝未能稱霸千秋萬世其來有自。

現在，敘述者的注意力轉移到阿拉伯人這一方了，敘述的風格也改變了，變得比較像在修撰正史，轉而依賴一連串的描述歷史傳承（「此係經哈茲利傳述，哈茲利係聽聞自慕薩之子緹步伊，慕薩亦係聽說自其父親……」）。我們又重新回到比較有組織、有紀律，比較不專橫武斷的世界，這是個法治的世界，這裡的人不論如何貪慕權力、聲譽與財富，還是要服膺某些眾人率皆遵循的規範。軍人服從將軍，將軍服從總督，總督服從哈里發，而所有的人都尊服在先知、伊斯蘭教與真主之下。

阿拉伯人兩度遠征信德失利之後，第三任哈里發歐斯曼（Osman，在位期間六四四～六五六年）下令就「北印度與信德」事務進行詳盡之調查報告，報告中應包含信德當局督戰原則、其策略、其政府屬性與其社會結構。這道命令降旨於阿布杜拉，哈基姆又奉阿布杜拉之命前往調查；爾後，哈基姆考察結果之周延令阿布杜拉印象良深，於是阿布杜拉派遣哈基姆入京晉見哈里發，親口對繼任先知訴說此行心得。

哈里發說了：「喔，哈基姆，你曾經一覽興都斯坦，洞悉其民情風俗嗎？」

「回我等信眾領導的話，哈基姆去過信德地方了。」

「請你描述予我等聽聞。」

「該地水質混濁烏黑。果實苦澀含毒。地質多石，土壤濃鹹。精兵勁旅易遭殲滅，大軍出擊則將飽受飢荒煎熬。」

「該地人民如何？可坦率誠實？抑或言不由衷，口蜜腹劍？」

「其人民奸狡邪佞。」

最後一項訊息令哈里發不寒而慄，下令禁止入侵信德。

可是，稍後幾任哈里發繼任之後，橫掃信德的主張又蠢蠢欲動，死灰復燃了。率軍第七度遠征信德的統帥是悉南（Sinan），如今，光陰似箭，白駒過隙，後人之所以還記得這位將軍，反而是他出生在先知歸西之前，並經先知賜名悉南。傳統中記載著，先知曾經對悉南的父親薩爾瑪說：「喔，薩爾瑪，恭喜你喜獲麟兒。」可是雖然先知有靈，現身在悉南的夢中，悉南還是出師未捷身先死，戰死在信德。第七次策進之後，阿拉伯又發動了兩次攻勢，結果也都損兵折將。

第七世紀將盡之時，哈嘉吉繼任為總督，統領「伊拉克、信德與北印度」。哈嘉吉上任後，先行處理庫法與伊拉克之間的宗教—種族叛離衝突。接著，他同樣也派遣大軍，揮師信德，因信德的達哈爾王不斷在幕後唆使穆斯林叛變。

哈嘉吉的軍隊淪為達哈爾王之子的手下敗將。阿拉伯將領遭戮，多少阿拉伯戰俘下獄監禁。當時在位的哈里發不願再聽朝臣提起信德。哈里發致函哈嘉吉，信中寫道：彼國遠居天涯一角，生民奸巧慳懶，幾度爭討，掏空國庫，穆斯林死於征戰者不計其數。可是哈嘉吉懇求哈里發再給他一次機會，不論再度出擊入侵將耗損國庫若干，他保證會加倍償還。哈里發同意了，於是他親頒手諭，下令入侵信德。哈嘉吉從敘利亞精選六千員沙場經驗豐富之戰士，由他的女婿，十七歲的穆罕默德·賓·夸辛姆擔任統帥，並親身督導建軍籌備事項，鉅細靡遺，務求完備切實。

部隊，包含員額完整的負重駱駝與負責管照駱駝的人員（每四位軍士配給一隻駱駝），採陸路東進。攻擊後勤所需，包括石腦油箭矢、鎖子鎧甲、破城槌，以及某種需要五百人力操作之特殊弩炮，則走水路會合。未經哈嘉吉核准，不論大小事務，賓·夸辛姆均按兵不動；少帥與老總之間公函往返，端賴一套傳令系統跑腿，俾便於七日之內往返信德與庫法兩端。哈嘉吉致函賓·夸辛姆的書信中，每每夾雜著帶兵之道與宗教勸導：「營寨周圍需掘深溝……夜半應保持警醒；軍中能讀《可蘭經》者，應時刻

吟誦……部隊紮營應盡量選擇空曠平地；作戰時，部隊應分做五軍並進：中軍、前鋒、後衛、左翼與右翼，騎兵隊應隨時配置於右翼。」

賓·夸辛姆抵達迪巴爾港。同一天，各項裝備也從海上運抵。可是哈嘉吉一直要部隊枯候到第八天才下令攻擊。第八天將盡之時，一名婆羅門出得城來。婆羅門對阿拉伯人說，該城係由某種護城符守護，護城符共計四面，迪巴爾大廟穹頂旗竿上懸垂而下的四面綠色絲質長旗即是。婆羅門說道，只要那四片長旗還飄揚在空中，迪巴爾軍民就會奮戰不歇。

這是信德人第一椿叛國事件，日後諸如此類的高層變節不斷地協助阿拉伯人攻城迫進。可是說起來，他們也算不上真的背叛。這不過是一群深諳「權力就是權力」的人，自然而然的轉向動作，他們以為眼前不過是將改朝換代、更替統治者而已；他們怎麼也料想不到，天地即將全然改觀，推擠上全新的軌道。

賓·夸辛姆諮詢他的弩炮工程師喬巴特，問他可有把握將大廟穹頂上的旗竿轟下來。

喬巴特開言道：「倘若我軍將兩根通條從大弩炮移開，只要三發大石彈子，俺就可以擊落旗幟旗竿，炸翻大廟穹頂。」

「擊落旗竿，本帥即賞賜你萬兩銀餉。」賓·夸辛姆說道：「不過，要是你未能擊落妖符，又當如何？萬一你搞砸了哈里發的弩炮，又當如何？」

喬巴特應道：「但憑主帥砍掉喬巴特雙手。」

作戰計畫就此議定（可是還要經過哈嘉吉批准）。第二天，阿拉伯人揮兵從四方進擊，大弩炮就推到喬巴特指定的地方就定位，五百弩炮手齊力繙拉，大石彈子擊出，旗竿應聲倒地，大廟穹頂瞬間灰飛湮滅。接著就像那個婆羅門事先預告的一樣：迪巴爾的守城官兵敞開城門，跪求開恩饒命。不過，哈嘉吉早已明確規範首度獲勝之後的處理事宜：迪巴爾城民一率殺無赦。阿拉伯軍奉令必須連續屠戮三天：

賓·夸辛姆就是這麼明確告知迪巴爾百姓的。

屠殺、劫掠之後，財寶與奴隸一切戰利所獲之五分之一要上繳皇室，「服膺虔信法則」進奉給哈里發，哈嘉吉的掌櫃就會全權負責了（值得玩味的是，回想起來，哥倫布與柯帝茲和其他新世界的征服者，都將劫掠所得進貢五分之一予西班牙皇室，說不定也是根源於阿拉伯人的宗教規範）；剩下來五分之一的迪巴爾戰利品則依照阿拉伯慣例公平分配：每位騎兵所獲為步兵或駱駝看管員的兩倍。

距離戰事結束還有一大段漫漫長路。信德幅員遼闊，許多城鎮皆擁兵自重。可是攻下迪巴爾就是建立了某種模式：首先部署攻城兵力；接著就有貴族或是婆羅門或是禁絕殺生的佛教高僧出城叛節；再來，阿拉伯人就會破城直搗，大肆殺戮；最後，戰利品預先扣除進貢哈里發的五分之一後，依法分配給眾將官（阿拉伯人在某個城鎮清點與分配戰利品，耗掉的時日跟屠殺花掉的時間一樣多）。

信德人民一直要到阿拉伯人打到悉維斯坦（Sivistan），才對他們的侵略者的底細有所了解。察納斯族派了個間諜前往敵營窺伺，看到阿拉伯人在營寨中集體禮拜：將士兵丁全體肅立，好一幅平等、團結、一致的畫面，將軍領導全員禮拜，行禮誦經莫不與將士一致。宗教在察納斯族人身上達到風行草偃的效果。他們排成一列縱隊，前往阿拉伯人的營寨——當時，阿拉伯人正在用晚餐——立地投降。（而今，見識過中國工兵在北方建造「新疆——巴基斯坦絲路」的巴基斯坦人，也都為中國人堅毅團結，感到類似察納斯族人的敬畏。）

迪巴爾屠殺之後，阿拉伯人進城宰殺對象的選擇性就提高了。商賈、工匠與農民都可以繼續其營

2 即中巴公路，路徑與古絲路有些許重疊，又稱為「喀喇崑崙公路」，也有「帕米爾之路」的美譽，在中國境內的路段約長四一五公里，起自喀什，止於紅其拉甫山口的中巴邊界，平均海拔三千公尺。西段在巴基斯坦境內，經由吉爾吉特，抵達首都喀拉蚩。

生，並保留其宗教風俗；婆羅門還是照樣擔任管理工作；非穆斯林只要納貢與征繳特種稅賦即可安家立命。可是哈嘉吉堅持戰士階級一律殺無赦，家屬也將強制從奴。當接獲達哈爾項上首級，以及賓·夸辛姆的戰勝報告時，他嚴苛地回覆：「我親愛的表弟，頃刻接獲爾令人精神振奮之書信，吾人之快慰歡愉，無垠無界。……然而，典律所載之寬赦條文顯然有別於吾弟所採之措施……至大真主於《可蘭經》中有言：『喔，正信信徒聽了，每遇非信徒，斬首莫延誤。』至大真主頒布如上之訓誡，吾人必將敬重與奉行不渝……以上，敬賀凱旋。納菲亞代筆於伊斯蘭曆九三年。」戰役進行到後來，哈嘉吉甚至又在信件中重申格殺論令：「吾人特別強調，參與征戰之人士應當一概處死，子女下獄，或是擒拿拘禁以為人質。」

因此，賓·夸辛姆攻下婆羅門納巴德（Braminabad）這個大城之後，「他直接到達該城行刑處所，當場下令以刀劍割下所有戰士階級的首級，據聞光是這一次集體行刑，即有六千餘人遭到屠殺喪命；亦有傳聞指出，屠殺人數應為一萬六千人。」

而達巴爾王從來未及了解戰爭本質，從來不知道此役將威脅的不單是他的王位寶座而已。戰爭之於他，帶著某種騎士精神，以及要命的遊戲成分。他原本可以將賓·夸辛姆阻擋在印度河岸之外，不讓阿拉伯人越雷池一步，他的參謀也忠言諄諄地勸告他，可是他卻以為這樣有損尊嚴。甚至在阿拉伯人過了印度河以後，他都還可以先行撤退，將侵略來軍困在沙漠中，自取殲滅；這同樣也是他的顧問直言諤諤地一再請他考慮的，可是他還是我行我素，覺得如此有損尊嚴。他死在戰場上。石腦油火箭射中了他的御象轎子，起火燃燒。轎子裡還有兩名女僕，一位替皇上備製檳榔，一位替皇上傳遞箭矢；轎子裡也有個婆羅門隨侍一旁。駝著御駕的大象背上著火灼身，大象劇痛受驚，衝進印度河畔的淺塘裡；騎在馬上的阿拉伯弓箭手一箭穿心，射殺達哈爾王於轎內。達哈爾就跟每個戰士一樣，馳赴戰場之際，就已經抱著必死的決心，臨行前，他連火葬的柴堆都準備好了。阿拉伯人發現他的屍首時（經轎內隨侍的婆羅門

洩密指引），達哈爾身上還洋溢著濃郁的麝香與玫瑰油芬芳。轎內兩名女僕也遭擒拿，稍後，她們幫賓·夸辛姆確認了皇上的首級。

為了保全達哈爾的國運，名義上與兄長聯姻的王妹在國破山河變之後，與家中一干女眷一同自焚身亡。達哈爾真正的妻子（而今已為阿拉伯哈里發與其國家之財產），經賓·夸辛姆連同一部分信德劫掠所得一併買下。達哈爾的兩名女兒則由阿比西尼亞的奴隸負責運送上京，專門侍候哈里發。

她們被哈里發納入後宮。他讓這兩位信德公主先行休息幾天，接著就差人將兩人帶進宮來陪他過夜。他想知道兩美之中誰是姊姊，他想要先臨幸姊姊，於是透過傳譯了解兩人的長幼關係。姊姊名喚蘇麗姬露（Suridew）。當哈里發想要攬她入懷時，她急著跳開，嘴裡說道：「王爺萬歲萬萬歲！奴家卑賤，配不上王爺陛下的寢宮，因為那位公正無私的王侯伊瑪杜丁·穆罕默德·賓·夸辛姆已經先逼著我們陪他三天了，然後再將我們送進京裡侍候王爺。或許，貴國風俗如此，不然，王族爵爺們怎能坐視如此羞慚的醜事。」

哈里發怒不可遏，隨即傳令與賓·夸辛姆，命他「置身於生皮中，回京晉見哈里發」。

賓·夸辛姆當時正在印度邊境上。他遵從王命，要他的手下將他包裹在一席新鮮獸皮之中，再將獸皮置於箱中，連箱帶人地運給哈里發。兩天不到，賓·夸辛姆就死了。屍首運到巴格達的時候，哈里發刻意要達哈爾王的公主前來認屍。他說：「你看，我們的將士是如何劍及履及地遵從我們的命令啊。」此時，蘇麗姬露坦承自己先前扯謊以報復賓·夸辛姆。她和她的妹妹兩人都還是處子之身，賓·夸辛姆根本連寒毛也沒碰到她們。

「哈里發立即下令將兩女活埋在一堵牆內。自此以降，一直到吾人之世，日復一日，伊斯蘭教的大纛不斷地冉冉高升，榮光與日俱增。」

這段史實的敘述，就這樣天外飛來一筆地結束，完結得毫無條理可言。賓·夸辛姆獲旨召回一節，

倒是透露了些許當時敘利亞與伊拉克政壇遞嬗的訊息；可是，《察克納瑪》中天方夜譚般的編造情節，以及書中隱晦暗示的道德墮落，反而提醒了讀者，《察克納瑪》與征服信德之間存在五百年的差距；強大的蒙古風暴即將襲來，摧枯拉朽之間，坍塌每一座清真寺塔樓，擊潰所有的伊斯蘭後宮。

為神學服務的歷史

阿拉伯征服信德的過程，截然有別於三個世紀之後穆斯林入侵印度本土的史實。可是，當年賓·夸辛姆征服的信德，是個幅員廣大的國家，大致包括了現在的巴基斯坦南部與阿富汗南部；《察克納瑪》可以說是伊斯蘭教進入這個國家的一部歷史紀錄。這是一部血腥殺戮的歷史，然而寫進學校教科書的段落，卻僅止於神話故事。一艘阿拉伯人的船準備將禮物載送給哈里發，達哈爾王攔截了這艘船，船上的穆斯林都淪為階下囚。其中兩位婦女哀聲喊道：「哈嘉吉，救救我們！」哈嘉吉為了拯救她們（而不是先前阿拉伯出征信德時遭到俘虜的兵丁），就決定發兵入侵信德。

即使在講神話故事，有些小節還是不能忽略，必須加以更正。迪巴爾大廟上的旗子，也就是被弩炮轟掉的護城符，是綠色的（我手上這本由信德人卡理契貝格譯為英文，並於一九〇〇年出版的版本中就是這麼說）。可是，綠色是伊斯蘭教的代表顏色，因此，至少有一種提供學童閱讀的教科書版本中，旗幟的顏色改為紅色。即使是小節，都不能忽略信仰教條的規範，更遑論史實大事了。

一九七九年九月，巴基斯坦國防紀念日當天，《巴基斯坦時報》上刊載了一篇長篇文章，推崇賓·夸辛姆為不世出的戰略家。該文純粹就軍事策略上探討，措詞中立，對攻守兩方都十分持平。結果，這篇評論引來巴基斯坦國家歷史與文化研究協會主席的嚴詞駁斥。

「撰文刻畫某位英雄形象時，尤其應當注意適切措詞。諸如『侵略者』與『防禦者』，以及『印度國軍』驍勇奮戰，卻因回防不及，未能『痛擊行將撤退之敵軍』之不當用詞，該文中比比皆是。更有甚者，以下偏倚失衡之敘述更污蔑了史實：『假若達哈爾王能英勇捍衛印度河，不令夸辛姆渡河，印度次大陸的歷史恐怕就要大幅改寫了。』吾人不僅費解，作者究竟是在歡慶英雄戰勝的事功，還是惋惜感嘆敵對一方之挫敗？」

伊斯蘭教現世之前，全世界禁錮在黑暗時期：這是穆斯林神學的一部分，歷史當然要為神學服務。古文明城市摩亨佐達羅出土於印度河谷，並於紀元前一五〇〇年遭亞利安人侵入，是巴基斯坦與全世界考古學上的輝煌成就。而今出土遺址飽受浸水與鹽分侵蝕，巴基斯坦政府遂向世界各個組織募款攤捐。《黎明報》上一篇專文募款函就為了保留這處遺跡而提出特殊主張。作者文中強調，有關單位應該在摩亨佐達羅「擇處」銘刻或豎立《可蘭經》經文：「例如說（到他們那裡去，喔，穆罕默德）：行旅至該地，眼見多行不義必自斃……例如說（喔，穆罕默德，去到不信真主的人群裡）：行旅到這裡，目睹不信您的人，冥冥之中有天理。他們大多為拜偶像者。」

就這樣，神學教義恣意出入歷史，矇騙了巴基斯坦人民。至於那些意識到國家機器運作不當，自覺即使身在穆斯林的祖國，感覺還是像個異鄉客一樣，或是橫遭褫奪家產，或是遭到威脅即將傾家蕩產的人們，對這些人來說，妄想跟如此輝煌勝利的伊斯蘭教攀親帶故，只是徒增來日紛擾。

在正統的伊斯蘭神學中，只有前四位哈里發曾獲正確指引。此後，哈里發的地位就父子繼，有如朝代更替；至此，已經背叛了伊斯蘭教中四海一家的理想。職是之故，信德是在阿拉伯人世道偏斜時期征服的；可是阿拉伯人將信仰傳播到信德來，所以困厄時期又轉變為神聖時期。接下來，蒙古人又摧毀了阿拉伯帝國的東方據點。所以說，蒙古人壞透了。可是蒙古人後來也改宗了伊斯蘭教，成為穆斯林，並且在印度奠定了偉大的蒙兀兒帝國，因此，這段時期又進而成為一段美好時光。再來，土耳其人將取蒙古人而代之，可是土耳其人同樣皈依伊斯蘭教，成為穆斯林，而且還威震八方，同樣的，他們也就不

再是壞人了。因此，信德的歷史——始於一段「賞心悅目的征服故事」——發展到最後，變得讓人束手無策地困惑難解。然而，某些巴基斯坦人還是從這股「不盡純為殖民」的混亂中，編織出自家民族的人格，其中，他們既是穆斯林，也是征服者，而且在巴基斯坦，他們還有點像是放逐於昔日榮光之外的境外流民。他們化身為土耳其人，或蒙古人，或阿拉伯人。

《察克納瑪》將第七世紀的阿拉伯人描述為一支經過伊斯蘭教啟發、教化與鍛鍊的民族，每在成功征服異族之後，就迅速地學習被征服者所擁有的新知識與新武器（弩炮與希臘火藥³），對於他們計畫攻擊的其他民族則充滿了知性上的好奇。目前巴基斯坦國內的基本教義派，力倡重返純正的伊斯蘭時期，顯然昧於理解阿拉伯擴張的歷史教訓。基本教義派人士以為，他們只需要一項工具——《可蘭經》，行為舉止就可以變化得像那些早期的阿拉伯人一樣。第七世紀時，將阿拉伯人造就為寰宇征服者的伊斯蘭教，現在卻蒙蔽了他們的繼承者，或是偽裝的繼承者之心智與判斷。

詩人伊克巴爾一心冀望建設一個印度裔穆斯林國家，可以讓伊斯蘭教擺脫「阿拉伯帝國主義者強加於上的標籤」。結果，阿拉伯人反而成為人類歷史上最成功的帝國主義者，因為在信徒眼中，遭到阿拉伯人征服，進而被迫同化，仍舊代表著靈魂獲得救贖。

在巴基斯坦學校教科書上，歷史僅僅開始於阿拉伯人入侵與伊斯蘭教。教科書上簡練地概述先知行誼，先知歸西後四位依序繼任的哈里發，接著或許也不會漏掉先知的女兒，最後再寥寥數語地將詩人伊克巴爾、巴基斯坦國父真納先生帶上一筆；兩、三位「殉教烈士」，即分別於一九六五年和一九七一年間對抗印度聖戰中捐軀的軍人或是飛行員，也附在一旁插花。

歷史撰述的選擇性如此殊異，迅速導向不切實際的虛無幻境。穆罕默德出世之前，世界只是一片黑暗，蓄奴、剝削橫行。可是，這是真的嗎？穆罕默德的教化廣布之後，人類的曙光初現，奴隸和剝削都消失了。可是，這又是真的嗎？有誰能言大而夸，或是教導這種不符現實的謊言呢？那些從信德押解上

京去侍候哈里發的奴隸又怎麼說？行走在喀拉蚩街頭的非洲黑奴後裔又怎麼說？如此扭曲史實，誰也無法自圓其說。此時，信仰就派上用場了，神主牌可以一以勾消，或是壓過了現實人世。

軍事政府執政，政黨活動一概禁止。巴基斯坦識字率僅及百分之十五，執拗的基本教條將大學束縛得動彈不得。巴基斯坦國內沒有工業，沒有科學，經濟全靠小額匯款支撐；不論合法、非法，巴基斯坦移民猶如潮水般湧向四方。然而，巴基斯坦英語學校六年級的社會課本裡，學童朗聲讀道：

薩爾滿說：「叔叔，我從我的歷史教科書上讀到，古早時期，種姓制度牢牢地箝制著印度，每個人都只能繼承家族固有的行業，他只能做這一項工作。」「喔！」薩爾滿的叔叔回答他說：「一直到现在，印度的狀況還是跟以前差不多。可是，我們是個民主國家，我們國內的每個人都可以自由選擇工作。這就是促使我們進步的秘密。」

五 海德拉巴德爵士樂

阿摩德要我深入信德內地，去海德拉巴德（Hyderabad）附近一座有名的陵墓。信德遍地可見穆斯林聖徒的陵墓。昔日佛教與印度教的聖地，早已為伊斯蘭教取代；可是古老的宗教心態仍然縈繞不去，而主張純粹淨化伊斯蘭信仰人士，則對於某些地方猶然遵行神秘性或是苦修，以及近乎偶像崇拜的宗教儀典，感到大謬不然。

可是阿摩德自有其道理。他力勸我取道一訪的陵墓（或是蘇菲中心），跟某個教士團或是兄弟會有關。他說，這個組織已經傳承了好幾個世紀的悠久歷史，他們棄絕了俗世的富貴浮雲，移居至此，專心侍服著老弱貧病民眾。他們在此地經營一所醫務室，每天中午到了午餐時間，他們就會提供所有前來果腹的窮人一頓熱飯。阿摩德就是受到如此犧牲與服務的理念所吸引。某一天上午，他派了一輛車來接我，送我往北走一百哩，直抵海德拉巴德。

跨出喀拉蚩，觸目所及盡是一片漠漠黃沙。高速公路平坦而迅速。公路架橋通過印度河，河谷寬廣，河水滔滔，夾沙帶泥；河面上小小的漁船，張著骯髒的白色船帆，頓時為這片漫漫無疆的沙漠平添幾許古典氣氛。海德拉巴德是一座難以名狀的沙漠小城，孤立著低矮、塗上赤赭色漆料的混凝土建築，焦烤在烈日之下。可是死水池塘還是隨處可見，這片沙漠顯然排水不良。

而當我到達巡迴招待所時，本來以為今晚就要住在這裡了，不料卻遇到些麻煩。兩個公務員操著不靈光的英語將我迎了進去，告訴我說，事出突然，某個部長剛到，他們不得不取消我預定的住宿登記，我可以改住另外一家旅館。他們不斷重複強調：「第一流的，第一流的。」可是他們帶我過去的地方，儘管還有中央空調，卻簡陋而昏暗，浴室裡的馬桶座墊還破了一角。

其實我大可不必在那裡過夜。負責帶著我四處遊覽的年輕人拉札克心中另有一套計畫。阿摩德的蘇菲中心可以等到第二天再去。拉札克打算利用當天晚上，帶我去看看其他幾處陵墓與宗教處所，車程要走上幾個小時，而且還跟蘇菲中心的方向完全背道而馳。我們就在下午兩、三點時出發。

參訪宗教聖地

拉札克是個信德人。他一開始帶著一個旅客啟程參訪某些宗教聖地，登時就化身為朝聖客，再多聖地也遊不膩。他同時也變得像個官方人員，緊抓著他的計畫與行程。他機智靈巧而溫善，可是語言的障礙令我們彼此火冒三丈。

我一開始就害他神經緊繃。我看到路邊有個男人身著信德的傳統服裝，隨口說道：「喔，拉札克，原來你們這裡也有非洲人。」他立即正色糾正我：「他們不是非洲人。他們是黑人，我們本地的黑人。」拉札克的英語自是精準的，只因為幾個巴基斯坦人——巴基斯坦英語教師系統——的關係，使得他說的都不是英語的口語，以致他一開口，我就得費點勁想想才知道他在說什麼。我說：「他們會利用這些蘆葦做些什麼嗎？拉札克？」他說：「囊子。」我聽了一頭霧水。過了半晌，我說：「囊子是做什麼用的？」現在輪到他奮力抑制不耐。他說：「囊子就是用來裝家用東西的。」原來是籃子。他的定義同樣精準，卻無疑地費去他不少心思，結果可能就像那樣子：他當奇可·馬克斯，我就是他的哈普，抑或他

作哈普，我當他的奇可¹。

因此，雖然拉札克一路上為我長篇大論、費心解說，我卻還是莫名所以地，當行經信德這處歷史悠久、人文薈萃的地方，不解為什麼經過某些地點的時候，拉札克就會特別興奮。一直要到後來，我才恍然大悟，舉例而言，曼殊拉（Mansura）那處廢墟，千百年前竟然是達哈爾王的大城婆羅門納巴德。

我們在第一處陵墓撲了個空。拉札克告訴我說，坐鎮此地的聖人，門下有十萬名追隨者。我們到的時候，已經天黑兩個小時了，進入這處圍地，就像是步入一座中世紀城鎮一樣。幾個小僮為我們敞開城門，等我們進城，又忙不迭地在我們身後合掩城門。城內巷弄地面上都鋪上石磚，路面中央還鋪設有排水管道。許多人在這位偉人的庭園前方平台上席地而坐。有個人將我們來訪的訊息傳達到內室，接著，屋子裡走出另外一個人來回覆我們。他年高削瘦，穿著藍色的長袍，左手上戴著一只布質手套。他說，偉人只有早上見客，現在已經是他的休息時間了。

於是我們只有快快樂離去，繼續開車前往阿布度爾·拉提夫王（Shah Abdul Latif）的陵墓。暗夜之中，清真寺前鋪上地磚的庭園傳出陣陣樂音，那是這位聖人傳唱了兩百五十年的祈禱短歌。奔波了一整天之後，黑夜中聽到這樣的歌聲——一小群民眾，有些人已經沉沉睡酣然，有些人則來來去去——前些時候我在麥什德的阿亞圖拉沙里亞特馬達理的屋子裡所體會到感受，現在又湧上心頭，伊斯蘭教已經將信徒結合在一起，產生某種瑰麗美感，信徒可以體會到某種完整圓融的感受——只是，假如穆斯林國度可以孤立在外界現世紛擾之外就好了；假如，人可以忘卻過去所習知的一切就好了。

我在陵墓休息場所的房間空調系統無法運轉，要是我敞開窗戶的話，成群昆蟲就會蜂擁而入，而我偏偏就是為了避開蚊蟲叮咬，才沒跟拉札克與其他等人等一同露天而眠。要睡在月光下，你還得將自己從

¹ 這個隱喻指的是美國四〇年代間炙手可熱的喜劇兄弟檔：馬克斯兄弟。

頭到腳裏得密不透風，纏得跟個木乃伊一樣，那可得費點功夫練習。於是，我就待在熱氣蒸騰的房間裡休息，靜候日出破曉。我們預計趁著大清早出發，專程駛回海德拉巴德，趕在中午前到達阿摩德熱心推薦的蘇非中心，參訪他們每天中午招待貧民免費午餐的慈善活動——阿摩德還特別強調這一點。

車子駛出海德拉巴德之後，數畦耕地零星可見，幾處灌叢，幾處沙地。明亮天光刺眼難當，烈日炙熱令人難耐，鄉間野狗靜靜地站立在泥黃色的積水池畔。我們現在已經到達某個早期文明的知名河谷，可是周遭感覺不像河谷；這裡感覺像是一片廣袤無邊的平原，直到你注意到這塊平坦谷地，其實地勢高低各自不同，地勢較高處的土地上，堆著一塊塊巨大岩石，因此，感覺上印度河谷是這股浩瀚天水沖激下唯一倖存的遺跡，這股洪流所向披靡，沒有岩石保護的區域一律洗為平地。經過幾哩之後，我們就開到這條河的西岸了。遠處綿亙著崎嶇嶮巖的山丘，山丘純為大石堆砌而成，皸裂處處可見。這道山勢必然是經由某些天搖地動的激烈變化而崛起，岩層受力向上凸起，再傾頹摺疊，就像一團麵糰一樣；接著大洪水從天而降，沖潰了構成岡脊的岩石。河道在這裡猛地轉了個彎。再過不遠，就是陵墓所在的城鎮。

鎮上主要大街兩旁的攤子上懸吊著布托先生的遺照。布托先生在執政期間，曾經出於主動或是被動地斥資為這所陵墓添加幾道新的鍍金柵欄門。站在陵墓外面，隔著外圍的鐵門，就可以看見新建的鍍金柵欄門。牆上嵌著一面匾額，記載著布托先生的贈禮義行；可是自從他死了以後，匾額就用一塊鑲著金邊的綠色布匹遮了起來。朝聖客進入陵墓之前，都會看到鍍金柵欄門與這塊綠色的布匹。

我們脫下鞋子，交給坐在遮陽篷下的男人保管。他頭上纏著頭巾，神情肅穆，動作迅速，顯然訓練有素。他將每雙鞋子個別綁在一起，編上編號，每雙鞋子的保管費用都是半個盧比。如此收費似乎偏高了，可這是獨門生意，沒有競爭。我問拉扎克，陵墓旁邊的攤位是世襲的，還是受到保護的專利？他說，陵墓門口保管鞋子的攤位是經過政府公開招標的，標金可以高達四千巴基斯坦盧比，合計四百美

金。成功得標的話，不論如何，一定生意興隆。

廟裡空間不大，信徒甚眾，摩肩擦踵。有人就睡在磨損陳舊的大理石地板上。他們都是來自遠方的信徒，而且對窮人來說，晚上也只能在廟裡過夜。他們都是沙漠地區的可憐人，出身印度河附近零星貧瘠的耕地與窮苦的村落，對這些人而言，這座陵墓——以及此地所有的陵墓，甚至在伊斯蘭教興起之前，橫阻在大河與碎裂的山脈岩石之間——總是提供了庇蔭與舒適。大理石地板骯髒污穢，嬰兒在地上或坐或爬，成群蒼蠅嗡嗡振翅，四下梭巡，尋找地板或是人體停駐。

陵墓——聖人的墓碑——四周圍上銀色的欄杆，工藝精巧優美，卻被信徒雙手摩挲得失去光澤。陵墓某個角落上的柱子已經斷了，或許是在某個特殊的日子裡，虔誠的朝聖人群一擁而上，擠斷了柱子，甚至是現在，當場都還可以感覺到這種狂熱。陵墓周圍搭起幾座單篷，層層相疊，天花板下撐著一張鐵絲網，或許是為了攔截鳥糞吧。支撐單篷的竿子上還用一條短短鐵線懸吊著一顆石頭，石頭周圍用銀色的金屬圈緊緊箍住。石頭是心型的，淺棕色的表面，經過信徒日積月累的摩挲，益加平滑光亮，輪到我伸手撫觸時，還真有種肉質的觸感。可是拉扎克說，這位聖人生前就將這塊石頭繫在腹間，從不離身；先知也做過同樣的事情。（話雖如此，說不定這其實是一種源自阿拉伯酷刑的苦行修道方式：畢拉爾〔Bilal〕，最先接受先知訊息的阿比西尼亞奴隸，日後就是被阿拉伯人在胸口壓上一塊大石頭，捆綁、曝曬在麥加沙漠中而死的。）

信徒先以雙手搓摩石頭，充分撫觸之後，再將手按在自己的嘴唇與雙眼上，或是緊摀著胸口，或是看起來緊緊地擁抱著自己。寺廟外，這個印度河谷小鎮在烈日灼燒下煎熬，可是陵墓裡滿溢著宗教熱情。來此謁靈，不能放過的除了這塊心型石頭和墓碑周圍的欄杆之外，還要一親垂墜在聖人墓碑之上的布縷，布縷盡頭某處還放置著一具法冠與一襲長袍，樣式奇妙得近似基督教法事用具，還有一頂頭巾，似乎代表著一顆頭顱。這是一塊信仰的大地，卻同時也是一處飛砂走塵、鼻孔乾燥與掘挖鼻孔的地方。

有個農婦先是用手搓摩墓碑欄杆，再用手碰觸她年幼兒子的嘴唇，當然，出手撫摸欄杆前後，也不忘頻頻揉搓清理她的鼻孔。

我們接著轉往「科裡」(Koli)，意即蘇菲中心。蘇菲中心就在一條市集短巷子底，巷弄地面上的灰塵經過雨水冲刷，以及街道兩旁吃食攤子洗刷的髒水匯流，轉為烏黑的泥漿。小吃攤子生意興隆，忙得不可開交，雖說現在正是科裡開門賑濟貧民的時候，蘇菲中心進門的長龍中，還是人手一圈棕色的扁麵包。

我們一腳踏進喧攘、忙碌與樂音之中，右手邊又是一座陵墓：先前多位皮爾的墓碑，他們都是受到聖人的精神感召，定居此地，將聖人的行止精髓發揚光大的虔誠信徒，接著他們就成為這個兄弟會的管理者或是領導人。有個來自沙漠地區的蒙德里安²，正在陵墓四周的牆壁上敲敲打打地嵌釘上現代浴室的磁磚，創造出比這位抽象畫畫家的名畫〈百老匯爵士樂〉畫面更加寬廣、畫風更為直接的「海德拉巴德爵士樂」，黃色、白色、藍色、紅色、黑色等等不同顏色構成的線條逐級爬升，映入眼簾，賞心悅目，因為畫面所呈現的喜悅如此純淨。

陵墓正前方，幾根柱子撐起一頂大帳棚，這裡就是賑粥之處。棕色的扁麵包堆成一落落的小塔，塔上蒙著粗布防塵，一個男人站在前面守著麵包，麵包的色澤不但意味著麵糰是全麥製成的，也暗示著印度河谷的泥土顏色。另外一個男人則從一只黑色大鐵鍋裡，舀出一杓又一杓的稀薄扁豆湯。建築物門廊左邊則有一個男人負責分配飲水；另一端，一個男孩有感於其任務之重要，牢牢地握著銜接水龍頭與水桶的橡皮水管。

拉扎克跟一個身穿藍色道袍的人攀談起來，此人顯然是在這裡管事的。藍袍男人個頭矮小，身型虎背熊腰，理個小平頭，五官有種中亞風味。他說，皮爾出門去了，三個小時以後會回來。在巴基斯坦，公定的延誤時間是以每半小時為標準單位；三個小時，換言之，就是明天請早了。難道說我們這下就找

不到人可以談談了嗎？穿著藍袍的男人說，孟席(Munshi)，也就是秘書，應該有空可以跟我們聊聊。他詢問我們的姓名與一些細節資料。拉扎克跟他如實敘述時，藍袍男人用英語說了，毫無抑揚頓挫，音調平板得奇妙，兩隻眼睛仍然骨碌碌地打量著我們。他說，歡迎我們來此作客，在清真寺過夜，要待多久都沒關係。皮爾三個小時以後就會回來，同時間，我們可以跟孟席一談，我們也可以領用食物，我們是他的客人。

他差遣了一名下人領著我們上樓。我們蹣跚著腳步避開水窪(水管漏水積成的)，跟著那人穿過樓上近乎迷宮的四角陽台中庭，進入一間整潔的房間，房間地板上鋪著寢具，還有兩套長枕與坐墊。房間裡一具電扇運轉送風；窗牖敞開，房內涼爽宜人，無以言喻地輕鬆舒適。窗外牆上架著兩具唱機，或者是配有擴大器的收音機，房內的風扇嗡嗡隱沒了外面的噪音；擴大器播送的歌曲，那可不是電影主題曲，拉扎克說道，這是祈禱短歌，一首接一首地，彼此中和抵銷；房內如此涼爽，歌曲頓而形成一種遙遠而悅人的背景音樂。

孟席沒有過來。五分鐘後，我們沒見著他，十分鐘後，還是沒人影。可是餐點卻先上樓來了，送上食物的是個男孩，抑或是個年輕男人，身穿棕色的巴基斯坦傳統服裝。他的面容極為俊美，想到他竟然選擇以犧牲與服務作為終生職志，就不禁感到驚訝。拉扎克(年方二十七就已經心寬體胖，圓呼呼的了)佯裝他能理解我對食物的緊張敏感，可是沒多久他就有如風捲殘雲，舔嘴咂舌地吃到盤底朝天。然

2 蒙德里安(Piet Mondrian)：一八七二年生於荷蘭，卒於一九四四年，他是新造型主義的重要代表畫家。新造型主義是沿續達達派的抽象藝術，捨棄一切有形象的造型，改以水平線與垂直線及單純色調的正方形與長方形的配置來構成畫面，在大大小小不同的方格及不同顏色、長短不同的線條中，產生的和諧和韻律，極具音樂性。〈百老匯爵士樂〉(Broadway Boogie Woogie)是蒙氏著名的代表作之一，典藏於紐約現代美術館。(編按：Boogie-Woogie是美國深南方早年的一種即興音樂，以鋼琴為伴奏樂器，左右手各彈出主題與變奏，通常是以藍調和弦為基礎，對後來的搖滾樂發展有深遠影響。)

而，孟席還是沒有現身，而當那男孩再度上樓來奉茶時，茶湯也是以印度——巴基斯坦街頭市場方式燉煮，茶葉加糖，和上開水及牛奶煮沸，濃烈甘醇，兼以提神醒腦。我就請他留步，談談他自己。

要跟他談話還真不簡單。倒不是因為他諱莫若深，而是因為他似乎對於自己的未來缺乏連貫性的概念。過往經歷浮散在他的心頭，你還得先問上許多多枝微末節的小問題，因為他被動得叫人咋舌。他的措詞（經過拉札克翻譯）語氣非常溫和，談話之間，他一對眼睛一直垂得低低的。

他在這個社區裡已經待了一年了，再過一年，他就準備走人了，他連想都沒想過要在這裡犧牲奉獻一輩子。可是既然他還是想要找份工作，成家立業，那麼他利用這段時間學個手藝或是學做生意，對將來應該比較會有幫助吧？他說，他曾經在淨水廠擔任過接管工人，每個月工資四百五十盧比；倘若他願意，還是可以去吃這份回頭草。

他老家在白夏瓦，位在巴基斯坦與阿富汗接壤的北方邊境省分。他家擁有一百英畝的耕地，以及一輛鐵牛；可是家裡有六個兄弟，食指浩繁，於是他加入浩大的南遷移民潮。他先在喀拉蚩（據指出，該城曾經容納一百萬來自邊境省分、原居印度西北境的阿富汗移民）停留了一段時間，接著就來到了海德拉巴德。他有個朋友跟他提起這個社區，帶他到這間宿舍參觀。他在宿舍也見到兩位同鄉，同樣是遠從北部村落南下的。於是，他又三番兩次地回訪這個宿舍，可是他還是心猿意馬地拿不定主意，一直到他見過了皮爾，才決定留下來。

過往經歷浮散在他的心頭，他似乎對未來毫無目標。他是個徒步旅行者。旁觀者透過他，比較容易參透歐洲中世紀徒步旅行者的人生經歷。這處偏居沙漠一角的宗教社區，只是一處中途站，協助他度過人生中的某一段落。不消多疑，在巴基斯坦——境外移民與國內移居同樣熙攘繁忙——許多人一定跟他一樣，天涯行腳，輾轉風塵，逆來順受，消磨人生。

我問到，這個社區有沒有外國人造訪，而當他們加入服務時，他們的表現會不會異於常人？這個問題令他的臉上多了一分光彩，抬起頭來，像個興高采烈的男孩般。他說，之前有個孟加拉人在這裡待了一個多月。他身無分文，什麼也沒有。有一天，有個男人開車過來接他到喀拉蚩去。而當那個孟加拉人回來時，可就開著他自己的車子了。

這是純粹運氣好呢？還是其中牽涉到某些交易？

顯然地，白夏瓦男孩自有令人眼睛一亮的回答。可惜，答案還來不及說出口，因為在這個時候，藍袍男人——小平頭、堅實的大肚子、寬厚的肩膀、上下不住打量的眼睛——進來了。穿著棕色服裝的男孩頓時緊張起來，噤若寒蟬，兩眼再度低垂，收拾了茶具茶碗之後就快速告退了。

在蘇菲中心

藍袍男人在我們面前跪坐下來，一屁股坐在雙腳腳跟上，雙膝就歇在地板的鋪蓋上。既然（雖說他嘴巴沒這麼講）孟席無暇分身，他自己就來跟我們談談。

他用英語說道：「你想知道些什麼？」

此時他口音之清晰，讓我吃了一驚。自從剛剛他在庭院裡跟我們交談過後，他的英語還真是進步神速。此時他清晰的口音當中有種侵略的意味，可是，這是種經過悉心造作的侵略，可以加強，也可以軟化；他還不了解我。我說，我自己也還說不上來現在究竟想要知道些什麼；不論他想跟我說些什麼，我都會洗耳恭聽的。

成串的英語字彙從他口中源源流出：「我會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信徒有千百種，有人求財，有人巴望來世投好胎，我則只想要見到阿拉。你只有透過靈媒才能見到阿拉。我的穆爾西德就是我的靈媒。我要愛我的穆爾西德。我要讓我的穆爾西德進入我的心中。阿拉跟我的穆爾西德在一起。而當我的

穆爾西德進入我的心中時，阿拉就與我同在。我心裡一點疑惑也沒有。我可以透過靈媒，以穆爾西德的形式見到阿拉。透過靈媒和以這種形式。」

穆爾西德並不如我私心想當然爾，一定是皮爾或是這個宗教社區的領導人。其實只有埋骨長眠此地的聖人才是穆爾西德，陵墓中的墓碑也是專門紀念他的。

藍袍男人以政治上的類比，進一步加以解釋：「奎德——埃——阿札姆（真納先生）建立了巴基斯坦。」他就像是穆爾西德一樣。「可是現在我們都要聽總統齊亞·烏爾——哈克發號施令。」總統就像是皮爾。藍袍男人伸手指著拉札克說：「你要聽齊亞·烏爾——哈克的。」他又轉過身來指著我說：「你也要聽齊亞·烏爾——哈克的。我也要聽齊亞·烏爾——哈克的。」我開始聽出他這段長篇大論中，類乎誦經念咒的成分了。

他說：「我還沒真的熱誠招待你們。那是因為我的穆爾西德。我不認識你，你不認識我。可是我還是竭盡所能地服務你們，因為我愛我的穆爾西德。我要我的穆爾西德進入我的心中。」

這個社區裡住有約莫一百名虔誠信徒。他們每天都會提供八百到一千名貧民賑粥服務，同時還經營一所醫務室（醫務室在樓下一間小房間裡，房間就在舀水男人所站位置附近）。可是，他們的經費又是從何而來呢？

藍袍男人說，前任皮爾是個聖人。「他無時無刻都在侍奉阿拉。他終日封齋，整晚都在祈禱。我告訴你，要把你兩隻手併成那樣子，可不容易呀。」他將兩手掌併在一起，併指開掌，這正是穆斯林的標準姿態，將雙手攤得像是開卷閱讀一樣。然後，他站起身來，示範這種禮拜時的開掌祈禱動作，重複他剛才說的話。「無時無刻不在侍奉阿拉。終日封齋，整晚都在祈禱。你像他那樣捧著手掌十分鐘試試看。」他再度跪坐在腳跟上。「他締造了多少奇蹟。他五十年來什麼也沒吃過。三年沒喝過一口水。人家對他說，倘若你再不喝水，就要準備報廢了，到那個時候，他才決定開口喝水的。」

可是，他們究竟是從哪裡籌到社區運作所需經費的呢？

藍袍男人說了：「我這不就告訴你嘛。要不是這些犧牲奉獻，這個地方怎麼搞得起來呢？我們的穆爾西德現在有好多好多穆理德（murtid），就是追隨者，遍布全世界。他們帶著大筆盧比過來。他們佈施一個盧比、五個盧比、十個盧比。而我們採買東西都會討價還價，要到好價錢。我還沒真的熱情款待你們。那是因為我的穆爾西德。信徒有千百種。我想要見到阿拉。重要的是，我只有透過靈媒，以我的穆爾西德的形式，才能見到阿拉。你了解嗎？」

我問他，當他搓摩掛在穆爾西德墓碑上的那顆心型石頭時，究竟感覺如何。令我驚訝的是，他好像根本不知道我在講些什麼。而當我再次相詢時，他說，他在這個社區中事情太忙了。

棕衣男孩表情熱切的站在門口，可是當他看見那個藍袍男人還是跪坐在我們跟前時，男孩就黯然無語地打著赤腳轉身離去了。先前，他提到的孟加拉人與新車的故事，撩得我饒感興趣；此時，藍袍男人繼續嘮嘮叨叨下去，翻來覆去，舊話重提，將先前的句子依照不同次序重新排列組合，開始讓我如坐針氈了。

他又跟我講了個前任皮爾的神蹟。社區裡某個苦行僧法吉爾（Fajir）死了，他們跟皮爾報信，他就趕到那個停屍的房間裡。他一腳踏進房門，死人就舉起他的右手，對著皮爾行了個穆斯林的敬禮。皮爾勃然大怒，掄起手杖猛敲那具死屍，口中罵道：「你還要再多下工夫，控制自己的身體。難道你不曉得死人對我敬禮是不正確的嗎！」

我問藍袍男人，可不可以麻煩他再請那個男孩送些茶進來呢？我拜託他許多次，可是我們就是沒法子再跟那個棕衣男孩獨處。藍袍男人說了，我們可以稍後再用茶，不過我們得先參觀廚房，接著我們當然一定要到前任皮爾墓前膜拜。他現在可沒打算讓我們清靜。我開始了解，原來這是他送我們離開這處社區的方式。

我試著將話題再轉回他自己身上，但請他談談自己就像跟棕衣男孩講話一樣困難。他話隨心轉，東拉西扯地講些個人經歷；過往經歷在他心中從未形成任何模式，他只知道自己現在身處何方而已。他同樣是個流浪旅人，同樣也曾經參與巴基斯坦中世紀的集體漂移生活。儘管他臉上有著富於中亞風味的五官（配上小平頭就更加突顯了），他卻跟棕衣男孩一樣，都是出身邊境省分的。他曾經進入一所農學院就讀，可是未曾獲得學位。此後，他打零工過了幾年，接著就到了這所社區。他見到現任的皮爾，登時就決定要待下來。當時他未曾徵得任何許可，就這樣待了下來（而拉札克在一旁插嘴道，而今，他已經是現任皮爾的「得力助手」了）。他的父親在邊境省分務農。耕地面積多大？十六英畝。土壤肥沃嗎？非常優良。家中還有其他兄弟姊妹嗎？沒有。那麼，令尊過世後，誰來接管農務呢？他以為我問的是，農場上需要他效力嗎？就回答說，農地已經包出去給人家機械化耕耘了。當他繼承家產時，這十六英畝耕地會有什麼變化嗎？他說他不知道，他已經捨棄了那一個面向的人生了。

我們下樓去參觀廚房。中餐賑粥時段已經結束了，廚房裡烹調的活兒卻還在進行中。我們遵守規定，脫下鞋子，赤腳踩踏著厚重、黏黏的灰塵，從主建築走到廚房棚子裡。他們在廚房裡就著大口銅鍋煮茶，而就在一束束薪柴之間，棕衣男孩閒散地站著，跟我們保持著距離。

一頂露天棚子下，正對著幾座麵包烤窯，有個男人湊著一張高腳大理石檯子，正費力地揉著棕色麵糰，雙手及肘都埋在麵糰裡猛揉著；他身邊的大理石檯子揉過的麵糰上停著成群蒼蠅，不斷摩擦著前腳。一個男人正在煮著扁豆湯，另外還有個男人探進麵包烤窯裡，盯著烤箱。廚房裡所有的員工都剃著小平頭，每個人雙眼都閃閃發亮，兩頰圓圓胖胖的。他們的態度都很友善，一點也不介意外人參觀打量；他們置身於食物與資源之中，自知自己正是侍奉窮人與真主。諸如此類的烹調景象，一再重複表現在北印度的畫作中：我感覺這些臉龐似曾相識。

藍袍男人領著我們，一座接著一座地走過所有埋骨於此的皮爾墓碑，還要我們一一撫觸碑石。接著，我們就坐在磁磚給日頭烤得滾燙的庭園裡，欣賞那幅「海德拉巴德爵士樂」磁磚壁畫上，拾級爬升的彩色線條所顯露的喜悅。棕衣男孩怯生生地為我們送上茶來。他沒有立刻走開。我們的時間也差不多了，於是，我就直接問他那個孟加拉人的故事。

棕衣男孩說道：「他去了喀拉蚩，然後又回來了。我跟你講過啦。」
「孟加拉人？」藍袍男人聞聲說道：「我們這裡的人來自世界各地。我不認識你，你不認識我。可是，我還是服務你們——」他坐在一道白色磁磚貼面的檯子上，驟然間他住了嘴，彷彿渾身精力都消磨殆盡在午後的炎熱、灰塵、沙漠與單調而一成不變的生活中。

我們重新坐回車中，駛進付費小吃攤子林立、泥濘污濁的巷弄。拉札克說道：「你還記得他說到買東西的時候嗎？他說他會去『倒價凡價』。他在科裡是不應該『倒價凡價』的。」拉札克是身為良善的穆斯林有感而發的。

我們將車子開回河岸與岩石山壁之間。岩層彼此傾軋，接著又遭到大洪水衝擊，產生巨大裂壑，岩石一層一層地風化裂解飛散，由是，山區某些地方就像是一座巨大的石質半圓形劇場的階梯觀眾席，只是整個劇場嚴重地傾斜。

我們在一處巨大裂縫前停車諦看。拉札克午餐果腹之後精神百倍，再灌上一瓶巴基斯坦的七喜汽水——泡喜汽水（Bubble-Up，光聽他講起這個字眼的發音，就夠逗趣的了）後，更是活蹦亂跳地無畏烈日高熱。

我們走得越靠近這座山，山勢便越高聳。當我們終於走到山陰時，氣溫也變得比較涼爽了。這是一處令人望而敬畏的地點。可是山腳下的印度教寺廟原本建來就是為了表現這分敬畏，小型的金字塔屋頂建築結構，年代並不久遠，不過是建於一九四七年以前而已，卻已經頹圮殘破，廟裡無人住持，空無一物，牆上也被人用烏爾都語塗鴉得面目全非：敵人已經將眾神徹底驅除出廟了。而這裡也是個知名的

地點：水柱激流曾經拚力衝擊山壁，接下來，水勢較小的亂流又再次淘洗岩層夾縫，沖刷出平滑的壺穴與巨大的洞穴，而今只剩下一處鹽泉，治療功效遠近馳名。山塊之間的裂縫中，一抹青藍色，鹽流行經撫潤之處，岩石上莫不留下一層白色的黏泥。而這條鹽流中，俯拾即是的不光是小小圓石，還有大量的海生物化石。

拉扎克有著一雙自然學者的銳利眼睛。他彎下腰來，撿起一塊石頭，我可以在石頭表面上看到貝殼的圖案；他又揀了個貽貝放在我手中，這顆貽貝整個都充分石化了；接著他又找到一個海螺一樣的貝殼。伊斯蘭教、佛教徒、印度教徒、亞利安人、早於亞利安人的先民，即使早在建立史前城市摩亨佐—達羅與哈拉巴的民族來此落地生根之前，印度河谷就已經奠定文明了。可是更能讓人心馳神蕩的不可解奇蹟在於，這塊大地過去曾經深沉在海底，這道稀薄的鹽泉從熾熱的岩石縫中湧出，代表著這陸塊過去深潛海底的證據，而今大地離海日遠，烈日光照，高溫燒烤，高聲地籲求水分潤澤。

以聖墓正氣來治療

我們回到海德拉巴德的巡迴招待所時，還是橫生阻撓。我曾經預定登記前天晚上住宿，但今晚還是沒有預定讓我過夜的登記。招待所空空蕩蕩的，今晚並沒有達官顯貴預定前來住宿，可是卻得講上一個小時的電話，拉扎克被一位政府官員轉接到另外一位官員線上，費了半天功夫才獲得住宿許可。

第二天上午，我們也不用走遠。光是在海德拉巴德裡，鎮上有一處用泥牆圍起的要塞，據聞是由最後一任穆斯林王侯抑或信德親王所建。要塞裡就有一座陵墓，凡是心理有障礙的信徒都會前往治療獲救。

陵墓坐落在一列大理石階梯之上。階梯底端散坐著幾個皮膚皺縮得愁慘可悲的婦女，其中還人抱著襁褓嬰孩。她們坐在那裡，只是在等待施捨。兩三階台階上，一個男人正在擊鼓高歌。階梯頂端，一條鋪上地磚的巷道，隔開兩座小型建築，左邊建築物是當年聖人冥想的所在，右邊建築物則是他埋骨之處。聖人墓碑周圍圍起鐵條柵欄，陵墓守衛是個渾圓而友善的小個頭男人，坐在前庭架有梁柱的迴廊地板上，地板上鋪著磁磚，成群蒼蠅嗡嗡擁簇著他。他在前來求助的信徒眼中，就像是孩童見到甜點舖子的老闆，彷彿就是全世界最富足無虞的人。他正跟一個紅著眼睛、失心瘋狂的男人閒扯些八卦，而他們一邊聊著，一邊還像是在以物易物或是彼此交流著某種豆子。

兩個人踱了過來，繞行墓碑，緩緩地走在兩座建築物之間的巷弄上，俾能同時吸取兩處聖地的精華靈氣。他們緊握住墓碑周圍塗上銀漆的欄杆，作勢摩擦，接著又將他們的額頭撫貼在金屬欄杆上。

墓碑後方，兩個蒙著面紗的年輕女孩面對著墓碑站立。兩人看來無恙，她們不過是利用墓碑作為聚會約定的地點，講些海德拉巴德式的閒話，再笑得花枝亂顫。可是，墓碑附近還是有個身上確實帶著精靈(Djinn)的男人，他是個年輕男子，膚色黧黑，身形削瘦，心智早已喪失泰半了。一看到這個男人，陵墓守衛隨即起身前往處理。成群蒼蠅飛散了幾吋，隨後又重新聚集停駐。

守衛咆哮的聲音從墓碑後方傳來。「你過來！」年輕男人身上的精靈應聲長嚎，彷彿受不了聖地祥瑞之氣的煎熬。可是那名守衛就像是根本無法容忍任何精靈在此耍賴作怪，領著那個男人，同時間不斷粗口叫罵附在他身上的精靈；而遭到精靈附身的男人，裝出退避抗拒的樣子。不管他如何苦惱煎熬，他還是清楚的明瞭，該來的擋不掉。而在這個病入膏肓的男人心中，還是殘存最後一絲虛榮。他知道自己病情嚴重，非得帶到陵墓親炙正氣不可，於是他回頭望著我與拉扎克，我們是他唯二的兩名觀眾，他要確定我們的確看到了附在他身上的精靈有多頑強；他身上的精靈如何嚎叫抗拒，硬是不願接近聖人的祥瑞正氣。可是，他非去不可，他得待在兩棟建築之間的巷道上，一值待到精靈散盡，寺方宣布他已經完全康復為止。守衛高喊著：「你坐在這裡！你給我聽著！」稍事掙扎之後，精靈終於安靜下來，而那守

衛再度喜上眉梢，回到他的豆子與蒼蠅群中。

門口進來一個非洲人——希狄(Sidi)，這是當地人稱呼非洲人的用語，並不會冒犯對方。他的頭髮梳理得整整齊齊的，看起來並沒有什麼異狀。他落坐在聖人冥想居處上了鐵條的窗戶邊，旁邊就是那個給精靈附身的男人，那人現在已經平靜下來了，神情甚至有些恍惚。不過一會兒，非洲人頓時變臉；他突然眼神呆滯，雙頰凹陷，身心痛楚突然變得明顯。接著來了一個嬌小女人，背上馱著她的兒子。女人又懷孕了。可是我看這女人不過是個孩子，頂多十二或十三歲，卻已經世故如成人一般地欣喜於親身感受如此重大需求。每個人都都在作戲（雖然說先前那個精靈附身的男人，在他虛榮乍現的一刻，似乎入戲得有些走火入魔了）；每個人都深諳自己的角色。可是當整個世界或是你所知悉的世界也寫進劇本裡頭時，還算是在演戲嗎？

拉札克對精靈可敬畏有加，他結結巴巴地試著用英語跟我闡述一個觀點。他說，他曾經見過兩、三個遭到精靈附身的人。可是他又補充說明，他很確定，在其他的國家、其他的文明裡，民眾信仰的是些其他的事務，心理疾病應該就會以其他形式呈現，需要用其他方式治療。

開車橫越沙漠回到喀拉蚩，穿過歷史悠久的印度河，就像行經層層進化的發展程度，跳躍世代的推演。顯而易見的是，大城市——還不提洲際大飯店所匯集的各國人潮呢——如何輕易吸引著一代又一代的村落居民，牽引他們離鄉背景，走上遷移飄移的人生旅程。

車子就快開到喀拉蚩時，好一段距離上，我們的車子如此湊巧，正好緊跟在一輛無頂貨車後面，車斗上載滿著剛剛遵照伊斯蘭教規定屠宰切割的牛頭肉，牛皮已經先剝了下來，無皮牛頭在陽光下閃閃發光，頭上牛角卻還保留著。

我很高興阿摩德將我送到信德內地。我有滿懷心得要與他分享。可是等我終於回到喀拉蚩，才發現竟然是阿摩德本人取消了原本預先登記供我住宿的巡迴招待所——當天根本沒有什麼部長來訪。從他送

我出發到海德拉巴德，與我到達海德拉巴德，其中這段時間一定發生了些蹊蹺，讓他改變心意。

我們會面前，他對我一無所知。他對我的回應，純然只是男人對男人的，而我也欣然相對。可是現在，或許有人跟他說，我不像自己所講的那樣。他電話裡的語氣變得冷漠生硬，連續兩次失約。於是，我無法跟他傾談我在蘇菲中心的見聞，也無法跟他討論這兩種宗教——其一端賴天啟與規矩，另一則憑著禁慾苦修與自由冥想——揉雜在一起，並不會彼此抵銷。我也無法再深入探知他年少輕狂時搞的「合作社」，以及他心目中女人進了天堂就不會再苦於月經的純淨觀點。至於棕衣男孩所說的那個孟加拉人的故事，他前往喀拉蚩時身無分文，從喀拉蚩回來後卻擁有自己的汽車，我也該滿足於自己所知的部分了。

我喜歡阿摩德。他如此突如其來地對我敬而遠之，讓我非常不開心，因此我也急著想要離開喀拉蚩。

六 法之不治

就在過了中央市集不遠處，喀拉蚩治安法庭裡，囚犯排成一列縱隊，魚貫進入法庭前院。囚犯通常兩人綁在一起，手腕上銬著手銬，一名穿著卡其制服的警員緊握著枷鏈的另一端。氣氛友善，法院庭前的熙攘人潮就跟市集上來往不停的行人一樣，誰也沒盯著囚犯直看或是多加注意。囚犯跟警員隨意交談，有時他們還在潘「攤前面盤桓，買一包檳榔磨牙根。一般而論，這些囚犯的面容與出現在市井之間的面孔差不多；雖然說犯人中有個男人雙眼無神，似乎無法聚焦，另外還有兩個小個子傢伙打著赤腳綁在一道，可能是兩兄弟，兩人看來都有智能不足之嫌。顯然，執法單位的手銬不敷需求。對於某些囚犯，警方只是在他們手臂上綁上一條繩子牽著走，犯人看起來就像是表演猴戲的小猴兒，可是他們的神情還是像其他人般友善。

台上撐起一把把遮陽棚避開日頭，棚下坐著公證人與負責監督宣誓的地方長官，各自面前一張小桌子，桌上壓著玻璃鎮紙和幾本污穢不堪的小書，各自等著生意上門。路邊有個亭子，專售各式印花與表格。法院外面的人行道上，坐著一群繕打宣誓書的男人，各自埋首敲著陳舊的標準式打字機——有些打

1 潘 (Pan)：一種印度零食，可幫助消化，用葉子包住（裡面有幾樣東西），包括帶有溫和興奮作用的檳榔。

字機看來已經頗有年代矣，滿布鐵鏽——填寫已經貼就印花的表格。一旁還有幫人代筆的書信業者。（「敬愛的先生」——我渴望著停下腳步，偷偷多覷上幾眼，偏偏代筆人不悅的警告眼神已經盯上我了，那是專屬作者這一行的嫉妒目光。）

主要道路旁邊，人行道一角聚集的是懸壺濟世的土方郎中，各自貨藏著妙藥仙丹。乍看之際，我以為那一疊堆得老高的蜥蜴早已死僵，腹內說不定還填塞了些其他藥草，也有點像是某種雕刻物。可是，其中一隻蜥蜴（或稱鬚蜥蜴）竟然動了起來，其他蜥蜴也紛紛跟進；這群蜥蜴一共十一隻，全都綁在一塊大石頭上面，繩子不是繫在蜥蜴尾部較粗的一端，就是綁在後腿部位的腰間，現在所有的蜥蜴都不停扭動，企圖擺脫人行道上滯悶的熱氣。稍後還是經由努斯拉特告知，我才明白這些蜥蜴的功用與藥效何在：強精壯陽是也。你將蜥蜴買回家，自己動手宰殺，再吃掉蜥蜴的某個部位。

法庭眾生相

我二度前往治安法院。第一次我是自己去的，只能見到法院門外戲劇般的場面；第二次就有努斯拉特幫我帶路了。努斯拉特是《晨間報》的記者，年紀在三十上下，矮個頭，粗壯，臉龐圓圓，架著一副大型圓框眼鏡，嘴唇上還留著一撮海象式的茂密短鬚。他總是精神旺盛，精力充沛。他熱愛自己在報社的工作，不僅非例假日戰戰兢兢，即使有閒還是叨念不忘。這份工作熱忱也轉移了他對他太太的焦慮，努斯拉特的夫人身子骨柔弱；此外，專注於工作也可以轉移他自慚於未能善盡優良穆斯林應負責任的焦慮。

努斯拉特身上混合了旁遮普與馬德拉斯的血緣，因此他在巴基斯坦是個本地人，也是半個莫哈吉爾，即印度穆斯林異鄉人，同時在他心中也有一半感到自己已經安家落戶了，可是一提到他身為一個巴基斯坦人與穆斯林，卻又好像做得還不夠。我們初次見面時，他劈頭就以急促、脫口而出的態度對我說道，他還算不上是個真正的穆斯林。他的意思純粹像在跟我道歉一樣；接著，他彷彿同時間又說，對他來講，全天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伊斯蘭教和來生了。

而儘管治安法院喧嘩嘈雜，經過每一間努斯拉特帶著我參觀的法庭，只有一間法庭裡還有個法官坐鎮主持。那間小型法庭裡，法官席下只有兩、三個旁觀者閒坐一側，或許他們不過是等著他們自己的案子開庭而已。法庭裡氣氛悠哉，因此，被告席上神情沮喪的男人（穿著藍色襯衫與寬鬆的巴基斯坦長褲），如此持重，不苟言笑，就顯得有些格格不入了；他表現得就像是某些將自己扮演的角色看得太過重要的人一樣。法庭中，當局者清，旁觀者迷，外人很難探知審判究竟進行到哪裡了。喀拉蚩市井坊間人等，講話莫不高談闊論；可是在這間小房間裡，人們卻囁嚅低語，再加上眾口紛云，我花上一段時間才聽出來，原來審判是以英語進行的，他們講的都是英語。還要再費勁聽上一陣子，我才明白這是一樁竊盜案，經過一年羈押，警方還是無法提出人證，案子再度開庭，不過是準備再度休庭、擇日更審而已。

審判進行當中，某個與努斯拉特熟絡的聯邦檢察官，滔滔不絕地向我說明起訴的個別程序。他急著要我留步，等在一旁看他如何處理他自己的案子，這個案子是檢方起訴一位國家教師：被告殷切渴盼著出國打工，竟然以不實資料申請護照。那名教師身為國家公僕，理當可獲政府核發一份 NOC (no-objection certificate，即無異議證明)，偏偏那個可憐的傢伙一定是因為急著想拿到這份證明，竟然將他的公務員身分按下不表。檢察官說，這個案子再過十分鐘就要開庭。可是在巴基斯坦，公定的延誤時間是以每半個小時為單位，十分鐘可以是一段漫長時光。努斯拉特和我繼續前進（而且，確實如我所料，我們過了半晌再掉過頭來探看時，庭上進行的是另外一個案子，而我們的檢察官還是坐在旁聽席上枯候）。

法庭外圍的陽台上，我們看到四個牽鏈帶枷的男孩，不慌不忙地坐在板凳上靜候傳喚，已經開始相互吹噓彼此的冒險歷程了。他們同在一家旅館工作，同樣被控以偷竊罪嫌。他們說，警察事先已經「適切」地鞭打過他們了，打的力道還好，一旁握著他們鏈條的警伯也只是微笑，搖頭不語。他們旁邊坐的是兩個被控持刀行刺的男人，兩人四目眼神都極不可靠。在另外一個犯罪與虛榮的平台上，某個北部出身的年輕人跟著腳步過來，他除了腕上的手銬以外，腳上還掛上鐵鍊，左右兩邊各有一名警員，擊著來福槍隨行。他皮膚蒼白，兩頰上冒著青春痘，可是那雙細長的杏仁眼卻充滿了驚懼力道。他深知自己所到之處無不勾引起騷動漣漪，他是注定要上絞架台的，犯行不過微罪而已，卻可以一舉登高而小天下，而他為了這趟公開露面，還刻意穿戴得像個酋長一般：一套剛剛燙整完畢的淡藍色巴基斯坦裝，頭上那頂紅色頭巾還縫上了一道高蹈堅硬的頭飾。你更別想要這年輕人住嘴，不與他人閒談。

努斯拉特眼見某個男人被人拿繩子綁了牽出來，突然就激動起來。「你看吧，他們的手銬根本不夠用，現在竟然用上繩子了。我非得寫一篇報導不可。法院最近發生許多脫逃事件。或許他們確實曾經從國外進口手銬，只是貨還沒到。或許是因為手銬現在都專門拿來控政治犯用了。」

有個女人臉上沒蒙面紗，帶著纖瘦孤弱的年幼兒子，坐在一間不見法官出庭的小法庭裡，這間法庭感覺就像一間教室一樣。她蒼白的臉龐既圓又小，皮膚粗糙；不論是她或是她的孩子，看起來都吃食不足，營養不良。先前她才剛剛花了四千盧比，折合四百美金，買下一處房地產，交屋時卻問題重重。她用一只塑膠信封將她所有的文件都裝在裡面，其中還包括了那一紙珍貴的、經過多人處理的四千盧比收據。她已經連續三天上法院來陳情，而今天同樣還是見不到法官。她住在喀拉蚩市以外十五哩的地方。她說，她的丈夫已經往生了，死於氣喘病。可是努斯拉特對此存疑，他認為這個女人應該是離婚了，可是要她坦白承認自己孤家寡人、無人憐愛，恐怕太有傷顏面了。

就在小法庭外面的陽台上，謀殺犯就多了。一個留著短鬚、渾圓矮胖的男人，是遠北地區斯瓦特(Swat)人士，兩天前才剛被緝捕到案。他五官端正，性情率直，儘管雙手上銬，看來還是挺自在的。他說，他之所以坦蕩從容，因為他啥事也沒幹。警察在他身上搜出一把槍來，可是那個遭人謀殺的傢伙一向就心術不正、素行不良，他們那個地方想下手殺他的人可多了。

某個希狄，或曰非洲後裔人士、經檢方控以謀殺罪嫌，身後跟著一大群為他加油打氣的希狄鄉親（希狄人數如此眾多，這些人當中，血統比較單純的是來自喀拉蚩碼頭區，祖上混血通婚較為複雜的則是來自俾路支省分，古老的馬克蘭海岸；此外，法庭庭院與陽台上都擠滿了看熱鬧的閒人）。這個希狄所涉入的是一宗穆斯林謀殺案，根據被控凶嫌的親友聲援團指出，那是替天行道，被殺的人該死，誰叫他引誘了一個純潔閨女。

接著，被法警鎖上手銬牽了過來的，是個出身邊境省分的旅印阿富汗少年，男孩受到首府的吸引，離家投入巴基斯坦的旅行生涯。對他來說，這不過是運氣不好罷了。他打著赤腳，一雙腳掌烏黑骯髒，身上這套衣服已經連續穿了好幾個禮拜，那件下擺曳長的襯衫，領口已經髒污發黑，有如擦過引擎機油一般。有個能說英語的律師，穿著談吐都還算稱頭，跟我解釋男孩所控犯行：男孩被控以擅自進入鐵路局地產。事實上，男孩擅自進入鐵軌區，只是冒著自己小命恐將不保的險，換取幾個盧比罷了。他進入鐵道區之後，可能會登上一班行進中的列車，強迫或是欺侮乘客，好擠進一席座位，稍後再企圖用二十盧比左右的價錢出售他的座位。這已經是個眾所皆知的把戲了。警員拎著拴住男孩的鐵鍊，微笑不語，講故事的律師也面帶微笑；唯一感覺不好笑的，是那個男孩。

法院裡有一間辦公室，裡面所有的文件都是經過登記收錄的。這是個檔案倉庫，檔案架上堆棧了一捲又一捲裹著紅色、黃色與白色粗布的卷宗，一列又一列的架子上隨處可見破損而滿布灰塵的檔案箱。這處狀似廢墟的檔案倉庫中央，擺著一張桌子，坐著一個白鬚蒼蒼的老人，頭上戴著一頂黑色便帽。他可有一則從基層做起、獻身法治、終於成功的故事，可以說來激勵後進。他在一九四七年印度次大陸即

將分離之際來到喀拉蚩，而他在這個法院服務至今已滿三十二年。老人從印度的齋浦爾（Jaipur）移民到巴基斯坦，移民前，他曾經在當地有過三年的法庭工作經驗。一九四七年，喀拉蚩全市只有六所市立法院，現在已經增加到四十所了。他本人則是一步一步地從基層做起，資歷完備，逐步登達到如今的顯赫位置，並一度官拜喀拉蚩最重要的市立法院之首席「審閱人」。身為「審閱人」，他得隨時坐在法官身邊，他的責任就是鉅細靡遺地記下法官所有的口諭。做筆記、整理紀錄，這就是他畢生投入的專職。

現在，他終於調任到這間文書記錄辦公室了。這間堆滿了布質卷宗、檔案箱與文件的房間，外觀乍看混沌，其實亂中有序。他保證在十五分鐘內，找到任何你所徵詢的紀錄文件。他只需要判決日期與託管日期，就可以探囊取物。所謂託管日期就是檔案送交登記處保管的日期。可是倘若託管日期不詳，又該怎麼辦呢？那老人說，事情就棘手了。我在心裡暗想，這下子就像泥牛入海，無跡無蹤了。接著，他就向我們示範他的尋件步驟，給他一個判決日期與託管日期，他打開一個破損累累的檔案箱，然後又參照另外一口箱子，第二口箱子破損得更加嚴重，接著——頂著黑色便帽，白鬚蒼蒼，他的食指似乎戰勝了時間——他的手指沿著一層架子不住翻尋，直到他翻出一捲蒙塵卷宗，再大拍塵埃，勝利地展示。我恭維他。他說，他的成功全憑真主意旨賞賜，凡事都要歸功阿拉。

努斯拉特問道：「你欣賞伊斯蘭律法嗎？」

「確實，」那老人說道，重新坐回他的桌子後面。「國家施行伊斯蘭教法之後，情況就改善多了。」喀拉蚩的人太邪惡了，只有速審速罰才治得了他們。在法院前庭閒晃的許多人當中，很多人都是專業證人，是靠著作證維生的，他們會在不同的案件當中一再出現；即使是他，所有的公務時間都花在整理檔案上面，整天窩在公共紀錄登記處辦公室裡，經年累月下來，他也可以認出那些熟面孔了。

那麼，他畢生的專業生涯都跟一群無賴混混一塊兒度過，他又有什麼感受呢？他誤解了我這個微不足道的問題，語氣堅定地說，他從來就不曾收取過賄賂。而今，他再過三年就要退休了。他對退休生活

毫無計畫。他將晚年，以及許多其他事情，統統都交給阿拉了。

我說：「那麼，你的孩子呢？」

「拜託你不要問這個，先生。」

一直到現在，我們才恍然大悟，原來如此充實而成功的喀拉蚩法院生涯——如此圓融的人生都要感謝真主賜福——竟然包藏著極為殘酷的缺憾。他七個子女當中，四人飽受骨質疏鬆之苦。他用英語說著。他們的骨頭都碎光光了，其中兩個孩子早就夭折了，一個女兒現在癱瘓在家，起居都要人照料。他將兩隻前臂舉起來交叉著，彷彿他腕上也鎖上手銬一般，老人向我們示範他女兒的雙腿現在萎縮到什麼程度。女兒即使是臉上停了隻蒼蠅，也舉不起手臂來趕蒼蠅，還要靠人替她代勞。

儘管如此，他還是寄望著美國醫藥發達，能夠治療他的女兒。他幾度跟美國書信往返，對方也曾經回過一封信。當然，這個終生管理檔案的人，也將這封信歸檔收存，檔案夾就留在他桌上方便索取，檔案夾子裡收著手寫的烏爾都語信件與打字機繕打的英文信件。美國！知識的世界，遠在信仰的世界之外；然而，即使在這個信仰的國度，美國醫藥之精進還是威名遠播。

陽台欄杆旁邊的板凳上，兩名農婦並肩同坐；老媽媽跟成年的女兒。老媽媽身高不及四呎，細瘦而滿面皺紋，嘴唇上厚厚地黏上一層包裹著潘的荖葉上的紫色石灰膏，石灰膏也沾上圍裹著她的頭髮與扁平胸部的歐爾尼（ornhi）。她一開口說話就尖聲嘶叫；而她的女兒——她那張年輕卻蒼老的臉龐，顯示出過度日曬與勞力操作及營養不良的痕跡——也不遑多讓，競相尖叫，彷彿在跟母親競賽一般。她們以其獨特、耐心十足與陰柔的方式，等候過路閒人對她們表達些許關注。她們滿心委屈，有苦無處訴，而她們也逐漸愛上這個法院的氛圍；法院大樓就是她們的哭場，嚎啕啼泣的舞台。

她們和她們的房客之間有爭紛。那人不想搬離這間房子。之前她們家裡風波不斷，一直到軍方接管政府，施行戒嚴法為止。那麼，現在應該沒問題了吧？她們要回自家的房產了嗎？是沒錯。可是他還是

不付房租。五年來，每個月五十盧比的房租，他都沒付。五年？她們竟然讓那人繳房租，白住五年？女兒拿出她的證明文件。那是一封英文書信，代筆寫手的傑作。信中——文字多處跳躍，上下不連貫——說道，那女兒的丈夫想跟她離婚，結果女兒終日惶惶，憂慮著老公即將狙殺她於不測。她曾經前往當地警察局錄製上述聲明。而今，她與母親同住。她家中只有「三件衣服」。她的丈夫一心想謀殺她，扣留了她所有的其他衣物，甚至連她的面紗（burga）都沒留給她。

可是，這跟那個房客與他積欠的房租之間，又有什麼關係？

啊，她們對著我悲淒嘶鳴，一個接著一個，輪番叫嚷，這就是說她們家裡沒男人，沒人做主啊。這也就是說，她們家裡缺乏生計，唯一的收入只剩下房客應繳的房租而已。

同時，她們那紙房屋租賃契約也有問題。她們先是花了三千盧比賄賂打點，好讓租約過關，可是收了她們錢的那個男人啥忙也沒幫上。然後，她們又給了另外一個傢伙八百盧比，拜託他幫忙將前面那三千盧比討回來，第二個傢伙同樣什麼事也沒做。

於是，她們就霸住法院上層陽台，嘶吼哀嚎，老婦人還不住啐吐出濃稠的荖葉紅灰汁，直到她們聽見喚拜聲，穆安津站在塔樓上呼喊著，晌禮的時候到了。政府諭令各級公務機關應於每天白日三次禮拜²期間暫停受理業務。而在這所市立法院之中，當天上午未見特殊效力，喚拜不像在提醒眾多公僕禮拜時間到了，反而像是發出一計信號，點醒那些還未能確實達成絕對無所事事狀態的公務員，再加把勁兒地混吧。

努斯拉特

午餐時分，努斯拉特說道：「我想請你給我建議。我應該繼續待在這裡呢？還是出國去西方國家待

上一陣子？」

「你出國去要做些什麼？」

「我可以在美國念個大眾傳播的碩士學位。」

「畢業了以後呢？」

「我不是教書的料子。我可以一邊旅行，一邊寫作。旅行和寫作。」

「你打算寫些什麼呢？」

「什麼都可以寫呀。旅行寫作一陣子以後，我可以在某個國際傳播機構裡找份差事，像是第三世界媒體專家之類的。」

「假如你一直在這裡待下去的話，你要幹什麼？」

「我可能會改行去做廣告。」

「要是你，我就會留在這裡，改行做廣告。」

「可是做廣告不誠實。」

「比你現在的工作還要不誠實嗎？」

「我不會喜歡做廣告的。」

「廣告公司會給你多少薪水？」

「四千盧比。」合計四百美金。「我現在的薪水只有兩千盧比。可是，我不會喜歡那一行的。你或許不喜歡我們《晨間報》，可是在我們報社，誰也管不著我。我沒辦法處理人際關係。你不覺得像我這樣的人，應該加入第三世界媒體嗎？你想想看，美國人與加拿大人能夠四處旅行，跑來這裡跟我們談有關

² 穆斯林一日需做五次禮拜，其中在日落之前的禮拜共有三次：晨禮、晌禮和晡禮。

第三世界媒體的事情嗎？」

「就是這樣子。他們很清楚報紙應該要怎麼辦。你應該沒有什麼特殊心得可以跟我們開導的。」

「你為什麼這麼說呢？」

「先前你自己跟我說過的，你說，伊斯蘭教與來世是你最重要的事情。」

「你讓我們覺得自己好渺小喔。」

轉瞬之間，幾樁可以令我激怒的事端同時湧上心頭：他工作的這份報紙在政治主張上如此刻薄惡毒，他妄想在國內維持伊斯蘭教治國，另一方面又蠢蠢欲動，企圖利用其他文明的開放與容忍，瞬間，我允許自己對他嚴詞相向。我頓覺懊悔，充滿了罪惡感。

可是，他的反駁也不全然是詈責。他確實深信與執著於建立伊斯蘭國家的理想，他自覺巴基斯坦違背了這樣的理想，因此，不論他在我話中聽出多少藐視的意味，巴基斯坦也是活該。這種伊斯蘭教立國的理，就歷歷撰述在一本出版於一九五一年的書中，《伊斯蘭立國：巴基斯坦》（*Pakistan as an Islamic State*）。這也是他先前帶給我作為見面禮的書。他說，這本書有助於增加我對巴基斯坦的了解。這本書讓我明瞭，伊斯蘭教建國的理想在三十年前，就跟一紙不切實際的意圖聲明一般空泛，也跟一段出入無章的伊斯蘭歷史（其間穿插著俗世的貪腐）同樣混沌，巴基斯坦現狀與當年的理想殊無二致。我讀著書上的敘述，而伊斯蘭教立國，就像一只高空風箏一樣，遁形在迷霧之中。「我等凡胎肉眼看不見，可是，冥冥之中，有人在操控著風箏。」

千萬別忘了努斯拉特。六個月後當我再度造訪喀拉蚩，心裡納悶著該跟什麼人見面敘談時，第一個就想起努斯拉特。我發現他變了。原先精力充沛、講起話來連珠炮一般聰敏過人的他，竟然鬢髮成灰了。他衷心期盼能夠善加奉行的伊斯蘭教，將他一步步地推向偏執的深淵；而我也再三懊悔，後悔當時轉瞬之間對他不假辭色，畢竟他所知的一切僅僅限於巴基斯坦啊。

伊斯蘭律法

努斯拉特在法院的紀錄保管辦公室裡，曾經跟那個戴著黑色便帽的男人談到伊斯蘭律法。我原先以為這套律法有待日後引進施行，不料，我所不知道的是，七個月前，軍事政府就通過了一套包含十條伊斯蘭律法的新法案：這套法案中制定了伊斯蘭法院規章，對富人與農產品徵收《可蘭經》中明文規定的稅則，還有相關飲酒、盜竊與通姦的罰則。最後這幾項幾乎說不上是法律，反而比較接近懲罰。

飲酒將責以鞭刑八鞭。至於通姦，對成年穆斯林，則於「公開場合擊石處死」；犯行者若為非穆斯林人士，則於公開場所鞭刑一百示眾；強姦則最高可判處死刑。「基於第五節或第六節判處之擊石死刑應依下列方式執行，意即：凡曾宣誓作證不利受刑人之證人，如可到場觀刑，得以擲出第一顆石頭，另，擊石處罰進行之際，受刑人可經槍擊處決，此時即應當停止擊石或是槍擊。」

竊盜罪——贓物超過某些價值（高於四·四五七公克之黃金）之時，且犯行非經近親、傭僕、賓客所為，盜竊物非「野草、魚、鳥、狗、豬、麻醉劑、樂器，或是缺乏保存器具與材料之容易腐敗食料等」——外於前述情況犯行之竊賊，首犯將處之截肢刑——「並由相關單位核可之醫療官員執行」——自「腕關節以下」截斷右手；再犯，即截斷左腳「直至腳踝」；三犯，即處以終生監禁。犯行人「左手或左大拇指或左手至少兩根指頭或是右腳逸失或是功能不良」，則可豁免截肢。

一般而言，就許多犯行者，這套法案都是以大量鞭刑處理，施行鞭刑的相關規定則記載於《鞭刑處罰執行條例，一九七九年頒定》。「鞭刑用鞭，包括其把手，應當一體成型，並以皮革製成較妥。又若以木杖或樹枝權充，則應選擇無節、無瘤者為佳。鞭具長度與寬度分別應長於一米二二，並寬於一·二五公分。」施行鞭刑之時，若有致死之慮，則應分次或延緩執行。孕婦經判處鞭刑，則應「視情況，於分娩或小產兩個月後」擇期行刑。執行時的天候狀況亦當考量。「若……氣候過於炎熱，或是寒冷，鞭

刑亦當延緩執行，視天候恢復正常之後，再擇期行刑。」行刑時，受刑人服裝儀容亦不可輕忽。「犯行者不可衣不蔽體，並應依照伊斯蘭教義訓練穿著受刑服裝。」男犯應站立受鞭，女犯則以坐姿受鞭。

根據那本努斯拉特給我的、出版於一九五一年的一書中指出，似乎在巴基斯坦建國成功之初，隨即有信仰虔誠人士開始談著恢復擊石死刑與斷腕刑罰等「古典的」刑罰方式，整合融入這個遙遠的伊斯蘭教理想，屆時（在如此幻想之中）人民將反璞歸真，重新回到伊斯蘭教創教伊始的純真狀態。誰也說不準，巴基斯坦有史以來，究竟曾經施行過諸如此類的古典法治嗎？可是，哈密德·阿里（Hamid Ali），藝術碩士、教育學碩士、法學學士，亦為（我手上這本）《伊斯蘭律法綜合法案，一九七九年版》的編輯，他曾經指出，新法不僅將與國內原有法制接軌，獲得法界人士歡迎，新法還將令巴基斯坦「自豪」。外界人士一再「誤解」伊斯蘭教。「伊斯蘭教是一套完整的系統，旨在建設福利、進步與富有前瞻性的完整社會。」伊斯蘭教將確保「公平的遊戲規則」，其教義綱要縱橫古今上下皆準，其刑罰旨在「滌淨社會，加強其完整性」。

可是倘若我孤陋寡聞，從沒聽說過這套新法的話，那是因為頒布七個月以來，新法還沒真的施行過。這段期間，還鬧出了一宗可以稱為醜聞的案子。某個鄉間地區的小鎮上，有個皮爾，或是虔誠信仰的人，被控強暴了一個十三歲的女孩，女孩的父親恰巧還是這個皮爾的追隨者。這樁不利於他的案子始終上不了治安法庭，因為根據新伊斯蘭教法規定，強暴案沒有四個目擊證人是不能成立的。

為什麼要四個證人呢？這就可以追溯到一件發生在阿拉伯沙漠上留名青史的事件，事件發生在某次先知軍事出擊即將結束之時，約莫在西元六二六年到六二七年間，正當這種新信仰即將奠基，逐一降服懷有敵意的小型社群時。先知最心愛的妻子阿伊莎（Aisha，又譯為艾綺霞），當時年約十三，不知為了什麼原因，某個晚上一個人孤伶伶地留在大隊人馬之後。她一直到翌晨才重新歸隊，同時還是由一位英俊的軍士相伴而歸。先知左右莫不大為騷動，引起軒然大波。先知的堂弟阿里建議先知應該休了阿伊

莎，攆她出門。而先知——此時已經五十過半了——連續鬱卒了好幾天。可是阿拉伯人調停；先知有夢，並於夢中獲得天啟，阿伊莎是清白無瑕的。至此，通姦罪名需要四位證人才能成立，多嘴閒人散布毫無根據之通姦謠言，應處八十鞭擊。

就一位在《巴基斯坦時報》上撰文的作者看來——文中為政府申辯，何以遲遲未能全面推行伊斯蘭新法，同時抨擊在伊斯蘭律法上竭力建言政府的毛拉——相關懲治強暴的法條漏洞百出而荒謬不經（由於犯行從未於公開場合進行過），立法的思維也誤讀了《可蘭經》而引喻失義。先知所獲啟示是有關於「淫蕩」的，尤指女性之淫蕩行為，萬不可強行扭曲到強暴案上。因此，控訴強暴無須四名證人。一般證人作證即可充分成立，甚至連醫療證明亦可以作為呈堂供證。

在茲言茲，就伊斯蘭教義而言，究竟誰是對的？是那些堅守《可蘭經》經文的毛拉嗎？拘泥著聖書中最接近天啟的神諭。抑或是《巴基斯坦時報》上的撰文人呢？稍微曲解天啟的本質，卻更加符合實際案情所需，同時在針對證人的概念上賦予現代意義的引申。陳述《可蘭經》上的刑罰方式容易，但根據《可蘭經》執法就是另外一碼子事了。如果單憑一本《可蘭經》作為執法根據，依照聖書中各項歷史上、地域上、文化上的特殊本質，法制只會陷入經文——宗教——教派之間的爭論中糾纏不清，永無寧日，同時極為迅速地流失了「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公平性。

《巴基斯坦時報》撰文作者無法隱諱他對毛拉的憤慨不屑。他們包藏著政治野心：他們刻意建構陳義過高、無法施行的伊斯蘭律典，再指責政府無意施行這些宗教法條，「奸巧地陷政府於不義」；他們迫使伊斯蘭教四分五裂，淪為許多相互衝突的小教派，伊斯蘭教在外人眼中，墮落為笑柄一只。答案只有越過毛拉，禁止教派蠢動，回歸聖書。只要回歸聖書，「我們就會發現四周一片光明。可是只要我們一旦偏離《可蘭經》的教化，前方就只有一片黑暗與無休無止的爭端等著我們。」

可是，事情真有這麼簡單嗎？光憑舉出一點來說吧：阿伊莎是在幾歲時嫁給先知的？當時先知五十

歲，阿伊沙是六歲、九歲還是十九歲？她真的有如某個溫柔的故事中所敘，帶著她的娃娃與玩具投入先知帳下嗎？《可蘭經》中毫無線索；阿伊沙的年齡還要從其他出處循索。這個議題在星期五安息日的《巴基斯坦時報》上，引發長篇而徹底的討論；提出這個議題不光是出於考古的興趣，而是因為阿伊沙披嫁紗的年齡——報上披露了九種不同見解——可以援引為修正女性法定婚嫁年齡的依據。

在伊斯蘭教中，尤其是基本教義派心目中的伊斯蘭教，除了前人先例之外，其他的一切都不算數。先知的原則——從揣度《可蘭經》與其他約定俗成的傳統中萃取得知——適用於任何時代，絕對定於一尊。先知的原則可以引申到各類事項方面。據傳，先知曾經說過，最優秀的穆斯林是與他同時代那一輩人，其次是下一代人，接著每況愈下，一代不如一代，持續劣化，一直到時間盡頭。如此主張可以解讀為不利於「達爾文主義」的有罪宣判嗎？而這也正是新一代受過教育的基本教義人士所說的。此語一出，隨即成為正確的信仰，同時也顯見他們對於西方文明的憤怒，西方文明環繞在他們周遭，而他們身為一個社群，卻因無力左右西方文明而絕望苦惱。

基本教義派以為，世界不斷墮落，不斷需要重新開創。知識的唯一功能就在於協助重創世界。憑著知識，他們可以重新詮釋經文，重新締建神聖的前例。因此，歷史必須為神學服務，法律一定要隔離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理想之外，知識也要抽離在純粹的知識之外。這種教條當然自有其引人之處。對於一個喀拉蚩大學的學生而言，學生或許出身鄉村，家中或許是務農背景，舊信仰當然要比學院裡教導的新科目容易掌握得多。由是，基本教義可以在大學裡生根，否定教育，適足以證明為受過教育的舉動。昔日於穆斯林的榮耀傲世之際，伊斯蘭教敞開胸懷，盡情汲取世上各項知識。而今，基本教義派提供了一具知識的恆溫器，盡量調低溫度。低溫知識狀況下，人人平等舒適，各自有所庇蔭，現況將永恆不變。

就這樣，信仰凌駕一切，因此我們也可以了解，當基本教義派說到伊斯蘭教是一套完整的生活規範時，他們究竟意指為何了。如此說明伊斯蘭教自有其真意，可是如果我們以同樣的說法，應用在其他宗教上，例如，印度教、佛教或是其他規模較小的部族信仰等等，或許更要來得真實貼切，這些宗教在早期的歷史階段上，也都各自成為一套完整的文化，自給自足，或多或少都孤立於內，自成一局，其機構體系、風俗習慣與信念，更加融合為單一完整的體系。

伊斯蘭基本教義派的心願，就是重返如此渾融一體的理想，他們眼中真主賜與的完整一體，可是單憑著信仰這一項工具——信念、宗教禮拜及儀式。如此意念其實只是一廂情願的妄想——知識遭到抑制或是限制，偽造的歷史觀感——重新由抽象建構具體，再度豎起部族相隔的高牆。就像是企圖重建某種從來就不存在的組織，有如部落，或是古希臘時期的城邦——當然，在基本教義派的神學幻想中，這種海市蜃樓是絕對存在的。《可蘭經》不是一本制定於黃金安定時代的成文法規彙編；相反的，這是一本寫在一段長期天翻地覆的期間，充滿神秘的或是謎樣的神論紀錄，再從先知擴及他的族人，一直推展到整個阿拉伯地區。阿拉伯半島始終動盪不安，伊斯蘭教包裹著基督教與猶太教義的成分，也總是處處揉雜，時時折衷，不斷地發展演化。幾乎就在先知安頓好他的族人的同時，他就馬不停蹄地開始征服他的敵人。而阿伊沙就是在穆斯林紀元第五年先知領軍長征之際，被孤伶伶地留在沙漠中過夜。

巴基斯坦人在感情上拒斥西方，或是西方人所領導的普世文明。西方文明動搖國本，威脅社會秩序。偏偏同時間，西方文明也不可或缺，巴基斯坦人民需要西方人的機械、商品、醫藥、戰鬥機、移民僑胞匯回來的匯款，以及有望治療骨質疏鬆症的美國醫院，還能夠提供大眾傳播碩士學位的美國大學。所有摒棄西方的想法，都植基於一個假設當中，假設人類社會總是存在著某種生活方式，某種富於創意的文明，令人難以置信地中立，開放於所有的訴求。職是之故，摒棄，不是純然絕對的棄之如敝屣。同時就整個社群而言，也是一種停止再增進智能的方式。意即整個社群將淪為寄生蟲，寄生現象將是基本教義始料未及又不能承認的惡果。同時之間，移民前仆後繼地競相離開這塊信仰的國度，人力專

家一船船地將三萬巴基斯坦人送到西柏林，申請當年專為東德人民設置的政治庇護。

大力倡導巴基斯坦理念的伊斯蘭基本教義派聖人，即毛拉納毛杜迪。當年，他還曾經反對分裂印度次大陸，建立印度裔穆斯林專屬的獨立國家，因為他認為，穆斯林還不夠純正，配不上一個純粹以伊斯蘭教立國的國家。他認為，真主應該是唯一的立法者；接著，藉著不斷炎炎大言諸如此類的宗教狂喜，卻從不提出任何具體可行的方案，他成為這種千年激情的焦點。他極力提倡伊斯蘭律法，卻從來絕口不提這些法條究竟應當如何制定。

毛杜迪死在我還停留在巴基斯坦期間。可是，他並沒死在巴基斯坦，他去世的消息還是從美國波士頓傳回來的。在他漫長而性情乖戾的一生盡頭，這位毛拉納違背了所有他高調鼓吹的理念與原則。他遠赴波士頓就醫，尋求恢復健康的可能；在他人生的盡頭，他將自己交到西方文明的技術與科學手中，可是，這也是過去他一力庇衛其追隨者禁絕與之接觸的文明。他企圖——這是某人跟我說的（不是每個巴基斯坦人都是基本教義派分子）——摘取他自己禁止他的人民播種的果實。我們可以如此蓋棺論定這位毛拉納，他取道波士頓，榮登他在西天的尊榮位置；而且有一段路程，他還是搭波音七四七飛過去的。

《巴基斯坦時報》的作者破題寫道：「假如，我們從《可蘭經》裡尋求指引，」接著又說：「我們將發現四周一片光明。」毛拉主張的鞭刑與擊石死刑，施行以來還是不見成效，可是巴基斯坦人卻仍然篤信，終有一天，巴基斯坦將達成符合伊斯蘭教的社會秩序。而今萬事具備，只欠一套新的「方法學」而已。跳過毛拉；禁止不同教派活動；改弦易轍，不再企圖混雜伊斯蘭教義與西方式民主——教義唯尊阿拉的治權，民主則強調人民的主權，兩者無法相容；禁止一切政黨活動。

數週之內，巴基斯坦軍事政府即遵行這項政治建言。先前政府承諾的選舉突然取消廢止。可是國家還是需要統治，人民不能沒有警察盯著。政府頒令恢復鞭刑示眾以遏阻犯罪，法院審判時再也無須拘

泥於目擊證人這種荒唐的限制。軍方開出一輛輛警車，把一批批鞭刑犯人送到市集上亮相：即時法治，啟動與落實了伊斯蘭教教義。

一步一腳印，巴基斯坦在致力施行伊斯蘭律典的同時，也逐步掃除英國殖民者留下來的法治傳承，取而代之的卻是一片荒蕪。

七 基本的東西

離開喀拉蚩，往東北走上六、七百哩，過了信德省與旁遮普的平原，走到印度河與其支流灌溉的廣袤平原盡頭，喜馬拉雅山突兀聳立眼前。大山山麓下，坐落著一對「雙子城市」：拉瓦平第與伊斯蘭馬巴德。

伊斯蘭馬巴德，「伊斯蘭教之城」，巴基斯坦的首都，建城不久，新泥猶濕。二十年前，執政的軍事政府不為了什麼顯而易見的原因，闢建了伊斯蘭馬巴德，或許只是因為建立一座新穎、規畫完善的新都，有別於亞洲的蕪亂污穢，令軍方人心大悅，同時在短期內興建一座西方風格的城市（就跟從美國進口的軍火武器一樣重要），可以營造出某種幻象：二十世紀終於欣然降臨於此，伊斯蘭教與巴基斯坦都將與現代世紀齊頭並進。

二十哩之外的拉瓦平第，則是一座較為古老的城市。拉瓦平第市區在某個方向往伊斯蘭馬巴德延伸，可是市中心卻不見多少變化。市集街道兩旁，觸目所及還是錫克族與印度教民往日的住屋，高挑的屋宇，染黑處理的原木棟梁，門窗上加裝格子框條，還有陽台。次大陸分裂之前，錫克族人與印度教民一度為小鎮上的主流居民，建國後，他們就被迫離國遠去了。舊有的英國拉瓦平第俱樂部仍舊在營業中，只是天花板上的吊燈略為黯淡；壁紙略為發黃猶如沾上泥漿；侍者身上的制服略為骯髒破舊；用餐

時間，餐廳裡的氣味較為刺鼻辛辣而已。

英國人在這裡統治了將近一百年，而在他們離去三十餘年之後，拉瓦平第老鎮上卻仍然停留在英屬印度小鎮的印象中：英國的氣氛還殘留在梅爾街上，旅館與花園林立¹；殘留在喀什米爾路上幾家老式的店舖裡；殘留在拉瓦平第的軍方與政府官員住宅裡。

相信來生

某一棟諸如此類的住宅，住了一位醫師。他在一家小型的石油公司裡擔任醫務主任，這家石油公司就以喜馬拉雅山麓的小丘為據點，向西拓展業務。公司原先為英國人所有，現在轉由阿拉伯人掌控，可是老式的排場還是離不開該公司資深主管宿舍區²。醫務主任的房子，門前植有廣大的草坪、半圓弧的車道，玄關前還有立柱支撐的帶頂走廊。起居室牆壁堅實，天花板纖薄，只靠著一具電扇與落地窗就足以納涼通風，門外時時現露屋外盎然的綠意。

這位醫生已屆天命之年，身形瘦小而五官精巧，深諳這幢住宅的氣派。可是屋宇的顯赫並不會矮化他，因為如此顯赫典雅的住宅是他自己爭取到的，也是憑著他的信仰才降臨到他身上的。這位醫生是個什葉派信徒。什葉派信徒——阿里與阿里出師未捷的信念（剛開始這只是一個政治傾軋的議題，隨著阿拉伯帝國版圖不斷擴張，又演變為某種反阿拉伯人的主張）的熱烈擁護者，什葉派在巴基斯坦是一支少數弱勢教派。而以醫生自己的措詞說來，什葉派信仰，也是他的「國際主義者」信仰。在這個星期五安息的早晨，這位溫文爾雅的醫生（彷彿刻意低調隱抑他的居家住宅過度的奢逸裝潢）就這樣跟我打開話匣子。

醫生有兩個兒子，其中一位公子也在座，他年方二十三，還在醫學院裡求學。醫生說這個兒子是個「叛逆小子」，也是理性主義者。列席的還有兩位新聞記者與他們的妻子，四人同樣也是什葉派信徒。這場安息日上午的聚會並不如我事先料想，只是個平常社交走動而已。對這些什葉派信徒而言，這可是個讓大家促膝長談的場合，俾便進行嚴肅的——嚴肅，通常就意味著神學的——探討。

醫生說，身為阿里的追隨者，他的信仰無時無刻地為他注入新生的力量，這股力量甚至可以表現在日常例行瑣事上。他的信仰中有五項要點：第一，唯一真主，真主是唯一的；其次，信服正義；第三，全心信望先知行誼；第四，全心信望伊瑪目（即先知的繼任人，並以真主之攝政人身份治理人世）；最後，吉哈，或曰聖戰。醫生說，他信仰中的聖戰，不是毛拉嘴裡高喊的殺戮戰爭；他心中的聖戰是「你自己內心恆常的天人交戰，抵抗邪惡不義的征戰」³。

我問他說，像是「先知行誼」與「伊瑪目」這類深奧難解的信仰概念，是如何在他的日常例行事務上運作的呢？

他說：「我會向你一一說明的。我現在雖然是這家公司的醫務主任，可是我並不是一直都擔任這麼高的職位。過去我屈就於主任助理的位子上，任勞任怨了好些時候。後來前任主任退休了，這個位子就懸在那裡，空了六個月。可是公司高層遲遲就是不肯任命新的人選。他們應該要任命我的。我做了不知道多少研究。過去我的老闆很清楚我在咬傷方面的研究和成果，我也知道他幫我寫了一份對我很有利的報告。咬傷，那可是我專長的領域。蛇咬、狗咬、驢子咬、狗咬驢子等等，我對這些狀況都有研究。只

1 梅爾街（Mail，發音如「梅爾」）：原本是倫敦市區中，聖詹姆士公園裡一條綠蔭蔽天的散步專用道路，日後成為眾多精品商店群聚之處。

2 作者在此刻意使用 compound 一字，compound 原義為某些中東國家用牆圍起的白人居住區，內有商店、住宅等，藉以突顯英國殖民主義的陰魂不散，還是處處顯現在拉瓦平第。

3 吉哈（Jihad）經常為西方世界譯介為「聖戰」（Holy War），然而更貼切的譯意為「正義的奮鬥」（Righteous Struggle）。

有窮人家才會受到這些咬傷折磨，而我幫窮人盡了多少力，治療了多少咬傷。有錢人不會打著赤腳滿地亂走，讓蠍子在他們腳上叮上一口。他們也用不著擔心家裡的驢子或駱駝被狗咬了。所以，我一個人就做了這麼多工作，讓我治療過蛇毒咬傷的人不計其數。他們送我到這裡來的時候，鼻孔、嘴裡都血流不止。你可以治療這些咬傷。我應該說，我治療的都是毒蛇咬傷。眼鏡蛇及環蛇又另當別論了。

「所以，我就跑去找老總，我們的總經理，跟他攤牌，直接跟他講到這個位子怎麼空在那裡這麼久，而我資歷完備，治療與研究成果豐富，是再適合不過的人選了。他沒辦法跟我交代過去。他一邊暗示說，我想要的不過就是薪水和這棟大房子而已。沒錯，這兩樣東西很重要。不過，也沒重要到那種程度。而且話又說回來，當醫生哪裡不能糊口營生呢？那個時候，坐在老總的辦公室裡，唯一給我寬慰鼓勵的就是我的信仰了。而當老總對我說，我要是不爽的話，可以辭職回家吃自己呀。接著他就抽了一張信紙，隔著桌子遞過來給我，而我當下也就擬妥辭呈。他以為他嚇得了我，可是我有我的信仰。要是我沒有我的信仰，我就不會當機立斷，寫下辭呈。老總看到了，他將我的辭呈退了回來。這也就是為什麼我現在可以住在這裡了。」

可是，醫生在他的「信仰五要」當中，並沒有提到來生或是來世。難道來生不是穆斯林最基本的信念嗎？

「關於來生，其實我也不懂。有時候我相信有來生，有時候我對來生的信心也會動搖。我會向你說明。我的長子——不是這裡這個孩子，是他的哥哥——當時他主修的是化學工程。我們一家人都是這樣子，比較傾向研究科學。這麼說吧，這孩子大學入學考試考得很好，沒想到入學後反而成績不良。那可非同小可，不能兒戲啊，這樣一定會影響到他的前途的。我想這一定是政府裡面某些部長在搞鬼。他們在這裡搞這種勾當已經不新鮮了。他們為了暗助自己的小孩，就會找人把其他學生的作業扔掉。這種事並不是沒發生過。」

「這段期間，有一天晚上，我夢見自己坐在一棵大樹下面，還是一棵美麗的樹。樹下有一具樂器。我只記得那是一個用黑色木料製作的樂器。當我醒過來時，就只記得這麼多了。樂器發出某種聲音，一種我從來沒聽過的音樂。然後我父親就出現在我面前，可是他的樣子卻像是我的叔叔。因為我父親在我兩歲時就過世了，是我叔叔一手把我扶養長大的。他說，他特別過來安慰我。我在夢中就哭了起來，哭個不停，醒來的時候，我發現枕頭都因為淚水而浸濕了。」

「那天，我就直接到我兒子的學校裡，找到他的老師。而他跟我說，雖然令郎前些時候在作業上丟了不少分數，期末考卻考得不錯。整個科目說來，他可以拿個七十八分。就在此刻，從校舍大樓裡走出來一個老人家，他的樣子跟我夢中的叔叔完全是一個模子刻出來的。我就朝著他跑了過去，擁抱著他，跟他說，『您可知道，見到您，我可有多開心。昨晚我在夢中才剛剛見過您呢。』」

此番遭遇，還有其他大同小異的事件，令這位醫生相信人生有來世。可是，他同時也自豪於小兒子待人處世上的理性態度，小兒子現在還在醫學院就讀，不時也創作英詩自娛（當下，那兩位新聞記者還有幸一睹幾首他的作品）。這個兒子的理性主義究竟表現在哪些方面呢？孩子被父親喊了過來，要他自己已在賓客面前說清楚，講明白。小兒子自言，他對於先知的態度，純粹是出於探討歷史人物的興趣。這一位偉大而良善的好人確實存在於歷史上，可是，他的神聖榮光卻是後人不斷攀附添加的。

基本的東西

這個兒子賽伊德的個子比他的父親高出一截，體魄也比父親壯碩一些。臉上架著一副眼鏡，更添學生氣質。在他父親的諸多賓客面前，顯現出一種尊貴的學生公子架式。他在社交場合之間，比他的父親更為從容自在，知性上也更勇於探索混沌，可是他同時也了解，他能有一天，全憑父親先打下的基

礎與成就。

賽伊德說，他在醫學院裡感覺跟同學相當疏離。他們一心只想要通過考試，開業行醫；他們毫無知性上的興趣，對於其他知識一無所悉。他們只想學到技術，對於承載著如此醫療技術的文明（可是賽伊德的措詞並不盡然相同）一點好奇也沒有，這就跟著賽伊德不同了。那麼，他又是如何達成這種知性上的興趣的呢？這麼說吧，他在先天上就沾了他父親醫療專業背景的光，而光是這項優勢，就讓他領先同期同學一兩個世代。他也在英國待過一年，英語文學也讀了許多。

一提到他的英語文學素養，我就讓他開口滔滔不絕地談了下去。而他在娓娓道來自己如何一步一步地接觸這個外於伊斯蘭教的文明，這種接觸，在許多方面都帶有先驅的意味，同時也鮮明的對照穆斯林林經常一概而論地全盤拒斥西方文化的態度，儘管他們也曾經旅遊西方國家，學習某種專業技能（某些孤立於他人之外，獨立行使的技術），卻依然毫無概念，不曉得自己究竟在排斥些什麼。他的述說令我神往馳迷，為此，我還跟人家討了紙筆來記錄他的話語。

當時他只有二十三歲，而他自己估計，截至目前為止，他已經讀過兩百五十本英文書籍了；其中當然不能將他從小一直讀到十二歲的愛妮德·布林頓⁴計算在內，還有在他讀完布林頓之後，接續一直讀到十四歲的「畢果斯」⁵系列故事也不能算計入列。十四歲的時候，他在閱讀上大有斬獲，他的父親給了他一本《大地》⁶，這本書將他推進成人閱讀的領域；詹姆斯·哈德利·蔡斯⁷、哈洛·羅賓斯⁸、伊安·弗萊明。他喜歡這些書嗎？這些書的情節鋪陳難道不會讓他離奇不解嗎？他說，他確實看不太懂伊安·弗萊明的布局與眉角，可是他還是照讀不誤，因為〇〇七的故事實在太有名了，而他找哈洛·羅賓斯的書來讀，也是出自同樣的原因。他想要多讀書。人家也都跟他說開卷有益，書中自有顏如玉，所以他得多找些言之有物的東西來讀。過去，他也會每週爬梳《時代雜誌》上的書籍銷售排行榜，期望能找到幾本適合他閱讀的好書。可是要他全然參透書中內容，卻也不總是那麼容易。

那段期間，正是他少年十五十六時，他如獲至寶地讀到了史坦貝克。《伊甸園之東》令他印象良深，讀不絕口。「我好愛這本書。這個女孩，一心想要跟她的家人切斷關係，還有房子被燒得片瓦不留。現在我也只記得這些了。這本書給了我革命性的震撼。」接著，話題就轉到他待在英國的那一年了。他曾經收看了一系列《輪椅神探》影集，看電視之外，他還找了二十來本《輪椅神探》偵探小說來

4 愛妮德·布林頓 (Enid Blyton)：布林頓係英國最著名的童書作家，出生於一八九七年，卒於一九六八年，一生共寫了六百多種童書，翻譯為四十種不同語言，全世界共售出兩億五千萬餘冊，其中《淘氣的麗莎》系列與《諾弟》系列在台灣均曾引進。

5 「畢果斯」系列：英國暢銷作家威廉·厄爾·強斯 (William Earl Johns) 曾經在他風靡一時的系列短篇故事中，塑造一位人氣迅速攀升、日後成為青少年心目中英雄人物的主人翁——詹姆斯·畢果斯 (James Bigglesworth)，並簡稱為「畢果斯」。強斯出生於一八九三年，一次世界大戰時曾經擔任機關槍炮手與戰鬥機飛行員，一九三一年自英國皇家空軍退役，轉而從事寫作。他根據自己的沙場生涯與朋友的軼事，寫出一系列的「畢果斯」故事，結果大受歡迎。強斯卒於一九六八年。

6 《大地》(The Good Earth)：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賽珍珠 (Pearl Buck) 的作品。賽珍珠生於一八九二年，美國西維吉尼亞州，卒於一九七三年。她的父母是南方長老教會的傳教士，曾派駐中國傳教，並育有七名子女，賽珍珠排行第四。她於出生後三個月便隨父母回中國，度過她的大半生，一九一五年與康乃爾大學畢業的農業經濟學家約翰·洛辛·巴克 (John Lossing Buck) 結婚，遷居安徽省的南宿州，日後，這個貧窮的地方便成為她寫作的背景舞台。一九二〇年代起，賽珍珠開始發表作品。一九三一年，賽珍珠出版了第二本小說《大地》，成為當年暢銷書，並得到普立茲獎，一九三八年獲頒諾貝爾獎。直到一九七三年逝世，賽珍珠一共出版了七十餘部著作。

7 詹姆斯·哈德利·蔡斯 (James Hadley Chase)：暢銷懸疑小說作家，一九〇六年生於倫敦，卒於一九八五年。蔡斯師法美國冷硬派偵探小說作家筆法，寫出一系列以美國為背景的懸疑與幫派故事，一九三九年出版《詭媚小姐無果園》(No Orchids for Miss Blundish)，風靡各界，相當成功，奠定他在通俗文壇上的地位。

8 哈洛·羅賓斯 (Harold Robbins)：美國暢銷作家，一九一六～一九九七，曾經出版二十餘部小說，作品翻譯至三十二種語言，全球行銷五千萬冊以上，其中最為讀者熟知者為《江湖男女》(The Carpetbaggers，又曾譯為《男歡女愛》)與《別愛陌生人》等。

讀。梅森探案的故事背景在他讀來難道不會太過艱澀嗎？畢竟書中的社會與場景，和他過去所知的一切都過於遙遠疏離了。不，他說，他徹頭徹尾的了解這些書在講什麼。

更離奇的是，閱讀英語暢銷書籍反而令賽伊德·胡賽因在他日益擴大、動搖舊信的世界中——主要是受到西方機械文明、奇技淫巧的迷惑——找到新秩序，讓他能夠從容應付異國文化，現代與古典可以兼容並蓄，騷亂與儀式可以雜列並陳：愛妮德·布利頓、畢果斯系列、賽珍珠、詹姆斯·哈德利·蔡斯、約翰·史坦貝克、佩利·梅森。

還有性。在他所讀過的兩百五十本書中，他可以說，其中有三十本是跟性有關的書。這些書，他還是鉅細靡遺地讀，「好穩定自己」。沒讀過情色書籍的人，往往在不意間翻閱到黃色書刊時變得過於亢奮；而他們也只想閱讀《花花公子》而已。閱讀情色文學，紓解了他閱讀情色畫刊的衝動。「我同時也閱讀學院出版的跟性有關的書籍，像是《美滿婚姻》之類的書。」

然而，即使在他初次閱讀《大地》後的九年間，賽珍珠仍是他最心儀的作家。他曾經展開了六、七本她的其他著作，而他認為這是相當嚴肅認真的閱讀。「而且我也很喜歡格雷安·葛林的《長城內外》(The Wall Has Two Sides)。」

「你說的是菲里斯·葛林 (Felix Greene) 吧？」

「或許吧，反正是某個葛林就對了。喔，我搞錯了，格雷安·葛林寫的是《醜陋的美國人》(The Ugly American)。我把名字搞混了。我要跟你講個故事。有一次我搭火車旅行到拉合爾，當時正好是伊朗革命期間。火車上有個美國傳教士，他要我坐下來，接著我們就聊了起來。他想知道我對伊朗的局勢有什麼看法。當時我就跟他說了——我就是這個樣子——我說，美國人遲早都要滾出伊朗的，現在他們就準備進入中國吧。那個美國傳教士聽我這麼說，心裡很不高興。或許他也是個間諜。」

我並沒有追問這個故事的後續發展。可是他自己倒覺得挺重要的，或許是源自於險惡的美國人形象

吧：為生存立命提出一切解答的文學，釐清塵世灰霾的文學。

他講完了火車上美國人的故事以後，又說：「除了看這些書以外，我還聽了很多西方流行音樂。我是真的很迷這些歌曲。不是那些吵死人的搖滾樂類型，而是那些真的要傳遞些什麼訊息的歌曲。不光是西方熱門音樂，我們本地烏爾都歌曲，我也很喜歡。我真的很喜歡卡本特，他們是一對兄妹組的合唱團，唱的都是些基本的純真的東西，所以我才會那麼喜歡他們。還有很多很多歌曲，都帶有某種宗教的訊息，他們都會提到真主與信念，讓我很感動。」

「信念？」

「就像是去做一些你確實相信的事情。就像是愛。基本的東西。」

「可是，我還以為你不是個非常宗教的人。」

「某些方面，我的確不是一個很拘泥於宗教的人。可是，一切事物都帶有一個訊息。」

「你最近又讀了什麼書呢？」

他說不上來。那已經是六個月以前的事情了，他記不得了。為了讓我們的談話不致中斷，他又說：「到目前為止，我心目中最了不起的作家還是賽珍珠。她為窮人寫作。我說的可不是中國人或是共產黨，我指的純粹就是窮人。她專門刻畫貧民的生活，跟人與人之間一些很基本的東西。」

「你所謂基本的東西指的是什麼？」

「人跟人之間的關係。純真的東西。人與人之間總是相互詐騙。不做偽君子，就要當被害人。到處都可以看到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的事情。大國都想要支使小國。不光是巴基斯坦而已，世界各地的小國家也都一樣。他們也打算對伊朗依樣畫葫蘆。」

他們全家都是什葉派信徒，伊朗正是什葉派信仰的核心地帶。他們家族最近才在聖城麥什德舉辦過婚禮。我說：「革命以後，你覺得現在都平靜下來了嗎？」

「不，現在只是惡性循環。伊朗國內總是有什麼事情不對勁。即使奉了真主之名，也不該殺那麼多人。」他想到了伊斯蘭革命法庭所頒論的格殺令。「這類的終結性懲罰——死刑就是這樣子——如果真主如此偉大，絕對不會坐視的，這是不對的。假如說真主至大，這種格殺勿論的恐怖手段絕對跟真主扯不上關係。」

那天早上，他讓在座賓客傳閱的英詩主題是偽善，而他剛剛才跟我講起偽君子與被害者。

偽君子說話像雲雀

咬的卻比叫的痛。

偽君子看來無畏而大膽

可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

他的詩文中還包括了其他主題，諸如殘忍、不公不義、毀謗等等（倘若以他的母語烏爾都語讀來，他在詩篇裡的運用文字遊戲與搬弄慣用語，就會更加出乎意料與激越了）。詩篇當中，最貼近他日常生活的（其中也包含了先前他特別指出自己在醫學院裡，獨學無友、孤立獨行的狀態），是一首悼念詩——某位外科醫師，也是他們家族的朋友，近日在施行手術期間，遭到某種病毒感染而辭世的意外：

醫術高明無人及

愛心溫暖如春陽；

懸壺濟世無神力

但憑全心除病恙。

講到他的英詩創作，他說：「我已經空了下來，三、四個月沒寫詩了。我滿心憂慮著其他事情，碰不到寫詩的材料與感受。然後，靈感自己找上門來了。經常就是這樣子。詩興一起，我可以連寫個兩、三首詩。那個時候，除了寫詩，我什麼也不想做。就算是我該專心念書，我也顧不得課業進度，非要等詩興過了才能重回正軌。接著，我整個人又空了下來。」

他最近剛完成的新詩主題為〈大黑人〉。挺少見的主題。這個大黑人究竟是誰？拳王穆罕默德·阿里是也。

……折枝誰不能

單拳擊樹倒。你可信？

阿里的箴言

安息日上午，兩位在醫師住所作客的記者，似乎將這場宗教性的討論轉為針鋒相對的爭執。兩造爭執不下的主題是什葉派信徒的英雄。先知的堂弟與女婿阿里。什葉派信徒堅信，阿里應於西元六三二年繼任先知，晉身穆斯林的統治者。可是，不論阿里生平事功如何彪炳——他是人類史上少數最早皈依的穆斯林，也是少數幾位在有生之年親眼目睹伊斯蘭教轉變為大帝國的信徒——他就是拙於政治鬥爭。先知去世之後，三位哈里發搶在他前面繼任。阿里一直苦候到西元六五六六年才等到登基擔任哈里發的一天；即使在繼任之初，他的統治權也不斷遭到異己挑戰；阿里旋即於六六一年遇刺身亡。而這就是他們兩人在安息日上辯論的焦點了：阿里，身為哈里發，統馭全國軍隊，他也會命令屬下殺人嗎？還是說，他只允准他的追隨者出於自衛而殺人？

辯論剛開始，兩造於醫師家中的起居室裡，語氣還算平和。接著，兩個爭論者的嗓子也拉開了，語氣也變得明顯不同：咬牙切齒，渾身顫抖，兩人轉而像是清真寺裡吟誦《可蘭經》文的毛拉。辯論涉及的不光是歷史。阿里在政壇上遭遇的挫敗與死亡，阿里之子同樣在政治上失利與遇刺，這幾樁千古疑案，含塵蒙冤一千三百年來，一直未獲昭雪，已經被什葉派信徒引申為某種人人切膚感受的極大痛苦：無以補償平復的痛苦。早期阿拉伯帝國中的種族分歧（阿里正是受迫害者的捍衛代表），轉為宗教上的紛異，也是這個安息日上午，英國人建造的醫師住所中，兩造雄辯的激情源頭。

午餐過後良久，辯論還是方興未艾。我並沒有久坐，等候他們辯個河清海晏。醫生在我臨走之前，從自己的藏書當中送給我一本《阿里箴言集》（*The Maxims of Ali*）。這是一本平裝本小書，本地出版的。醫生說，就是這本書為他締造了奇蹟，讓他在面對石油公司總經理時，產生無比的力量；他想，這本書對我也會有幫助的。

當天下午稍晚，我回到位於梅爾街上的弗萊希曼旅館之後，就開始翻閱這本箴言集。阿里的箴言其實很有名。箴言的第一部分——一百條嘉言，早在一千年前就蒐集成冊，日後又陸續增列了數千餘條。醫生給我的這本小冊子只是選集而已，並由 J. A. 洽普曼（J. A. Chapman）翻譯為英文。剛開始閱讀時，我著實迷惑不解。

信人如信己。

兩面人最醜陋。

神箭手也會失準頭。

爸媽死孩子，背脊皆寸斷。

可是這般充滿村野風趣的智慧，也有其另外一面。

人間至偉之財富，富在智慧與判斷；至寒之貧窮，窮於愚蠢與無知；至惡劣之孤僻無友，在於虛榮、自負與自我誇耀。

俗世無完人。

世間畜牲只有狺吠吠犬與可厭野獸。牲畜彼此嚎叫。強噬弱；大欺小。彼等率皆役畜，某些受人馴服，某些猶逍遙野外。

俗世如逆旅，災禍無間斷，背信忘義人，堆積如山巒。人國險惡不留情，近者皆殞滅。

俗世猶如巨蟒一溜：觸感軟柔，咬起人卻不留活口。

以上犖犖大者，就是這個遭到不公不義與挫敗生吞活剝的正義之士的不平之鳴。如此憤世嫉俗，如此的痛苦。這些格言真的能讓讀者產生力量嗎？可是，看在同樣遭到挫敗與信仰堅定的信徒眼中，阿里正是一個體受到更多煎熬的好人；藉由阿里，俗世的痛苦和挫敗，瞬間都昇華為高貴的行徑。在此同時，寬恕與平和都是空言廢話：阿里同時也昇華了憤怒。閱讀至此，我心中更加明白——回到弗萊希曼旅館中，坐在屋簷寬闊的房間裡，屋外屏障著一堵獨立的水泥磚牆，隔開飯店小型游泳池的燦燦水光，庭院一角還裝飾性的栽上幾株香蕉樹——我心中益發冰雪明白，那個醫生的次子，從小到大，在他的教養過程中，灌輸了多少這類什葉派與穆斯林的宗教態度；醫生的次子自許為理性主義者，而他的詩文內涵總是外向無憂，要不是回到旅館，掌握了這等特殊的新見識，或許我也永遠無法看出他的英詩中任何屬於穆斯林的成分。

伊斯蘭教是人類史上最為俗世取向的宗教。儘管伊斯蘭教在政治上無能施為，卻沒有任何一種宗教

會像伊斯蘭教這樣，促使信徒目不轉睛地盯著世界運作的方式。而在醫生的次子的英詩中，在他對於普世文明不靈光的回應中，在他對於「基本的東西」的關注中，我忖度著，或許我可以看出，伊斯蘭教的狂熱將如何超越禮拜與態度，轉化為創造性與革命的改變，引領信徒超越宗教教條，落實在人本主義上；這將是一番真正的文藝復興，對著新世界敞開大門，並接受新世界的滋潤蘊含，正如早年穆斯林於其光榮時期的開放表現。

極端缺乏安全感的基本教義分子曲解歷史，深恐外來文化的污染而終日憂懼。可是，基本教義派一無是處。基本教義只會將人推向無法平復的信仰死胡同；基本教義派治國，徒然將全國推向政治的沙漠。基本教義違反了所有「基本的東西」；基本教義將世界擋在門外的功夫只有徒勞無益。而我心想，或許就在不久的將來，我們就可以看見，伊斯蘭教在巴基斯坦，歷經基本教義的過度伸張，伊斯蘭教即將自行蛻變轉型。

八 喀格汗谷地

向正北方走去，丘巒漸次隆起，不過一百哩遠處，就到了高聳的喜馬拉雅山區。那裡冬天來得早，山間道路每年都要被冰雪封閉上幾個月。一到九月，牧人就會攜家帶眷，趕著牲口，從他們夏季放牧的高山草原，舉家遷移到低地避寒。而我也特地前往喀格汗谷地（Kaghan Valley），觀察牧人遷移。伊斯蘭馬巴德大學的教授夸茲為我安排了這趟旅行。他將他的座車與司機都借給了我，他們將我送到巴拉科特（Balakot），我再自行僱用吉普車，沿著崑哈爾江（Kunhar River），往北走上崎嶇的一程。崑哈爾江是一條印度河的結冰支流，早在偉大的印度河發源之初就注入了這條大河。

馬素德是我此行的旅伴，他是一位專研科學的學者。自他成年以來，大部分時間都花在求取學位上面，而今他到了二十七歲的關頭，反而終日閒散，無所事事了。巴基斯坦國內找不到適合他的位子。他是很願意繼續他的研究工作，他也被英國某一大學錄取，修習某項進階課程，只是學費高昂，他委實負擔不起。

馬素德個子高挑瘦長，架著眼鏡，唇上留著一撮海象般的茂密短鬚，神情抑鬱黯然。他臉上那部小鬚子，暗示他出身軍事家庭的背景：他的父親在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六一年間曾於陸軍服役，前六年隸屬於舊時的英屬印度陸軍，接著改派到巴基斯坦陸軍。而今，他的父親從事會計業務。他們全家從印度北

部的勒克瑙遷徙到巴基斯坦，他們在巴基斯坦就是所謂的莫哈吉爾，也就是外地人。

馬素德說，莫哈吉爾已經改變了巴基斯坦地方或是區域上的文化屬性了，他們為這個地區帶來了新的食物、音樂、語言。莫哈吉爾講的語言烏爾都語，現在已經是巴基斯坦的官方語言了。馬素德進一步說道——對著我說，彷彿在對著一個全然的外地人說話，他一定要對這個外地人灌輸正確的國家形象——烏爾都語是一種極為優美、簡單易學的語言。我們經過歷史悠久的佛教城市塔克西拉¹之後，轉向北行，海拔漸升，挺進到亞波特巴德（Abbottabad），馬素德就給我上了一堂烏爾都語課，他的勒克瑙口音之清晰與優雅，甚至連我都能輕易領會。可是過了那個時候，他逐漸與我熟稔起來，當我們行車在乾燥、色彩鮮明的山丘之間，他就不再以莫哈吉爾族群的對外發言人自居了，語氣中也流露出些許諷。

依他說來，許多遷徙到巴基斯坦的莫哈吉爾，總愛偽稱自己是來自印度的伊斯蘭親王或是貴族世家出身。他可不。他的父親曾經投身軍旅，可是他在軍中官階僅止於哈維爾達爾（Havildar），也就是未獲任命軍官，跟我們的士官差不多。原來如此，儘管他能說一口帶著勒克瑙口音的烏爾都語，臉上還養著富於軍事氣概的小鬍子，還有他的科學研究學位，馬素德在巴基斯坦——此地比印度更封建，巴基斯坦的工業階級和專業人士組成的中產階級，遠比印度匱乏——只能算是個出身普通的人，而且還是個待業青年。

我們在巴拉科特停妥車子。接下來，我們還得上政府機關裡的旅遊部門，跟人家討價還價，租一部吉普車。那是我原先所料未及的，竟然還要討價還價。還有那間辦公室，同樣令人咋舌。辦公室是草坪盡頭一間門戶洞開的房間，房裡兩張套著椅套的椅子，兩張鐵欄杆床上鋪著泡棉床墊，同一邊牆上還有另外兩張金屬床，一對椅子上下倒置地堆疊在房間後方，房間前方則擺著一張小型的沙發椅。這間辦公室乍看像是一間候診室，又像是一所殘破不堪的病房。可是，這裡確實還是個工作的地方，室外草坪上

停著的吉普車也是實際存在的。

馬素德囑咐我不要插手，在他跟人家討價還價的時候，我可千萬不要開口說英語。我就在草坪另外一邊上的農舍走廊前坐了下來，過了一會兒，他就緊繃著一張臉走出辦公室。他說，他們開價要七百五十盧比的租金，那是美金七十五元。他想，他們可以讓步到七百盧比；可是他已經跟他們說，我們走人了，不跟他們租了，我們寧可到市集上去租吉普車。

有個男人從辦公室裡追了出來，他說，六百五十要不要。馬素德不理睬他。他表情凜冽地用英語對我說：「咱們上市集去。」我們走過市集——骯髒污穢的泥土道路，兩旁黑霾陰暗的小店。路邊一家破舊的加油站，機油污漬斑斑，有個男人正拿著水管沖洗一輛破舊的吉普車，他要價九百盧比。於是我們就折回政府辦公室議定租車，卻沒撈到六百五十的租金，我們得付上七百盧比。

沒多久（政府裡的人好像一點也不擔心做不到我們的生意一樣），我們就準備上路了。吉普車駕駛是個極為英俊的男人：暗棕色的蓬鬆頭髮，古典的印度—亞利安輪廓，褲管寬鬆的長褲與下襠忒長的褐色長衫，完美地襯托出他健美結實的體格。他隨車帶著一個小助手，男孩身形污穢，國字臉，菸不離手，卡其色圍巾下面只穿著一件薄薄的襯衫。我們出發得如此倉促，一直過了好半晌，我才注意到他緊緊地吊在吉普車車尾（純粹是為了表現戲劇效果），圍巾裹著他的頭臉與瘦窄的肩膀；接著，車子又走了好幾哩，我還以為他只是個巴拉柯特市集上揮手搭便車的孩子呢。

¹ 塔克西拉 (Taxila)：巴基斯坦古國健陀羅 (Gandhara) 阿契美尼德王朝 (Achaemenid) 的總督轄地。現為考古名城。位於巴基斯坦旁遮普省。

河谷風光

不多久，我們就來到崑哈爾江畔，河道寬闊淤淺，河谷兩壁都是岩石堆砌而成的。我連續在熱塵灰沙裡待上了好幾個星期，聽見水聲就要司機停車，駐足聆聽潺潺水聲。山路兩旁，綠蔭遮日，陰涼沁脾，更是意外的惠澤。可是我們不能多加逗留，前面的路還遠著。馬素德強調，再往前走，水聲還更加清且漣漪呢。而且走過從拉瓦平第開出的康莊大道之後，四周景物就像是舞台轉換一般，戲劇效果十足，我們開始可以看見牧羊人趕著羊群下山。牧人都是阿富汗人，身量意外的袖珍，男人圍著黑色頭巾，女人身著色彩鮮明的寬鬆長褲，頭上裹著拖長的頭巾。女人忙碌而不得稍閒，迴避外人注目，獨處在她們的遷徙生涯中，衣著色彩鮮明（黑紅對照），面容慘烈，營養不良，因為長途步行與畜牧雜務而身心交瘁，她們的臉龐久經日曬，布滿刻痕。

山丘上刻畫著一層層不規則曲線的古老台地，林木蓊鬱。人家湊著山壁築屋安居，厚重的泥材平頂房屋，地基高低參差不齊；房屋屋頂都架在厚重的木樁上，有些人家還直接將整段原木拿來湊數——這裡可是滿山遍野的棟梁樹木。沿著路基搭蓋的房子，屋頂就與路面同高，外觀上只得到某種類型的泥土庭院，起居住所則深掩其後，不輕易為外人所見。

我們將車子停在一個村莊裡，下車跟幾個男孩子聊聊。他們意態閒散，身上卻還穿著深藍灰色的學生制服，而且並不如表面看來般的遺世孤立。其中一個男孩還有個叔叔住在拉合爾；另外一位同學有個哥哥離家前往喀拉蚩，另外一個哥哥則遠赴沙烏地阿拉伯打工。一幢平頂石牆的兩層樓房裡走出來一個年輕男人，信口說道，他隨時可以南下喀拉蚩做木匠，每個月至少賺個兩千四百盧比。馬素德認為這人說得並不誇張：巴基斯坦人力大量外移，能夠操做工匠技術的人才已經很少見了。可是那人鄉氣可掬的狂妄口氣，害得馬素德益加鬱卒；他說，這個月薪，他自己可就賺不來了。

他們並不真的與外界隔絕。可是我們離開拉瓦平第之後，經過幾個小時愜意的車程，轉眼間已經置身於一處封建地方了。一個個子非常瘦小的男人，身高不及五呎——這些山區居民的個子怎麼會這麼袖珍啊！——牽著一頭水牛，走在前面。一旁男孩說道，那頭水牛不是他的。水牛是他主人家的，走在前頭的那人就是他主人家，頭上纏著頭巾的男人就是了。原先我們沒多留意他，惘然不解，原來他兩手空空，步履悠哉，正適足以顯示他在村中的地位，以及他擁有一頭水牛與一名農奴的高級身分。村裡的男孩又說了，那邊那棟房子就是大地主的宅邸，也是地方上的有錢人。那可不是挨著山邊蓋的平頂房屋，而是田畦盡頭平地上的那棟房子；石砌的大房子，兩層樓，鑄鐵屋頂向下傾斜。現在從我們面前走過的這些發育不良的矮小男人是古佳爾人（Gujjar），他們是這片谷地的原住民，腦筋似乎不太靈光，事實上算是相當笨拙，他們也不跟外人來往。

山路往上爬升，河流遠遠落在我們身後。一處處小面積的耕作農地補丁一般地遍布在險峻的山丘上；留待河谷地區晚夏採收的玉米田，只要能開拓填平任何一小片平地，就可以栽種。山中隨處可見擎天碧松，松樹沿著山壁天然下種，松樹小苗伸展出第一輪針葉枝幹之後，就極力挺身向上，爭取陽光，小樹站得又直又高；我從來沒看過長得這麼高的松樹。住屋雖不顯眼，山區中總還是有人煙定居，房子總是隱居在平頂屋頂與石牆之後。

路上不時穿梭著綿羊、山羊、馬匹與駱駝，綿羊背上還染上顏色。我們沒法子讓阿富汗人開口說話。即便他們開口聊天，也沒有多少可以閒談的。他們住在非常寒冷的地方，每年這個時候，他們下山來避開冬雪；就是這樣子了。他們跟他們的牲畜齊心一致，人獸之間達成某種了解。非常年幼的孩子，外界還認定為襁褓時期的嬰孩，跟著行李一道兒繫縛在駱駝或是驢子背上。他們一旦過了學步的年紀，就得開始分擔家務，投入工作，搖身變為小型的成人，手上拎著的不是棍子，而是鞭子，身上穿著襯衫、長褲、頂著頭巾，神情如此沉著與老練，遠遠看去，尤其當他們落單獨處時，令人難以估量他們的

年紀與個子。

英俊的吉普車司機語氣中不乏某種部落間的嫉羨說道：「他們趕的那些羊，每一頭在曼瑟拉（Manshra）或是亞波特巴德都可以賣上一千盧比。」

羊群忙碌的小蹄子，將路面上的塵土磨得更加細碎。而當我們車行經過兩三大群羊隻時，穿過雲霧迷濛的塵陣，每隻羊都羊毛茂盛，背上一簞一簞地染成許多不同顏色。馬素德（他的自信早已遭到先前吹噓自己可以在喀拉蚩賺上兩千四百盧比的鄉下人戳傷）對我說：「你能想像這條路上一拉克又一拉克的盧比嗎？」一拉克就是十萬盧比。

我說：「他們賺了錢要做什麼用呢？」

馬素德說：「他們還是有親屬要撫養，也有子女的終身大事要辦。他們結婚也得請客吃飯。這裡在習俗上，男方要送兩萬盧比的聘金給女方。要是新郎身上沒現金，他就得蓋棟房子給新娘，或是在土地交易上作一些安排。這樣子，有朝一日，他若休掉她的話，女方才不會人財兩失。要是他什麼都做不到，沒有女孩子會嫁給他的。」

「我還以為女孩在巴基斯坦，沒有嫁妝無法出嫁呢。」

「嫁妝？這個詞是什麼意思？」

我想，馬素德是曉得這兩個字是什麼意思的。我心想，他也知道這種習俗並不是什麼經過認可的公序良俗。我說：「我在喀拉蚩的時候，聽人家說，嫁女兒只會送上三十二盧比，因為當初先知也只收到這麼多嫁妝。」

他認同了這一點。

我並不相信一隻羊可以賣上一千盧比。而就在稍後，我們的車子再度受阻於一大群綿羊時，我請馬素德直接去請教趕羊的阿富汗牧人。那個阿富汗人以為我們有意買他的牲口，他指著羊群中某一隻較為

渾圓肥胖的羊隻說，這隻羊三百盧比，一個蹦子兒也不能少。這回就輪到我們的吉普車司機佯裝他聽不懂牧羊人說的話了，誰叫他事先叫了個一千盧比的價錢呢。

淡綠色的河水湍急湧過岩石，逝者如斯，不捨晝夜，無間無歇。可是，山勢攀高過了某個海拔之後，河水似乎結凍了。白色的激流與漩渦形成了某種固定的、大理石一般的圖案，雖然耳畔還是可以聽見河水湍流的淙淙水聲，然而當我們下車，走下去趨近岸邊，再次眼看著固定的圖案靈動了起來，洶洶水聲終於又配合上動態水流了。

山路上一處寬闊凸出的拐角地帶間，阿富汗人在這裡紮了個營地。營地上搭起了一座低矮的帳棚，駱駝與驢子拴成一群，營地上有人正埋鍋造飯。營帳前炊爨的煙火映照著暗褐色的帳棚，構成一幅引人注目的畫面。在我們請教過吉普車司機，如此不請自來的攪擾會不會令當地人不悅之後，我們就停下來，駐足與阿富汗人閒話家常。

我們跟一個穿著巴基斯坦傳統服裝的年輕男人攀談起來。他上唇留著小鬍子，原本白暫的皮膚因為日照過度而黧黑，臉上洋溢著村農式地歡愉。可是他狡黠得很，他以為我們搭乘政府部門的公務吉普車而來，應該是官方人士，所以劈頭就對馬素德說，他營帳裡的人，許多年以前就離開了阿富汗，現在他們都定居在巴基斯坦這一邊的邊界裡。

馬素德頭也不回地直盯著那個年輕人，語調一如平常地用英語跟我說：「他在撒謊。他是從喀布爾來的。他才剛剛去過喀布爾。他只是不想在政治上惹麻煩而已。」

營地上那個年輕人掏出一只黃銅鼻煙盒，盒子裡盛滿了暗綠色的菸草與其他藥草，取用的時候，應該捏起一小撮來壓捺在下唇下方。我擰了小小一撮，攔在舌尖上試味道，菸藥草受潮濕潤之後，舌尖便感到一陣陣刺激，感覺上也不盡然全不舒服。禮尚往來，他也從我自己的棕色菸葉鼻煙中挖了一點試試。我的鼻煙勁道太強了，刺激得他全然無意掩飾他的嫌惡；他不但大打噴嚏，鼻涕淚水還差點就噴濺

在我的腳上。等他回過神來，他先是用手指敲敲我掛在襯衫口袋上鏡片透明的眼鏡，接著再自己動手取下我仍然架在鼻子上的深色太陽眼鏡。日光如此明亮，我忘了自己還戴著太陽眼鏡。一開始，我就應該讓他看清楚我的雙眼；他反詰我這般無禮的行為是有道理的。

他領著我們到他的營地參觀。茶汁剛剛以次大陸的方式泡好，或是煮好，骯髒的小口茶碗擺在地上。篝火前，一個女孩，或許是個年輕女人，正在做羅替（roti），也就是扁平、未加酵母的麵包。她兩手將麵糰壓扁，動作迅速，不住地翻轉挑拉著麵糰，直到麵糰變得又薄又圓。接著，女孩將又薄又圓的麵糰甩過右臂，動作簡單俐落，麵糰就這麼攤到鐵質烤鍋上了。麵糰的麵粉是採集當地生產的穀實，再送到附近村落裡的磨坊輾磨成粉，麵粉再在營地上和水揉成麵糰。營地上總是有吃用不盡的麵糰。

阿富汗人請我們享用的羅替，滋味極為可口。營帳、炊煙裊裊、可愛青山、潺潺流水、濃釀的茶湯，還有羅替，轉念之間，我覺得自己就要拜服在這種生活方式之下。可是，他們真的每一餐都光吃這兩樣食物嗎？光是羅替與茶汁就夠了嗎？馬素德替我問道：「只吃羅替和喝茶伊（chai）嗎？不用塔爾卡里（tarkari）嗎？」不必配上比較富有風味的菜蔬或是肉類餐點嗎？那個年輕人開懷笑道：「塔爾卡里？我們為什麼要配著塔爾卡里呢？」

吉普車司機說道，有時候他們也吃帕尼爾（paneer），那是一種白色乳酪，可是我們吃的那一餐就沒有這等好料了。

馬素德說：「這就是為什麼他們會這麼健康了。」馬素德對於腐敗的食物與不潔飲水總是提心吊膽的。他出門總是隨身攜帶藥品，這體現了一部分他的綜合性焦慮。

營帳裡的女孩或是女人，個個都鮮麗非凡。她們現在也只能吃到羅替與喝茶，可是她們看起來吃的比我們沿路所見的女人要好，也獲得比較多的關注照應，而山間的陽光也在她們白皙的皮膚上，染上一層美妙的暗色暖意。

營帳內外，綿羊和山羊隨意進出。地毯和寢具都收拾在營帳後方。領著我們參觀的年輕人說道，營帳前方左手邊的空地上是專門保留給他父親與伯父的；中央地帶是留給婦女的；剩下右手邊的地方呢？可惜我沒聽懂右手邊是保留給什麼人的。兩個兄弟帶著這一列旅人遷徙，他們家族可不寒噤。營地中央，一個面容平凡、神情凶狠的女人坐在她指定的位子上，耳垂上吊著沉重的銀質耳環，脖子上也圍著一串沉甸甸的銀質項鍊，她是伯父的妻子，始終正眼也不瞧我們一眼。

不需要我在一旁催促，馬素德自己就趨身請教那個年輕人，羊群價錢怎麼樣？年輕人指著對面路面上面積較小的營地中圈養著的一小群羊隻說道，那邊那幾隻羊，每一隻都可以賣上三千盧比。羊隻都壯碩有神，羊毛茂盛，而這些羊一定非常特別，因為牠們就拴在對面營地的起居區域裡，每隻羊的兩隻後腿都繫上繩索，綁在一根中央柱子上。

他們在營地主帳附近圈綁駱駝的方式，也是我前所未見的：駱駝一隻前腳往後折起，再用繩索跟大腳綁在一起，因此，如此龐然巨獸走動時也只能單腳跳躍。這也是我第一次注意到，每一隻駱駝鼻子裡都插了一根木栓或是木釘。原來，行旅隊伍就是以這種方式牽著駱駝前進。那個年輕人也示範讓我們了解。他拉扯了一下牽引駱駝的繩子，駱駝彷彿十分不悅的嘶鳴了一聲，卻了無其他反應。可是過了一會兒，駱駝就矮身下來，蹲踞在四隻長腿上，腿上關節處瘀血與痲痕斑斑可見。駱駝就跟大象一樣，近看不如遠觀神氣；趨近一瞧，獸皮總是體無完膚，殘破可憐。

年輕人說，營帳裡的漂亮女孩是他的妹妹，她們兩人都還待字閨中，他也還沒有意中人。他心想，自己的年紀應該是十六歲。可是，這顯而可見的是胡說八道，或許他根本不曉得自己的年紀，也不知道該怎麼計算春秋來去，究竟過了幾個寒暑。這個家族的一家之主，他的父親，現在踱了過來。他滿臉惱怒，風采卻極為莊嚴；頭巾優雅的裹在腦門上，面容嚴峻。直到他走到我們的跟前，我們才注意到他極為嬌小的身型：他的身高大概還要再加上一兩吋，才湊得到五呎高度。可是這些阿富汗人個個都相當袖

珍，非常近似他們圈養的動物——牲口、小馬和驢子等等，小牛的個頭則跟狗一樣，只有山羊和綿羊看起來還強健壯碩。年輕人的父親睜著一雙淡藍色的眼睛，眼圈周圍剛剛畫上銀黑色的錫粉。他白色的短鬚尖端還上了臘；唇下美髯分梳兩旁，鬚曲曲；日照曬黑的皮膚下，還是白皙可見。如此岌岌高山之上，置身於駱駝與羊群之間，這位美髯公還是如此花稍不懈，自豪於他盥洗（此外就別無他字可以形容了）之精妙，猶勝於同族女性之講究，實在叫我大開眼界。

年輕人說他父親年過五旬。而他的父親——藍色雙眼中滿是疑斥，甚至輕蔑——問他兒子說，我們是打哪裡來的。年輕人說，我們講的話都不一樣，馬素德講的是烏爾都語，我說英語。他就是用這種方式說明我跟馬素德兩人都是外來人士，只不過出身不同部落罷了。年輕人的父親意態悠閒的請我們用茶。我們敬謝不敏。接著兩造就再也無話可說。那位父親落坐在營帳左側，那是規畫給他與他兄長的指定位置，仰身倚著幾紮細軟包裹躺下，就不再理睬我們了。

一頭驢子，後面還跟著兩三隻同伴，步進帳棚裡來，細細咀嚼著棚裡切得整整齊齊的秣草，這些糧草或許是切給較為珍貴的牲口的。年輕人的父親張開手掌，轟地就在驢子側身上賞了牠一計。可是他這一巴掌並沒有傷害驢子的意思，這一掌拍下去，不過是為了製造出警告的轟然音效。家族裡一個小男孩撿起石頭扔向其他幾隻驢子，可是石頭也只是小石子，而且，扔的力道也很輕。他們對待牲口都非常溫和，他們會揮舞著棍棒，誇大動作來威脅牲畜，可是從來不會掄起棍棒鞭打動物，棍子只是拿來給牲口搔癢、引導牲口前進的。

年輕人的父親倚著遷移旅隊上的幾捆行李，開始咳嗽起來。接著，儘管他頭巾華麗、眼圈塗飾著銀粉、美髯鬚曲、唇上短鬚還上了蠟，他還是醜態難掩地就著自己躺下的周圍隨地吐痰。我看他其實就躺在動物糞便之中；而就在帳棚後方的陰暗角落裡——受到的保護比人還要周延——就是他豢養的珍貴山羊與綿羊。

馬素德眼光往下探望著那個老人，對我說：「他們都是這個樣子。你去過阿富汗嗎？喀布爾去過嗎？他們的中產階級都是這個樣子的。」

我們說著不同的語言。彷彿大家都心照不宣，為了我們的共同利益與彼此容忍，異鄉人對異鄉人，彼此之間固然相互輕視，每個人在他所屬的族群中也自有隱私。馬素德對老人的不屑，不見得就比他們對我們不屑來得強烈。我可以從老人的眼神中看出這點。這塊窄小的區域上，擠了這許多不同部落人等：古佳爾人、阿富汗人、喀格汗人、印度西北境內的另外一族阿富汗人、馬素德（印度北部的勒克瑙人），還有我。然而，來者是客，待客的禮數還是免不了：奉茶之外，還要敬菸。我們的吉普車司機已經遁形到一邊去了，阿富汗人已經讓他煩得受不了了，而他也無意掩飾這一點。他高踞在岩壁一端，英俊颯爽依舊，修飾更加，頭髮梳得跟電影明星一般，路上風塵更為他蓬鬆的暗棕頭髮增添一種新的色調。

帳棚裡那幾位漂亮女孩的母親又是哪一位呢？我知道，營地中央那個面容平庸的女人是伯父的妻子。年輕人說，女孩的母親（不見得就是他的生母）正在公路的另外一邊，張羅著另外一處面積較小的營地，每頭要價高達三千盧比的珍貴羊隻就拴在那裡，女孩的母親小心照料著牲口，不讓牠們漫步迷途，傷到自己。

我們跨過公路去參訪營地。他的伯父也在那裡。他只是坐在地上，對我們視若無睹。兩個圍著面紗的女人，其中一位就是漂亮女孩的母親，正忙著打理行李。她們的面紗頗不尋常，顯示出這個家族的社會地位。伯父跟這兩個女人交代了幾句話，她們就合力將一方毯子鋪在地上，伯父就從他原來坐鎮的地面上移駕到毯子上。而等他坐穩之後，兩個女人就在伯父四周忙著將帳棚架起來：帆布四角打洞，周圍再嵌上鐵環；撐起帳棚的桿子是竹竿充就的，竹竿底部箍上鐵環，竹竿頂端還串在一起，架起來就形成了一個三角錐體。女人家費盡力氣還是撐不起那幾根帳棚支架，伯父則毫不在意，他只是坐在那裡，等著帳

棚搭起來好避開日頭。他雙手在胸前合握著一個舊式的奶粉罐子，罐子裡裝的可能就是錢吧。

女人使出吃奶力氣，極力撐起帳棚竹竿之時，面紗從她們的臉上滑落。她們跟對面路邊帳棚裡的女孩一點兒也不相像，她們的臉龐蒼老，布滿刻痕而棕灰黯淡。雲英未嫁的女孩是美人。這些女人，身為人婦，就是工人了，她們就是拉車載物的駝獸。正如帕克曼²於一八四六年在奧瑞岡古道上看到的達科塔印地安婦女一樣。可是這些阿富汗人就跟這裡所有的山區部落一般，生活在只有他們才能掌握的特殊地形上。誰也無法料想，正如帕克曼無法斷定達科塔的印地安人，終有一天竟然會從地表上遭到剷盡清除的命運。

我們站在年輕人的伯父身邊時，馬素德說：「他們的女人一手包辦所有的家務。男人只有袖手旁觀，一點忙也不幫。在歐洲就不是這樣子了，對不對？」可是，他對這些男人的批評並不公允。他們同樣也將自己逼得很緊；游牧民族當中，還有誰像他們這樣將自己逼得這麼緊呢？馬素德說：「他們對待女人的態度，其實跟我們差不多。只是，我們住在城鎮裡的女人比較沒這麼苦。」馬素德家中也有姊妹。他的姊姊已經出嫁了，成為「家庭主婦」，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落入了古老的窠臼。可是，他的妹妹都還在大學就讀，而馬素德也非常關心她們。

然而，此時此刻，我的態度卻跟馬素德有別。阿富汗營地上的景致，勾起我遙遠的回憶，童年時期最早接觸到的地理課程，回想起早期的《遠方人家》(Homes Far Away)教科書中的插圖：人類建造家園，在極端的天候與自然條件下，提供溫暖與庇護——非洲人在他們的圍欄住屋裡彎弓搭箭，抵禦暗夜森林中不可知的猛獸；廣袤無垠的西伯利亞大草原上，吉爾吉斯人住在帳棚裡；冰封大地之中，愛斯基摩人砌起冰堡安身。

而帳棚裡的女孩如此嬌豔，我心中不禁翻攪起某些務農或是游牧的渴望。信德沙漠中，印度河畔，某個聖人的陵墓旁邊，有人夸夸高談著穆爾西德與穆理德等等，在在令我聯想起托爾斯泰與萊蒙托夫寫的高加索故事。而就在這裡，佇立在某條注入印度河的寒冷江水旁邊（清澈的綠色江流即將轉為泥濘遲滯，經過人工運河，流到喀拉蚩，再注入距此千里之遠的熱帶、鹹性沼澤），我感覺像是重新回到開端：牲畜成長的歷程、帳棚與日間行進的隊伍。我可以繼續我的旅程，做些其他的事情，而他們只會固守著現在我們看到他們在做的事情。而那些女孩，嬌豔鮮麗如此，皮膚吹彈可破，實際上卻如此遙遠，封閉在她們自己的部落幻想當中，今朝美嬌，足食豐衣，自覺身價水漲船高，不日卻即將淪為人婦與苦勞。

我們跟這群阿富汗人流連了整個下午，心版上注記著他們對於牲口的溫柔關愛，遠超過他們對自身的愛惜憐憫：那些面孔久經日曬，年紀猶輕，卻已經蒼老不堪。營地上女孩嬌豔的姿容與健康，並不多見於其他族人身上。偶爾，我會看到一個男人扛著他的山羊；偶爾，會看到一隻山羊裹著毛毯，安置在驢子背上。有個女人腳上只穿了一隻鞋子，另一腳打著赤腳，另外一只鞋子則掛在她頭上。頭頂穿鞋，是此地穿著風格之一。稍後，我們又看到幾個女人將一雙鞋子都掛在頭上，鞋跟彼此相套，恰好形成一個小拱門。當地人只有走在碎石地上才穿鞋，倘若地面平滑，或是走在柔軟的沙地上，那麼還是打赤腳走路比較濟事。赤足行人的腳踝也因為路面污漬而發黑。

吉普車繼續上行，到達秀格蘭(Shogran)的時候，陰霾低垂，氣候涼爽，可是一下起濛濛小雨，身上就感覺冷起來了。松樹高聳，樹高擎天，而在某些地方，路邊以外，地勢陡降，很難俯首探見樹根所在。山路拐到某個比較安全的地帶，就可以看見村農的破壞行動：幾棵可以數人合抱的大松樹，樹皮

2 帕克曼 (Francis Parkman)：美國歷史學家，法蘭西斯·帕克曼還在哈佛大學念書時，就已經決定今生將致力於法國、英國與印地安人在美國大陸上活動的歷史。一八四五年夏季，他與一位朋友同遊在蘇族與龐尼族的勢力範圍內，為他的寫作計畫蒐集第一手的史料與印象，並於一八四九年出版了《奧瑞岡古道》(Oregon Trail)一書，記載他此行見聞。

被剝個精光，農民將樹皮劈下來，搬回家當柴燒。此地奇缺薪炭材，這裡地力如此貧瘠，植被稀少，只有松樹能夠扎根在岩石縫間的貧薄土壤裡。

黃昏時分，我們再度沿著江水行駛。低矮的岸邊，人們清理出一片草生空地，許多人家就在上面搭起帳棚。炊煙裊裊，熱茶騰騰地剛煮好，羅替也出爐了，肉乾細切準備今宵晚餐。駱駝（比人先進食）已經細嚼慢嚙著秣草。某個營帳旁邊的駱駝還嚼著冬青樹的枝子。河岸下方，水湄邊上的岩石上，暮色四合之際，各種彩度都減低到非灰即白，小馬與其他獸獸四下徜徉，辛苦了一天，終於可以短暫的自在一番。

阿富汗人在草地上攤開厚重的羊毛毯子。以前我就注意到過這些毯子。這些都是未經染色的粗羊毛織就的，原色暗棕，圖案簡單，再染上鮮麗的花色；這些羊毛毯子聞起來羊羶滿溢，像是山羊或是綿羊，這也是阿富汗人的氣味，游牧民族隨身攜帶的氣味。我深受某一張毯子吸引，馬素德與吉普車司機立即幫我跟店家議價，彷彿純粹為了品味殺價的喜悅。一個老人是這片營地的帶頭長者，遠比我們先前遇見的錫粉眼圈花稍父親友善和藹，開價要四百盧比。

馬素德將我帶開來，留下吉普車司機獨立完成這筆交易。我們盯著白天馱著行李的牲口，低頭吃著牠們的嫩葉與枝桿；我們漫步在營帳與野炊之間；我們走在盤桓於岩石河床邊緣上的驢子之間。我們重新踱步回去的時候，交易已經講定了：三百盧比。

每個人都歡天喜地的，大家紛紛握手誌慶；而那吉普車司機抓起毯子勝利歡欣，像是他為自己討了個好價錢一樣。可是我一定是受到高山海拔的影響，等我稍後回到了拉瓦平第，細看這條毯子，才大吃一驚，毯子不但尺碼寬闊——近晚之際，駐足江畔，我還以為這是條最小號的毯子呢——而且，毯子的圖案與花色之光怪陸離也令我咋舌驚憾，好比失心瘋狂的創作者所繪畫的色點與波紋，直追精神病院出品的作品。或許，游牧維生的經歷，就像是在腦袋上挨了一計一樣。

山路再度攀高。即使在暗夜當中，江水還是銀白耀眼，漱石泉湧。溯溪以上，石塊益加增大，岩石偉碩，山路有一兩回都在孤懸巨石之下側身通過。沿著山壁建造的平頂多層房屋，透出澄黃的燈光。屋舍僅僅靠著室內的燈光浮現於暗夜之上，呈現出室內裝置，映照出某種孤寂與蒼涼的氣氛。

路上可不孤寂了。有時候，牧人的帳棚就搭在路邊邊坡下方；我們還在一個路段上，碰到一個橫躺的男人，他彷彿就睡在路邊堆砌路基的石牆上。我們還行車經過一處營地，沿路廣布：篝火、帳棚，綿羊矮身休憩過夜，黑暗中遠看像是河床邊上一顆顆線條柔和的渾圓巨石。看守營地的犬隻是當地特產的厚毛狗，對著我們咆哮，在車後奮力追逐著我們。

光線退去之後，吉普車司機打開車上的卡式錄音機，播放起印度電影的主題曲。一支支甜美、哀傷的情歌，訴說著愛情、失落與渴盼，歌聲伴著我們通過夜幕籠罩的山谷；而且，屢試不爽的，歌曲中總是女人在幽幽嘆息。

Tun zindagi-ko ghumko fasana bana-ge

Ankho men intizar-ki jagga-ge

我的一生因為你而悲哀。

在我眼中，你點醒了一個渴望的世界。

第二行歌詞，奇妙無可言喻，幾乎無法翻譯，歌詞中出乎意料的自負，在愛人眼（Ankho）中，點醒（jagga-ge）渴望（intizar-ki）的世界（duniya）。就是這一行歌詞，這首歌才能歷經四十年仍然傳唱不絕；只要錄音帶轉動到這一行歌詞，吉普車司機的助手小弟就會跟著唱。

Ik tees si dilmen ut-ti bai
Ik dard sa dilmen hata hai

就像輓歌浮現在我的心頭。

隱隱地刺痛了我的心頭。

雖然夜落山谷，牧人卻還在路上；這裡似乎沒有特定的遷移與紮營時間。我們的吉普車還得減慢車速，讓路給一群追牛的牧人。這頭公牛獨自闖蕩，脫離了旅行的隊伍，一個勁兒地猛衝回來時路。

接著，我們就好像迷了路。我們從吉普車上下來，四下一片漆黑，伸手不見五指。吉普車司機派遣他的小弟前去探路，後來自己也過去探路。他轉身回來，慢慢地將吉普車駛離，留下我們幾人站在那裡。我們失去了吉普車的燈光。那個小弟回過來找我們，藉著手電筒的光線引導我們前進。他將他的小手伸出來給我握著，他小手的觸感意外的輕柔。我們似乎走過泥漿與石塊，再度看見吉普車的車燈。漆黑當中，難以度量距離。吉普車的車燈似乎遠在天邊，彷彿，我們的司機開上了好一段距離才又找到大路。其實，幾秒鐘過後，吉普車就在那邊，只不過是幾步之遠而已。

我們似乎跨過泥漿和石塊。可是稍後，第二天回程路上，就著天光我才看出來，原來是冰河下山阻斷了路面，雪泥晃盪在路基的擋土石牆上。表面上積雪看來陳舊而骯髒，可是就在看來堅硬的雪層下，就在喜馬拉雅山晚夏的盡頭，淘刷了一個巨大的白色洞穴，一道激流就這樣洶湧地流出這處大洞穴。

我們現在置身於冰河與急流之間。水聲音效足以降溫刺骨，隆隆不絕於耳。

山上的夏夜

納冉（Naran）招待所燈火通明，卻沒有人出來招呼我們。當我們還在巴拉科特為了吉普車的租金討價還價時，吉普車司機曾經提過，這裡有一家公營的政府招待所，一個房間一晚只要一百二十五盧比。此時，他說，房價要兩百盧比了。當時我心裡計算著跟人家要四個房間——我自己、馬素德、從拉瓦平第開車送我們到巴拉科特的轎車司機（一路上一直保持緘默與謙遜自抑），還有吉普車司機和他的助手，一聽房價漲了，整顆心就沉了下去。可是馬素德一貫擔憂著飲食不潔，對於金錢同樣也疑神疑鬼，總是惻惻忖度著會不會被商家敲竹槓了。馬素德說，一開始他就跟吉普車司機和他的助手講明白了，吉普車司機跟他的助手自行料理住宿問題。結果，吉普車司機沒把我們帶到公營的招待所，而是我們帶到公園旅館，沿路上，我們都在不同地方看到這家飯店色彩鮮豔而粗劣的宣傳看板。

「公園」是一棟狹長的建築，深深退居在公路一側，前廊照明不良。吉普車司機按了按喇叭，停車場旁邊一棟規模較小的房子裡走出一個男人，身上還裹著毯子。入夜之後，寒氣逼人，外邊已經冷上了一陣子，可是，旅館裡頭還是找不到暖房可以歇腳。裹著毯子的男人將我們領到一間臥室：兩張木框床舖，壁上點燈照明。他跟馬素德討價還價，而馬素德將我拉出寒冷的臥室，站在冰冷刺骨的前廊上對我說，倘若臥房裡再加一張床的話，我只要付七十五盧比就可以了。這倒有趣了，先前我像個領著一小群旅行車隊的旅人，擔憂著一個晚上上百美金的巨額旅館帳單，這時候，我只要負擔美金七塊五毛錢，卻得淪為公路宿舍的一員。我說，我只能單人獨睡一房；我不容易入睡。馬素德繼續跟面帶微笑的旅館人員講價，最後，兩人終於議定，多增加一間房間，帳單上只會多出一筆二十五盧比的帳款。

我請他們在我房間裡生一盆火。旅館人員微笑著說，這可使不得。煙囪不通，要是他在房間裡生火的話，會把房間搞得烏煙瘴氣的。那倒是說明了壁爐相對的清潔光溜。我說，可以上一些熱茶嗎？是，

那倒是沒問題，晚餐時就會送上來了。晚餐如何呢？您打算用些什麼呢？

他們有雞蛋嗎？沒，這兒不供應雞蛋。我轉念想到這條水流清澈的崑哈爾江，就說道：「魚有嗎？」馬素德替我翻譯，重複「魚」這個英文單字，旅館人員晃著腦袋，肯定地複述一次：「魚。」而馬素德還在繼續翻譯說，旅館可以供應鱒魚。

馬素德說：「釣魚許可證要四十盧比。」

「許可？你們這裡做什麼都需要許可嗎？」這個字眼讓我聯想起自己在拉瓦平第寄書和兌現旅行支票時碰到的困擾。

馬素德不高興地說：「不用。」

天氣太冷，無法繼續多談任何關於許可的話題。我本來就預計入夜之後，這裡將是天寒地凍的。可是現在卻冷得刺痛；隨著一分一秒過去，我的房間益發冰涼冷冽。我在行囊中未曾打包毛線衫或是套頭毛衣。我決定在狩獵襯衫下，再多穿一件襯衫。當他們看到我開始脫換更衣時，都紛紛離開房間，走到前廊讓我方便。可是臥室房門還是半開著，這真是種打了對折的嚴寒隱私。我寧可他們在旁圍觀，甚至還會請他們幫我的忙。我的手指頭都凍僵了，實在無法俐落應付襯衫上的釦子；而且，人群散去之後，房間裡靜無人聲，只聽得滔滔水聲，令人備感沁涼。

接著，我穿著兩件襯衫，再度返回前廊。旅館人員已經將四條疲軟的魚攤在桌上了，顯然他不必走遠，就可以弄到充足的漁獲。吉普車司機與圍著卡其色圍巾的助手已經暫時跟我們告別了。正如馬素德先前所言，他們得自行安排住宿；不消多猜，就在某處，一定有一間溫暖的泥簷農舍在等著他們。

馬素德跟我（還有我們沉默寡言的司機）一同前往廚房取暖。廚房搭在停車場旁邊那間比較小的建築裡。雖然我們不過剛到沒幾分鐘，雖然我們跟商家討價還價才剛剛大勢抵定，四條魚才剛剛撈起，廚房裡幫我們準備晚餐的廚師和幫忙人手已經忙得不可開交了。燒烤鐵板下面升起一灶熊熊爐火，穿著藍色長衫的男人，兩手壓扁麵糰準備做羅替，長衫下襬隨著他每個慶典般的歡快動作而跳動。魚已經剔骨、切片、灑上調味料，攤平在一張木質矮桌上了。

我站在灶火前面，樣子像個廚師當爐。馬素德坐在一張板凳上，面對著一張矮桌。我們兩人不約而同地都會輪番移動過去關牢廚房的門；廚房的員工進進出出的，總是不記得要隨手關門。天下事莫如灶火重要：藍衫廚師在桿麵桌上給麵糰灑上麵粉不重要；紅色塑膠桶裡的水質不重要；攤著魚肉切片的切菜矮桌也不重要。

廚師總是動作迅捷，很滿意自己剛剛烤好的羅替，拿了一把菜刀除去圓形鐵板上堆積多時的脂肪硬痂。他在鐵板上點了點油，又將灶裡火光旺盛的薪柴抽了幾根出來，好減弱灶火。他將魚肉放上鐵板，再拿一只鋁鍋鍋蓋蓋在魚肉上頭，然後彎腰下到燻黑的地板上拾起一塊舊磚塊，鎮在鋁鍋鍋蓋上。

馬素德說：「我們就在這裡用晚餐吧，如何？」

他正好說出我的心思，於是我們就在那裡解決民生問題。

門外走進一個彪形壯漢，相貌堂堂，戴著一頂毛帽，圍著一條深灰藍色的圍巾。他不是村莊裡的泥腿子，也不是山間居民。我心想，這人要不是個地主，就是跟這間旅館有關聯；不然就是個警察，或是個情治單位派出的探員，出來巡查外來的異鄉人士。他說自己是個「混業」的，或許是某種化學研究員，或是藥劑師吧。他在巴拉科特有片店舖，納冉地區也有一家店面。於是，我就說了：「你有兩家店舖嗎？」他說：「不，我只有一家舖子。」納冉那家店只在夏季營業（按照官方規定，現在還是夏季時節），巴拉科特那家店則只做冬天的生意。

晚餐桌上，除了魚之外，還有一盤肉菜，讓馬素德與我們沉靜的司機享用。司機一貫地自我謙抑，即使美食當前也竭力自制，千萬不要吃得比我或是馬素德多。馬素德飢寒交迫，將他對於不潔飲食的顧慮完全拋諸腦後。他請人端來開水，就著肉片吞飲。廚房小弟一直在旁觀看著我們的舉動，湊著灶前的

平台，拿了一只玻璃杯，浸進一個紅色的塑膠桶子，再將滴著水的杯子遞給馬素德。馬素德擊著水杯，仰頭一飲而盡。

混藥人走了。本來，在他說明他的行業及他住在什麼地方，以及在他了解過我們是些什麼人，又說些什麼語言之後，他跟我們也就無話可說了。穿著藍衫的廚師將柴火從大灶裡抽出來，滅熄的火焰餘燼很快地黯淡下來。廚房不再對我們開放，我們只好再度步出戶外，一品颯颯冷風。可是填飽肚子以後，整個人也暖了起來，院子裡感覺不再那麼寒冷，房間裡也暖多了。山谷間的孤獨與凋零影響了馬素德的情緒，他待在我的房間裡，聊起他自己和他的焦慮。

馬素德的焦慮

他在心裡為他的父親與家人還有家中的生計焦慮不已。他覺得自己有分擔家計的責任，偏偏又心有餘而力不足。同時，他也擔憂著自己從事科學研究的前途，若不是短於經費，他的研究生涯也不會中斷。他現在已經二十七歲了，一輩子都在上學，當學生；可是，由於他選擇專攻的領域使然，他還得再窩上一段時間求學才會有所成果，這對他的父親是個沉重的負擔。他的父親卻沒有抱怨，他把所有的驕傲都寄託在孩子與他們的教育之上。

「我不能再讓我父親繼續工作下去了。他太辛苦了，每天起早摸黑出門，一直到天黑夜深了才回家。他已經六十一歲了。」

「可是萬一他退休的話，又會落得無事可做。」

「這你就不了解了。我告訴過你，我父親在陸軍的官階。我父親只做到非委任士官，官階很低。你不曉得這種官階在這裡的意義。」

他的父親今年六十一歲，會計業務每個月可以為他賺個一千七百盧比養家。這一點令馬素德寢食難安，同時也耿耿於懷，嫌惡自己的無能為力，同時也深感自己一定要堅守研究領域。

「可惜，我的領域不是應用科學方面；倘若是應用方面的科目，就會有錢了。」

「你想要離開巴基斯坦嗎？」

「我並不想走。我在這裡還是找得到工作的。可是現在政府遇缺不補了，目前不再找人，可能這也只是暫時現象。可是，我也不確定。我跟美國一所大學申請獎學金，他們拒絕我了。他們說，印度——巴基斯坦一帶的學生，只會糟蹋、濫用學生簽證而已。他們拿到學生簽證後，就過去工作一個月左右，然後人就不見了。我可以去英國的泰爾佛德³，他們已經答應給我一個位子了。可是，我又要上哪兒去籌這筆錢呢？在某些國家，你可以為自己的人生奮鬥。你可以相信，只要付出，就會有結果；可是在這裡，你只能憑運氣。在我們國家，你只能相信運氣。」

他並不知道，他正好就直接講到我的狀況。奮鬥跟執著與收穫的理念，這種講究人的品質的觀念，只屬於某些社會而已。當年我生於斯長於斯的千里達殖民社會中，並不存在著如此自立自強的概念，當時千里達全國只有八十種簡單的工作種類，可亞與砂糖的品質遠比人民的素質來得重要。馬素德眼前的恐慌，他的世界觀就像一條死胡同一樣（他以為積極奮鬥與成長只屬於世上其他地方），我不由得也跟著回想起三十年或是三十五年前的自己。

馬素德的父母在一九四七年間，從印度移民到巴基斯坦。他們身為穆斯林，理所當然應該遷居到一個由穆斯林的信仰所治理的穆斯林國家。這個國家自從建國以來，始終如一；可是，馬素德的思想經過遷移行動的解放，經歷了多重蛻變；而今他（還有他的父親）需要的已經不止於一個穆斯林國家了。馬

3 泰爾佛德 (Telford)：英格蘭中西部沙諾普郡新興城鎮，當地有電子、塑膠、汽車、金屬製品等行業。

素德說，他的父親後悔離開印度，這層懊悔之中，有對也有錯；馬素德的父親在一九七九年間，已經不再是一九四七年的那個人了。而馬素德自己，他所知道的一切僅限於巴基斯坦，心目中並沒有任何政治或是宗教上的英雄；他心目中唯一的巴基斯坦英雄是個科學家阿布德斯·薩藍⁴，刻下正在歐洲進行研究工作（而且再過幾週，就要獲頒諾貝爾獎）。

馬素德說：「他們可以在大學裡替我找份差事。以前我在學校裡也兼了一份工作，現在這份工作也停了。這裡什麼事都要講究政治成分。不管是誰，要想幫我找份差事，就等於要冒當局之大不韙。有一陣子，我在學生政治活動上挺出鋒頭的。」

「你的學業成績怎麼樣？」

「我可是我們大學裡頂尖的前五名呢。」

他指的是他的論文，他手邊正在進行的研究工作，不久之後，就可以從當地大學拿到博士學位。現在，更出乎我意表之外的是，他說：「說不定，過一個月以後，我就要離開這裡了。有個朋友幫我跟一所西非學院牽線，幫我弄到了一張教學合約。」

「西非哪一所學院？」

「就是一所學院嘛。」

「學院叫什麼名字？」

「這所學院沒有名字，不過是一所中等學校而已。他們就叫它作學院。我已經琢磨出他們每個月可以付我多少薪水了。一個月三千三百盧比。」三百三十塊錢美金。

「說起來，給的並不多啊。」

「我朋友說，我在那裡一個月生活費不會超過八百盧比。」

「我想那不太可能。」

「算寬一點吧，我一個月也可以存下兩千盧比。」

「那邊的稅又怎麼算呢？你查過這一點了沒有？」

「稅的問題，我還沒想過。不過，這個工作可以解決我在經濟上的問題。」

「你去教書的話，會不會妨害你的研究生涯？」

他煩躁不耐地說：「當然會妨礙我的研究進展啊。」

「那就別去。」

「教書可以解決我缺錢的問題。我有義務要照顧我的家人。我父親已經六十一歲了。」

「一年吧；或許至多十個月。我說：『好吧，你就去吧。這樣你的英語也會進步的。』」

他不喜歡聽我這麼說，回嘴道：「我『托福』考試考得很好呢。」他當下就跟我說，他的成績在有參加考試人數中，名列前面數來多少個百分點。他的英語確實觸角極廣，字彙豐富，可是他終究還是個追逐學位與文憑的人。

面帶微笑的旅館人員推門進了我房間。

馬素德說：「他現在就要跟你耍四十盧比的釣魚許可。剩下的，明天他再跟你要。」

旅館人員同時也給我的床鋪帶進了一席——不是床單；原先我向他討過床單，而我想他滿口承諾會帶給我，結果是一席桌巾。他移開床上厚重的絨絨被子，將桌巾均勻地攤平在床上，有如擺設餐桌一般，再將絨絨被收疊整齊，攔在床底下。接著，他就告退走人了。

我開始鋪床。

4 阿布德斯·薩藍 (Abdus Salam)：一九二六～一九九六，巴基斯坦核子物理學家。因弱核力與電磁學的一致性理論 (electroweak theory) 而獲得一九七九年諾貝爾物理獎，是當年的三個共同得主之一。

馬素德對我說，一定要將床單（或是桌巾）墊在覺絨被下面。「你不知道究竟是什麼人在用這床被子。」他示範著，「要像這樣子睡。千萬別接觸到覺絨被。」這種鋪床的方式，不該是他抑或是我，過去曾經學過的。住在熱帶國家，晚上睡覺是不蓋毯子的；相反的，我們會裹著一張棉布床單入睡。馬素德再三叮嚀我的，也是他後來學習得知的知識。他讀了萬卷書；過去，他吸收許多廣博的知識；他獨自堅持，沒也任何典範與前例可以師法。他在言行舉止之間，也顯露出低微的出身，尤其在用餐時，他隨口就將食物殘渣吐在地上；他與這些出身來源（而今與他的綜合焦慮夾雜在一起）的疏遠，就表現在他的的小題大作與疑神疑鬼上面。

接著，他又轉向枕頭，枕頭上也套著綠色斜紋布的套子，馬素德說：「枕頭也要遮蓋起來。」

他告辭離開以後，我就照辦了，將白天穿著的狩獵襯衫翻過來，用襯衫向外的一面裹住枕頭。我想要拉開細薄的棉布窗簾遮窗，偏偏兩邊的窗簾閉不攏。夜間氣溫陡降，寒冷刺骨，可是覺絨被既溫暖厚重又舒適，沒多久，我就被自己的體溫與被子烘得溫暖欲眠。我就著江流翻騰的水聲睡去，然後令我喜悅寬懷的是，一覺醒來，再睜開雙眼時，已經天光明亮，又見清晨了。

弱勢的貧窮山民

前夜，我還以為自己睡在江畔，就著滔滔江流的水聲入睡。今早我才發現，那不是滔滔江流，而是一濺滾滾瀑布，就在公園旅館後方，水流洶湧地翻過山丘。旅館邊上，山腳下還築了一條石砌水道，引導水流下山。在這個融雪的谷地中，建構引流溝渠不是為了灌溉，而是防洪。

山谷遠端的巒峰起伏——越過旅館的庭院或是廣場，越過地毯攤販雲集、男孩踱步的主要道路，小鎮上低矮的人家屋宅，還有隱而不見的河流——朝陽照亮了山壁，山丘上的皺摺顯得柔和而隱約。太陽還沒升高到高過旅館後方的山丘，山丘與旅館猶仍籠罩在暗影之下。可是稍稍往下探看，就在山勢下頹的缺口上，陽光已經盈溢谷中，映照著幾棵松樹的枝桠，一道窄窄的朝陽光束，營造出透明而有如新蕨般嫩綠的效果。

面帶微笑的旅館人員為我們三人端茶進來，他將茶盤擱在我的房間裡。我離房叫喚我們的司機和馬素德過來一同用茶，可是馬素德將自己鎖在浴室裡，好半天不露面。等他從浴室出來以後，他說他晚上沒睡好，胃不舒服。昨晚，他可是吃了什麼我沒吃的東西？他的肉菜嗎？還是水？沒錯，就是那杯水惹的禍。

他說：「這裡的水看起來純淨，水質卻包含了某些礦物成分。你去過吉爾吉特嗎？」吉爾吉特遠在更為北方之境。「那裡的水是黑色的。」

還好，他已經先吞服了隨身攜帶的藥片。可是沒過多久，他還是流露出本性中的另外一面，他一坐下來，隨即風捲殘雲地將旅館送上的早餐——僵硬的油炸麵包厚片，還有淋上咖哩、油膩而軟無嚼勁的青綠馬鈴薯——狼吞虎嚥，盤底見天。

這裡是一處小型的屯墾聚落，石砌的房屋低矮，無以名狀，有些房屋老舊，有些則是政府出資興建的，看來新泥未乾（政府公營的旅館屋頂還漆成明亮的紅色）；經過一個菜市場之後，聚落就突如其來的地截斷在荒野中了。某些店舖或是攤子前面還架著炊事平台。浮著泡沫的污水，從店家溢流到岩石堆砌的路面上；動物糞便隨處可見；岩石間較為鬆軟的地面，久經踏踩而發黑。即使天色如此清早，綿羊與牲口早已趕下山來了。

儘管這個小聚落看起來如此不安適，菜市場看起來像個流動攤販聚集處，而且也半顯傾圮了，傍著古老的山徑道路，這裡卻是個歷史悠久的歇腳據點。人家沿著山路生養；路上隨處可見挨著山壁建築的矮簷房屋，要不就是湊著路基搭建，半遮著屋角，屋內厚實的支柱或是樹幹，支撐著絕緣泥磚葺築的厚

層屋頂，或許同樣有助於抵擋冬季厚重的降雪吧。屋頂上堆著預備過冬用的取暖柴薪，有乾燥的松枝、樹叢等等，意外地加強了房屋的隱匿效果。

偶爾，巨石壘疊的碎石台地上，種著收成不良的馬鈴薯或是胡椒或是玉米（初夏收成小麥，晚夏收成玉米，入冬則準備收成粟穀）。穀類作物與馬鈴薯，還有胡椒！松樹三兩散生。野草叢生在陡峭的山壁上，點出雜色斑駁的畫面，同時也暗示著，當你攀爬上峰頂向下俯瞰，不論山丘還是群峰都會點綴穿梭著羊行小道。

皚皚白雪，逐漸融流，一路摩擦擦洗著山坡。舊雪積存在岩壁之間，這雪的顏色曖昧難辨：非白，非棕，反而比較像是捕捉住光影變化的靜止水面。這層舊雪表面堅實，雖說再不多久，寒冬又將降臨，可是雪有一點點地融化，每一道岩壁都匯流湧出一條雪水。海拔上升到一萬呎高處，山間谷地突然又開闊起來，暗影籠罩著裂隙，陳雪晦暗；山頂積雪皚皚，厚重可見，軟化了山峰尖銳陡峻的線條；山邊照得到陽光的赤赭岩石上，雪水洗滌蕩盡的岩石表面，生長著薄薄的青苔；接著，就在開闊谷地中央，一鉢綠湖，湖畔草原遍生著勿忘我小草，還有夏季積水草草原常見的小黃花，在冬季降雪之前，欣欣向榮幾個星期。湖的遠端岸邊，搭著幾頂帳棚，那是游牧民族的帳棚；白色帆布襯托著暗色的三角形帳棚。人獸牽弋的交通車流，川流不息。

回程路上，我們再度駛下山谷，吉普車司機將車停在一處阿富汗人營地之前。他對著營帳前方備製羅替的女孩，或是女人，高聲叫嚷。女孩迷惑了半晌，終於明白吉普車司機在喊些什麼以後，她微微一笑，搖搖頭。馬素德說，吉普車司機在跟人家討些樹根藥材。這種根莖有藥效，專治筋骨酸痛。稍後，我在心中猜想，他要的該不會是人蔘吧？

吉普車司機還有其他考量。今天早上，他曾經跟迷你巴士的司機洽談多時。我們的吉普車司機在當地還小有名氣；我在去程上，一直沒揣度出來。原來，他不光是個頭腦簡單的山地居民而已，他的優雅

氣度——完整的白色長褲、褐色長衫與一頭蓬鬆美髮——都不是憑空偶然的。

現在他們交頭接耳，還有其他司機也都湊上來旁聽！我原本以為他打算跟人家討些植物根莖，比較不具療效的那種。可是，他現在高談政治，評論著執政的軍事政府近期間頒布的地方選舉事務。儘管山羊與綿羊成群、駱駝與帳棚、生火做飯的炊煙，穿戴著黑紅相映傳統服裝的阿富汗人與他們沉甸甸的銀飾珠寶，這個河谷還是充斥著政治氣氛。吉普車司機跟他那一夥兒，都是支持布托先生的死黨。布托先生五個月前慘遭絞吊處死，可是，他的黨羽還是可以爭取到河谷居民的同情。

吉普車司機說了，巴基斯坦上上下下，只有布托先生曾經替窮人做過一點事情。在布托先生之前，阿佑巴將軍（General Ayub，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九年間治理巴基斯坦）期間，窮人只有出國前往阿富汗和印度時才拿到護照，能去的都是些窮鄉僻壤，沒有工作，也沒有出頭機會。布托先生當家以後，你想上哪兒去，都可以拿到護照——歐洲、美國、沙烏地阿拉伯、杜拜，任何地方都可以去。現在，你又申請不到護照了。

馬素德（穿著一件藍色尼龍防風外套，頭上戴著鑲有邊飾的無沿便帽）用英語對我說道：「那是因為外國政府不願意放巴基斯坦人入境。只是他自己不明白而已。」

吉普車司機說，他在這個河谷土生土長。他的父親經營一片店舖，所以，他的出身要比一般窮人好得多了。只有在布托先生治理國家的時候，他才對政治發生興趣。「這個地方，」他高聲喊著（透過馬素德的翻譯）：「過去都被一些大地主把持著。他們一年收穫三次農作，他們賣掉他們的收成。他們找了我們鄉親替他們種田，我們替他們種田，只能糊口，換一口飯吃。這裡過去就是這個樣子。」

而那邊那座橋，跨過崑哈爾江的那座橋，就是布托先生蓋的。

吉普車司機繼續說下去，越講越激動。現在，他的神情模樣，跟早些時候載我們上山時完全不一樣了。先前，他的心情還輕鬆愉快到自動幫我去跟地毯商家殺價。馬素德不再替我翻譯他的演說內容了。

過了一會兒，馬素德說：「他現在被情緒沖了昏頭，非常意氣用事。他竟然說，布托先生其實沒死。」

我們出發的時候，吉普車上播放著傷感而甜美的電影愛情插曲，這些歌曲營造出某種專屬於薄暮、流水與遠處人家燈火的氣氛。我們在回程路上，就帶著另外一種截然不同的熱情了。而我也開始以不同的眼光與角度觀看著路上的行人：他們都是窮人，遭到政府忽視的貧民。可是，這可不盡然就是吉普車司機眼中的莘莘大眾。

吉普車司機又說了：「這些毛拉，」馬素德翻譯，「只會將伊斯蘭教當作工具利用。我們都是穆斯林。可是，我們可不是他們想要的穆斯林。他們想要毀掉巴基斯坦。我們的伊斯蘭教比較好。只有我們才救得了伊斯蘭教與巴基斯坦。」

現在，我們可得在路邊停下車來了。前方有一輛卡車正在裝載松樹段木。原木先以人力從山邊運送到山路上，再扛上卡車。山路狹窄；我們還得等在一旁，等到原木裝載完畢後，才能重新上路。在我們之前，還有一輛紅色的鈴木迷你小巴士在等著卡車讓路呢。我們只好先下車來。路面經過先前一批羊群走過，踩踏出密密濛濛的塵霧。吉普車司機手腳敏捷地攀爬過路肩，走過去跟負責上貨的工人攀談，接著又坐回車上，望著他們工作。

馬素德與我並肩站在崑哈爾江峽谷邊上。

馬素德說：「他講到毛拉的時候，我很同意他的意見。那也是我的觀點。這裡只有百分之十五的識字率。」

我說：「可是，你難道不覺得奇怪嗎？他唯一要求的自由竟然只是離開巴基斯坦的自由。難道他一點也不曉得，這個國家還是有待開發，留在國內也可以獲得工作機會。」

馬素德起先無法領會我在講什麼。離開巴基斯坦的意念，也同樣縈繞在他的心頭。等他終於通澈明

白了以後，他說：「可是，我們這個國家的統治者從來就不曾跟民眾灌輸這樣的觀念。現在，軍方又控制了政府。」

所以，現在我只有將他們視為一群貧苦、民瘼無法上達天聽的弱勢窮人，而非一群穿著某種傳統服飾、五官輪廓特殊的一群人。我站在綠波激起白沫的江邊，端詳著裝運工人、路過牧人與悠哉旁觀裝載原木工作的閒人。馬素德的抑鬱與吉普車司機歇斯底里的激情，突然觸動了我的心緒。

我說：「將來，這些人會發生些什麼事情呢？」

馬素德說：「這也只有真主才知道了。」

稍後，他又補充說道：「什麼事也不會發生的。還有什麼可以發生呢？」而又過了些時候，一群背上染著鮮麗色彩的羊群走過我們面前，羊蹄將細碎的塵土磨得更細，揚起一陣濛濛，將馬素德白色的無沿便帽與海象般的短鬚都髹上一層淡淡灰色。馬素德凝視著腳下的滾滾江流，又說了：「他們手無寸鐵。他們也沒有槍。幾百萬人都會死的。」他講的可不是軍事叛變；他純粹只是提到絕望，對現況束手無策而已。「你可知道，我們國內有幾個政治黨派嗎？這個國家境內就有九十四個政黨。這還有什麼搞頭？」

我說：「你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為將來擔憂的？」

「一九七一年，」也就是孟加拉分離獨立的那一年。「不，我想應該還不到那一年吧。我想，我剛進大學那一年就開始為前途憂心忡忡了。」

馬素德顯然誤解了我的意思。我問的是對巴基斯坦未來的憂慮。可是，他對於自己的前途滿心焦慮，沖噎胸懷，自然而然地將問題轉向他自己身上。他誤以為我的問題是在延續我們昨天傍晚的話題。

吉普車司機箕坐在山壁旁，雙膝朝上，籠在白色長褲褲管裡的兩條腿分開，看著裝載工人幹活。

馬素德說：「以前我都是靠著家教賺錢。以前我家教一個月可以賺上四百盧比。可是，現在不得不辭掉家教工作了。學生家長拿我當傭人使喚，他們從來不拿我當老師尊重。假如我得準時四點鐘到達他們家，偏偏我遲到一個小時五點才到的話，他們就會小題大作找麻煩。要是他們小孩被學校當掉了，家長就會怪到我頭上。」

金錢、他的職業、他的家人，經過前夜略略述及之後，馬素德又重新拾起話題。

他說：「我父親現在開始問自己，當初幹嘛要移民到巴基斯坦來呢？當初他自以為可以歸屬榮寵的尊嚴到哪裡去了？」可是，關於這一點，正如我曾經感受到一樣，只有道出一半的實情。馬素德的父親，穆斯林，這位穆斯林陸軍士官，一九四七年舉家移民到巴基斯坦時，就在一九四七年，獲得了他所冀望殷盼的尊嚴。

卡車終於裝載上貨完畢。車斗上沉重的分段原木用棍棒定位牢靠，再拿繩索牢牢地網繫著原木。卡車移動了，紅色的鈴木小巴士也跟著前進。而我們在幾經與對方來車錯身讓過之後，也跟著前行下山。

一場意外

我們在嘉瑞德 (Jared) 小鎮上停車，該鎮以木雕工藝聞名。只是我觸目所及的樣品率皆拙劣——木雕匕首、盤碗、煙灰缸等等，設計潦草，雕工粗糙。馬素德花了十五盧比買下一個胡桃木煙灰缸。顯然，此地曾經富於精雕工藝傳統，而今人才凋零，眼光標準與良莠判別不繼，正如人煙荒蕪一般。

我們的車子再度開過載運著原木的卡車，跟在鈴木小巴士後面，專吃他們揚起的灰塵。突然間，鈴木小巴士後座發生了某種騷動。先是有人給掏出車外，接著另外一名乘客又給扔了出來。

我說：「他們怎麼把人扔出車子外面呢？」

馬素德說：「車上有人打架。」

鈴木巴士還在行進當中，可是沒多久就停了下來。我們避開了第一個被扔出車外的人；他看來毫髮無傷，又重新站回馬步。接著，我們又遇到另外一個年輕男孩，或是男人——他全靠一條布帶繫緊的長褲鬆了開來，性器官就這樣曝露在外——就這樣子橫躺在地上。巴士上的人全都傾巢而下，朝著他跑去。我們超車經過那輛鈴木巴士——駕駛座上空無一人——將車子開到路面較為寬闊的前頭，停在距離小巴士百來碼遠的地方。

我並不想看到流血事件。我也暗自慶幸我們的司機將車子停在老遠之外。巴士上的衝突，誰也說不清楚來龍去脈。可是，鈴木巴士的擋風玻璃被砸了個粉碎，禍首就站在上方陡峭的山壁上：一群山羊，本當給游牧牧人看管的，成群漫步在山路上。羊蹄踢鬆了一塊大石頭，石頭沿坡滾下，砸破了小巴士的擋風玻璃，砸傷了小巴士司機。這部鈴木小巴士在這條蜿蜒山路上無人控制了好幾秒鐘。無疑的，就在這幾秒鐘之間，某個後座乘客被摔出了車外，接著受傷的司機也落出車外，然後某人，或許就是坐在司機旁邊的乘客才將車子穩住，停下車來。

現在，其他乘客將司機抬了起來，準備抬到我們的吉普車上。而我們的吉普車司機正在攀爬岩壁，他手腳健捷（他就是這個地方出身的），打算爬到那群山羊與牧羊人所站的位置上，那裡離我們的所在的山路路面可高出一大截呢。我們的吉普車司機究竟要幹什麼？這麼急著上坡找人又為了什麼？答案很簡單：他急著走壁上坡去痛扁那牧羊人一頓，讓他飽以老拳，再將他逼下山來。

那富有古趣的牧羊人，趕著羊群下山，遷移到他們的冬季草原部落居民，現在看起來只是個弱不禁風的小個頭男子而已。我們的吉普車司機一拳狠狠地砸在他臉上，再對他拳打腳踢一番。他的黑色頭巾——他的尊嚴——墜落在地上，露出他光光如也的腦門，頭巾開散得像是一條骯髒的長條棉布。吉普

車司機一路上將他又推又搥的趕下山來，硬是要他將寶貴的山羊留在身後，無人看管。接著，罪魁禍首被押到了山路上，鈴木小巴士上的若干乘客又紛紛對著他跑過來，掄拳相向，猛捶一番之後，又跑回他們原本站立的地方。然後，他們的怒火再度攻心，又再衝了回去，提拳再度修理那個年老牧人。老牧人不住地哭泣，又丟了頭巾，看起來就跟個小孩兒一樣，他的臉上和胸口又吃了好幾記重捶。

我對馬素德說：「他們不是要殺了他啊？」

馬素德說：「不，他們不會再打他了。你瞧，他們這下不是將他押上巴士。現在，他們要將他扭送進警察局裡。」

可是，這不過是椿意外而已。再說，那個牧人的羊又該由誰照料呢？但是當地民情如此，馬素德也不覺得有什麼可以唱反調的。可是，我們的吉普車司機先前還如此悲天憫人的講到窮人。窮人是他的弟兄手足，河谷居民皆然；原來，外來人等不算在他的貧民之列。

他們將鈴木巴士的駕駛抬到我們的吉普車上，他已不省人事，有個人扶著他的手臂坐在前座。馬素德和我坐在後座，吉普車司機的小助手吊在吉普車車尾。受傷的小巴司機並沒有流血外傷。

馬素德說：「他的傷勢應該是以內傷居多。他們說，他開車的時候滾下來砸傷他的那顆石頭大得很。」原先我看他橫躺在路上，性器半露的，還自付著他應該只是個男孩，或是非常年輕的男人。現在我就明白的看了出來，這人年紀已經不小了，他身子細瘦得不盈一握，臉龐與身軀都因為長期營養不良而萎縮。他還是不省人事。呵護著小巴士司機的人對著他輕聲細語的說話，彷彿在寬撫兒童一般。可是那受了傷的男人始終沒有反應，雙眼一直閉得緊緊地。

我們盡全速駛出喀格汗谷地，直入巴拉科特，沿著崑哈爾江峽谷，掠過山丘的線條、高聳的松樹、玉米田台地，以及平頂的人家住屋。馬素德或是吉普車司機三不五時地都會伸出手來，用手背探探昏迷不醒的小巴士司機的臉頰。他們說，他還有一口氣在；只是他動也不動，也不發出一聲半響的。

我們開了約莫一個小時的車子。而當我們開到巴拉科特，直奔城裡灰撲撲的小醫院時，院子裡只有三五頑童，院方沒有任何醫護人員出面安置傷患。醫生上白夏瓦出差去了，而那個圍牆住宅區遠在曼瑟拉。受傷的傷患要到曼瑟拉才有醫院收他，可是這已經不是我們責任所及了；時候到了，我們也該交還這輛租來的吉普車了。

同時，吉普車司機的責任也告一段落，接下來他也幫不上什麼忙了。他激發了自己對於政治的熱情；在他上坡去追究那個阿富汗牧羊人的肇事責任時，在他溫柔照拂受傷司機時，他就已經將這股熱情表現得淋漓盡致了。可是，他的焦慮掛意以及他的戲劇感，還是抵不上長途駕車開回巴拉科特的辛勞。我們在那裡跟他告別時，雖然英俊與慵懶如昔，他看起來卻像個精力完全被掏空只剩下一個空殼子的男人。

近晚時分，以及華燈初上之際，我們開著借來的車子以及借來的司機，兼程趕回。離開山區之後，大地柔軟多了，也乾燥多了，兩旁植被景致變化也多了。

馬素德和我都沒開口多說些什麼。其實，我們兩人之間也沒什麼可以多說。馬素德內心包袱沉重，很難讓他拋開思慮談些事不關己的話題。

路邊的腳踏車騎士，即使天黑了，還是不點燈。過往巴士與卡車車尾經常也不打燈，因為點燈照亮你身後走過的地方委實沒有意義。馬車更不可能費神去照明路面了。

我感到一陣突如其來的煩躁，脫口抱怨：「他們怎麼都不打燈啊！」

馬素德只是淡淡地回了一句：「他們沒有燈。」

我讓他在前往白夏瓦的路上下車。白夏瓦，巴基斯坦西部的軍事重鎮，坐落在一片坦闊寬廣的谷地上，也是通往開伯爾隘口與阿富汗另外一片疆土的要道。

九 阿迦·巴布爾

拉瓦平第的報紙上刊載了政府縮編的新聞，六名部長準備捲鋪蓋走路。俾路支省的經濟消息方面，政府無意創造新的工作機會，現職人員短期內也不會調薪。度量衡部門將裁撤二十九名官員。《巴基斯坦時報》指出，遭波及的官員已經「敦請政府另行安排職位，俾便於現今之高物價社會條件下，拯救當事人及其家庭免於心理創傷以及飢饉凍餒」。然而根據《穆斯林報》的披露，這些官員僅僅要求政府協助紓解其「精神困苦與挫折感」。

固定往返拉瓦平第與伊斯蘭馬巴德之間的迷你巴士司機進行了為期一天的罷工活動，抗議警方騷擾。巴士司機對報社宣稱，警方要脅提高索賄金額。警方則反駁，聲稱巴士司機對乘客「不規矩」。

三十四名教師對《穆斯林報》抱怨道，他們迄今無法離國前往阿拉伯東南部的阿曼王國就任教職，都是因為巴基斯坦出境當局質疑與干擾這些教師的「無異議」證明文件。同一份報紙當中，《穆斯林報》還刊載一篇調查報告，探討距此遙遠的北部，某一所政府公營的旅遊住宿中心擴建工程的成本為何高得離譜，一樁原本只需要七個月就可以完工的工事，竟然拖了五年，至今還沒個了結。

一名退役陸軍軍人投書到《巴基斯坦時報》上，痛陳當今社會之紀律蕩然無存。「而今，事態至為明朗，吾人社會已然沉淪為道德敗壞之社會，各項吾人所能想像之邪行妄為均體現於市井之間。孩童成

長於如此惡劣之家庭氣氛——走私、黑市交易、囤貨抬價、賄賂與貪污……均獲其父母之縱容與包庇。日後，吾人焉能期望這些孩童接受任何型態之紀律管束。這些孩子在他們進入教育機構受教時，必將其家庭氣氛投射到課室中。」解決之道唯有促請校方（禁止政治力量介入）與法院益加堅守紀律，祭出「一隻鐵掌」嚴打重責。「入獄服刑、鞭刑，甚至處以極刑，殺一儆百，均可奏效，以敷現況之需。」

至於縱覽巴基斯坦危機方面，《穆斯林報》的領袖版上也登了一篇由A·H·卡爾答爾撰文的緊急呼籲，作者曾任巴基斯坦板球國家代表隊隊長，也曾於牛津大學求學。「我們回顧往昔，莫不感到羞恥與憤怒，羞憤於我們的政界領袖在面對經濟議題時，毫無準備，胸無成竹，手足無措……羞憤於一船船的進口米糧輸入……」然而在這番慷慨激昂過後，他又提出了什麼對策嗎？沒什麼具體的。唯一湊數的就是要少搞一點政治花招，多恢復一些舊日不返的純樸風氣。「顯然，我們面對一種選擇，選擇物質主義，與跟物質主義脫不了干係的、企圖分裂國土的政治聲明；抑或，我們可以選擇真主的銘言。」

藝術協會的巴布爾

除了諸如此類的文章，《巴基斯坦時報》還上了一篇藝評，評論現在正在藝術協會展出的畫展。藝術家名喚哈密德·薩格合爾，這是他第一次個展。這篇藝評的語氣既坦誠又溫柔：

當我一腳踏進藝術協會歷史悠久的建築物裡，踩在木質地板上，幾幅色彩鮮豔的畫作，立刻就吸引了我的目光，而這些畫作所促發的各種相互衝突的反應，更深深糾結著我的心坎。畫家所展現的多種技巧與風格令人眼花撩亂……若是你想要通澈了解這許多不同風格——某些風格還彼此傾軋呢——你就一定得先約略了解這位畫家的二三事。哈密德·薩格合爾一度是位詩人。然後，藉著專

業前輩的引導，他開始在商業領域以藝術創作維生。作為一位藝術家，他從未接受過正式的學院訓練……作為一位詩人，他則目眩神迷於各種意念。身為一位藝術家，他必須以色彩來捕捉那些意念，而他也從朋友之間互動的煽惑性理念中汲取靈感。因此，他也發展出某種張力，藉著這種張力，他強烈地刻畫出他的理念；有時候，這些理念還表現得至為明顯……

他的畫作〈知識〉，畫面上是一顆著了火的頭顱。題為〈奮鬥〉的彩色粉蠟作品，畫的則是一隻手，還有一道熱火從雙手中放射出來，向外投注。〈行動〉這幅畫，則再度追摹火焰與煙硝之間的政治鬥爭，各式色塊當中，一抹凜冽的綠色，似乎要打破著了火的剪影所呈現的熱火衝擊。〈祈禱〉則畫出一隻合什懇求的手，一對大眼睛從兩手之間看出，飛鳥則環繞著清真寺塔樓飛翔。鮮明的色彩，畫面的動力與張力，顯示畫家潛力無窮。只要經驗再豐富一些，經濟壓力再舒緩一些，哈密德·薩格合爾一定會崛起，成為一位不容忽略的藝術家。

畫展在共濟會會館展出。幾年前，共濟會在巴基斯坦遭到封查，全面禁止活動，官方一度將共濟會認定為錫安主義組織（同時我也聽說，這是因為他們將所羅門推崇在所有的其他先知之上¹），藝術協會就鵲占鳩巢，進而占用他們的會館。

會館位在弗萊希曼旅館後方一條街上，這是條披肩商販、地毯商家與服飾業者雲集的街道。會館是

1 共濟會（Freemason）：國際性的秘密互助團體，一七一七年肇始於英國。Mason含有石匠之意思，有人說共濟會起源於參加建造巴別塔（古巴比倫）的石匠工會；但另有一說，共濟會最早是由參與建造所羅門的耶路撒冷神殿的石匠發起的，最終目的在於重建耶路撒冷殿堂，作為全人類的大殿堂。不少研究者認為，共濟會是暗中支配世界的陰謀組織。從法國革命、美國獨立，到俄國革命、以色列復國等歷史上的重大事件，都是由共濟會組織促成的，因此，共濟會組織總是跟猶太團體有所牽連。德國第三帝國時期，共濟會會員還經常遭到納粹的盤查與騷擾。

一棟建於英國殖民時期的磚造建築，是標準的「公共建設部門」風格，建築物前方一片草坪，半圓弧車道，拱窗，還有一道柱廊。柱廊上方的三角牆上還嵌著共濟會的徽章，徽章上兩支兩腳規構圖，像是一幅未完成的星形圖（拉瓦平第市區中充斥著諸如此類的侵占行徑、驅逐與濫產權的所有人之後，當地人便加以進駐。總統官邸原本屬於錫克人的建築，不日之間即將屆齡摧毀的龐曲廳，過去還曾經是印度的喀什米爾大君的宮殿）。

哈密德·薩格合爾的畫展是由阿迦·巴布爾一手策畫與負責的。他是個談諧有趣的中年人，身材修長，風致迷人，銀白長髮披在肩後。他的辦公室就在展覽廳後面。當天下午畫展就要開幕，他忙得不可開交，可是他還是擠出一點時間來接待我。

一位體態豐滿的女士（阿迦·巴布爾的夫人；稍後他向我表示，他夫人的身體不是很硬朗），不發一言地坐在阿迦·巴布爾的辦公桌邊，倒也是個良伴。坐在他辦公桌對面的，是個態度恭敬的男人，他是從廣播公司派來的。我則坐在辦公桌還空著的第三邊上。

阿迦·巴布爾已經在畫展型錄摺頁上，替哈密德·薩格合爾寫了一篇短文。

「這是我非寫不可的。我們的藝術家出國展覽時，可不能沒有這些介紹性的小冊子。他們不能光是給人家看價目表而已。假如他們光是亮出價目表的話，國外人士，像是法國、德國及義大利，是不會為他們辦展覽的。他們需要這些介紹摺頁。」

哈密德·薩格合爾的行情不算高，從五十盧比到兩百盧比不等，介於五塊美元與二十美元之間。

阿迦·巴布爾主持藝術協會前，經歷了豐富的軍旅生涯。「我加入藝術協會，全是因為當初這是艘鐵達尼號。多虧了我，這個協會才重新出頭，在外界還有點知名度。我能讓這個協會起死回生，因為我是個主意多的人。我舉個例子給你聽。一九七五年是巴基斯坦旅遊年，可是我們旅遊部門什麼事也沒做。這裡剛開始的時候，旅遊業做得不好，我就寫信給這裡所有的外國大使館，請他們寄他們本國的旅

遊海報給我們。我收到十個國家的旅遊海報，然後我們就辦了個國際旅遊海報展覽。我們還頒獎呢：首獎給了波蘭，第二獎給了土耳其，西班牙拿到第三獎。我們非給西班牙一個獎不可，因為他們寄了一張鬥牛的海報給我們。」

他坐在椅子上，雙手比出鬥牛士的姿勢，上身驟然抖動，做出個快速斜刺的動作，而他的眼睛也因為歡快而躍動著。

「動力十足啊。因此，我們協會就在這些國家有了一些名氣。我就寫了一封信給旅遊部門的主管，跟他說，『這就是我替旅遊年辦的活動。你部門裡的人都在睡覺。』而他說，『阿迦·巴布爾，你真是點子多多啊。』我不是光這樣就算了，我還要他讓他的部門給我獎——盃。」他說到「獎——盃」的時候，發音跟糖果「太妃」押韻。「我們就頒發獎盃給得獎國家，頒獎典禮在華沙、安卡拉和西班牙都有電視轉播。」

「我的點子就是像這樣一個個地冒出來。早上起床我在刮鬍子的時候。舉個例子吧，現在是伊斯蘭教黑蚩拉²的第十四世紀，我們的總統在哈瓦那這麼說了，『一千四百年以前，掀起了一場革命。』（這話是巴基斯坦總統幾個星期前參加某次不結盟國家會議時說的，巴基斯坦剛剛才加入這個組織。）」他這話現在就給了我一個新點子。你可是我第一個透露的人，你還真榮幸呢。我們邁入新的黑蚩拉時，我就要籌備一場《可蘭經》的書法展。」

阿迦·巴布爾在哈密德·薩格合爾的摺頁上寫著：「哈密德·薩格合爾在他的作品當中，運用了詩意般的氛圍，以天真無邪的風格重現了懷舊與痛苦的重新詮釋。他在作品中尋求認同與力量……他的作

2 黑蚩拉（Hijra）：黑蚩拉的意思是遷移。穆罕默德從麥加遷移到麥地那，選擇了與太陰曆的朔日相合的一天，並將該日定為伊斯蘭曆的紀元。

品表現出畫家的個人主義，面對著尚未成熟的、五味雜陳的情感，好比包藏與隱匿在阿里巴巴的寶藏洞天之中。」他在文末還以草書花體英文，鐵畫銀鉤地簽上：阿迦·巴布爾。

他等著看我的回應。我將短文的最後一行念給他聽，他似乎非常歡喜。阿迦·巴布爾，阿里巴巴；或許前者（阿迦·巴布爾素來喜愛使用本名）暗示了後者。

我們談到英語在巴基斯坦的狀況。我說，這裡好像沒多少人講英語。他不以為然，接著，他看起來卻又像是同意我的說法。「口說英語或許是奄奄一息，文書應用上的英語就不一樣了。雖然我以烏爾都語自豪，可是我也從來不會忘記自己還是個英語人。」意思是，他是個能操英語的人。「我們現在還保留著我們的英語。所有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都巴不得能跟我們一樣。要是我們失落這個語言，情況就不妙了。現在，每當我們巴基斯坦駐聯合國代表站起來，用這種美麗的英語，發表兩、三個小時的演說，演說結束之後，阿拉伯人就會跑過去擁抱我們的代表。我們萬萬不能失去英語。」

「我的英語老師是巴克哈理。偉大的巴克哈理也是個暴君，他會直接將卷子扔回去給你。扔在你臉上。『這算什麼作文？這算什麼英語？』他說過一句話，我一直到現在都忘不了。他說，『寫作現在是很難過，其他事情都很快活。記著這一點。可是總有一天，寫作最快活，其他事情都難過。』你說，這話說的是不是很棒？』寫作現在是很難過，其他事情都很快活。記著這一點。可是總有一天——」

他中斷了話語，接著說：「你跟我在美國的朋友卡洛琳一樣，她也是喜歡記下我講過的話。」

當時我正湊著小小的畫展卡片邊緣塗寫著。

「我到美國的時候，她是我的導遊。她離過婚。我是美國國務院的文化訪客。卡洛琳跟我說，『阿迦·巴布爾，大部分人到美國，走過東岸，就以為他們已經看過遍美國了。他們頂多再到西岸的洛杉磯打個轉兒，然後他們就以為他們已經將美國看透了。我第一次遇到像你這樣，還會到猶他州來參觀的人。你對什麼感興趣？』我說，『身為穆斯林，我最感興趣的，當然是一夫多妻制了。』那只是個笑話。她

跟我描述了一個計畫，他們打算在百貨公司裡設置一個劇場。我說，『卡洛琳，你這不是要將藝術擺在店鋪櫥窗裡嗎？』秀場櫥窗，店鋪櫥窗，不管是哪一個，我都說對了。當時她正在開車。她用一隻手掏出一本記事簿來，就開始寫東西。我說，『卡洛琳，你這是在幹什麼？』她說，『阿迦·巴布爾，我正在記下你講的話啊。』」

他從書架上取下一本百科全書。他在一小幀美國地圖上，用藍墨水標記著他的文化之旅所經路線。他此行也去了佛羅里達州，一遊迪士尼樂園。

畫展上的對話

畫展預計在下午五點三十分開幕。可是這裡是巴基斯坦，而應邀開幕致詞與剪綵的貴賓則是伊拉克派駐巴基斯坦的大使，我心想六點鐘到場就綽綽有餘了。可是，會館距離我的旅館不過幾步路的距離，而我又沿街躊躇，駐足觀賞披肩與地毯，到達會館時，已經是六點零五分了。會館大門前站了個警察。草坪上搭起一頂莎米亞納（shamiana），也就是鑲有花飾的圍幕帳棚，帳棚裡的長桌上擺置著供應來賓取用的點心。而我到得太遲了，開幕致詞早就結束了。

由於出身軍旅，阿迦·巴布爾已經準時舉行開幕典禮。他也要求大使在官方預定開幕時間七分鐘之後到達，意即五點三十七分，大使也準時照辦了。當我踏上會館光滑乾淨的木質地板時，官方團體正順著參觀方向欣賞畫作，大使穿著一套三件式的暗色西裝，阿迦·巴布爾身上一席不如正式禮服隆重的淺灰色西裝，畫家則套上白色的巴基斯坦傳統服裝，上身還配上一件淡黃褐色的羊毛無袖上衣。大使虎背熊腰，表情認真，強忍乏味，腦袋偏向一邊，專注地聽取阿迦·巴布爾的解說；畫家個頭嬌小，羞澀，畫展堂皇的排場顯然令他不知所措，不過，整體而言還是頗為動人；阿迦·巴布爾則文質彬彬，顯耀傑

出，一頭長髮更增添他的藝術風采。

會館爆滿。阿迦·巴布爾又成功了一次。他在拉瓦平第的社交沙漠中，營造了某種交誼場合。而畫展也大有斬獲。展出的畫作已經售出十二幅了。伊拉克大使就獨力訂購了五幀（包括〈知識〉，即腦袋著火的那一幅）；印尼大使館代表也訂購兩幀；東德大使，抑或是他的代表，也買了一幅；俄羅斯大使也不落人後（這位大使聽不懂烏爾都語，卻深諳波斯文，曾經握住畫家纖細的手指，稱讚這雙手「很藝術」）。

我跟畫家的一位朋友認識。他是個教師，跟他一同參觀畫展的小個頭男人也是個教師。那個年輕人——黑色胸毛茂密叢生在他瘦窄的胸膛上——曾經在軍中服役，可是後來離開行伍，改行教書。現在，他想要轉進英國攻讀學位。正如許多巴基斯坦人一般，他同樣聲稱自己不單只是個巴基斯坦人而已。他說，他有波斯人的血統；他的先祖在一八五七年印度兵變³之後，遷徙到印度（可是，那位先人不過只是他眾多十六位先人中的一位）。他想要前往英國，針對為政治服務的小說，例如，E·M·佛斯特、康拉德、格雷安·葛林等作家的作品，寫一篇論文。

「葛林？」

「他寫了三本以非洲為主題的小說。」

「三本小說？」這我還得好好想一想。

「他寫了那本講非洲的小說，什麼《核心》的？」

「《事物的核心》嗎？我可不認為那是本政治性的小說。」⁴

「那是政治性很高的小說。他裡面有些對話提到土著都是騙子。可是，沒有人說那是本政治小說，那是因為在殖民主義之下，土著都會被外人當作騙子。人都是殖民主義塑造的。都是歷史的產物。只是從來沒有人講出真話而已。」

「可是，若是照你這麼講的話，每個人都是為政治服務的作家了。」

那個年輕人蒼白、細瘦，顯然從未深入思索過他的論文，他胸中就只有這麼一點點概念。他想要改弦易轍，就說：「那麼，吉卜齡怎麼樣呢？」

我說：「古往今來，從來沒有人能像吉卜齡那樣，將印度人描寫得如此精準。在這方面，他可是無懈可擊的。」

可是，他對吉卜齡一無所知，他只知道這個名字而已。他開始對我熱絡起來。他說：「我其實不想去英國研究政治小說寫論文。那是他們的打算。事實上，我是想去研究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可是，他們說，十四行詩這條路已經讓前面的人走穿了。」

「的確，研究十四行詩的人很多。你對莎士比亞的詩又有什麼獨到見解呢？」

「我覺得莎士比亞被某個年輕男人吸引住了。可是，大家都覺得這樣很不自然。」

我心想，他還是別碰十四行詩為妙。

3 印度兵變 (Indian Mutiny)：一八五七年的「印度兵變」，可謂近代西方霸權在西南亞地區遭遇具意識型態色彩抗拒的首例。

英國「東印度公司」麾下的印度傭兵（名義上因宗教理由反抗英軍換裝採用豬牛油脂潤滑的新式步槍彈）叛亂並屠殺英人，英方不僅以軍事鎮壓，更決定廢止其先透過該公司統治印度的非正式安排，改以總督節度，直接在印度次大陸行使英國法律與主權。

4 《事物的核心》(The Heart of the Matter)：這本小說的背景位在大英帝國的熱帶殖民地。小說男主角是位警官，卻與有夫之婦有染，最後終於因為本身性格的置弱而招致不幸。小說出場人物中，除了警官憂傷的情婦之外，誠實的當地人與某些隨口扯謊的當地人都有所鋪陳，書中人物言談率皆有禮合宜，卻對事情的真相毫無助益。

「而由於他們認為那樣是很不自然的——你明白了吧，我是個波斯人。你知道哈菲茲⁵、薩迪⁶嗎？歐洲人對於同性戀的認識實在很天真。」

他今年三十歲，可是他如此孤陋寡聞，涉獵淺薄，心中幾乎空空如也，什麼概念也沒有。我想，他根本不是要出國寫論文，他想要一份工作；他想要的不過是一紙簽證和一張無異議證明而已；他真正的企圖只是遠走高飛罷了。

當其本國的歷史都遭到大幅扭曲、封鎖資料、拒絕外界查詢時，他又如何能夠研究，如何判斷，如何臨淵履薄地踏進另外一個文明的文學批評領域呢？再者，想來這有多突兀，站在拉瓦平第遭人侵占的共濟會會館中，談論著唱和英國政治的小說及殖民主義的扭曲效應，然而那個城市再過幾個星期，藉著宣揚伊斯蘭教之名，所有疑問與質詢一概消音，一車車載滿鞭刑犯人的卡車即將出動，官方也將陸續發布公開鞭刑的檔案照片，這個國家最優秀的一位記者即將遭到逮捕，他鎖枷上鍊的照片也即將張貼於巴基斯坦各地。

5 哈菲茲 (Hafiz)：波斯詩人，一三二五～一三九〇，運用波斯古典詩歌中的抒情詩體「嘎札勒」創作了近五百首富有哲理，並充滿浪漫主義精神的詩篇。

6 薩迪 (Sadi)：波斯詩人，一一八四～一二九二，著名作品有敘事詩《果園》，和用韻文寫成的《薔薇園》，文中夾雜許多短詩、民間格言、警句，作品對後世有深遠影響。

十 夢裡鹽山

入夜之後，拉瓦平第逐漸降溫涼爽，夏日已近尾聲。可是搭乘小巴士從喜馬拉雅山麓南下，直驅旁遮普平原上的拉合爾，經過短短的車程，又來到燠熱難當的南國。此外，這趟短途車程也將我從端賴賴雨的看天田，帶到大幅仰賴旁遮普的河流水道灌溉系統澆注的農作環境。

巴基斯坦旁遮普地區的灌溉平原，素來為供應次大陸當地米糧需要的穀倉。可是滋潤某些田地的灌溉系統，同時也損害了其他地區。旁遮普土壤排水不良，地下水位距離地表只有十呎的高差。目前百分之四十的灌溉田地出現水淹淤積狀況；四分之一的土地已經遭到鹽害，土壤表面鋪上一層白色鹽粒結晶，表土下的土壤發黑，損害更為嚴重。殺手潛伏在地下，悄悄前進，可以想見，緊鄰的下一列樹木根系即將爛朽，鄰近另一畦田畝即將淪為不毛之地。

來文德 (Rainwind) 地區的村莊，坐落在一片新生沙漠地區。從拉合爾驅車前往這處村莊，舉目遠眺（由於這片土地如此平坦）綿延數百平方哩的受損農地（間或的，還是可以看見斑斑點點的豐綠區塊）。來文德這裡有個大聚會，遠處觀之像是個大型的廟會，人群來自四面八方，徒步走在平坦直達的路徑上，走向占地遼闊的帳棚城市；遠處的卡車、巴士與馬車，像是迷你模型一般，踢起塵土飛揚（可

那是個宗教場合。在巴基斯坦，宗教所勾撩起的興奮從來就沒有消褪的時候。除了齋月一整個月與齋月結束慶祝開齋的節慶之外，還有前往麥加朝聖的興奮，接著又快到了「宰牲節」¹。而就在這幾個大節日之間，巴基斯坦人又舉辦了這個活動：穆斯林修道團召集了各界信徒共襄盛舉，活動宗旨在於宣揚每個穆斯林都是伊斯蘭教的傳教士。

他們遠從巴基斯坦各地而來，只有天知道這趟旅程開銷多大，也有許多信徒從許多其他國家趕來赴會。這些伊斯蘭修道團的成員可不是身無分文的窮人，他們很多都是貿易商。這三、四天以來，他們都將聚在一起，共同生活，聆聽演講與進行禮拜。來文德當地無法種植農作，提供了完美的開闊空地以供聚會。農地飽含水分，地下水位高漲，十分接近地表，踏足在某些地方就像走在一張彈簧床墊上。

空地上架起許多頂條紋圍幕圍起來的點心帳棚。主帳區域廣大，無數根竹竿以各種不同角度，撐起小山一般的白色帳棚。竹竿上綁著繩子，繩子上又繫著大塊白色棉布，整塊棉布縫得鬆鬆垮垮的，不停地微微上揚下墜，由是，整個受到遮蓋的區域——面積廣大，一眼看不到盡頭——頂上的白色遮篷看起來像是經過割裂與撕扯一般，時而現露出淡淡藍天，時而現露出棉布頂端白色光芒，那正是受到陽光直射之處。日光切入之時，在帳棚下的人群與地面上投射出不規則的光塊。白色棉布下的效應，棉布濾過日光，而非遮陰，感覺上漫漫渙渙，像是走在水中；兩棉布繫在繩索上，起伏升降之間，也營造出類乎海平面的波動。四下都有人在為裹著頭巾的聖人打扇，有時就用大開紙張充當扇子；有時候，兩人一組替躺平著的聖人納涼，兩人四手抓著大幅紙張，同時間起落揚抑，聖人上空頓時形成一個暫時性的涼篷。帳棚裡，到處是墊子和收拾成束的寢具，水罐東倒西歪的散落在地上。

聚會中，秩序井然，組織完善，每一列信眾都有個編號。我從一名工作人員轉手給另一位同事接待，我們的對話才剛剛展開，隨即又有人將我帶到異國文化團區，那裡聚集了阿拉伯人、印尼人，甚至還有非洲人（他們顯然深諳諸如此類的國際穆斯林聚會，各個安之若素、厚顏無礙地享受著他們與他們

身上穿著的傳統服裝所散發的異國民族風情，彼此興高采烈地交談著）。我在那裡才剛剛聊了起來，不多久又被帶到主辦單位的莎米亞納，終於落定在那裡，帳內一名剃著三分頭的科學家上下打量著我，接著，一名頰下留著美髯的空軍准將，眼神憂傷、態度溫柔地走了過來，跟我細細談起來世。他說，那就是這個聚會的宗旨所在，讓大家認真地思考來生的議題。

他們在我面前的一張棉布地毯上蹲下，腳下是一片光禿禿的不毛農地。那位科學家說，他曾經在大戰末期去過英國；他是搭乘兵員運輸艦過去的。即使在那個時候，他就已經看出西方世界的病態徵兆，可是他還是跟外人持平和睦相處；而今，眾所皆知的，西方世界早就承認他們確實有病了。

科學家說，他並不想身心分離，表裡不一，他不想像他自己的父親在英屬印度大陸一樣自我切割：在家做穆斯林，離家搖身一變做歐洲人。他們——他們和這次聚會中的每個人——都想要做一個全方位的穆斯林，就像那些最早追隨先知的穆斯林一樣。可是當我問及在待人處世方面，他的新行為又跟舊行為有什麼細節上的差異時，從他的對應中，我聽不出個直接了當的回答。

天氣炎熱，剃著三分頭的科學家熱汗淋漓。頂著頭巾的空軍准將就氣定神閒多了，令人印象良深，當然，他也經歷過更多的天人交戰。他一心期望著能將思想中的自我私念滌淨清除，全神灌注於取悅阿拉。可是他覺得自己的一舉一動都帶有嫌疑，他能在自己每一項舉措中都偵查出可鄙的私念私慾。

1「宰牲節」(Festival of Sacrifice)：舉行於伊斯蘭曆十二月十日(約為農曆九、十月間)，也是朝聖者在麥加活動的最後一天。穆斯林屆時會灑掃庭院、屋內，盛裝打扮與屠宰牛羊，製作麵食點心。一般不宰不滿三歲的小羊、小駱駝，也不宰眼瞎、腳癩、割耳、少尾的牲畜，所得肉分成三份，一份自食，一份送親友、待客人，一份施捨給貧苦孤寡老人，不能出售。羊肉則交清真寺，血與骨埋於地下。當日，清真寺會張燈結綵，信徒握手擁抱，互祝節日愉快，並在教長的帶領下，進行節日禮拜，聽阿訇念經，看宰牲儀式。親朋好友互到家中探望，共嘗手抓飯、羊肉、點心。男子群聚清真寺廣場，拉手成圈舞蹈，婦女則在家中歌唱歡舞。某些地區還會舉行賽馬、叼羊的活動。

「留下來跟我們一起禮拜，」他說，「有時候，新來的人看到我們一同禮拜的壯觀場面，都會感受到一些震撼效果。」

可是，共同禮拜的場面正是我最不願意參與，也最感到焦慮不寧的。禮拜之時，十萬名信眾，或許是二十萬吧，集體一致的匍匐跪拜，跪拜在並非無可避免的來文德沙漠中。

回程路上，我在一處村莊停駐歇腳。現在，村莊田地上已經不再生產任何農作了。村人也不再務農，他們每天花上兩個小時通勤，前往拉合爾的工廠工作。地下水就是這個村莊的天敵，尋常的小水坑也擴大為池塘，村莊遍布著死水沉沉的泥塘，有些池塘還相當大，池邊堆積著村莊的廢棄瓦礫。綠地消失無跡。可是不知怎地，村莊裡還養得起牲口，泥牆上堆著牛糞塊，充當薪炭燃料。

我跟幾個躲在一棟已然傾圮的單房建築裡躲太陽的村人攀談起來，泥磚房屋，屋側就是一池死水。沿著屋前崎嶇不平的泥土街道稍遠處，立著一棟稍具規模的房子。當地人對我說，那是一幢穆斯林的房子。我乍聽此言，感覺頗為突兀，接著我才進一步了解，原來所謂穆斯林的房子，意思是說，早在巴基斯坦建國以前，早在一九四七年之前，這幢房屋是屬於非穆斯林人士的。而今，這個村莊居民清一色都是穆斯林了，清一色。禮拜時間到了——雖說聽不到呼拜的喊聲——兩個男人起身，逕自走向清真寺。田地嚴重鹽化，可是信仰讓這些人心平氣和，毫無掛慮。

阿默德教派

在此同時，某些同樣擁抱如此偉大信仰的信徒，卻被政府擯出主流信仰之外。這群信徒就是阿默德教派信徒。我來到拉合爾就是為一探阿默德信仰的究竟。

阿默德教派以為他們自家這一派是最為純正的穆斯林。他們同樣崇敬先知，卻將這份崇敬轉借到對

於真主應許的「彌賽亞」阿默德身上。阿默德出現在十九世紀的印度。阿默德的追隨者，日後形成阿默德教派，他們宣稱，阿默德現身以淨化這個腐敗的信仰。在其他的穆斯林眼中，阿默德信徒尊崇應許的先知，意即詆毀先知默罕穆德「定於一尊」的宗教地位，也是抹黑最甚的褻瀆。穆斯林世界中，不斷對阿默德信徒鳴鼓攻之；而在布托先生執政期間，政府下令將阿默德信徒定位為非法團體。

我剛剛抵達巴基斯坦時，曾經在喀拉蚩遇到一位服務於政府機關的女性阿默德信徒兼公僕。她嫁入這個教派，經由丈夫的教諭，進而深信此派；她的丈夫服役軍中，稍後殉職。這位年輕女性的教育程度與不卑不亢的氣度曾經令我暗嘆，她接受他們所遭到的迫害，她也認命地接受她跟她的子女有朝一日可能必須離開巴基斯坦的現實。

我對這個教派的興趣，也因為她而日益濃厚。而我是冀望著來到拉合爾，可以一訪距離拉合爾一百哩遠之外的小鎮拉布瓦（Rabwah），這裡也是阿默德信徒聚眾屯壑的據點。可是沒有人搭橋介紹，我還是一籌莫展；而要在拉合爾找到中間人介紹我認識阿默德信徒可不簡單。阿默德信徒本身往往深藏不露，這也是可以理解的。再者，非屬此一教派的穆斯林對他們毫無興趣，聽我問起，他們要不佯裝不解，不然就是勃然大怒。

我也聽說，阿默德信徒酷愛牽強附會的詭辯，他們在公開場合宣揚為應許的彌賽亞，私底下卻是這群信眾間一致接受的第二號先知。我也聽說，教派創始人阿默德，是受了英國人的攪弄，陰謀分化印度的穆斯林。我同樣也聽說，阿默德信徒在武裝部隊中勢力強勁，他們長袖善舞，經商致富，「自己人還會相互照應」；加入阿默德教派不但安全無虞，還有人會照料你。

接著，透過一位退役陸軍軍官的兒子牽線，我認識了阿尼斯上校，他原先也在巴基斯坦陸軍中任職。上校也是此派中人，由於他感受到軍中的宗教偏見——尤其在政府宣告阿默德為非法團體之後——過於強勢迫人，他便辭官退役，離開陸軍。我們認識的時候，他四十一歲，身形碩大肌肉結實，兩肩雄

渾有力。他的表情氣定神閒，看來近乎微笑。一九七一年孟加拉獨立戰爭之後，他曾經被拘禁在印度戰俘營中兩年。他在印度戰俘營中閱讀涉獵極廣，學了法文，還畫了幾幅極為精細、需要投注大量耐心的鉛筆素描，畫面品質近乎攝影作品。他心緒之寧靜沉著，或許也來自那兩年遠離塵世、集中心智的戰俘際遇吧。

他是個很容易討人喜歡的人，可是要深入他驚人的信仰就沒那麼容易了。然而，他對這一點也不意外。他說，要了解阿默德信仰，你一定得先熟稔伊斯蘭教，要先知道的很多。我一直摸不透他這話究竟意指為何，還得等到他帶著我晉見這個教派在拉合爾的領導者之後，才捉住要領。某一天下午近晚，他帶我過去拜訪，隨即將我留在那裡，獨力參透玄機。

一棟坐落在郊區的豪宅，車道上停著三、四輛房車；原木鑲框的玻璃立地門窗；地板鋪著地毯；翻製的家具；低矮的桌子雕著花飾；巴基斯坦的現代畫作；僕傭成群；奉茶招待。多麼詭異的場景。或許只有在印度——維多利亞過度講究的情境下，散發出一種封閉離群之感，才正好適得其所吧。如此背景之下，聽取教派先覺們細說宗教玄奇，感覺像是來自古代的世界。而負責接待我的人，年紀不一，從坐三望四到年近七十都有，從他們的衣著、教育與儀態揣度，平常或許都是現代的生意人。他們當中，某些人或許過去經商，可是都散發出特殊的權威；依他們自己的判斷，他們都是因為信仰而偉大不朽的人。

許多人沒有慧根，無法認知彌賽亞，無法在彌賽亞一出現在塵間隨即起身追隨；他們不能以這種方式，將自己跟最早追隨先知傳教的信徒連接起來。如今，世人已經明證了那些早期信眾大無畏的勇氣，有朝一日等到全世界的人類都轉向膜拜應允的彌賽亞之後，他們的勇氣也同樣會獲得肯定。而為了標誌他們的信仰，儘管迫害加壓如火如荼，某些信徒還在下巴上留了一撮新月形的小鬍子。

一百年前，濁世中只有一個阿默德，獨自一人。現在，全世界已經聚集了一千萬阿默德教派信徒。再過一百年，這一千萬信眾難道不能再乘上一千萬嗎？這正是拉合爾的伊瑪目（或是教長）在倫敦諄諄

告誡某個懷疑者的箴言。懷抱著如此宏大的信仰，他們可以反唇相譏現在嘲笑他們的人，將對方貶低為「既得利益者」。那位伊瑪目說了，真正的宗教，潛伏在「文化」之下。只要能夠看透人世間過往塵埃，正信自然就水落石出，明現在世人眼前了。

伊瑪目又說，凡人總是對各種徵兆視而不見。舉例而言，預言家老早就說過，真主應允的彌賽亞現身時，或是他明白宣示他的傳教使命之時，日蝕與月蝕將同時出現。一八九四年，日蝕與月蝕在極為接近的時間點上逐一出現，某個懷疑者懊喪地拚命舉頭捶牆，嘴裡叨念著：「現在，那個人」——也就是應許的彌賽亞——「可說中了！」可是，懷疑者還是不肯盡棄疑端。

這個故事講來，在座諸君莫不暢笑，這個故事他們已經聽熟了。接下來，還有更多關於不信教者與既得利益者的故事。

伊瑪目說：「去年在倫敦的國協中心有一場年會，世界各國派遣了幾百個代表參加會議。科學家也應邀與會，有些人宣讀他們的論文。可是，新聞媒體竟然對這個大會不聞不問，電視台竟然沒派人到會場採訪。」

我問道：「這個大會主要在討論什麼呢？」

年事最長的老人家說：「那個會議是專門研究基督是如何從十字架上被解救下來的。」

耶穌基督並沒有死在十字架上。他從十字架上放下的時候，不過是陷入昏迷、不省人事而已。都靈裹屍布上的血跡檢驗證明，那是活人留下的鮮血。耶穌基督在骨折肢體療癒康復之後，便啟程前往以

2 都靈耶穌裹屍布 (Shroud of Turin)：《聖經》記載，耶穌被第十二個門徒出賣，釘死於十字架上，死後三日卻復活過來，曾經包裹著他屍體的裹屍布一直被教徒視為神蹟，是對耶穌存在的一大證明。裹屍布上可以見到耶穌的輪廓，像是攝影底片形式一般，顯示得異常清晰，仔細得連嘴唇也清楚可見。專家指出，從分析裹屍布的光譜，足以證明血液的存在，血型屬於A B型。除此之外，還有多項檢驗都支持裹屍布上血液存在的說法。

色列某個失落的部落傳教。他接著轉進喀什米爾，再深入北印度地區，去世的時候，享壽一百二十歲。

我說：「這個會議是由什麼人主辦的？」

伊瑪目倒抽了一口氣，說道：「我們辦的。」

我迷惑不解。可是，執著於信仰耶穌基督，正是阿默德教派的中心思想。

某些穆斯林深信（雖然《可蘭經》並未明文限制），耶穌基督（在穆斯林認定中，只是先於穆罕默德的一位先知）終將以救世主、抑或「馬赫迪」（Mahdi，即將於世界末日降臨的救世主）之姿重返人世。阿默德教派的信徒說，先知的預言遭到後世穿鑿誤解。因此，耶穌基督現在並未活在天堂某處，等候適當時機重返人間；基督已經壽終正寢了。基督已死，因為他並沒有從十字架上直升天堂。信徒將他從十字架上解救下來，治療康復，繼續傳教，直到高齡一百二十歲為止。他像個普通人般地過了一生；那是漫長的一生；他不可能再重返人世，二度救世。

依照阿默德教派的說法，真正的先知，就是某個跟耶穌基督一樣的人，他將重新回到人世，擔任應許的彌賽亞，縱身在滔滔濁世，黑暗時期之間，滌淨這個宗教，恢復伊斯蘭教的純淨。而那個人就是阿默德，一八三八年出生於當今印度境內的一個小村莊卡迪恩（Qadian），這個村莊緊挨在巴基斯坦邊境上。摩西離世後一千三百年，耶穌基督降生；先知辭世後一千三百年，阿默德誕生了。耶穌基督出生在羅馬人的殖民地上；阿默德出生在英國的殖民地上。這兩項不過是阿默德與耶穌基督之間諸多相似處中的犖犖大端而已。

阿默德出身地主家族。可是在英軍的鎮壓下，整個家族失去了八個村莊的田地，再加上分家之後，阿默德只繼承了一小部分的剩餘家產。關於阿默德的童年或是早期生涯，記載甚少，語焉不詳。記載有言，阿默德不需教諭，自己就學會了神聖的語言阿拉伯文；還有他苦於暈眩症、糖尿病，講話還略帶口吃。他在四十歲那年首度接獲天啟，可是一直到他五十一歲或是五十二歲之年，才開始四出宣揚傳教。

到了那個時候，許多跟阿默德有關的事項，譬如說他肢體上的殘障與他出生地點的地名，都已經事先預言料準了。

他的天啟是以言語方式降臨的，這一點可不能輕忽。倘若他聲稱自己只是受到啟發而為，他就不能對自己的文字獨攬全功。他曾經被控意圖殺人未遂——那不過是早期外界企圖詆毀他的陰謀之一——可是他後來還是無罪釋放了。阿默德成家甚晚，五十歲那年才喜獲麟兒（就在他四出傳教的前一年），這個兒子日後成為宣教運動的第三號首腦（阿默德死於一九〇八年）。這些事件早都已經預言過了。

正如阿尼斯上校先前警告過我的，那實在是一段外人極不容易理解的故事；或許，我也未能將所有的細節完全記錄正確。大部分我所記下來的情節（尚未完整呈現），都是拉合爾伊瑪目的兄長伊迪里斯，跟我在某個早上長途同車前往位於拉布瓦的阿默德聚落時一一講述的。

信徒的生活

伊迪里斯期望我能前往聚落，親身見證阿默德教派是純正的伊斯蘭教，適足符合所有一般咸信的傳統與預言。同時，我覺得在這個教派經政府宣布為非法組織之後，伊迪里斯也有點緊張，戒懼恐憤，不想褻瀆或是冒犯。伊迪里斯擔任高等法院的出庭律師，白髮，他的詮釋應當是詳盡而切實的。

布托先生會將這個教派宣布為非法組織，事前也是預言料定了的。布托先生下野受刑的懲罰也不出預言家意料之外。多年前，預言家就說過了，統治者會將他們稱為卡發爾（*catar*），即異教徒；而稍後，該統治者雙手都將斷裂粉碎。「那隻宣布我們為非法組織的手，」伊迪里斯說：「還有那隻賦予該道命令法律效力的手。」

我問伊迪里斯，阿默德教派信徒待在印度難道不會比較恰當嗎？為什麼不留在印度，固守阿默德出

生地的創教總部呢？

伊迪里斯說：「倘若沒有巴基斯坦和真納先生，印度將會淪為另外一個西班牙。」
「西班牙？」

「印度會變成像西班牙一樣，國境所及之處，一概將伊斯蘭教掃除殆盡。現在許多學者都說，伊斯蘭教最輝煌的成就，都是在西班牙締造的。」

早在印巴分離之前，第二哈里發或是繼任人（阿默德的兒子）就曾經預言到，信徒將進行大規模的遷徙移民，類似基督耶穌從十字架下來之後的遷徙。這項預言是在他夢中出現的。

我們行車經過的大地一片平坦，當我們靠近時，山丘突然從平地拔起。那是旁遮普的鹽山。伊迪里斯說，從空中俯瞰，這些山峰就像喜馬拉雅山突出地表的最後一點山脈。紅色的低矮山丘，如此殷紅，內藏純鹽，鹽丘像是帶有條紋的大理石，傍著山壁挖鑿取鹽的工人，也被山丘塵埃所染紅。

流經山丘一旁的是契那布河（Chenab River），只是旁遮普的許多河流之一，印度——巴基斯坦次大陸上流經此處的一條河流。這不是一條溝渠界定清晰的河流，而像是一處寬廣而經過天候蹂躪的窪地。契那布河行經拉布瓦（含鹽丘陵的山腳下）時，河道擴及兩、三哩之寬，河床大幅曝曬在驕陽下，乾烤焦燥，河道沙岸低矮，凸狀弧線起伏，大片平坦的灰色沙地，經水浸泡之處暗沉發黑，還有幾洪儲水池塘，真正的河流有如不規則的淺水廣散，而不像是一股流水，了無漣漪，表面上望去淺不盈踝，懶懶地錯開中流島嶼，緩緩前行。

第二哈里發在預言信徒將從印度遷徙到巴基斯坦之後，曾經在夢中見到這一片大地景致，而面前這片地景確實也帶著夢境的特質，殷紅的岩石山丘倏地崛起，還有那條行經旁遮普平坦的灌溉平原後，分支開散滯流的河道。

伊迪里斯說：「他夢見此地曾經大洪水氾濫，」接著又說：「我們都隨著洪氾漂流，直到重新踏上

一片丘巒起伏的陸地，地上除了山峰凸起之外，還有沙地。」

這一趟遷徙之旅中，絕對少不了這幾座山丘，如此才能與耶穌基督的遷徙類比。據說，耶穌與馬利亞在離開加利利³之後，曾經遷居到某些地質上高起的地方。同時河流也不可或缺，因為，真主應許的彌賽亞自己就曾經預言過，他的同胞手足將有一段日子難過，屆時為了安慰信眾，他將在尼羅河畔或是類似尼羅河的河流岸邊顯靈。在一個不實際的世界裡，「明喻」——套用伊迪里斯恆常使用的字眼——就是一切。尼羅河，伊迪里斯解釋道，發源自月山；契那布，字面意思就是「月河」。

信徒社群計畫在這條寶貴的河邊興建一處住宅區。許多虔信的教徒已經買下小面積的住宅建築用地了。可是巴基斯坦政府甚至大老遠地趕來此地迫害信徒，並已宣布將此地規畫為收容孟加拉比哈爾邦難民用地。難民對抗非法教民，不受歡迎者驅逐不受歡迎者。早在阿默德教派信徒從法院接獲一紙合法定居令，駁斥政府非法占用他們的土地之前，比哈爾人已經修建了一所清真寺，象徵他們篡奪成功。而在拉布瓦當地，政府當局同樣徵用了四英畝已開發的社區用地興建警察局；阿默德教派信徒不服上訴，同樣贏取了一紙合法居留令。

越過河流，紅色丘陵山麓下，熱氣蒸騰，亮光虛幻之處，就是阿默德教派信徒的墓園。夠格入葬此地的信徒，都是些毀家抒難，以金錢灌注這片社區，或是投注在這個宗教運動上的人。墓碑低矮，墓園圍牆同樣低矮。墓園就像是這片詭異地景的一部分，要不是伊迪里斯刻意提醒，我還不會注意到呢。

阿默德信徒剛剛買下這片地產時，硝石礦脈就在地表下六吋到一呎之間深處。這片土地——他們買了一千英畝——已經荒棄了數個世紀。現在就在這片大地上，殷紅的含鹽巨石上，逐漸出現一抹檸檬綠

3 加利利（Galilee）：古代巴勒斯坦北部地區，現為以色列北部地區。《聖經》時代為耶穌的主要傳教地區，西元七〇年在耶路撒冷被毀後，成為巴勒斯坦猶太教的主要中心。

的農作，平添一筆意外的色澤。此地也興建了小小的城鎮，沿街栽種路樹，雖說鑿井伸管取得的飲水是此地唯一可以飲用之水，還是略帶鹹味。阿默德信徒屯墾區與總部，煥發出某種政府城鎮的氣氛：建築低矮、風塵僕僕，紅磚樓房的出入口圍著蘆葦編製的簾幕，環繞著庭院的露台上，經過悉心灌溉，栽植著夾竹桃、朱槿花與某種小型的棕櫚樹。

伊迪里斯將我安置在「專為招待尊貴人士」的客房裡，接著就去伊瑪目——彼人亦為這個教派現任的首腦人物——的辦公室通名報姓。伊迪里斯說道，這位伊瑪目可是應許的彌賽亞的孫子，現年七十，曾在牛津大學攻得藝術碩士學位。我房裡先是端進百事可樂，接著又奉上茶點。不多久，伊迪里斯進房來，神情誠惶誠恐地說道，伊瑪目已經差人「召喚」他了。他心想，不過多時，伊瑪目也會來召喚我的。

可是沒人理我。稍後，伊迪里斯解釋道，伊瑪目公務纏身，他每天都要看上幾千封來信，還有許多管理業務待決，而且第二天他就要趕往拉瓦平第。見不著伊瑪目本人，只有一睹伊瑪目玉照充數——方臉男人，裹著頭巾。我還獲准進入一間照明昏暗的候客室，房間裡已經有一整個家族的人，彷彿在等著醫師手術結束，人人面容陰沉的等著，其中還有個戴著面紗、彎腰駝背的女人。

儘管連日來阿默德教派才因為最近出版的印刷品，跟政府發生了些糾紛，發行部門中還是堆疊著小冊子，還有不同語言的《可蘭經》翻譯本。伊迪里斯拍落幾本大部頭書冊上的沙漠風塵，按照不同語言，逐一將《可蘭經》譯本列出來，翻開一本譯本的書名頁，接著另一種譯本的書名頁。阿默德教派在非洲也相當活躍，他們出版了陸干達語、斯瓦希里語⁴與約魯巴語⁵的《可蘭經》譯本。如此的能量，竟然發自這個退居旁遮普一角的宗教組織！可是，阿默德教派的目標與企圖，絕對不下於讓全世界改宗皈依。

他們在許多穆斯林國家都遭到查禁封鎖，可是他們依然努力不懈，進行得如火如荼。那個身著白衣的高挑男人，方才從丹麥傳教駐地回來。他令我聯想起外交官奉召回國，屈就在降低了的生活條件之

下。而他在跨上腳踏車，踩向遠處炙熱的強烈陽光之前，跟我說道，斯堪地那維亞一帶居民，現在正積極尋求另外一種新信仰，而他業已於丹麥建立了一個相當優秀的小型聚會，用以宣揚應許的彌賽亞。

這個人在倫敦前後配合了二十年的上司，心寬體胖，神情愉快，有更多事蹟可以吹噓。他建立了一個信眾高達一萬人的聚會（我應該猜想得到，大多數都是巴基斯坦僑民），而他即使身在倫敦，也從不怯於為穆斯林奮鬥。他女兒學校的女校長，要求他女兒穿著學校規定的裙裝制服到校，將表現伊斯蘭教謙抑美德的巴基斯坦寬鬆長褲留在家裡。他就遞狀一路告進高層，扳倒女校長的規定。他的女兒終於可以穿著長褲上學，消息一傳開來，許多穆斯林都將女兒送到這所學校就讀；事後，女校長還跟他致謝呢。他說，法律保障了宗教自由。他的意思是，英國的法律，別人的法律。

他最大的困擾就是不讓他女兒產生「貳心」，可是她已經被「這個婦解」攪和得心神不寧，回到巴基斯坦和拉布拉瓦就相當難適應。他不斷地對她勸解，開導她，女人在伊斯蘭教律法之下，日子過得有多好。在他旅居英國期間，他已經看到英國女人地位動搖下滑，公共汽車上，男人不再讓座給女人；而他在《觀察家報》上讀到，性病現在已經跟「瘟疫」一樣大肆蔓延了。

可是，婦解運動究竟是哪一點吸引了他的女兒呢？他避而不答。一點鐘共同禮拜的時間到了，擴音器傳出喚拜聲：「萬物非主，唯有真主。」吟詠的頌聲音律悠揚，此起彼落。這位一度在倫敦宣教的教士站了起來。他戴上他的黑色毛帽，語氣間流露著倫敦特產的玩笑調侃地說道，午餐時間他可不想遲到，他家夫人不同於一般穆斯林婦女，可是位女暴君。他說過去在倫敦，總是有人問他為什麼不討四房老婆呢？他總是回說，他連一個都應付不來呀。

4 斯瓦希里語 (Swahili)：非洲坦尚尼亞以及附近沿岸的東北班圖族所操的語言。

5 約魯巴語 (Yoruba)：非洲奈及利亞西南部和貝南境內民族所操的語言。

伊迪里斯則深深以為，婦女絕對不可以外出拋頭露面；他的太太可就堅守樸爾達（purdah）了。伊迪里斯以為我與那個倫敦人之間話不投機，純粹是因為不樂見巴基斯坦移民的關係。而當我們一同走在大太陽下，回到客房時，他說了：「有一項關於人類事務的訊息……」

洪水氾濫的影像，哈里發的夢境，移民！

夢的啟示與預言

我們共進午餐。餐後，伊迪里斯暫時告退，專心祈禱，利用三點鐘禮拜的時間，補足一點鐘錯過的禮拜。禮拜過後，我到他在客房裡的房間找他聊天。他躺臥在一張床上，時而仰臥，時而側臥，我則坐在穿衣鏡前的化妝椅上。房裡悶熱。拉瓦布丘陵上的鹽岩儲存熱氣，定時輻射散發。夏日炎炎，岩石從無冷卻之時。可是伊迪里斯卻心平氣和。這片含鹽大地，還有岩石與河川，就是他的聖地。他說，只要他一到拉布瓦，就會感覺心平氣和。

煩人的瑣事是沒完沒了的，迫害總是無休無止。連當天早上他都接獲一道小小的驚駭：鎮上有個男人向警方抱怨，他之所以被人趕出住屋，都是因為他們教派的首腦下令之故。其實不然，那只是單純的房東與房客間的衝突而已；可是大家都知道，他們可以堂然皇之地向警方抱怨，編造不利於阿默德教派的故事。就像是他最近必須處理的一個案子，有個遭到開除的工人自戕受傷之後，就到勞工法庭告狀，說他給這個教派毆傷了。

他三不五時就會講一些諸如此類的新聞片段。可是他還是喜歡來拉布瓦，而他也連稱自己何其榮幸，每個月可以過來造訪個兩趟。我無法深入他的信仰。我也樂於見到他四肢舒展，躺在床上休憩，緊抓住心平氣和的時刻，懷抱著堅定不移的信仰，信誓旦旦，應許的彌賽亞曾經回到人世過，滌清與昭示

天下，一個全新的宗教，真正的正信。他益加平靜，他的面容更是清新有神。而我到了這個時候才恍然大悟，我被他的一頭灰髮給拐了；他其實還比我年輕幾歲呢。乾熱的風塵；最近才經由人為努力，賦予重要意義的夢中仙境；救贖的所在，以及預期將壯烈殉教的情懷；彷彿時光倒流，將我們帶到遠古的過往。

我們談到夢的啟示。第二哈里發作的夢，即使在英國殖民時期都十分知名。穆罕默德·札弗魯拉·汗爵士，阿默德教派中最高傑出的信徒之一，過去經常將這些夢境轉告給英國總督，總督原先還抱著高度懷疑的態度，後來他接收到某些準確預測盟軍戰機動向的訊息之後，就甘拜臣服了。可是，處理夢境與預言都要非常的謹慎；這些訊息不可以貿然廣而宣告；這些訊息有可能煽惑人心，釀成傷害。預言最好在事過境遷之後，再廣而向大眾宣導，就像有關布托先生與他雙手碎裂的預言一樣。

可是，拉布瓦的和平局面又可以維持多久呢？難道這些年以來，不曾再出現新一波遷徙的夢境嗎？這話就像觸動了某一條神經一樣，這也是伊迪里斯不願多想的事情。他儀態隆重地說：「截至目前為止，這裡是最能實現真正主旨的地方，為全世界與全人類提供了前瞻的指引。」

我們重新步入屋外的熱氣中。我們看著遠處的清真寺，寺外廣闊的廣場，信眾每年都會聚集在這片廣場上。我們參觀一所招收世界各國學生加以訓練的學校，訓練期間長達六到七年，學生修業屆滿之後再各自回國，宣揚應許的彌賽亞教義。我們遇到一位來自千里達、今年二十二歲的印度穆斯林，還有一個二十六歲的印人。棕紅色的操場邊上，兩個奈及利亞人踟躕獨行，年齡分別為十二歲與十四歲。「來，來，過來這裡，」伊迪里斯說道：「我不想讓他們覺得落單，沒人理睬。」那兩個男孩就趨前而來，看起來像是無父無母的孤兒。他們跟我們無話可說，憂傷的臉上，睜著一雙明亮的眼睛，在旁遮普的鹽丘下，佇立在人工造就的小鎮上，戀慕著非洲潤澤的森林。

夕陽漸漸西斜，我們也打道回府。我們正聊著聊著，突然之間，伊迪里斯迅速地將雙手合什，做出

穆斯林禮拜的手勢。原來，我們剛剛經過那處墓園。稍後他解釋道，那是他的習慣，替墓地裡的先人祈禱幾句，「他們在天堂裡說不定還可以升到更高的位置呢。」

落日遼燒著契那布，月河。而當我們將河流拋過身後，落日仍映照著積水田野的池塘，灌溉田地逐漸失去生機，轉為鹽田與沼澤，黃昏時分，水面捕捉了最後一道光束，沼澤要比日正當中之時來得澄清。

去程路上，伊迪里斯一直喋喋不休。現在，他緘默無語，彷彿大地重新召喚了他，再度在他自己的抑鬱當中，加添一道焦慮的渴望。

炊煙升起。馬路上，車輛排放未經管制的廢氣，染黑了煙霧。馬車沒有加裝車燈，卡車車尾經常也不帶煞車燈。伊迪里斯說，這些車輛一度都會開燈行駛，現在則沒有法條規範管制。「要是立法委員帶頭折損法律的尊嚴，市井小民又何必守法呢？」

他的高等法院出庭業務毫無起色，可是他的太太還有些資產和收入。他一心想要旅行；他喜愛旅遊；他只有四十二歲。他從來不曾宣之於口，可是我可以替他感受到；至於我在喀拉蚩遇見的、穿著紗麗的阿默德女孩，現在她心中已經盤算著移民遷徙了，趕在下一波更猛烈的迫害加身之前，趕緊離開。

拉合爾華燈初上，逐漸出現在遠端了。

他說：「你有沒有記下那段預言呢？一九八九年，全世界的基督徒都將倦於繼續等待耶穌基督重返人世了。伊朗人也不會再繼續等候他們的第十二順位伊瑪目。屆時，他們都會轉向阿默德，加入我們。」

[第三部]

馬來西亞對話： 原始的信仰

一 與夏菲的第一次對談：出樂園之旅

宗教從印度，或是印度——巴基斯坦次大陸傳到東南亞。印度教與佛教先行。這兩大宗教加速了柬埔寨與爪哇兩大文明的演進，兩地的文化遺址——吳哥窟與婆羅浮屠，都是世界數一數二的奇蹟。歷史告訴我們，這兩大傳自印度的宗教，都不是經由軍隊或是殖民帝國傳布，而是經由商旅與教士宣導。同樣的印度旅人，在伊斯蘭教傳入次大陸之後，從第十四或十五世紀開始，逐漸將伊斯蘭教引進印尼與馬來西亞。

伊斯蘭教就像另外一種印度宗教一樣深入東南亞。在此之間，不曾發生阿拉伯入侵的事件，一如巴基斯坦的信德歷史；當地武士階級未曾遭到系統化的屠殺，東南亞不曾淪為阿拉伯駐軍的殖民地；不曾劫掠分贓，也不曾將財貨與奴隸進貢給遠在伊拉克或是敘利亞的哈里發享用；異教徒也無須上繳特殊的苛捐雜稅。伊斯蘭教引進之時，不曾發生浩劫巨難，原本安定的社會秩序，也不曾在一夜之間風雲變色，全盤廢除。伊斯蘭教的理念流布四方——一位先知、某次神聖的天啟、天堂與地獄、神言聖諭等等，新的理念混雜著舊式的觀點。為了進行宗教淨化，伊斯蘭教宣教人員紛紛東來；然而，新一波的傳教行動當中，最富熱情的教士還是來自次大陸，尤其是巴基斯坦的一群。

他們來到東南亞，隻字不提巴基斯坦境內的軍事統治，端賴小額匯款支撐的經濟，法紀蕩然無存，

一個打赤膊、嘴裡嚼著檳榔的厭世者，站在一條熱帶河流的河岸上，站在一座靜默而廣袤的森林邊上；一個怒氣沖天、無權無勢、身無分文之人，強忍著苦澀的不甘，即將脫口而出的長嘯悲鳴；這一聲呼號，倘若真的脫口而出，就會傳遍這片林地，穿透原始的遺世孤寂，如此真切，如此雄渾，如此深邃，正如任何發自安樂椅深度的哲學嘶鳴一般，擾亂了煙囪與屋頂所構成的不純荒野。

——約瑟夫·康拉德：《海隅逐客》（*An Outcast of the Islands*，一八九六年）

那些截至今日並未建立多少歷史的社區，看了一個歐洲人眼中，營造出某種奇異的印象，感覺既輕薄又隔離在周遭世界之外。他們並不以為自己也是時代的繼承者，由是，他們所堅持要傳遞給後代人接收的傳承，看在歷史背景豐富鮮活的外人眼中，就顯得幼稚而缺乏情感上可茲共鳴之處，尤其是當這個旁觀外人的過去不但鮮活，同時也因為他熟知先人緩慢與痛苦地締造的成就，他的未來也呈現一片光明。歷史讓觀者明瞭，人類事務永無休止與定於一尊之日；人世間斷無「靜止的完美狀態」，也絕對無法達成「臻至完美、無懈可擊」之智慧。

——羅素（Bertrand Russell）：《羅素的回憶：來自記憶裡的肖像》

（*Portraits from Memory and Other Essays*）

比哈邦穆斯林徘徊在孟加拉與巴基斯坦之外，求助無門的慘劇。以上種種現況，純然與伊斯蘭教無關，這些人只會帶來有關伊斯蘭教與伊斯蘭教敵對惡仇的訊息。他們帶來宗教激情，次大陸穆斯林專屬的特殊激情，儘管巴基斯坦已經獨立建國了，這群人猶自認定為受到脅迫的少數弱勢；這些人懷抱著他們認定為「歡樂的征服故事」的歷史觀點，悲痛於穆斯林不再是雄峙全球的征服者；此外，他們最為熱切的激情在於，這些穆斯林認為自己屈居在真正的穆斯林世界邊緣上。波斯與阿拉伯半島距離遙遠，什葉派信仰遂應運而生，而波斯人也信誓旦旦，自信他們的伊斯蘭教要比阿拉伯人來得純淨。印度半島上的穆斯林距離阿拉伯人要比波斯人更為遙遠，他們的宗教熱情同樣熾熱，或許更有過之而無不及。

每個穆斯林都是伊斯蘭教的傳教士：這就是在旁遮普積水沙漠上舉辦修道團聚會的宗旨。而經過四天的帳棚作息，反反覆覆地大規模集體禮拜之後，這些心思單純的人法喜暈眩的以為，世界即將為他們改變。有些人來到馬來西亞，他們持續在馬來西亞傳教多年，而今，他們的熱情即將獲得回應。

伊斯蘭教在大馬

馬來西亞北部還保留了幾處印度化的建築古蹟，有別於爪哇與東埔寨的是，印度文明不會在馬來西亞生根茁壯過。這片土地，一直到上個世紀，雖說海岸一帶曾經被歐洲人染指，內陸大部分地區都不曾有外來強權侵入，完整掌握在馬來人手中。

約瑟夫·康拉德的故事，傳達出約莫一百年前馬來半島偏遠地方的印象：歐洲人駕著沿海貿易的商船而來，偶爾與懷抱著虔誠正信的阿拉伯人發生衝突；歐洲人在海岸或是河口，建立面水背山的貿易港口或行政據點；中國農民或勞工隨遇而安，落地生根；馬來蘇丹與皇親國戚高踞朝廷之上；同時，故事背景中較為純樸的馬來人，棲息在林間水湄，半是穆斯林，半是泛靈論者。

相互分離、彼此撞擊的不同世界：歐洲人的世界，一步步推向「黑暗世界的外圍」，馬來人封閉的部落世界：這正是康拉德慣用的主題之一。而在今日的馬來西亞，伊斯蘭革命中抵禦一切外來影響的年輕人，他們正是康拉德小說中充當背景的那群人，居住在山巔水湄的馬來人後裔。在馬來西亞，他們出頭的最晚；直到殖民輪替結束之後，馬來西亞獨立之後，金錢匯入之後，他們才能應運崛起。

現在馬來西亞這座棧橋上，提得出來的已經遠多於椰子與藤材了。馬來西亞生產許多珍貴的貨物：錫料、橡膠、棕櫚油、石油等。馬來西亞富了起來，金錢向下挹注，創造出一整代受過教育的鄉村居民，引領他們進入一度被視為黑暗外圍、而今卻已經遍及寰宇的文明。

這些年輕人卻不見得喜歡自己一腳踏進的新世界。他們有些人曾經出國留學，研習科技專才，可是卻鮮少有人真正了解他們曾經涉足暫留的國度。他們不論是身在澳洲、英國或美國，都孜孜不倦地渴求著家鄉的規矩與習慣；旅居國外的時光，令他們惱怒乖戾，令他們更加畏懼退縮到個人天地之中。他們也無法再度回到他們的田園舊莊。他們還年輕，可是童年時光的生活情境已然不再。

他們同時也逐漸了解，過去這一百年間，就在他們或是他們的父母在寤寐之間，他們的國家——新的理念：複合的王國與蘇丹——已經過殖民而脫胎換骨了；當今富庶的馬來西亞，接收殖民主國奠定的基礎，搖身一變為英人——華人的創造物。英國人發展了礦冶與農產。他們引進了華人（一個世紀之前，那群飄移無根、砥礪奮發的中國農民），以及人數較少的印度人，接手操作馬來人無能為之的勞動苦工。而今，英國人不再統治這個地方，可是，馬來人也不過占總人口百分之五十而已。

華人已經遙遙領先了；華人憑藉著充沛的精力與聰穎的資質，推動了馬來西亞。華人不准涉足政壇，國家專由馬來人統馭；官方明令馬來西亞為穆斯林國家，制定穆斯林人身份案，穆斯林與非穆斯林之間發生性關係是違法的。此外，這個國家還保有某種窺探個人宗教傾向的政策，對於非穆斯林的合法性歧視令人咋舌。可是，統治馬國的還是一群早已高高在上的階級，他們不是出身古老悠遠的世家，就

是貴為皇親國戚，幾個世代以前就跨越文明的差距，進入新世界。

農村出身的新人類，一方面自覺失落太多，卻又發現自己進退維谷。金錢、發展與教育為他們切實混沌，開拓視野，卻只點醒了他們，外面的世界跟他們的村莊有如天壤之別，這個世界不是他們所能掌握的。他們的憤怒——田莊出身的人家，自身技能有限，資金有限，對於世界的領會更有限，油然攻心的怒火——涉及各種面向。現在，他們掌握了一項有力武器：伊斯蘭教。這是他們報復這個世界，以期兩造扯平的工具。伊斯蘭教處理了他們的怨懟，撫慰了他們的不足之感，他們對於社會不公的憤怒以及種族間的仇恨。

這種伊斯蘭教，不僅僅是他們村落裡的古老信仰。宣教人士帶進來的伊斯蘭教，也是一種昭告改變與勝利即將到來的宗教；伊斯蘭教來到馬來西亞的村莊，猶如全球運動的一部分。一份當地的傳教雜誌《伊斯蘭教讀本》上，作者侃侃而談，西方，即使在他們的哲學家眼中，都逐漸因其拜金與貪婪而自食惡果。真正的信徒，一心惦念著來世，生活中懷抱著更高層的理想。至於那些不信真主的異教徒，對於來生毫無信仰，此生不過徵酒逐色，貪歡享樂。「那些將大部分財富揮霍在奢靡的生活享樂、虛矯誇飾，穿著絲綢錦緞、使用金杯銀盞的人。」

絲綢錦緞，金杯銀盞？這話說在像吉隆坡這樣的城市，有什麼道理嗎？可是，這是神學的範疇。作者此語暗指相對於先知的聖訓「或「傳統」。某一日，侯宰斐（Hudhafa）口渴，呼人端水進來，一名波斯教士用了一個銀杯子盛水給他。侯宰斐怒責那名波斯人。侯宰斐說，他曾經親耳聽先知說過，只有不信《可蘭經》的異教徒才會使用金杯銀盞飲水，穿戴絲綢錦緞。

新一波的伊斯蘭教就是以這種方式重返東南亞，而對於農村出身的這群新人類而言，伊斯蘭教則可以作為另類的知識與真理，無處不見學院組織與架構。這是無須具體建設性方案加以充實的熱情。第一要務，在於徹底推翻拜金的物慾世界；稍後再以伊斯蘭教立國，一切就會水到渠成了——伊朗、巴基斯

坦不就是現成的先例嗎？

而起始自巴基斯坦的訊息，從未終止於馬來西亞。訊息同時也傳送到印尼。相較於馬來西亞一千兩百萬人口，印尼食指繁浩，人口多達一億兩千萬，卻更為貧窮落後，種族更加紛異，近代歷史上一連串的計畫滅種與大規模的屠殺，政局更加岌岌可危。馬來西亞此間流傳在年輕一代中的伊斯蘭運動，在敵對勢力眼裡，定位等同於否定一切存在的虛無主義；他們將這種運動稱為「馬來西亞之瘟」。因此，巴基斯坦推動伊斯蘭教的熱情，帶著特殊的根源，一而再、再而三的皈依改宗，激起更多不滿與苦惱。承諾中的政治大災難，竟然被當作大好消息四下傳布。

拜金生活的誘惑

馬來西亞熱氣蒸騰。雨季的早晨，烏雲蓄積迅速。午後，傾盆大雨，滂沱而降，青綠的遠山消失無蹤，雨後，雲絮流連在山間裂隙，猶如裊裊煙霧。攀緣植物競相爬上電報柱子的支索；藤蔓叢生，壓倒乾枯的椰子樹枝葉，枯枝受壓，吃力難擋，只有殞落地下；爬藤將枯木纏得密密麻麻的，不然就是攀爬在某些無力抗禦的樹上，製造出某種詭異的樹型。在馬來西亞，豪雨、驕陽與熱氣並不代表腐敗頹喪，抑或是熱帶地方的倦怠懶散；相反的，這些天候徵象表現出活力，行情看漲的作物迅速生長，金錢收入指日可待。

吉隆坡現在是馬來西亞的首都，昔日於殖民時期建立的部分城鎮仍然保留了下來。屋頂鋪著磚瓦的

1 聖訓（hadith）：伊斯蘭教源於先知穆罕默德或他的一位同伴關於各種問題的傳述。這些言行錄指導穆斯林生活的各個方面，其權威性僅次於《可蘭經》。

私人住所起源於英國，一列列狹窄的兩層樓華人店舖住家，樓下充當店面，走廊上撐起廊柱，廊柱上就是二樓住家；馬來西亞特有的鄉村——簡樸而迷人的木屋，原木滄桑，棕紅色的鑄鐵欄杆上，鐵鏽斑斑——坐落在當初建城之時就保留給馬來人居住的區域；火車站附近，矗立著幾棟英國官方建築：維多利亞—哥德—蒙兀兒式的法庭、圓形屋頂、拱門與階梯塔樓。

殖民時期的老街，已經落後在新開發的住宅區之下了，新城區聳立著摩天高樓，韓國人蓋的高速公路從機場將旅客直接送達市中心，一路上先經過栽植林地（馬來西亞西部從空中鳥瞰，只見得黑壓壓的森林連天，可是這是一片廣大而有秩序的森林，樹木成行栽植，柱狀的白色熱氣冉冉升起，就像是煙霧從煙囪冒出一般），再經過工廠與跨國公司的裝配廠。

不論在公共花園或是其他新城鎮區域，都可以看到出身馬來西亞鄉間的年輕人，穿的像阿拉伯人一樣，纏著頭巾，套著長衫。阿拉伯服飾——遠從巴基斯坦進口，遠從阿拉伯半島輸入——正是他們的政治標誌。大學校園裡，有些女學生不但圍著面紗，冒著溽暑，還套著手套與襪子。不同的團體，穿著不同顏色的衣裳。面紗不僅是面紗，面紗也包裹了侵略性的敵意。面紗有別於牙買加的「拉斯法里特派」教派中人濃密糾結的髮辮，此派中人強忍了幾個世代的邊緣生活，因而遲鈍迷惑²；也同於中產階級的嬉皮衣裝，他們只想遁隱出世；面紗與阿拉伯服裝正為失根的田莊青年發聲，他們只想扯下不屬於他們的一切，再進而強占。因為存在他們的幻想之中，有個不足為外人道的部分——這個運作自如、持續不輟的世界，只有繼承而來，無法白手創業成功。

夏菲的工作就是為宣揚穆斯林信仰。他並不身著阿拉伯服飾穿街過巷，可是他能夠理解套著阿拉伯服飾的年輕人。夏菲從馬來西亞北部的一個村莊南下，來到吉隆坡。遷徙衍生的困擾，至今仍然糾結在他心頭。

夏菲說：「我還待在村子裡的時候，氣氛與城市完全不一樣。你離開了鄉村。你看到這些明亮的光線，就開始體會自己身邊圍繞著拜金的物質文明。因此，我也忘了我的宗教跟我的承諾——在每天禮拜的方面。可是我還沒離譜到出去打混，幹些下流事情，像是找女人、喝酒、賭博以及嗑藥之類的。我並沒有失去我的信仰，我只是忘了要定時禮拜，忘記了我的責任。我只是放鬆了自己。我給自己的框架不夠切實，太過軟弱。我只有四處浮盪，找不到自己的方向。」

我說：「你剛到吉隆坡的時候在哪裡落腳？住在哪裡？」

他並沒有正面直接地回答我。在我們談話初期，很難從他嘴裡引出具體的回應。他說：「我住在某個郊區，而且，那裡是我初次見識到物質文明的地方，過去我從來沒有面對過這種拜金的生活方式。男孩子和女孩子竟然可以一起出去玩。你竟然可以不受家庭管束，社會也管不著你。而在我們鄉下，你要搞了什麼糟糕的勾當，一定會受到社會批評。要是你將一頭羊、一頭母牛或是一頭水牛——在某些地方，他們整天都把羊綁在繩子上——然後你把羊跟其他一些牲口鬆綁放走，你的羊沒了繩索牽著，就會四處亂走。」

「這樣對羊不好嗎？」

「我想，那羊一定很高興，可以到處亂跑。可是你要問我的話，我可不覺得那有什麼好的。假如那羊有頭腦的話，我倒要對牠說，『你有繩子綁著，有主人餵食，為什麼還要到處亂跑？你為什麼還要到處亂跑？』」

「可是當你剛到吉隆坡的時候，難道不曉得自己要做什麼嗎？」

2 拉斯特法里派 (Ras Tafari)：指的是崇拜衣索比亞遜帝賽拉席 (Haile Selassie) 為神，並信奉黑人種族將獲得救贖、重返非洲的牙買加黑人教派。教派成員不但禁止剪髮，還在宗教儀式中大量使用大麻菸，以達到飄飄欲仙的冥想幻境。

「我到吉隆坡的主要目標是受教育。那是我的框架。可是我碰到自由跟主要目標發生的衝突，而且我想，這是我和我許多朋友共同面對的難題。」

「其他人在別的國家也會面對相同的困難啊。」

夏菲說：「難道說，他們也會碰到跟我相同的家庭生活限制嗎？」

「什麼樣的限制？」

「宗教上的限制。這是你甩不掉的框框。宗教的傳統、家庭生活、社會、村落裡的社群。然後你來到了城市，城市人到處亂跑，城市人自由自在的。這時就產生價值觀的衝突了。」

「你明白嗎？在我長大的村子裡，我們過著胼手胝足的日子。我們有米可以吃，有房子可以住。我們不必沿街討飯。城市裡的人可以花上十塊錢（馬來西亞貨幣，相當於美金兩塊兩毛錢）吃上一頓午餐，也可以只花上五毛錢在攤子上解決午飯。多出來的九塊五毛錢，就可以讓我們鄉下人花在其他事情上面。在我們說來，我們有我們的框架、傳統和宗教，這九塊五毛錢就是花費過度了。」

「有時候，我太太會想說我們應該回到鄉下去，我也有同感。我們不是要逃離現代世界，只是想要過得簡單一點，過比住在城市要有意義的生活。城市裡，你浪費了太多東西，太多或許不真實的東西了。要是你花上五毛錢就可以填飽肚子，卻花上十塊錢，你就是對自己不誠實。」

「我可以跟你舉個浪費的例子。前些日子政府蓋了一間室內溜冰場，三個月後，他們又把這座溜冰場敲掉了，因為有一條高速公路要從那裡經過。他們專門蓋一些經過村莊的大馬路和高速公路。又是誰把卡車開進我們村莊，載運窮人種植的農作物之外，還傾銷那些花大錢製造給有錢人買的產品——彩色電視、電冰箱、空調機組、電晶體收音機？」

「難道村子裡的人就不想要這些東西嗎？」

「到頭來，他們只是想要利用彩色電視機——大家都喜歡看——來廣告促銷他們的產品，把村子裡

的人拐進浪費的生活方式。」

「難道你不覺得，鄉村生活對大部分人來說是相當沉悶的嗎？」

「鄉村？鄉村生活單純。這種生活沒有——我該怎麼講呢？——沒有浪費。你是不該浪費的。你也不該急吼吼的只想買東西。當我說到我們應該回到馬來西亞的鄉村生活時，我的意思是說，我們應該跟社區緊密聯繫，而不是逃離進步與發展。社會應該是緊密相連的。在我們鄉下，要是有人去世，村子裡都會敲喪鐘通知大家；我們大部分都會知道誰過世了、什麼時候會下葬、他又是為什麼而死的、他的近親又發生了什麼事情、他們有沒有在一旁送終呢？村莊裡沒有污染這回事。實體的污染，心靈和社會的污染都沒有的。」

「社會污染？」

「就是違反我們的習俗與傳統的東西。在馬來西亞鄉下，男人不可以跟不屬於他家族的女人走在街上。那是禁止的。」

「那又有什麼不對嗎？」

「人與人之間，相互尊重與彼此的尊嚴，全都來自於男女之間光明正大的關係。社會上一定要立法保障每個社會單位的安定。你的家庭一定要受到保護。可是，女孩子從鄉下進城到吉隆坡的時候，她們並未享受到這個法律的保護。」

穆斯林青年活動

夏菲時年三十二歲。他个子瘦小，臉上架著眼鏡，前額傾斜，下頰還留著一撮淡淡薄薄的鬍子。他曾經一度紮根在建築業界，可是他的事業並未成功；後來他放棄了建築業跟其他一切俗務，轉而以所有

的精神與時間，投注在簡稱為A B I M的穆斯林青年運動³。A B I M是馬來西亞最重要與組織最完整的穆斯林青年團體；夏菲對於這個團體的領袖安華·依布拉欣⁴也推崇備至，安華正好跟他年紀相仿。

安華的故事極引人注目。他出身馬來西亞開發最為先進的西部海峽地區，比起夏菲，算是先進了兩個世代。安華的祖父經營一家小型的村間餐館，他的父親在醫院裡擔任男性看護，安華自己則進入一家英國人辦的、專門招收當地親王與蘇丹公子的學院。安華必須通過嚴格的入學考試才擠得進去，皇親國戚的公子哥兒則可以保送入學。

英國校方曾經承諾絕對尊重蘇丹的穆斯林傳統，在學院裡，校方也切實遵守此項承諾。可是安華認為，學校裡尊行的宗教規範不過是儀式性的照章行事而已，缺乏實質的重大意義。因此，借助於某位英國教師（日後他也改宗伊斯蘭教）出力，安華開始研習伊斯蘭教，逐漸體會到遵行真主意旨，團結與紀律的價值。在他年滿十六歲之前，就已經可以在村中暢談伊斯蘭教，侃侃演講；而他也是個熱力萬鈞的演說家。他所主導的運動就這樣從學生課外活動當中發展出來，可是，現在這個運動已經高度組織化，在吉隆坡擁有一棟建築，有辦公室、工作人員，甚至還創辦了一所學校。

安華也跟馬來西亞海外的穆斯林運動保持聯繫，舉凡印尼、孟加拉、巴基斯坦等地都與他交好。他曾經前往伊朗會晤阿亞圖拉何梅尼，此行也為他在當地的名聲加分。安華認為，伊斯蘭教正是馬來西亞此刻迫切需要的強心劑與淨化劑；真正的伊斯蘭教可以點醒沉睡的人民，尤其是馬來人，同時也可以挽救馬來人的心靈，不致於跟著馬來西亞的種族政治齊步沉淪，不受卑鄙的金錢文化與任意模仿西方文化所污染。

他在A B I M的辦公室——工作人員的辦公隔間在外，設置有打字機與檔案櫃——其實與一般簡樸的企業主管辦公室殊無二致，應用現代機具與現代組織，為伊斯蘭教的淨化運動效力。他的個子跟夏菲一般嬌小，只是比夏菲更清瘦些，而面容上還更加孩子氣。他的言談舉止極為迷人；而更增添他的迷人

風采的是，儘管他在當地擁有相當權威，他卻給人一種印象，彷彿他自認還在求知，還在不斷思索一般。他對於伊斯蘭教的宏觀視野，給了他某種安全感，他的追隨者卻未必能夠領會，而四出旅行更拓展了他的見地。他不願苟同某些馬來西亞穆斯林團體「趕時髦」般的狂熱，以及他們在宗教與政治上單線思考的簡陋思維。他也坦承自己在經濟面的議題上還沒完全想通；他說，自己仍然處於「良知化」的階段。他給我某種印象，他似乎真心相信，終有一天，他可以從像巴基斯坦這樣的地方，引進諸如伊斯蘭經濟體系的東西。

我確實期望能夠跟安華多談上一些。經過我們首度在他的A B I M辦公室晤談過後，我突發奇想，我應該與他結伴同遊馬來西亞各地，透過他的眼睛來審視這個國家。他很樂意，只可惜這個構想胎死腹中。他太忙了，坐鎮在A B I M運動中樞，他總是馬不停蹄的四下奔走，時而乘車，時而搭機，到處都

3 A B I M：全名為Angkatan Belia Islam Malaysia（「馬來西亞伊斯蘭青年運動」），是馬來西亞國內成員最多、可見度最廣、政治性最高的青年宗教團體，其組織係由歸國留學生所創，成員亦多屬受高等教育城市青年男女。他們鼓勵學生示威、參與政黨、攻擊政府、舉辦伊斯蘭講習會、下鄉創辦學校、開設伊斯蘭課程、穿著阿拉伯服裝、仿效阿拉伯習俗，與利比亞、沙烏地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以及其他國家的伊斯蘭組織常保持密切關係。更激進者甚至暢談伊朗革命、鼓吹人拒唱國歌、不用西式家具、只修習伊斯蘭教義教規而不學科學、工程、貿易等西方學科。

4 安華·依布拉欣（Anwar Ibrahim）：從獻身伊斯蘭教復興運動崛起，一九八一年間，因為帶頭抗爭大馬政府修定民間社團法案，民間威望更甚。同年，馬哈迪在擔任總理半年有餘後，直接邀請安華加入巫統，成為他頭號副手。馬哈迪此舉，有意在於打擊當時的伊斯蘭教黨，因為該黨一直將A B I M（當時會員已超過五萬人）視為路線與調性相近的同盟，兩者之間有著高度的共識，只是安華始終遲遲不肯加盟伊斯蘭教黨而已。

安華加入巫統之後，仕途上更加順利，也被外界視為首相馬哈迪的接班人。然而，一九九八年在安華擔任副總理時，兩人決裂，九月間，安華在家遭到逮捕；一九九九年，安華因四項貪瀆罪名被判處六年徒刑。目前他雖然在監服刑，卻依然是馬來西亞最大反對黨的精神領袖。

有人請他前往演講。當他不克趕赴我們第二次晤談的時候，便差遣夏菲到我暫住的假日飯店來見我。

因為安華的推薦，夏菲來訪的時候，才真正對我敞開胸懷。而即使如此，夏菲還是含羞帶怯的無法毫無保留地發言，或許是卻於擔任發言人的角色，或許是不願玷損了運動領袖的威嚴。

我們坐在梔花廳喝咖啡的時候，夏菲說：「我不是最高領袖，」接著哈哈大笑。「我只是個將軍而已。」

一開始要跟夏菲聊起來還真不容易。他講起這個運動的抽象概念，而抽象概念使得他的語言乏味沉重。他迴避具體的細節，倒不是因為他有心保持神秘，而是因為他的工作泰半著重於回答有關信仰與穆斯林運動的問題，而非討論與剖析自我。

他說，他並不喜歡像是假日飯店這類的場所。原本我以為他只是有意誇張，直到他開始談起都市生活之浪費無度。而這個與我對談的人——充滿知性、沉著、一派學者風範——與步調鬆緩的鄉間生活，他自稱從小成長於其間，而今急於回歸的村野時光，兩者之間的差異，始終無法令我信服。

他想要回到鄉村重溫昔日凡事萬物，無不合度完整的美好過往；而我也暗自了然，為什麼對他而言，伊斯蘭教是再完美不過的承載工具了。可是，夏菲——身為一位專業人士，一位組織者——正是這個他所厭斥的世界所塑造的產物；多虧了這個世界，他才能發揮他的智能專長。對他而言，要將自身純粹傳統，或是全憑直覺的部分，區分在他必須獨力負起全責的部分，恐怕不是那麼容易。再說，他的村莊已經不復往昔，馬來西亞也變了；整個世界都不一樣了。

夏菲告辭離開後不久，我就聽到馬來西亞的外交部長在大學召開某一場研討會上致詞，說到這個已然改觀、步調急促的世界。部長身著一領花襯衫，而這就是他渾身上下唯一觸及傳統的一點色彩了。他與其部門的印度官員，提到近日於哈瓦那的不結盟國家會議中的討論事項；他說到馬國北方邊境的諸多滋擾事端：泰國、柬埔寨、越南等等。中國大使館派遣了兩名官員赴會，兩人穿著灰色的狩獵短袖襯

衫，像是中國人在練書法一樣地挺直握著筆桿，振筆疾書。稍後，大型禮車紛紛將大使載離會場。改變世界的，不只是當地富有的華人與建造高速公路的承包商，以及彩色電視機的製造廠商而已。

晚間，在一名傑出印度律師家中的晚宴上，話題才轉到另外一種舊日生活。律師詹姆士·樸塔齊利一度活躍於殖民時期的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政壇。他說：「我被英國人、新加坡人與馬來西亞人關過。關過我的人當中，由於囚禁方式比較人道，釋放出來後還可以跟他們做朋友的，只有英國人。」有一天，英國殖民地書記——位階僅次於總督——到監獄裡探望他。書記在踏進他的牢房前說了：「樸塔齊利先生，您允許我進入您的房間嗎？」稍後，樸塔齊利說道，他們兩人「都腳踏實地的回到真實世界中」。日後，殖民地書記退休了，改行做生意；樸塔齊利完成了他在獄中展開的課業，取得律師資格執業。「過去我們經常見面，一起玩橋牌。」

那天晚上是個優雅的中產階級聚會，與會者教育程度相當，除此之外，與會眾人都意識到晚宴上族裔組成之多元：馬來人、華人、印度人等。車道上與草坪上都停了許多輛車子。舊式的爭鬥，舊式的規矩；我們可以這麼說，借助於馬來西亞的金錢挹注，這些人才得以攀升到體面富裕的階段。他們眼中的這個世界運轉得異常快速，然而，他們所贏取的一切，已經遭到不在晚宴現場的其他族群的怨懟與憤怒所動搖，這些來自山林河川的鄉下人，自外於殖民時期的醒覺與崛起，他們的子輩造就了第一代受過教育的馬來村人。對他們而言，這個世界運作的更加快速。

關於這個層面，每天早上翻開報紙就可以獲得更多了解。布米樸特拉（buniputra）將獲價值達一千五百萬美元之股份。布米樸特拉（這是個梵文字眼，前於伊斯蘭文化）意指「土壤之子」，也就是馬來人；政府將協助穆斯林貸款購買專為他們保留的股份。大馬政府就是這樣偏倚馬來人，進行種族性的施惠政策，企圖將馬來人的經濟條件提升到與華人相當的水準。這種施政是徒勞無益的，徒然創造出一群受惠於政府的馬來「創投人」階級。安華·依布拉欣與ABIM反對最力的就是這類偏愛施惠的種族政

策；安華並提出較為純淨的伊斯蘭式願景與之抗衡。

ABIM表示，樂見政府通令各級學校研習伊斯蘭教，日後，伊斯蘭教將成為大馬各級學校穆斯林學生之必修科目。拉曼則說：屬靈成長不可輕忽。他可是個政府人士，他與任何其他人都一樣都是穆斯林。越過沙漠沙地的呼聲：這是今天適逢宰牲節的專文，作者是一位名聲頗高的專欄作家，他將全家人一同遠赴麥加朝聖的經歷，娓娓寫成這樣一篇文情並茂、音韻悠揚的佳作。

大馬人口中只有百分之五十為穆斯林，可是每個人都得對伊斯蘭教輸誠。這股壓力來自基層：淨化與一清的運動暗潮洶湧，卻也擺脫不了種族運動的痕跡。如此運動引發普遍的緊張。人們躲避訪客，唯恐遭到朋友出賣。突兀的是，在這片豪雨、熱氣與茂林蔽天的土地上，這種運動引導出意識型態國家的氣氛。

夏菲的過往

夏菲趁著早晨來訪。配合宰牲節這個宗教性的節日，他也穿著馬來的傳統服飾應景。他穿著淡橘色的長衫與長褲（馬來傳統服飾的這個部分就是從華人身上學來的），長衫上還釘著金色的飾扣；他在腰上纏上一條紗龍裙布，像是西方男人燕尾服上衣之下打摺的寬腰帶一樣，只是比較鬆垮輕便（紗龍是道道地地的馬來西亞傳統服飾，而夏菲身上圍的這條粉彩條紋紗龍，還是他的母親為他編織的）。夏菲頭上還戴了頂帽頂收攏的平平整整的絲絨無邊帽子（帽子這部分，就是馬來西亞服飾受到印度影響的痕跡）。他的模樣堂皇莊嚴。倘若腰上再佩帶一柄寶刀，他活脫就像個耀武揚威於一百年前的酋長，站在河岸上，身後跟著一群朝臣隨扈。可是，今天他開著自己的車子來，而我們也不過是約在假日飯店的大廳裡見面。

他說：「你了解我昨天晚上講的事情嗎？你還喜歡嗎？」

「你講到你的家庭單位時，我很感興趣。」

「你還想再多問一些嗎？」他十分熱切、開放。有人彷彿要替他作傳的工夫，我對他生平細節的興趣，顯然令他興奮不已。

「我的確想多知道一些，可是我已經聽你說明過你的哲學思想和運動理念了。我想知道一些比較個人的東西。」

我們從大廳一同走向槲花咖啡廳，經過一旁的酒吧，一到晚上，酒吧裡就燈光陰暗，幾乎伸手不見五指，情侶相伴而坐，聽著〈往日情懷〉。印度人與馬來人，或許只有馬來人，就著擴音機唱著熱門歌曲。我們在咖啡廳裡找了個靠窗的位子坐下，窗外俯瞰著一個橢圓形游泳池，大池旁邊還有個專供兒童戲水的橢圓形小池。這個早晨，流連泳池的都是白種人。

我說：「你覺得他們怎麼樣？」

「起先，他就已經逐漸緊張了起來，等著我問他一些私人的問題。他轉過身去，盯著小游泳池中戲水的人們，我也得以細看他的側影。他的馬來人棕色皮膚平滑，斜塌的前額，臉上一副眼鏡，鼻梁塌陷，圓球般的獅子鼻頭，他的鬍子。他看來艱苦困頓；他的面容逐漸嚴肅起來。」

他說：「我不曉得我自己該怎麼覺得。他們在我們看來，都是外國人。他們跟我們的文化完全不搭軌。」

「你不會想要跟他們在一塊兒嗎？」

「不會。可是，現在游泳池水一定很涼爽。我們村子裡也有同樣清冽的泉水，自然環境也比較多。你可以看到河床。你可以在河岸上看到綠色植物，還有很多爬藤。」

游泳池的另一邊有個四十來歲的女人，穿著黑色的泳裝。她皮膚白皙，顯然未經日曬，肌肉已經開

始鬆弛，身材卻還沒走樣，一雙腿驚扭的收束在白色塑膠橫帶構成的休閒躺椅上，而非引人遐思的伸展著。就在我們窗邊下方，俯臥著一個年紀較輕的女人，身上穿著藍色泳衣，她的個子比較嬌小，肌膚也比較緊致。兩人都可以撩起「性」致勃勃的男性無限的慾念。

我說：「你覺得那些白種女人漂亮嗎？」

他一個接著一個地盯著那兩個女人端詳，臉上嚴肅的表情不變。他搜索枯腸，企圖理出自己的感覺與頭緒。

他說：「我們沒有這種比較的觀念。」

「可是，很多白種男人都覺得大馬姑娘非常漂亮呢。」

「這種話我也聽說過。可是，那是真的嗎？他們真的這麼覺得嗎？」

咖啡廳裡，馬來女侍身著長裙款款的制服，衣襟上別著她們假日飯店的名牌（「美麗溫馨」），我們聊到鄉村生活。要夏菲暢所欲言實在不容易，不過一提到思想與回憶就令他精神鼓舞。我得不斷提問，才能循循善誘出他的敘述。

「我們村莊上上下下每個角落，我都瞭如指掌。小時候我們經常去打鳥，有時候也捕魚。我們不是穿著長褲，就是圍著紗籠。要是我們穿著長褲，口袋裡就會裝滿了小石頭，我們就用這些小石頭當作彈子打鳥。學校放假的日子，我們差不多早上十點多就會出門去，要是碰上齋月，還會再提早一些。一直到吃中飯的時候，我們才會回家，口袋裡一顆小石頭也沒了，卻兩手空空的，什麼也沒打到。有時候我們不打鳥，跑去撿橡膠樹的種子。我們每個人會把橡膠樹的種子攔在自己的竹筒裡，再把竹筒架在離地面高大約四吋的地方，再站得遠遠的，把竹筒敲倒。敲倒竹筒的男生，就可以拿走所有的橡膠樹種子。」

「我們童年時期另外一項活動就是讀《可蘭經》，就算是我們不曉得經文究竟在講什麼意思也一樣。我們的父母要我們多讀《可蘭經》，我們只是乖乖聽話。」

我說：「你不覺得這在智性發展上是個不好的開始嗎？」

「你說得對。可是讀《可蘭經》的時候，不光是學習語言文字而已。不只是我們的父母要我們讀《可蘭經》，還有許多其他管道都要我們讀《可蘭經》。你每讀一次，就會為你的生活帶來一些好處。我真的有這種感覺。」

「就像是變魔術一樣嗎？」

「講起來，《可蘭經》是超越在魔術之上的。《可蘭經》不是人類撰寫的。魔術只是人為操縱，《可蘭經》可就比這個要高太多了。除了《可蘭經》以外，我們還有幾本村子裡有名的意見領袖寫的書。都是宗教方面的書籍，主要是教導信仰方面的。那些書都是在鎮上印刷，講些該如何禮拜、怎麼保持個人衛生的事情。假如你家裡有水，就該用水來淨身；假如沒有水可以用，你可以使用其他材料來保持清潔，如石頭、木片、樹皮、樹葉、紙張等等。可是不能使用未經屠宰的動物骨頭。這都是些基本的衛生習慣。」

「假如你家沒有妥善的盥洗設備的話，你可以選擇找到隱蔽沒有人會撞見你的地方解決，可是一定要避開別人取水使用的溪流河川，不可以在人家房子下面上廁所，也不可以在糞便會冒犯大眾的場所方便。這些都是宗教上的教諭，也很適切於我們的生活型態。所以，我就認為這是我們必須遵守的規矩。我們讀這些東西的時候，都還不到十二歲呢。」

「你們村子裡每一戶人家家裡都有一本這樣子的書嗎？」

「每個有去上課的小孩都會拿到這本書。第一冊、第二冊、第三冊。這本書是清真寺裡的毛拉寫的。我印象中，這位毛拉有個櫃子，十呎高、十呎的櫃子靠著牆壁，櫃子裡塞滿了像這樣印好了的書。他會先免費給你一本。可是要是你搞丟了第一本，第二本就得花錢買了。每個星期五下午和星期六早上都排有教學課程。那是專門開給小孩上的，從九歲到十五歲、十六歲都有。」

「這些書中可曾提到自慰與性嗎？」

「基本上，這些書在教小孩子有關清潔的問題。清潔是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就是教你怎麼禮拜。禮拜之前，應該要用什麼樣的水來沐浴。你一定要用乾淨的水來淨身。清潔的水，通常定義為溪流裡的活水。淨身的時候，至少要用上二十到三十加崙的水，那樣，你才能說是徹底沐浴清潔了。沐浴用水不可以看見任何灰塵，或是帶有土味，或是摸得到泥土。除非水質符合這些條件，不然那水就是髒的。」

「假如你無故翹課，錯過某一節教學課程，又提不出具體的理由，就要接受處罰。毛拉處罰學生，家長不會有意見的。除了毛拉的課程以外，星期五上午，村子裡的老人家也會推舉代表給我們上課。這種課就是為所有的村民開的，不光是小朋友要上，大人也得參加。他們教的東西，宗教的也有，世俗的也有，像是人際關係。老人家和年輕人，男人和女人。保持清潔、禮拜祈禱等等。每次星期五上午上課，他們就會引述《可蘭經》，再翻譯給我們聽，這樣也鼓勵大家多讀《可蘭經》與經文的翻譯。後來我們每天上午和下午都會讀上一陣子的《可蘭經》。」

「我的村莊位於哥打巴魯（Kota Bharu），那是大馬的東北地區。我會說，我們村莊的人都挺有生意頭腦的。他們會織布——我身上這條紗龍就是家母織給我的。村子裡沒有幾個人在公家機關上班。有些村民擁有農場、稻田和椰子林，他們從村子裡雇人來做這些工作。」

「那個時候，我們村子裡大約有兩千人。每個人住的房子都是自己家的，地也是自己的，要不然也是某個親戚的，或是屬於政府機關宗教部門的地。他們的房子都是自己蓋的。誰也不會去強占別人的土地。假如我沒記錯的話，沒有人乞討；我們村子裡沒有討飯的。我可以說，當時那實在是個很繁榮的村子。有個人跟他家人，因為他們的住宅用地被別人賣了，不得不離開我們村子。他們搬家到另外一個村子裡，後來我們問起他們在新的村子裡過得怎樣，他們說，哪能跟我們老村子比呀，他們在老村子裡比較容易找工作。」

「我們村子裡沒有色情文化的污染，沒有色情書刊。村子裡的學校教你讀書寫字，就是這樣子了。在馬來就是這樣。」

我說：「可是，倘若你的生活一直這麼簡單，你就不會去追求知識和學問了。」

「追求知識根本沒用。我給你舉個例子吧。我們村子裡，離開家鄉接受高等教育的人不是很多，只有毛拉的家人才會離鄉背井去念書。可是他們出遠門接受的是宗教教育，而不是一般世俗的教育。他們去麥加留學。毛拉全家人都去過麥加，他們在麥加還有個親戚呢。」

「我們村子裡一個外國人也沒有。可是我們村子旁邊，鄰村就是個華人的村落。他們跟我們不一樣，就是這樣。他們吃豬肉，可是我們說豬是最骯髒的。他們的長相也不一樣。我們不會覺得他們長的醜。他們眼睛小，皮膚卻比我們好。他們要比我們髒得多。他們後院發臭，後院排出來的廢水又髒又臭。不管什麼時候，要是他們養的豬溜了出來，跑到我們村子裡，我們村子裡的小孩就會往那些豬身上扔石頭。華人村落裡跑出來的流浪狗，有時會被我們扔石頭的。因為養狗、養豬對穆斯林來說都是禁忌。可是這兩個村子也從來沒發生過衝突。」

「當時，那些華人有錢嗎？」

「那個時候，他們還不算有錢。可是他們在小孩的教育方面，要求很嚴格。每天吃過晚飯以後，他們就會督促孩子高聲朗讀課文，不是在廚房念書，就是在前房裡。」

「可是，你們對於子女的教育要求也很嚴格，不是嗎？還是只有在宗教教育上要求？」

「對我們來講，宗教教育是一定要的。幾乎每個年幼的穆斯林都要了解。那也是種義務。我們強調人性價值遠超過宗教價值。」

「可是這樣一來，你們在知識上就落後了。」

「沒錯，我們在知識上的確落後了。我應該進一步的說明，在追求物質和俗世的教育上，我們確實

是落後了。可是在作為比較具有人性、比較負責的個人方面，在待人接物上比較有理性的方面，我想，我們就比他們要好太多了。道德上，我們可比他們優秀多了。」

「可是，你們不具備任何科技上的智能啊。」

「沒錯，我們確實缺乏科技方面的能力。我們村子裡有個毛拉，過去也面對過這個問題。他開了一家煉製椰子油的工廠，順便生產肥皂，結果不是很成功，為什麼呢？我認為這是因為他沒有掌握到技術上的要領，又缺乏管理上的能力。不過那時候，他不准我進他的工廠，所以，我也不多廢話什麼。」

「可是我們從來不曾思考過學習科技專長的問題。我記得某個例子。當初我們打算在哥打巴魯建造一條跨河橋梁的時候，好幾個毛拉和哈吉（曾經前往麥加朝聖過的穆斯林）都大吃一驚，他們覺得不可思議。他們說，『他們究竟該如何建造這麼大一條跨河橋梁呢？』他們開始架橋的時候，這個場景真的把他們嚇得魂不附體。」

「基本上，我們都是好人，只是對科技連一知半解也說不上。基於某些理由，我們可以自給自足。我們不需要摩天大樓，不需要大型電梯，也用不上快速道路。我們不必學習什麼科技。」

我說：「你真的這麼確定嗎？」

「我不這麼認為。我們還住在鄉下的時候，曾經看過一份月曆上面印了一幅新加坡一棟二十五層樓的大樓照片，那張照片讓我們很吃驚。這是一九五七年的往事。我們住在村子裡，我們覺得自己不需要那樣的開發。一直到我們離開哥打巴魯，到吉隆坡和其他地方走上一回之後，增加了一些見聞與經歷以後，才了解到那些開發的必要性。」

「你那本月曆又是哪裡來的呢？」

「我們家有幾個親戚去哈吉（即前往麥加朝聖）的時候，經過新加坡，那本月曆就是他們帶回來的。新加坡城裡可真忙啊——他們就是這麼表示的；他們睡在旅館的時候，車子好像就在床頭跑來跑

去，搞得他們輾轉難眠。我還記得我們村子裡只有兩三輛車子而已。那個如此描述新加坡的人，現在也是這麼描述我們的村子，說村子越來越像新加坡了——車子往來的聲音就在他床舖後面，吵個不停。」

「難道你不覺得過去村子裡的生活方式已經不再了嗎？」

「不，這種生活還是應該保留下來。我們還是需要良好的基本設施。我們需要優良的公車服務，上軌道的學校教育。」

他怎麼會有這樣單純的願景呢！可是，願景裡還要有公共汽車，而公車需要道路，開路需要機械。

我說：「你的學校生活又如何呢？」

「我們村子裡有一片泥土空地，一下雨就會被水淹過去，而我們村子裡也沒有電力設備。」

可是，即使在這樣因陋就簡的學校裡，新世界還是無聲無息的侵入，在不知不覺間，將夏菲提升到超越純粹鄉村生活的境界。學校設立童軍團，那可是英國系統的一部分，可是在夏菲眼中，那只是他鄉村學校生活的一部分而已。一九六三年，馬來西亞舉辦了一項全國性的童軍露營技能競賽。就在夏菲十五歲時，身為學校童軍團的一員，代表學校參加這項競賽，他首度離開哥打巴魯來到英屬——華人的都市吉隆坡。事隔十六年，首度踏出村莊的旅程中，一路上的緊張與慌亂，還是不曾遠離夏菲，流露在他的措詞遣字當中。

「我們搭火車南下進城。火車走了一天一夜。我們已經有了準備。我們都迫不及待。我們每個人都怕冒險。我們是一支團隊。我們在旅途上不斷尋索著相似的事務。舉例來說吧，像是好吃的馬來餐館，我們在哥打巴魯也有，可是我們卻找不到任何跟家鄉相似的餐館。餐廳裡的東西都很难吃；對我們說來，我們是一定要吃穆斯林餐點的。」

「我們剛搭上火車離家時，還可以看出見村莊的景致。天就要黑了，火車窗外都是橡膠樹林和叢林，到了晚上，外面只看得見無邊無際的雜木叢林。可是到了早上，火車到達吉隆坡之前，我們才了解，我

們正經過一處華人社區，華人聚居的地方我們也很熟悉。同時間，我們更加悲觀的確定，要想吃到好吃的穆斯林餐點，還有見到更多馬來人，希望都很渺茫了。我們看到越來越多的華人和印度人。要跟他們溝通實在挺困難的，因為我們不了解他們。要是碰上了解我們的馬來人，那就容易得多了。那段火車之旅是個震撼，可是還說不上是困擾，因為我們已經先做好心理準備了。但是，那還不是最震撼我們的部分呢。

「之前就我們就對吉隆坡的一些地標建築有些概念了，所以，我們一團人在吉隆坡閒逛也不成問題。可是我們有種感覺，不曉得自己究竟身在何處。我們就像是迷失在巨大的社區當中。每次我們出門走走，街上十個人當中，幾乎找不到一個馬來人。對於這一點，我們也有心理準備。我們就像是處在一個團體裡面，卻跟這個團體搭不上什麼關係。我們就這樣走進一個非穆斯林、非馬來人的社群裡，而那就是我們的困難所在。我們也知道吉隆坡市鎮周遭散布著幾個馬來西亞鄉村社區，可是為了參加比賽，我們只有將就在主辦單位安排的地方。」

夏菲累了。攪動回憶令他疲倦不堪。同時間，他的價值觀中無法連貫之處，也令他苦惱無解，充分流露在他的談話當中，一方面，他緬懷著鄉村生活的純淨無暇；另一方面，他也體認到馬來人的缺點。然而在內心深處，他還是感覺——他知道——兩者之間並無抵觸，毫無疏漏，可是他還是苦於缺乏適當言詞加以說明。

現在是下午一點鐘。時間太晚，夏菲來不及帶我到他兄弟家裡作客，這是他原本安排帶我過節的計畫中的一部分。也因為今天的特殊節慶，規模不小的假日飯店一反常態，將星期五的自助午餐從較上層樓層中鏡面牆壁的封閉餐室，移到樓下的咖啡廳來擺設。在平常的星期五（對於非穆斯林與不遵行星期五安息日教規的穆斯林等），飯店會在樓上自助餐室播放音樂，舉辦時裝秀。假日飯店讓夏菲沮喪不安，這個地方如此殊異、浪費，滿坑滿谷的陌生人，沒有信仰，漠然無視於教義規範：我可以從他的眼

神看出來。我們散步經過旁邊的酒吧，即使在大白天，酒吧裡還是黑壓壓的一片。走廊的另一邊，正是「雪蘭莪白蠟」(Selangor Pewter) 的商品櫥窗。這段時間，每家飯店、每家精品店都在展出這種當地生產的室內裝飾品；此外，所有當地的觀光手冊與雜誌也都刊登了這家公司的廣告。

一想到夏菲村子裡撰寫與發行的那些書籍，我就感到驚奇而難以置信，這些相關教規的書就像是出自伊朗的阿亞圖拉們，好比何梅尼和沙里亞特馬達里這些教長之手，他們的著作收藏在追隨者的家中，追隨者會毫不羞赧地向他們傾訴個人最隱密的私事，翻閱書籍，查詢什麼是《可蘭經》與眾所接受的伊斯蘭傳統所允許的，什麼又是觸犯禁忌的。簡單的生活同時也是禁錮嚴格的生活。簡單的生活有各種約束，而每個人都要記取這些規定。

巴基斯坦的基本教義派以為，只要遵循這些規則，就可以重現早期伊斯蘭生活的純淨境界；只要世人重新體認到正信之可貴，自然而然就能重整全球秩序。然而，夏菲的不滿與熱情，在如此多種族組成的馬來西亞就更為激切了；而我感到，於他而言，重新奠定秩序的渴望，同樣也是重建他童年時期安全感的願望，找回他失落的馬來鄉村生活。

諸如此類的缺憾，可以觸動大部分人的心弦。這也是身為個別獨立的個體，對自己負責，我們必須時時遷就的缺憾。可是在夏菲眼中，好像他是古往今來第一個失落樂園的傷心人。他歸咎在整個世界上，他將自己必須遷就的包袱一股腦兒地擲在伊斯蘭教上。

這層領悟，還要捱上一陣子才讓我參透。那天下午，夏菲告辭離去之後，我滿懷著他的情緒。直到晚上，我才到酒吧裡享受飯店附贈的飲料「熱帶氛圍」。「往日情懷」的聒絮噪音已遠；「熱帶氛圍」喝起來有股罐裝鳳梨汁的腥味。稍晚，我在咖啡廳裡——又來了——點了一客蛋餅，味道平平。可是年輕的馬來侍者卻服務周到。我看著他仔細地鋪整著鄰桌的桌面，要把事情做得盡善完美，我心想：「他就像夏菲一樣，我一定要記住這一點。」

二一 勇敢的女孩

我在清晨兩點半醒來，無法重新入睡。前晚，同樣輾轉難眠的夜裡，我下樓到咖啡廳坐坐，卻發現咖啡廳裡空無一人，還飄散著一股化學清潔藥品的刺鼻氣味。於是，這次我就待在自己房間裡。五點鐘一過，我差人送咖啡進來給我。我打了兩次電話才奏效。服務的小弟送咖啡進來時，油頭垢面的，態度還極不友善。奶精餿了，這下子倒盡了我的胃口，卻不曾稍稍饜足我的飢渴。

我拉開窗簾的時候，窗外已經天光透亮，對面路上的賽馬場裡，三兩馬匹已經開始練跑了。當初我選擇投宿假日飯店，就為了欣賞賽馬場的視野及飯店一旁吉隆坡丘巒的美景。每逢星期六、日午后，群眾聚集在馬場的正面大看台上，每隔半小時就高聲叫囂一回，呼聲壓過擴音機播送出來的場邊評論。可是飯店旁的賽馬場上空空如也，不見馬匹，沒有賽事。跑馬比賽在其他地方舉行，此地觀眾面對的是電視轉播，他們齊聚一堂，只為了方便賭錢，因為依據馬來西亞的伊斯蘭法律規定，吉隆坡地區只准在賽馬場進行賭博。現在，賽馬踏步在這有名無實的賽馬場上。一開始，我只看到兩匹馬，接著六匹，然後又陸續增加更多。我端詳著騎師伏在賽馬頸背上的姿態，鋸短的馬蹬鐵，平擺的韁繩。

陰霾多雲的天空，山丘上煙霧騰騰。山谷之間，浮升起皎潔的白雲；山脈之上，一整排一望無垠的灰白色厚重雨雲，緩緩地冉冉上升，雲腳慢慢地散發出毛絮。賽馬場周圍栽種著我自小就十分熟稔的行

道樹：香蕉、雞蛋花，還有一種開著黃花的樹，那是中美洲的薩曼（saman），或曰雨樹，林農將雨樹種在林場四周，作為小苗的庇蔭。

真希望我能夠更敏銳、更能毫無記掛地欣賞眼前的美景。失眠的疲憊轉為焦慮、急躁，酸掉了的牛奶害我喝不成咖啡，房間電話又打不通。當我下樓到飯店大廳時，見到櫃檯上有個女孩在值班。我跟她講起房間電話不通。她跟我比個方向，要我去向電話總機人員申訴。總機辦公室門上嵌著幾個大字：「機房重地，非請勿入。」總機小姐是個馬來女孩，英語並不靈光，面容平凡，戴著一副圓眼鏡。

她忙著搜尋檔案時，我就在一旁閱覽員工通知，通知是以馬來文和英文對照寫成的。其中有一頁通知，看了讓我暗自懊悔，但願自己從未翻到這一頁。「不肖員工」曾於更衣室地板上「便溺與嘔吐」，零售店裡的盤子與玻璃杯也無一倖免。宗教儀式上講求的清潔，與為達成清潔目的的清潔毫不相關，有人絲毫不在意其他人的觀瞻感受。村莊裡自有一套規矩，城鎮中卻無法無天。飯店也有一套規矩，員工應當切實遵守，因為那是飯店經營的規則，而飯店也維繫著一套高標準。可是樓面之下，還是有那麼一兩個馬來人硬是覺得自己可以逾越規矩，典章制度都可以忽視。

噁心欲嘔的感覺還是揮之不去。當我推門走出總機機房時，還暗自幻想著，飯店中浮動著惡臭，這股臭氣還陰魂不散地跟著我，甚至一路跟到赤道飯店，我就在那裡的自助餐廳解決午餐。我在赤道飯店碰到一位舊識。他跟我說，吉隆坡這個城市可不是為了穆斯林人民建設的。穆斯林每天禮拜之前，都得盥洗淨身，所以說，真正的穆斯林一天至少要盥洗五次。他們會盡量遷就利用現成的器皿，利用水槽和水桶洗腳與清潔下體。就這樣，前一天所有因為夏菲講的故事而引發的悸動——今天早晨也是這份悸動將我從睡夢中一腳踹醒——如此悸動，現在整個變了調。

可是，當天下午我再次見到夏菲的時候，感覺上又無啥大礙了。夏菲穿著他日常的辦公服裝，帶了一位朋友來看我。眼前這個男人如此坦誠，如此迷人，我心中的不安揪擾也隨風遠颺。與他同行的朋友，個頭嬌小，身材瘦削，今年三十四歲。那位朋友的父親曾經在村裡擔任毛拉，這位朋友本身則專攻伊斯蘭研究，而且奇怪的是，他的博士學位竟然還是在英國伯明罕拿到的。現在，他同樣也在ABIM高層任職。他曾經在一場意外中摔斷幾顆門牙，也癱了一條腿。而今只要他一開口說話，由於缺牙的緣故，看起來好像無時不帶著笑容。

我說：「你們參加這個運動的人怎麼都這麼年輕呢？」

那個朋友帶著微笑回答道：「我們的父母親都是很單純的人。他們之中，百分之九十五沒上過大學。我們上一輩上過大學的人，不過是在大學裡學個一技之長，侍候他們的殖民地主子。」

他就跟夏菲一樣坦率。前一天，我對夏菲的同情又全數回流了。

我說：「可是你就跟夏菲一樣，一點都不打算隱瞞任何事情。」

夏菲說：「我們有什麼值得隱瞞迴護的？我們根本就一無所有。」

我說：「夏菲，昨天早上當我問你，你對游泳池畔的那些白種人作何感想時，那是你第一次想到諸如此類的事情嗎？」

「那確實是我第一次想到這些事情。」

「可是，怎麼會這樣呢？這些人一直在你的周遭。現在在這間咖啡廳裡，他們就在我們左右。」

夏菲說：「我從來都不會去看那些人。」

他的話中有兩層意義：一則是說，他一直沒有機會與白種人見面晤談；二則是，每當他看到白種人，他對他們總是視若無睹。

他們兩人落坐至此，都不曾動用我替他們點的雞蛋三明治。他們要等我先開動。我據案大嚼了，可是即便如此，雖說夏菲的朋友還沒吃午餐，他們還是只是在嘴裡細細嚙咬。原來，他們讓我幫他們點三明治，只是出於客套。在一個像是假日飯店這類的場所，他們總是臨淵履薄般，生怕吃不到不合穆斯林教

義的食物。

他們離去時，為了避開飯店大門的階梯，夏菲扶持著他的朋友，改走另外一邊運送行李的地毯斜坡道。夏菲站在那個異常矮小又癩了左腿的男人身旁，突然間拉長了他的身型，他顯得極具保護威力。我聯想到貝札德跟他跛足的女朋友，兩人在德黑蘭車站月台上的情景：革命同志，眼前雖不引人注意，卻意識到自己肩負的真理及潛在的危險。

女人是焦慮來源

夏菲答應要帶我前往拜訪 A B I M，同時找幾位「勇敢的女孩」，她們應該會願意跟我對談。前天，他就是帶著他的朋友過來預先審查我的。顯然，審查通過，他的朋友也不表異議；第二天清早，夏菲就開著他的車子過來接我了。

我們驅車走在這樣一座川流不息、五光十色的現代城市中，商店市招上書寫著中文、英文與馬來文；想到困坐在車陣中，汽車廢氣與路面熱氣共舞；想到夏菲坐在他的車子裡，跟馬路上其他的司機一同進退不得（這個男孩，村子裡的學校，遠在遙遠的東北區域，教室是泥土地面，一下雨就氾濫成災）；我問他，吉隆坡這個城市還是令他咋舌，感覺還是像個異鄉國度嗎？

他說，吉隆坡不再像過去那般震撼了。可是每當他回到村子探親，他反而變成陌生了。他的意思是名符其實的陌生人。村子裡的房屋都翻新改建了，以前的鄉親都搬家了，他不再認識村子裡的每個人了。村子不再是屬於他的村子，不再像過去那樣。

學校位於一棟 A B I M 遠離市中心的三層樓建築中，我在校舍裡遇到一個中年澳洲人，身材高大，戴著眼鏡與一頂無邊便帽，獨自落坐一旁，顯然無所事事。夏菲說，那人一心想要研習伊斯蘭教。我在學校裡遇見一群年輕而忙碌的馬來男人，我開始確認這些人的類型：這些出身田莊的青年，他們的面孔，初見時面無表情，臉上甚至還帶著一絲懷疑，經過夏菲介紹我們此行來訪目的之後，才燦然開朗，滿臉堆笑，掩埋在陰沉冷峻的外表下：舊式的禮儀，老套的村莊禮數。

總書記就沒這麼容易親近了。夏菲一介紹過我，他馬上就開口說了，近兩三百年以來，隨著全球工業化的進展，世人道德直線衰敗。他談吐之間，就像個即將出手矯正全球的聖人一樣。他帶著主管人物的神情，手上握著幾份卷宗。

夏菲另有公務，他將我交由納薩先生帶領。再一次，就跟許多其他人一樣，納薩也是個小個子，令人無法不注意到的還是他身子骨之虛弱。約莫一百年前，歐洲人駕著巡岸汽船，一個登陸站接著一個登陸站地移動，接著英國人登岸拓殖造林地，華人也過來打天下，沿著叢林邊緣建立起粗獷的屯墾聚落，作為行政市鎮。納薩的祖先是一位施克（Sicki），伊斯蘭教國家，尤指阿拉伯國家酋長或是族長），這位馬來人一度長住阿拉伯半島，還帶領著許多馬來人前往麥加朝聖。

這位施克回到馬來西亞與他的村莊——村莊不過離現在的吉隆坡市區六哩遠——生了一個兒子。這個兒子，也就是納薩的曾祖父，十二歲那年就定親了。一九三四年，這位曾祖父在他耄耋之年，還創辦了第一份馬來語的報紙。他想要振奮整個馬來西亞，警告他的同胞，一定要為自己的生存奮鬥。可是誰都把他的話當耳邊風，甚至連他的兒子也不例外。納薩的祖父，原先是個宗教教師，後來他嫌教書收入過於微薄，改行務農，種了七英畝的稻田。種稻農夫的兒子，日後在政府機關任職，成為林業署的一名官員。他就是納薩的父親。這個家族就這樣，一度在阿拉伯受教育，也曾經居於同族社群的領導地位，可是在現代化了的馬來西亞，不知怎地，就是淪落到「中等偏低階級家庭」。

納薩自己在本地接受過基礎教育之後，也負笈英國留學，去到布拉福（Bradford）修了個研究國際關係的學位。他理解到，全球各大強權無意追求和平，他們只在乎各自劃分勢力範圍，他們兜售武器。

而英國人在布拉福的生活方式也讓他看不順眼。

「他們太過分強調個人主義了。我住在布拉福的時候，英國人總是問我，『你怎麼都不去酒館或是迪斯科舞廳晃晃呢？』他們想要跟外面人聚在一起，疏離自己的家人。他們完全是自己科技的產物。馬來西亞的現代化要是不趕快打住的話，就會重蹈覆轍，掉進西方人的老路子。我們可以接受科技，可是不能影響到社會結構的基礎。男女隨便混雜、喝酒，都潛伏著極大的危險。尤其是男女隨便交往。家庭幸福的基礎就建立在相互信任之上。阿拉創造男人和女人，就為了男大當婚、女大當嫁，依照妥當的步驟成家，生育教養子女。我們一定要極力避免男女自由交往。最後，我們在這裡建校宗旨之一，就是為男孩與女孩分別設置男校與女校。我們相信當今社會失業率這麼高，婦女解放運動就是罪魁禍首。」

女人，家庭，她們撩動這些纖瘦的男人心底無限的焦慮。這些男人剛剛崛起，或許除了他們肢體的衰弱外，還感受另外一層憂心吧。我跟夏菲首次對話即將結束時，他曾經說：「女孩子從鄉下來到吉隆坡的時候，她們不喜歡受到法律的保護。」

與馬來女孩的晤談

男人趕在中午十二點三十分前往清真寺進行星期五的禮拜。在他們出發前，就在辦公人員全都離開、即將關燈鎖門之際，夏菲幫我介紹了幾個他先前承諾的勇敢女孩。

我們一同坐在遠眺高速公路的前廳裡。前廳其實像一間倉庫，毫無秩序，桌上堆著還沒開封飲用過的牛奶咖啡杯，還有許多卷宗與出版品；桌旁一張辦公椅還缺了個腳輪，傾斜在一邊。兩具空調機組運轉的聲音模糊了屋外車流的噪音。

女孩各有不同的種族類型。一位身材纖瘦，皮膚棕黑；另外一位則白皙豐腴，臉蛋圓圓。棕膚女孩

裹著一條薄薄的黑色棉布頭巾，頭巾皺巴巴的，看起來鬆鬆垮垮；她散發出一股青少年特有的邋邋氣質，委實迷人可愛。她們兩人都圍著頭巾，穿著長衫。圓臉女孩穿著比較整齊，頭上緊緊的綁了條白色的帕子，白色帕子之上又安上一條粉紅色的頭巾，再用別針別在她的下巴下面。

她們兩人都有些緊張。兩人已經在 A B I M 學校裡入學兩年了，而她們選擇這所學校，也是因為課業成績不夠好，進不了政府開設的學校。現在，她們都已經念到學校的最高階級了。

我問起她們頭上的裝飾，這種裝扮令我聯想起德黑蘭的婦女。她們教我「頭巾」用馬來語該怎麼講：圖—東（tu-dong）。

戴著黑色圖—東的女孩說：「我們一定要紮頭巾。」

頭上白色、粉紅色相間圖—東紮得緊致的女孩說：「一根頭髮都不可以露出來。」

我對著裹著黑色頭巾的女孩說：「可是你有些頭髮就露了出來。」其實，她有大把頭髮露在頭巾之外。

她咯咯傻笑，孩子氣十足。

我說：「為什麼頭髮一定要統統遮起來呢？」

戴著黑色頭巾的女孩說：「頭髮，你也知道——」然後，她又咯咯笑了起來，好不容易她壓住自己的笑意，鎮定說道：「有些女孩子的頭髮很漂亮，頭髮有的時候會讓男人對她們色眯眯的。」

她用馬來語跟戴著粉紅頭巾的女孩咬了咬耳朵，粉紅頭巾女孩轉身就離開房間。

我說：「那樣不好嗎？是對女孩子不好？還是對男人不好？」

「對男生和女生都不好。對女孩子不好，是因為故意吸引男生是一種罪過。」

戴著粉紅頭巾的女孩回來了。她說：「頭髮就是歐拉（aurat）。」

「歐拉？」

「就是不能露在外面的東西。」

接著，她們就像是二重唱一樣地說著，採取正確的姿態。戴著粉紅頭巾的女孩說：「女孩子只能露出臉來。」戴著黑色頭巾的女孩說：「還有手腕以下的手掌。」

「那麼腳呢？」

「腳？」戴著黑色頭巾的女孩說。「我想腳應該沒問題吧。我想腳不是歐拉。」她一雙腳丫在她的棉布長衫下還是清楚可見，長衫就跟她的頭巾一樣皺縮；而她腳上也穿著一雙相當纖巧而漂亮的高跟鞋，繫著鞋帶，還釘著釦子。

戴著粉紅頭巾的女孩說：「腳也是歐拉。」

兩個女孩再用馬來語相互交談一陣子，粉紅頭巾女孩又跑了出去。

戴著黑色頭巾的女孩說：「進這個學校兩年，其實只是一段很短的時間，因為我們要學的東西還多著呢。」然後好像為了弭平先前她因為無法確定女人的腳的屬性所漏的氣，於是就用手手指指著自己，向下比一比說：「男人從腰以下到膝蓋都是歐拉。」

粉紅頭巾女孩回來了，嘴裡嚷著：「腳也是歐拉。」

（外面究竟坐著什麼人？誰能夠提供女孩這一切答案？難道會是那個澳洲人嗎？）

黑色頭巾女孩說：「有些女孩連她們的臉都會遮起來。我們學校裡就有很多人將臉蒙起來。雖然那並不是絕對需要的。」

「她們為什麼要蒙臉呢？」

粉紅頭巾女孩說：「或許是她們知道的比較多吧。」

黑色頭巾女孩微笑著，她現在比我們剛開始談話時要輕鬆多了，彷彿對自己所知甚少感到挺愉快的。

她的朋友豐腴而整潔，整體看起來穩重多了。她說：「這些哲學的主要目標，就是要保存女性的美麗與溫柔。我們可以保守住我們的美。這種美不應該拿出來炫耀。那是很不好的。」

「那樣有什麼不好嗎？」

現在在我的感覺上，黑色頭巾女孩是比較輕浮的一位，她開口說道：「我只知道那樣很不好。」她開懷笑著，「我知道，可是我說不上為什麼。」

「你會想要把臉也蒙起來嗎？」

「或許有一天吧。等我們知道的更多一些。」

「而且，等我們也覺得有必要的時候。」粉紅頭巾女孩在一旁補充道。

「你們還要再學習些什麼嗎？畢竟你們在這裡已經待上兩年了。」

黑色頭巾女孩說：「要學的東西還多著呢。」

粉紅頭巾女孩說：「我們還不會阿拉伯文。」

「所以說，你們也不了解自己在念些什麼祈禱文嗎？」

「我們懂得祈禱文。可是《可蘭經》是用阿拉伯文寫成的，我們希望能用阿拉伯文來讀《可蘭經》。」

「假如，妳們考得進政府辦的學校的話，會不會想要在政府的學校裡呢？」

裹著黑色頭巾的女孩點了點頭。

戴著粉紅頭巾的女孩以她一貫豐腴、矜持的方式說：「現在，政府辦的學校，教育系統比較傾向學術研究。」

「科學，」黑色頭巾的女孩補充道，這時，她顯然對公立學校頗不以為然。「科學。科技。要想找一份好的工作，或是高水準的生活，你一定得通過各種考試才進得了大學。他們在學校裡其實不太教導這種宗教。女孩子都不禮拜。她們都忘了該怎麼禮拜。可是，你一定要禮拜的。」

「你會跟那些女孩說，她們將來會下地獄嗎？」

「才不呢，」戴著粉紅頭巾的女孩說：「我們絕對不會這麼講的。我們一定要溫柔的對待她們，跟她們講話也要輕聲細語的。」

「你會為她們感到很遺憾嗎？」

「當然會囉。」黑色頭巾女孩說道。

「想要找份好的工作，這樣不好嗎？」

「那樣不是不好，」粉紅頭巾女孩說，「可是，我們在生活中不能永遠追求著物質的東西。因為在我們死後，還有來生。所以我們在生活中，一定要在俗世的生命與死後的生命之間取得平衡。」

我對著黑色頭巾女孩——她腳上還蹬雙高跟鞋——說：「你們現在還這麼年輕就想到死亡，不嫌太早了點嗎？」

粉紅頭巾女孩代替她回答。她莊嚴隆重地說道：「生死不過就在剎那之間，我們隨時都會死的。」

「死了以後，你想上天堂嗎？」

「當然囉。我們在天堂裡都是跟好人在一起。不只是跟好人在一起，我們還會跟我們的先知在一起。你聽說過我們的先知嗎？天堂裡只有真善美。我沒辦法告訴你，天堂究竟有多好。我們的真主向我們保證過，人世間的東西跟天堂是沒得比的。」

「你找出時間讀書嗎？」

粉紅頭巾女孩說：「當然，我們都要讀書。」

黑色頭巾女孩插嘴說：「我們要讀的東西可多了。」語氣中略顯抱怨。

「你最近讀的是什麼書呢？」

繫著粉紅頭巾的女孩回答：「《遠離塵囂》(Far from the Madding Crowd)。」

「那是學校的教科書。我的意思不是問學校的書。我的意思是，你們會不會讀一些自己想看的書，是因為有興趣才看的書。」

黑色頭巾女孩說：「現在課業這麼重，最近都沒讀什麼課外書了。我想不出來。」

粉紅頭巾女孩則說：「我們也讀過芭芭拉·卡德蘭、輪椅神探。」

黑色頭巾女孩湊上一句說：「詹姆斯·哈德利·蔡斯。」彷彿她突然想起來了。

粉紅頭巾女孩又補充了一位作家：「丹妮斯·羅賓斯(Denise Robins)。」她圓圓的臉蛋逐漸容光煥發，就像她在形容天堂何等美好時一樣。

「那麼哈洛·羅賓斯呢？」

黑色頭巾女孩說：「我不喜歡哈洛·羅賓斯，所以就沒有繼續看下去了。」

她咯咯傻笑。粉紅頭巾女孩臉上浮出微笑。

「為什麼你沒繼續看下去呢？」

黑色頭巾女孩說：「我沒法子跟你說。我只能跟你翻譯我們馬來語說的方式：我們說，『那種書很髒。』」

「芭芭拉·卡德蘭和丹妮斯·羅賓斯又怎麼樣呢？她們的書也髒嗎？」

「才不呢！」粉紅頭巾女孩說道，語氣柔和了不少。「她們的書不髒。」接著又帶著點奇妙的拘謹

1 芭芭拉·卡德蘭(Barbara Cartland)：英國知名的羅曼史作家，一九二三年以處女作《鑲花裙》一鳴驚人，至二〇〇〇年五月香消玉殞，七十七年間，共計出版七百本羅曼史，堪稱史無前例，也被她的書迷暱稱為「玫瑰夫人」。卡德蘭拒絕在羅曼史中書寫露骨情慾，自稱從不在書中描寫性行為，因為那樣會讓本來沒有陷入性迷思的讀者想入非非。她只寫純粹的神話，使讀者自書中那些風流個體、儀表出眾，還有不可思議的殷勤態度的男人身上得到滿足。

說：「她們的書是寫給年輕少女看的。」

「可是，難道她們書裡的人物跟你們不是天差地遠嗎？她們都是英國人、歐洲人、白種人，而且多半都是基督教徒。」

粉紅頭巾女孩說道——我開始探測到隱藏在她莊嚴堅定的外表下，少女性格的另一面了：「我看這些書也只為了打發時間而已。」

黑色頭巾女孩說：「我們的老師規定我們要看的。」

「幫助我們英文進步。」粉紅頭巾女孩說。

我說：「米爾思出版的書，你們在這裡也買得到嗎？」

這些小本平裝的輕量級羅曼史小說，不管作者是誰，外界統而以其英國出版公司名稱稱之，在大英國協各地都廣為銷售。這些小說滿足了一般初來乍到、剛剛接觸到教育體系與城市生活的學生與民眾的想像需要，這些書以摩登的方式，指導現代人如何處理情感，讀者群甚至廣羅大學學生，甚至連男人也可以開卷有益。

「米爾思！」粉紅頭巾女孩柔柔地輕呼一聲，語氣再度軟化，有如回憶起某些特別甜美的珍饈。

「那些書為什麼就那麼好看呢？」

粉紅頭巾女孩再度恢復嚴肅認真的神情，說：「在我們讀這些書的時候，書中的愛情非常美好，因為那都是假的。」

「你的意思說，你不會指望諸如此類的事情發生在你身上？」

「不。」

「可是這樣子的話，那還有什麼趣味呢？」

「我們只是一面讀，一面想像他們的生活有多愜意。」

「愜意？」

「他們都很有錢，」粉紅頭巾女孩說道，「他們都住在大房子裡，開著大車子。」接著，她的語音轉得柔柔潤潤地說：「而且，他們還彼此相愛。」

「相愛？難道你們結婚也完全要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嗎？」

「喔，不！我們才不來那一套呢。」

大房子、大車子，難道這些伊斯蘭小鴨，雖說白天學習規矩，懷想著天堂，卻已經偷偷地蛻變為都市裡的天鵝了嗎？

我說：「你會想要回到鄉下生活嗎？我跟幾個人聊過，他們都說，鄉村生活是最棒的生活方式。」

「不，」黑色頭巾女孩說：「我想要留在這裡生活。」

粉紅頭巾女孩再度堅毅內斂起來，實在是訓練有素，說道：「鄉村生活比較平靜。我會回到鄉下定居的。」

黑色頭巾女孩似乎臨時改變主意，她說：「沒錯，鄉村生活是比較幽靜。」接著，她的心緒好像又拐了一個彎：「可是我還是想要留在大城市裡，因為所有的事情都發生在城市裡。」

粉紅頭巾女孩充滿情感地說：「鄉村裡要平靜得多了。」

黑色頭巾女孩現在就像是突然認知道自己內心的意願，也找到如何宣洩出口的方式一樣，侃侃說道：「我會想要待在都市裡，因為所有的宗教活動都是集中在都市裡。」

我為了進一步激發她們對話，就說道：「可是都市裡有那麼多外來人士。」

「沒錯，」黑色頭巾女孩應道，她的反應又快又堅定，「我們有太多移民了。」馬來人用「移民」一詞，泛指所有非馬來裔的馬來西亞國民，其中又以華人為大宗；非馬來裔馬人也嚴詞拒斥這個標籤，宣稱他們也在馬來西亞落地生根超過一個世紀了。「移民為我們帶來太多麻煩了。他們都是英國人帶進來

的。英國人還引進英國的制度和體系。在英國人進來以前，馬來西亞都是伊斯蘭的系統。」

原先我還以為黑色頭巾女孩——她邋邋不整的圖——東、她的高跟鞋與她對清規戒律有欠掌握——要比粉紅頭巾女孩輕浮膚淺。現在我看出來了，在政治與種族議題方面，她可比粉紅頭巾女孩要激進多了。接著，她一人侃侃而談，粉紅頭巾女孩有耳無嘴，靜靜聽著，臉上掛著不褪的微笑。

黑色頭巾女孩說道：「華人只想寡占我們的經濟。他們很會做生意。我們落在他們後頭。他們會說那是因為馬來人懶惰，但那是假話。我們都知道那是假話，可是聽在耳裡還是挺傷人的。假如沒有這些華人，我們一樣也可以把生意做得很好。只要你翻開歷史，在麻六甲王國蘇丹掌權時期，大家都知道我們馬來人也是世界頂尖的生意人。」²

「為什麼你對華人這麼忌憚呢？」

「華人還可以回到中國去，印度人可以回到印度，而我們只有馬來西亞。」

「難道你們不能遷居到印尼或是其他島嶼嗎？」

她扮了個鬼臉，年輕豐潤的額頭擠出幾條皺紋。「印尼到處都是基督徒，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我問那個黑色頭巾女孩：「難道你不是在吉隆坡出生的嗎？」

沒錯，她確實出生在吉隆坡，可是她的家人是從印尼爪哇遷居到馬來西亞的。她說：「好久好久以前。」

粉紅頭巾女孩補充道：「大戰之前就搬來了。」

所以說，這個黑色頭巾女孩，或者說，她的家族，是在英國殖民統治期間來到馬來西亞的。她是印尼人，也就是說，她在種族上與馬來人十分接近，而她又是一個穆斯林。四十年過後，她可以將自己認定為馬來西亞人。可是經過一百多年，華人胼手胝足建立起她的國家，卻還是外國移民。

前廳後面的辦公室還是漆黑一片，教職人員還在清真寺禮拜。兩個女孩伴著我，送我出校，走到馬

路上。粉紅頭巾女孩陪著我走過車流無間的馬路，一直等到我招了輛計程車；黑色頭巾女孩則留在馬路的另一邊，傍著校門站著，現在，陰柔誘惑的意念又縈繞在她的周遭，她面帶微笑，偶爾含蓄地揮揮手，對我頗為友善，而我，不過也只是個外來人士，她卻洋溢著錯綜複雜的激情。她頭上鬆鬆垮垮，繫得不熟練的圖——東並未完全遮掩住她的頭髮；而就在她麵粉袋一般的茶褐色長裙下——掌握住伊斯蘭教得素樸儉約，也象徵著她的侵略性——她腳上蹬著精巧漂亮的高跟鞋，繫著鞋帶，釘著釦子。

歸化馬來，即需皈依穆斯林——新國家的法規上如此明文要求。可是，晉身馬來，不也意味著否定如此宏大富庶的英國——華人大都市，而凡事萬物不都輻輳匯集在都市裡嗎？金錢流向熱帶土地上的森林、河川與村莊，可是金錢同時也製造了新型的狂熱與挫折。

2 麻六甲王國，建國於西元一四〇五年，結束於一五一一年，首都為麻六甲，是馬來西亞歷史上第一個信奉伊斯蘭教的封建王國。根據《馬來紀年》記載，約在公元十四世紀末，室利佛逝巨港王子拜里迷蘇刺，因受爪哇麻喏巴歇的進攻，逃到當時受暹羅控制的單馬錫（今新加坡），隨即自立為王，後來再度遭到爪哇攻擊，拜里迷蘇刺遂率領少數隨從逃到麻六甲。麻六甲居民原信奉印度教，一四一四年，拜里迷蘇刺國王開始改信伊斯蘭教。第四位國王統治期間（一四四五年至一四五九年）對內宣布以伊斯蘭教為國教，始稱蘇丹；十五世紀中葉，麻六甲已成為東西方的貿易集散地之一。印度人、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用商船運來棉花、染料和香料藥品，中國商船又帶去絲綢、錦緞、布疋、盜器等貨物。第六位國王於一四八八年去世後，王國開始衰落。第七位國王年幼繼位，皇室內部爭權奪利的鬥爭越演越烈。一五一一年葡萄牙殖民者占領麻六甲。從此開始葡萄牙在麻六甲的殖民統治。

三 麻六甲與雲頂高原之間

這片土地何其富饒，豪雨、高溫與河川，沃土阡野，生機盎然，香蕉、稻米、椰樹、橡膠，莫不欣欣向榮。橡膠樹下，雜草叢生；素來避暑猶恐不及的放牧牛群，卻在草原上覓得清涼庇蔭。城鎮中令人難耐的暑熱，置身鄉間就宜人多了。豐沛水氣與熾熱陽光激發植物生長，綠樹遮蔭，調節熱氣；不論是因為開路還是新闢建地而挖掘曝現的紅土地面，綠色植被總能迅速恢復覆蓋。馬來村莊總在咫尺不遠之處，小小的花園，房舍屋脊高聳，原木紮排的矮牆。而幾無例外的是，興建於殖民時期的小鎮，華人的聚落，混凝土與鑄鐵建構的兩層樓店舖住宅，樓下店面內退到走廊之內，走廊上則頂著樓上住家。建築物年代若不是漆在住商兩用宅上，就是用混凝土鑄成的數字凸嵌在門楣上——這些日期都相當晚近，許多都是一九三〇年代遷入的；這片殖民地開發得頗晚。

某個星期六，我從吉隆坡南下麻六甲的車程中，沿途飽覽如此景致。我到麻六甲主要是受到「麻六甲」這個歷史名詞的驅策：麻六甲海峽、麻六甲甘蔗、麻六甲胡椒等等。

市鎮中心一座漆成紅色的教堂興建於一七五三年；一處頹圯的古舊歐洲碉堡門徑旁邊，蓋了一座博物館。可是除此之外，歷史似乎已經蒸發在炎夏熱氣之中。退潮時，海岸平坦寬闊，綿軟的黑泥一望無際；城鎮下水道裡的廢水泉湧至此，黑泥上點點密布著小螃蟹的洞穴，兩棲動物爬行的足跡，曲身跳躍

的小鯉魚，以及某種黑色的有鱗小動物扭動身子前行的痕跡，也都清晰可循。

船隻在遠處下錨。一列平底駁船，每艘船上都站著個打著赤膊，腰身圍著裙布的馬來人，掌著直舵柄，一整列駁船正拖曳進入通往市鎮的運河。運河其實是條不加蓋的大陰溝，河水不棕不黑，反而泛著灰色的水光，兩岸倉庫與建於晚近殖民時期的屋舍櫛比鱗次。

此地經歐洲人殖民的過往，其實比表相所顯示的來得早遠。麻六甲戍守著通往東印度地區香料群島的航道，這個據點一度為兵家必爭之地；葡萄牙人於一五一一年征服麻六甲（自里斯本啟航，經過七個月的航程），八年之後，地球另外一端的柯帝茲揮軍直入墨西哥，二十二年後，皮薩羅抵達了秘魯¹。而今，這些歷史遺跡已經難以捕捉了；更難以領會的是，葡萄牙人與西方人不過是在伊斯蘭教入主馬來西亞不久之後到來的。

西方，歷經多次叛變，至今歷久彌新，不斷刺激創新，不斷引發干擾，即使在當下，猶仍如此。伊斯蘭教則停留在遠古時期，逐漸融合在某種隔閡在世界之外——套句夏菲即將賜教於我的話：「平庸」的馬來鄉村生活。

「平庸」的鄉村生活

夏菲心中切切待念著相關平庸的話題，他迫切思念的馬來鄉村生活，與他一心亟待馬來人能夠獨立自主的渴望，兩者之間彼此抵觸。他跟我在電話中談到這一點，他的話語表達了他的憂心忡忡。

而就在星期天上午，當我向他提起在我南下麻六甲旅途中的沿路景致，馬來西亞國土之富饒多產，為我今生僅見，他回應道：「隨便你撒顆種子在這裡，都會長得起來。」說著，他隨手做了個揮灑的動作，播種在假日飯店的游泳池裡。「就算你只是將空鉤丟進河裡，都會有魚上鉤。或許，這就是為什麼

馬來人平庸的原因吧。他們就住在河邊，這樣當然就提供了他們吃不完的魚，肥沃的土壤可以闢做稻田，水上船隻通行無阻。華人出身四季分明的母國，跟他們比起來，馬來西亞的人日子實在太好過了。」

他出門前，心中已經事先擬好一些有關鄉村生活自給自足的思維，所以，他想要先談談這個主題。

「我們是個組織嚴密的社區，所以我們對於外面的世界所知也非常有限。你曾經問過我，我們為什麼沒有科技人才或是專業人士呢？其實，我們有我們自己的專業人才，可以符合我們自己的需要，建築工匠本身就是建築師，他們可以依照客戶的要求在心中畫出設計圖，再本著他們的技能將圖面轉為實物。我們沒有醫生，可是我們社區裡還是有進行傳統醫療的大夫。就我記憶所及，我們村子裡還從來沒發生過需要緊急動手術的慢性病例過。」

他說完這段話之後，我們又回頭談起他的生活與志業。他在一九六三年隨同學校的童子軍，首度遠赴吉隆坡，其震撼效應，至今不減。可是兩年之後，當他再度前往吉隆坡時，心理調適就自在多了。

「我變得比較習慣都市，膽子也大多了。我是跟著一名老先生，他是我們家的一位遠親一塊兒來的，我們在吉隆坡待了十天，輪流住宿在各個親戚家裡。我們待在市郊的馬來鄉村，也跟家境比較現代化的親戚同住。怎麼說我膽子也大了起來呢？我可以給你舉個例子。我搭了一輛計程車去博物館，回家的時候走了好一段路之後，我突然怎麼也搞不清楚方向，於是我又招了一輛計程車載我回家。」

「那怎麼能說你膽子大了起來呢？畢竟當時你都十七歲了。」

「當時除非有個家裡認識的親人領著，我父母親還不准我去吉隆坡呢。而且像我這樣，以這種方式

1 皮薩羅 (Francisco Pizarro)：西班牙冒險家，也是秘魯印加帝國的征服者，一四七五～一五四一。皮氏曾於一五一三年參加巴爾沃亞 (Balboa，另一位西班牙冒險家) 所領導的探險隊，航行太平洋，一五三一年率隊征服秘魯，一五三三年擒獲並處死印加皇帝。

離開鄉村來到吉隆坡的人還不多呢。他們也不是擔驚受怕。吉隆坡或許嚇著了他們，或許沒有。總之，他們到了吉隆坡就無所事事了。

「所以，一九六六年我到吉隆坡的學院念書，接受大學預校教育時，都市就嚇不著我了。我那個時候十九歲。學校裡所有的學長都在吉隆坡念過書。我住在由學生管理的學生宿舍裡。一九六八年我進了技術學院，從那個時候開始，我才逐漸對學生政治感到興趣。也就在那個時候，我才接觸到安華·依布拉欣。當時我二十一歲，他也二十一歲。」

「那個時候，你也跟女孩子交往嗎？」

「你所謂交往，指的是什麼意思？你知道嗎？有時候我也會喜歡上某個女生，偏偏我中意的女孩跟她家人同住，要約她出來簡直難如登天。因此，要是我約別的女生出來，就是對她不忠實。她是我們的遠親。我們是青梅竹馬。從小時候我們還住在村子裡時，家人聚會團圓的時候就認識的了。」

「一九六九年那一年，吉隆坡發生許多政治滋擾，馬來人與華人之間的種族暴動。當時我已經成為學生運動的領袖，有幾個朋友邀我一同前往某個群眾集會的示威活動，結果我沒去。我有種感覺，當天會發生一些政治滋擾。那是一場馬來人對抗華人的示威活動。」

「你對華人也懷有強烈的厭惡感嗎？」

「沒錯。我得老實說，我從小就生長在厭惡華人的氣氛之下。那是種宗教上的禁忌。可是在吉隆坡，那種厭惡的感覺又不一樣了。那是不同民族之間的政治傾軋。示威當天傍晚七點，我正在大學宿舍裡，聽見收音機裡宣布吉隆坡全面戒嚴宵禁。宵禁令讓我有充分的理由不去參加示威。我的第六感沒錯。我當下立即安排了群體的安全措施，讓學生用餐，維持平和秩序。宿舍裡已經沒有其他學生領袖了，於是我歪打正著地晉身領袖位階。這些暴動過後，我們跟安華·依布拉欣還有其他幾個穆斯林學生組織會面，我們開始討論民族主義與伊斯蘭教。我的運動生涯就是這麼開始的。」

「你在念書的時候，從來就沒對這種信仰產生過懷疑嗎？」

「沒有。我只對體系與制度有所懷疑。人為什麼一定要結婚？我甚至提議，適婚男女應該進行契約婚姻。契約的意義在於，倘若你想要傳宗接代，就去找個人簽約結婚，雙方都了解，當孩子呱呱墜地之時，契約也就截止失效了。那算是我的狂野想法，也是我曾經幻想過的少數幾個白日夢。」

「你的契約婚姻也適用在你傾慕的那個女孩身上嗎？她是怎麼回應的？」

「我喜歡的那個女孩沒有對我回應。我從學院畢業以後，就在一個青年組織裡工作。四年過後，我就去了美國。」

這倒新鮮了。之前夏菲談及的種種見聞，從來沒提起他曾經出國的經歷。

「我聽說美國和馬來西亞之間有些青年工作者交流的計畫，就去找美國大使館的文化官員。剛開始，他說名額都已經填滿了，可是過了一個月後，他又回來找我，提供我前往美國交流的機會。」

「美國是個大震撼。可是我們在行前就先接獲一些文獻說明，告訴我們應該有什麼心理準備。可是一到紐約的甘迺迪機場，我們接收到的第一個震撼卻是生理上的不適應，時區調適的問題。馬來西亞比美國早一天，我們的身心狀態還是停留在出發當天的時間。我事先就預期甘迺迪機場面積碩大無比，機械事物率皆新穎神奇，所以我也不覺得不可思議。我從飛機上鳥瞰下去，看到鄰近海灘地區，美侖美奐的居家住宅，心想，好美啊。接著到了旅館，不出我所料，我跟一個非洲人同房。」

「那也不出你所料？」

「跟非洲人同房並沒有出我意料之外，因為我是交流計畫裡唯一的馬來西亞人。」可是從夏菲強調他跟非洲人（在他的敘述中，沒名沒姓）同房的語氣當中，我感覺到，經過長途飛行與生理時鐘的震撼，他的美國經驗令他悸動不安。「我懷疑，安排一個非洲人跟我住在一起，是計畫主辦單位故意的，他們想要讓背景相近、彼此熟稔的人歸聚在一起。我料想，這個計畫一定是或多或少的種族隔離措施。」

我也不會因此而不悅。我心想，他們不過就是對我們一概而論，非洲人跟馬來西亞人，我們都是來自未開發國家——我們的文明程度相當，假如你要這麼講的話。

「我們吃的東西全是西式的。我身為穆斯林，實在無法開懷享用，因為我總是擔心餐點是不是以穆斯林的方式烹煮。我們到了美國的第二天晚上，交流計畫主任竟然帶我去看一齣限制級的電影。我感覺到我在美國所要面對的大部分經驗，都不屬於我的——」他停頓了一會兒，搜索著適當的字眼：「文化範疇之內，這些經驗對都很陌生，不論任何事情，美國人說可以的，在我們馬來西亞都是不可以的；而只要是美國人說不可以的，在我們馬來西亞都是可以的。科技上的發展、物質發展，都是我預料得到的。這些東西，你在任何地方都買得到。」

「任何地方都買得到？」這種看待已開發世界的觀點，令我好奇不已，好像科技文明是種自然生成的東西，隨處都可以落地生根；就跟富於創造力與缺乏創造力，無信仰與虔誠篤信一樣，都不過是人類命中注定的某些區隔。

「後來當我在曼谷、香港、東京路過停留時，我看這些大都市都差不多——高聳的建築、穿梭忙碌的人群、現代科技等等。我就是找不到一個跟我一樣有著相同宗教背景的人。」

「這一點為什麼會讓你驚訝呢？你去的是一個外國。一個大國家，一個重要國家。難道你對這個國家即將展現的一切都絲毫不感興趣嗎？」

「他們有些什麼好展現的，我一點也沒興趣。可是我不斷地在問，為什麼？為什麼像這樣一個國家，經濟發展得那麼先進，卻沒有時間坐下來，靜靜思索一下宇宙闢創的問題。那些非穆斯林、那些不相信造物主的大能的人，竟然連一點坐下來想想這個造物主的時間也沒有。稍後，我在芝加哥跟幾個猶太人、幾個黑人、還有幾個美國人談過伊斯蘭教。跟他們信的TM——超覺靜坐，比起來，我的簡短說明是挺吸引他們的。」

「你對其他宗教了解多少？」

「各種宗教，我拉拉雜雜的也讀了不少。可是以我們有限的腦力，你能思考多少有關宇宙的事情？」

「你會不會覺得你將自己誇張太過，過分輕率地看低別人了？」

「假如有人知道自己來自何方，去向何處，你就可以說這個人是個文明人。假如有人終其一生都在研究宇宙，到後來開始膜拜星座，卻還是不知道自己來自何方，去向何處，要說這人是受過教育的文明人，我可礙難同意。他們根本找不到答案。」

「夏菲，難道你認為自己胸有成竹，你已經找到答案了嗎？」

「我想沒錯。」

「再多跟我講一些你在美國過的生活吧。」

「在我離開吉隆坡之前，有個記者問我，到了美國，我想做些什麼。我跟他說，我想要研究現代世界當中所有文明——或是所謂文明人——制定的政策，作為我們的前車之鑑，這樣子，我們便不會困在他們犯過的錯誤當中。」

「你的意思是說，馬來西亞有著高度文明，而他們沒有嗎？」

「在我們這裡，文明不單指物質發展而已。文明在於我們能夠開發人的潛能，每個人的性格能更加接近我們的造物主。」

2 超覺靜坐 (Transcendental Meditation, 簡稱TM): 冥想的概念於三千年前在印度萌發, 一九五七年間, 星象學者瑪赫西維德 (Maharishi Mahesh Yogi) 創立超覺靜坐, 不以宗教自居, 而自名為「意識的科學方法」(scientific technique for consciousness), 風行歐美各國四十餘年, 據稱全球共有五百多萬名會員, 四萬名專業的超覺靜坐老師, 六〇年代某些搖滾樂團, 如披頭四合唱團也曾經推波助瀾, 加以推廣。

我說：「所以在你眼中，我也不過爾爾囉？」

「嘿，拜託，不要在這方面泛情緒化了。」夏菲開懷暢笑。他這句話說的恰到好處，時機拿捏得其準，我感覺這是他過去就開過的玩笑。「假如你可以在這裡待得久一點，或許我也能夠讓你信服。可是關於美國，有人給過我一本書。基本上，從我跟那裡的人對話與討論得知，他們說，金錢就是他們的宗教，性就是他們的先知。基本上，他們生活就是繞著金錢和性打轉。」

「你認為我的生活也是繞著金錢和性打轉嗎？」

「我會說，你寫作的目的何在？寫作是為了要向讀者交代一些什麼嗎？」

「沒錯，我會說，寫作是為了讓讀者更加領會與理解我的主題。」

「難道你寫東西不是為了賺錢？」

「沒錯，可是，作品的本質也同樣重要。」

我著實讓他大吃一驚。這種使命感是他聞所未聞的；同時，基於他的心胸開放，他還尋思半晌，細細體會。他嗜好宗教辯論，這一點，現在我也可以看得出來了；可是當他再度開口之時，就不再打算否定或是質疑我對於自己的說明了。

他語氣中的尊重，聽來也像是憂心，「我要說，你現在正一點一滴的在失落當中。你對於自己並沒有據實而論。你一直在搜索著真理，卻還沒有找到真理。」

「我們再回頭談談美國吧。」

「我在美國也交了一些朋友。紐約、芝加哥、華盛頓、印地安那等等。當初我在一個『對外支援』的方案底下工作，這個方案是專門救濟貧民的。可是我一心想要回家。現在，美國在我看來，是個可以去短期觀光，可是卻不宜久留的地方。我回馬來西亞之後，就在紅十字會工作。後來我在一家商業公司，那是一家建築公司上班。那也是一家馬來公司，我在裡面擔任總經理的位子。」

「當時你年紀應該還很輕吧？」

「那時我大概是二十八歲或二十九歲吧。在那家公司裡頭，做生意是不講道德倫理的。做生意全靠賄賂。建築偷工減料，瞞天過海，根本不把建築規格當作一回事。」

「因為這家公司是馬來人公司的緣故嗎？」

「做生意還不都這樣。建築這一行上上下下都是些昧著良心、沒操守的人。送錢賄賂的壓力之大，我待了大約一年就離職了。其實當時我的薪水還很不錯，一個月大概領個一千美金上下，那是一九七三到七四年間。我打算自行創業，自己開一家建築公司，試著堂堂正正的做生意。誠實只會虧錢。我爭取到一張建築合約，打算實實在在地動工——你想要老老實實地工作，結果，工地上就你這麼一個唯一的老實人。舉個例子說吧，我要蓋一棟房子，建築規格上對於混凝土比例的規定是死的，我也有心要按照規矩來，我的工人大部分都是華人，卻不跟著遵守規定。結果，我就踢到鐵板了。人家都不肯再相信我。客戶也不相信我，而且他們對馬來建築公司都懷有深重的成見。他們的懷疑並不是無的放矢，畢竟，馬來人才剛剛開始涉足建築領域。有一段時間，我們公司整整六個月接不到一個案子，一張建築合約也簽不下來。那段日子真的很苦，可是我心裡還是很滿足，因為你是為了自己工作，而且你心裡知道你是誠實無欺的。我們穆斯林做生意的目的，就是為了完成社會的需要。」

「滿足社會需要難道不是所有行業生意的圭臬嗎？」

「有些生意就完全是為了營利。在我從事建築的第三年年底，開始熱切參與伊斯蘭教運動。我感覺到某種必要，這種必要基本上就是要去應合推動伊斯蘭教運動，而不是汲汲營營地應付我當時的生意需要而已。」

「那麼，當初你欽慕的那個女孩，後來有什麼發展呢？」

「我一從美國回來就結婚了。新娘不是我一直喜歡的那個女孩，而是一個同樣出身鄉下、或許在背

景上跟我比較接近的女孩。她也是在馬來鄉下長大的女孩，小時候家境很貧窮，她家在另外一州。我跟她結婚，也算是打破了我們家族的傳統。因為我家裡，甚至連我們家的近親當中，都沒有人跟出身外州的人進行嫁娶過。我的父母親並沒有反對。可是，我覺得自己打破了某項傳統。這一點也不會讓我擔心。我太太現在在一家公司上班，是英國人開的公司，公司業務難不倒她。大致上，她就是負責一些秘書事務。我們現在還沒有自己的房子。房子正在建築施工中。我花了五萬八千美金跟一個建築商買下來的。」

「這麼說，你已經放棄了回歸鄉村的打算囉？」

「其實，我倒不在乎住在鄉下還是城市。我喜歡鄉村，因為就環境、社會與資源這些來說，鄉村都還沒遭到污染。鄉下人不是那種物慾橫流的拜金主義者，他們都是些有尊嚴的人，同時也非常虔誠。即使是在都市裡，要是我可以找到像那樣不曾遭到污染的社區，不曾遭到污染的環境，我也會願意待下去的。這種想法或許不可能成真，可是受到我所推動的穆斯林青年活動限制，我只能住在都市裡。我們一起出錢，在出了吉隆坡約二十七公里遠的地方買了一塊面積八英畝的地，我們現在規畫一個自給自足的社區，所有設施都依照伊斯蘭的體系來營運——伊斯蘭教的幼稚園，開一間合股公司，蓋個保健中心，請穆斯林醫生駐診。我們計畫盡量利用所有的資源，發揮最大的效應。」

「你這樣不就在重創鄉村生活嗎？可是你也不說，你們哥打巴魯鄉下的生活方式非常平庸嗎？」

「沒錯，在某些方面來說是很平庸，但那是因為我們鄉下可以自給自足的關係。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我們待人接物都受到宗教的導引。」

「難道所有的馬來西亞人不都遵循著宗教的導引嗎？」

「那可不，並不是所有馬來人的生活起居都遵循著宗教規範。有些社區重視傳統更甚於宗教，有些傳統還帶著濃厚的異教性質。」

他的意思是屬於前伊斯蘭時期的傳統。而我也逐漸體會到，儘管他一再執意要恢復保存馬來的鄉村社區——那是馬來半島後來居上的伊斯蘭教所賜與他的——其實，他念茲在茲的還是要淨化舊日的生活方式，滌除他的馬來同胞生活中極為重要的一部分。可是，那就是另外一個問題了，他也知道他還沒回答有關平庸的問題。

他說：「讓馬來人不再如此平庸的嘗試，則屬於另外一個層面。我還沒認真思考過這個問題。」

他已經失落了他的鄉村。他跟一個出身外州的女孩結婚，打破了他家的傳統。然而，接受過教育，旅行千里，再親身從事某些專業，他在不知不覺間還打破了其他傳統。他在新世界經營的生意失敗了。現在我明白，一旦失去伊斯蘭教的指引，他就茫然若失，手足無措。可是不管他喜歡還是厭惡，夏菲已經進入了新的世界；要想在這個新世界之中隱遁度日，那是不可能的。夏菲生存之所繫，只有靠著一而再、再而三的嘗試，一次要比一次努力，全看他有沒有如此的願景。

我們一同漫步，漸漸遠離假日飯店的咖啡廳。他再度憂慮起來，擔心自己是不是太過唐突，懷疑他是不是將自己的個體差異抬高到他的同胞教友之上。我說：「我要請你想想。我不想跟你辯，雖然說我也知道，跟你辯論是你求之不得的。可是由於你到美國旅行的時候，心裡固執地以為你會在美國失落些什麼。我想，你對外界人士的評價可能有失公允。」

他說：「我可以接受，國外或許也有執著奉獻的人，也有好人，可是我就是不能妥協。」

錢、錢、錢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六日，《新海峽時報》的報導：

淡馬魯地區印度教神像遭毀 三項指控

淡馬魯，週一——某前任宗教教師與一名學生今日於當地治安法庭，針對前年遭控搗毀淡馬魯地區印度教偶像一端，兩名被告均辯稱無罪……

這也是伊斯蘭教運動當中，青年學生活動的一環。搗毀偶像屬於較為草莽的伊斯蘭教類型，而我感覺這樣的舉措讓夏菲尷尬不已。他說，那不是什麼重要的大事。可是，搗毀異教偶像非同小可。

夏菲身屬的團體 ABIM，不是馬來西亞唯一的穆斯林青年團體；安華·依布拉欣倡導著他高貴的伊斯蘭教理念，卻也不是此地唯一的領袖。伊斯蘭宣教士（遠從印度與巴基斯坦而來）將搗毀偶像的訊息帶到馬來西亞，他們查閱過幾本來源不同的書籍之後，計算得出，搗毀一座異教偶像，每人可以在極樂天堂延長享樂若干千年；而他們在精算過後，推估得知，每個穆斯林搗毀的異教偶像只要達到三十尊的總數，就可以榮獲伊斯蘭教的大獎：在極樂天堂中，永生快活。

馬來人其實對華人神龕最為不滿與嫉恨，而某些神龕其實不過就是個混凝土砌成的壁箱。都市裡隨處可見華人膜拜的神龕（假日飯店旁邊就有兩座）。可是華人勢力雄厚，華人的秘密幫派擁護武自重，不得輕犯。坦米爾印度人社區規模就小得多了，居民多半只想息事寧人。因此，印度教偶像處處遭殃。一九七八年某個為期三星期的暴亂期間，連續許多晚上，坦米爾廟堂都遭到穆斯林褻瀆污辱。

接著在克齡（Kelang）寺廟當中發生了一樁悲劇。一個五人（其中至少兩名大學生）組成的搗毀偶像團，與八名寺廟警衛對抗。五人團中，死了四個搗毀偶像者。此後，砸毀偶像的風氣就停頓了下來。而今遠較淡馬魯寺廟案更令萬眾矚目的是，審判那八名護衛寺產的警衛的案子，八名被告都被控以「謀殺未遂之惡意殺人」罪名。

審判刻意遠離克齡，改在馬來西亞西岸、距離吉隆坡三十二公里遠的基蘭（Klang）開庭。我搭乘一名坦米爾計程車司機的車子前往旁聽。可是計程車司機的心思不在審判上，他滿腦子想的還是錢；他心裡總是想著錢。

我第一天搭他的計程車時，我說：「你還沒把你的里程表按下去呢。」他說：「我腦子裡心不在焉的。我在想明天該怎麼去麻六甲。去那麼一趟一定得花上至少一百四十塊錢。我身上哪來這麼多錢開銷啊？我妹妹要結婚了。」我說：「為什麼去一趟麻六甲就要花上這麼多錢？」他說：「我們一共有七個人。我母親、我妹妹、我太太，還有我三個孩子，總共七個人。光是車資，每個人二十塊錢跑不掉。我們會搭定線計程車去。」我們卡在廢氣裊裊的吉隆坡車陣當中動彈不得，我也感染了他的焦慮。

我說：「為什麼你們全家七口全都得去麻六甲呢？你太太非去不可嗎？」

「她非去不可啊。那可是她妹妹要嫁人。」

「我還以為是你妹妹要結婚呢。」

「她的妹妹就是我的妹妹。」

「好吧，這樣我就明白你太太為什麼一定得去。可是，你的親妹妹又為什麼一定要去呢？」

「她想去。她跟要出嫁的那個女孩很熟。」

「這樣吧，讓你太太跟你妹妹一起去，兩個人的車資四十塊錢。」

「那我媽媽怎麼辦？你不曉得我們這裡的習俗啊。我媽媽絕對不能不去的。」

「沒問題。就讓你媽媽、你妹妹跟你太太一起去，這樣如何？你留在家裡。」

「三個女人？自個兒南下到麻六甲？」

「好好好。你送她們過去，你跟她們一起去。」

「可是萬一我也去的話，小孩不能留在家裡。她們年紀都還小，而且三個都是女孩子。」

所以說，要嘛，只有全家出動，七個人一起去麻六甲；要嘛，就全都不許去。一個男人帶著六個仰

賴他保護管束的婦人女童，無怪乎他已經近乎瀆言妄語、神智不清了。

現在，他開車載著我前往基蘭旁聽審判，又再度瀕臨亂語狀態。錢，錢，他需財孔急。他說，只要他弄得到六千塊錢美金的話，日子就好過了。只要有錢，他就把計程車給收了，改行印文具。作文具生意一定會賺錢的。你先給大盤商一千塊錢當訂金，大盤就給你價值三千塊錢的東西讓你賣三個月，不收利息。

只要，只要有錢。偏偏，他家裡還有七張嘴巴嗷嗷待哺，三個孩子都是千金，還有一個妹妹等著嫁掉。馬來西亞政府把所有的好處都給了馬來人。華人就好多了。華人雖然是凶險的敵人，卻是不錯的朋友。「你有沒有認識什麼馬來人？你喜歡馬來人嗎？馬來人專門在背後捅你刀子的。」他反反覆覆地抱怨著，抒發他分離種族的怨氣。

我說：「你去了麻六甲嗎？你的車資是週轉過來的嗎？」

「跟一個旁遮普人借的。借了一百塊，下個月我得還他一百二十五塊錢。」

「所以說，你是跟人家用三分利借的錢。現在，你還想再搞個六千塊錢？」

他將話題轉移到另外一個講得快爛了的主題上：他一家人的生活開銷。他說，他一個星期就要買上十卡提（catty）的米。「一卡提有多重？」「一公斤。」「所以，你們家一個星期就要買二十二磅的米？」

「是啊。」他曾經說過，他向車行租計程車來開，一天的租金也是二十二塊美金；他也曾經說過，從吉隆坡到基蘭，里程也是二十二哩；現在，他們家一個星期要吃上二十二磅重的米——二十二還真是他命中注定的數字。

然而，儘管他困難重重，麻煩多多，他還是知交滿天下。而他彷彿就在車陣當中，看見他們浮現在他眼前。「他跟我是一家人車行的。」有一次，他又說：「你看到前面那輛車子嗎？以前我就是開那部車子的。後來我的經理就把我叫了過去，讓我開這部車子，把那部車子交給那個傢伙開。那個傢伙開車很

差勁的。他愛喝酒，整天酒後駕車。我開車一定不喝酒的，頂多喝一點棕櫚酒。每個星期我只喝上那麼一回。星期六下午喝酒，只喝兩公升。」

「兩公升！」

「棕櫚酒對身體好啊。」

我說：「你家沒錢，還有三個丫頭要養，你還得跟人家借三分利的錢才能去麻六甲參加婚禮。現在你還跟我說，你每個星期六下午都喝得醉醺醺的。」我從他的後照鏡裡看到他前排牙齒缺了一顆。「你那牙怎麼不見了？」

「我被一輛速克達撞的。」

「這些意外怎麼都發生在你身上？你怎麼不回鄉下去種田呢？」

「我們家沒田。」

就是那樣了。實在叫人難以理解的是，早在伊斯蘭教遠從西方而來之前，他世居印度南方的祖先，已經將他們的宗教、史詩、雕像與建築傳播到東南亞了。可是，他自己不會知曉這一段歷程的。十九世紀，他的直系先祖隨著殖民宗主國遷徙於此，在英國人的栽植場上工作，那就是他所有的過去了。而今，處於後殖民時期的穆斯林馬來西亞，他卻遭到排擠。他就像夏菲與其他馬來鄉下人一樣失落。然而，或許他比夏菲失落的還要多，他找不到某種社區的歸屬感，無法認知自家某種純粹的過去，缺乏可資訴求慰藉的信仰，不能將自身際遇歸咎在這個世界上，事實上，他也不知道究竟該怪在誰的頭上。克齡與淡馬魯地區神像遭到搗毀的事件，基蘭州的審判——他佯裝自己對這個案子漠不關心——看在一個出生就背著沉重壓力包袱的人眼中，那些宗教衝突不過是些皮毛焦慮罷了。

這一片開發完善的西部海岸地帶，一個市鎮接著另一個市鎮，沿路上，看不到馬來村莊的蹤跡。車子開到基蘭之後，我們還得停車問路，才搞清楚法院的位址。法院跟市中心有段距離，位在一棟寧靜的

殖民地風格的兩層樓建築。法院廣場不見群眾聚集。樓上的法庭裡，公共旁聽席上差可羅雀。這個案子登上報紙頭條，記者不斷地緊密追蹤報導，閱聽大眾無不緊張。可是這個事件本身卻像是樁私人糾紛，就像夏菲說的一般無足輕重。一位馬來法官坐鎮法庭，兩名馬來警察，證人席上一個年輕、面容俊俏的印度男孩，出庭作證的男孩身邊，坐著一位擔任口譯的印度女人，口譯者身上穿著黃色的紗麗，一位兩腮留著鬚角的印度律師正在詢問證人。

其他七名遭到控告的被告——他們在事發當晚與毀壞神像的破壞者發生正面衝突——集合在被告席上，圈禁在法庭中央一個原木欄杆圍起來的圍欄裡，看起來還相當從容自在。四架空調機組轟隆運轉，坐在旁聽席上，根本就聽不出來律師或是證人或是口譯在講些什麼。這樣一個不足為外人道的場合，然而，四個失落而愚蠢的年輕人，面對著新世界，惶惑而不知所措，他們的迷惑與惶恐簡化為擊毀三十尊偶像，換取極樂永生的幻夢——這四個人死了。

我們驅車回到市中心，再開著車子沿著市區繞了一圈以後，就到了碼頭，碼頭架設在一片黑泥的海灘上。船板不全的划槳船，困在黑泥裡自行朽爛，船身沾染黑泥，逐漸與這片海灘同色；暗棕色的水面上，尚能使用的船隻繫在直立凸出的木桿之間，烏鴉與飢餓多時的野貓在垃圾堆裡叨銜檢食。落雨瀝瀝，視野黯黯，南國燠熱卻不見稍退，周遭景物頓時灰暗無光，轉眼間與海灘上癱軟近乎液態的黑泥融為一色。可以輕易想見，一百年前這個景致不討喜的海灣光景，或許當時這裡不過是個討海打魚人家的聚落，百年前看來，這個地方如此隱匿，世界絕對不會向此地走來。

門牙漏風的坦米爾司機不見蹤影半晌之後，終於回來了，渾身被雨淋個濕透。他買到了幾隻螃蟹。他以他一貫快速而興奮的語氣說道，螃蟹到了吉隆坡，價錢就是這裡的兩倍了。

我說：「你打算賣掉這些螃蟹嗎？」

「螃蟹要拿回家去，晚上要下鍋了。」

「你一輩子也湊不到六千塊錢的。」

遠離海岸之處，新開的公路穿過茂林重山，直抵雲頂高原。雲層沿著山丘下降，氣溫低到穿得住套頭毛衣了。可是就在這條公路盡頭，經過林間樹木筆直高大的泛白樹幹，經過公路兩旁蓊鬱林木下的幽暗天光，攀爬樹冠的藤蔓，大片大片的心型樹葉，樹蔭與野棕櫚與野芭蕉；經過這片森林，公路兩旁不見聚落，沒有城鎮，只有一片面積廣大的遊憩區域，迷霧中，一處混凝土搭建的遊樂場：一窪玩具湖，玩具走道，玩具火車，一棟旅館與一座賭場。

在馬來西亞，金錢的樂趣其實很單純。金錢放大了類似馬來西亞這樣地小人稠、未經開化、遲於面臨世界變化的地方所受到的束縛。金錢——經由石油、橡膠、錫礦、棕油貿易換取的金錢，改變了舊日的行事方式。可是，金錢只能將民眾轉變為購買進口商品的消費者，使得馬來西亞更加倚賴已開發世界，壓低所有的馬國人民，讓他們永遠活在殖民狀態之下。

像夏菲這一類人的退縮可以為外人了解，滅佛毀像的破壞者心中的怨怒也可以理解；同時，我們也可以領會，其他的馬來人心中，如何期盼能夠偽裝成阿拉伯人，回歸先知時期純淨無雜的生活。

四 阿拉伯風潮

吉隆坡有個伊斯蘭教公社。據傳，公社裡的年輕馬來人一概排斥現代的生活方式與現代商品；他們協力耕作一小片田地，並以此維生，過著誠如他們所想像的阿拉伯人的生活——古代的阿拉伯人，而不是現代的阿拉伯人。他們並不歡迎外來訪客。夏菲雖然認同這個公社的理念，卻不願意插手干涉其他團體的事務。他向他們通報了我的名字，許多時日過後，彼方還是毫無動靜。

然後，我就接到亥魯爾的電話。他是公社裡的人。他的英語口音刺耳短促，言談間每每省略字彙尾音，活像老式的美國戰爭電影裡日本人角色在講話。而且就像電影裡的角色一樣，他說道：「我怎麼知道你是不是中情局還是格別烏派來的？」我心想，他心裡清楚得很。他說不久前，他們讓兩個《時代》雜誌的記者到他們公社採訪，可是採訪過後，公社裡的人就益發疑心，這兩個傢伙根本就是中情局的人（其實根據我事後打聽，《時代》雜誌沒用這則採訪；而亥魯爾——正如其他極力避免外人注目的隱世者一樣，遁入他們意料之外的無名無聲——必然會覺得些微氣惱與不解吧）。

他說，當天傍晚他會帶三個人過來看我。我拜託他帶兩個人來就好。我說，我連日奔波，實在累得沒法子擠在我的假日飯店房間裡，跟四個人面面相覷。

亥魯爾又說了：「你對哪些話題有興趣？」接著又用短促的日本口音問道：「屬靈方面的，還是經

濟方面的？」

「屬靈方面。」

話一脫口，我心想自己講錯話了。要是我們能聊聊經濟面上的議題，應該會比較有意義。我從主持 ABIM 的安華·依布拉欣那裡，聽來了一些馬來西亞的伊斯蘭團體在經濟事務上的理念。他們說，西方世界已經危如累卵，即將崩潰了。「而他們還在繼續炮製出一種印象，說我們伊斯蘭教的經濟體系不過就是調製番茄醬和哈拉爾（halal，儀式上潔淨的）食品——就每個星期宰殺一條母牛的觀點看來。」

可是我對於談話主題的憂慮，其實只是杞人憂天，就跟我先前擔心訪客人數過多一樣無稽。當天傍晚，亥魯爾跟他們公社的人沒來；相反的，他們稍了個訊息給我，要我第二天上午十點到議會大樓外面會晤某個男人。我決定不予回應。我心想，只要我對他們毫無回應，日後也不對他們出聲探詢的話，說不定還能刺激亥魯爾的好奇，或許他反而會回過頭來找我。而事情就如同我意料的發展下去。

伊斯蘭公社人的理念

幾天後，某日黃昏時分，七點過半，亥魯爾來電了。他就在樓下，假日飯店樓下，帶著三名公社同仁。他們上樓來。或許更精確地說，他們出其不意地一擁而入。其中三人，包括亥魯爾自己，頗叫人驚駭地纏著頭巾，身上套著綠色的長衫。

第四名來人則穿著長褲與襯衫，落坐在一張扶手椅上。另外一張扶手椅上則坐了個裹著頭巾的男人。亥魯爾眼神欣悅，皮膚經日曬而黧黑，身著阿拉伯傳統服飾，神情歡快得出人意料，挑了兩張扶手椅中間的小茶几坐了下來。梳妝台化妝椅上坐的是一個個子極為嬌小、臉上蓄鬚的男人，自稱是個記者，希望我不介意他作筆記，隨即迅速掏出紙筆來。

亥魯爾說：「你想知道些什麼呢？」

這四個人就這樣將房間擠得水洩不通，而我猶兀自驚駭於這四人的衣著模樣——頭巾、骯髒邋遢的長衫，還有他們興奮的情緒，結果，我又忘了要提起伊斯蘭的經濟體系。

我說：「你們都是各自不同的人。我想知道，你們怎麼會齊聚一堂，一起參加這個公社呢？」

「是啊，」亥魯爾說，「我們都是不一樣的人。」

他們四人，除了亥魯爾以外，都是出身北部吉打州（Kedah）的人。穿著長褲與襯衫的那個人，面容比較接近華人，而不像是馬來人，也不像其他三人一般興奮，他說自己是個醫生。亥魯爾則是位律師。纏著白色頭巾，五官輪廓像個黑白混血兒的那個人是傳教士，也是個哈吉，意即他曾經前往麥加朝聖過。他是四人當中最不修邊幅、最不精緻的一個，然而他卻儼然以四人的發言人自居。亥魯爾負責口譯，沒多久，他就感到舒適自在，兩條腿疊在小茶几上，頂著假日飯店的藤編燈罩下的吊燈，盤腿打坐了起來。我則半坐半躺在床上，身上還穿著睡衣褲。

我問哈吉，他對於鄉村生活還抱著一絲浪漫的依戀情感嗎。他說不。鄉村生活是不合伊斯蘭教義的。

那個醫生說了：「鄉下有太多信仰靈魂學說與印度教的傳統。」

那就是夏菲曾經跟我說過的。在我們前次對話即將結束時，夏菲終於透露他心中自我抵觸的想法：鄉村生活才是馬來人的真實本色，可是他們固有的生活方式一定要調整。鄉間信仰一定要加以滌淨，古老的異教傳統一定要連根剷除。

亥魯爾說：「到現在，鄉下人結婚都還是按照印度教傳統舉辦婚禮。」

「這有什麼關係嗎？」

有關係，那個哈吉回應道，那樣是違反《可蘭經》規範的。

那個哈吉說，他母親的家族來自葉門，他們取道泰國來到吉打。他父親那邊的家族則是來自蘇門答臘。他們都是食人族，專門獵人頭的；哈吉跟其他來客都哈哈大笑。他們家族第一個皈依伊斯蘭教的就是他祖父。他的父親後來成了個宗教教師。他的先父生前耕田養家，僅能糊口；當他去世的時候，留下的家產剛好只有一塊錢。他拒絕將哈吉送到政府開辦的公立學校，而是自己在家裡教導這個孩子。

哈吉透過亥魯爾的翻譯說道：「家父的教導無所不包。他教我《可蘭經》、阿拉伯文，也教了我歷史上拿破崙與希特勒的事蹟。」

「令尊教了你哪些跟拿破崙有關的事情？」

「拿破崙制定了簡易而有效的法律。可是，他跟先知的同伴與將軍哈理德是無法相提並論的。哈理德曾經說過，他最為心滿意足的時刻，就是看到虔誠信徒與異教徒兩軍交鋒，暗夜中，只聽見戰馬嘶鳴，刀劍搏擊激發的火花燦燦如泉湧。」

醫生補充說明：「陰暗、寒冷的夜晚。」

「拿哈理德和拿破崙比一比吧。拿破崙為了去跟愛人相會，就把軍隊撤離要塞，這在歷史上寫得明明白白的，你可以去翻書。所以說，你怎麼能將這兩種人格拿來相提並論呢？哈理德為了宣揚他的宗教，可以犧牲他的性命。拿破崙只想得到他的愛人。全世界的女人長得還不都一個樣子。可是，堅定的信念卻是舉世無雙的。」那是亥魯爾的翻譯。「假如拿破崙當初是個穆斯林的話，他只有在軍中吊車尾的份兒，而且很有可能還會被隔離開來呢。」

「交由軍事法庭審判嗎？」

亥魯爾回道：「就是那樣子，」彷彿接受了我的建議一樣，「他會因為不道德的行為而遭到軍事法庭起訴。」

我想多聽聽那個哈吉談他的童年往事。我一心想要對照比較他的回憶與夏菲的懷舊。可是他說，

他寧可多談一些規模比較宏大的事情，然而我還是極力請求。

我說：「除了婚禮以外，鄉村生活中還有哪些部分因為不合伊斯蘭教義，所以讓你很排斥呢？」

「高利貸。」

「放高利貸的都是些什麼人？」

「馬來人、華人，」為了顧全我的情感和顏面，那個哈吉說到這裡就住了嘴。

四人中的記者則說道：「還有印度人。」他坐在梳妝台前的化妝椅上，一邊振筆疾書。「華仔。你聽說過華仔嗎？」

我說，我聽說過。「華人有什麼地方讓你討厭的呢？」

「他們的生活方式，」那個哈吉說著，一張臉微笑著，渾圓如太極。「假如他們願意改宗成為穆斯林的話，我就不會再跟他們計較了。我們沒有什麼種族情結的。」（可是我在馬來西亞也聽說過，倘若華人社區集體改宗為穆斯林的話，馬來人就要皈依佛教。）

他從小就要替他父親看牛，一直到十五歲那年，他都得幫忙父親下田。然後，他的父親過世了。喪禮上總共來了一千多人給他父親弔喪。

「照你這樣子講的話，他們當年為什麼不乾脆供養你的父親呢？他生前不是宗教教師嗎？為什麼他們就這樣讓他死得這麼貧困潦倒，名下只有一塊錢的家產呢？」

那個哈吉避而不答。他說在他父親亡故之後，他還是繼續他的學業。任何書籍，只要他弄得到手的，他都會讀。「我還讀了一本蘇卡諾寫的書，《革命》。《革命》什麼來著的。」

那個醫生說：「《革命陰影之下》。」（那個書名其實翻譯有誤。蘇卡諾的著作書名為 *Dibawah Bendera Revolusi*，翻譯作《革命旗幟之下》較為妥切。）

忙著記錄我們對話內容的記者，同時也翻看著梳妝台上幾篇新聞剪報。我心中不由暗暗驚怯，擔心

他會看到些引他反感的東西。

此時，他轉頭以馬來語跟亥魯爾交談了幾句，亥魯爾問我，我房裡可有照相機。我回答沒有。亥魯爾指著記者說：「他帶了一具照相機過來，可是裡面沒有底片。飯店裡買得到底片嗎？」

我說，他不妨試試看，飯店大廳的商店應該還沒打烊。那個小個頭男人就離房下樓去了，大號的白色網球鞋踩在假日飯店內的暗色地毯上，閃閃發光。

我取出鼻菸來用了一點，跟他們解釋道，鼻菸只是菸草，味道很溫和，一點也不刺激。我知道他們並不贊同用刺激物。

亥魯爾說道：「伊斯蘭教並不鼓勵信徒使用菸草。」

「只是不鼓勵嗎？」

「伊斯蘭教並不禁止抽菸，只是不鼓勵而已。這個在阿拉伯文裡是個技術性的字眼，你應該了解吧。」

那個哈吉面帶微笑地說：「大部分的菸草製造商都是猶太人，為了要摧毀猶太民族，我們絕對不可以使用他們的產品。關於猶太人，有一本書寫得非常好。」

那個醫生說道：「亨利·福特寫的。」

亥魯爾補充說道：「就是那個做汽車的人。」

「我可以在這裡弄到這本書來讀嗎？」

「博金書店，」亥魯爾說，「你可以在那裡買到這本書。」

那個哈吉說道：「猶太人是真主的仇敵。你對天演理論熟不熟？」

「我稍微有些概念。」

那個哈吉抬起滿面帶笑的圓臉，凝視著我說：「你知道天演論為什麼會四處風行嗎？」

我說：「以一個務農背景出身的人來說，你懂得還真多。」

「我知道的很有限。我不過知道《可蘭經》經文的一部分罷了。」

亥魯爾盤腿坐在那個哈吉與醫生之間的矮茶几上，神情舒適自如，插嘴說道：「要是你讀通了《可蘭經》，你就是萬事通了。經濟、政治，還有家庭法律等等，這些方面的微言要義都深藏在《可蘭經》經文中。」

房門響起敲門聲。

我說：「那一定是你們的朋友。」

於是我穿著睡衣褲，起身去開門讓那個記者進來。他頭上頂著頭巾，眼前架著一副圓形鏡框的深色眼鏡，下頰兒稀疏長鬚，身上穿著長衫，長衫下還有一塊先前我沒注意到的類似裙布的一塊衣料，他看起來就像個久經日曬風乾、縮水了的苦修僧，迷途在假日飯店的長廊沙漠中；而他踩著腳上那雙白色大號跑鞋，緊緊地挨著房門站立，一離開了他的友伴，他就變得非常害羞怯懦。他沒買到底片，空手而回。

我重新躺回床上，我對那個哈吉——哈吉坐在扶手椅上，面帶微笑，耐心無比——說道：「你剛剛才跟我講到天演論。你說，天演論在世界各地廣泛教授，背後自有緣故。」

那個哈吉說道：「你對猶太人的歷史了不了解？」

「我知道的很少。」

「猶太人全都是天才。他們是一支天才民族。」那個哈吉說著，「這個你知道嗎？真主的聖書上已經證實過這一點了。」

亥魯爾也跟著附和：「他們整個民族都是天才。這一點古今中外的歷史都是這麼說的。」

那個哈吉繼續闡述：「其他的民族都很嫉妒他們，因為猶太人都是天才，他們在思想和觀念上貢獻

很多。卡爾·馬克思就是猶太人。」

亥魯爾撇開翻譯，自己又補充道：「還有恩格斯。」

同行的記者再度傍著梳妝台桌面作筆記，插進一句話：「托爾斯泰。」

醫生說：「他們都是猶太人。」

我感覺我們話題已經扯遠了，跟天演論距離越來越遙遠。我說道：「你們要不要用些茶點呢？」

那個哈吉說道：「這裡的茶點也是以穆斯林的方式製作的嗎？他們是怎麼準備茶點的？」

「飯店的茶是用茶包包泡的。這裡的小弟都是馬來人。」

那個哈吉不為所動。他們自顧自地用馬來語商量了半天，最後，亥魯爾對我說：「我們還是喝瓶裝飲料就好了。」

我下了床，走到房間裡的三洋小冰箱旁邊，冰箱就擺設在哈吉座椅附近的角落裡，門上還印刷著「您的私人酒吧」字樣。冰箱上層兩排小型的架子，上面排列著小瓶裝飲料，有啤酒、德國出產的葡萄酒、蘇打汽水、可口可樂、七喜汽水等等。他們選擇了可口可樂。

亥魯爾說道：「一瓶就夠了。」他又說：「一瓶就夠我們四個人分了。這就是我們的方式。」

我將那瓶可口可樂帶進浴室，為了除去他們擔心飲料遭到浴室污染的憂思，我嘴裡高聲嚷著：「開瓶器就在浴室的門後面。」我從盥洗台上拿了一個經過消毒、裹著玻璃紙的杯子，連同打開了瓶蓋的飲料，一起遞給那個哈吉。

那個記者則用手指著梳妝台上的兩篇剪報。

我說：「那是關於一個計程車司機與一個非洲人的報導。」

他們知道這則新聞。這個事件已經在報紙上炒熱了一段時日。一個計程車司機在吉隆坡機場碰到一個垂頭喪氣的非洲人。這個非洲人說，他搞丟了飛機票、一些證明文件，還有他所有的錢。計程車司機

就開車載他回他家裡暫居，還自掏腰包在報紙上刊登遺失證明文件的廣告，請善心人士代尋，可惜石沉大海。好心的司機還幫忙這位非洲人延長他的簽證，並且借錢——一部分是他自己的儲蓄，另外還向他嬸嬸借錢——給這個非洲人，讓他住進旅館，同時也幫他買了張回程的飛機票。現在，事情過了兩個月，那個非洲人，他是個迦納人，又回到吉隆坡來。他帶了兩千元美金來答謝那個計程車司機的嬸嬸，至於那位計程車司機則獲贈一輛全新的日產汽車。

那個哈吉將盛了可口可樂的杯子遞給亥魯爾，一邊說：「這種事情會發生在你們國家嗎？」

「不會。」

「可是這種事情在我們伊斯蘭社會裡，天天都會發生。對你來說這是新聞，但我們早就屢見不鮮了。」

可是，那位勇於助人的計程車司機卻是個華人，而且根據某份報紙的報導，當局還不准他擁有一輛計程車呢。

那個哈吉用食指清理他的鼻孔，接著再將食指指淨在座椅的平絨扶手上，他說道：「我們一定得講完這個猶太人的故事。早在摩西出世之前，阿拉伯世界裡有一支猶太部落，這個猶太部落裡出了一位先知。那個先知接收到真主的啟示，傳令下去，要所有的猶太人都在星期六做禮拜。可是那些猶太人根本就不甩先知的命令，因為星期六海裡的魚多，他們寧可出海捕魚，也不願將星期六定為一個宗教的例假日。」

我說：「我怎麼從來沒聽說過這個故事？」

那個哈吉說了：「這個是《可蘭經》裡的故事。結果先知非常生氣，真主也發火了——」

亥魯爾翻譯至此，碰到了些困難。他中斷了傳譯，用馬來語跟那個哈吉交頭接耳一番，然後又繼續口譯下去。「真主就將怒火發洩在猶太人身上。真主還誓言一定要將他們全族都貶成猴子——」他再度

中斷傳譯，自個兒咯咯傻笑。

「人猿，」醫生突然嚴厲地說道，「要將他們統統變成人猿。」

那個哈吉說：「將他們全族當猴子，當七天。」

記者接著說：「七天過後，所有的猶太人都要死。」

那個哈吉說：「這個故事在猶太律法、《可蘭經》、還有《聖經》裡都提到過——」

「《聖經》的《舊約》，」亥魯爾說道，夾議在自己的翻譯當中。「我們是不認可《路加福音》跟其他經文的。」

「真主有三部聖書，」那個哈吉解釋道，「這三部聖書的信徒都會知道這個故事的。我們穆斯林也讀《舊約》。假如你不相信《舊約》的話，你就算不上是真正的穆斯林。」

醫生則說了：「因為《舊約》中有個部分清清楚楚地宣告先知穆罕默德就要降臨人世。」

亥魯爾說：「班哲明教授曾經針對這一點寫了一本專書。你可以在博金書店找到這本書。班哲明教授原本是個天主教教士，後來他改宗伊斯蘭教。他的新名字就叫阿布·杜德教授。」

那個哈吉不甘心自己被摒除在這段英語對談的插曲之外，又開口說了：「猶太人的故事還沒講完呢。猶太人被真主變成人猿以後呢，他們在道德上的威信就江河日下了。為了矯正這個現象，因為他們已經劣化沉淪了——」

醫生說道：「在全世界人的眼中。」

「猶太人只有將整個人類社會拖下水。」

「這就是他們的原則，」醫生說道，「倘若他們已經渾身醜陋了，就讓別人跟他們自己一樣醜。」

那個哈吉兩眼發亮，鼓著嘴唇，又說道：「當我說猶太人是真主的仇敵時，你嚇了一跳。可是，這不過顯示了猶太人有多邪惡而已。你問過我問題。這就是傳諭伊斯蘭的方式。你先發問，接著由我發

問。我回答，然後你也要回答問題。你相信你的曾祖父是一隻人猿嗎？」

「不信。」

那個哈吉滿意的微笑，又說（亥魯爾吞下可口可樂之後，一邊翻譯，一邊打噎吐氣）：「那就證明了猶太人真是太邪惡了。」

我說：「可是難道人類不是進化來的嗎？我不是想要做人身攻擊——」然後我對著房間裡每一位來客呼籲，「之前你不是跟我說，你家先祖來自蘇門答臘，還是獵人頭的部落。可是現在你已經成為一位哈吉，受過教育。」

那個哈吉說了：「過去那是錯誤的生活方式。伊斯蘭教應運而生，也就是為了糾正過去有偏差的生活方式。舉例來說吧，在伊斯蘭教傳入之前，哈里發歐馬會把他的女兒抓過來活埋，當時的人認為生女兒是非常丟臉的。那也是當時阿拉伯人的習俗。改宗伊斯蘭教之後，哈里發歐馬一想起過去，他過去的生活方式，就忍不住流淚啜泣。」

醫生說道：「他的朋友都可以看到他躲在沙漠裡哭呢。」

「而當他一接受伊斯蘭教，灌輸了教義的中心思想之後，他就變成一個品性最端正的人了。」

亥魯爾說：「你讀過一本叫做《通往麥加之路》（*The Road to Mecca*）的書嗎？啊，那真是一本好書。作者是穆罕默德·阿撒德，他是個出生在奧地利的猶太人。」

記者有耳無嘴地靜默了好一段時間，說道：「他以前叫什麼名字來著？什麼波德的。」

「李歐波德，」亥魯爾說道，「同樣的，你也可以在博金書店買到這本書。」

醫生說：「那本書也是一本傳記，對不對？」

「沒錯，」亥魯爾回道，「那是一部傳記。真是好美的一本書。」

那個哈吉再度遭人冷落，奮力重新加入談話。「你相不相信造物主？」

我說：「不信。」

「可是，這就是伊斯蘭教的基礎啊。」

經過來往數回的討論之後，「這對我來講太難了，」我說，「只要我多想一些宇宙的事情，我就會覺得茫然。」

那個哈吉欣然說道：「你所謂茫然的感覺，我會說，那正是滿足的快感呢。」

他這話讓我理不出頭緒，不曉得他是在對我表示悲憫，還是在批評我。

「你在伊朗的時候，有沒有跟他們的宗教導師談過呢？」

「我跟幾個阿亞圖拉見過面。哈爾哈里、施拉吉等等。」

「啊，施拉吉，」那個哈吉說道，「你們都談些什麼？」

「我們稍微談了一些關於宗教方面的主題。我想，他一直在擔心我可能是共產黨員。」他們哄堂大笑。

那個哈吉問道：「伊朗現在怎麼樣了？」

「一團糟，法治蕩然無存，工廠無法運作。那些毛拉不曉得該怎麼治理國家。這也是你們在馬來西亞可能要面對的狀況。」

那個哈吉說道：「假如穆斯林都能奉行伊斯蘭的生活方式，真正的伊斯蘭生活方式——」再一次，亥魯爾又翻不出那個哈吉的語意了。

醫生補強說明道：「所有的事情就會水到渠成了。」

我說：「而今你們都是真正的穆斯林了，你們現在的生活跟過去又有什麼不一樣呢？」

他們緘默不語。

那個哈吉只是說：「你只要看一眼，就可以看出這個人究竟是印度教徒、信仰靈魂學說的、抑或是

個穆斯林。」

你是怎麼看出來的？這種差異是寫在臉上的嗎？難道信徒臉上都會帶著某種真主恩典或是滿足的神情嗎？

不，那個哈吉的意思比我的猜想要單純多了。不信伊斯蘭教的異教徒吃豬肉，對食物的清潔也不講究。

我問起有關服飾方面的問題，是不是每一位宗教人士都有必要穿得跟他們一樣？

亥魯爾回答道：「關於衣著，伊斯蘭教義中有五項規定。都是安拉的規誡。男人從肚臍到膝蓋都可以暴露在。至於女人則除了臉龐和手掌之外，都要遮蓋起來。」

我說：「大學校園裡有些女人連手掌都包裹起來。」

亥魯爾說：「那樣更好。」

「你們為什麼要穿綠色的袍子呢？」

「根據伊斯蘭教義，穿著白色和綠色衣物都是可鼓勵的。」

「怎麼說呢？」

「因為這是我們先知穿著的方式。根據伊斯蘭教義，像你穿著蠟染布的衣服，是不受鼓勵的。」

「蠟染？」我拉拉自己身上這套「馬莎」棉織薄絨布睡衣上衣。

亥魯爾說：「你穿的這套蠟染衣料，只有女人可以穿。」

記者說：「男人就只能穿素色的。」

「可是，睡衣睡褲是合乎伊斯蘭教義的。樣式和顏色都跟伊斯蘭教的規定不衝突。歐洲人穿睡衣還是從土耳其和印度之類的地方學來的。」

「睡衣睡褲固然是從伊斯蘭國家流傳開來的，」那個哈吉有言，「卻不是遵照阿拉戒諭的。」

亥魯爾說道：「你還不了解伊斯蘭之美啊。」他接著又說：「只要你體會了我們的五大原則，你就能明白伊斯蘭之美了。五大原則可以應用在萬事萬物之上。伊斯蘭教裡，有些事情都是有規定的，有些事情則是可資鼓勵的。『可資鼓勵』是個技術性字眼，那是從阿拉伯文翻譯過來的。」

「意思就是『獲得允許』嗎？」

「『獲得允許』？不，『可資鼓勵』比較妥切。另外還有些事情是不予鼓勵的，就像你的蠟燭睡衣一樣。有些事情是哈倫（Harun），是禁止的，譬如男人將他的膝蓋露了出來。第五項類別就叫做哈魯斯（harus），是可以自由裁量的。」

「自由裁量、矛盾偏差，亥魯爾，你的字彙還真豐富。」

他回應道：「我是個律師啊，」接著又小小吹噓了一下，「我受的教育都是在一間馬來語學校完成的。我跟你舉個例子，說明什麼叫做自由裁量的原則。比方說有個生意人，其實他只需要五件襯衫，卻買了四十件襯衫，為什麼？因為他買得起呀。因此，他這種奢華的行徑就是可以解釋的。這五項原則包含了生活上所有的面向，所有的事情——政治、經濟、家庭生活，甚至連咳嗽也包含在內。伊斯蘭教之中有太多太多可以學習的東西了。不管你花上多少多少年，都還是學無止境呢。」

「跟我說說咳嗽與五大原則的關係吧。」

「我給你舉個例子說明。假如說你在一個聚會當中，你想咳嗽，卻又覺得當眾咳嗽很丟臉，就忍住不咳，三天以後你一早醒來，身子骨側邊痛得不得了，這是因為你當時沒有咳嗽的緣故，那就不對了。倘若不咳嗽會危害到你的健康的話，按照規定，你就該咳嗽。假如你咳嗽的時候會用手摀住嘴巴，說聲『阿拉恩典』，那就是可資鼓勵的。咳嗽不摀嘴，就不予鼓勵了。可是，要是你對著人家的臉咳嗽——」他轉身面對那個醫生，作勢要對著醫生的臉吐痰，「那就太過分了。這就叫哈倫，是禁止的。這是不合伊斯蘭教義，而且也是有罪的。」

「那麼，所謂自由裁量的咳嗽，又是怎麼一回事呢？」

「哈魯斯。假如你自己一個人獨處，身邊沒人，咳嗽不會冒犯到別人的話，那樣，你就可以站著咳或是坐著咳，都沒人管你。這種情況下，咳嗽就完全是自由裁量的了。伊斯蘭教裡，這些事情都有明文規定。」

時候到了，他們也該走了。那個哈吉有會要開；他們說他是個偉大的旅行家與宣教人。醫生則開了一家診所。

「你絕對不能放過他的診所，一定要去看看，」亥魯爾說，「他的診所非常的伊斯蘭，而且美侖美奐。你身體不舒服吧？我一眼就看得出來，你不是很硬朗。他可以把你治療得健健康康的。他現在就可以替你治療。」

我說：「多謝盛情，只是我現在已經有一個醫生照顧了，沒法子換人的。」

此時，那個醫生竟然突兀地表現得專業起來，開口說道：「那就這樣子吧。」

他們的公社位於吉隆坡外圍一處茂林山坡區域裡，距離公社還有一段路程之前，路邊就懸掛了一塊招牌。招牌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可是雖說這處公社素來標榜其隱密遁世，但既然穿著裝束得跟阿拉伯人一樣，再躲起來避人耳目就毫無意義了。

這個地區作為馬來人的聚落是再適合不過的了，木屋可以架在木蹠或是木柱上，菜園裡可以綠意盈暉，屋外高大的綠樹蔽天。可是當地居民伐倒林木，清出空地，鋪設了一條寬闊的街道，街道兩旁櫛比林立著現代化的馬來住家——現代化，因為這些房子棄捨舊式的窗戶，改用百葉窗，住屋下方原本架設支柱的地方，用水泥牆圍了起來，為住戶多增加一些空間。

一陣風雨過後，填土街道淪為泥漿窪地。街上許多穿著綠袍或是長衫、纏著白色頭巾的年輕人，來

來去。街道遠端，一輛汽車困在泥漿裡，幾個人呼喝著使勁推車出泥。推車人群當中，我以為自己認出了前天那個哈吉；在這裡，什麼事情都不是不可能的。我看走眼了；那個推車人不過是裹了頭巾，他的馬來面容、頭巾之下，遠看就浮現了黑白混血兒的輪廓。街角商店的走道或是迴廊上，閒晃著幾個穿著傳統服裝的人（他們殺著時間，等候著禮拜的時間，有如演員等著登台走位一樣），這處公社——為了昭揚他們獨立自給的伊斯蘭生活方式——商店裡沒有什麼商品可以賣給過往暫停的開車旅客。

我買了幾盎司的炸番薯片。店員將薯片裝在塑膠袋裡，袋口再釘上幾根訂書針固定。嚐起來味道不像番薯，反而像是嚼炸油塊一樣。

計程車司機說了：「現在，你明白這些日子以來我們碰到些什麼狗屎（bullshit）了吧？」他將「狗屎」念得像「嘔稀」（bush）一樣。乍聽之下像在講「叢林」（bushy），我還以為這是他特別援引指稱馬來鄉村的措詞：「現在，你明白這些日子以來我們碰到些什麼叢林了吧？」

我問他要不要一起吃點炸番薯片。

他憤憤不平地說：「免了。」

五 毀壞了的遊樂場

夏菲來自未經開發的大馬東北部地區，他的老家在哥打巴魯。我想要看看他如此懸念遺憾的故鄉，一度純淨而未遭污染，村民信仰虔誠，自尊自重，從來就不會迷失在物質主義當中。而哥打巴魯就是他為我安排深入大馬內陸之旅的第一站。

偏偏這趟旅行並沒有好的開始。先是門牙漏風的坦米爾計程車司機，這個家無恆產的人，原本該由他載我到機場的。出發前一天晚上，他還在假日飯店的大廳裡跟我期而遇，興高采烈地對我說，載我前往機場的差事又落在他的頭上了；在我們多次同車，聽他多次跟我訴苦抱怨之後，他顯然已經將自己當成我的知己好友了。然後就在我半心期待之下，他出了些岔子。他的車子半夜裡被撞扁了（可是他跟我說，他正打算跟保險公司申請理賠），當天早上我只好四下尋覓，另外找個司機。

拜訪夏菲的故鄉

一個小時的航程之後，我們就到了哥打巴魯與季風大雨中（就夏菲說來，十七年前從哥打巴魯出發，經過一夜一天，穿過橡膠樹園與叢林，才會到達吉隆坡，體驗各種震撼）。飛機兩度企圖在哥打巴

魯機場的跑道上降落。最後我們終於在滂沱大雨中著陸，機上旅客分作一小群一小群的，撐著俗氣的花傘，衝進小小的機場棚子。只是棚子裡竟然沒有拉赫曼的身影，按照夏菲的安排，他應該要在機場等著接我的。

我拿到下榻旅館的名號之後，自己就招了輛計程車過去。哥打巴魯正在淹大水。這是個停留在一九二〇與一九三〇年代間的殖民地小鎮，簡陋搖晃——狹小的低矮店舖、狹小的低矮住家、簷瓦覆蓋的屋頂、鑄鐵欄杆；晚近的金錢灌注，還是在這處頹落小鎮上栽培化育出混凝土與玻璃建構的新市鎮。我即將過夜的旅館，新穎小巧，門面上敷貼了許多現代化的浮誇裝飾。而且，我還發現——那簡直就像個小型的奇蹟，可是哥打巴魯鎮上也不過就這麼一百零一家旅館——拉赫曼竟然幫我預定了一間住房。

稍晚，拉赫曼打了通電話給我。他說，這就怪了，機場裡頭怎麼都沒人接到我呢？他說，他不光只是派了一個人到機場等我，他還找了三個人到機場去接我，是三位校長級的教師。他還特別跟他們交代，因為我長年旅居英國，我也應該長出一身白皮膚來。拉赫曼這樣天花亂墜的瞎掰故事——與夏菲這類人士的坦率直言恰成對比——就是要知道他在瞎掰；這也是拉赫曼曲折隱諱地在告訴我，他根本不想和我搭上什麼關係。拉赫曼在政府機關上班，他當然不想跟夏菲或是A B I M或是由A B I M派遣的訪客牽扯出無謂的是非。

哥打巴魯的雨下個不停。下午近黃昏，拉赫曼來到旅館找我。他個頭矮小，渾圓肥胖，滿臉堆笑，穿著一件短袖的藍色狩獵襯衫。我原本期望他能帶我參觀夏菲從小生長的村莊，或是諸如此類的村莊，可是拉赫曼絲毫無意領我參觀；他可不想以嚮導之姿，跟我一同出現在公共場合。我們捨村莊觀察不就，夜幕即將四合之際，開車駛入傾盆大雨之中，經過淹水的田野，樹冠滴水的果樹下，馬來人窄小的住屋四下散置，在大雨中淋個濕透。我們的車子開進一所穆斯林學院，進了這所學院，拉赫曼才能找人，由兩三個跟他一樣神經緊繃的同僚分攤接待我的風險和責任——我這個專找麻煩的訪客。

他們端出茶點款待我。茶湯甜膩、奶汁濃厚，而且還冰冰涼涼的。接著，我的東道主們似乎決意隻字不吐。這些人是夏菲的童年友人嗎？當年跟著他一同打鳥釣魚的好友嗎？沒錯，他們小時候也是成天打鳥釣魚。或許不見得是夏菲童年期間的那幾位友人，卻也是生活經驗相近的人。長大成人之後，經過蛻變的人顯然不只有夏菲一人。

東道主當中，有個男人是教授哲學的講師。一位講師？你也跟夏菲一樣，出身田園背景嗎？是的；他在學院裡教的哲學，主要是闡述阿拉伯與波斯的哲學家如何將伊斯蘭教精義與希臘哲思合成一體的努力。聽起來像是門非常艱澀的科目。講師也說，確實是很困難。隨後又抑鬱地補充道，到現在，他該讀的東西還多著呢，尤其是關於希臘哲學方面，更有待充實。他曾經遠赴開羅的伊斯蘭大學——愛資哈爾大學求學。他並不喜歡那段日子（可是，馬來鄉下人幾乎各個都不喜歡他們的旅行經歷），他覺得阿拉伯人既不守紀律，言行又不可信賴。

我想多聽他講些他在愛資哈爾大學求學的經驗，可是他說——又開始編起故事來——他可忙了。他得回家跟太太一起吃晚餐。那麼晚餐過後如何呢？吃過晚餐，他還得開車四處打轉，他得將家族裡某人過世的消息傳遞給其他家族成員；這是一種馬來傳統習俗（而且，這也是第一個讓我想起夏菲曾經提過的馬來習俗）。

禮拜的時間到了，他們紛紛起身到隔壁房間裡匍匐祈禱，讓我一個人落單在會客室裡。他們慢條斯理的，一點兒也不急著結束禮拜。

好不容易他們終於結束禮拜，走出房間，學院裡的註冊主任穿著一件鈕釦鎖嚴密的長衫，正襟危坐，口風跟他的鈕釦一般緊密，現在，他倒願意開口透透他的心聲了。他說，他曾經在英國待過三天，住在「皇后大道WC2」。從那三天的見聞中，他只記得三件事：英國人去哪裡都搭地下鐵；有個人站在海德公園肥皂箱上說，百分之六十的英國男人都是同性戀；還有（兩相對照，不乏矛盾）英國男男女女

女在公共場合擁抱親吻。

「世風日下，竟然如此缺乏教養。」註冊主任嘆道：「在我們這裡，我們捕到魚，會先把魚清洗乾淨，我們煎魚，然後再把魚吃掉。到了他們那裡，他們一釣到魚，當場就把魚吃了。我們還在洗魚的時候，他們已經吃乾淨，擦起嘴巴了。」

拉赫曼撇開村莊人家的形象，說道：「在我們這裡，我們只有在特定的房間與時間裡才會行房。」

「性行為對我們來講是一件非常私人的事情。」哲學講師強調著，接著又說：「既私密又神聖。我們甚至對朋友都不會講。」

註冊主任結論道：「那些人都迷失了。」

此時，阿拉伯語教師也加入了我們的談話。他的個子要比其他三人都高些，腰間圍著一條裙布，頭上戴著一頂無簷小帽。他面無表情，坐下來就開始猛喫茶點。他說，現代的讀者都已經厭倦小說了，因此許多人都紛紛轉向《可蘭經》，開始閱讀《可蘭經》。

拉赫曼同意道：「這樣子要自然多了。」

可是，難道阿拉伯語界沒有自己的小說嗎？

沒錯，阿拉伯語教師口不停囀地說道，有個埃及小說家，可是他第一本寫這個，下一本又寫別的，一看就知道那個作者自己已經迷失了。

他寫的是些什麼小說？

他也說不上來。他說，他只是轉述他學生講的話。接著，他繼續埋首猛啃馬來糕，又灌下大量冰茶，站起身來，整整裙布，就噠啦著腳步離去了。

他們都很滿足。「滿足」一詞，被他們翻來覆去地說著。他們要我知道，他們的生活滿意得很。拉赫曼為政府工作，每個月領薪一千塊錢，自家還有一部車子。他說：「我很喜歡這裡的生活。」他無意

出門到馬來西亞其他各地參觀見識。他們在這裡不必過著錙銖必較、跟別人爭個你死我活的日子；他們在這裡也不用擔心華人來搶地盤；他們不會碰到馬來人在其他地方必須解決的問題。

雨下個不停，沒完沒了。我們一同前往一家由某個馬來組織經營的馬來餐廳共進晚餐。這家餐廳的規模，遠比夏菲童年時期所知的任何機構來得宏大，餐廳裡的裝潢卻有潦草輕忽之嫌，可是拉赫曼並不介意，餐廳占地之大，使他樂於向外地人炫耀，作為馬來人企業的樣板。他說：「你看，我們也不是統統要回歸伊斯蘭教。」

哲學講師還是跟我們膩在一起。顯然地，他早就將與妻共進晚餐的約定，以及他四出傳達死訊的傳統義務拋諸腦後了。可是先前他大費周章的杜撰情節，不過是個訊號，就是要我別再追問他在愛資哈爾求學的事情，也別考他哲學，或是提起任何有爭議性的話題。

此外——這也是他們滿足的生活的一部分——他們各個都成立了大家庭。拉赫曼有五個孩子；長衫緊扣的註冊主任雖然年紀輕輕，也養了三個；哲學講師家裡有四個。

「我們都很樂觀的，」哲學講師說道，「我父親生前一窮二白。可是你看，我現在還不是好好的。我們的小孩將來長大也會跟我們一樣，平安沒事。」

註冊主任說道：「阿拉曾經說過，世上一切生物，都不會衣食無著。」

我說：「可是像柬埔寨這樣的地方又怎麼說呢？」

「他們自找的，那些處罰都是他們自己招來的，」註冊主任回應道，「阿拉也曾經講過，不信真主的，就要受懲罰。」

拉赫曼說：「倘若一隻螞蟻叮了你的腿，你不會光捨死那隻螞蟻而已。你一定會斬草除根，殺光一整窩螞蟻。」

我問起今早報紙上的一則新聞。有一項傳聞最近到處流傳，揚揚沸沸得不可開交。傳言中說，某處

港口若要竣工，就得犧牲四十顆人頭，不然永無完工之日，鄉間地區的家長嚇得不敢讓孩子出門上學。他們說這已經是舊聞了。拉赫曼說，他還是個小孩的時候，就聽過類似的傳說了——某條鐵路要完工，就一定要犧牲四十顆人頭。像這樣的故事都可以簡單地解釋，家長只是想要讓孩子乖乖地待在家裡，不要離家遠遊，因為村子裡天一黑就伸手不見五指，只有三三兩兩的路燈照明而已。還有，在他小的時候也聽人家說過，要是你爬上一棵香蕉樹的話，你的私處就會爛掉，這種傳說不過就是要孩子別去爬樹。要是你坐在枕頭上，屁股就會長癬子，用意也只是要讓枕頭保持清潔。

「可是現在大家的教育程度都提高了，」拉赫曼說，「他們只是跟孩子坦白講，屁股坐在枕頭上會把枕頭弄髒的。」

我們談著談著，外面大雨直直落，我的胸口也因為空氣潮濕而隱隱抽緊，心思也不由得遊走到我在旅館裡的小房間，房間裡的中央空調冷氣甚強，而且無法調節。

夏菲遺憾追念著他小時候熟知的鄉村生活；他講到這種生活時，語氣之間彷彿這已經是舊日情懷，像是他們只能經由組成公社才能夠重現這些美好的往事情景。可是那種生活——嚴密的社區感、古舊的方式，以及平和的氣氛，卻仍然保存在這些人之間，儘管他們已經買車，從事過去不曾存在的新型態工作。這些人所信奉的伊斯蘭教，不過是他們滿足愜意的生活的一部分。夏菲的伊斯蘭教——伊斯蘭教作為馬來人的振奮機制，滌淨馬來人，掃除虛偽的行徑與虛偽的渴求——那可就是負有革命宗旨的伊斯蘭教，對這些人來講，夏菲陳義過高，他們無法了解他究竟在追求什麼目標。

更叫人奇怪的是，我也被他們當成伊斯蘭教革命的特使。偏偏在他們眼中，我就是個不折不扣的特使，晚餐過後，眾人鳥獸散去，就沒有人再搭理我了。翌晨，拉赫曼致電，自稱當天上午十一點他得去清真寺，接著他和他太太安排了一個「節目」，一直要到下午三點才能得空。他分身乏術，哪裡都沒法子帶我去，連帶我去參觀一家蠟染工廠的計畫也要胎死腹中了。他甚至連開車送我到機場也沒時間。

天雨無歇，我只有待在房間裡。旅館的「維修人員」用報紙糊住空調送風口，卻無法稍減小房間裡的刺骨寒意。為了取暖，我只好敞開浴室的百葉窗，大雨也順勢啪嗒竄進。旅館大廳僅容迴身，我只有在大廳、餐廳與自己臥房中消磨時光，一直耗到下午近晚，搭車駛進汪洋積水，重回機場。日頭好不容易稍稍露臉，轉眼間，大雨又浙瀝降下。雨水打在跑道的積水上，激起高揚花白的大片水沫。

重建馬來西亞的理想

檳榔嶼¹在大馬西岸上，不過是一段航程的距離。西岸是馬來西亞全國最先進的地區，受到的殖民影響也較為深厚，除了英國人擁有的大片栽植林地、工廠之外，華人也隨處可見。這裡也是安華·依布拉欣所領導的ABIM崛起之地，由是，夏菲也就替我安排了一趟親謁造訪之旅。可是從哥打巴魯回來之後，我就遲疑不能確定了。飛機在檳榔嶼短暫停留，再起飛飛往吉隆坡，我心中舉棋不定，只想就這樣飛回吉隆坡算了。可是，我還是下了飛機。

航程雖短，卻像是來到另外一個國家一樣。檳榔嶼有一座國際機場。天氣晴朗無雨。機場大廳裡，三十四歲、在附近一所大學工作的阿布拉，正等著接我。

知名廠牌的工廠，繁忙的市鎮，優雅的公共設施，目不暇給。阿布拉開著車子從機場載我進城區，剛開始，他措詞選字還嚴守中立，彷彿也在探索著他和我之間應當如何互動，只是沒多久，他的激昂熱情還是不由自主的流洩了出來：跨國公司、低廉的工資、馬來人散漫隨便、他們如何缺乏競爭力、

¹ 檳榔嶼 (Penang)：馬來西亞西北部一州，為馬來半島西北部沿海的狹長地帶。檳榔嶼島位於麻六甲海峽，是英國殖民者在馬來亞的第一個落腳點，首府是喬治市。

現況亟需伊斯蘭教的挽救。阿布拉在馬來人當中，面容算是白皙的，五官輪廓也隱隱顯現著西方白人的特色。可是他不滿於現況，他的激情令他看來備加神傷。透過他的引介，我認識了穆罕默德，他比阿布拉要年輕兩歲，外表看起來更像華人而不像馬人。穆罕默德是一位教師，同樣也肩負著馬來人的十字架。

他們將我送到「東方快車」大飯店，就讓我先自己休息一陣子。東方快車大飯店在英國殖民期間就已經赫赫有名了，這家飯店至今猶是輝煌不減當年。進入飯店大廳就像是準備接受洗禮，整個人都煥然一新了起來。我房間裡的客廳，就開向一片植有灌叢與棕櫚的平台，大海就在平台之外，可惜夜色深沉，我遂無緣一睹海景。然而，此時能夠暫時拋開馬來人的馬來西亞——縱使我對阿布拉與穆罕默德之抑鬱不快，寄予無限同情——遠離哥打巴魯知足常樂又言行不一的鄉親們，實在是人生一大樂事，感覺無限舒暢！我原本抽緊了的胸口，現在也逐漸鬆弛；坐在寬敞的餐室裡，桌巾像是剛剛洗淨熨整過的，華人侍者動作俐落而經驗豐富，我的心神情緒也跟著輕鬆愉快，一餐之間，我竟然喝掉了大半瓶的澳洲白酒萊斯凌。

晚上十點鐘，分秒不差地，就在我還為了晚餐的白酒醺醺然之時，阿布拉與穆罕默德依照先前的約定，準時回來找我。我向飯店要了茶點和咖啡。負責客房服務的華人侍者，原先對我這個全然的陌生人極為友善，幾近於殷勤款待，此時一見到我房裡的兩位馬來客人，當下就面無表情，彷彿他在一瞬間就察覺出我這兩位客人的底細與本色：這兩個相貌英俊卻滿腹憂思的馬來人，其實內心包藏著種族與宗教的使命。

剎那間，我看著他們——他倆坐在藤椅中——有如在遠距離之外遙望。客房侍者離開之後，我便對穆罕默德與阿布拉說明晚上用餐時，我腦海中突然興起的想法；也就是說，在這樣一座殖民時期的大飯店裡，讓人欲迎還拒，半心喜愛，卻也半心排斥，鄉下出身的馬來人進入這樣的場所，隨即成為自己

國家裡的異鄉人。

穆罕默德，那個年紀較輕的一位，五官肖似華人，首先回應道：「你說得對。」

「我們的確感覺像是異鄉人。」阿布拉附和道。

「在你還是個小孩的時候，就曾經這麼感覺到嗎？」

「特別是在大人帶我們進城來的時候，」穆罕默德說道，「我是在馬來鄉下接受小學教育的。小學畢業後，家裡就將我送到一個小鎮上念中學。巴特渥斯（Butterworth）。」講到這個英國校名時，他以當地人習慣的方式發音「巴的渥斯」（But, worth, 譯按：意即「還是值得」）。「學校其實不遠，從這裡跨過一條運河就到了。可是，我已經感覺自己像個異鄉人了。」當時他只有十一歲。

「我還記得我第一次被帶去見我的老師時。誠如你所說的，他們都是我的父執兄長。我的伯父帶我到那所學校。學校旁邊就是一所基督徒的墓園。所以，校園一旁緊鄰墓園及附屬的禮拜堂，怎麼都避不開。因此，我們總是在這種氣氛下上課，基督徒與外國人的氣氛。當然了，每天早上我們都得跟著唱他們的歌。」

「讚美詩。你還記得任何一首嗎？」

「我全都忘光了。」可是他還記得當年學校裡點點滴滴教導給他們的基督教宗教知識，「不是伊斯蘭教。從來沒有人教我們任何關於伊斯蘭教的知識。這是發生在一九五七年左右的事情。那個時候，我們就快要獨立了。或許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導致我們的青年，我們這一整代人都迷惑無解。你本來是個穆斯林，從小在穆斯林和馬來鄉下的背景中長大，突然給人家帶到——轉移到——那樣的環境裡。那就是為什麼一直到最近，我的世界觀還是非常不合伊斯蘭教義。」

「你的意思是？」

「你對於生命的整體觀點——你如何看待人與社會？你對於大自然抱著什麼樣的想法和觀念？你覺

得自然是你生命的一部分嗎？你應該跟自然對抗，還是去征服自然，還是應該跟大自然並肩共存？最後，還有，你對於超自然現象的觀感如何？你認為超自然是強而有力的嗎？」

「身為一個穆斯林與馬來人，你自己對於自然環境又抱持著什麼樣的觀點呢？」

「關於這一點，我們稍後再詳細討論。」

「那麼，要你說的話，你們在學校的時候，他們又灌輸你們什麼樣的自然觀呢？」

他語塞頓頓地說：「在那個階段嗎？」畢竟，提起這個主題的是他自己呢。他無語尋思了一會兒，「當初他們傳授我們的觀點，也不盡然純粹是基督教的觀點。其實是將基督教教義與俗世觀點混雜在一起。其中一個想法——當初就這樣灌輸給我們——他們認為，大自然是有待開發與征服的。等一下，最重要的是，自然環境是沒有靈魂的，唯有征服自然，你才能安平自保。」

我回想起自己在千里達求學的日子，同樣也是英屬殖民地，同樣有著大片的栽植農場，學校的老師曾經教導我們諸如此類的觀點嗎？

我問阿布都拉：「你同意穆罕默德剛剛說的話嗎？」

阿布都拉說：「他講的沒錯。」

「當你還是個小孩子的時候，你就像這樣有所感觸了嗎？還是說，你只是現在才萌生這樣的想法？」

穆罕默德說：「現在，直到我們重新回顧伊斯蘭教之後，我才開始產生這種體會。」

「可是，難道他們在學校裡沒教你們華滋華斯和英國的自然詩嗎？」

「那不是我們上課的重點。我們只有在上文學課的時候，才會教到這些英詩。而且老師總是會說，這些詩人都是浪漫派代表人物。那並不是他們思想的要素。因為在我們求學期間，所有的重點都擺在如何開採錫礦、如何伐倒樹木，以及如何建造工廠。」

穆罕默德說的對。英屬馬來西亞，這整片西部海岸上，不過就是一片栽植農場和一處礦場而已。英

國人引進了華人、印度人，甚至還有少數的爪哇人來此採礦栽植，當地的馬來人適應不了像這樣必須集中同住在臨時工房裡的粗重勞工，還是守住他們建造在河畔的青翠村莊。那些馬來村莊，至今都還散發著濃郁而迷人的田園風味，井然有致的園子裡，綠蔭高樹跟果樹與香蕉交錯雜立，木樁上架著原木紮排搭建的小屋，透風清涼，宜於小憩補眠，半堵矮牆圍起的陽台，適於三五好友聚會清談。有別於控制嚴密的大農場，栽植林地上的橡膠樹成行直立，還分成不同區塊，定期採伐，定期補植，林工就住在林場上。馬來人的生活也不同於礦工，也不能相提並論於小鎮居民的日子，鎮民面對著平坦開放的市鎮，經營他們櫛比成排的店舖住家。當穆罕默德還是個馬來村莊孩童時，一定驚慌地醒覺到，眼前是兩個不同的世界，截然不同的景觀，而且要比我在千里達時所能體會的多更多。只是，當時他究竟又注意到了多少？其中，出自他的馬來村莊生活背景的本能，又允許他看見多少呢？

「你自己對於大自然又抱持著什麼樣的觀點呢？」

之前，他已經一度避而不答這個問題，即使到現在，他還是吞吞吐吐的。「那個時候嗎？或許，我自己也說不上來。」

「現在，還是請你盡量說說看吧。」

「現在——要我構思出自己的觀點？」接著，類乎夏菲的直爽坦白，他突然緘默無語了，一逕苦思當年未曾通徹脈絡的思路。

我想要幫他一把，就開口說道：「當然囉，關於自然，馬來人一定也有清開叢林種香蕉，房屋四周栽芒果，叢林不敢過——諸如此類的想法。難道這樣就不算是征服自然嗎？」

「我比較傾向說那是跟自然共存。那就是馬來人的觀點。我們的想法中沒有像西方人那樣要去征服自然，不像他們現在這麼強調。」

阿布都拉說：「我們的想法比較像是只為了滿足需要而開發。」

穆罕默德說：「同時，馬來人也會照料那些當時沒用上東西。」

「哪些東西？」

「那些自然的成分。那些自然的組合因子。」

可是，現在我隱約覺得，他們開始堆砌鋪陳的理念，他們正企圖挖掘出恰恰符合某種毫無思慮的生活方式，正是西方人所倡言的生態與環境理念。

而在我持續追問穆罕默德之下，在他胡謔了一兩個虛偽的開場白之後，他說：「目前，我依舊無法確定我們馬來人看待人、社會與超自然現象時，心中究竟有什麼想法。」

「超自然？你真想用這麼熱門的字眼嗎？」

「假如我們真理解某個特定族群的世界觀的話，『超自然』這個字眼就絕對迴避不了。就我們現下討論的主題而言，也就是穆斯林或是馬來人的超自然觀點。」

他言僅於此，只將他空泛的情感留給我捉摸。

他看來似乎也意識到自己言語浮泛了。他說：「關於先前我提過有關錫礦的事情，我想再補充說明一下。當時老師告訴我們，自然是有待征服、開發的——他們鼓吹這些理念都是為了配合工業革命。」

那還真像是學童學舌，歷史學生交報告。可是，他話中的弦外之音隱隱作響。我猜想，他正在援引兩度從他心中移除的想法：起源於西方的觀點，再經新伊斯蘭教運動的宣教士擷取、簡化、廣泛印刷傳播——西方已死，西方人性靈頹敗，西方人只是徒然浪費世界資源等等。

我說：「當初你還在學校求學時，一點都沒有體會到這些想法嗎？」

他沒有回答。

我們三人落座以來，泰半時間一直保持緘默的阿布都拉，這時開口回答了。阿布都拉說：「至少對我而言，我還在學校念書，五年級的時候，就開始明白這些事情了。我的意思是說，我們存在於這個世

界上，不僅僅是一樁偶然的意外而已。我們的生存應該還蘊含著更深刻的意義。我個人從小就接受了宗教訓練，因為我家人都具備了強固的伊斯蘭背景。在我十七歲之前，這樣的想法就不再只是埋藏在我內心深處了。」

「那麼，那段期間一定發生了些什麼事情，促發了你的覺醒。你碰上什麼事情讓你開始質疑他們在學校裡教給你們的東西。你能不能舉出一個比較具體的事例呢？」

「我記得我們在上英語文學課時，學校要我們念一本書《人與神》(Man and God)，是希臘神話，裡面講的都是些宙斯、愛芙羅黛蒂和麥洛，還有其他所有的希臘女神；阿波羅。根據希臘神話記載，這些人物都是天神，不過是以人身份出現在世間罷了，接著再在各種人類活動中攪和，不是嗎？像是挑撥離間、製造敵對，還有微酒逐色、放蕩形骸等等。當然，他們在道德層面上也沒有缺席，你是知道的。所以，我身為一個穆斯林，看到這種天神有這種行為就覺得豈有此理，十分反感。舉例來說，我還記得，朱比特變做人身下凡來誘拐那個公主——我想不起她的名字來。除此之外，要是我們上地理課的話，就會念到各種地形形成的原因和過程，比如像火山是怎麼形成的，你就會聽老師說如此如此，這般這般，火山就是這麼形成的。可是一上到宗教課，宗教老師又說了，這一切都是某個掌管著整個宇宙的全能天主所一手擘畫的。因此，我就會跟宗教老師討論這些事情。我還得說，幸好我們家是個大家庭。所以說，有時候我們在家裡也會談到這些問題。我說，火山怎麼會就像他們在地理課堂上講的一樣，突如其來地就冒出來了呢？火山一定是某些神祇創造出來的。」

穆罕默德說了：「我的背景跟阿布都拉不一樣。說起來，在我身上，馬來人的成分多於穆斯林。我想，我家人對於宗教沒那麼講究，對於伊斯蘭教的知識了解的也不多。後來我上了教會學校，學校裡傳授的教育，混雜了基督教義和世俗的觀點。」對這些人來說，世俗是個惡劣的字眼，這字眼意味著現世、無神信仰、西方的、非馬來來的。「所以，中學畢業時，我就變得非常世俗。那種情況下，我日子過

得很迷惑。當時我對伊斯蘭教的了解也很少。所以講起來，我的伊斯蘭意識醒得很晚。當我一開始擔任教職之後，就又重新拾起伊斯蘭教，開始認真研習。」

我說：「當時你究竟在迷惑些什麼呢？我的背景要比你們都來得複雜，可是我並不迷惑。而且跟我一樣清楚自己在幹什麼的，還大有人在。現在這個時代，很多人的出身背景都不是那麼直線單純了。」

穆罕默德說：「你只是經過深思熟慮之後，不再迷惑而已。」

我說：「深思熟慮之後。」

他微笑說道：「你不再迷惑，因為你接受了，你認命了。」

「難道你不能接受自己嗎？你是個馬來人，你上教會學校，因為那是當時你能進的最好的學校。難道當時你不曉得自己是什麼樣的人，以及你為什麼要上那樣一所學校嗎？」

「或許不吧，」接著，他又重複一次：「或許不吧。」他又側首思索了一陣子，接著說道：「雖然我說我們家在宗教信仰方面不是那麼強烈，我還是知道，我每天都做禮拜，我們全家人也都會做禮拜。然後，一到學校，他們就要我們開口唱這些基督教的歌。當然啦，那樣一定會害得我非常迷惑。另外，校方還有個教育理想，兩性合班教育，男生女生混在一起，這也讓我手足無措。」他存心將教會學校的最大震撼，保留到壓軸時刻。「在那間學校裡，你總是避不開女孩子。學校還叫你跟女生牽手，一起跳舞。」

穆罕默德三十二歲了，自己也是個老師，他在大學裡也有朋友。可是事經二十年，教會學校如此甘犯村莊生活之大不韙，還是叫他怔忡不安。而且就像我在吉隆坡的假日飯店裡面對著夏菲一樣，要將眼前這個優雅的男人，跟他所說的話連結在一起，還是讓我感到相當費解與艱難。在這間廳門敞向一方平台，平台上棕櫚灌叢相映成趣，傍著海邊的一鴻泳池，這人坐進一張藤椅裡，顯然十分舒適自在，可是他言語間卻猶然驚扭不歡。

他說：「我們聊了一個半小時的話了，可是卻還沒談到你跟我們說想要談的重點——重新架構我們的社會。」

這話不假。可是，我寧可避而不談社會架構。今天傍晚，從我們稍早的對談中我可以猜想得知，他真想致力的目標不在於重新架構；動搖國本，拆解清除社會組成成分，才是他真正的興趣所在。他唯一想要加以運用來重建社會的，只有伊斯蘭教，伊斯蘭教的抽象概念。話題就這樣導向至此。馬來西亞剪不清、理還亂的痛苦病灶；馬來人之閒逸散漫、華人之積極進取、種族政治、晚近出口收入所導致的貪污腐敗，這個教育程度低落的弱勢國家對於科技一面倒的倚賴——馬來西亞在我們的談話中消失了，飛升為一個抽象概念，一個信仰純正的國度，五體投地，全心拜服於阿拉真主。達成這般全國全心的順服之後，所有內政外交的問題都會迎刃而解。

時間到了午夜，他們得走了。要是過了半夜十二點再開車回家，會讓他們緊張焦慮的。臨走前，穆罕默德遞給我兩篇文章，留待我詳細閱讀。其中一篇是他的隨筆文章：〈現代主義的缺失：穆斯林世界之納達（Nadani，文藝復興）趨勢〉，通篇文字正如伊斯蘭教宣教人員的文宣。文中某個段落題了這樣一個小標：「西方之破產」（「罪惡與慾望，酒精與女人，狂野的派對與充滿誘惑的周遭環境」）；另外一段的小標為：「伊斯蘭教之完美無瑕」。如此思維背後有一個邏輯。教育與灌輸穆罕默德各種知識的西方文明，同時也訓練了穆罕默德如何判斷思考，因此，西方世界必然無所迴避於各種批判。至於伊斯蘭教，宗教無法累積學養與知識，唯一的功能只能讓信徒重拾信仰，理所當然地可以免於所有的批判與質疑。

穆罕默德留給我的第二篇文章，是他為了這次會談，用鉛筆撰寫的一份備忘，是他所謂重建馬來西亞的主旨大綱，內容之空泛抽象與題目不分軒輊。他的「信仰體系」強力呼籲全國上下共同膜拜阿拉；至於他的「社會體系」，他則要求自由「各層部門不得瀆職貪污」，保障婦女與家庭生活，「禁絕賣淫與

同性戀娼寮」；「經濟體系」則堅持「良心收入，禁絕賄賂、賭博，不得剝削貧下階級」。可是，文章結尾卻刺眼難堪。穆罕默德在文章最後一段，討論到他的理想國的「政治體系」時，呼籲道：「推出近乎伊瑪目的政治領袖：哈里發代表真主統理人世」。說穿了，穆罕默德正在呼求某個像是阿亞圖拉何梅尼一樣的寡頭。何梅尼同樣自命為真主的代表統治伊朗。穆罕默德同樣一心期望，某個像何梅尼那樣的宗教領袖，可以下凡出世來統治馬來西亞。通篇空言當中，這是他唯一提得出來的具體建議。

而萬流歸宗，那就是他的馬來與穆斯林激情、他的歷史知識、自覺意識的醒覺與知性的生活，共同歸納得出的結論。他對於改革毫無概念，至於改進現況的過程中任何一項環節，他也一無所知。他根本無法實事求是。然而，要他廢除空言，回歸現實，委實太困難了。他全盤倚賴別人的論述與想法，再將它們填塞進入他無法用言語表達的激情當中，要他落實具體，委實強人所難。他一心只期盼著這個世界能夠在迅雷不及掩耳之間，全盤改造，突如其然地（就像他回憶中，田莊男孩進城去，就讀一所位於墓園一側的教會學校一般突然）重新回到信徒的掌握之中，就像當年他的世界驟然逸出他的掌握一樣。

穆斯林世界發生的新聞，讓人無法振奮。伊斯蘭時代的新紀元——肩負著多少信徒的殷切期望——開啟了一連串的浩劫災難。巴基斯坦一架滿載著朝聖客的客機，朝聖客結束朝聖之旅，正要啟程返鄉，飛機卻在離開麥加機場不久後墜毀。麥加本身，清真寺裡的槍戰已持續多日，多人傷亡。而在巴基斯坦，戒嚴法執行得更為嚴格，軍事政府取消了選舉，重新實施公開鞭刑；當局逮捕一位知名的記者，並廣為刊布他戴著手銬腳鏈的照片。在伊朗，美國大使館遭到學生襲擊，並挾持五十多名美國人作為人質，暴徒無啥清晰動機，不過就是達成戲劇效果罷了。伊斯蘭革命已經開始發餓了，走上歧路，迷失了目標。

可是，阿布都拉與穆罕默德面對信仰的國度所傳來的噩耗，絲毫不予採信。穆罕默德以為，巴基斯坦局勢之動盪不安，適足證明這個國家終於進入重新架構的過程。阿布都拉則認為，路透社和美聯社都未曾正確報導有關伊朗的新聞。當天傍晚，我們曾經討論過這一點，而阿布都拉說：「我們應當建立自己的新聞媒體。」

我回到吉隆坡，回到了假日飯店。

總機小姐在電話裡說道：「你還好嗎？你的胸口還疼不疼？你知道嗎？要是你有氣喘毛病的話，你就不能吃冰的，你應該要吃蝙蝠。」

「蝙蝠？」

「是啊，蝙蝠。蝙蝠——蝠。我們馬來村莊的鄉下人都是這麼說的。你把蝙蝠抓來，把蝙蝠心臟挖出來，再把蝙蝠心拿去烤，烤得脆脆的，要真的很脆，然後再把它磨成碎粉，混在咖啡裡喝下去，一天兩次。我們鄉下都是用這個偏方的，真的有效。」

「可是，蝙蝠的心臟應該很小一顆吧？」

「那你大概一次要用上兩三顆心吧，我也不曉得。反正很有效就對了。」

過去的美好時光

夏菲到飯店來看我，順便探問我這趟旅行收穫如何，我跟他說：「你怎麼沒跟我提到哥打巴魯雨下一個不停呢？這就好像跟我介紹格陵蘭的時候，略過不提那裡的冰天雪地一樣。」

他哈哈大笑。「那個，我還真是漏掉了。我們哥打巴魯只要一淹水，大家就會覺得這裡好像是水鄉澤國。這可是一樁大事。然後，我們就會划船出門。有個故事說——可是，我從來沒有親身經歷過——

女孩子會穿戴得花枝招展的，就像要參加慶典節日，穿上她們最好的花裙子；男孩子呢，就會趁這個機會仔細打量女孩子。路上淹水也不會深過膝蓋的。還有划船。我們每一戶人家家裡都有一艘船，拴在房子底下，每一家都會把船拖出來，準備參加划船活動。我們會划著船逛村子，看看平常沒水的地方，淹了水會變成什麼樣子。等到氾濫季節真的開始了，我們就會砍下香蕉樹幹，再拿一個竹竿插過香蕉樹幹，紮成一條香蕉筏，然後我們就跨在這條筏子上，划著槳出去玩。」

「聽起來還挺像個天堂的。你看你講的，連你自己的一雙眼睛都亮了起來。」

有時候，夏菲就是這樣歡喜陶醉地講起他的村莊，語氣不像個村莊居民，反而像個浪漫的觀光客，像個從遠處瞭望他的村莊的人。

「我們總是渴望著下雨。我總是喜歡水。」

過了幾天，安華·依布拉欣前往孟加拉參加一項伊斯蘭會議，ABI M辦公室比較空閒，夏菲又來看我了。我們招了一輛計程車開出去遊車河。我們開到吉隆坡西區一處優美的山坡地，看到一大片新近興建的住宅區。在我眼中，我看到的是一座修葺精緻、維修良好的新興都市，灑錢所及之處，莫不欣欣向榮，可是，那不是夏菲帶我到這裡來要我看的。新舊城區的差別，也正是馬來人與華人際遇之分歧。而就算房子是新建的，夏菲還是可以一眼認出哪一棟是馬來人的房子，哪一棟裡面又住著華人。

於是我就跟他玩起這個遊戲。我當菜鳥，盡量挑些容易辨識的例子。我們經過一幢周圍堆疊著木料的房子。我說：「華人的家？」夏菲說：「華人住的。」我們經過一棟前院種了成排蘭花的人家。我說：「馬來人的房子？」夏菲說：「不，還是華人的。」我放棄了。

再走遠一點，市郊轉為鄉間，我們跟幾個女孩擦身而過，其中一個女孩相當標緻，她們都坐在一輛巴士車頂上，都是馬來女孩。

夏菲說：「這些超越時空的人。」

「你怎麼會用這種話來形容他們呢？」

可是，夏菲對於「超越時空」這四個字有他自己的解釋。同時，他的出發點也不是為了表現浪漫，而是強力籲求革新。「這些人超越時空。他們不受時間限制，也根本不在乎時間。他們有的是時間可以等公車。他們一點也不急著把事情辦完，你還可以在某些村莊裡看到他們遊手好閒，浪費時間，玩牌、閒聊。『你上哪兒去呀？』『我上市場去呀。』要是你再問他，『上市場做什麼？』他們不會跟你詳細說明，究竟他們上市場要做什麼，他們只會跟你漫不經心地瞎扯——上市場去看人來人往啊、看看朋友啊、跟大家打個招呼啊，然後將近吃午飯的時候再轉回家去呀。他們朋友之間要是碰了面，總是講些，『你小孩怎麼樣啊？最近打到什麼魚啊？今天市場上魚多不多啊？你們家裡最近好不好啊？水淹得有多高啊？十五呎？十九呎？』這些人真是完全不受時空限制。」

我們開到一個油棕農場。油棕樹幹粗糙，張揚著暗綠色的羽狀複葉，成排成行地栽植。果園邊上堆著一枝枝結實累累的果穗，黃紅斑雜的油棕果實，富產棕油，剛經過一場雨淋，椰果表皮上還是濕潤滴水。天色灰霾，山雨欲來，我們就將車子往都市開回。

司機突然驚呼一聲：「蘑菇！」夏菲就請他將車子停在一頂馬來路邊棚攤旁，攤子上正擺設著蘑菇出售。白色長柄的大型蘑菇，一把把地綁在一起。

「這些蘑菇可不是人工栽植的，」夏菲辨識著，「這些都是鄉下人在森林裡摘來的。」

我說：「看起來花朵好像。」

他手上捧著剛剛買下來的那一把蘑菇，兩眼凝視著蘑菇，嘴裡說道，語氣罕見地溫柔，「蘑菇確實也是一種花朵啊。」而當我們再度啟動，重新駛回路上時，他說：「他們在村子裡，總會跟我們耳提面命，『千萬不要用鏟子去挖蘑菇。要是你用上鏟子，蘑菇就再也回不來了。』以前我還以為這麼說是因為鏟子是金屬做的。其實不是這樣。老一輩人家的意思是，要是你用鏟子挖蘑菇，你就把蘑菇的孢子和

表土都一起挖掉了。」

那幾個女孩還是坐在巴士車頂上。

快到吉隆坡的時候，夏菲請司機將車子開下高速公路。我們開車經過一處聚集了馬來人的臨時聚落，這些人都是從鄉下進城暫居的人。聚落裡的房子跟馬來村莊裡的屋舍差不多，只是興建的比較緊密，住家周圍也缺乏綠色蔬果菜園。這些房屋都是連夜趕建、隔日進住的，而夏菲指著幾路邊幾個大倉庫，倉房裡堆棧著木材及其他建築材料，以敷流動居民建屋所需。

「那些華人，」夏菲說道：「專門剝削馬來人。」

「難道他們不也提供了勞務嗎？」

「他們的勞務不過七成心意而已。」

「那還不夠嗎？你指望每個華人都是聖人，你我之間的差別就在於此。」

我們一同在假日飯店裡用午餐。這回，他對餐點食物就沒啥挑剔了。

我說：「這是真的嗎？你從來不曾像跟我對談一樣的，跟別人談起，或是回顧反省自己的生平嗎？」

「一點也不假。對我來講，過去就過去了。我覺得自己也沒那個時間去想那些事情。」他又補充了一句：「過去那些美好的時光。」

他對於歷史一無所知。他從父母親口中聽說日軍在二次大戰期間占據過馬來西亞，不過，除此之外，他就空空如也了。大馬其他地區還有些古老的傳說，可是在哥打巴魯，鄉野傳說付之闕如，抑或，他從沒聽說過任何傳說故事。他還在學校念書的時候，也從未傾心於歷史研究。而現在，他公務纏身，推展運動如火如荼，分身乏術，又怎麼抽得出時間學習或是研究歷史呢？他將自己封閉在他的同胞豐富多彩的過去之外：印度教、佛教、靈魂信仰等，他一概充耳不聞。

他活在虛無凌波之中。他感覺身為一個馬來人，他兩手空空，一無所有；職是之故，他暗心期望——雖說，這種妄想也不是辦不到的——自己除了正當信仰之外，其他一概一窮二白，類似某種抽象人物一樣。他曾經說過，人要是想要真正進入文明狀態，就得清楚掌握自己來自何處，去向何方。這種追尋與歷史無關；對夏菲而言，唯一重要的，只在於宗教信仰正確與否。只要建立正信，其他一切自然水到渠成。基於他對馬來同胞的熱愛，他殷切期盼自己能為國人矯正俗世的偏差，他要他們盡可能的純淨，就像他以為自己何等純淨一般。他加諸在自己肩頭上的使命還真是任重道遠。

我說：「難道宗教不會轉移民眾的注意，占用掉他們原先該拿來辦正事的時間和精力嗎？難道宗教不會淪為一般人用來逃避現實的出口？」

他略過我話裡的要點而以自己的方式詮釋我的問題。他說：「我們是開疆拓土的第一代。馬來西亞沒有幾個人懂得何謂全方位的伊斯蘭生活方式。我們想要改變普通的伊斯蘭傳統，正宗的伊斯蘭生活方式不是那樣子的。可是這個過程要推動不容易，還要花上很多年的時間。」

我繼續問他如何看待自然環境。我跟他複述了一遍穆罕默德與阿布都拉在檳榔嶼跟我說過的話：穆

斯林力求與自然共存，而非穆斯林，尤其是西方人，只想征服自然而已。他並沒有使用穆罕默德與阿布都拉的語彙。「我得坦白跟你講，我們的村子從來就沒有經過開發。沒有錫礦，沒有橡膠樹栽植園。所以在這方面，我也說不上什麼。」他的經驗更為狹隘，而且還侷限在個人切膚體會上。「我小的時候，對周遭環境只有一種印象，就是乾淨。溪流不曾經過化學藥品污染。我們村子裡唯一的污染源，就是隔壁華人社區裡養的豬和豬的排泄物。我十五歲的時候，村子裡開始開起染坊，總共三家，一家馬來人開的，兩家華人開的，從此，化學染料就不斷倒進河流裡。結果，我們在河道支流的溪流裡游泳的活動也受到干擾。他們毀壞了我們的遊樂場。他們應該挖個洞，把廢料埋在裡面。我們那一幫——我和幾個青少年朋友——覺得非常不高興。那家蠟染廠正好是華人開的，我們就

非常看不起那家工廠。」

「我現在正在讀一本馬來小說，作者講到馬來人在住家陽台下面都有個小便池。」

「那是生物污染，有時候這些排泄物也可以做堆肥，像是鳥屎、雞大便。可是不管再怎麼說，因為我們有受到宗教的限制，所以不會拿豬大便做堆肥。」

「你小的時候會覺得青山多嫵媚嗎？稚嫩的稻穗會不會讓你覺得很美？」

「在我們看來，這不過是很家常便飯的風景。我們從來不會去想那樣的風景美不美。可是，我們也在幾本小說中讀到稻田的美，還有風吹過竹林發出某種音響，自然的聲音，這下子我們才領悟到，原來我們周遭真是美不勝收。」

「今天早上你才跟我說，講到那些房子的時候，你說，華人種瓜栽花都是為了商業上的理由，馬來人則只是為了追求唯美的價值。」

「我可沒說『唯美』那兩個字。」

只是，他確實是用了「唯美」這兩個字，我也因此印象深刻。雖說這兩個字也不是用得毫無道理，但或許他提到「唯美」的時候，其實心裡並不是那個意思。他的意思是：華人住的房子和院子，皆可謂商業性質的設施；院子裡養著成排蘭花的房子裡住的華人，養蘭純粹只為賺錢。馬來人的院子就是花園，是家的一部分，從來不曾脫離這片美好的大地，一直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即使園中生產的花果準備出售、待價而沽亦然。如此錯綜複雜的情緒，怎能濃縮在一個單字裡面呢？「唯美」（雖說也夠公道了）只是夏菲抄捷徑的說法，也是他無心說溜了嘴，只是立論不夠嚴謹，不能固若金湯的防堵質疑。或許這個想法，他根本就還沒有完全想通。即使華人與馬來人之間確實存有差異，感觸得到，同時也看得見，然而馬來人與華人居家屋舍之間卻找不到任何站得住腳的確切差異，任何牽強附會的定義都經不起考驗而左支右絀。

而我也在心中納悶著，難道是夏菲這般無法以適切詞彙表達感受的窘困，再加上他對於自身歷史毫無觀感，將他推擠到了他現在的處境嗎？情感，不受語言羈絆，始終只流於情感，日後再匯入宗教；也是藉著這股情緒，讓夏菲囫圇吞棗地閱讀這種宣教信仰的抽象文章；這股難言以喻的情感，掩藏了他的動機，模糊了他的目的，同時，有時也讓他自己搞不清楚自己。而今，宗教掩藏了真實的情緒。他熱愛他的往日情懷，他的小橋流水；現在，他卻致力於連根剷除他的故鄉。

他說：「講到香蕉園與馬來式的屋子，我跟我父親有些意見相左的地方。我很喜歡那些鮮豔漂亮的開花植物，心想要在家裡前院種上一些。可是我父親在家門口直接挖了一個大坑，然後他連續好幾天都在坑裡燒些廢物和垃圾——香蕉葉子、雜草，還有園子裡其他的廢棄物，最後，他就在坑上種了一棵香蕉樹。這樣，我實在不是很高興。我父親說了，『種香蕉，我們還可以摘香蕉下來吃。種花，我們什麼好處也不會有，花又不能吃。』」

「我請我其他兄弟姊妹過來跟我站在同一陣線，好跟我父親據理力爭，可是香蕉樹還是栽在那裡。幾個月以後，樹上就長出香蕉了，這時候，我父親就開始笑我了，『你看吧，現在，我們可以收成自己辛苦的結果了。而你種的花，又能給你什麼收穫呢？』其實，我父親挖的坑，正是我過去種花的位置。後來，我開始排斥起種花了，因為花朵除了好看以外，我什麼回饋也得不到。」

我說：「你現在對這件事有什麼感想嗎？」

「我父親說的對。即使到現在，在我們吉隆坡的家裡，我太太想要在盆子裡種些花草，我也堅持我們不要種花，種些綠色的蔬菜比較恰當。」

[第四部]

印尼：篡奪

一、摧擊

就在我即將結束馬來西亞之旅時，夏菲改變了對我的想法。我準備搭機離開吉隆坡的那天早上，他撥了通電話給我，跟我提了幾個在印尼推動穆斯林運動的成員姓名。他說，穆斯林運動在印尼的處境比較困難。然後，夏菲又來電致意，他要我在前往機場的途中，到他辦公室坐坐，他想跟我說再見。可是就在一個小時後，當我抵達 A B I M 建築時，夏菲竟然不在辦公室裡，也不肯從他所在的樓層下來跟我會面。

他差了一名老先生下來見我。這人頭上戴了頂馬來小帽，剛從瑞士回來。他出差瑞士也是為了辦理伊斯蘭業務；這些新穆斯林還真是行千里路。（馬來西亞某些地區傳出的消息指出，歐洲人正急速改宗伊斯蘭教。斯堪地那維亞的社會風氣一貫自由，民智開放，早就陷落拜服了；法國一半以上人口都是穆斯林；而在英國，每天都有數百人皈依。）

這個剛從瑞士回來的人，跟我聊起美國駐德黑蘭大使館遭到襲擊的新聞。他說，西方新聞媒體如此偏頗，他都不知道該相信誰家的報導了。可是他還在瑞士時，曾聽說美國人僱了幾名伊朗人進攻「另外一處」西方國家的大使館，企圖折損伊朗革命的聲譽。伊朗革命衛隊事先破獲這個陰謀，將計就計，直接將這些受僱逞兇的伊朗人引導到美國大使館去，以夷制夷。

這裡的人已經失去了他們的宗教。

——席托·西杜莫朗（Sitor Situmorang）

就這樣，帶著因為夏菲，還有偽裝隱藏了他真正目標的伊斯蘭教而引發的沮喪低落，我驅車經過井然有致的大片富庶農場，直抵吉隆坡機場，當天下午就降落在雅加達了。

雅加達靈雨方歇，道路兩邊盡是紅色泥濘。長排鑄鐵欄杆圍籬（究竟在防堵何方神聖？）；水果小販挾著水果籃子席地而坐，不避濕氣；巴士來往，廢氣薰天；人潮散聚；散發出某個行將窒息的大城市的風味——紅簷屋頂，綠樹成蔭——憋縮在三兩叢立的摩天大樓腳下；冉冉上升的塵霾指示著高速公路的所在。離開天高地闊的吉隆坡後，來到雅加達，宛若重返亞洲。報童與殘障乞童占住十字路口。男人雙肩撐著一根扁擔，兩端各挑著一簍沉甸甸的貨物，快速、碎步地移動。（後來，我在印尼內陸城市日惹〔Yogyakarta〕試著挑起某個陶罐生意人的擔子，扁擔的載重壓力其實不在肩膀，反而直接落在兩腿肚上，每向前走一步，壓力就向下甸一甸，無怪乎挑擔人要踩著輕輕碎碎的步伐。）

可是，雅加達也是個隨處可見雕像與革命紀念碑的城市：一把自由之火；一群集結在革命大纛之下的勇士，揭竿起義，手上的傢伙不過是削尖的竹矛而已；還有一幅碩大無朋的圖像，畫著一串打破碎解的鎖鏈。這些公共藝術展示，似乎與城市生活毫不相干，而其創作風格也是進口的，有些模仿俄羅斯，有些則是表現派的手法。可是，豎立這些作品以茲紀念的卻真實不假：國家的榮耀，以及浴血苦戰換取的自由。

置身雅加達，就走入一個對於過往充滿歷史感的國家。而那段過往還早在印尼爭取自由與殖民時期之前。荷蘭人曾經統治印尼長達三百餘年，雅加達就是當年他們命名為「巴塔維亞」的城市。可是，現在在雅加達，卻再也找不到荷蘭語的蹤跡。目前四處通行的語言，同樣以羅馬拼音，卻是印尼國語，而某些字彙還是由梵文字幹所組成。雅加達這個城市名稱——再也不是巴塔維亞——也是個梵文字彙，意即「勝利之都」。而梵文出現在如此遙遠的遠東異國，我的心思不由得也飛回了好幾個世紀前的過去。

我住的飯店名號顯赫，婆羅浮屠洲際大飯店（Borobudur Intercontinental），標榜著第九世紀爪哇中部的佛教寺廟。這座九層寺廟宏偉的地面基座，讓飯店援引為商標的基調：三個同心圓，圓弧以虛點點出，架構在五個方形基壇之上，方形有如階梯層層相疊，直抵四個角落，造成漣漪般的效果。這個商標印在菸灰缸底部，編織在電梯裡的地毯圖樣上，大游泳池池底磁磚上也浮顯著這個標誌，藍色池水泛起的波紋，更添加圖樣上的漣漪效應。

印尼就跟馬來西亞一樣，也是個穆斯林國家。可是，印尼抑或爪哇，於前伊斯蘭教時期的文化表現——這方面在馬來西亞只剩下村野傳說與習俗而已——卻呈現出一種偉大的文明。伊斯蘭教於十五世紀傳入印尼，現在已成為國家的正式信仰。可是早在伊斯蘭教入主之前，印度—佛教文明就已經在印尼大放異彩，長達一千四百年有餘，至今這般文化特色還殘存在印尼各地，以許多不同方式現身——半遭抹滅，略顯神秘，卻依舊輝煌不朽，正如婆羅浮圖的寺廟。如此繽紛多麗的過往，也賦予印尼人，或是爪哇人，獨一無二的特殊感受。

獨立建國

雅加達四處可見的戰爭與革命雕像，往往過分強調，某些甚至看來荒謬。可是，雕像紀念著近代歷史，而這段歷史既富於英雄事蹟，又充滿血腥恐怖，讀來令人詫異昏亂。

一九四二年日本軍閥占據印尼時，荷蘭語言遭全面廢除。日人一聲令下，卸下或塗抹掉所有荷蘭文店招；就在一夜之間，歷經三百年的殖民統治，荷蘭消失了。大戰期間，日本人將蘇卡諾和其他幾個宣揚民族主義的印尼領袖（先前經荷蘭當局流放他國或下獄監禁）拱出檯面，組成徒有虛名的印尼政府。

日本人也組織了一支印尼軍隊。戰後，荷蘭人還企圖捲土重來，再度執政，也多虧了這支軍隊應戰，與荷蘭人對抗了四年。稍後，也是這支軍隊，在蘇卡諾擔任總統的二十年間，鞏固著印尼星棋羅布的大小群島於不散，鎮壓國內各地穆斯林與基督徒分離主義運動於無波。

印尼之獨立得來不易。獨立並非擬定五年計畫，一旦改朝換代即應運而生。獨立是經過不計其數的大小戰役贏取的；獨立也是經由混亂、示威，以及蘇卡諾源源不絕的大塊文章，高唱民族主義的華美文宣，方才得以降臨在印尼。蘇卡諾的鋒芒魅力已然消褪，軍方勢力卻不斷成長。最後，一九六五年之際，也是這支軍隊罷黜了蘇卡諾。軍方宣稱，共產黨人仗著蘇卡諾暗助，正欲圖謀不軌，染指印尼。接著，歷經獨立過程中的亂局與挫折之後，印尼群島面對著前所未見的殘暴恐怖統治。

當局逮捕了十萬民眾，大規模進行排華屠殺行動（華人定居印尼群島已達數世紀之久，傳統上總是躲不掉計畫性屠殺的厄運。一七四〇年，荷蘭人就在雅加達殺了數千華人）。同時，根據傳聞，印尼各島揚揚沸沸的群眾暴動中，將近五十萬名疑為共產黨徒之平民百姓遭抄家屠戮。有些人說，其實是死了一百萬人。印尼人至今仍為一九六五年與稍後的一連串暴動事件驚悚寒顫。每談起一九六五年，他們就像站在遠處，遙望著自身不可思議、無法理解的一部分。

而今軍方當政，四下可見卡其色軍用巴士；而雅加達點點散布著突擊隊（Kommando，怪了，這個特殊的荷蘭文單字反而沿用至今）的營房，營房一角總是飛揚著紅白相間的印尼國旗。軍方已然深入政治組織，並且嚴正宣告：此後軍方代表在各級政府都不會缺席，更要扮演有力角色。

印尼軍方緊緊箍住各個群島，不致動亂分離。軍方統治之下——經過了蘇卡諾提綱挈領，再以華麗辭藻極力鋪陳了二十年後——印尼終於平靜無瀾地過了十五年。這段期間，印尼拜原油輸出之賜，雅加達平地起高樓，鋪設起通渠大道，因應大都會要求的各項服務也逐一出現。在這段休養生息期間，受過教育的年輕一代也逐漸成人，印尼上下動盪五十年來，終於有一代初嘗社會穩定的滋味。然而，軍事統

治不時總會擦槍走火。此外，隨著穩定與成長，騷動紛擾總是接踵而來，猶如印尼這類國家不可掙脫的宿命束縛。

這股騷動暗流正以新伊斯蘭教運動現身，新伊斯蘭教超越了禮拜儀式，新伊斯蘭教探討阿拉子民所遭受的不公不義，以及俗世政府如何自甘為撒旦爪牙；勸人避俗出世的伊斯蘭教，此時卻教唆信徒更為激烈粗暴地向前躍進。

一個印尼穆斯林的故事

閱讀印尼近代史實在讓人頭昏腦脹。倘若將印尼近代這一頁動亂投射在一個平民百姓的身上看來，則更叫人置疑不解，在國政與法制率皆無所依託的情況下，竟然有人身受如此頻仍的人格摧擊，卻依舊存活無恙。

蘇理雅迪（Suryadi）年紀坐五望六。他個頭矮小，棕黑皮膚，外貌看來不堪一擊。他出生東爪哇，自稱是印尼全國「穆斯林統計人數」中的一員。他不曾受過任何宗教訓練，他信奉某種宗教不過是因為周遭環境如此。他無法確定自己究竟不相信來生這回事，也不知道預求美好來生乃是伊斯蘭教義的基要素。

他出身貴族階級，只是貴族在東爪哇不過意味著他家不是貧農罷了。當年，荷蘭人透過爪哇的封建朝廷遂行殖民統治，可是爪哇只是一處農業殖民地，因此荷蘭統治期間，晉身貴族無須高明的職技素養。蘇理雅迪的祖父身為貴族，生前不過是個薪資微薄的白領人士；蘇理雅迪的父親則在銀行擔任會計。

然而身為貴族，蘇理雅迪因此得以進入荷蘭人主持的學校就讀。學校收費低廉；事實上，蘇理雅迪

根本不必付費。教育品質相當精良，光從蘇理雅迪一口標準精湛的英語，就可以稍微探知其教學品質之優秀。此外，最近蘇理雅迪打算重拾德語，就在雅加達的德國文化中心「歌德學院」註冊上課，結果他發現，憑著四十年前荷蘭人教給他的德語，他竟然還夠格上中等程度班，稍後，他不費吹灰之力地通過德語測驗，獲得一紙證書。

一九四二年年初，日本占據了爪哇。東京電台播送出來的消息報導，日本政府將放手讓印尼獨立，許多印尼人也提獎擔食以迎日軍，將他們奉為解放印尼的王者之師。當年正是蘇理雅迪在那所學校求學的最後一年。荷蘭教師紛紛替換免職，遺缺由印尼人補齊，校長抑或督導則由日本人擔任。六個月來，教學活動一如荷蘭主政時期，正常進行。接著——即使國內天翻地覆，天網人事還是照常進行，委實令人詫異——蘇理雅迪進了大學。此時，大學裡的講師和教授就一概是日本人。可是，日本人就是拙於應付外國語言，這一點，他們自己也不迴避。過了一陣子，日本校方開始派任印尼人，奉日本上級之命辦理校務了。

印尼人利用授課時間大力鼓吹民族主義，頓時將印尼學生對於日本人原先存有的的一絲好感一掃而盡。蘇理雅迪十分明白，印尼全國經濟生產不過是為了挹注日本戰事需要而已。日軍徵召了成千上萬的印尼人，前往修築緬甸鐵路（而當時強迫遷移的印尼勞工，至今在泰國還組成了一個僑民社區）。電台也查禁封口了；過去接收東京電台二手傳播大好消息的收音機，現在也聽不得了。

這個時候，兩件事情同時發生，讓蘇理雅迪堅定地公開宣布他對於日本人深覺反感與抵抗。大學校方竟然通令所有學生都要剃頭，那是追摹禪宗寺廟裡出家的規矩。而蘇理雅迪的觀感恰如理所當然：校方這種規定是種人身攻擊。接下來，某一日在操場上——大學生也要接受軍事訓練——有個學生被日本教官甩了一巴掌，所有的印尼學生都同感羞辱，蘇理雅迪跟他的同學就在校園裡發動了一次示威抗議。結果，日本密警逮捕了連他在內的三十餘位示威者，其中老師和學生都有，一併打入大牢。

他們在牢房裡聽說有人因為反日示威而遭酷刑虐待，甚至連聽收音機都會招來一頓痛打。可是，蘇理雅迪跟他一夥同志卻被奉為政治犯「款待」，只是仍避免不了禪宗寺廟的規戒。日軍揮舞竹板鞭打他們，可是，如此鞭笞不過是儀式性羞辱。竹板末端分岔，打在身上並不痛，傷不了皮肉，只能咄咄哄然作響。坐牢一個月後，蘇理雅迪和他的朋友就獲釋出籠了。然而，他們被撤銷學籍，驅離出大學，因此，蘇理雅迪從來就未能完成學業。

他們之所以能夠輕鬆脫身，主要因為當時印尼的民族主義領袖仍舊跟日方合作。蘇理雅迪說，蘇卡諾自始自終深信日本人絕對不會輸掉這場戰爭；蘇卡諾甚至不相信日本曾經挨上兩顆原子彈重擊。一直要到日本宣布戰敗投降，蘇卡諾跟一千民族主義領袖才宣布印尼獨立，接著就展開了對荷蘭長達四年的作戰。

如許風生雲湧、驚濤駭浪的世局變化，一股腦兒地濃縮發生在人生的前二十六年間，回想起來，怎不令人瞠目結舌呢！可是蘇理雅迪還是心平氣和，沒有積怨，不留仇愆。世事動盪太過，無可怨懟，更無須歸咎在任何人身上。他對荷蘭人或日本人都毫無芥蒂。日本人硬頸交易的作風在東南亞地區一向夙富盛名（雅加達還曾發動過一次反日示威，就因為日商占據印尼市場太過，欺人太甚），蘇理雅迪卻覺得日本人還算慷慨，至少比荷蘭人大方。

蘇理雅迪心無怨懟，或許也可以說，他已經克服調適了過來。可是，他身上卻帶著一股印尼式哀愁，這種哀愁只有流洩在自覺遺世獨立的人身上，而且，此時此刻——捱過荷蘭殖民時期、日本殖民、四年抵禦荷蘭人的戰爭、二十年的蘇卡諾專政——他已經失落了奮鬥目標。世界不只一次對他這個印尼人敞開大門，可是這扇門霎時又緊掩閉攔。

蘇卡諾專政期間，他一直保持低調。蘇卡諾下台後，軍方接手統治，國家稍得喘息復甦。可是，現在另外一股暗流方興未艾。有人開始提倡某種爪哇文化復興運動。蘇理雅迪就是爪哇人，爪哇的傳統舞

蹈和爪哇史詩與皮影戲，都存在他的文化涵養中。可是，他以為爪哇文化遭到誤用；復興爪哇文化等於間接教唆封建態度，而軍方正好可以篡繼古老的朝廷，借屍還魂。蘇理雅迪銳眼獨具，足以探掘爪哇的朝儀遺痕。他看得出來，當今印尼士兵對軍官舉手敬禮時，其實已經不僅止於軍禮，其中還包含了封建的鞠躬禮。這是一種扭曲了的退化，也不是蘇理雅迪樂於見到的國家發展。

此外，他也失去了女兒。她已經改宗信奉新的穆斯林運動——某些印尼當地人以「馬來西亞之瘟」稱呼這波潮流。他的女兒在求學期間以及進入大學後，原本都表現得活潑進取。她曾經研習爪哇舞蹈，也深諳潛水，更熱愛外出露營。後來，她在大學裡遇到一名新穆斯林，一名所謂的「重生」穆斯林，接著她就變了。她出門時一定會將頭髮遮蓋起來；她穿上單調乏味的茶褐色長衫；她的心智也逐漸遲鈍沉悶。

有一天，蘇理雅迪和妻子終於不可寬恕地冒犯了女兒的隱私。他們搜查了她的各項文件，取出一紙經她簽署的聲明，聲明中表示她將無條件全權順服某個穆斯林導師，而他將是引領她進入天堂的特使。這個女兒，原本與蘇理雅迪夫婦一樣，不過是全國統計數字中的一個穆斯林而已，現在卻被規範到純正的信仰當中。

蘇理雅迪委實不能接受這樣的發展。不過，事後看來，他說自己一開始應當鎮定一些；當初他過於明顯露出不悅苦惱，反而將女兒推得離家更遠。有一天，他對女兒說：「假如有人找到野外露營，你會跟人家說，『喔，我不能去，因為我怎麼能確定野外有水，可以讓我在禮拜之前沐浴淨身呢？』」當時他講得氣急敗壞，語氣中不乏挖苦反諷。可是過了不久，他的女兒回過頭來對他說：「我已經查過書了。根據《可蘭經》上記載，倘若出門在外，禮拜前就沒有硬性規定要沐浴淨身。」此刻，蘇理雅迪才恍然大悟，女兒已經聽不懂反話了，再怎麼諷刺，她都無動於衷了。同時，她也不再參與家人之間不時引經據典的談話方式，而這般知性上的失落最令蘇理雅迪心痛。他說：「難道你自己已經沒有腦筋判斷

了嗎？難道你一舉一動都要參照那本書嗎？難道你現在不能獨立思考了嗎？」她說：「《可蘭經》就是世間所有智慧與美德的來源。」

後來她嫁給那個引領她進入正信的「重生」穆斯林。她已經修到學位，他卻還在大學念書；可是正如一名良善的穆斯林妻子般，她也甘心為他驅策。那就是晚近以來蘇理雅迪必須學著適應抑忍的悲哀：一度活潑亮麗的女兒，竟然漸行漸遠，日益疏離。

然而，最近他又看到一線希望。前些時候他開車載女兒回她婆家，她跟她丈夫就住在那裡。他說：「女兒，爸爸不是幫你買了間小房子嗎？你們怎麼不搬過去住呢？你先生怎麼老是要跟他父母住在一起呢？這樣是不對的。他為什麼不肯下定決心自力更生呢？」當時她回答他說：「爸爸，他有自卑感哪。」而這個小小的徵兆，長久以來首度顯示他女兒還是有點腦筋，還能夠自主判斷，這給了蘇理雅迪莫大寬慰。她終於看出蘇理雅迪一直清楚明白的現實：那個男孩是個平庸的學生，缺乏知性背景，無法應付大學校園裡的多邊生活。他距離他的學位還有一段漫漫長路，偏偏他用在学习上時間還是太少。一到齋月，整個月禁食，他就將功課忘得一乾二淨，每天封齋，傍晚就到清真寺禮拜祈禱，這可比鑽研艱深的教科書容易多了；而他恪行宗教正確，也為他贏得大學裡伊斯蘭同儕的欽佩。

蘇理雅迪的女兒終於自己看出這一點。那是好幾個星期前的事了。現在，蘇理雅迪衷心期盼著女兒能夠即時醒悟，再多了解現況些。

最後，就在我們即將道再會前，蘇理雅迪說：「可是，我還算運氣好的。我不必像許多印尼人那樣受到高壓，不得不轉換到另外一個波段。」

「另外一個波段？」

「你也知道我們這裡的人是什麼樣子。不，或許你不知道。他們變得崇尚神秘起來。本來都是講究邏輯、理性的人，現在卻燒起線香；要是他們想要有所突破，就晚上不睡覺，集體到墓園打坐。只要覺

得在工作或生涯上沒有進展，他們就用這種法子來消災解厄。」

「你會說那種行徑是神秘主義嗎？」

「不這麼說，我就不知道該怎麼稱呼這種怪事了。」

文化根基漸失

伊斯蘭教是印尼人民的正式信仰。然而，正式信仰之下，古舊世代的暗流——印度教—佛教—靈魂信仰遺留在印尼的遺風——仍然活躍泉湧，卻被摒除在正式體系之外。建於第九世紀的婆羅浮屠與普蘭般難²，前者為佛教廟宇，後者為印度教寺院，都曾經集文明榮光於一身。可是印尼人民不再完整擁有這些文化遺產，他們根本無法充分理解其中意涵。這兩座寺廟的意義一度強烈明朗、難以抗拒，而今卻需要學者專家解說闡述；婆羅浮屠淪為不解之謎，留待學術界皓首窮經以釋義。婆羅浮屠深藏叢林之中，得等待荷蘭人再次發現，重新引領爪哇人認知，而這正是詩人兼編輯古納萬·穆罕默德（Gunawan Mohammed）的喟嘆。古納萬雖為穆斯林，但依行的是自己獨特的印尼式教義，當他論及印尼的過往，略略比了個切砍的手勢，說道：「某個地方的脊髓被切斷了。」

往昔總總，對於印尼人這個民族而言，既生也死。而且不管他們討論的是一九六五年的血腥屠戮，抑或是半夜靜坐墓園，講起來，他們彷彿自己也不了解自己，自己也像謎般神秘難解。

而今，藉著軍方強力把持的平和局勢，工業發展，教育程度提高，新興科技文明之下的印尼即將成形，這個世界卻益發玄異。某個星期六晚間，我走在雅加達中區的帕薩巴魯（Pasar Baru，意即新市集）中，人行道上地磚殘破，地上泥濘及踝，兩旁街道上充斥著販賣進口商品的店舖、沿路燒烤吃食的小攤子，以及店家扭開擴音機播送的唱片聲響。就在這種園遊會的氣氛下，我竟然還發現了一家書店。店內照明充足，書籍分成兩層樓面陳列，書架上陳售著科技主題的英語書籍——醫藥、心理學、工程等等。此外，店內還隔出一大塊區間，陳列同樣以英文書寫的神秘或玄奧主題——道教、《易經》探索、保羅·布倫頓³探索神秘的印度與玄奧的埃及等。新文明就是這樣子體現於市井之間：科技與幻術並陳，缺乏核心的文明。

印尼經過五十年令人暈頭轉向的近代歷史之後，世界變得益發離奇，人心也惶惑浮動。不論他們向前踏步，進入新的文明，或好比蘇理雅迪的女兒，退縮向後，回頭訴諸阿拉伯人的純正信仰，而今，他們總還是邁入別人的文明，益發遠離自己的文化根基，漸行漸遠。

2 普蘭般難（Prambanan）：西元第九世紀時建於爪哇的印度教寺廟，由兩百餘座神龕構成，其中規模最為恢弘者係獻祭印度教主神濕婆的主寺，其他的則奉祀梵天與毘濕奴。

3 保羅·布倫頓（Paul Brunton）：一八九八～一九八一，英國哲學家、神秘學家和旅行家。他捨棄原本相當成功的新聞報導生涯，轉而混跡於一群瑜伽修行者、神秘主義者與信徒之間，廣泛研習東方與西方的各式神秘學。布倫頓是以西方觀點闡述東方神秘主義的第一人，他的作品極富影響力，助長東方思潮於西方之散布。

二 席托：重建過去

印尼不輕易對外人敞開胸懷，我跟席托·西杜莫朗¹初次見面時，也無法完全掌握與深入了解他。他是個詩人，因在蘇卡諾執政末期跟當局有所牽連，軍方掌權後遭逮捕，一九六五至一九七五年間忍受了十年囹圄之災。我們第一次相會時——事後再想亡羊補牢地追回顏面也難——我竟然忽略掉這位詩人在政治上的參與面，以及他十年身陷牢獄的痛苦經歷，他在獄中不得閱讀，更不准寫作。我相信我之所以會忽略掉他的這一面，也是因為我們初次見面時，席托暗暗希望我能夠略去過去不提；或許，那時過去的創傷仍令他疲憊衰頹。

1 席托·西杜莫朗 (Sitor Situmorang)：印尼詩人，一九二四年生，打巴努里人。八月革命期間在報界工作，一九四九年在文壇初露頭角。一九五三年從荷蘭、法國回國後，成為五〇年代的代表性詩人。《綠色信箋》(一九五四)是他的第一部詩集，也是他的成名之作。其他詩集有《在詩中》、《無名氏》。他的詩風格獨特，清澈流暢，節奏明快，帶有板頓的旋律，對後來的詩人有不小的影響。他還創作有戲劇集《珍珠路》、短篇小說集《戰鬥和巴黎之雪》和《親王》等。早期作品受法國存在主義的影響，帶有頹廢色彩。一九五七年以後任《印度尼西亞新聞報》主編，成為《政治宣言》的擁護者。一九五九年任印尼民族文化協會主席。一九六二年出版的詩集《新時代》反映了他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重大變化。一九三〇事件¹後被捕，一九七七年獲釋。出獄後有詩集《旅程》和《時間之牆》出版。

他舉手投足間流露出作家風範，富於關懷，思慮周延。他談到手上正進行的一部自傳，以及寫作進行間遇到的障礙。他當時五十六歲，小個頭，臉面狹小，有華人—小黑人的血統，崢嶸聳立著一對眉毛；肩膀上掛著一只帆布背包，背包裡塞了幾本書，突兀地平添他幾許當代大學生的氣質。

他來自印尼北部的最大島蘇門答臘。蘇門答臘的風土比爪哇更接近蠻荒，那裡的穆斯林更穆斯林。蘇門答臘接受的印度教—佛教影響較小，島上也有基督教徒的教區；同時，信仰靈魂精怪的部落照樣生龍活虎。席托就出身其中某個部落，他是巴塔克族人²，而他的巴塔克血緣正是他寫作自傳時的瓶頸所在。

我想起馬來西亞的夏菲，在他遠比席托年輕許多的生涯裡，如何艱困地嘗試從過去的經歷——從鄉村到都會生活的進程——理出頭緒與模式。而席托寫作的困頓也跟諸如此類困擾有關。可是，席托的部落背景已經遠颯，他早就跟部落失聯多年；而他深切感受到，撰寫自傳如果對自己的出身一無所知，寫來不過是記流水帳般羅列生平大事罷了。這也就是為何他將寫作要務擱置一旁，轉而專心研究起他的部落背景的原因。他曾跟著一位年輕的加拿大女性人類學者，一同回訪蘇門答臘北部的家鄉。她試著引領他了解自己這一族的演進過往，而這段歷程有如幫他釐清混沌，點醒了他多年的迷惑般。

我們首次見面就這樣草草收場。相聚時間匆促，彼此都有其他雜務待辦。當時我尚千方百計試著想跟當地穆斯林團體搭上線——他們一直維持低調，作風神秘。

由於順路，席托跟我一同前往某個辦公室。我心想，他一舉一動都帶著知名人物的權威。後來，有人傍著上層樓房的窗檐對他揮手招呼時，席托示意我注意這個人。他說：「我並不認識那個人，你知道的。」甚至在那時，我都還無法領會，對席托而言，陌生人向他揮手代表著如何重大的意義——經過十年繫獄，身為一名作家，卻在四十二歲到五十二歲間噤聲十年——有陌生人致意，表示他還是有這麼一點名聲。

再訪詩人

這些穆斯林迴避生人，謝絕見客。午餐前後，計程車往返了幾趟，一無所獲。當天下午，奔波行路的疲倦及下榻旅館的疲憊頓時上身。我的房間高居第十五層樓。我開始覺得自己面對著如此沉靜、空調的景致，已經過了好長一段日子：紅瓦屋頂與綠樹、摩天大樓、全錄影印機的大看板、飛機飛進左側國內機場降落、車流來往於旅館花園兩旁馬路上，還有高速公路上的廢氣飄懸，像是陣陣棕色迷霧冉冉上升，混入挾帶大量雨水的雨雲雲端。雅加達可不是個適合午后閒步的都市。

於是，我打了通電話給席托。我並沒有想到他是個一生橫遭政治扭曲與監禁阻擾的人。先前，在早上的短暫會面後，我歸納的印象只是個修養有道、心平氣和的人，一個恬靜而令人心安的人。

電話是個女人接聽的，她說得一口悅耳英語。接著，我在電話旁等了半晌，席托才姍姍來遲，我擔心自己是否打擾了他的休息，或他的工作——他的寫作，他的自傳。然而，他拿起聽筒回應，語氣正如我所期盼的溫和關切。

他說：「你一定得盡早退房，離開婆羅浮屠，改住其他飯店。」

「你的意思是，婆羅浮屠總是讓人沮喪嗎？」

「不，其他家飯店都比婆羅浮屠便宜多了。」

可是，當下他就了然於心了。他了解孤寂的滋味。

他說：「你來我家吧。七點鐘過來。我六點要見一個年輕人。不，請你六點半過來吧。」

他住在馬魯姑街（Jalan Maluku）。白天的暑氣退去，兩、三位男人在閃耀著螢光燈管的飲酒攤前閒

晃，還幫我的計程車司機指路。路旁推過一輛手推車，推車男人一邊走著，一邊擊著竹片敲打車身。這些小吃推車、流動攤販，雖說是雅加達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雖說飯店餐廳裡為了烘托地方特色也供應當地菜餚，飯店周遭卻從不見這些流動推車的蹤影。

詩人的住所是一棟新穎的混凝土建築，占地龐大，前院圍著竹籬。席托身著一襲印尼棉衫出來開門。他指著竹籬柵門說道：「鐵柵柵就藏在竹籬後面。」他也說，那輛推車上賣的是麵條，他光聽竹板敲擊的噪音就知道了。每一樣街頭佳餚都有它特定的配樂伴奏。

房子是棟德國建築，表現出相當程度的外交位階。房子暫時閒置，無人居住。屋內了無長物，卻擺設了一尊印尼當代雕塑作品，以及許多印尼畫作。

我們進到房間，席托彷彿在重複與測試這個英文單字說道：「這是平台。」我們就坐在那裡。原先與他約定於六點鐘會面的年輕人爽約沒來。席托說：「他是個大忙人，負責人權工作的。」

後院一角有幢小屋，外牆精巧地漆成綠色，即所謂的「小亭」。席托就住在這小屋裡。

他說：「芭芭拉會過來跟我們一起聊。」

阿迪，那個定了六點鐘約的男人，這時到了。他年紀三十啣，體態清瘦，輪廓深刻，頭髮剪得短短的。他說自己一天下來已連續工作十二個小時，不容久留。要是在這裡逗留太久，家裡準會興起一場小型越戰。

席托說：「阿迪也是一位新興領袖，他是個穆斯林。」

阿迪說：「我是個穆斯林。」

「為什麼呢？」這種問題，問在印尼還真是恰得其所啊。

「我的父母親都是穆斯林。伊斯蘭教義也比天主教合乎邏輯。三位一體那碼子事，神、基督、聖靈三者合一，我實在怎樣也想不通。新教還比較好。印度教講究種姓制度，那可是我舉雙手反對的。」

夜色已暗，小亭前廊亮起一盞燈光。映著這點光，隱約可見一位高挑、修長的女人，穿著長裙，臉孔半掩在陰影中。晦暗中，伊人似乎在照料著某些懸吊盆栽，或是養在籠子裡的某種小動物。

席托難掩悸動。到了他這個年紀，竟然在見到某個女人時還是難掩悸動！他強力鎮定自持，又刻意從容地說：「芭芭拉是何蘭人。」

女傭將幾盤甜點端到我們就坐的桌上。芭芭拉走出小亭暗影，來到主屋輝煌的燈光下，她漸漸趨近我們，也逐漸揭去臉上神秘面紗。她穿著一領藍色蠟染長裙，年紀還輕，二十八、九歲，面容姣好，舉手投足落落大方又獨具丰姿。席托重新穩定下來。

我試探地問起桌上甜點，說道：「那是什麼甜點啊？」

芭芭拉的英語幾乎聽不出口音：「這是豆子做的。」

「好吃嗎？」

「他喜歡吃，味道就一定不錯。」「他」指的就是席托。

她轉頭用印尼語跟阿迪交談。

甜點的形狀圓呼呼的，表面下沉，像是走了氣的網球。狀似法蘭絨的外殼中包裹著柔軟餡料：油滑、甜膩、無啥風味，跟我在馬來西亞嚐過的甜點差不多。

阿迪用英語說道：「我被當局盤問身為一名穆斯林的種種問題。」

「喔，我的天哪，」芭芭拉說道：「該不是真的盤問吧？」

可是，阿迪心中還是掛記著盤問。印尼當局逮捕了一名漫畫家。

阿迪說：「軍方一點幽默感也沒有。」

我說：「指控罪名嚴重嗎？」

「他們就是喜歡來這套。把人抓起來，關個一、兩天，再友善地訊問他。雖然說友善，或許也不盡

然吧。」

稍後，席托陪我漫步到外面大街上。夜間，街頭來往的推車和流動攤販更多了，交織奏鳴著各式噪音。

遠離了芭芭拉，以及她身上那襲蠟染長裙，席托再度悸動浮躁起來。

我說：「你該回頭去招呼阿迪了吧？」

「阿迪是老朋友了。」

「你跟芭芭拉結婚了嗎？」

他在路上縱聲大笑：「在我們族裡，算是結過了。」接著他又說：「星期六上午再來吧。我可以讓你看看照片。我們族人堅持的。那個時候我們都同居兩年了。」

「你現在五十五了嗎，席托？」

「五十六了。」

「日子裡還是情慾激昂嗎？所以，我們的情慾永遠沒有退潮的時候嗎？」

「那個加拿大人類學家也是這麼問我，『到了你這個年紀，還是這樣嗎？』她才二十四歲。」他再度仰天長「笑」，那張華人——小黒人的骨凸臉龐開啟雙唇，綻露出雙排牙齒。

詩人的部落

白日天光下近乎空盪的主屋，一到星期六上午，情況完全改觀。席托苦於牙疼，吞服各種止痛藥仍不見奏效。芭芭拉則穿著工作服，歐洲的淺淡色澤讓她看來更為纖細。自然天光在她臉蛋上增添了一、兩年的歲月，雖說她的樣貌還是像個三十出頭的年輕女子。她行色匆匆，上下忙碌，一本正經，只想盡

早出門上班。她在一所荷蘭贊助的印尼手工藝中心工作；她離家前，還仔細叮囑席托，別忘了照顧她養在籠子裡的鳥兒，尤其是紅鸚鵡，絕不能掉以輕心。

席托坐立不安。他不但要忍受牙疼，三不五時還得分神應付進門來跟這位名詩人寒暄的閒雜人等。我們原本打算利用星期六上午談談他的自傳，可是他一再推延，遲遲不肯將話題導入；最後，就在我們即將聊入正題時，他竟然藉口需要盥洗，尿遁去也。而當我們真的談將起來，他又有口難言。他準備得過於周全，思索得過於艱深，每當脫口說出一行短句，他隨即評估這話的分寸拿捏是否恰當，結果連句子都無法說得完整。他開始使用一些艱澀的多音節字彙。在此期間，訪客總是絡繹不絕，登堂入室，相互道好，印尼式行禮如儀沒完沒了。

這間起居室的每一扇門都開向綠色庭園。這處小莊園充分運用季節氣候的優勢，綠意蓊鬱，房間涼爽宜人，每扇門外都有大片綠葉庇蔭。莊園外的街道上，毫無閒歇地——清晨點滴消褪，逐漸不再清新爽人——有推車小販交會，發出各種不同噪音。

最後，我們終於決定大家坐著閒聊就好。席托搬出一本本相簿，翻出他位於蘇門答臘北部家鄉的彩色照片，邀我一同欣賞。這些照片不過幾星期前拍攝的，當時是他第一次偕同芭芭拉返鄉探親。席托已經說過，他是個部落出身的人，還說他家世代擔任酋長。光憑話語，我也摸不著多少頭緒，但這些照片讓我增加了一分了解，探知到這方面的現實：照片裡的席托既是個部落出身的人，也是酋長的兒子；照片裡顯示部分的蘇門答臘風光，這是大地的一部分，也是席托絕對不能離異切割的一部分。

席托祖上十八代，世代相傳，一直統治著蘇門答臘北部一塊小幅區域——長十二哩，寬不過六哩。小地方群山環繞，岩石累累，不值得任何人耗費精力征服。此地荷蘭人涉足甚晚，直到十九世紀末才初探席托的家鄉。席托的父親奮起抵抗，戰爭從一八八四年開始，持續到一九〇八年，防堵荷蘭人染指。這個年代紀錄讓人難以置信，不過，席托說父親生於一八五〇年，一九六三年過世。難道，他父親活了

一百一十三歲嗎？沒錯，他是我們族裡的超人。席托有個姊姊，現在高齡八十；席托自己則是在父親七十三歲時受孕懷胎的。席托的父親成為荷蘭人手下敗將後，接受荷蘭人封點為當地行政長官。他依舊擔任酋長，日子跟荷蘭人到來前沒兩樣。

席托的部落故鄉，他父親統治的區域，涵蓋三條發源自六千呎的高山，逶迤直下到一泓美麗湖泊的河谷。照片上，河谷之間，一畦畦疏疏落落的稻田，相隔以石砌矮牆或田壟。稻穗不如生長在肥沃土壤上的豐厚鮮翠。這片部落風景的色澤異樣、平淡、無彩。席托出生在酋長家的一房裡，就在這裡度過最早的童年時光。席托無法回想起任何一段他跟父親或母親的談話。他六歲時就被送進一所荷蘭人辦的學校，那是所專門為教育像他這樣的孩童——酋長或轄地更小的酋長的孩子——而設置的教育機構。可是學校只收男生，謝絕女孩。這也就是為什麼席托的姊姊，高齡八十，始終只是個一字不識的田莊婦女，屬於（對席托而言，在他體驗過他的人類學啟蒙之前）古老又遙遠的過去。

這群族人獨處地角一方。可是，不論他們究竟如何找到這處化外仙境的，他們還是為這片河谷帶來了——抑或，日後不斷琢磨精進——特有的裝飾藝術與卓越的建築技術。村莊外圍以巨大石牆屏障，入口柵門狹窄，容易防守，必要時可以圍堵得滴水不漏。村民房舍集中興建在廣場上。房屋屋頂挺著兩角；屋簷前方向上陡升，中間向下平垂，屋頂兩端再像船桅般拔起突出。席托說，如此巧思設計可以保護房屋不受當地強風侵害。

席托的村子裡，傳統建築上唯一增添的現代裝置，不過就在屋頂上加裝幾排鑄鐵欄杆。房屋架設在堅固木樁上，木樁上再樺接橫木或橫梁加強保固。木樁與飛簷屋頂間的房屋外牆其實很矮。屋子裡伸手不見五指，擺設著木床，木床仿造兩角或船桅屋頂的形狀，只是略加修飾。然而，目光移到村子的廣場上，又可以看到這樣略加修飾過的形狀出現在殮盛酋長頭骨的石棺上。石棺蓋板上刻有一尾蜥蜴的上半身，蜥蜴的下肢則刻畫在蓋板下方的石棺側面上。蜥蜴是幸運的象徵。

席托六歲時，硬生生地被送進荷蘭人主持的住宿學校，遠離部落生活。那是所基督教會學校，但不強求學生改宗受洗。儘管如此，校方要求席托不論上下課都要說荷蘭語。每年學校會放假，假期最長達一個月，屆時，他就回村落省親。他的父親（當時已八十高齡）與母親總會溫暖親切地招呼他，可是親子間無話可說。他回到家裡，不過就在村子裡找個房子睡下，用餐就跟著大家同炊共爨。村子裡總有幾名遠親成天張羅著吃食，隨時可以填飽肚子。

日軍開到印尼時，正是席托在雅加達就讀中學的最後一年。一九四二年二月中旬，日軍最先從蘇門答臘南端登陸。兩星期後，蘇門答臘淪陷，日軍轉攻西爪哇。荷蘭軍隊撤退，雅加達市街頓時清空，大家都躲在家裡不敢出門。可是有一天，席托還是跟著幾個朋友騎腳踏車上街。接著，幾個人騎車騎到當時巨大的荷蘭人殖民紀念碑附近，就是快到現在婆羅浮屠洲際大飯店時，席托看到了今生所見的第一個日本士兵。

當時，那名日軍正騎了輛腳踏車，日本軍方出品、馳名全球的摺疊式腳踏車。他疲倦狼狽，大汗淋漓，身上制服單薄而廉價，散發出渾身汗味。他將幾個男孩攔了下來，雖說他只能說日語，卻明白表示他要席托騎著的那部腳踏車。

日本人的摺疊式腳踏車粗製濫造，難以踏取。席托的腳踏車為英國製品，堅固的漢柏、來禮或飛利浦等，是有品牌的大廠生產的。可是，席托胯下的這輛腳踏車，他騎都稍微嫌高了，對那日本軍人來說，車身更是高得構不著。他三番兩次試著騎上腳踏車，最後還是死心放棄。席托當時身高約一百六十分，那日本人還比他矮上幾吋。

荷蘭紀念碑就在這次交逢會面不遠處（原碑現已不存，原址上取而代之的是一尊巨大黃銅男性雕像，歡欣鼓舞地打破鎖鏈）。根據席托所述，原先的紀念碑主題是個早期荷蘭殖民者居高睥睨地向下指著這片征服得來的印尼土地。即使在那時，席托保住了他的腳踏車，回想起來，他還是想不通，那麼矮

小的日本人怎能打败如此高大的荷蘭人呢？

席托與日軍的直接接觸僅止於此。在他當時定居的雅加達城區，日常生活照常進行。即使在荷蘭人群居的市區裡，也同樣平靜無波；稍後，荷蘭婦女和孩童才被送往集中營。席托的學校面臨關閉的命運。接著，再過了幾星期，火車恢復正常發車，席托跟著朋友搭車前往雅加達市外的山野郊區採集蔬果，再帶回雅加達街頭叫賣兜售。沒多久，他又找到另一份收入更穩定的工作。日軍下令取下所有荷蘭語市招、看板，塗抹銷毀。於是，席托就在雅加達四下走動，塗抹遮掩寫著荷蘭語的招牌。

六個月後，日軍又頒布命令，強制所有非爪哇學生一律回鄉，返回各自出身的島嶼。席托說，日本人想將整個印尼打散，分化為一個個易於掌控的占領區；他們同時也想將尚未就業的學生，潛在的麻煩製造者，攆出雅加達。席托乾脆趁日本人提供交通運輸之便，順勢回到蘇門答臘，回到他六歲後就不曾長居超過一個月的村莊。他在村子裡待了三年。他兄長藏書豐富，正是一個受過精良荷蘭式教育者應有的藏書規模。因此，即使席托未能完成學業，大戰末期，他還是廣泛閱讀了許多書籍。

時間再往下推演，就進入二次大戰結束後印尼國內波瀾不斷的戰後史：蘇卡諾與其同志宣布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成立；蘇卡諾執政期間；接著，一九六五年，反蘇卡諾運動風起雲湧。日人一手創建的軍隊崛起，而今盤據了國家大位。席托因為與蘇卡諾有所關聯，懷璧其罪，遭逮捕下獄，一關就是十年，喔，直到一九七五年才重獲自由。獄方不准他閱讀或寫作。每個月只准接見一名訪客，會面時間十五分鐘為限。當時，他該怎麼打發時間？他跟獄中難友聊天，因此結交了許多過去一無所知的朋友，在政治與社會上都獲益良多。

不論席托在雅加達如何風光，抑或文名曾經如何顯赫，在他的村子裡，他永遠只是一名部落子弟而已。出獄後，席托必須重回部落，重新為部落所接受。為了典禮所需，席托還得撬開蓋板上刻繪象徵幸運的蜥蜴圖飾的石棺，請出祖父的頭骨。席托雙手托著一只盤子，盤上盛著祖父的頭骨和一顆檸檬，檸檬的功用在於淨化。席托的某位表親也出席觀禮，這位表親恰好是個醫生，祖父頭骨轉移到席托手上的盤子時，表親一看就發現頭骨的下巴歪了，於是他伸手過去將歪掉的下巴骨移回原位。主持典禮的祭司或巫醫見狀，大發雷霆。那個表親貿然出手探觸先人遺骨，不日定會消解掉村裡的所有運勢，害大家霉運加身。

席托還有一張黑白照片，紀念那個不尋常的時刻：相片中的席托渾然不知身後這幕緊鑼密鼓的劇碼，將盛著頭骨與檸檬的盤子端得與肩同高；族裡的祭司被那位表親氣得七竅生煙，面孔扭曲，四下迅速舞動著，怒髮飛揚，企圖反制村人的不敬妄為，消災祈福。

美麗的「約見」

席托出獄後，背負著政治標籤，找起工作四處碰壁。可是，他還是享有隆崇詩名。有一天，在出獄兩年後，他應邀在雅加達一名荷蘭人家中朗讀自己的詩作。會中聚集了二十多人，主要是外國人。有個人姍姍來遲。席托當時背對著門口，聽見遲到者推門進入時，他轉過身來，但見眼前有位歐洲女孩，身材高挑，面貌妙麗，他驚為天人。而且還不只是她的美麗，席托說：她的「光環」。剎那間，蓬華生輝。他當下決定，他一定要認識這名女孩。冥冥之中似有神助，女孩就坐在一位英國婦女身旁，這位女士發言請席托朗誦一段他詩篇的英譯版本。

就這樣，朗誦結束後，席托得以直接跟女孩自報姓名。他說，他想跟她結識；他說，兩人何妨找個時間「約見」。接著，他才明白，她來這兒不是因為她深諳他的詩作，一心想聆聽他朗誦，她來只是想看看詩人的廬山真面目，想看看這個因為跟蘇卡諾有所牽連就繫獄十年的人，究竟長什麼樣子。席托並不介意他對他的詩毫無印象。芭芭拉是個荷蘭人，某個荷蘭團體派遣她到印尼來，協助發展印尼的手工

藝；她就相當於荷蘭「和平工作團」的工作人員。

他們約定在五月二十五日見面。芭芭拉滿腹心思都放在啟程返荷的準備工作上，她預定在六月十六日離開印尼。無巧不成書，真是天賜良緣，當時席托接受了荷蘭某文化組織的邀請，恰好將在六月二十八日前往荷蘭。兩年過後，這幾個日期他還是記得絲毫不差。結果，雖說芭芭拉離開印尼前，只允許他在雅加達「約見」兩次，到了荷蘭，她可就樂於跟他再多多「約見」了。

他自己也很難說明，究竟他留給芭芭拉什麼印象。芭芭拉是荷蘭人，性情冷靜理智。可是，芭芭拉引領他見識的新世界卻令他拜倒，她為他介紹解釋的新觀點同樣令他折服。他在牢裡禁錮了十年，隔絕在書本資訊之外，耽溺在古舊想法之中，他錯失了西方世界一整個十年間知性思想上的運動推進。

芭芭拉浸浴在一九六〇年代，她屬於一九六八年的那一代，周遭全是舒馬歇之流的人物。對成長於殖民時期的席托看來，芭芭拉和她的青年夥伴們就像一個新品系的「傳教士」。芭芭拉夥同周遭年輕人深入原住民部落，目的並不是威逼利誘他們改宗，而是想以更直接的方式施以援助。

這群人是如何應運而生的呢？歐洲又是如何大量滋養出這樣令人目眩神迷的一代？席托跟芭芭拉同在荷蘭的那段時間裡，他無時不處於情緒與知性高度興奮狀態下。這個五十四歲的部落族人，一臉華人——小黑人的五官輪廓（他那對鋼毛聳立的眉毛，時時意味著中國海盜的血緣），身高一百六十分，患有糖尿病，政治角力上業經去勢，跟在一個高挑聰慧的荷蘭女孩身邊，女孩還比他年輕二十歲。

他們回到印尼後開始同居。族裡得到風聲，族中長老堅持他們一定要依照部落習俗舉行婚禮。由於席托的部落向來主張「異族通婚」——他提到這個人類學上的專有名詞時，還順溜得很呢——依照傳統，芭芭拉一定得先加入某個與本族有關，卻與席托這族無親屬關係的部落。

不過幾個星期前，他跟芭芭拉回到村子裡，按照習俗完婚。河谷上的岩石山丘濕潤涼爽，照片上雲霧瀰漫在低矮海拔山麓間，色彩柔和溫潤。婚禮禮成後，眾人在屋角誇飾的房子裡，享用了一頓儀典大

餐。芭芭拉和席托兩人都用手抓食，吃的是豬肉。「你看，」席托指著照片說：「那是『我』。在『我的』村子裡。這些都是真的，不是觀光客的玩意。」只是，他穿得跟觀光客沒兩樣，腳上一雙橡膠雨靴，兩眼下望，看著一個在織布機上工作的村中老婦。「那是我的姊姊。她不識字，也不會寫字。」相簿裡還有張照片，他跟芭芭拉兩人並立，站在他父親的家門前，這位一度戰功彪炳的首長住家，現在歸由席托的兄長繼承。席托就是帶著芭芭拉在這棟房子裡舉行部落婚禮的。

這趟人生旅程令他感慨良深，這確實也是趟了不起的旅程。他在一個世代之間就躋身體驗了種種歷程，對其他印尼人而言，這些經驗歷歷開展在過去四至五個世紀之間。然而，他還是無法落筆寫下自傳。過去三年，他兩度動筆，寫成數百頁文稿，卻盡付字紙簾。他的自傳材料過於豐富，過於殊異詭譎；在他而言，作者性格的偏離與改變正是這部自傳的基調，偏偏他還苦於摸索，不知如何付諸文字表達。截至目前為止，他只能如實地將生平歷程一一記錄。

他講到已經完成的部分時，說道：「總體說來，還是無法合成與連貫，還是無法以我個人為稜鏡，透過我這塊稜鏡觀看這種成長的表現。我所經歷過的一切都無法圓滿地擠進某種脈絡中，完成不了藝術、個人生涯抑或政治上的脈絡，一切枉然。」

先前，他無法定義與廓清自己，因為他不曉得自己究竟是什麼人。他已經切斷了自己與過去的聯繫。他六歲時就被送進荷蘭人的學校寄宿讀書，村莊的信仰在他身上早已蕩然無存。作為一位作家，他的早期生涯又詭異得不著隻字片語：他竟然從不曾與父母交談過。由此可見，那位加拿大人類學家對他的幫助有多大了。

他曾在他的村子待了五個月，他也曾跟著她進行田野調查，身兼嚮導與傳譯。他將那位人類學家的照片找出來給我，好個高大可愛的年輕女人，穿了套獵裝。身為巴塔克族的一員，席托顯然有所斬獲；經由她技巧的詢問，她為他重建了巴塔克族先祖的過去，這是他自己無能為力的。因此當他現在再度提筆、重新投入自傳寫作時，他至少可以說：「我祖上十八代，就是這麼流傳下來的。」

席托說：「我是很複雜，可是，我並不迷惑。」

矛盾情結

整個早上，各色訪客不絕，川流不息。有個人，是個說英語的德國人，過來看房子。其他人造訪，就是為了看席托這位詩人。他滿心歡喜地接待他們。重獲自由四年後，有人特地出門造訪，還是令他歡喜。

中午時分，芭芭拉回來了。她回家來照料她養的小鳥，一隻接著一隻。席托與我閒步到小亭。亭子在傍著主屋的狹長花園盡頭，裡頭裝飾著芭芭拉遊走印尼群島致力提倡的工藝品：蘆葦編織的墊子、藤椅、帝汶生產的籃子等等。芭芭拉對她的工作主題瞭如指掌，她評判工藝美學的標準獨到，慧眼獨具。傭人（席托與芭芭拉僱請了兩名傭人）料理了煎魚和米飯作午餐，餐後再佐以醃黃瓜。席托糖尿病纏身，吃得很少。

我問芭芭拉說：「你最近還會回歐洲去嗎？」

她回答道：「我可不想。」一邊決斷地咬下一片醃黃瓜。

席托說：「有機會我還是挺想再去歐洲一趟。真希望有人邀請我過去長住一段日子。印尼這裡有太多人事物，都讓我觸景傷情。」

芭芭拉的午餐時間匆匆結束，她還得回頭趕她的手工藝作品。我又吃了一片煎魚塊，席托看著我細嚼慢嚥。狹小房間裡，一面牆上掛著一幅超現實油畫，畫著兩名裸體男女的背影，棕色男性裸體色塊，女性則以暗紅色表現，畫面上各個角落都畫上展翼飛舞的小鳥。之前一位畫家朋友過來拜訪時，芭芭拉養的鳥恰巧死了一隻，畫家有感而發，畫了這幅畫送給詩人以茲紀念。牆上還張貼著許多筆觸奔放的裸體鉛筆素描，都是席托自己畫的。

芭芭拉擁抱著印尼與詩人席托的魅力鋒芒；席托則渴望著芭芭拉的嫵媚，以及歐洲所象徵的安全感。芭芭拉可以將歐洲視為當然，可是走到自己旅程盡頭的席托卻無法將歐洲等閒視之。現在，他已經繼承了祖先流傳下來的村莊、山谷、湖泊、石牆與神話中的小屋，可是，他再也無法回歸故里；世事盡非，他也不能佯裝舊時模樣。剔除了歐洲（意即荷蘭）與歐洲人的文化邀請，以及歐洲對於他的「複雜情結」的好奇，他就只剩下印尼。這是片恣意傷害與辜負他的國土，他在印尼找不到工作，任何人都可以對他嗤之以鼻，他也找不到任何人或任何議題作為訴求。

過了許久，好幾個鐘頭後，我才恍然醒悟，我們兩人雖然促膝長談多時，卻還是忽略了一個重大疏漏：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六五年，這段為時二十年的日子。我竟然忘了向席托請教，這二十年來他又經歷了哪些風波，而令我感興趣的是他如何在文壇初試啼聲，以及他的現況。那二十年間，印尼首度獨立，席托創作詩篇，嶄露頭角，接著聲名大噪。稍後，他晉身政壇，掌握權力。當時，席托對某些人而言，尤其是接近蘇卡諾執政末期那些被當局扣上「反革命」帽子的人，是個專事威逼脅迫的角色。此外，就我事後深入了解，那段期間，有些人的一生事業曾遭席托無可挽回的迫害；而有些人，即使事過境遷，物換星移，還是不能原諒他。

可是，告訴我這些片段往事的人，同時也說：「儘管如此，我還是不忍心對他苛責求全。畢竟，他受的罪比我們任何人都磨難得多。」

三 廢除傳統學校

前晚我在席托家裡巧遇的客人阿迪·薩索諾告訴我，倘若我能抽空深入印尼鄉間，參觀傳統的伊斯蘭教鄉村學校，一定能夠大幅增長我對印尼穆斯林的瞭解。這些學校一般稱為「經學學校」(pesantren)。阿迪有個公務上的同事，對「經學學校」頗有研究；他跟阿迪一樣，都是虔誠而關懷廣泛的穆斯林，也多虧他的安排，我的印尼下鄉之旅才能成行。他認為我應該先去參觀現代化的經學學校，在日惹和婆羅浮屠附近就有一所遠近馳名的學校；此外，我也該找一所歷史悠久的古老學校看看，以資對照，離泗水(Surabaya)不遠也有一所。

這些設置在鄉間的經學學校維繫了社區與校園之間的和諧，協調了鄉村生活與教育。而這就是他們與奉行西方教育的學校之間最大的差異；那些西方式的學校分散在亞洲的鄉間地帶，其實在學生心理上只是治絲益棼。阿迪的朋友告訴我，知名的教育學家伊凡·伊理奇¹曾經走訪印尼，參觀過他們的經學

1 伊凡·伊理奇 (Ivan Illich)：一九二六年生於維也納，在羅馬格里高里大學研讀神學和哲學，後來在薩爾斯堡大學取得歷史博士學位。一九五一年前往美國，曾任助理牧師、大學副校長等。他在七〇年代便在《廢除社會的傳統學校》(Deschooling Society)一書中，倡議由於學校擔當了社會角色分配功能，使人篤信文憑(學歷)的價值，而忽略了教育制度本身的問題。

學校。我從未拜讀過伊凡·伊理奇的著作，至於他的「廢除傳統學校」理論也只聞其名，未詳其實。可是，我也知道此人盛名在外，我心裡盤算著，參觀他曾經走訪過的地方（我也得坦白承認，他來過印尼的偏遠地區，委實令我驚異），一定很有意思。

拜訪宗班的經學學校

此行，我跟著普拉索喬一同前往。他年方十九，還在學院裡念書，也是我不多得的最佳旅伴。普拉索喬曾經接受美國高中國際交換學生計畫的獎學金，在亞利桑納州住過一年。他的英語流利，帶點美國口音。他充分利用旅居亞利桑納州的那一年，日子過得很開心，學得也很多，對於出資贊助他成行的美國高中國際交流基金會也一直心存感謝，他還打算把我支付他的費用捐出部分回饋這個基金會。

我同時也感覺到，普拉索喬有意將他在美國所接受到的親切款待，回報在我這個完完全全的陌生人身上。我們一同出門旅行時，他穿了一條牛仔褲，臀部後口袋上還釘了一只交流基金會的標誌。他的個頭不過比中等身材高出一點點，五官酷似華人。他的長相可是他們家裡固定的笑料來源。普拉索喬的父親虎背熊腰，十足的印人輪廓，就會開玩笑說道：「可是，欸，我這個華人兒子是打哪兒來的？」

我們搭乘印尼航空的機場巴士前往位在東爪哇北部海岸上的泗水。泥漿髒污了海岸線，河道間滾滾黃湯，奔流在這片耕作過度、人口過於稠密的平疇綠野上。泗水周圍富產米糧，稻田開闢成窄幅狹長的田地，以利灌溉，可是從空中往下俯瞰，就顯出一大片小農勤耕的拼湊景象。

稍後，我們從泗水驅車深入內陸，一路上屢屢可見農民的住屋配合著稻田闢建。當地屋室十分狹窄，建物迤邐向後延伸。房子跟馬路邊緣還隔著一段距離。前院清掃收拾得一塵不染，綠蔭宜人。香蕉樹生長在院子裡的空地上，一旁還伴著椰子樹、芒果樹、甘蔗與雞蛋花。屋後緊接著就是稻田。車程之

間，我們似乎走過一處極為狹長的村落。爪哇在這裡拉長為無限無底的小塊聚落，讓人難以聯想起爪哇過去馳名歷史的輝煌王朝與帝國，這片土地像是一片聚合了無數辛勤小農的土地，就是所謂的「枉致力」（wong chilik），他們遭到自身旺盛的繁殖力詛咒，十九世紀初期，爪哇全島人口統計為四百萬人，現在已經高達八千萬人了。

「枉致力」一詞，還是普拉索喬教我的，同時他也跟我說，這個稱謂（儘管發音巧妙地切合）現在已經是既過時又沒禮貌了。某些人——那些家裡不務農的人——還是很介意這樣的不敬稱呼，他們總希望外人能清晰認知他們與一般貧農截然不同的身分地位。這類人士就會自稱為「拉丹」（raden）——貴族，還在姓名前面加一個大寫的 R 字。他們的房子也蓋得不一樣，一定要加蓋一個形狀像帽子的屋頂。要不是普拉索喬特別點出這項殊異不群的建築特色，恐怕我也只能有眼無珠，走馬看花而不察。他們的帽形屋頂造型如此扁塌，每一頂帽子看起來都沒兩樣，只覺溫暖舒適；窮人家以紅瓦覆蓋屋頂，再編紮竹片充當外牆；沒那麼窮的人家就用混凝土砌牆，院子裡蒔花植草，幽靜庇蔭。

普拉索喬說，窗戶在這裡也是個新發明。傳統的爪哇房子是不裝窗戶的；傳統的房子用成排編織的竹壁作牆，濾過陽光、熱氣，卻仍然保持通風流暢，開挖窗戶根本就是多此一舉。傳統的房子裡，光線從屋頂的縫隙間洩入。可是，混凝土牆就不能不裝窗戶了。而我也看得出來，此時，玻璃百葉窗正在沒那麼窮的人家之間大行其道。

每一小塊庭院門口都豎著門柱，卻沒有大門。門柱的設計殊為巧異：柱子頂端砌著小型的金字塔或是某種鑽石形狀的立體物，有時金字塔或鑽石形狀的立體結構還會一分為二；門柱直材顯然是混凝土灌漿，卻仿製出石塊疊砌的樣式。乍看之下，我還以為這些門柱在於標明每一塊土地的所有權與地主，或許是某些大規模的栽作農場所豎立的；其實不然，這裡的門柱代表著爪哇最後一個信奉印度教的帝

國——麻喏巴歇王朝²，建築風格的遺跡，該帝國早已在十五世紀末葉瓦解無蹤。

印尼的前伊斯蘭教歷史與文化，就是以遁入傳統、化作神話的方式，殘留在爪哇。馬路上，走在我們前面的巴士車身上漆著因陀羅普拉（Indrapura），「因陀羅之都」；因陀羅維加亞（Indra Vijaya），「因陀羅的勝利」，則出現在許多店家招牌上。可是這位因陀羅可不是印度教萬神殿中的亞利安神祇³。在普拉索喬還有幫我們開車的司機看來，因陀羅只是爪哇皮影戲裡的一個角色。接著，普拉索喬跟我講起當地一則穆斯林傳說：潘達閩（Pandava）家族一門五虎，五個兄弟分別代表伊斯蘭教義中的五大項原則。而我也敢相信，普拉索喬竟然對這個傳說中真正神妙之處一無所知，他跟我講的神話，其實是摘錄自古老的印度史詩《摩訶婆羅多》⁴，這闕偉大的史詩於一千四百年前渡海引介到爪哇，紮下爪哇的根，又經過伊斯蘭教移花接木。普拉索喬生為爪哇人，又是個穆斯林，與這許多美麗的神話共同成長。赴美擔任交換學生一年的經歷，貼近到他的生活背景時，一定曾經動搖過他的信仰與生平倚賴的文化養分。

就這樣，夕陽偏西，將近黃昏之時，我們開到了宗班（Jombang）鎮上。那所歷史悠久的知名經學學校就設在這個鎮上。可是我們一將車子開下幹道，就發現宗班鎮上似乎遍地學校。放學時，路邊成群的穆斯林女學生三三兩兩、窸窣窸窣地閒聊交談，一個個修女模樣的小個頭女孩，裹著頭巾，穿著襯衫，圍著裙布。我們要找的經學學校究竟在哪裡？這所學校又與其他穆斯林學園有何差別？我們來回奔波，司機控車神勇，彷彿他還在幹道上拚搏一樣。我們揚長深入陰森晦暗的鄉間巷道，然後才發現，原來我們來來回回，不過過其門而不入多少回。這所學校門面之不起眼，即使架設了招牌指示，還是難以引人注目，跟我（普拉索喬亦然）預期中柏木森森，幽靜避世，鄉村與校舍融於一體的莊園氣派，真是大相逕庭。

學校四周圍了一堵圍籬。籬笆裡的沙地庭院上，一棟兩層樓的混凝土建築，院子裡稀稀疏疏地種了幾棵樹。院子中央，幾根木樁上頂著一間清真寺，寺中架起地板，鋪上磁磚。男孩穿著短褲、裙布，閒晃或是靜坐在階梯或地板邊緣，隨著一位只聞其尖聲、不見其人的教師，持續吟誦著阿拉伯經文。

我們走過閱報欄——空地上架著一座玻璃箱櫃，頂著木製蓋梁，一張張報紙就攤展在玻璃櫃子裡——來到清真寺一旁的辦公室。辦公室裡無人坐鎮。兩層樓的校舍陽台欄杆上，晾著五顏六色的襯衫與裙布。校園四處都是男孩，圍著裙布，光著背脊，暖棕膚色，精瘦、平坦、優美的印尼人體型，胸膛與小腹肌肉的線條都極為精緻。

他們回頭凝視，接著，緩緩地開始圍繞著我和普拉索喬。我們一走動，他們就跟在後頭，緊隨不捨。我們走進這處圍地後方學生宿舍之間狹窄的泥土巷道與泥濘的側溝時，身後的學生儼然已經形成一團群眾。宿舍四處晾曬著布縷抑或長幅的裙布，宿舍房間之狹窄，望之足以令人窒息（某個學生告訴普拉索喬，宿舍裡八人合住一個房間）。簡陋的廚房棚子與學校合作社周邊，泥巴與垃圾堆散置；泥濘的院子地上，圍著裙布的小童就著空地上的生火爐灶，正費力地刮掘著燒焦了的鍋子底部，刮出一塊塊相互沾黏的焦硬米塊。他抬起頭來，惶恐恐懼地望著我們及跟在我們後面的一夥群眾。我心想，或許吧，中世紀時期，所有的知識重鎮、學習中心都是這個樣子吧。

2 麻喏巴歇王朝（Majapahit）：一二九三～一四七八年統治印尼大部分地區的封建王國，首都建於布蘭達斯河附近的新闢村落

麻喏巴歇。十四世紀中葉時為麻喏巴歇的鼎盛時期，後來由於伊斯蘭教的傳播與爪哇北部海岸一些伊斯蘭教國家的興起，麻喏巴歇時代遂逐漸結束。

3 因陀羅（Indra）：印度最古老的宗教文獻與文學作品《吠陀經》中的主神，司雷雨。

4 《摩訶婆羅多》（Mahabharata）：共十一萬頌（詩節），為世界上最長的史詩。西元前第一千年形成，歷代口傳，到十九世紀才刊印。主要情節是講俱盧族（邪神）和般度族（善神）之間的衝突。史詩中反映當時奴隸社會生活，涉及哲學、宗教、法律各項層面。

可是某個男孩嚷了起來，接著一呼百應，其他男孩也紛紛跟著叫喊著，難道他們正呼喚著「伊理奇」嗎？

一名個子非常矮小的男人，戴著一頂黑色便帽，身高大概只有一四六公分，朝著我們走了過來，領著我們跟我們的臨時追隨者離開宿舍區，回到學校圍地前方，回到清真寺旁的二樓建築裡。他打開了一扇門，讓我和普拉索喬進入一間寬敞的房間，隨即關上門，將那一夥群眾擋在屋外。黑色便帽之下，他神情肅穆。

普拉索喬說：「他說，我們為學校製造了紛擾。」

我說：「製造紛擾的可不是我。」

大房間裡，座椅沿著一列矮桌排成兩排。我們坐了下來。

就像在東非地區某些特定的季節裡一樣，飛蟻受到光線吸引，成群成堆地飛舞在住家的窗玻璃外，這所宗班鎮上知名的經學學校裡的莘莘學子正如東非飛蟻，只是不知道他們究竟是感受到何種吸引？受到證明他們學校知名度的訪客的吸引？他們攀聚在房間窗戶上，黃種人的臉龐上疊著另外一張黃種人臉龐，每張臉龐都有露齒微笑。即使隔著房間的屏障，他們還是可以模仿我說的每一句話。而且現在，就在他們竊竊私語與模仿我說話之間，我清晰地聽出來了，確實有人喊著「伊理奇！伊理奇！」難道那位知名學者的一度走訪，或是傳聞中知名學者對他們的研究興趣，撩得他們如此虛榮嗎？

又一個男人走進房間。

普拉索喬說：「他說我們應該要先登記，清真寺裡正在上阿拉伯文課，我們給學校製造紛擾了。他這裡每天都有很多訪客。」

當然囉。

「我們得先到辦公室去登記。」普拉索喬說。

「可是，他們辦公室裡一個人也沒有啊。我們一到，就先去過他們辦公室了。」

於是，我們枯坐了半晌。稍後我才知道，那個頭戴黑帽的男人根本算不上校方人員，他甚至也不是教師，只是個學生，入學本校已經九年有餘了。他將我們帶進這房間，只為了引起我們的注意而已。原本我還以為他應該幫得上忙的。

我對普拉索喬說：「把我們的介紹信交給他，叫他把信拿給他的領導。」

正如我在雅加達聽說的，經學學校謹守著傳統，以及堅持「去除架構」(unstructured)，所以學校裡沒有「校長」，只有「奇亞」(Kyai)，意即領導。

黑帽男人溫順地拿了信就走遠了。

我對普拉索喬說：「你能不能過去跟那位阿拉伯文老師談談呢？」

課程持續進行著。老師躲在清真寺裡的暗影中，沒完沒了地吟誦著。

普拉索喬一籌莫展，他根本沒辦法打斷那位老師。

「我們現在該怎麼辦？」

「只有等著了。」

我們等著。等到阿拉伯文課終於結束了，我們步出屋外，冒著再度被群眾包圍的危險。打著赤膊的男孩在房屋前廊上閒晃，有些學生抽著印尼的丁香菸，菸味甜膩。可是，身處在這群模仿群眾當中，而他們現在集結在我們四周，不管是行動或是講話都更加艱難。戴著黑色便帽的矮小男人又轉了回來，步履快促、靈巧、沉穩如初，手上還是握著那紙介紹信。他沒找到他的領導。

普拉索喬又將我帶回排著椅子的房間裡。他快快不歡，措詞也跟著正式起來，說道：「您介意我讓您自個兒在這裡待上一會兒嗎？我出去試試看，說不定能找個相關人士過來。」

他走了出去。群眾裡的男孩沒有一個跟著他，他們依舊杵在窗外瞪著我。天色漸晚，接著就到了禮

拜時間、晚餐時間，他們對我的興致也逐漸消褪。「伊理奇」的呼喊聲漸稀漸遠，有時，遠處還是傳來一聲（某個無所事事的學生滿足了好奇心之後，移步離去，順便長嘯一聲）。然而，印尼傳統的待客之道還是不曾偏廢。我一個人獨坐，有人卻從內室裡端出許多杯茶來（彷彿校內即將舉辦一場正式的茶會），他在我面前擺了一只玻璃茶杯，避免跟我眼神接觸，隨即就離去了。

普拉索喬帶著兩個男人回來。兩人之中，一名是學生，雙眼圓睜地瞪著我，坐在一旁保持緘默；另外一人則是英文老師，個頭像黑帽男人一般矮小。英文老師笑容滿面，急著練習英語會話。可是，普拉索喬澆了他一頭冷水。他們用印尼語交談了幾句，普拉索喬就說，這位英文老師要帶我們去參觀另外一間經學學校，離這裡不遠，開車半小時就到了，我們在那裡或許能夠找到可以跟我們對談的人，多跟我們講些關於經學學校的事情。

這個安排想來也不會讓我們損失什麼，於是我們驅車入薄暮，通過永恆無盡的爪哇農村，而那滿臉堆笑的英文老師坐在司機旁邊，一點也不嫌麻煩。車行幾分鐘之後，他迅雷不及掩耳地突然轉過身來說：「你曾經來這裡參觀過多少次？」架構了這個英文問句，問過他的英語問題，也獲悉了答覆之後，他轉身坐定，一路上安安靜靜地。

「去除架構」的經學學校

我們轉進的這所經學學校，校舍看來較為新穎，營運也比較有章法。幾棟建築完善的混凝土校舍，鑄鐵欄杆圍繞著修整有方的庭院。時間正值昏禮，有人在校園裡吟誦呼禱。沒開燈的辦公室裡坐著一名架著厚片眼鏡、圍著藍色長裙的老人，他是經學學校的副領導。他說我們運氣真好，瓦西德先生第二天就要動身上雅加達去。他領著我們在暮色中穿過幾處花園，走到一處私人住宅門前，去拜會阿布度

爾·拉曼·瓦西德先生，瓦西德先生對於經學學校可謂瞭如指掌啊。直到這個時刻，我才猛然想起，先前就有人跟我提過瓦西德這個名字，極力推薦說他是我此行一定要拜訪求見的人。雅加達的報紙上也刊載過與他有關的報導。他致力辦學，經營經學學校有道，使他逐漸浮上檯面，成為一號人物。

這真是無心插柳，普拉索喬找到這位英文老師，反而讓我見到瓦西德先生。瓦西德先生是個矮小粗壯的中年人，腰間圍著裙布。他家的西式客廳裡，天花板上吊燈微明，一架電視擺在房間遠端的角落裡，女眷、傭僕進進出出，矮桌上端出茶點。瓦西德先生在他家客廳裡說的話，逆轉了我這一天的際遇，重整釐清了傍晚這一段混亂的經歷，並且讓我大開眼界，見識到一段歷史上的奇蹟。

首先，必也正名乎。印尼語當中，城鎮中常見的唐人街叫做 *perchinen*；*per-china-en*，意即「華人所

在之處」。所以說，經學學校的名稱，*persantren*，也就是 *per-santri-en*，代表「智者所在之處」，*santri* 則是由梵文 *shastri* 轉變而來，意指精通印度 *shastras*（經書典籍）的飽學君子。

在過去印度教—佛教盛行時期，經學學校在爪哇正如修道院一般，由社區供養，為居民回饋屬靈上的導引及精神上的保護。每逢古老文明的哲學體系崩潰之際，經學學校的功能與位置，很容易就被蘇菲教派的穆斯林取而代之。校方對外開放，任誰都可以去跟經學學校的奇亞請教，請他針對個人需要指點迷津，或是給予宗教上的指導。求道者不須註冊入學，研習任何正式的課程；以這種方式運作的經學學

5 阿布度爾·拉曼·瓦西德 (Abdur Rahman Wahid, 一九四〇—二〇〇九) 於日後儼然成為印尼穆斯林的政治領袖，他並沒有激烈的主張，象徵著宗教與道德，受到群眾的尊重與愛戴，並於一九九九年由幾個較大的穆斯林政黨推舉為總統候選人，復於十月二十日，經印尼全國最高民意機關人民協商會議經過秘密投票，獲選為印尼第四任總統，接替蘇哈托的副手哈比比上台。瓦西德上台時年紀五十九歲，雙眼近乎全盲，健康情況令人憂慮。瓦西德上任二十一個月後，捲入兩宗貪污醜聞，但拒絕向國會解釋，再加上他無法解決國家經濟問題，被認為不勝任總統職務，遺缺由副總統梅嘉蒂娃（即印尼國父蘇哈托之女）遞補上任。

校，則可稱為「去除架構」的教學方式。

荷蘭人殖民時期，即十九世紀下半期，村莊開始蛻變。有些人家境逐漸富裕起來，他們想要讓孩子受教育。經由村子裡新近致富的這些人家的運作，經學學校逐漸從蘇非中心，轉變為招收孩童入學的學校。同時，爪哇人信奉的伊斯蘭教也發生位移了。探索神秘主義的蘇非教派，其實也是伊斯蘭教各分支中較為接近古老宗教如印度教與佛教的一個派系其重要性頓減。再加上蘇彝士運河開通，汽船通航，使得當時還位處伊斯蘭教宣教東界的爪哇，不再那麼遙遠。過去，信徒只能揚帆航行，前往麥加朝覲，要耗上好幾個月的時間；而今，朝覲一趟，三、四個星期就可以往返。越來越多人去過麥加。越來越多印尼人接觸到較為純正的信仰：先知、真主的使者，以及先知嚴格的訓誡。

十九世紀最後十年之間，經學學校開始轉變為一般學校。宗班鎮上，我們方才走訪過的那所經學學校，創建於一八九六年。可是，這所學校仍舊是地方上的宗教中心。村莊居民提供學校運作所需資金，村民不時可以向校方請益。同一個區域的各級經學學校領導，每隔三十五天就會聚會一次，討論當前亟待解決的議題。舉例來說吧，最近這附近居民就為了男人留長髮的問題，感到很困擾。領導們就恰如其分地作出最符合伊斯蘭教義的反應。領導們翻遍《可蘭經》，又考證了所有先知生平的可信典籍，而他們找不出先知曾經對男子蓄留長髮有任何評議。因此，他們達成決議，男人留長頭髮不是個伊斯蘭問題。至於領導們為什麼每隔三十五天聚會呢？那則是延續了印度教—佛教時期的傳承。當時每個星期只有五天，修道院的長老每隔七週就舉辦一次聚會的緣故。

時辰已晚。可是瓦西德先生自己開設的經學學校還有課要上，課室就在他自家花園盡頭的一間屋子裡。經學學校依舊維繫了修道院的鐘點規定，依舊要求院內學子不分晝夜地投入研習。我們走進花園裡，在一旁駐足觀察。授課老師宿舍的前廳和門前，或坐或臥地擠著一群男孩。室內照明昏暗，老師的視力很差。老師朗讀或是吟誦著阿拉伯文，半刻不間歇，學生們也埋首書中跟著念念有詞。這堂課教的

是伊斯蘭律法。

瓦西德先生說，這位老師是這一帶最有學問的先生了。他不支薪，每個月只拿五百印尼盾，合計美金八毛錢而已。村民供他食膳，經學學校提供他交通來往，還蓋了這間小房子給他棲身。

課程結束，男孩們站了起來，幾個學生繞著我們閒晃。老師戴著鏡片厚重的眼鏡，走出昏暗的房間，靜默地站在我們身邊，即使我們正好在談他，他還是神情溫順，一言不發。瓦西德先生說，這位先生年紀不過三十歲，可是他已經默記住大部分的《可蘭經》經文了。

我說：「不過三十歲，而他可以將《可蘭經》默記在心裡！」

「半本《可蘭經》，」瓦西德先生說：「半本《可蘭經》。」

我可不覺得這有什麼了不起的，這人都三十歲了，消磨了大好青春，卻只掌握了一本書？瓦西德先生跟我語氣友善地交鋒往來幾回，辯論這一點。這段時間，授課教師一直就著屋內冥晦的燈光站在一旁，安靜、駝著背、謙恭，等候著瓦西德先生允許他告退——這是佛教僧侶流傳至今的種種昔日規範中，最不容易保留下來的風俗了。（根據佛陀的規戒）僧侶倚賴信眾供養，而今在爪哇，卻改以支付教導他們的孩子阿拉伯文鐘點費用來供養僧侶。

我們開車送那位英文教師回到宗班。他每個月的薪資高過美金八毛，但他不願吐露究竟高出多少。可是他居無定所，也沒有人供應他吃食。他量入為出，只是銀根還是緊得很，經常捉襟見肘。向村子裡的人買碗飯吃，就要花上五十印尼盾，美金五分錢；白飯上頭再添點「菜色」，就非要他一毛六分錢不可了。

街燈下，宗班的經學學校就換了個樣子，感覺寧靜致遠。大門已經鎖上了。英文老師說，鎖上大門是為了不讓學童亂跑。我們就從領導宿舍旁邊一扇還敞開著的門進入，學生見到領導總是膽戰心驚的，比較不會從這扇門出入。

一燈如豆。圍地上要比今天下午安靜得多了。學生卻還是照樣裹著裙布，漫步在一棟稱為「愛爾法塔」(Al-Fatah)的屋舍前無所事事。然而，就像棲息了無數禽鳥的自然公園入夜後一樣，訪客到來仍掀起一陣騷動。八名學生共用一間宿舍寢室，他們十三歲時進入經學學校，直到二十一歲才能畢業離校，同寢室的學生年紀一定相差懸殊。可是僧多粥少，即使八人同宿，寢室房間還是不敷分配，有些男孩就睡在清真寺的地板上。

院子裡，四下燈光昏暗之處，都有男孩佯裝在溫習功課。燈光如此陰暗，可以直言無誤，學生的確只是裝出用功於課業的樣子。學生讀的書當中有一本專講伊斯蘭律法的書，《阿拉伯文法》、《伊斯蘭教故事集》、《如何禮拜》等等。最後這一本《如何禮拜》書中刊載了八幅插圖，一個動作接著一個動作，解說合乎伊斯蘭教教義的禮拜姿勢。我心想，說不定這本書根本毫無必要，反正這些學生一天都要做上五次禮拜。夜色已深，而經學學校的一天可得起早摸黑地開展。

蘇非中心轉變為學校，僧侶與托鉢苦修道人的紀律要求也轉移到年輕的一代身上，這不是傳統，更無助於教育。經學學校同時也偏離了印尼的往昔傳承；這是伊斯蘭化的機構，其茫然無著，遠超過任何西式教育課程所能及。然而，有心人士卻執迷於如此乏善可陳的教育理念，並且以昔日僧侶安貧樂道、稱頌貧窮的精神橫加扭曲。如此理念，應用在一九七九年的爪哇學校裡，演變之下，不過是一群窮教師教導窮學生，繼續窮下去。

文化豐美

我們在泗水過夜。任何一個大帝國或是世界強權，都不會繫記所有的小型戰役。可是，當地人卻牢記不忘。二次大戰結束後，英軍曾經在一九四五年於泗水地區與印尼人作戰。泗水當地還為此豎立一方

紀念雕像以供後人參觀；普拉索喬與我參觀過後就驅車動身，往西南方向開上六個小時的車程到日惹。我們再度走上宗班鎮的道路，通過似乎永無止境的村莊，重見磊疊石片的門柱，無言自明地道出，信奉印度教的爪哇帝國麻喏巴歇王朝，沉落靜止在早遠的歷史中。

我們停車在麻喏巴歇博物館參觀，館藏卻乏善可陳。可是沿著村莊產業道路往下走不遠，對面路邊就有一座廟宇。那是一條綠色道路，兩旁路樹枝葉掩映。竹枝編就的矮房沒有窗孔。道路邊上的停車標誌，標誌綁在一根鬆鬆插在地上的竹竿上，停車標誌旁邊有一個小女孩看管。收費一百印尼盾，她就會給你一張收據，再將橫竿舉起來放行；這筆費用將繳納鄉庫，因應公共支出。

產業道路旁邊搭了一個草蓋屋頂小屋，小屋橫梁上鬆鬆地懸吊著一塊大段原木。這裡就是村子守望相助的崗哨，村民輪流排班值夜。原木內部挖空，一邊還縱向地開了一條縫，村民掄起木槌猛敲原木時，就會發出嗒嗒悶響。這塊木頭既能報時，也可以用來通報竊案與火災；目前，火災是村子的首要公害。

綠蔭蔽天的村莊外圍空地上就矗立一座輝煌古蹟：一座麻喏巴歇王朝的廟宇，紅磚塔樓高聳，了無贅飾，幾何圖案層層重複，堅固強勢，這般古典的建築風格，正是我們一路在泗水地帶屢見不鮮的門柱上磊疊的鑽石體或金字塔的來源。這座廟宇作為紀念碑並不足道，塔樓裡供奉的神像已經取了下來。可是，經過這一帶的稠密擁擠、千篇一律、低矮的房屋、狹窄長條的稻田，這座塔樓給予當地人某種過去，也為這片景致平添另外一分感受。

普拉索喬對這座廟宇的建廟目的或是重要性何在一無所悉。他只是驚嘆於廟宇建築過程中，完全不曾仰賴機械動力。此外，建廟時連灰泥都沒用上。數世紀之前用來鋪砌磚塊的黏鳥膠，至今依舊牢固可靠；這就是普拉索喬曾經遇過的一個德國人嘖嘖稱奇的奇觀了。

我們在一家華人餐館裡吃了些東西。普拉索喬問我：「你看得出来他們是華人嗎？」我說，可以

呀。馬路兩旁，持續不變的農村風光，鄉人與他們狹小的房屋，跟著我們亦步亦趨。接著，沿路風景逐漸破碎中斷，我們的車子在新綠的柚木造林地之間蜿蜒出入，柚木樹幹挺直，大片渾圓樹葉迎風招搖。普拉索喬說，大戰期間，日本人將爪哇的柚木悉數砍盡。這一點頗耐人尋味，因為就在前一天，我們在雅加達的國內機場，機場裡展示著印尼古蹟的照片。普拉索喬跟我說，印尼石雕佛陀的頭像都是被日本人揮著大刀砍掉的，不然就是予以毀容。我們在參觀麻喏巴歇博物館時，這個話題又提了起來，而我告訴他，（除了專門蒐集戰利品的狂熱分子之外）穆斯林本身毀壞偶像的歷史，其實淵遠流長，古往今來，穆斯林可以說是人類史上最慣於削掉古代偶像鼻子的一群人了。要讓普拉索喬接受這一點，剛開始實在不容易。但到後來，他比較能夠了解了，也只是簡單說道：「毀壞偶像只是要避免民眾膜拜偶像罷了。」

日正當中，柚木林中更感到潮濕悶熱。普拉索喬在車上睡了又醒，醒了又睡。他要司機播放卡式錄音帶裡的熱門歌曲，他聽著聽著，就沉沉睡去。眼前的大地逐漸平坦，豁然開朗，迎向一片寬廣的平原，一邊環繞著一線藍色矮丘，另一邊遠遠卻平地拔起高山連峰。雨剛停，一草一木晶瑩閃爍。稻田綠意盎然，一片欣欣向榮。襯托在綠色的背景之上，任何一抹鮮豔的顏色——田間農忙男女身上的衣裝或是裙布——都益發出色，與藍色晴空，完整倒映在亭亭田水之上。稻苗沿著一直線插秧，不同的田地長著不同階段的稻穗。

天光雲影不斷變化，午后燥熱逐漸退去時，普拉索喬醒了過來，再度神采奕奕，精神飽滿。睡眠不只是令他神清氣爽而已，隨著我們驅車通過，他開始詩意無限地講起這片村野。他曾經在這附近受教育。他講起過去擊著棕櫚複葉編成的火把，起早摸黑走到公路旁邊等公車的美好往事。他也講起午后的「約會」習慣。下午四點到六點之間是青年男女固定的約會時光；晚上過了七點，村子裡就沒地方好踹了。女孩兒雙腿併攏側坐在摩托車後座上，兩手環抱著男孩的腰，這可是一般認可的約會樂事。

普拉索喬說：「那可真是一整天下來最愉快的時刻了。」

紅日偏西，紅霞萬道，透過樹葉灑下，投射在路面，依舊火紅可愛。稻田間瀰漫淡淡水霧，藍色矮丘的色澤更淡了，夕陽與天空都映照在稻田的積水上。

「我們要出國實在不容易，」普拉索喬說，「我們很容易染上思鄉病的。」

他們可以為了任何事物思鄉情怯：我們那一整天所經歷過的一切大小事情，早晨之清新，中午之熨熱，傍晚之放鬆愉快以及夕陽霞光等等；我們在路上或是田埂間看到的景象；稻米栽種與收穫的節序，農務的改變，男人挑著兩端簍子裡堆滿貨物的竹竿扁擔，腳踏人力車，馬車（不同區域各有不同型態的馬車）。在一個印尼人眼中，本國的凡事萬物，他都了然於心；不論屋內擺設、服裝衣著、抑或光線明暗，每一項細節都逃不過他的銳眼審思。每個季節都有其模式，每一天也有其模式。當普拉索喬遠赴亞利桑納州時，隔天一早醒來，眼皮還沒張開，躍上心頭的第一個念頭就是：「我現在不在印尼了。」

長日將盡，暮色不遠，又到了爪哇生活中最美好的時光了，他的心思也隨之飛揚。路邊聚滿了出門享受如此美好時光的村人，伸腿舒筋，閒話家常。載貨馬車來往不息。男孩女孩共騎在腳踏車上——普拉索喬還特別指出來要我注意。

而他也向我提到他住在亞利桑納州時，遇到一些人情上令他感到詫異唐突的事情。有一天早上，他跟隔壁鄰居打招呼，接著，出於禮貌和友善，就像他會對任何一個印尼人寒暄一樣，他問道：「你今天打算要做什么呢？」倘若當時他身在印尼，人家就會回答他：「喔，今兒個，我得上我家稻田去，我得做這個、做那個的。」可是在亞利桑納州，他的鄰居，某個三十來歲的男人，只是冷漠的回應他：「不干你的事。」偶爾，普拉索喬就像他還在印尼的時候一樣，不請自來地去朋友家裡走動，不為了什麼特殊原由，只是維繫友誼而已，可是在亞利桑納州，他朋友的媽媽就會問他：「你來有什麼事嗎？」在印尼，這可是極度不禮貌的問話。「我們不像他們那樣個人主義。」普拉索喬結語道。

爪哇當地農民若是準備要收割稻田了，他就會送信給同村的鄰人親友，大家都會過來幫忙，每個人

再帶把稻子回家當作謝禮。普拉索喬的祖父也是個農人，總愛蹲在自家門口吃晚飯，這樣才能向路過的朋友吆喝著：「進來一塊兒吃吧。」那種事情，住在都會區裡當然不可能了。住在雅加達，每一頓飯都吃得風捲殘雲，速戰速決。可是，他的母親還是保留了與眾人分食的本能；為此，普拉索喬的母親和父親不時紛爭，甚至落淚收場。雖然她十分痛心的體會到，憑她一人之力，實在無法每天晚上都餵飽整個雅加達，可是只要她搭乘火車旅行，她還是會準備大量的餐點食品，份量之多，遠超過她自己與家人所能果腹，只為了跟可能會與她同車共乘的其他旅客分享而已。

雖說如此，身為一個印尼人，普拉索喬還是很樂於旅行的。在他擔任交換學生、待在亞利桑納州的期間，美國國內聚集的人種之多元，讓他不勝驚異。到美國之前，因為印尼經歷過荷蘭人殖民統治的階段，所以他不喜歡荷蘭人。幾星期過後，他還向我提起，他的祖父跟某個荷蘭人曾發生肢體衝突的一樁往事。可是他在美國碰到一個荷蘭男孩，結果他非常喜歡這個男孩，而且他也很高興自己能夠擺脫掉對荷蘭人的反感。還有，拿「希特勒」來稱呼某個德國男孩，還向他說明這個笑話的用意何在，這是多麼好玩的事情；還有，當普拉索喬拒絕食用豬肉時，有人對他說：「嘿，你到底要到什麼時候才會放棄你那個宗教？」又是多麼有趣。

他在亞利桑納州，最先住在一個信奉路德教派的大家庭，接著又搬到某個長老教會家庭，接著又改住到無神論者的家中，可是他與每戶人家都相處融洽。不過當時要是有人問他：「你喜歡美國多於印尼吧？」他內心深處還是個道地的印尼人，足以令他迴避問話，不予置評。普拉索喬不想傷到那個如此提問的美國人，同時，他也不能說自己不像以前那麼喜愛印尼了。由於經歷了旅居亞利桑納州的一年，他心中也逐漸萌生寫作的意念，他已經寫了一百來頁自傳性質的隨筆短文：《梅登不是卡薩葛蘭地》（*Menden Bukan Casa Grande*）。卡薩葛蘭地是普拉索喬在亞利桑納州落腳之地，梅登則是他在爪哇的家鄉。

日落大地，我們已經開到普蘭般難。看過多少有關這座印度教廟宇的攝影作品之後，而今親眼見識到這座雄偉的高塔，就這樣矗立一旁，如此接近主要道路邊緣，鶴立在村頭街景之間，叫我驚愕不已；叫人怎能不信服拜倒在這座廟宇之前！

這座廟宇建造在第九世紀，早期的照片只顯示了廟宇的大型基座，基座外落石移置，有如冰礮石推移散落，目前已經由荷蘭人處處考據研究，加以修復還原，沒有一絲假造瓜代。建物上原始石塊逸失之處，就以素面無紋的石塊填補。這座廟宇原本是一群大小印度教宗廟的中心，重建工作持續進行著。較小廟宇的石塊整整齊齊地堆在一邊，每塊石塊上都標上位置記號。可是，村莊人家已經迫在咫尺了。普蘭般難寺廟群四周雖然已經用籬笆圍起隔開，村民仍舊在籬笆外圍一處小型神龕旁焚燒垃圾，神龕上還有些雕飾畫作。普拉索喬說：「看了真讓我難過。」然而，普蘭般難就跟麻喏巴歇王朝的塔樓一樣，對普拉索喬來說，只是代表著古代建築上的奇蹟，古代人竟然單憑人力，不用機械就可以興造規模如此恢弘的廟宇，不用機械就可以切割得如此精準平直。

一群當地女孩把握住一天最美好的光景，輕浮妄躁地在四座石砌階梯上奔跑跳躍，不住地出聲呼喚著普拉索喬和我，一逕咯咯傻笑，歡鬧在築有短矮護牆的平台上。天光漸褪，遁落在這片潮濕田野之外，大廟也為之遲暮。

矮護牆上雕刻著摘自史詩《羅摩衍那》⁷的情節場景，這部印度史詩已經為爪哇與其他東南亞國家內化，融入各家文明之中。普蘭般難建廟千年之後，史詩故事卻依然栩栩如生地存活在爪哇。普拉索喬熟知《羅摩衍那》的來龍去脈，這些故事他都是從爪哇皮影戲院聽來、看來的。史詩中的人物及布局發

6 這個書名也有一語雙關的隱義，卡薩葛蘭地（Casa Grande），即西班牙文「大城堡」之意。

7 《羅摩衍那》（*Ramayana*）：原為民間口頭所作，傳約西元前三至四世紀由蟻蛭以傳奇材料編成，被稱為「最初的詩」。字面為「羅摩之路」，是古代梵語史詩傑作，敘述羅摩（Rama）從惡魔拉摩那（Ravana）手中拯救其妻悉多（Sita）的故事。

展，他如數家珍，同時他也深諳故事所警示的道德教訓。諸如普蘭般難之類的文化紀念物，蘊含了艱深的神學理論，兼容印度教與佛教，藉以宣揚君王類於神性的特質。這種神學已遠，軍主與僧侶已去；然而，古老信仰中柔軟平易之處，反而賡續不減，源遠流長，匯成一股文明。

普拉索喬是個穆斯林，他有些朋友也是新穆斯林。然而，他卻遠遠地偏離了新穆斯林一力淨化的欲求，新穆斯林期望創造出只有信仰、別無其他的抽象人類，除了恪遵規範之外，別無其他思想的人。普拉索喬所掌握的爪哇文化之完整豐富，令他無法割捨傳承，接受新穆斯林的籲求；而他一路上喋喋不休、滿口欽嘆的，也正是這樣豐美的文化。

廢除傳統學校

普拉索喬愛朋友，更不放過跟朋友瞎扯閒聊的時光。他在日惹也有朋友。當晚，他就跟朋友相會，稍後他說，他們五個人一起上了家餐館打牙祭，歷時一個小時，共同度過「歡樂」時光。

他說明天早上，我們應該盡早起身，上路去參觀日惹的學生騎著腳踏車上學，七個學生並排共行，一邊揪著腳踏車鈴，一邊說笑打趣。日惹交通繁忙，車輛川流不停，他們為什麼要這樣阻礙交通地騎車呢？「因為他們是這麼快樂。」而他們之所以快樂，也是因為他們正值花樣年華，理當快樂。此外，這正是朝陽初升之時，一日之計在於晨，更應該快樂。只可惜，就是這群踩著腳踏車的學生，夥同其他腳踏車潮，製造了交通阻塞，延堵了普拉索喬。我也就這樣錯過了早上上學的學生。

可是，普拉索喬還是找了個朋友介紹給我認識：而我從普拉索喬的言談之間，隱約感覺這個朋友挺像是個神話人物。這個朋友，像是存在於爪哇生活的安定與儀節中。普拉索喬無法掩飾自己如何樂於有朋為伴，他不時地碰碰他，他跟我提到他的時候也是滿面微笑。而那位朋友跟我們在一塊兒的時候，始

終木訥寡言，神情卻也不見絲毫煩躁，能跟普拉索喬共處，就已經令他心滿意足了。

宗班鎮上的經學學校就像一次試煉。然而，普拉索喬對於帕伯倫（Pabelan）的經學學校還是抱著高度期許。帕伯倫是經學學校的樣板，這所經學學校係由「傳統的」伊斯蘭教育機構延伸發展而成的某種學校，許多人以為那可能是最適合爪哇地區的教育方式：棄絕文憑工廠（該校不授與任何證書或文憑）、「去除架構」、教授合乎學生需要的技能，有如一座「合作社」、自給自足、教師與學生齊心協力、校內誰也不只是擔任教師、村莊與校園相互扶持，這裡沒有絕對的村民也沒有絕對的學生。而我就所了解，這所學校是一座教育公社、自助組織，校園與普拉索喬訴過我的村莊生活和諧共濟。

從日惹驅車，取道前往婆羅浮屠的方向——沿途村莊與水田不絕，此地土壤富含火山灰而肥沃——開車一個小時就到了帕伯倫。我們轉進一條綠色隧道，兩旁路樹枝葉相連，綠蔭蔽天，隧道盡頭，我們看到一處廣大的砂質圍地廣場上，幾棟新近粉刷過的爪哇房屋，屋外栽植幾株椰子樹與鳳凰木。我們循線在一間粗略不整的村舍裡找到了辦公室，然後我在那裡吃盡了苦頭。

辦公室裡有兩個男人，其中一位就是陶菲克，年約三十，矮小，圓臉，臉上一抹微笑，笑意始終濃厚不減，隨時可以迸出深沉暢笑。他首先糾正我們，彼辦公室非辦公室也。聞言之際，我登時困惑不解，因為室內一角明明就立著一只玻璃櫃子，櫃子裡塞滿了卷宗。

陶菲克接著辯稱，本校不設任何辦公室管理人員。經學學校師生輪流坐鎮辦公室，這也就是為什麼許多訪客對他表示，這間辦公室看起來一點兒也不像辦公室，而這一點令陶菲克愉悅異常。當天陶菲克在辦公室裡充當經學學校的發言人，純粹只是因為恰好輪到他值班而已。

只是，學校業務的連續性又該如何在師生之間交接傳遞呢？玻璃櫃裡的卷宗、檔案，又由誰負責管理呢？若不是陶菲克略過不答，就是我漏聽了他的說明。陶菲克接著介紹辦公室裡的另外一個男人，那是個結實的年輕男子，一口流利的英語，是村子裡的領袖，也是村莊的首領。觀其人，實在不是我認知

中的村莊首領。而就在我極力釐清陶菲克拋給我的連串謎團時，我又錯失了他向普拉索喬解釋為什麼該校沒有所謂教師的說辭。

我再度抓住聽話要領時，陶菲克正以心平氣和的方式說道：「我們與大自然和睦相處。」

陶菲克對於生態環境的關懷，似曾相識，我不由得豎起雙耳諦聽：生態關懷聽來摩登，其實卻與《可蘭經》經文契合，綜合這兩個緣由，自然保育的意識就融入新伊斯蘭教當中。而當陶菲克侃侃高談道，我們雖然是外鄉人，可是他們還是衷心歡迎我們的時候，我又能完整地進入對話了。陶菲克說，我們可以留下來共進午餐，可以在這裡過夜，這就是帕伯倫的待客之道。作為穆斯林，就是要善待你的同胞。

我說：「那就是你善待同胞的原因嗎？有些人對他們的同胞好，純粹是因為大家是同胞而已。」

村莊首領回應道：「我們是穆斯林，我們想要對別人好啊。」

「你所謂的好，是什麼意思？」

村莊首領直起腰桿來說道：「要遵照習俗，不要冒犯到別人。」

這倒是言如其分，標準的穆斯林回答：遵守約定俗成的穆斯林習俗，不要冒犯到其他的穆斯林。

我說：「那麼，留長頭髮究竟是好還是不好呢？」

他再度毫不遲疑地回答：「那不成問題。」

他通過了他的伊斯蘭測試，開始放輕鬆了。他以某種新的角度重新檢視我。他說：「你阿拉伯人嗎？」

「不是。你怎麼會這樣想呢？」

「你看起來像我們的先知。」

這話觸怒了普拉索喬。「你不可以那樣說的。誰也不知道先知究竟長什麼樣子。」

「確實，沒有人知道，」首領說著，企圖平衡在褻瀆與失禮之間的鋼索上。「可是，他的樣子看起來

就像是你會期望的先知長相一樣。」

我們望著牆上一幅印尼群島的地圖，地圖中心就是帕伯倫。周圍的印尼各地，只要曾經將子弟送到此地受教者，都釘上大頭釘以茲識別，同時再從當地位置牽出一條紅線，輻輳聚集在帕伯倫一地上。

或許只是頑皮，或許是認真的，普拉索喬指著地圖北方一處非常狹小的島嶼說道：「那裡的人怎麼打聽到你們學校的？」

「咱們先別聊了，」陶菲克說：「我們四處走走。」

於是我們將村莊首領留在辦公室，三人一起走到砂質院落裡。方才在辦公室裡瀰漫著濃重的化糞池臭氣，出得室外，感覺就淡了許多。椰子樹樹蔭下，幾個男孩和壯丁，其中還有個戴著黑色便帽的老人，正在雕刻一扇床頭板。

我對陶菲克說道：「你說你們學校裡沒有教師，那麼是誰教他們製作床鋪呢？」

「他們彼此相互指導。」

我們趨向那幾位製床工匠。他們顯然已經習慣訪客出入了，絲毫不在意我們駐足觀看。

普拉索喬說：「你現在要我問他們什麼呢？」

「請你問他們，做床鋪的木料是誰出錢的？」

陶菲克說：「大家都給我們東西。我們也賣東西。我們製造家具，再賣掉換錢。村子裡有些人甚至不曉得我也是經學學校的人，他們還以為我是貿易商呢。」接著，陶菲克以深沉的笑聲，短短地笑笑；他喜歡如此隱姓埋名，雙重身分，不為外人獲悉的撲朔迷離感。

「你看，」普拉索喬驚呼一聲，「女孩子。她們都滿漂亮的。」

這也只有在這個十九歲的男孩眼中，才會看出如此西施來。她們確實是很年輕。那些女孩子圍繞著沙地上一個不大不小的淺坑旁蹲著，撿拾椰子樹根的碎片，再將碎片集中在每個人身邊的提籃裡。當我

們趨近觀察時，她們變得無精打采的，慢條斯理地摘下椰子樹根上鬆軟的枝條，一點兒也不趕時間。

陶菲克說：「她們正在蒐集新材，好生火煮飯。我們就是這樣一個合作社。」

普拉索喬說：「她們花了多久的時間在收集柴火上呢？」

「今天是星期五，」陶菲克說道，「她們整天都沒課。」

普拉索喬開始替這些漂亮女孩擔憂起來了。「你的意思是說，她們一整天都在撿這些柴嗎？」

陶菲克臉上的微笑不曾稍釋。「這就是合作社嘛。」

可是即使我們還目不轉睛地注視著她們，女孩們已經決定到此為止，今天可以收工了。她們小心翼翼地站起身來，每人拎起椰子枝條編就的小籃子，一搖一擺地離開了。

沙地上，白色繩索圍起一塊區域，是排球場，可是場上無人角球。太陽下，廣場上四處都有人將床墊拖了出來，再在地上鋪上毯子晾床墊，以利通風。

普拉索喬說道：「前面就是女生宿舍。你不想進去參觀？」

我決定不讓普拉索喬拿我當掩蔽馬，提籃假燒金。我說：「那樣恐怕會讓女孩子們不好意思。」於是我們過門不入，改而參觀一群師生合力清理一處池塘。一具停止轉動的幫浦上接著一根長條厚壁水管，幾個男孩站在冒著浮泡的深綠色池水當中，掄著網子撈起水中的腐葉與其他渣滓。有個中年男人站在池塘旁邊，監督著男孩作業。

陶菲克說：「他就是創辦這所經學學校的人。那時是一九六二年。」

普拉索喬說：「你想跟他談談嗎？」

我說不必了，我也不曉得該跟他聊些什麼。

我們繞著男生宿舍漫步一圈。宿舍裡，床舖和行李箱堆得滿坑滿谷的。那是一間供三十二名男孩共寢的宿舍，其中某些同學就待在宿舍裡，各自躺在床上。

陶菲克對普拉索喬說道：「那個男孩很有名氣，他哥哥是個歌星。」他順便報出歌星的響亮名號，普拉索喬聽了感覺如雷灌耳。

另外一棟宿舍外面，幾個小男孩站在他們的行李箱及其他行囊包裹旁邊。他們各個戴上他們的黑色便帽，樣子看來就像是著裝完整，彷彿他們剛剛抵達此地，正等著聽人吩咐，帶隊到各自分配的寢室一般。

陶菲克說：「我們差不多每隔十天就會為這些年紀較小的孩子換寢室，這是為了促進大家互動。我們這裡不會去分別他們是爪哇人、巽他人，還是蘇門答臘人。他們都是印尼人。你看到那個孩子了嗎？」他對普拉索喬說道，「他是從帝汶來的。」

普拉索喬饒感興趣。「哪一個？」

「帝汶。」陶菲克說著，接著開懷大笑，「我們最近收服的殖民地。再過不久，我們就會去殖民澳大利亞囉。」

普拉索喬說：「你不可以『講』那種話。」

我想著小孩子每過十天就要改換寢室，便開口說道：「不過，假如孩子不願意換寢室的話，又怎麼處理呢？你不是說你們這裡沒有老師，大家都分工合作嗎？」

「沒錯，這裡是完完全全的去除架構。」

「可是，萬一小孩不想換寢室的話——」

「你看那裡，」陶菲克說道，一手指著排球場和幾棵樹木之外的空地，「我們在那裡保留了一塊地，保留來栽種農作物。」

我這下就忘了那些男孩。我說：「那塊地面積多大？」

「兩英畝半大。」

一棟新的建築物，建造成本應當所費不貲，裡面堆放了些樂器。可是當天是星期五安息日，沒有人
在調弄樂器。布告欄上張貼著印尼文與英文寫作的影印本，文章主題都在頌揚經學學校之奇妙。其中三
篇係以英文寫成，三文彼此應和，尤其強調校方與社區之「互動」如何融洽，三篇文字一定都是以某些
講義為藍本，再加以鋪陳寫成。有一篇文章提到伊凡·伊理奇——想來，要在經學學校裡避開這個名諱
恐怕不容易——並進一步暗示，帕伯倫的經學學校就是「廢除傳統學校」的完美典範。

我逐行閱讀文章時，陶菲克和普拉索喬就在一邊等著。

我說：「你說你們學校已經去除架構了，而且沒有老師，學生要修業幾年才能畢業？」

陶菲克說：「六年。」

「我想，我還不了解我所見到的這一切。」

「你看，」普拉索喬說道：「他們在貼壁報。」

那是一間村舍，泥土地上灰塵之積重，被學生腳印在地板上踩出淺淺的山丘來，三名學童正忙著將
壁報拼貼起來。壁報內文是以打字機打出，左右兩邊留的空間相當，這意味著在這個爪哇農村聚落，在
這些許多低矮的茅屋與住家中，有人家裡不但擁有一架電動打字機，還有人能夠操作這架電動打字機。

我們經過一間老舊的茅屋，茅屋四面都以棕櫚墊子充作牆壁，屋外坐著一個老人。

「他是誰？」

「一位村民，」陶菲克樂見我提問，就開心地回答，「而那也是一位村民。村莊、學校，哪裡有什麼
區別。」

我說：「普拉索喬，我覺得我感冒了，我們應該準備回日惹去了。」

陶菲克並打算留我。我們朝著辦公室的方向往回走，停步在幾個擱在板條上的木箱前。

陶菲克說：「這些箱子就是我們儲存米糧的地方。村民會捐獻稻米給我們。如果他們缺米下鍋了，

我們也會回饋食米給他們。」

這就是陶菲克，自始至終，就連我們都要走人了，還是可以故弄玄虛，讓我暈頭轉向大惑不解。

我們坐回車子裡時，我跟普拉索喬說道：「我認為這是一間爛學校。何必費這麼大工夫來搞這種名
堂呢？為什麼我們不肯乾乾脆脆的蓋一所像樣的普通學校呢？學生在這種地方真能接受什麼教育嗎？還
是說他們只是在扮演村民而已？」

「你怎麼可以這麼說呢？你在那裡停留不超過十五分鐘，不可以就這麼武斷地評判一個地方。」

「我們還沒待上十五分鐘。」

「我想，你也並不了解自己看到的東西。」

「我也覺得。」

「在我們學校，沒有人會去製造床鋪，」普拉索喬說道，「我們學校的人不會去製作和銷售床鋪。那
是個新點子。」

我說道：「我以前念書的時候，學校裡也有工藝課，我們也要作木工。」

「真的？」接著他沉默不語。

我們開過一條星點散布著黑色熔岩岩屑的開掘河床，那是默拉皮火山。爆發後岩漿流經的渠道之
一。

8 默拉皮火山 (Mount Merapi)：印尼爪哇島上活動頻繁的活火山，位於日惹東北三十二公里。火山口直徑六百公尺，海拔兩
千九百公尺。一〇〇六年爆發的火山噴出物曾湮沒附近婆羅浮屠、門突、普蘭般難等古蹟。至今噴發活動依然頻繁，平均每
十年會出現一次規模較大的噴發。然而，火山灰土壤養分充足，默拉皮火山附近農業密集，因此建有嚴密監視設施，印尼政
府並興建了四十多處攔阻火山噴出物的堤壩。

我說道：「你聽說過一個英國作家，名叫查爾斯·狄更斯嗎？」問話出口，我馬上感到荒謬，車窗外，爪哇稻田連綿飛馳而去。「這樣說吧，一八三七年到一八三八年之間，查爾斯·迪更斯寫了一部小說，書名叫做《尼可拉斯·尼可畢》」，書中就描寫了像那樣一所學校。那所學校是由一個叫做史魁爾先生的人經營的。他相信學生應該從操作中學習。上植物學的課時就走出戶外，在庭園裡上課；上生物學離開教室，到外面去刷馬。」

「我聽說過查爾斯·狄更斯，可是沒看過《麥可·尼可畢》。」

「是《尼可拉斯·尼可畢》。要是我被逼一定得待在那種地方的話，我會痛不欲生的。」

「要是你離開這裡之後，寫出那樣東西的話，那就是『犯法』了。經學學校裡沒有人是被迫留下來的。」

「那不是我的意思。我是說，假如我是個小孩子，而我父母親硬要把我送到那種學校去的話，我會很生氣。」

我冒犯了他，我害他連爪哇人的傳統禮儀都顧及不了了。他對於經學學校的系統有信心，他相信這個體系可以兼容穆斯林與爪哇的系統。他從未到過帕伯倫，或許他也跟我一樣迷惘，被我們的所見所聞與陶菲克的吹噓瞎掰唬得方寸紊亂。可是，他還是尊重這個地方的令譽。

稍後，我們到了日惹附近，路旁逐漸出現大型看板，他又重新提起回到這個話題上，不過這回他就委婉多了。他說：「要你說的話，你認為教育與知識之間有什麼差別嗎？」

而就破天荒的第一遭，我思索著普拉索喬的問題，我心想，或許這也就是陶菲克一直試著要對我們灌輸的東西。

只是那並不是我喜愛參與的討論。我說：「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回答你的問題。這是個假問題。教育和知識並非總是背道而馳的。」

他假裝自己聽懂了。就在我們冒著日正當中的熾熱開進日惹——速克達與噴著廢氣的巴士、荷蘭風味的麵包店、印尼丁香香菸的廣告、架高的車座安在後方的腳踏人力車上（人力車的重量多半壓在手臂上，車夫腿上的壓力反而比較輕，人力車夫承受著駕車的壓力，不時得伸出手臂，壓低人力車車體的前半部）。當我們開進日惹市中心時，普拉索喬假裝自己還在玩味之前說的話。

可是當車子停在飯店門口時，他終於再也按捺不住了。他說道：「其實你知道的，我根本不想來擔任導遊。我把學校甩開了一個星期，就為了當你的導遊。我的老師認為跟著你跑上一個星期，對我一定很有幫助。而那也只是因為我們校長蓋了三個章。」出乎意料地，在他連聲抱怨過後，他又跟我道歉。

「我很抱歉今天早上帶你看那個蠟染廠。你沒跟我講要我帶你去看的。參觀蠟染廠害你浪費時間了。」

我握住他的手臂，這是我向他道歉的方式。而他也就讓我握住他的手臂好半晌，才打開車門。

可是，難道說，所謂村莊教育公社的理念——假如，先前我所聽聞見識的訊息無誤的話——不過是建構一個僅能操作低等技能的社區，那不也是對貧民的一種欺凌嗎？

揭開經學學校的面紗

晚間當我們同往奧馬·珈音家中聚會時，經學學校的神秘面紗就稍微揭開了一些。奧馬的父母親以

9 《尼可拉斯·尼可畢》(Nicholas Nickleby)：這本小說是狄更斯早期的作品，書中描寫了一所由威克佛德·史魁爾(Wickford Squeers)先生經營的私校，他也是個殘酷的學校教師，不但尖酸刻薄，還專門虐待學生。書中主人翁尼可拉斯·尼可畢受僱於同一所學校擔任教師，史魁爾先生的行徑令他髮指，最後終於成功地將他逐出校園。稍後，史魁爾再度出現，還想使出詭計陷害尼可拉斯·尼可畢，所幸為後者與其朋友識破。

古波斯大詩人¹⁰的名字為他命名，不過在印尼，這個名字就成了他與生俱來的名號了。他是個高頭大馬、坐四望五的迷人男性，執教於日惹一帶的大學，課餘也寫作不輟；普拉索喬對他可是敬畏有加。而奧馬與他的朋友，其中一人還在帕伯倫求學過，全都站在普拉索喬這邊，替他出聲打氣。

他們說，我誤解了帕伯倫。怎麼這麼不巧，我正好碰上安息日學生沒課的時候去參觀學校；再說，我也受到他們語焉不詳的說話方式誤導。帕伯倫裡不是沒有老師。雖然陶菲克說他們學校裡沒有教師，他的意思可能只是在說，學校裡沒有宗教老師，沒有像是烏斯塔德之類的訓導主任，過去這一類師長講的話就是法律條文啊。帕伯倫學校性質以宗教與伊斯蘭教為主，可是他們也教授其他的科目；校內有一座圖書館，也有實驗室。校方試著利用鄉村的資源，就地在村莊裡設立這樣一所學校，這種理念是純粹新穎的。

我說道：「可是，普拉索喬，難當你忘了，陶菲克跟我們說過，學校裡不但沒有老師，連任何架構也沒有。」

「說不定陶菲克知道的不是很多。我跟你說過了，你對那個地方的印象決定得太快了。你當然有武斷的自由，可是，這次你的定論下得真是太早了。」

難道我們在帕伯倫的時候，他們跟我講的話，不也是他們認為那是我想聽到的話嗎？當陶菲克跟那個村莊首領誤以為我也是個穆斯林，可能還是個阿拉伯人，他們就一個勁兒地拉攏我這個「穆斯林」。後來陶菲克換了方式估量我，他改弦易轍，滿嘴兜弄著些聽來現代化的字眼：「合作社」、「去除菁英」、「去除架構」等等。或許，陶菲克種種行徑不過是爪哇風格的禮俗——雅加達還有印尼人為文申斥咒罵這種陋規——而我不過是被這種習俗搞得一楞一楞而已。

奧馬·珈音家中聚會談話的重點多在爪哇農村方面。科學家最近研發出一種新品種稻米。新品種生長神速，可達一般品種的兩倍，一年可以兩穫。食米增產是有必要的，可是兩穫也擾亂了昔日農村的生

活節奏，阻礙了節慶與爪哇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皮影戲表演。人口過多，延伸家庭也逐漸式微，每年到了收割稻穗的時候，再也沒人會去呼朋引伴、號召親友一同幫忙，再每人分把稻穗回家以茲致謝了。普拉索喬念念不忘的爪哇農村生活，凡事儀式化的傳統生活情調，現在正逐漸瓦解當中。帕伯倫這類地方的伊斯蘭教機構，正是爪哇人面對這股趨勢的某種反彈。

再訪帕伯倫經學學校

第二天早上雖然普拉索喬緊張不安，我們還是決定再訪帕伯倫，仔細瞧瞧前一天我究竟漏失了些什麼。

首先，我漏掉了高掛在鄉村道路入口處的高聳柵門，門上一塊歡迎的招牌。二度尋訪，椰子樹與開紅花的鳳凰木，校舍屋頂上鋪著簷瓦，再度入目，印象要比前一次標緻許多。院子裡四處閒晃的學生少了，清真寺建築的迴廊上空無一人。透過辦公室後方一扇兀自開敞的大門，我看到幾個女孩在做針線活兒。她們說，她們正為迎接宗教事務部長來訪，齊力縫製一面歡迎旗幟。部長那一天就該到的。說完，她們咯咯傻笑著，幾個女孩就跑遠了。

那天早晨駐守在辦公室裡的男人，身兼秘書與校方發言人，個頭比陶菲克還要小一號，戴著一頂黑

10 奧馬·珈音 (Onar Khayyam)：波斯詩人，《魯拜集》作者，以諸如「遺身願裹葡萄葉，死化寒灰帶酒香」之佳句遺世，一〇五〇（一一二二）生前除了創作詩篇之外，奧馬·珈音（奧馬意即製作帳棚者）也是當時重要的數學家與天文學家。英國詩人兼翻譯家愛德華·費茲傑羅是第一位將奧馬·珈音的四行短詩譯介到西方世界的第一人；中譯本則以黃克孫所譯的《魯拜集》最為稱道（編按：一譯為奧馬·開儂）。

色便帽。我直覺以為，這個人跟陶菲克一樣，也打算以虛言混淆我。我們耳邊聽到有人在上阿拉伯文課，年輕的女孩吟誦著應答教師，可是辦公室裡的那個人說，這堂課還沒開始。我問道，學生是不是還在田裡忙著農務。雖說我問了個煽動性的問題，他卻義正辭嚴地回答。他說道，學生只有下午才會下田。我又問道，陶菲克在哪裡呢？

「他在洗東西。」

「洗澡嗎？」

「他在洗衣服。」

「他要洗很多衣服嗎？」

「他要洗的東西可多了。」

聽起來確實像是陶菲克樂於在經學學校裡做的事。我說道：「我想去看看陶菲克，看他怎麼洗東西的。」

我們繞過辦公室，走到後面一條巷弄。一條混凝土築成的測溝銜接到另外一棟房屋，屋後汨汨排出大量污水，流放到一條污黑、濕透的排水溝裡。

「那是什麼？」

辦公室秘書有如在應答英語字彙測驗一般說道，「一條水路渠道。運河。」

「那算是校產的一部分嗎？」

「不，那是我們一位村民所有的。」

接下來是一排混凝土建成的浴室，浴室前方橫著一排露天的盥洗台，分別以半高矮牆隔開。我在浴室與盥洗台之間的巷道上看到陶菲克，拎著一只紅色塑膠水桶。陶菲克兩頰圓鼓，始終歡愉如一。

他說道：「早上好啊。再見到你真是太好了。我就知道你一定會再回來的。可是現在我得失陪了，

因為我還有衣服要洗。」

就在浴室外面不遠處，幾個男孩正在幫別的男孩剪頭髮。其中一個男孩已經十八歲了，雙肩圍了條毛巾，正等著其他同學幫他剪頭髮。他說自己老家在蘇門答臘，他很快就要回到他的家鄉了。他說道，回到家鄉就要替村里做些好事。這話說得既正確又有禮貌，可是我想聽他講得更明確一點。他偏頭想了想兒，說道，他要回到家鄉去當老師。接著，他就不肯再多說了。

普拉索喬與我那個秘書轉了回來。我們又看到陶菲克，不過，只有他露在盥洗台矮牆上方的頭和肩膀。他穿著一件紅色的圓領衫，又對我們微笑致意，說道：「我在洗自己的衣服。」

我問辦公室秘書：「他得洗很多衣服嗎？」

秘書了解我問話中的要點，說道：「他洗的是他自己的衣服。」

我們來到方才女孩在課堂上吟誦阿拉伯文的新樓。她們頭巾緊紮，不露出一縷髮絲，頭巾包裹下，每個女孩都只剩下一張黃種人的臉龐。這節課就要下課了，授課老師正在收拾堆疊著習字簿。隔牆聽來，彷彿女孩吟誦的每一行阿拉伯文都是以阿拉開頭，可是普拉索喬說我聽錯了。

我問秘書：「昨天陶菲克跟我說，你們學校裡沒有任何一位教師。」

我們一面走著，秘書跟普拉索喬用印尼語來回交談。普拉索喬翻譯道：「陶菲克的意思是說，他是個教師，可是同時間他也跟著其他人，像是領導之類的人學習。所以說，他也是個學生。」

我們經過了那幢爪哇式的房屋，上一次他們跟我說，這是這所經學學校建校之初的第一棟校舍。房屋門上有人漆了道「古早居」(Ancient House)的字樣。竹板編排而成的牆壁，屋內空間毫無分隔，中央豎著四根木樁，頂上橫梁，架著覆蓋簷瓦的屋頂。沿牆三邊，一道連續不斷的竹製通鋪，竹鋪製作優雅，鋪邊厚實的竹材支柱，鋪面上薄薄的長條竹片，編成床鋪的使用而光滑發亮。二十二個男孩就睡在這張竹製通鋪上。竹牆上釘掛著許多五顏六色的小型碗櫥。這就是經學學校辦學的初衷：蓋一座鄉村建

築，讓鄉下孩子跟著鄉下老師學習阿拉伯文，吟誦《可蘭經》。

竹材通鋪上堆著許多寢具，可是我們發現某一具乍看像是一捲被褥的包裹，其實是個臥床休息的男孩，頭上還繫了條白布，意指他染有疾病，藉以區分。他前天就病了，今天下午醫生會過來看他。那只是小事一樁，微不足道。

我們踏出竹屋，進入「互動」的較新世界。椰子樹蔭下七八個男人，年紀參差不一，他們還在製作床鋪，有人鋸木，有人刨平。

「你們會出售這些床鋪成品嗎？昨天我是聽陶菲克這麼說的。」

「喔，這些床是不賣的。這些床鋪，學校要留下來用。我們這裡很缺床鋪。」

「那麼，你們購買這些木料的錢又從哪裡來呢？」

「那我就知道了。」

「所以說，這些人都是工人囉？你付他們工資。」

「他們都是村子裡的人，他們都是要付工錢的。」

「昨天陶菲克跟我們說，這個學校是合作社共同資助的形式。他還說，這些人是學生，也是村民，他們彼此相互學習，教學相長。」

秘書不發一言。我們看著男人們鋸木、刨光，他們就像忙碌幹活兒的工人一樣，不太注意我們。

普拉索喬想要幫忙打個圓場。他拾起一把鶴嘴鋤說道：「可是，這是經學學校裡的工具，不是嗎？」

秘書還在搜索枯腸，漫不經心地回答：「是的。」

我說道：「他們木板刨得有多平呀。」

普拉索喬說道：「你不想買一塊回家呢？」

秘書現在開口了，他說道：「陶菲克可能是說，這些人裡頭，有些人從來沒製作過床鋪。說不定，

他們是專門做椅子的。或許，他們有些人是專門蓋房子的。他們只有在這裡才能學到做床鋪的技術。這麼說的話，他們在這裡就是學生。我想，陶菲克的意思就是這樣。」

這時，普拉索喬突然斬釘截鐵地說道，好像他好不容易剛剛想通了一樣，「這裡就像個校園一樣，不過，學生在這個校園裡還要工作就是了。」

這裡確實是個校園沒錯，只是多了分農家庭院的感覺。女生宿舍（前一天，普拉索喬如何殷切盼望能夠登堂入室的悠遊所在）外面，大小坑窪積水不淺，野鴨帶著小鴨成列悠遊。我們步步為營地走過泥地，經過垃圾堆，通過那一系列盥洗台。魚塘依舊墨綠污濁，跟前天清理之前沒兩樣。昨天那架本田幫浦還兀自擱置在一旁，幫浦的水管依舊浸在池塘裡。

我們越過女生宿舍後面的矮牆，來到這塊地勢較低、也更污穢的平地上，農家庭院特有的臭氣衝鼻，只見得農村平房跟一群農村婦女，她們從滿院子的垃圾堆裡抬起頭來對著我們微笑，招呼著我們，垃圾布滿庭院，兩相對照下，她們的平房看來彷彿拔高挺出了。

「她們也是經學學校裡的人嗎？」

「她們是村子裡的人。只要她們有空，就會到學校的福利社來幫忙。」

福利社距離牛欄不遠。這個地方，到處是村民在鋤地耕作、耘草、清運雜物；背景中，另外一節阿拉伯文課堂上，吟唱朗讀的頌聲不斷。眼前這個「校園—轉—農家庭院」的綜合體，正如一處中世紀莊園農場一般，充滿生機，呈現一片農家景象。接著就像是受到我心中思維的召喚一樣，一列中世紀裝束的村民就這樣施施然而來，拖曳著偌長的雜木而去。

普拉索喬自作主張地攔住了一個男人。那個男人雙肩寬厚，肌肉糾結，已經上了點年紀。儘管他負重擔，還是不曾輕忽爪哇傳統的禮貌；而他向普拉索喬說道，是的，他很想做個學生，可是他資格不符，再說他也負擔不起一個月十塊錢美金的學費。他一天能賺上五百印尼盾，美金合計八毛錢；可是，

東家還包他伙食。

吟誦阿拉伯文的聲音，遠從校舍新樓傳來。新樓陽台上，一群東家長、西家短的女人嘻嘻哈哈地用木棉填塞床墊，揚起輕輕濛濛的一層棉絮。

普拉索喬先跟那個秘書講了一段話，稍後，他說道：「他們這裡有七十位教師。他們會保存著出缺勤紀錄，每個學生都會收到成績單。這個地方一點也沒有去架構化。」普拉索喬輕笑著，又補上一句：「這裡是『非常』有架構的。」教師都是義工。學生即將畢業離開經學學校之前，得先留校執教一年到兩年，每個月的束脩在美金八塊錢到四十塊錢之間。

如此群策群力，如此的組織，只為了複製鄉村的氣氛，教導村民如何作為村民！

我們即將回到辦公室時，又碰到了陶菲克，他衣服已經洗完了，紅色塑膠水桶和水槽都留在後邊。他換下了先前身上那件紅色的圓領衫，現在他上身一襲清新乾淨的花襯衫，配上一條淺紫丁香色的長褲，部分褲管過窄，緊緊地裹著他厚實的短短大腿。他仔細刮修過他那張圓臉。看來，他已經準備全力以赴，應付嶄新的一天；或許，連迎接宗教事務部長的大任都已經胸有成竹了。他對著我們綻開一個大笑臉。

他說道：「學校領導昨天本來想請你們在我們這裡過夜的，他親自準備了個地方讓你睡覺。可是你先走了。他本來還要請你吃中飯的。他都吩咐學生捕魚，替你準備了大餐呀。」

捕魚！我還以為那幾個男生站在髒水裡是為了清理池塘呢。而那也是陶菲克自己跟我說的。

我問道，我可不可以拿幾份曾經刊登在期刊上討論經學學校的文章？我尤其想要細讀那篇陶菲克特別提到，將經學學校視為「一個學習社區」的論文。陶菲克說，他可以幫我準備這些論文，隨就走遠了。

我們等著。

我問那個秘書說：「你想，他會給我那些論文的影印本嗎？」

「沒錯。他往影印室去了。」

影印室！這裡竟然有一台現代化的影印機，而他們還在學校裡研習著伊斯蘭教，以及如何安貧樂道，認命認分地做個鄉下人！

陶菲克回來的時候，手上不只是那幾份我討來閱讀的論文，同時還多了一紙他剛從澳大利亞收到的信箋。

我們再度步出庭院準備上車。一個衣衫襤褸的男孩走了過來，背上扛著一顆碩大的青綠果實。

我揶揄地問著陶菲克：「他也是你們的學生嗎？」

普拉索喬吃吃傻笑了起來。

陶菲克說道：「他是個村民，也是個學生。」

陶菲克微微笑笑。可是這一次，他的微笑無法再誤導我了：陶菲克可是認真的。我慶幸我們就要走了，因為不到五分鐘，陶菲克即將又鼓起他哲思高超的如簧之舌，再一次不知所云，讓我們困惑迷惘。

坐進了車子，一路開出村莊之際，我攤開那封澳大利亞來函閱讀。那封信寄出已達三週，寄件者應該還在大學裡就讀或研究。陶菲克真的看過這封信嗎？

「親愛的陶菲克，我要再次感謝你，多謝你上回費神費時地接待我。相聚的時間太短，但願我們能在信中繼續我們的對話。我一邊回想著之前造訪帕伯倫跟你所有相關人士的經過，一邊仍感到困惑無著……究竟，在你們學生畢業離校之時，你期望他們能做些什麼呢？……學生固然具備了鄉村發展的技能，可是萬一這名學生沒有土地，或是根本不擁有土地的話，他又該怎麼辦呢？而他在帕伯倫所學到的伊斯蘭教教義中，又提供了什麼樣的原則可以幫他解決這樣的困境呢？……關於印尼，伊斯蘭教又提供了什麼樣的助益呢？伊斯蘭教之於貧窮，又有什麼對策呢？」

四 豐饒女神

澳洲人的問題正好點到要害——伊斯蘭教究竟傳達了什麼樣的訊息給鄉村居民呢？

村莊公社的意義

一個星期後，我又回到了日惹，跟著奧馬·珈音下鄉，前往默拉皮火山腳下的一個村落。默拉皮火山坡面逶邐平緩，火山錐上總是漂浮一縷輕煙，偶爾錐尖也潛藏在雲霧之後。火山熔岩滋養了大地，稻田間濕潤的土壤，不論農人駕著牛犁深耕，或是擊著鶴嘴鋤翻掘，都是一片肥沃黑土，富含火山養分。泥巴築牆圍起水田，緊鄰著村莊，從空中俯瞰，農家聚落在熱帶地區的開闊平原上，綠樹掩映，幾堵紅簷屋瓦，一步跨出就是稜角分明的田壟界線。

進入像這樣子的村莊，感受到的可不只是綠樹濃蔭。走進這樣一個火山腳下的村莊，就像是走進一個經人施以魔法幻化、圓融完滿的世界，村莊裡諸事萬物——糧食、屋舍、工具、儀典、行禮，都經過許多世紀的演化，達到某種完美的境界。萬事萬物環環相扣，就像是村莊外圍的水田一樣，每一片田地雖然不過半英畝面積，卻像拼圖一般緊密湊合。

每一幢屋舍，不管是混凝土築牆，還是以竹條編排做牆，屋外一定植有高大綠樹，枝葉茂密，長年庇蔭樹下人家；每棵樹都有其特殊用途，包括木棉樹，我還是第一次看到這種樹。此外，村子裡竹材種類眾多，有些竹桿粗壯陰暗，近乎深黑，有些則莖枝細長，黃色竹枝上鬆著綠色條紋，彷彿是在筆酣墨暢之際，彩筆無心滴染所致。竹林提供了製作床鋪、竹牆、天花板、竹蓆的材料。可是，稻米依然主宰了農村生活。稻作為食米來源，也是所有勞務操作的目的；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稻米也標記了農村四季的轉換。傳統的爪哇房屋中，木柱撐起的主房後方總會闢出一間小室，過去，這間小房間裡會安上一具神龕，奉祀著女神史麗（Dewi Sri），史麗正是主司稻米收穫的女神。

奧馬帶我到萊諾斯的村莊，萊諾斯也隨行前往。萊諾斯是個年輕的日惹詩人，迄今他還是只能從朗誦自己的詩作當中換取微薄的收入。萊諾斯信奉天主教，他的全名（他也有個印尼名字，只是他棄而不用）喚做萊諾斯·奧古斯丁諾斯。萊諾斯的母親是個天主教徒，萊諾斯的父親為了迎娶他的母親才改宗。他們一家務農。萊諾斯的父親也是一村之長。自從軍政府接管之後，村長的人選改由選舉產生，村長還得負責執行政府交代下來的計畫事項，舉例來說，勒令農民改植新品種的稻米就是其中一項。村長於任期間得以耕作十二畝的田地，如此面積在爪哇中部可以稱得上田產殷實了。

村莊就在通往帕伯倫的路邊上，奧馬熟稔此地。革命期間——對荷蘭人作戰期間，荷蘭人曾經入侵日惹——革命軍遂移防潛入這些村莊。當時奧馬加入了學生軍，他們就分派住宿在村民家中。

我問道：「當時你們的組織嚴密嗎？」奧馬笑我怎麼問這種不著邊際的問題。「你以為呢？」當時全印尼顛沛流離；再者，置身如此軟調舒適的場景，再加上時局承平，委實是難以想像戰爭場面；兩軍在這般狹小而脆弱的村莊裡，這般不堪一擊、需要恁多功夫照料的水田，不知該如何廝殺搏鬥。

萊諾斯家的房子是混凝土築成，架設在低矮的木樁上，地板也是混凝土鋪就的。可是房子依舊遵循爪哇傳統模式。進入大門，二門上嵌著一幀天主教的聖畫像，牆上則掛著一具爪哇皮影戲偶，這是當地

皮影戲碼中常見的一個要角：黑色的訶里什納¹，不是印度教中頑皮靈動的訶里什納，而是爪哇的訶里什納，足智多謀，目光遠大，因此這尊偶像也適於擺置在詩人家中。書架上塞滿了萊諾斯從小上學一直念到大學讀的書，架上還有一本《T. S. 艾略特詩選》，這是英國國家廣播公司致贈的獎品；萊諾斯曾在某次英國國家廣播公司印尼支台舉辦的詩作比賽中掄獲第二獎。

主人在玻璃杯子裡斟上熱茶，蓋上錫製杯蓋，端到我們面前奉茶，一盤堆得老高、熱氣騰騰的帶軸玉米，另外還有一盤不知名的某種捲狀點心，堆得也跟玉米等高。那是印尼傳統的待客之道，歡迎嘉賓的儀式，展現出主人家餘糧充盈。來客自然也要以相當的禮儀回應。誰也不敢先行取食，或是掀蓋啜茶，結果，往往一直要到賓主盡歡、客人即將告辭之時，才得掀蓋飲茶，此時，熱茶早就都涼透了。

其中一盤茶點是由萊諾斯的小妹妹端出來的，她是個相當標緻的小女孩，年紀約莫十歲到十二歲之間，身上穿著一套連身裙。接著，房裡又走出一個年紀要比小妹妹大多了的女孩，出來探望訪客。她的面容扭曲，暴牙凸出，一席裙裝歪斜斜地披掛在身上。她的行動極不協調，穿上拖鞋的腳丫重重地拖，在光滑的混凝土地板上。她撿了個屋角，坐在椅子上，雙眼瞪著我們，一言不發；過了半晌，她站起來，又拖著腳步離去了。

過了幾分鐘後，奧馬謹慎地說道：「你可能也注意到萊諾斯那個妹妹了。她身體不太舒坦。」她年幼的時候罹患疾病，他們帶著她求醫就診，醫師的助手給她注射了錯誤的針劑，傷害到她的神經系統。原來這幢詩人的家屋、村長的住宅，還是一棟隱藏了悲劇的房舍。

萊諾斯的母親回來了，他的父親就是為了這個女人而改宗天主教，他們一家人也是因為她而成為天

1 訶里什納（Krishna）：漢譯又稱黑夫。印度教與印度神話當中，訶里什納是大神毘濕奴的第八化身，為人間掃除魔王之子。然而，近幾世紀以來，訶里什納卻轉變為一個出生在放牧聚落中，從小頑皮靈精的男孩，也是女孩愛慕的對象。

主教家庭。奧馬站了起來，卻刻意佝僂駝身，曳著步履，往側邊閃了一步。高大的奧馬企圖將自己矮化縮小到比萊諾斯嬌小的母親還要袖珍。而在我們重新坐下之前，奧馬與萊諾斯的母親寒暄問好，滔滔不絕的言語交流，有如樂音繞梁。

她身型之嬌小輕盈，正如一般印尼婦女，倘若她混跡在街頭，隱身在人潮之中，誰也不會注意到她的。現在，她抽離在印尼群眾之外，在她自己家中，作為我們的女主人，她的美麗得以散發耀眼光芒；同時，外人也可以看出她穿著之悉心打點——襯衫、腰帶、裙布（她的女兒不過穿著連身裙而已）。此外，我也可以看透她隨時可以浮現臉上的印尼式微笑（過一陣子笑僵之後，反而令人不安），看出她優雅的儀態講求，以及從這位農婦身上看出某種高度文明的體現。她臉上神情平和而開朗；她抬頭挺胸，下頰還微微上揚；她骨架亨勻，兩眼雖然深陷眼窩卻奕奕有神，雙唇弧線完美，微笑時展現出編貝般的美齒。她說話的時候不疾不徐，無恙無礙，總好像即將轉化為銀鈴笑聲一般。

她跟奧馬就這樣交談了一段時間，看起來他們有說不完的話，多少近況變化需要交代。可是，奧馬稍後告訴我，那不過是迎客儀式的一部分，他們只是行禮如儀罷了。他們講的是含蓄有禮的爪哇語言，跟一般日常生活用語是有分別的；其實，他們根本沒什麼話好講。萊諾斯的母親說道，稍早她得去她小孩的學校領孩子的成績單，所以她才沒來得及趕在我們到達之前返家，歡迎我們蒞臨。她還說，真是不好意思，在這間連房子也稱不上的陋室裡招待我們這樣的顯貴來客，這裡充其量只能算是個草寮罷了。同時間，奧馬的歉意也不遑多讓，他為我們冒昧求見而深感不安，此行說不定攪亂了她平靜和諧的家居生活。爪哇傳統禮數就是這樣你來我往的，以致歎回應致歉。

即使如此，兩人客套應答之間，還是講到了些具體的事情。又過了一會兒，我們離開萊諾斯家，漫步穿過村莊時，奧馬還是提了起來。萊諾斯的母親擔心兒子的前途。萊諾斯不是經常回到家鄉來省親的，他自己在日惹租了個小房子住；他也不結婚；還有，他也不找工作。而她的擔憂並不是庸人自擾，

奧馬說：畢竟，萊諾斯都二十八歲了。

我對萊諾斯說道：「可是私底下，難道她不為你這個詩人兒子而自豪嗎？」

萊諾斯用英語說道：「她連當個詩人是怎麼回事都不曉得呢。」

奧馬說道：「萊諾斯只能以一種方式讓他母親明白。也就是明說，或是向他母親暗示，萊諾斯是那種古典傳統的詩人。可是那樣是說不通的。她絕對不會相信，而且她認為那是絕對不可能的。」

像萊諾斯母親這樣子的人，活在某種締造過輝煌成就的文明中，詩，早就經過大師寫成，藏諸風雨名山，千古傳頌，不需要現代人來狗尾續貂。

可是，萊諾斯即將有所突破。日惹有一家報紙請他代為製作與編輯一張文化版面，每個月給薪二十五塊錢美金。從老家到日惹不過一段短短的巴士車程，可是相形之下，萊諾斯戮力在日惹為自己經營的生活——詩歌朗讀、編輯報紙，卻與這個哇田緊致、稻米所創造的村莊，恍如隔世。

綠蔭深處，鄉村道路迂迴蜿蜒。路面是黑色的熔岩風化土壤，卻清掃得一塵不染。溝渠裡，流水盈溢，湍急奔騰——缺水灌溉，就不可能結出稻實。村子裡的清真寺不過是一幢架在木樁上的簡樸小屋，頂上不但沒有圓形屋頂，連造型特殊的屋頂也付之闕如。伊斯蘭教並不是以泱泱大國文明之尊來到爪哇的；伊斯蘭教只是種信仰，或曰只是陪襯古老宗教的信仰而已，後起進入的宗教也只能就地取材，接收古老宗教使用過的素材。清真寺門戶洞開，寺中幾張竹蓆，此外別無他物。幾步之遠，沿著黑色泥土巷道拐個彎，就是一座天主教教堂，正如清真寺一般，教堂也只是間樸實無華的小屋，可是教堂除了屋頂上嵌了個十字架外，門前一道混凝土階梯上還架著鑄鐵欄杆撐起的柱廊。

清真寺開敞著大門，正如清真寺之所當然；教堂卻大門深鎖，其實也鎖不住什麼。萊諾斯從朱槿花灌叢中，順手折了一小段枝子，將枝子推進鎖眼裡，喀拉一轉。教堂裡頭跟清真寺同樣空洞，一尊嵌著耶穌受難像的十字架，牆上高掛著三幅加了框的苦路祈禱像。相框玻璃陳舊發黃，塵埃蛛網交纏，苦路

祈禱像已然褪色，其中兩幅還從定位上滑落。牆端頂上緊挨在屋簷下的鐵絲網，多處已經扯散鬆脫了。基督教在伊斯蘭教進入印尼之後接踵而至。基督教是殖民勢力所信奉的宗教，可是就像伊斯蘭教一樣，基督教進入鄉村地區，不過也只是陪襯古老的宗教而已。荷蘭人殖民期間，伊斯蘭教作為黎民百姓較為正式的信仰，可以讓印尼人抬頭挺胸，與荷蘭人分庭抗禮。再走不遠——村莊腹地狹小，步道短促，卻像是走過爪哇歷史一樣——可以看到一棟房屋，門前高舉著一幅看板，自言為「穆罕默德雅」辦事處。那是個萌生於荷蘭殖民期間，標榜著改革、宣揚民族主義的印尼穆斯林運動，時至今日，這個團體已經被譏諷為「保守」了。

小村莊，短步徑；現在在這個屋舍不耐久、行將頹圯的村子裡，諸多世紀又將追加到歷史之上。我們走過村莊，來到穆斯林庫姆（Koum）的家門前。奧馬·伽音將庫姆意譯為「長老」，還跟我大略說明庫姆的職責所在。穆斯林人家每逢重要場合，比方說，孩子出世、家人葬禮、週年紀念，抑或是那家人只是想辦個宗教典禮，就會請他來家出訪，而他就應邀舉行薩拉馬騰（salamatan）的儀式。這個儀式就是要先替人家家裡的菜餚祝聖，再將經過祝聖的餐點分給鄰居享用。我的印度童年回憶直覺反應到，這是賡續了印度教傳統的儀式，而我心想，所謂穆斯林庫姆，或許是印度教教士的某種繼承人。

出人意表的是，他竟然住在村子底的一間棚舍裡，旁邊緊鄰著水田，他自家房子毀爛傾圮，內室漆黑，前廊堆滿垃圾，竹牆鬆垮下垂，粉刷過的牆壁雖然跟黑土地面還有一段距離，卻已經發黑腐朽。

他沒有請我們進去，而是出來迎接我們。綠樹庇蔭下，他孤身站在黑土潮濕的前院中。他穿著短褲，身上一件圓領衫。無人費神向我們引介他的太太，她也站在前廊上，兀自觀望著。他樣子看來比較像個農夫、貧農，而不像個教士。然而，等到我們再進一步了解他的職責內容之後，更意外發現，原來他除了負責祝聖之外，還要清洗穆斯林死者的屍體，加以妥善包裹，以便下葬。他一人身兼穆斯林的庫姆與印度種姓制度中的賤民。這個掌控儀典進行的人以這般異於尋常的方式，具體實踐了印度種姓制度得上許多用場。

保存下來的遺緒。

他六十有四，矮小，肌肉雄壯，依舊魁梧，映著陽光，他的棕色皮膚閃閃發光，只有膝蓋周圍鬆垮皮層略顯示他的年紀，不過他的面容卻無限滄桑。他顴骨凸出，有如淺灘暗礁；蒼白的額頭與平扁的頭髮，可以想見他在日頭下勞動時，必然經常戴著一頂沉重的遮陽斗笠。

現在，他口角春風地跟奧馬講著他洗斂屍體的工作，他語氣之快活開心，彷彿隨時可以開懷爆笑一樣。他的職責並未使他意氣消沉。他繼承他的父親擔任庫姆的工作，同時也繼承一英畝的田地。這也說明了他的體格狀況是長年下田勞動所致。他做得不錯，他覺得自己是個成功人士，生活寬裕，自己又派得上許多用場。

難道說，他這一生毫無遺憾嗎？這個國家也是風調雨順、萬事興隆嗎？

他似乎就要爆出狂笑。風調雨順？現在時局是越來越順暢了，日子從來沒這麼好過過，他真是活在太平盛世啊。那麼，過去有什麼令他遺憾的事情嗎？荷蘭人來過我們這裡；而在他二十六歲的時候，日本人占領了爪哇。

那個時候又是什麼光景呢？他跟日本人還處得來嗎？

他說話又像在大笑一般地回應。那可是段要命的時候啊，他說，什麼都短缺，他們沒有衣服穿，只好將麻布袋改作長褲。日本人走了以後，革命就來了，打仗阻擋荷蘭人。荷蘭人進攻日惹以後，就經常搜索咱們村子；他常常得開溜出門，躲避荷蘭人。不，那段日子挺好過的。

這麼蘇卡諾又怎麼樣呢？難道他不是率領印尼人對抗荷蘭人的領袖嗎？

而那老人家的回答，這個站立在棚舍旁邊的赤腳農夫，他的回應叫人驚愕。他神情和緩、語音輕柔了起來，說道：「啊，蘇卡諾好英俊哪。他講話好動人哪。」

奧馬代為翻譯後，補充解釋道：「在我們這裡，容貌俊美是很重要的。人一定要長得好看才能當領

袖。不過，我想這在其他地方也是一樣的。」

儘管如此，即使在講究儀典與禮俗的爪哇，還是非常奇怪：姿容俊美和口才便給竟然就可以領導殖民地人民浴血奮戰！難道蘇卡諾早期生涯，也就是在一九三〇年間，沒有其他脫穎而出的過人之處嗎？

「請你問他，他是什麼時候第一次聽說有蘇卡諾這個人的？」

老人回答了，奧馬哈哈大笑。「他說，一九四五年。我得老實說，這倒挺新鮮的。」

我說道：「我還以為可以聽他講些蘇卡諾年輕時，也就是在一九三〇年代間的事蹟呢。」

「我倒不作如是想。三〇年代之間，蘇卡諾大部分時間都放逐在國外。當時媒體報導的篇幅不如現在。再說，新聞媒體也都被荷蘭人把持住了。我原本以為他會說他第一次聽說蘇卡諾這個人是在日本占領期間，蘇卡諾還是日本人從國外找了回來的。」

所以，這老人家一直要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印尼宣布獨立之後，才知道蘇卡諾這號人物的。蘇卡諾驟然現身，躍登領袖大位，他不但能夠率領軍隊衝鋒陷陣，還唇紅齒白，相貌堂堂，口若懸河，值得人民追隨。

院子一端，兩頭白色母牛靜靜地吃著切得整齊齊的牧草，牛頸上繫著鈴鐺，伴隨著老人眉飛色舞的談話，叮噠作響。他日子過得倒吃甘蔗，越來越順心，再怎麼說，都比當年日軍占領期間他所能夢寐以求的要好，當時日子何等艱苦，他連印尼國內有位英俊的領袖存在都不知道。

可是，既然他現在日子舒坦，耕著一畝地（這可是塊不小的田產）還擔任庫姆，他又是為了什麼非要屈就在這樣破爛的小屋裡呢？

奧馬與萊諾斯交談了半晌，稍後，奧馬跟我說道：「這應該是牽涉到個人生活方式不同的問題。」接著，奧馬就對老人提出問題，那老人回答道：「這是伊斯蘭教的生活方式。」

他說道，這種生活方式現在已經沒幾個信徒確實遵守了。而今，只有三分之一的穆斯林還算得上是

穆斯林，只有三分之一的穆斯林還曉得要上清真寺禮拜。可是，現在的年輕人也跟以前不一樣了。怎麼說呢？那是因為政府辦的學校裡，他們傳授宗教就像在教導某個科目一樣，年輕人想要拿到好成績的話，就得認真學習伊斯蘭教。

他跟奧馬又叨叨絮絮地談了一陣子。體裁纖細、踩著長腿的爪哇公雞漫步在庭院濕土上；母牛脖子上的鈴鐺錚錚鏗鏘；老人的太太待在堆棧著廢物的前廊，直望著我們，面帶微笑。

奧馬說道：「我剛剛問了他關於哇揚（wayang）的事情。」哇揚就是爪哇的皮影戲表演。「我問他，作為一個虔誠的穆斯林，他會不會排斥印度教裡的故事呢。他說，不會呀，那不過就是傳說故事罷了。」

我們循著原路回到萊諾斯家中。奉茶更加殷切，萊諾斯家人端上更多熱氣騰騰的玉米，還有一盤以各式水果曬乾切片炒成的滾燙薄片。我們告辭時，萊諾斯的母親一路同行，送我們出門。前院裡攤著一張蓆子，曬著包裹外葉的玉米穗軸。穗軸待價而沽，被收購之後就會拿來榨油；這裡諸事萬物都有其用途。這一次我還在路邊的一個小棚子裡晃了一圈，那是萊諾斯家經營的商店；萊諾斯的家人務農之外，還經商。

奧馬想要帶我參觀傳統的爪哇房舍。萊諾斯知道哪裡找到這樣的房子。這棟傳統房舍花徑不掃，蓬門蕪亂，可是就在我們四下探望之時，房屋的女主人對著我們微笑示意，還比個手勢，告訴我們豐饒女神的神龕應該是在哪裡。而我感覺到，在我們結束這次不請自來的叨擾正要告退之時，奧馬特別恭敬地矮身鞠躬退出，側身曳足離去的時間也刻意延長。如此古典而過時的優雅有禮。幾分鐘路程之外，平常的主要道路上，速客達摩托車正呼嘯而去。

儘管大路就在旁邊，我們還是引發一陣騷擾。鄰近孩童都跑出來一探究竟。每個小妹妹都背著一個娃娃，只不過這是活生生的娃娃；每個小妹妹腰上都背了個小弟弟或是更小的妹妹。

這裡離日惹不過半小時車程，可是並非每個村民都可以像萊諾斯一樣，完成他離開村莊、進入城鎮的旅程。萊諾斯之幸運易於常人。他是個詩人；他知道自己是什麼樣的人；他可以將自己抽離在社群之外。然而，萊諾斯也是個例外，大多數村民不能取法他的途徑。他們的思想行為完全受制於村莊，村莊生活塑造了他們。他們需要大家庭所給予的安全感，不論村中如何封建，不管夜間輪值守夜或是耕種公田的義務有多繁重，他們需要置身於村莊公社的安全感。對這樣的人來說，村莊確實是一個施點過魔法的幻境，難以跳脫逃離。倘若有人只是因為村子裡沒有足夠的田地供他耕作而被迫離開村莊，他就會在工廠裡或是辦公室中尋找一個大家庭，就像又回到了他的家鄉，即使在雅加達也一樣。

哇揚皮影戲

就像基督教一樣，伊斯蘭教陪襯了印尼原有的古老宗教。村莊裡信奉的宗教其實是種複合性的宗教；所謂優質生活的理念，其實是個複合性的理念。印尼人民的生活真是包羅萬象：有清真寺、有教堂、還有訶里什納及豐饒女神、保留了一點印度種姓制度的遺跡、佛教徒涅槃的概念也可以跟穆斯林的天堂理念並行不悖。奧馬說道，誰也不能斬釘截鐵地準確說出自己的宗教傾向。他們會說：「我是個穆斯林，可是——」抑或是說：「我是個基督徒，不過——」

而奧馬也講了一個發生在普蘭般難附近村莊的故事。一九六五年間，軍事政府接管之後，當局忌憚著蘇卡諾晚期甚囂塵上的共產主義風潮，要求每個印尼國民都向有關單位正式申報自己的宗教隸屬。普蘭般難一帶的民眾就紛紛陷入進退兩難的困境中。某個層面說來，他們是道道地地的穆斯林，信仰先知和他的天堂；可是他們又覺得自稱為穆斯林似乎有失妥當，伊斯蘭教裡有諸多清規戒律，是他們從來不曾遵行的。他們知道，第九世紀時，他們的先人建造了宏偉的印度教寺廟，世界各地都有人慕名前來參

觀普蘭般難；而且，就算他們不再能夠完全體會這座廟宇的重要意義，他們還是明瞭，這是一座印度教的名剎。他們樂於觀賞改編自《羅摩衍那》與《摩訶婆羅多》的皮影戲，他們也知道這兩部史詩都是印度教的產物，因此，普蘭般難地區居民覺得自己應當申報為印度教民。

麻煩就出在，他們不曉得假如他們申報為印度教民的話，日常舉措又該如何更易呢？社區裡沒有印度教教士，祭奠節慶又該如何進行，大家也毫無頭緒。他們請來了峇里島的印度教教士，峇里島的印度教教士就帶了一團甘美朗樂團，來從旁指導他們。可是這樣還是徒勞無功。過去是無法重建的，古老的祭典與神學觀念，失落了就不再也無法追回。於是，普蘭般難的民眾就退回原點，將就現況，認分地信奉著複合式的宗教。

星期四下午，黃昏近晚，普拉索喬所謂爪哇一天當中最美好的光景，一名婦女坐在她開在日惹一條大街上的小店外邊，拿著芭蕉葉編製小型的香囊，香囊裡填塞著玫瑰花瓣、茉莉花，還有香水樹花香甜蜜的綠色花朵。她身懷六甲，而她坐著的時候，卻將兩條腿分得老開。芭蕉葉片疊在一隻籃子裡，其他香料花材、花瓣及花朵就分別裝盛在小碟子上。她編起香囊來手指俐落得很，她抽起兩片長條芭蕉葉，用一條椰子樹葉的粗葉脈將兩片葉片縫在一起，形成一小袋子，再將紅白花瓣扔進小口袋裡，加進茉莉，有時還從瓶子裡滴進幾滴香精，最後再將小袋子袋口縫合起來。偶爾她也應顧客要求，額外抹上一撇黃色的糊狀物，或是一小截棕色的枝子。等在一旁取件的顧客都是年輕女孩和女人。每個香囊要價不過十五印尼盾，還不到美金三分錢。香囊代表花朵，是要祭獻給往生者的靈魂的；香囊可以置於屋中一

2 甘美朗樂團 (Gamelan)：甘美朗是東南亞鑼群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樂團，由大小不同等的掛鑼、座鑼和成排的銅鑼敲擊樂器所組成的樂團，以鼓領導，有時也加入弦樂、直笛與聲樂等。印尼各地甘美朗樂團的組織及風格至少有十六種之多，但以中爪哇、西爪哇（巽他）和峇里島的三天甘美朗文化最為著名，其樂風懸殊各有千秋。

角，也可以供奉在墓園裡。客人一定要趕在星期四下午購買香囊，因為星期五穆斯林的安息日，已經成為祭拜長眠者的日子了。

奧馬·珈音家對面就是一處華人墓園。墓園開放，環境清幽，可是他有些親戚就是不肯來他家走動。他開導他們說道，華人勤儉有成，華人墓園裡的先靈應該也是與人為善的神鬼。可是有些人就是聽不進去。

如此宗教，一端為體現無拘無束的敬畏的宗教，另外一端則為內涵著異乎尋常的精緻教養的宗教。有人與逝世先人的幢幢鬼影如此親近，他們也掌握了永生不滅的史詩，並將史詩轉化為道德訓示。印度教深奧的神學與複雜的儀典無法重新奠基，可是，印度教的遺澤卻蘊育了爪哇文化當中最富有人性與文學成就的一環：印度教的史詩《羅摩衍那》與《摩訶婆羅多》就活在皮影戲「哇揚」之中。

《摩訶婆羅多》篇幅較長，是皮影戲師傅的「重」頭戲，師傅一人得操作所有的角色，為每個角色發音。《羅摩衍那》演出機會就比較頻繁，而在爪哇中部，不論大街小巷，都可以看到《羅摩衍那》的字樣——巴士車尾、商店招牌。《羅摩衍那》的故事，經過數個世紀不斷加強整理，已經融入共同的想法之中了，劇中角色集神性與人性於一身。甚至連喜來登飯店對面，專門為觀光客演出的精簡版節目單上，劇中人物都改稱為R·羅摩、R·拉摩那、R·哈紐曼等等——R·意指「拉丹」，也就是貴族，正如某些爪哇居民還是喜歡如此自我標榜一樣。因此，白色的屏幕上，映現著古典而雅致的戲偶，不但銜接了觀眾與往日的英雄事蹟，同時也跟現代事務維持聯繫。

《羅摩衍那》的故事不只是故事。這些故事並不平板，相反的，有些《羅摩衍那》提供了模稜兩可的曖昧事例。《哇揚中的人性角色》一書，集結了大師級作者穆麗優諾發表在報刊雜誌上的專文，穆麗優諾本身也是皮影戲師傅，他在書中引述了一小段《羅摩衍那》的故事。統馭阿藍迦（Alengka，即今斯里蘭卡）的拉摩那王誘拐了孟利亞灣（Mangliawan）國羅摩王美麗的王妃悉多。羅摩王攻進阿藍迦，

解救他的妻子。拉摩那王最年幼的弟弟維比薩納痛斥兄長，責備他不該誘拐美麗的悉多，籲請他釋放悉多，讓她回到王夫的身邊。拉摩那不予理會，維比薩納就加入了羅摩的大軍。維比薩納這樣遵從他自認為正當的理由行事對嗎？抑或，維比薩納其實背叛了拉摩那王？抑或，在這種情況下，他一定非要有所行動不可嗎？難道他不能置身事外嗎？

進攻軍逐漸勝券在握。拉摩那王無計可施之下，轉向他另外一位兄弟昆拔坎納求援。他對昆拔坎納說道：「你是我最後的希望了。我的將軍都陣亡了，我們的國家也毀了。你一定要幫我的忙。」昆拔坎納回道：「趁你時間還來得及，放了悉多，讓她回到她丈夫身邊。」拉摩那王拒絕了，他告訴昆拔坎納：「你的兒子被入侵者殺死了。」昆拔坎納一陣狂怒當中，披掛上陣，跟入侵者廝殺搏鬥，結果慘烈地犧牲了。他又是為了哪樁呢？

這位優秀的皮影戲師傅，不論他如何詮釋史詩中的故事，從政治的角度抑或當作神話解讀，書中提問從未拍板定案。台下每一位看戲的觀眾都可以基於個人的性格或是背景條件，產生不同的反應。而這個史詩故事還要比表相上來得深沉許多，因為每個角色，即使邪惡如拉摩那，抑或美麗如悉多，都無法擺脫其出身家系與進退維谷的困境。每個角色都耽溺在自己的徬徨當中，出現在故事情節中時，也正是他身陷危機之際。因此，《羅摩衍那》不愧為歷史上最深刻的戲劇或虛構文學作品，登場人物每一次交逢，必然都寓意無窮。這部史詩永遠沒有終結的一刻。皮影戲可以不斷重複戲碼演出，因為觀眾越是熟諳情節發展，越能體會劇中深義；而關於動機的詮釋，是非權宜的判別，更是時時變遷，從無定論。

解脫之道只有止於至善，涅槃登達極樂世界；然而，登達極樂只能靠著感官的征服，這是條充滿陷阱的漫漫長路。而伊斯蘭教義中的天堂，正巧符合佛教——印度教所讚頌的迷夢，除卻塵世一切枷鎖與煩勞。伊斯蘭教中，全知全能的真主，融入神秘的印度教中昆濕奴（Visnu）的觀念，正如大師穆麗優諾所稱，昆濕奴是「真理……現實，萬事萬物的生命血脈之源頭」。

伊斯蘭教黑白分明的道德觀，屢屢翻遍《可蘭經》，或是在先知行誼之中尋求解答，這種道德觀進入皮影戲中，也只能退位默存。印度教與佛教的玄奧複雜性也減低了。似乎在世界的遠端，爪哇人自由擷取了各種宗教當中最符合人性的要素，卻掙脫了宗教的束縛，衍申出他們自家版本的名門大教。奧馬·珈音曾說，哇揚是爪哇宗教與文明的核心。皮影戲闡述了儀典、禮俗，以及千古以來人類行為永遠專注熱中之所在。

然而，爪哇人對於美好事物與正確行為的關切，也有另外一個層面。一九六五年，蘇卡諾與他的共產黨政府遭到罷黜之後，印尼全境估計有五十萬到一百萬民眾慘遭屠戮。方其時，所有受阻於過度精緻的挫折感都出籠了，私人之間睚眦必報，不論是如何雞毛蒜皮的過節亦然。當今觀光客最愛慕名前往的峇里島，島民信奉著印度教，然而島上殺戮之凶殘，絕不亞於印尼國內其他地方。只是峇里島民為了在屠殺行凶之際也沾染一點儀式的氣氛，村中暴徒出門殺戮之時，還會帶著甘美朗樂團隨行演奏。

無法解決問題的伊斯蘭教

伊斯蘭教也是這種複合式宗教的一環。而那位澳大利亞學院人士在致陶菲克的信中所提出的問題，仍然亟待解答。這些積極推展新伊斯蘭教的宣教士，經學學校的伊斯蘭教，究竟能為印尼鄉村帶來些什麼呢？至於那些只有表面上看來幻化如人間仙境，內部已經失去平衡的村莊，新伊斯蘭教在田地租放方面又有什麼新見解？他們又能以什麼樣的新論點交鋒激盪，來挽救村莊的命運呢？

印尼人口眾多，食指繁浩，可是，政府的家庭計畫部門嚴重威脅到傳統的大家庭體系，以及大家庭所賦予的保護。印尼需要更多糧食供給，但一年可以兩穫的新品種稻米卻擾亂了農村生活舊有的規律節奏，干涉了節慶的進行，剝奪了農民欣賞皮影戲的閒暇，因此也動搖了古老文明的根本，瓦解了人與人之間的聯繫。農民負債累累。為了一年兩穫，他們得跟銀行貸款購買肥料與種籽。銀行將業務範圍擴及鄉間，原意是為了協助農民，可是跟銀行借錢有別於向村子裡的錢莊老闆借錢，村子裡每個人都認識錢莊老闆。向銀行借錢，農民一瞬間就淪為傀儡戲偶，遭受不具人性的機構操控、荼害。

萊諾斯村子裡的庫姆說道，現在的年輕人在學校裡也要上伊斯蘭教的課，因此，他們對這種信仰的興趣也增加了。但這位庫姆的伊斯蘭教是屬於村莊的舊式伊斯蘭教，而這位庫姆，一方面替民眾主持宗教儀式，收取費用，一方面耕作者家傳的一畝田，充分了解近代這段歷史，覺得自己眼前的日子悠哉愉快，夫復何求。可是，現在有很多人渾然無知於日本人或是荷蘭人殖民印尼的歷史，許多人在村子裡已經找不到容身之處了，這些人被迫離開或是背棄他們唯一僅知的生活方式。他們的生活困頓，此時對他們宣教發聲的伊斯蘭教，可不是這位庫姆的伊斯蘭教，而是將他們自覺遭到虧待的滿懷委屈充分合理化的伊斯蘭教。

我在帕伯倫拿到一篇文章的影印本，文章摘自某份不知名的雜誌。那是一篇由某個「基督徒外行人」專訪一位穆斯林奇亞，或說，經學學校的領導。「你問我，當今農民的生計如何，以及身為奇亞，應當如何改造這個不公不義的社會呢？當今農民並未獲得公平正義。許多農民沒有農地，以至於貧無立錐。現在，沒有工作的農民要比以前多。地主的農場不再僱用農民，改以機械操作。農民只能以低微的價錢出售農產品。同時，我們社會裡的有錢人富者益富，他們從非常富有的國家借給我們的貸款中上下其手，汲取了他們的財富，中飽私囊。現在，一位奇亞該做些什麼來扭轉這種社會呢？他怎能迫使地主與富人交出他們的不義之財呢？根據伊斯蘭教義，這些家產應當歸屬於阿拉，一定要歸還給一般莘莘大眾，屬於阿拉的子民。」

可是，誰是阿拉的子民，誰又不是呢？而在人口過盛的爪哇，又要上哪兒去找出閒置的土地來歸還呢？爪哇可不是馬來西亞。萊諾斯村中大部分的村民，每家只能耕種半英畝的田地。這些人算得上富有

嗎？那個庫姆，耕種一英畝田地，自覺日子優渥好過，他又該歸還多少土地呢？

這一波即將下鄉推廣的伊斯蘭教——塗抹著轉借而來的新理念，控訴機械化之邪惡與國際援助之濫用——也是在二十世紀末葉重新發掘了政治根源的伊斯蘭教。先知奠定了一個國家，人民因為他而獲致平等與團結的理念。建國伊始，改朝換代之際，剪不斷理還亂的紛爭，已經融入這個宗教的神學之中；因此，這個以朝拜儀式與典禮排滿信徒生活的宗教，鼓吹著隔世來生，同時又賦予穆斯林獨具慧眼，大力批判俗世的不公不義，並且將之納入教義的一部分。

二十世紀末葉的伊斯蘭教，表面上揭發了某些政治議題；然而，伊斯蘭教從崛起迄今，卻一直未能除去的陳疴，也長存在伊斯蘭教的發展歷史之中：這個宗教提出政治方面的議題，卻無法提出政治上或是實際上的解決對策。伊斯蘭教只能提供信仰。伊斯蘭教只能拱出先知，先知可以擺平一切，可是，先知已經不在人世了。這種披上政治外衣的伊斯蘭教，只有激狂怒火與無政府狀態。

突然間，日惹湧進了大量的觀光客，來自日本、德國、台灣與澳大利亞的觀光團客，喜來登飯店也隨之爆滿。他們來到日惹要看些什麼？澳洲人想做什麼？他們又要上哪兒去參觀呢？我在婆羅浮屠與普蘭般難見到的遊客，泰半是印尼人，零星點綴著幾個德國人。每天早上，喜來登飯店大廳都有一團甘美朗樂團演奏一個半小時，下午再表演一個半小時；可是大廳裡人來人往，似乎無人側耳聆聽。飯店七樓的餐館裡，每天晚上都有一個小時高格調的爪哇傳統舞蹈演出；只是餐廳門可羅雀，往往無人用餐，桌桌閒置。其實，日惹不過是旅途上一個休憩據點，路過投宿而已。觀光客主要的目標是峇里島，峇里島迷人的號召——峇里島耶誕假期。

我替澳洲人納悶著。不過，我也確實知道某個澳洲人來到日惹所為何事。他針對爪哇燒製木炭的專業民眾，撰寫一篇學術論文。研究發現，隨著爪哇地區森林不斷砍伐，那些人已經瀕臨絕跡邊緣；此外，有人住在雅加達，卻堅稱他們也是出身燒製木炭的人家，雖說他們平常販售番茄、替人修補鞋子，或是充作流動攤販，沿街叫賣餐點。如此奇特的行為，我也從一位漂亮的女社會學家那裡聽說過，她在某個爪哇村落探勘進行田野調查時，感染了傷寒。當時我心想，這個題目做到這裡就算是研究到底了。可是我在日惹遇到的這位澳洲人，已經花了兩個月的時間，專注在燒炭人這個題目上。兩個月的時間！他笑我大驚小怪。兩個月算什麼！學術論文少不得要訪談、問卷調查與繪製圖表。學院生涯表面上看來悠閒，底子裡的要求可嚴格了。

我在即將離開日惹的前一天晚上，接到了他的電話。他說，他下午確實在街上看到一個人背上扛著一簍木柴，他本想追上那個扛著木頭過街的人，請他接受訪問。那人顯然是個燒木炭的人，準備扛著木柴回家燒製。可是，他還是打消此念頭了。當時他跟他的爪哇朋友在一起，那正是一天下來最美好的時光；他就這樣白白流失機會，他就這樣眼睜睜地看著他罕見的研究題材——誰知道，說不定那正是中爪哇最後一名燒製木炭人——暮色中，扛著背上那簍木柴，漸行漸遠，消失在日惹公車與速克達機車的黑色廢氣中。

可是，那個澳洲人早有安排。他在日惹租了個地方安身，我卻無枝可棲。耶誕夜裡，喜來登飯店將我請了出去，我只有回轉雅加達，再次住進婆羅浮屠國際大飯店。由是，我無緣一窺日惹的皇家宮殿，日惹的佛教壇場也無法探訪；壇場的九道門徑代表了人體的九個穴竅；道場象徵許多事物，林木也寓意無窮；爪哇王室揉雜了印度教—佛教—穆斯林，集三大懸秘於一身，適足以匹配獨一無二的文明奇觀。

五 人格之斷喪

耶誕節期間，婆羅浮屠洲際飯店的調性也變了。跨國公司人員、外籍經濟學家與顧問都走了。他們有很多人都是單身的中年男性，有些人回家，有些則赴山居避暑或是前往離島度假。洲際飯店為當地人推出假日住宿優惠的減價方案，當地人就攜家帶眷地來了；這在地方的富裕人家當中，是種經過公開認可的度假方式。

孩童在鋪有地毯的走廊上奔跑，百玩不厭地搭乘電梯上下。家裡的奶媽，或是「阿姨」，有些還打著赤腳，搖動逗弄著懷裡的嬰孩。飯店裡一戶華人也來此度假，卻毫無紓解放鬆的享樂，一家人一整個早上都沉靜無語地坐在十五樓電梯出口旁邊的皮沙發上。他們的一家之主是個上了年紀的老人，飽經風霜的面容，穿著一件汗衫，沒搭上襯衫。從十五樓高處往下看，游泳池中戲水的人們，襯托在洲際飯店漣漪圖案背景上，各個黑髮人頭都極為突兀地放大了，我不禁聯想起（另外一方面也是因為人數甚眾之故）蝌蚪。有一天早上我算了一遍，游泳池裡總共有六十三人。

單純的歡愉；可是，這些有錢人正在滋養憎恨。憎恨華人，憎恨外國人，憎恨這些擁有印尼人所缺乏的高等技術的人。或許，這些技術本身也是他們憎恨的對象，以及技術精進所引進的新秩序，至今還沒有人能完全接受這些新秩序：新人、新狀態、新的權力、新的金錢。不該有錢的人發財了；不該平步

青雲的人，竟然能替他們自己營造出封建領主的氣氛；不該踏入洲際飯店的人，竟然在這裡昂首闊步、活蹦亂跳，展現出這個社會的另外一面。

當我在飯店販賣部為假日選購一瓶葡萄牙原產的葡萄酒時，店裡的女孩跟我說：「對你來講很便宜。」接著，「可是，我們可不覺得便宜。」然後，她咧嘴給我個大笑臉，卻不是她慣常的微笑，不是我習於熟稔的微笑，她的笑容令我感到颯颯寒意。

此地瀰漫著委屈不平的憤慨。十五年來承平局面的建設成果都可以一筆勾消。國家益加富足，國家越上軌道，印尼富於創造力的一面就越容易被視為理所當然，越容易顯示社會階級之間新近萌發的差距與不平等。百姓之間，有人緬懷起一九四五年，當年大家都一樣貧窮，對於是非黑白的看法率皆一致。不只都會中，村鎮裡也一樣，任何改善舉措都令事態益發艱難，人民更加惶恐，無所依從。

人格斲喪的社會菁英

「人格之斲喪。」對於是非善惡不再存有共同的感受：這就是達爾瑪——薩斯楚的主題。

達爾瑪——薩斯楚位高權重，是印尼政府某個掌管科技發展的新部門裡的頭號人物。人家向我描述他的時候，說他屬於足智聰穎的印尼新人類。某天近晚結束公務時間之後，他在他的辦公室裡接見了我。他年紀坐三望四，抑或四十出頭。他咬著用玉米穗軸做的美國菸斗，抽著芬芳撲鼻的荷蘭菸草；在印尼，如此姿態為他營造了某種尊貴的氣質。他不算是個英俊的人，可是他怒而威，儀表堂堂。他跟印尼高層的貴族人士有所關聯。他提到這一點只為了低調帶過而已，可是無庸置疑地，就是因為這層關聯，他才能超然抽離於新菁英階級——正如他所說的「最多一萬人，不會超過這個範圍」——之外，只是，他現在也是這個菁英階級的一員。

達爾瑪——薩斯楚說道：「我們當中，有些人已經失落了他們的人格或是他們的認同，他們不再屬於村莊。他們已經太過富裕，或是地位太過重要。對他們來說，返村下鄉就是頹廢退化，他們已經失去了村莊裡人與人互助合作所提供的安全感了。同時，他們又不是西方概念中的獨立個體，他們無法獨立自主地站在平等的基礎上跟其他個體互動。」

「他們有些人也曾經出過國，可是許多都是人在國外，心卻留在國內。你怎麼認出這些人呢？」這就是達爾瑪——薩斯楚講話的方式，自個兒提問，自己回答，「他們總是跟自己人聚在一塊兒，他們總是吃著同樣的食物。他們不會跟西方人攪和在一起，甚至連西方報紙都不訂。我認識幾個印尼人，他們在美國待了三年，從來沒看過美國報紙。那麼他們看些什麼呢？他們光看電視。他們盡量避免跟西方接觸，他們就想要這樣子。他們一出印尼大門就手足無措。他們始終還是鄉下人。他們待在西方只是為了拿個學位捧回印尼，帶著可以歸屬的尊榮回國。」

「可是，他們還是無法躋身貴族之列。他們缺乏隨著地位身價走高、個人應該對社會更進一分綿薄的封建價值觀。所以，他們倚恃著新近獲取的尊貴優勢，一心只想攬權搞錢。這就是印尼社會之痛。過去，權貴人士對社會有種責任感。假如你身為貴族，你應該要以身作則。我現在講的這些人，他們已經失去仲裁社會是非的功能了，因為他們自己已經失去辨別是非黑白的本能了。怎麼會這樣子呢？在他們失去認同的時候，他們也失去了所有的價值判斷，心裡只剩下跟權力有關的東西。這些人還在追尋他們自己的安全感。」

「印尼社會現在還沒淪為叢林，可是，我們也離叢林不遠了。我們有好幾百萬人本性上是具有道德良知的，可是他們無能為力，無法將良善推廣到社會上去。我們也有幾千人——這一點很重要——他們掌握了權力，卻不願意風行草偃、淨化社會風氣。所以，你就會覺得飄移無根、飄飄蕩蕩的感覺就是這樣。你知道自己應該做好事，避開不良影響，可是現在你得好好想一想。而當你發現自己在思考的時

候，那就是你開始感覺飄移的時候了，那也就是你開始感覺整個社會都在飄移的時候了。我跟你說，要是連像我這樣的人，做好事之前都刻意在心理與道德上耗上半天功夫琢磨，那就不對了。

「那麼，促使我們社會走到這一步的錢，都是打哪裡來的呢？錢都是從石油上賺來的。」他踱步在鑲板裝飾的辦公室裡，手指著一具角鋼櫃子，現代的辦公設備。他說話時，開始比手劃腳起來。「我也是靠著石油收入生活的，大部分如此；政府靠著輸出石油和其他外銷所累積的盈餘。那也是為什麼我可以住在這裡，住在城市裡。只要一離開大城市，我就只有靠田吃田了。我們靠著人民過活。我抽他們的稅，你明白吧。我向他們徵些苛捐雜稅。這些老百姓要了解這一點，我有我的需要，他們不能兩手空空的來見我。」

「我嚇了你一跳嗎？過去在歐洲，貴族成員的重要性是以他們擁有多少土地衡量的。在我們爪哇，貴族的影響力要看他的土地上養了多少人。因為人力就是財力；免費的勞力，也算是某種農產品，軍隊充員的來源。我們現在已經不是貴族了，可是我們卻沒忘記，人力就代表財力。」

失焦的城市

鳥瞰之下，雅加達是一片綠樹擁簇著紅瓦屋頂，向八方延展。可是，地圖上的雅加達卻只有寥寥幾條主要道路。車流就沿著這幾條主要道路奔馳，經過新近拔起的摩天大樓、公園與紀念碑。這幾條道路圈住了都會區。雅加達是個失了焦的城市，集合幾塊都市庄腳或是村莊，而這些村莊保留了鄉間建築之隨性恣意。一般市街地圖哪裡登載得了像這樣九彎十八拐的巷弄與街道呢？

雅加達市中心一帶雖然多見混凝土構成的村莊，可是只要向外跨出一些距離，村莊還是綠意盎然。家家戶戶屋舍前，不加圍籬的花園；果樹高大，濃綠遮蔭；庭院晨昏定時清掃。這些村落依舊是聯繫緊

密的社區，村子裡依舊還有指派的「領袖」管事。諸如此類的區域，無須多加費神矯正。可是，許多像這樣子的都會村莊社區並不穩定。城中心鄰近區域，地價昂貴，建商可以高價買下村莊，整個社區只好向外遷移。此外，人口繁衍，家庭倍增，土地所有權一再細分，房舍面積也縮水了，住屋與住屋之間的巷道變得越來越窄。

當時，收集垃圾從來就不是個問題，留給收破爛的料理就好了，那些人身上背著精心編製的竹筐，在垃圾堆裡鉅細靡遺地翻檢，收集還可以再加利用的物資出售，每個錫罐、每只瓶子、每一張可以熨平的字紙碎片都可以聚合起來，轉手賣出，當作包裝紙再加利用。珍貴的果樹栽植在圍籬圈裡，爪哇人家的一小塊寶藏生長在帶刺鐵絲網後面，周遭圍繞著狹小的房舍。孩童四處可見，散布在每一處空地上，一窩一夥的，跟雞仔兒一樣數不清。

那天早上，我跟普拉索喬一同散步經過一棵紅毛丹果樹時，樹底下就有一窩小雞。一位老人家爬在樹上，使著一根竹竿，摘下一叢叢帶刺的鮮紅果實。普拉索喬與我駐足一旁靜觀。老人的兒子看到我，知道我們是外鄉人，就從他父親摘下來的果實當中拿了一把送給我們，還比了個爪哇——印度傳統禮俗中的手勢：他伸出右手，握住水果，再用他的左手手指碰觸著右手手肘。

紅毛丹是這家人的現金來源，他們採收果實是準備要出售的。不過幾百碼距離之外，穿過蜿蜒曲折的村莊迷宮，主要幹道就橫在村外，機油廢氣染黑的道路兩旁，鮮果蔬菜的攤子櫛比鱗次。雅加達是個人口五百萬的都市，然而就在這裡，奇蹟一般地，緊鄰城市深淵的人們依然還奉行著鄉間村莊的禮數，古老文明的溫文優雅。

普拉索喬就不像我在收到人家致贈紅毛丹時這樣感動了。在他看來，那不過是種合乎規矩的行為罷了。他說道：「換作是我，我也會這麼做的。我們還停留在社區裡的人，都會這麼做的。要是在一個『社會』裡頭，同樣的那個男孩，說不定會偷你家的水果呢。」

社區裡的人依然活在爪哇農村互助合作的生活方式當中，「社會」中人只有靠自己了，他背離自己的村莊與自己的同胞，縱身躍入都會的滾滾紅塵中。普拉索喬以為，這種人拿他們的生命當「賭注」，他把那些人視為賭徒。日後淪落為拾荒者的就是這些人。他們就是那些你可以在大街小巷看到的，那些專撿香菸頭的（可是，他們用的竹夾子過長，就像在使弄太長的筷子夾菜一樣），再取出菸蒂裡的菸草，做成香菸賣給窮人。他們就是爪哇失落的一群，有些人還連「文件」都沒有。他們正是被爪哇的繁殖力排擠出爪哇文明的一群人，這些營營苟苟存在社會底層的人，跟達爾瑪——薩斯楚這群身處社會頂端的人，同樣斲喪了人格。背上扛著竹簍，掛著長條竹夾，他們細微瑣碎的勤勉，目光永遠在地上梭巡著，正如脫離了凡囂與群眾的菁英階級，他們在每一個旁觀者眼中都是個怵目驚心的警告：花無百日紅，人無千日好。

雅加達欣欣向榮，這個都會與國家都需要大量的財富與技術灌注。可是，財富與技術也撕裂了社會均勢，留下創傷，同時間，舊秩序的失落，據以評判是非黑白的舊知識也淪喪了，在在激起公憤，怒火燎原。

耶誕假期結束了，新近致富的人們帶著他們的孩子和他們的奶媽，離開了婆羅浮屠洲際大飯店。游泳池因應年度檢查，放乾池水；先前碧藍池水盪起漣漪無限，而今，白色磁磚映著陽光閃熠，工人刮削釘槌。跨國公司人員、顧問與經濟學者紛紛回駐。走廊上平靜無擾，飯店終於又回到正常營業狀態了。

六 心理訓練在萬隆

雨季到了。即使天氣晴朗，雅加達南部還是籠罩在雲霧之中，摩天大樓與綠地和紅瓦屋頂，都消褪在視野之外。土地顯得開闊平坦，可是南端還有丘陵起伏，雲雨稍霽，就可以清晰顯露。山丘頂端有一棟棟度假別墅，住著意圖避開雅加達的燠熱與濕氣的有錢人家。

一條高速公路穿過農業用地——開路伊始，曾經成為學生抗議的題目，現在，高速公路承載了大量的車流交通——駛向群山萬壑。高速公路開到盡頭之後，我們又重新置身於爪哇的擁擠稠密當中，循著羊腸路徑，走過綿綿不絕的村莊（偶爾凝聚為小型城鎮），數不盡沿途多少蔬果攤販，開進茶園，雨雲迷霧浮散依依，混雜著公車、卡車與速克達機車的墨黑廢氣。偶爾，山路一側潮濕的土壤鬆滑走位，暴露出茶樹樹叢根系，樹根驚人的粗壯綿長，探出山壁，懸在山路上空。

山路盤桓茶樹與雲霧間，陡降到一處開闊的稻米河谷，接著山路繼續爬升，行經幾座陡峭的尖錐山丘之後，就到了坐落著萬隆市鎮的高原。萬隆，此地於一九五五年召開過知名的亞非會議，蘇卡諾總統與尼赫魯先生都曾與會¹。氣候涼爽宜人的萬隆，殖民地時期列名在當時人言必稱之的許多個「亞洲的

¹ 一九五五年四月在萬隆召開的亞非會議，為亞非兩大洲國家第一次在沒有殖民國家參加、自己召開的歷史性會議，有衣索比

巴黎」之中；荷蘭人也在萬隆創辦了一所技術學院，無可避免的，日後這所學院也成了孕育革命動力的溫床。蘇卡諾也曾在此就讀，他的「工程博士」頭銜便是從這座學院掙來的。

然而，萬隆激進的盛譽還是不減當年。這裡也是印尼復興伊斯蘭教的重心之一。普拉索喬在雅加達有許多朋友，曾經南下此地，參加由於理工學院舉辦為期三天的清真寺伊斯蘭「心理訓練」，以此度過週末假期。

這項訓練課程的主持人伊瑪杜丁先生，在印尼的穆斯林社群中夙負盛名，本身是一位電機工程師，也在技術學院任教。雅加達有些人士認為伊瑪杜丁是位勇者，有些人則不敢苟同，認為他是個危險人物。五個月前，他入獄一年之後，終獲釋放。而他以伊瑪杜丁這個阿拉伯名字作為名號，捨棄他原有的印尼名字，暗示了他是個執著到什麼程度的穆斯林。

暮色四合之際，萬隆邊緣道路旁泥濘的步道與路邊的流動攤販，感覺上爪哇多於巴黎。可是，這正是普拉索喬念念不忘的幻妙時刻，人約黃昏後，我們的車子還尾隨了一對共乘一部速克達機車的約會男女，亦步亦趨了好一段距離，交通廢氣與噪音之中，女孩小心翼翼的側坐（兩手環繞著護花使者的腰）在機車後座上，腳上的拖鞋懸空晃盪，似乎隨時可以消失在車陣中。

普拉索喬說道：「你本來不是在問我什麼叫做冷塞臉嗎？她就是個冷塞果。」

冷塞果果實的色澤，即所謂印尼女性最完美的膚色。果實呈淡淡赭色，淺淡的泥磚色；而速克達機車後座上的女孩，五官清秀，帶著南洋女性的輪廓。

女孩被我們打量得怪不好意思的。而當我們的司機將車頭燈投射在她身上時，她的護花使者原本就已經窮於應付路況了，現在又遭到後車干擾，惱得他不住回頭，怒目瞪視我們。最後當他們終於轉向駛離大路時，那個冷塞果女孩腳上拖鞋晃呀晃的，臉上焉然的一抹媚笑，普拉索喬驚呼道：「你看到了嗎？你看到了嗎？」

接下來，我們得不斷停車問路，幾乎是一條街接著一條街問，才找到那間理工學院與清真寺的位置。學校坐落在萬隆城裡較老舊與殖民時期的城區，夜色與街燈映照下，印象中，寬闊寧靜的街道，屋舍退離路邊；高大的行政大樓，爪哇在大樓雕繪的屋頂上，只能隱退為一個建築主題，成為一段荷蘭殖民時期的異國風情。

清真寺圓筒型的建築頗為「現代化」。時間已經過了晚上七點，清真寺與側樓之間，鋪上地磚的露天空地上，心理訓練班的男孩與女孩成群聚集在一塊兒，等候著晚間的課程。暗影中，幾個女孩兒嬌嫩的聲音喊著：「普拉索喬！普拉索喬！」這個男孩做人真是太成功了！女孩喜歡普拉索喬，就像他喜歡她們一樣；她們一擁而上，圍簇著他，彷彿他睜違好幾個星期了。這群青年學生之歡快，只有露營烤肉活動之其樂融融可差比擬。他們都是來自雅加達的年輕人，中產階級人士的孩子。他們可不像經學學校裡的學生，跟那些嚴守清規戒律、封閉的穆斯林團體就差得更遠了。

行前我們先給伊瑪杜丁打過電話，有人領著我們到他家去。我們還沒下車，伊瑪杜丁自己就出門來迎接我們。此人中等身高、寬肩、闊臉、微笑、開朗，然後他趕著我們魚貫入室。

他的房子只是大學講師的宿舍，簡樸的座椅、櫥櫃，可是還是少不了一撇印尼特色：屋子裡頭有兩個女孩，不知是伊瑪杜丁的親戚還是女傭，原本席地坐著，一見到我們進門，隨即起身離去，想必是準備待客茶點去了。

伊瑪杜丁展開普拉索喬攜帶的介紹信，細細讀過。一面讀著，他的神采就越加煥發；他說，自己深

亞、伊朗、利比亞、土耳其、泰國、越南、日本和中國（由周恩來率團）等共二十餘國與會。

2 冷塞果（Jansen）：一種熱帶水果，原產地是馬來半島和東印度群島。果實呈橢圓形，直徑約一點五到五公分，結成串，每串有六到十顆。果皮呈淡黃色，果肉白色，多汁而香甜。

感榮幸。他看起來比實際年齡四十八歲年輕得多。他的皮膚光滑，暗黑瞳眸閃閃發亮，豐唇闊嘴，談笑風生。他的風采如此迷人，滿懷熱情的接待我們。然後他問道，我是怎麼聽說他這個人的？我提起雅加達的一個記者，而伊瑪杜丁哈哈笑說道，「不過，還要請你轉告他，我還在為了爭取我的自由奮鬥當中！都五個月了，理工學院還是沒有分派任何課程給我。」

「你為什麼認為校方對你還是有所忌憚呢？」

「我怎麼會曉得？我想，他們只是擔心學生對我的歡迎和支持吧。」

我問起他的名字。

他說道：「就是伊瑪——杜——丁，意思是『信仰的支柱』。」

「這是你自己給自己取的名字嗎？」有些印尼人喜歡給自己取阿拉伯文的名字。普拉索喬就給自己取了一個名字，過了好久才告訴他父母親。

「不，這是我父親給我取的。當時他還是開羅的愛資哈爾大學學生。我從出生到現在，都一直叫做伊瑪——杜——丁。」

女孩端上款待來客的熱茶，茶汁捨玻璃杯不就，斟在瓷碗當中。茶點則以餅乾充數，兩種餅乾都裝在罐子裡。這可不是鄉下地方招待人客的方式。

遭到逮捕收押之後，偵訊過程確實十分煎熬。伊瑪杜丁第一次接受訊問，曾經被反覆訊問了二十個小時，可是他也說，這期間當局並沒有對他動刑。而與他同時入獄的難友當中，還不乏社會知名人士。伊瑪杜丁在獄中結識了蘇斑德里歐博士，兩人還不時交談。蘇斑德里歐博士於一九六五年軍方接管政府時擔任印尼的外交部長，這位前任外交部長遭政府指控，意圖與他人陰謀策劃共產黨徒政變，推翻政府，因而判處死刑。行刑前三天，英國女皇伊莉莎白二世公開為他請命，蘇斑德里歐博士得以暫緩槍決。這段期間以來，蘇卡諾這位前任閣員一直身陷囹圄，早已為世人遺忘得一乾二淨。此情此景，坐在

伊瑪杜丁的大學校舍裡，啜飲著熱茶，委實難以想像。

此外，同樣難以想像的是，伊瑪杜丁，如此一位新穆斯林，與蘇斑德里歐這個站在老左翼尖端的人——他們兩人立場對峙，兩人致力的目標對於印尼局勢都是有害無利的——卻在軍方管控的監獄裡握手言歡。

伊瑪杜丁在獄中，又怎麼能夠獲准跟蘇斑德里歐博士攀談呢？伊瑪杜丁說道，入獄一段時間之後，獄卒就變得友善多了；而且他坐牢的時候還享有某些特權呢。這麼聽來，他判刑監禁的這段時間，並不至於生不如死。而且對伊瑪杜丁來說，這段時間也不至於完全無益。就在他被逮捕入獄之前，伊瑪杜丁參訪過幾個阿拉伯國家。阿拉伯人不斷招待他用餐，大宴小酌，續攤再三。從來沒有人跟伊瑪杜丁提過，跟阿拉伯人同桌吃飯一定要細嚼慢嚥，而且還要隨時留意你的東道主，因為他吃的時候，你是絕對不能停箸的。就這樣，當他前往阿拉伯國家進行伊斯蘭交流任務時，體重只有七十公斤，一百五十四磅，等到他終於辭別諸國打道回府，體重直線上升到一百七十二磅，七十八公斤。後來警察來敲門的時候，他就是那種規模的身材；他一直到現在都還在努力減肥。伊瑪杜丁坐牢的時候，確實甩掉了一些肥肉；獄中定期為他體檢的軍醫，還對他體能的進展十分滿意。

可是自從他獲釋之後，理工學院一直未曾指派任何工作給他。現在，他整天專注在年輕一輩當中，宣廣伊斯蘭教。他的心理訓練課程可是遠近馳名的。七年前，他首創這個課程，甚至還曾經特別為英國的穆斯林學生團體辦理過。雅加達一地請他開課的要求如潮水般踴躍。就拿週末這一班來說吧，報名參加的人數就高達六十七人，可是他一次最多只能指導四十七名學員。

熱茶再啜上幾口，餅乾啃上兩口，就到了兩相道別的時候了。我得在這個熱門的觀光假期找到一家可以投宿的旅館，而伊瑪杜丁的訓練課程也要開講了。

普拉索喬說道：「你可以明白他為什麼這麼受歡迎了吧。你注意到他跟你握手的方式了嗎？他跟我

握手的時候，好像他已經跟我認識了好久，好像他真的很高興能夠認識我一樣。我想，要是我想像他那樣受歡迎的話，那我也應該像他一樣握手。」普拉索喬的美國經驗對他影響深遠。他隨身攜帶幾本他在美國擔任基金會交流學生時的留影相簿，有國際學生派對、大峽谷、雪景等等。

心理訓練營

我回來的時候，心理訓練營已經開始了一個小時。訓練課程就在清真寺一旁、外觀像座倉庫的診所建築裡進行。地板上鋪著磁磚，綠色的黑板上已經寫將起來，天花板上點著螢光燈管照明。訓練學員坐在金屬摺椅上，寬大的椅背閃閃發光。學員中女多於男，女孩坐在右邊，男生坐在左邊。女孩頭上都裹著圍巾或是頭巾，巾幗顏色鮮麗，橙黃橘綠、姹紫嫣紅、丁香茉莉，不一而足。每一位學員胸前都別上綠色名牌，以茲識別。講師是個個頭矮小的年輕男人，穿著花襯衫，嘴上還留了一部短髭。

伊瑪杜丁坐在教室後方。我走過去坐在他身邊，他跟我說，我們正在目睹一場「人際溝通」的練習。

講師先將四、五個學員請了出去，接著，講師手上拿著一部錄音機，將一篇敘述某次車禍經過的故事念給一個年輕人聽。然後，他從守在外面等候的學員中請了一位，是個女孩，回到教室裡。年輕人開始跟女孩講述他聽到的故事。她提出問題，他則面有難色，困惑沉吟，課堂裡爆發出笑浪。學員都是看著皮影戲長大的，他們都具備了演員的本能。心理訓練進行到後頭，越看越像在演一齣皮影戲，故事接二連三地從一名學員傳遞到下一名學員，過程中益發扭曲與偏離，課堂裡歡鬧突梯的氣氛更加熱烈了。

伊瑪杜丁說道：「所有他們講的話都錄了音。遊戲結束時，就會倒帶放出來給大家對照，學員可以藉此了解原版的故事被竄改到什麼程度。這樣，等他們訓練結業、出去宣導伊斯蘭教時，對他們也會有幫助。」

可是，溝通訓練一直無法推展到放錄音帶給大家重聽對照的階段，而那也沒必要了。這些學員的皮影戲本能已經如蛇起螫了，而這堂課所要表達的重點：故事經過二手、三手傳播之後就會橫遭扭曲，反而淪為嬉鬧打趣的主題了。

接下來，就到了嚴肅認真的部分。就跟優良的學員一樣，學員開心盡興之後，也願意收心思索笑鬧之中的真義，大家靜了下來，告訴講師他們從這場練習中學到了些什麼。他們學到了些重要的東西：查詢質疑、理性分析的價值。

可是我卻覺得，做過遊戲之後所推演出來的結論，反而不利於他們參加訓練的目標，因為他們即將要對著外界宣導廣播的訊息，可非比尋常：一位受到神聖天啟的先知；主觀武斷的各種規戒；每年長途跋涉去跟一塊石頭朝聖；每年封齋一個月等等。不過，我們現在都已經深入伊斯蘭教義了，而教義種種都是無庸置疑、不容挑戰的。質疑與分析都是為了一些內在的議題，我們應該質疑與分析先知聖訓，亦即有關先知的傳統與傳說。某些先知聖訓比較可信，其他傳說可能就只是穿鑿附會；有些人不疑有他，貿然遵從一些不可靠的先知聖訓，日後很容易犯下不合伊斯蘭教義的劣行。學員們就開門見山地直搗重點：他們剛剛玩過的遊戲，直接將他們的思維導向了先知聖訓，有些人甚至還對《可蘭經》的部分經文提出質疑。他們高聲朗讀這些經文。此時，速克達機車後座上的冷塞果女孩感覺十分遙遠，像是隱遁到另外一個虛浮飄渺的國度。

留著短髭的年輕講師操作著日本製的錄音機，顯然滿心歡喜。伊瑪杜丁也十分快慰。這個遊戲不是他發明的，他說他是從許多不同管道當中汲取了靈感。可是將伊斯蘭教的理念應用上去，就是他的獨到卓見了。

講師又說話了。學員紛紛起立，啞啞鏗鏘地將金屬摺椅排成每五個人一圈的圓圈——「五」是個伊斯蘭教義中的重要數字。目前為止，我只看到女性學員的背影，以及她們的頭巾；現在，我終於可以看

到她們的臉龐了，可惜其中並沒有冷塞果一般的完美膚色。大部分女孩可能都來自蘇門答臘，那裡可比爪哇要穆斯林多了。

我跟伊瑪杜丁說道：「我想，我可以分辨出這個遊戲的六個階段。首先，講師講故事；接著，故事被扭曲了；全班同學一同評論；再將大家導出的結論應用在先知和先知聖訓上；然後再朗讀《可蘭經》裡的相關經文；現在，學員五個人一組，排成一個個圓圈。」

「你說的沒錯。可是，現在每五個人坐成一個圓圈，卻是新的遊戲。」

講師發下信封給各個學員，每個信封裡都裝著不同形狀的紙片，這個遊戲的重點，就是要利用這些紙片拼湊出正方形來。沒有任何一個信封裡的紙片是完整的正方形，可是經由事前設計，每個五人團體，利用他們所拿到的信封裡的紙片，都可以拼湊出五個正方形。

伊瑪杜丁說道：「他們一定要彼此交換，相互合作，但是不可以交談或是發出任何聲音。誰也不可以強行取走別人信封裡的紙片，可是他可以接受對方給他的紙片。」

我們走進各個五人團體之間，學員低著頭，緊靠著彼此，到處都可以看到小丑型的男孩，誇張地裝出困惑不解的模樣，刻意拼出荒謬的圖樣。我很高興看見，有個男孩竟然動作迅速地作弊，從鄰座同伴那裡偷了一片紙片，再湊到另外一位學員的圖案當中。一群女孩驚聲歡呼了一聲，鼓掌叫好；她們率先拼出五個正方形了。現場就像賓果遊戲一樣。接下來，歡呼聲此起彼落，男孩和女孩之間友善地爭執，空氣中洋溢著青春期的性別表現。然後，嚴肅的一面又登場了；椅子重新排回原位，講師要大家提出心得感想。學員一個個發表感想。令我詫異的是，這樣小小一場遊戲，竟然可以引發他們這麼多感想，這個遊戲在伊斯蘭的大道上，不知帶領他們跨越了多少進程。

講師在綠色黑板上寫下評語，伊瑪杜丁為我翻譯說明。他們學到了五件事情——「五」，又是個伊斯蘭教裡的理想數字，伊斯蘭教義當中就有五大信條。「要達成共同目標，大家就一定要合作。容易放棄的人，終將一事無成。你應該在人家開口前就踴躍付出。知己知彼同樣不可或缺。堅毅執著。」

我說道：「可是，他們不是已經提過堅毅執著了嗎？『容易放棄的人，終將一事無成。』」

伊瑪杜丁頷首同意。

可是學員不過是暫時迷途重複而已。一個裹著番紅花色頭巾的女孩舉手發言，講師在黑板下方寫下她的見解。伊瑪杜丁說道：「這個很重要——歸屬感。」

那一切感想與評語竟然都是從這個遊戲引申出來的。即便在遊戲當中有人作弊，他們還是可以直接導向伊斯蘭的團結一致或是同心協力的理念；每個人在真主面前都要謙恭自抑，共同遵守嚴格的戒律，維持緊密的聯繫。課堂裡有種不需言傳、人人可以意會的推論：社群之外的一切，都該棄之如敝屣，外界所有的一切都是不誠、不純、不信主的；他們則是正義的一方，沐浴在充足的安全感之中，浸淫在他們業經強化的信仰當中，他們法喜盈滿。接著，某個學員又想起《可蘭經》中相關的中肯經文，於是全體學員再度展示出勤學與質疑的精神，大家翻查經書，找出經文段落，講師就跟學員輪流朗誦。

講師一面喋喋講述著，一面將一疊複印的大頁書寫紙交下講台，讓學員傳遞分發。伊瑪杜丁說道：「講師現在要我去朗誦一首詩。那是伊克巴爾寫的。這是我們這個心理訓練課程的最後一個段落了，我總是在即將結束前，朗誦伊克巴爾這首詩。我特別選這首詩，因為詩中充滿了情感。你應該知道，這首詩原本是用烏爾都語寫的，後來是由埃芬迪³翻譯成阿拉伯文，再經穆罕默德·納特錫爾⁴從阿拉伯

3 魯斯丹·埃芬迪 (Ruslan Effendi)：印尼詩人，一九〇三～一九七九，蘇門答臘巴東人，曾在西蘇門答臘當過教師，日後投身革命。二〇年代初期加入印尼共產黨，開始詩歌創作。一九二六年民族大起義失敗後逃往荷蘭，曾任荷共職員，後來被開除黨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回國。魯斯丹是印尼二〇年代的重要詩人，作品帶有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善用象徵和暗喻的手法，表達傷時憂國的心情和對自由獨立的嚮往，但也時而流露孤獨感和調和主義的情緒。

4 穆罕默德·納特錫爾 (Mohammed Natsir)：曾經於一九五〇至五一年間擔任印尼總理。年少時加入剛剛成立於萬隆的印尼現

文譯成印尼文。」伊克巴爾，巴基斯坦的建國理論家；納特錫爾，一度領導遭到政府查禁的印尼穆斯林政黨。

基於印尼的傳統禮數，伊瑪杜丁跟我解釋那首詩的內容大要，因而耽擱了幾分鐘。他走到講台前，取出眼鏡戴上，開始朗讀，接著，他整個人就脫胎換骨了。他在社交應對上所有的優雅舉止、所有開朗坦白的幽默，全都遁形隱沒在這層全新的人格之下，不再像個演員或是皮影戲師傅，他現在像個毛拉，像個清真寺中人，在某個洋溢著穆斯林熱忱的一天，捧讀《可蘭經》。他曾經說道，這首詩充滿了情感；而他朗讀之際，也將嗓子喊得嘶聲沙啞了。他幾度似乎行將啜泣：伊斯蘭教正如他個人身心所遭受的極大痛苦，地獄、天堂、贖罪。而正如我所了解的，那正是這首詩的主題：倘若世間沒有先知，抑或世人無從理解先知的使命，這個世界還能繼續長存嗎？

他事先說過，這首詩讀來需要六分鐘的時間。結果，朗誦耗上了十分鐘不止。今晚心理訓練的課程已經進行了超過三個小時，課程即將告一段落。可是明天一早三點鐘，學員就得摸黑起床。原先我猜想，那是因為紀律跟否定自我可以促發與加強團結一致；其實不然，伊瑪杜丁向我說明，《可蘭經》中明文訓示，信徒一定要趁著夜半時分禮拜，吟誦出特殊的禱詞，而所謂的夜半時分，意即午夜到早上六點之間的中點。

學員似乎並不在意。他們就像一群快樂的露營者，各個都為課程最後一天要起早禮拜而興奮雀躍，這可是壓軸好戲，最後的高潮。他們從金屬椅子上站起來，依依不捨地離開課室，女孩夜宿清真寺的某個區域，男孩則分派在另一邊。他們都是雅加達中產階級人家的子弟，這些人面臨著人格斷喪的印尼式危機。然而，虔心進入伊斯蘭教，寄宿在清真寺裡，恪守著戒律與儀典，卻讓他們拾回抑或重建了某些只出現在封建社會或古老農村社區裡的秩序，而這種秩序早已如大江東去，不復存在了。

變化多端的伊瑪杜丁

伊瑪杜丁說，他不會跟學員們一同摸黑起早，趁著清晨三點禮拜。可是，他三點三十分就起床了。他每個星期一和星期四都會刻意早起，因為他每逢週一、週四就會封齋。這在印尼的穆斯林之間算是相當少見，而且有人還跟我說，這是起源自靈魂信仰的習俗。伊瑪杜丁的齋其實封得並不嚴格，不像是齋月封齋，只能在日出前與日落之後進食。某些人在每星期兩天的封齋時，將封齋規定修改為只可進食白色的食物，白色不但代表純淨的顏色，同時對印尼人來說也方便多了，如此一來，他們就可以放心大啖他們最喜愛的食物——米飯。可惜，我是後來才聽說有關白色食物的放寬規定，無法向伊瑪杜丁當面請益。

第二天，我在他緊鄰著前晚上課的辦公室裡再度跟他見面時，伊瑪杜丁說道，他每逢星期一和星期四封齋，只是做法先知，因為先知每到這兩天也會封齋。《可蘭經》裡雖然找不到相關經文，可是其他可信的先知聖訓中卻詳述歷歷。此外，伊瑪杜丁還是十分留意自己的體重。除了遵照伊斯蘭教義力行封齋外，他還定期慢跑。他說，他可得好好保養、照顧自己，他年近五十了。他認為自己還沒完全從阿拉伯世界之旅的暴飲暴食中恢復過來，可是那已經是十八個月前的往事了。我覺得，從他大腹便便的形象中臆想，每個星期封齋兩天，這兩天之間，一定將他的胃口養得出奇驚人。

伊瑪杜丁這個人真是兼容並蓄。他會在伊斯蘭教的心理訓練課程中，應用錄音機與西方的心理學遊戲。他深具毛拉的熱情，可是他同樣也會定時慢跑。他曾經經歷過印尼近代史上驚濤駭浪的一頁，他也

曾經與偉大的印尼名人結緣相識。他受惠於他的祖國的獨立，國家發展雖然坎坷起伏、顛躓前進，他還是跟他這一輩的同胞一樣，得以掙脫封閉，進入世界，眼界大開。他曾經是一位電機工程師；他也曾經周遊列國；他也在美國攻讀過更高的學位。

他已經活過許多不同的年代和階段了；他曾經投身在世界的滔滔洪流當中。可是，伊瑪杜丁卻漠然無視於自身經歷的種種奇觀，他將他的新世界視為當然。這個世界是不該開發的，任何開發都應該不屑。伊瑪杜丁出生在蘇門答臘，打出生就是個穆斯林。世間一切都已經包含在開天闢地之初：開天闢地之後，各種事件、工具與年代都只能逐一添加。

伊瑪杜丁的父親，正如他前晚跟我說的一樣，畢業於開羅的愛資哈爾大學。他也是穆斯林瑪斯玖密黨（Masjumi Party）裡的重要成員。

「荷蘭殖民期間，我父親擔任宗教教師，隸屬於一所由蘇丹經營的宗教學校。那是所有名的學校，而我父親同時也是校長。革命期間，也就是對荷蘭作戰時期參加了穆斯林軍隊，希資布拉（Hizbulla）。一九四六年，我接受了兩個星期的游擊作戰訓練，加入游擊隊，他們封了我一顆星星和一條彩帶，將我升做士官。當時，我才十五歲！希資布拉的意思就是真主的軍隊。」

「你為什麼會說你加入的是穆斯林的軍隊呢？你是印尼人，難道你不是為了印尼的獨立而戰鬥嗎？」

「那個時候，革命軍裡太多不同團體了。有共產黨PKI，他們有自己的軍隊，管自己叫做紅軍。社會主義者也有自己的團隊。民族主義者和蘇卡諾也擁兵自重。荷蘭人被我們趕走後，有時候我們自己也會互相殘殺。」

「我們獨立了以後，我回到中學，重新入學。一九四七年，革命政府在我們家鄉設了一所中學，我就在那所學校一直待到一九五三年。」

「你怎麼會決定要從事電機工程的呢？」

「一九五二年間，哈塔博士，也就是當時的副總統，到蘇門答臘來下鄉巡訪，他談到這個國家應該如何開發。他還去棉蘭（Medan）附近參觀了蘇門答臘最壯觀的瀑布，然後他致詞的時候，就提到電力供應的重要性。我被他的演說唬得意亂情迷的。再過一年，一九五三年，我結束了高中課業。我是以最優異成績畢業的。當我向我父親要求請他送我到萬隆念書時，他說，『我沒那個閒錢送你去上學。不過，倘若你要自力更生，半工半讀的話，我也准你去，而且還會為你祈禱。』」

「我母親賣了她一只戒指給我充當盤纏。我離家前往雅加達時，身上的錢只夠支付船票和一兩個月的伙食費。傍晚，船從蘇門答臘開出，時間差不多是六點鐘。我們航行了三個晚上，第四天晚上到達雅加達。看到人山人海、擠得滿坑滿谷的景象，讓我十分驚訝。」

「我們到達雅加達時已經入夜了，可是港口只允許我們白天進港停靠。其實，我們有四個人在船上，都是剛剛畢業的。所以天一亮，趁著大清早，我們就趕忙上教育部去，我直接跑到獎學金部門去敲門。我把我的成績單，還有中學校方為我撰寫的推薦信給他們看。跟我同船的一個朋友，雖然他在雅加達有個朋友，可是他也不確定，朋友家究竟擠不擠得下我們四個人。還好，那位朋友一併收容了我們四個人。我們就睡在客廳的地板上。那個房子事實上是蘇檀·沙里爾（Satan Sjahrir）的房子，他當時是印尼社會主義黨的總書記。」

我說道：「可是，他是個很有名的印尼名人，你怎麼能就這麼隨興的提起他的名字呢？」

說實話，他隨口說起，如此漫不經心，委實令我詫異。蘇檀·沙里爾曾經是印尼醒覺最早的民族主義者，一九三四年到一九四二年之間，遭到荷蘭人流放異鄉，也在印尼獨立後擔任開國的總理。

伊瑪杜丁說道：「其實，蘇檀·沙里爾還訪問過我們蘇門答臘。我在棉蘭的中學裡也是個學生領袖，而我就在那裡見過他。當時他下鄉巡訪，另外也是在吸收有前途的年輕人——社會主義者都是那個樣子的。你可以想像，那個時候一個像我這樣的年輕人跟那樣偉大的人物交談，是怎樣的一個情況。」

「第二天，我們一早就離開了雅加達，帶著他幫我們寫給社會黨西爪哇黨部總書記的介紹信，前往萬隆。西爪哇的總書記同樣留我們住了幾天。然後我們就到了ITB萬隆理工學院註冊入學。」

「可是，這個是關於蘇檀·沙里爾的美好故事。」

「社會主義者都是那樣子，隨時都在吸收支持者。其實，是不可能加入他們社會黨當個社會主義者的，因為我早就不是個穆斯林了。社會主義裡所有的卓越理念，我在《可蘭經》裡都找得到。」

「可是，《可蘭經》不能為你建設任何機構跟體系，而社會主義者一直致力創建的就是這些。你要的不光是理念而已。」

「要說到機構和體系，那還不是要全看我們的。希資布拉——穆斯林的軍隊，還不是瑪斯玖密黨招募的。我父親也是那個政黨的領袖，代表他的地區，蘇門答臘北部。而他在穆斯林神職人員最高委員會裡也有一席之地。雖然蘇檀·沙里爾不論在做人和禮儀，還有他的足智多謀方面，都非常吸引我，我還是絕對不能去當社會主義者，因為我早就不是個穆斯林了。他身為我們的民族領袖，我非常敬佩他，但是也僅止於此了。」

「你們瑪斯玖密黨裡有些什麼具體方案嗎？」

「他們提過啊。政府應該要盡量授權地方，去中央化；成立上下議會；提倡互助經濟；召喚各區域當地居民參與經濟發展。」

「那算是伊斯蘭教的主張，還是只是地域主義呢？」

「他們強調鄉村發展。穆斯林大多數住在鄉村地帶。」

穆斯林，穆斯林，他開口閉口就是穆斯林的，別人可能會以印尼人一詞稱他時，他還是照講穆斯林不誤。

然後，當他第一次在萬隆理工學院裡碰到星期五的時候，他又驚駭莫名的難以置信。

「一九五三年，這個地方還世俗化得很，這裡連一座清真寺也找不到。你還得走上三公里的路，走到鄉下地方才找得到一座清真寺。理工學院裡大部分的教授都是荷蘭人，他們在這裡一直待到一九五七年才走，還是被蘇卡諾一腳踢走的。大部分的課都是用英語授課的。當時那就是規矩，專門為了方便那些不會講印尼語的人。到了入學後的第一個星期五，我發現有些教授竟然連禮拜的時間到了都還在上課。我出身於蘇門答臘，從小就在嚴格的穆斯林家庭長大，所以對我來說，星期五不能去清真寺做安息日禮拜，實在是個很嚴重的衝擊。」

「我就站起來發言，請荷蘭講師允許我離席，去清真寺坐禮拜。他看起來很友善，也准我提早下課。兩三個學生跟著我離開教室。我去了清真寺，卻錯失了聽老師講課。結果，我每逢星期五就要天人交戰一番——是該去上課，還是去清真寺？就在那個時候，我心裡開始有個想法，要在校園附近建立一座清真寺。第一次只有三、四個同學跟我一起提早下課，離開教室。現在，我相信，《紐約時報》做過一個調查，他們說，兩千多個學生會定期上清真寺禮拜。」

「你說，你曾經申請過獎學金。你拿到了獎學金嗎？」

「我母親賣戒指換到的錢，讓我衣食無虞了兩個月。那是五百印尼盾。」現在，經過不斷貶值，合計只有美金八十分而已。「獎學金一個月三百印尼盾，那已經挺夠用的了。當時，房東還包伙食的房租一個月只要一百印尼盾。」

好幾個人進入伊瑪杜丁的辦公室，其中一個中年人，小個子，穿著悉心刻意，或許不過是個出身寒微的訪客，或許是個學生的家長，他對伊瑪杜丁畢恭畢敬的。而伊瑪杜丁一如前天晚上令普拉索喬（還有我）印象深刻：豈有怠慢禮數之道，他請我們暫且寬諒，隨即起身迎接來客。

我讓出我的扶手椅，伊瑪杜丁與他的客人交談之時，我就側身坐在辦公桌上。桌上幾封信件最上方，攤著一張印有信頭的信紙，信件內容是複印的。不如我原本猜想的，這封信並不是公共傳閱的文件

公告。那其實是一封私人信件，發自美國，寄件人是位大學教授，年終之際，祝福大家耶誕快樂，順便報告他們一家人的近況。美國式的親切友好，不論文化背景，祝福大家萬事如意。信件擱在這裡，伊瑪杜丁的辦公桌上。美國教師與亞洲學生，這些不信真主的異教徒與傳教士，他們之間究竟彼此誤解到何種程度，方能和諧融洽，相處盡歡！

一九四七年，革命政府排除萬難，在蘇門答臘開辦了一所中學。從那個時候開始，伊瑪杜丁就在求學路上步步高升；在他帶著五百印尼盾初抵萬隆十年後，一九六三年，萬隆理工學院將他保送到美國，求取更高的學位。他負笈留洋三年，先到愛荷華，再赴芝加哥。一九六六年夏天，他的求學歷程即將結束，他在康乃爾找到一個假期打工的機會，擔任該校的印尼語顧問，週薪一百美元，他連續工作了九個星期，他就拿這九百塊錢美金，先到歐洲，再轉進麥加。

「我一到麥加就哭了。我第一次走進那裡的清真寺，那個黑色石頭的地方，我哭了。還有，就在我要離開的時候，我也哭了。」

等他的客人告辭，他就是以那種方式跟我們訴說他放洋留學三年的心路歷程。那就是他刻意強調的順序：三年荏苒，研習高深學問，憑著運氣找到康乃爾的假期工作，最後在他前往麥加的大清真寺朝聖時達到高潮。

「其實，你剛剛瞄到的信」——原來他也注意到了——「是我的教授寄給我的。他是個基督徒。我被抓去坐牢的時候，他還寫了一封抗議信給我們政府。」

結束異國求學的歲月後，他的穆斯林熱忱益發國際化了。他在康乃爾曾經遇到一個來自馬來西亞的人。一九七一年，透過這個朋友，他到馬來西亞協助一所技術學院轉型為大學。伊瑪杜丁在馬來西亞連待兩年，一直到一九七三年；他參與了當地的穆斯林青年運動，至今還是將馬來西亞穆斯林運動中的年輕同志當作他的「弟兄」。他覺得自那個時候起，他開始對印尼政府高層產生懷疑——他們，還有其他印尼人

士，對於「馬來西亞之瘟」總是很神經質，而且他們還對萌芽自萬隆理工學院的激進發展特別敏感。

一九七三年正是國際原油價格起飛的一年，這一年，生產原油賺取的金錢，不斷地湧進阿拉伯世界，猶如對於阿拉伯信仰的獎賞。穆斯林宣教活動方興未艾，仍有待進化的穆斯林學生分散在一打以上的他國異鄉，他們無法領悟課堂上研習的科學技術與他們負笈所至的國家之間有何關聯，卻紛紛醒覺：是時候了，應該要挺身而出宣揚正信。伊瑪杜丁行萬里路，他去到利比亞、到英國，他在國際穆斯林學生組織裡的地位水漲船高，他的心理訓練課程行情看俏，需求日廣，現在，他的課程為舊式的毛拉教諭增添了一層必要的現代性。

雖然他繫獄一年，卻沒有阻礙他的晉升。他在名片——白色、黑色與綠色色塊相間（此為伊斯蘭教的標準色）——上面打印著：穆罕默德·伊瑪杜丁·阿布拉爾·拉賓；總書記；國際伊斯蘭教聯合學生組織。他沒有印尼文名字。

我說道：「可是，你怎麼從名字到姓氏都是阿拉伯名字？」

「我的名字不是阿拉伯名字，這些都是穆斯林名字。」

清真寺塔樓傳出日中喚拜的宣禮聲。這座清真寺，在伊瑪杜丁首度註冊萬隆理工學院專攻電機工程時，還不見蹤影。他說，他得暫離十五分鐘，我因此得以趁隙瀏覽他整個書架上的藏書。

有些英文書籍屬於伊斯蘭教教用的基本工具書：《十字架的迷思》、《伊斯蘭教之耶穌預言》等等；其他書籍則多半是穆斯林運動所翻譯與刊行的印尼文平裝本，其中有一本為庫塔布（Qutub）原著，他是個埃及作家。我對於庫塔布一無所悉；伊瑪杜丁說，庫塔布是被納瑟殺的。還有一本書是毛

5 納瑟（Gamal Abdel Nasser）：一九一八～一九七〇，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七〇年間擔任埃及總統。納瑟曾於一九五二年領導「自由軍官組織」發動起義，廢除君主制，成立埃及共和國，宣布蘇彝士運河國有化，提倡不結盟主義，著有《革命哲學》一書。

拉納毛杜迪寫的此君係印度——巴基斯坦的基本教義派，其主張如此極端，甚至連巴基斯坦作為純穆斯林政體的理念都極力反對，因為印度穆斯林還不夠純淨，無法建構穆斯林國家。巴基斯坦建國三十餘年來，毛杜迪不斷煽風點火（雖說從不曾提出任何具體建議），強力要求實施伊斯蘭律法，組成伊斯蘭政府。他對巴基斯坦毫無建樹，只有破壞，最後在他重病垂危時，他搭機飛往波士頓就醫，順服在西方科學之下，然後他就死了。

伊瑪杜丁回來了。現在已經是伊瑪杜丁封齋日的午餐時刻，而我感覺，尤其是現在這個時候，他已經飢腸轆轆、深切渴望午餐果腹了。

我說道：「只有伊斯蘭教能夠讓你感動嗎？」

「有些西方音樂，我也很喜歡。韓德爾作的《彌賽亞》。我也喜歡巴哈。還有宗教音樂。」

可是他並不樂見目前印尼各界對於古老信仰的關注，印尼政府花大筆財力，修建某些古老信仰的古蹟。

「你去過坎培拉嗎？」他問我，「你注意過那裡的印尼大使館嗎？印尼大使館竟然是一棟印度式建築。這兒可不是印度教或是佛教國家，印尼可是個百分之九十國民都是穆斯林的國家。」

「婆羅浮屠和普蘭般難都是偉大的印尼古蹟啊。」

「真正關心婆羅浮屠的是國際社會，而不是印尼。」

國際社會、全球文明，不過是供應了錄音機與心理遊戲，還有電機工程的高等學位罷了；然而，此時此刻，還擔任戍衛守護了印尼藝術與文明。

在伊瑪杜丁看來，身為穆斯林兼蘇門答臘人，印尼是個亟待淨化的地方。他的信仰如此堅毅恢弘，他可以將印尼切割分離在本國歷史、傳統與藝術——換言之，印尼特殊出眾之所在——之外。他的信仰相對於印尼，委實過於簡化；相對於爪哇，更是無庸置疑的掛一漏萬，他甚至不如萊諾斯村子裡的庫姆

豐富多元。而印尼，人口過於稠密，多少人離鄉背井，排除在鄉村生活之外，全國上下只有靠著軍事力量鎮壓維繫，實在太過脆弱，經不起他這種的抗議風浪。

「倘若你往雅加達走上一圈，看看雅加達周圍十五或是二十公里的範圍，你就會了解印尼究竟出了什麼問題，來龍去脈又是怎麼回事。這裡的土地不屬於在地辛勤的勞動者。根據我對伊斯蘭教的了解，要是我不能耕耘土地的話，我是不配擁有任何一片地產的。只有阿拉才有這種權利。所以，假如在這方面，我們是依照伊斯蘭律法經營管理的話，土地就應該由政府安排分配，杜絕坐擁土地而獲取暴利的地主歪風。」

「哪個伊斯蘭國家曾經按照你說的實施這種土地制度過？」

「有啊。阿布伯克，還有歐瑪，以及最初那四位哈里發都這麼做過。」

就在伊斯蘭教創始之初，接下來再過三十年，直到先知的女婿阿里薨於西元六六一年。巴基斯坦鄉下的毛拉如是相告的話，我不會感到意外；可是，萬隆的伊瑪杜丁也這麼說，就讓我費解了。

伊瑪杜丁接著說道：「我跟你講個故事。」他說：「先知最親密的戰友當中，有一位名叫畢拉勒。他原本是黑奴，後來阿布伯克還他自由身，他還得到一份呼喚民眾祈禱的工作。先知跟他的追隨者一同遷移到麥地那的時候，就賞了畢拉勒一塊田地讓他耕作。到了歐瑪時期，歐瑪就是第二哈里發，畢拉勒已經年老力衰，犁不動他的田了。歐瑪就把他的土地部分充公，讓給別人耕作。」

「你真的以為現在這個時代裡，國家還可以這樣運作嗎，全靠一個人發號施令嗎？」

「那樣正好符合目前這個時期的需要啊。再說，我們現在談的是土地改革，不是領導統馭的方式。而且，即使是歐馬，他也有個某種形式的顧問團。」

「那麼，那個統治系統又是怎麼瓦解的呢？」

「那個系統是毀在第五位哈里發手上的。他只想建立一個朝代，伊斯蘭歷史上第一個封建王朝。」

「所以說，自第五哈里發以降，伊斯蘭統治就一直是那樣子囉？」

「是的，我想這麼講也沒錯。所以，現在如果你想要再以伊斯蘭教建國的話，就得建立在共和國的基礎上。」

「你不是在說，伊斯蘭教已經失敗了呢？」

「不，伊斯蘭教當然沒有失敗。失敗的是人民，穆斯林。」

「你認為你現在可以把他們重新導上正軌嗎？」

「我想沒錯。尤其是印尼。因為我們的政治結構與伊斯蘭的教論裡描述得差不多。總統、國會或是議會、軍隊。我們現在只缺結構裡面的人，他們一定要是真正的穆斯林。」

「你們的政府就是因為這樣而對你忌憚嗎？難道這也是有些人覺得你很勇敢的地方嗎？」

他似乎頗感意外。「我並不勇敢。」而他的確也是在說真話；他只是在做他應該做的事情而已。

幾個學員進到辦公室來跟他說再見。他們臉上容光煥發，同時也凜然敬畏。訓練課程十分成功。所有的復興伊斯蘭教圓領衫都出售一空，圓領衫上寫的還是英文呢。伊瑪杜丁跟學員一樣深受感動。他陪著他們走向門口，站在陽光下跟他們閒話家常：白色襯衫，灰色長褲，腰上繫著皮帶，強壯而迷人，可以信賴倚靠。

伊瑪杜丁踱回辦公室，對我說道：「我正在為印尼培育下一代的領袖。我相信我們的憲法當中還存在著一些伊斯蘭的價值。我正在培育新的一代，將來可以取代這一切。」

依賴西方文明的痛苦

取代這一切。可是，這是所為何來？又該如何取代呢？不以制定新的典章制度驅逐劣幣，而是以一

群跟他一樣純淨的人。「我只是個教師，至少在自我感覺上，我只是個普通教師而已。」伊瑪杜丁如是說道，「我只對教育年輕的下一代有興趣。因為我相信，我們現在最需要的就是一位真正的穆斯林領袖。」

只要樹立了真正的穆斯林領袖，就像是歐瑪與其他遵從正確引導的哈里發一樣，社會就會蒸蒸日上，水到渠成。他的基本教義歸根結底就導出如此結論：我們需要一位真正虔誠的領袖，而不是一個深具個人良知、富於悲憫或智慧的領袖，這人舉手投足、起居行止無不遵照著《可蘭經》的指示，這人可以作為先知的代理人，這人應當對先知行誼與天啟瞭如指掌，他可以仿效先知，以先知安排信眾政務的典範，將國家治理得妥妥當當的。伊斯蘭教就憑著虔誠與良善的理念，超然獨立於其他道德體系之外。

伊瑪杜丁的信仰與其人格操守的邏輯，實在非常單純：不公不義是有違伊斯蘭教義的，而印尼上下交相爭利，全國充斥著不公不義。而不斷痛陳印尼國內道義淪喪的伊瑪杜丁，竟然可以無憂無慮的出國旅行，周遊暴政殘民的穆斯林列國。那些他曾經走訪的國家，單純只是成就了正信的國家。你不會到那些地方去察訪別人家的不公不義；他只會想到他們的領袖，而且受到這些領袖信仰之純正的感召，你自己也會覺得清新潔淨。

他告訴我說，他曾經在巴基斯坦待過兩天。而他顯然對於巴基斯坦如何建國與其歷史所知甚少。在他而言，巴基斯坦只是一個穆斯林國家，經過伊克巴爾賦詩盛讚而卓越不群。至於巴基斯坦的國政體系、幻影一般的伊斯蘭律法、巴國實施戒嚴及其憲政幾度崩潰、巴國政壇之齷齪構陷、公眾場合鞭刑示眾、官方審查與過濾出版物、箝制言論自由、知識分子遭到的羞辱等等，凡此種種，他幾乎一無所知。他為什麼知道的這麼少呢？他說道：「或許是西方新聞媒體作梗吧。」由於他對西方媒體心懷疑慮，所以他也無法確定伊朗國內究竟發生了哪些事件。他只有從「內部」汲取到一點點的資訊而已。

我在雅加達跟一位穆斯林編輯提到這段插曲，他說道：「誰也攔阻不了他們的資訊。他們大可派人

到當地去採訪調查。假如說他們不知道，那是因為他們不想知道。那些消息不符合他們的宗旨。」

確實，西方媒體反而服務了他們的宗旨。復興伊斯蘭教：心理訓練課程結束後，販售給學員的圓領衫上打印的英文字樣，一度紅遍許多國際發行的英文雜誌封面，因而為大眾所熟悉。伊瑪杜丁自己講到前往他自己的清真寺謁拜時，則特別點出《紐約時報》。

雅加達某個重要的青年組織，附屬於某個中產階級地區的清真寺，也曾經在伊瑪杜丁的心理訓練課程中受訓過的該組織總裁說道，伊斯蘭教現在已蔚然成為新一波全球性的偉大風潮，不論世界各地都有信徒改宗。《時代》和《新聞周刊》都這麼說過。而《新聞周刊》上還有一篇專文，將先知跟另外一位穆斯林列名在世界歷史上發揮過高度影響力的前五十人當中。年輕人說道：「現在，這已經成為歷史了。」這話純指先知在《新聞周刊》列名一節。（歷史，就像一本神聖的分類帳冊一樣，就如同許多其他事物，同樣為其他文明護衛戍守。）這個年輕人屬於中產階級，個子修長，面如滿月，有張標準的冷塞果臉龐。自他從伊瑪杜丁的心理訓練課程結業之後，就念茲在茲地一意執迷在死亡與來生上。可是他內心一角，還是無法抵禦俗世的虛榮驕傲。

《時代》與《新聞周刊》協助創造他們所記錄的歷史。伊斯蘭教純正而完美，我們應當摒棄世俗化的西方，西方已經行將就木了；那就是他們要傳達的訊息。可是，西方即使行將就木，還是僵而不死，拖著老長的一口氣。同時，越來越多人受到這個新世界的吸引。在這個新世界裡，他們抓不到中心，感覺距離如此遙遠，根本無法駕馭掌握，這些新進蛻變出頭的新人類置身於新世界中，就像這位雅加達青年組織的總裁一樣，只有益發感受到自身的缺憾與不足。這些人不是經學學校裡的學童，也不是赤腳貧農，他們渴望獲取西方人的高等技術；西方人的見證令他們鼓舞振奮，而他們需要的，也就是西方人的見證。這也是他們對西方文明極度仰賴的一部分。這種倚賴性引發了他們在身上的極大痛苦（就像青少年一樣），而他們也只有嚴格力行他們的新宗教，日復一日自虐以求藉慰，於是乎，一日五次的禮拜

祈禱，恪遵不必要的封齋等等。一度屬於他們的古老宗教，任憑他們棄之如敝屣，現在卻成為他們獨家擁有的文化資產，製造出完整一體的幻影，高調承諾著即將贏取的勝利。此外，古老宗教也讓他們重新對自己感到好奇，值得探索；正如報紙所言，也再一次讓外界對他們興趣盎然。

摒棄，卻又不能獨立，進化卡在半路上的人們實在難以擺脫那種循環窠臼。伊瑪杜丁的心理訓練課程中，有個女孩的座位遠離男孩，她圍著頭巾，還在西方的心理學遊戲之後引述相關的《可蘭經》經文，而她即將前往倫敦。她說，她要到倫敦去擔任模特兒。事實上，她只是去受訓，參加模特兒的訓練課程。印尼——歐洲的模特兒事業正在起步，粗具組織規模。我還拿到一本招募小冊，主要的訴求對象在於中產階級人家，半開發中國家人民。而今，模特兒走秀吸引了女孩和她們的家長，可以跨出輕鬆的一步，進入新世界。然而，無須多加想像就可以預料到，總有那麼一兩個女孩迷失在伸展台上，而終有一天，這輕鬆的一步將淪為整個社群共同的苦痛。

七 互換式革命

取代這一切。伊斯蘭教讓各種怨怒憤恨都理直氣壯起來——為了信仰而義憤填膺，為了政治待遇不平而憤世嫉俗；兩種憤怒，彼此相似。而在這趟旅途中，我三不五時就會遇到這類敏感人士，他們心中早已醞釀著翻天覆地的大騷動。

我在伊朗遇到了貝札德，他帶著我走遍德黑蘭，以及聖城科姆和麥什德。他是個共產黨員父親養大的共產黨兒子，而不是個穆斯林。可是，他的共產主義卻與伊朗的什葉派信仰如出一轍，類同於什葉派信徒肩負著的血海深仇：這個樑子結在第七世紀，阿拉伯人顛覆了古老的波斯帝國之時。良善的穆斯林相信，這個世界最美好的時光，就在於先知與前四任循規蹈矩的哈里發期間；貝札德則篤定的以為，全世界最美好的時光，就在於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五一年之間的蘇聯。黑暗陰霾一掃而空，人民推翻了腐敗不義的社會，蘇聯的集中營與監獄裡關滿了邪惡的奸佞小人。阿亞圖拉何梅尼言必稱真主，自命為正信的復仇者；共產黨員貝札德，說起話來卻跟何梅尼沒有兩樣。

走到巴基斯坦北部，喀格汗谷地，溫文儒雅的馬素德，他只有在情操上算是個穆斯林。可是當他站在我身邊，我們並肩俯瞰著腳下冰冷、凝綠的崑哈爾江，他憂心忡忡於家庭生計，以及自己的前途發展，個人的焦慮終於匯流進入他對國家前景的灰心絕望，而他也曾喃喃說道：「幾百萬人都會死的。」

穆斯林的憤怒

我在雅加達的時候，有個企業人士也對我發出類似的感慨。某日近晚，我們約在飯店裡的餐廳晤談。介紹他給我認識的人，先前將他描述為一名經濟學者，與政府部門關係密切，他是個為國家規畫未來展望的人。這些描述確實不差，毫無溢美，不過，他言談之間，還是流露出印尼人感到時局出了狀況的典型反應。而他也滿懷怨恨：厭恨華人（他們比印尼人要聰穎能幹太多了，「就像把勞斯萊斯的零件，裝配在日本車子上一樣。」），對跨國公司也很憎惡，印尼社會裡的成功人士，以及那些統治他國家的無知軍頭，都該痛打五十大板。

他說道：「開發中國家的領袖，大部分的領袖，都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他指指自己的胸口，「他們買得起賓士車，可是他們對車子沒有真感情，他們無法體會、欣賞那種車子裡的創意和智慧，以及車子裝配打造的功夫。假使你打字速度一分鐘只有四十個字，那就算你用了IBM的打字機也沒有意思。」他現在又妙語如珠、談笑風生了，可是，他的憤怒（以及他慣於引用科學譬喻的偏好）顯然賦予他另外一種諧趣機鋒。

他是個穆斯林，出身蘇拉威西，舊稱西里伯島，此地過去跟蘇門答臘與西爪哇都曾經風起雲湧，發生過激烈的穆斯林分離主義運動。當年的憤恨激怒，在他身上殘留的不只一絲餘燼，即使他受惠於軍方長期鎮壓、緊箍印尼各島於一體的承平局面亦然。他從一窮二白開始，接著入學受教；他也曾經去美國放洋留學；他白手起家，創立事業，而且生意興隆；經過蘇卡諾風雨飄搖的統治末期，整個國家的發展讓他分到一杯羹。可是，這樣子還不夠。其他的不提，他的成功反而讓他視角錯亂。成功之後，他反而清楚地看透了那些飛黃騰達人士究竟是什麼人，而他也滿心祈願能夠一舉掃除那些他不順眼的人。而今，他但願能夠拆卸潰滅這個讓他崛起的國家。

他說道：「我們得殺掉一大堆人。我們一定殺掉一、兩百萬個爪哇人。」不管是誰，只要是爬升到上層階級的，跟他一樣，都該死：政府裡所有的文武要員，大小百官，找到好工作的人，大學裡的人，住好房子的人。「我覺得自己在雅加達已經失去了敏銳的感知能力。我的辦公室在某一棟新大樓的九樓，大樓是中央空調的。我每天早上開著一輛空調冷氣房車上班。下班回家，我就待在家裡讀書。我看電視。我究竟是住在哪裡？我掌握不到貧窮。我怎麼能夠掌握住這個社會的不滿和怨恨呢？」

這個社會太不公道的了。太多人找不到工作，待業者的人數一年比一年高。政府部門、跨國公司，還有從新加坡和香港過來的華人企業，都沒想要去開發出足夠的工作機會。這個人的反應就是憤怒，熊熊怒火，狀似政治不滿，骨子裡包裹著伊斯蘭教，而說穿了，其實還是種族傾軋的憤怒。

「大部分的博士都是華人。他們就跟癌細胞一樣不斷生長，強而有力，他們總有一天會把整個環境毀掉，偏偏我們又奈何不了他們。假如這些人進入任何一個系統，他們總是比別人努力，又比別人聰明。」

「可是你們需要聰明又有才智的人。」

「這些人——」他指的不僅是華人而已，還有所有跨國公司裡的人、外國人等，「其實就像是兩百二十伏特的電流一樣，可是我們社會既有的配線電路，只撐得起一百一十伏特，所以只要直接接觸到兩百二十伏特的電流，一百一十伏特的就毀了。你欠的就是一個整流器。政府部門與年輕的知識分子就該扮演整流器的角色。可是，這個部門急著追求物質回饋，大部分時間都在跟兩百二十伏特的攪和，從來沒想多關心一百一十伏特的。因為這些年輕的科技官僚，要是他們打算開車的話，一上路就要開勞斯萊斯的；要是沒有勞斯萊斯可以開，好歹也要開富豪的。」

所以，這些人都得滾蛋。「將來的鬥爭一定是大學裡的人和經學學校裡的人互鬥。總有一天，經學學校的學生會上雅加達來放火燒掉這間飯店。伊斯蘭教可以變得像古柯鹼一樣，讓你發狂。只要你去清

真寺裡頭轉一圈，自己就感覺很爽、很勇。你變得很爽、很勇的時候，不管發生什麼事情，都是阿拉的意旨。」

這種事情在印尼並不是史無前例。一九六五年，共產黨就被剷除乾淨了。當時死了一百萬人，他說，不像現在政府講的只有五十萬而已。其實，該死的不只這一百萬，那個時候，印尼各地的共產黨員有兩百五十萬人。所以，至少有一百五十萬人逃過一劫，許多人現在還活著，還在作怪。

我說道：「要是屠殺再度開始的話，你自己可能也會上場吧。」

「很有可能。我希望自己不要去。可是，我可能會上場去殺。」

「我聽人家說過，一九六五年，有些人出門去殺人的時候，還會帶著甘美朗樂團一起去。」

下午茶時間已過，婆羅浮屠洲際飯店餐廳裡的玻璃門窗外是庭園花木，餐廳裡則高朋滿座，偏偏都是他極言痛批的人：當地的華人、富裕的印尼商人、跨國公司裡的中年人。他高聲議論，口沫橫飛，講的還是英語。

我說道：「你跟政府裡的人交談時，也像這樣子嗎？」

「不。我只跟他們談事實與數據，計畫和研究。」

「那麼，你為什麼要這樣跟我說話呢？」

「你不是科學家。你想刨根掘底，發現我究竟是怎麼樣的人。你在跟我玩遊戲，想將我一軍。我就是故意要把我自己講得完全不一樣。」

我不是在跟他下棋。他來看我之前，早就知道我跟他訪談的目的何在，我不想將他的軍。或許，他並不相信那就是我的本意。他個頭極為矮小，臉上有一道輕微卻無法忽略的畸形。他心裡可能非常介意這一點；印尼人鍾愛俊俏優美的容貌。他想要在飯店餐廳裡吸引往來食客的注意。他也跟印尼人一樣酷

愛戲劇演出，以為人生如戲。可是，他的憂忿卻足夠真實；而他的暴力屠殺幻想，卻有可能成真。一九六五年，不就發生過了嗎！

某一天，我跟古納萬·穆罕默德談到一九六五年的殺戮，他是印尼當今風靡群倫的周刊《節奏》(Tempo)的編輯。當時古納萬只有二十五歲。(印尼人近代經歷了多重風雨：沒過多久，我才想起來，古納萬在另外一個場合跟我說過，一九四六年革命期間，古納萬當時六歲，他的父親被荷蘭人槍決了。可是，古納萬對荷蘭人並無惡感，他說道：「戰爭期間，無可奈何。」)

古納萬單刀直入地解釋了一九六五年的屠殺。「恐懼。完全是出於恐懼。我無法以言語形容，當時我們有多怕共產黨。他們勢力非常強大，誰也不曉得他們究竟要幹什麼。」共產黨的青年黨部建築就在古納萬家不遠之處，那些憂懼交加的日子，古納萬閉門家中坐，配槍不離手。「我相信，情況必要的話，我也會殺人的。」

詩中情操

我找到一本在那段憂懼歲月之前，在印尼出版的書。那是一本《當代進步印尼詩選》，選錄了印尼詩人讚頌共產主義詩作的英譯，由人民文化聯盟在一九六二年出版。現在看來，應該都是古早歷史了，可是到目前為止，這個聯盟的任何出版物都還沒解禁。而且一直要到一九七九年十二月，正巧是我停留在印尼期間，當年跟該聯盟有所關聯的最知名作家普拉摩德拉·阿南塔·托爾方才重獲自由，與他一同解除禁錮的，還有從一九六五年來以共產黨員罪名逮捕下獄的兩萬餘名政治犯(官方公布的數字)，至今仍繫獄的最後幾人。據說，印尼政府是屈服在美國卡特總統的壓力之下，才曲意縱囚。

普拉摩德拉的後半生，可說乏善可陳：四十一歲入獄，五十四歲才重回人世，他早期的作品遭禁，創作成熟的年歲卻枉費在獄中。就像席托·西杜莫朗一樣，我一抵達印尼沒幾天，就跟這位詩人見面晤談，彼時我無法理解他的生命經歷，當時他在知性上的素養與善於交際的魅力，我都太過視為當然。

一九六二年，席托在印尼可是個聲勢如日中天的要角。早期，他的抒情詩令他詩名大噪。後來，他染上濃厚的政治色彩，晉身民族文化聯盟的總書記；詩集中選錄了他在中國之旅後趁興揮灑的三首詩。

姑娘左拉，老家古巴，
來到北京，自豪自信，
給我一面旗幟
代表她的國家，
慶祝祖國勝利，
抵禦美國入侵。

叫人傷感的是，同時也幾乎難以置信的，席托詩中如此單純的情愫，竟然會為詩人與他的國家招致如此的苦痛。可是，現在沒有人願意再苛責席托了，他受的煎熬已經太沉重了。我也願意再在他這些政治詩篇當中，尋索些其他的情操。

有一天，他跟我說：「這裡的人已經失去了他們的宗教。」這是他回顧自己的部落背景橫遭切阻，六歲就遠離自己的村莊，送到荷蘭人辦的學校寄宿的年幼歲月，有感而發的喟嘆。只有在出獄之後試著撰寫自傳時，才體會到他必須重建或是了解自己的過去；倘若他對自己的過去一無所知，他又怎能將自己的生命理出一個頭緒呢？而我有種感覺，似乎一九六二年的社會主義或是共產主義給了他——一個缺

乏過往、不隸屬於任何社群的人——某種替代性的完整感，撫平了他的缺憾。他在中國旅行的時候，曾經到一處公社參觀。

社會生活、團結與希望
就是我在這個公社裡
所見、所聞與所感。因此，
我但願，我能汲取你溫暖的
希望，
我但願，我能握住你的雙手，
忙碌勞動的手，
我但願，我能嚐嚼這片麵包，
這片公社烘烤的麵包，就像一件信物，
紀念社會生活、團結，以及
重新拾回的希望。
自由浸浴在社會主義世界的
愛、理想與現實之中。

公社的麵包；社會生活、團結與希望：這不只是席托一個人的主題，這是整個印尼社會的共同主題，於今猶熾，更勝往昔；同樣也是穆斯林經學學校的主題。翻開這本出版於一九六二年的共產黨詩選，讓人驚訝的是，許多詩篇裡的情緒與主題，依舊是穆斯林與印尼的共同氣氛。

不公不義（詩選中所有的詩篇都由賓唐·蘇拉迪譯為英詩，並由他加以標點）：

峇里島，也有成熟稻田，阡陌綿延，
峇里島，卻也有千萬農民，死於飢饉。
我們來到峇里，舞孃身影綽約，
我們來到峇里，廟宇櫛比鱗次，
舞孃與廟宇，代表了峇里，
我們來到峇里，農民死在家裡，
不是因為收成結不出稻米，
這同樣也代表著峇里，
同樣也有其意義。

（樸圖·歐卡：〈峇里〉）

印尼人與穆斯林不約而同地哀嘆著童稚純真與兄弟友愛的失落：

生命豈能以奢華衡量，
雖說，人人追求富貴，
貧寒才能衡量生命，端賴貧寒是否不斷循環，
是否蔓延遍布大地。
餐館裡，士紳據案大嚼，

街道上，乞丐伸手乞討，
生命有什麼道理可說？

（樸圖·歐卡：〈生命〉）

憤怒與復仇：

可愛的培利安崗，烈焰熊熊，火光紅通
農民困守故土，飽受煎熬
同志們、弟兄們，一同面對挑戰，其志斷金，
抵抗、復仇，怒火燃燒在每個人心中。

（索伯龍·阿伊迪特：〈一位堤江都農民的悲慘回憶〉）

政治上的挫折與困境轉化為一道宗教的傷痕：

母親！
年復一年，您等了又等
心中無休無歇的期盼
可是，您的苦痛只有無限擴散。
揮汗勞累，血淚交織，
恐怖分子、高利錢莊，還有地主

輪番聯合壓榨，吸乾您的血肉。

母親，真的嗎？

世間萬物真的都有一份您的愛嗎？

（路其亞·克爾塔帕替：〈義憤填膺〉）

救星：

屆時，所有微不足道的法官名號率皆消失
遺忘、燒毀，或是遭到鼠輩啃噬

你的名字依然高懸長存，——群眾之子

孕育在強有力的子宮裡

你的名字將永恆不朽，不知死亡大限

因為，你就是生命

（M·S·阿沙爾：〈自由與監禁〉）

復仇，並且承諾要恢復「團結」：

我們一無所有，

只有飽受欺凌後，窮且益堅的心靈，

可以轉化為火山熔漿、火焰與驚雷

摧毀強敵，磨碎為齏粉。

我們是受壓迫的人民，並肩為自由奮戰，

不分階級，無需名銜，

我們要力保國家，不容江山落賊窟。

（薩巴爾山托索·阿南塔古納：〈受壓迫人民為自由奮戰〉）

最後，完整的信仰：

屬於我的階級的社會，長久以來，我夢想著陽光

夢想著屬於烏丁的未來，還有其他人的展望

他們渴望著友愛團結，人人平等

啊，而今，世道何等污穢黑暗

可是，等等，沸騰民怨終究會掀蓋沖天，熔漿烈焰亦將披靡阡陌

時候一到，敵人將喪命在匕首尖端

為人民而戰，必將功不唐捐

他們灌溉了列寧植下的堅韌小苗。

我在帕伯倫的經學學校拿到了一篇訪談的影本，抽印自一本菲律賓出版的基督教雜誌，雜誌記者訪問了一位印尼奇亞，亦即經學學校的領導。「現在，一位奇亞應當如何扭轉這種社會呢？他怎能迫使地主與富人交出他們的不義之財呢？根據伊斯蘭教義，這些家產應當歸屬於阿拉，一定要歸還給勞苦大

眾，屬於阿拉的子民。奇亞又該如何讓農民大眾體認到他們出世為人，享有同樣的尊嚴，理當獲得公平正義的待遇呢？」

一九七九年間，阿拉的子民；一九六二年間，某一首詩篇當中，大地的子民——兩者之間相似之處，不勝枚舉；真正的信仰、蕭牆之內的不公不義，詩人往返於已然正信完滿的國家，對於所見所聞，照單全收，毫無批判。

伊瑪杜丁曾說過，他不會轉變為社會主義者，因為他早就在《可蘭經》裡發現社會主義的優良理念了。他知無不言，而且還言過於知。新近崛起、抗議社會不公的伊斯蘭教，其實已經受過二十世紀末葉的洗禮。人民不再只是因為共同順服在阿拉之下而彼此團結。人民是阿拉的子民，而在二十世紀末葉，這幾個字的意義再度延展擴增：這些阿拉的子民，「他們出世為人，享有同樣的尊嚴，理當獲得公平正義的待遇。」土地與財富均為阿拉所有，而不屬於任何凡人：這個概念在二十世紀晚期，已經轉調為政治上的意圖，而不再是個宗教上的想法。

經過一個世代的平和無波瀾，一九六五年間的革命洪濤，再度暗流湧現。而今披上伊斯蘭教的外衣，卻也跟昔日經歷殊無二致，彷彿憤怒與復仇的願望，總是尾隨著這個人口過度稠密、一度封建統治的國家，擺脫不去。這個國家多少人被排擠在外，破壞了舊日的平衡；這個國家每向前邁進一步，就再度將人民撕扯遠離於心理安全區域；新世界為這個國家帶進奇技淫巧，提出難以達成的要求，而不論身居雲端要津或是蝸居底層，所有的人都活在斷喪人格的憂懼之中。

[再現部]

信徒的社會

一 順服

喀拉蚩，巴基斯坦，六個月之後。那六個月誠可謂多事之秋，穆斯林世界沸騰騷動。德黑蘭的美國大使館遭到伊朗學生攻擊，將五十餘名館員挾持為人質。麥加的清真寺發生圍攻與槍戰，顯示沙烏地阿拉伯王國內地下活動伏流洶湧。蘇聯出兵入侵阿富汗。

巴基斯坦國內也橫生風波。八、九月，市井間揚揚沸沸地議論著選舉。那些預定的選舉活動都已經取消了；戒嚴法加強管制；政府逐條過濾報紙刊載的新聞；公開鞭刑也恢復了。當局逮捕了一位知名的記者，帶枷上銬的出庭應訊，發配下獄監禁一年。巴基斯坦民眾驚覺沙烏地阿拉伯事件當中有美國人插手的身影，遂群起攻擊巴國北方都市伊斯蘭馬巴德與拉瓦平第兩地的美國大使館。一位以歐洲為研究據點的巴基斯坦裔科學家，榮膺諾貝爾獎桂冠，可是他身屬政府明令禁黜的阿默德教派，膜拜獨尊真主特別應允他們的彌賽亞，在他回鄉探訪巴基斯坦時，掀起了一場學生暴動。

巴基斯坦上下似乎瀰漫著恐怖暴行與獨裁暴政。可是，這個國家還是對外宣稱，他們的目標就在於將全國導上真正的伊斯蘭康莊大道。而且，這種目標還不能等閒視之。不論在印尼、馬來西亞或是伊朗，伊斯蘭教都只是為了其他目標服務，或是包裹了其他用心。雖然基本教義派當中也不乏政客與野心家，但在巴基斯坦，信仰卻只為信仰服務。

巴基斯坦在穆斯林世界獨樹一格，巴國是印度裔穆斯林的創造物，這群少數民眾從來不覺得自己脫離弱勢，從來不覺得背腹遭受的威脅稍有紓解過。同時間，巴基斯坦國內有人還將信仰發揮到淋漓盡致。就他們而言，伊斯蘭教不只是個人的救贖，不只是一種信仰而已；伊斯蘭教還成為國家、文化與認同，不論個人或是國家本身必須付出何種代價，信仰都絕對不能偏廢。一九三〇年，詩人伊克巴爾在勾勒他規畫中的印度裔穆斯林的分離獨立國家時，曾經說道：「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印度是世界上以伊斯蘭教作為建構人民力量的各個國家當中，表現得最為優秀的一員。」而今，就在我自己這趟造訪伊斯蘭國家之旅即將走到盡頭時，重新讀到這段話，不免也心有戚戚而感慨萬千。

季風雨滋潤之後，八月的喀拉蚩綠意蓊鬱。季風過後，截至現在，次年二月了，一滴雨也沒降下來，庭園荒蕪，暗棕泛黃，路樹蒙塵，有些還枝葉落盡；然而，不到六月，天是不會下雨的。

我心想，我可以去跟努斯拉特見面。他是《晨間報》的記者，也曾經帶著我參觀喀拉蚩的法院運作。我還記得他粗魯莽撞的說話方式，圓鼓鼓的兩頰，海象般茂密的短鬚。他在法院裡，曾經驚呼啾啾囚犯手銬不足的現象，有些犯人在押解出庭的時候，只是拿繩子綁住上臂而已。他說道，他一定要針對這個缺失，好好的寫上一篇報導——手銬不足、獄政管理弛廢等等。努斯拉特總是四出採訪，隨時留意可以上報的新聞。他工作勤奮，熱愛他的工作，同時也受到某種焦慮的煎熬驅迫。他是個信仰虔誠的人。他跟我攀談沒兩句話，就說自己是個糟糕透頂的穆斯林；其實，他的意思只是說，他是個不及格的穆斯林，因為在他而言，伊斯蘭教與來生就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事情。

我對努斯拉特曾經很不客氣。他曾經說過，他想到美國去念個媒體或是大眾傳播學位，再想辦法在某個國際傳播企業找個工作。他妄想讓巴基斯坦與他的信仰維持現狀，永恆不易，特殊獨異，與世隔絕，他再前往外面的世界，加以利用剝削，這種妄想害得我動了怒氣。我曾經對他直言斷定，他根本不夠格去做那些他想做的事情。我對他的直言冒犯——冒犯了這樣一個友善、開朗、焦慮的人，委實讓我

自己懊悔。

我招了輛計程車，開到《晨間報》。上層樓面上一幀長幅看板，大字書寫該報的鼎鼎大名；街道樓面上還容納了幾家小店。陡直的混凝土階梯直接從人行道搭上報社大門。報社門前的階梯不像通往一家日報的辦公室，反而比較像是某個可有可無的政府衙門。上樓之後，這種印象就益發強烈了：磁磚地板的地磚顏色褪去，彷彿是被灰塵給磨損的；破舊的辦公室家具；牆上幾幅陳舊的膠彩畫作；幾個人坐在辦公桌上，閒散地處理些不急庶務。

搞了半天，原來這不是我要找的地方，這裡是廣告部門辦公室，編輯部辦公室在後面一棟樓房裡頭。於是，我走下一段螺旋式的鐵扶梯，扶梯上的鐵柱鏽爛，瘡疤孔洞不斷。編輯部那邊樓房的階梯上，有個清掃工人正在沿著混凝土階梯灑掃，從一只水桶裡倒水出來啪嗒刷洗，水桶裡的水污濁發黑，污水就順勢掃到更低一階的台階上，再就著二手污水繼續刷洗，原來，廣告部門的磁磚地板就是這麼給刷洗褪色的。他停頓了片刻，我也就趁隙拾級而上。

編輯部辦公室位於新建的建築中，可是這一大清早的，辦公室的氣氛跟廣告部門沒兩樣。一間塞滿了檔案卷宗——彷彿這些資料都是陳年舊帳，可以永不見天日了——的房間裡，一個女孩挨著一張辦公桌坐著。她隸屬於《晨間報》兒童版，負責回答兒童讀者的來信，而且工欲善其事，必先「適」其器，她用的打字機也意外的袖珍。她並沒有蒙上面紗，感覺挺奇怪的。其他幾張桌子上，分別放置著其他幾架打字機，損朽殘破的狀況不等，正如我在治安法庭附近的喀拉蚩市集，一家販售打字機攤子上看到的機器（一日近晚，攤子上的生意人還莊嚴隆重地朗讀文件，要他的男秘書聽寫打字）。鑄鐵階梯鏽爛與地磚褪色的喀拉蚩，確實也為這間編輯部辦公室沾染了這個都市固有的氣氛，《晨間報》的編輯部感覺就像是我和努斯拉特一同走訪的法院文件登記處。

那個女孩幫我撥通努斯拉特家的電話。努斯拉特不在家，他早就出門去採訪捕捉一些報導了。努斯

拉特正是如此。我就請兒童版的女孩留了話給努斯拉特。他如此熱切地投入工作，總是馬不停蹄的；想到他每天趁熱將他剛出爐的報導繳回這樣一間死氣沉沉的辦公室，就覺得突兀而不搭調。

稍後，他撥了電話過來。「我剛進辦公室。我沒想到你還會再回來。我還以為我們已經把你給氣走，永遠不會再回來了呢！現在，你可把我的人生整個都改觀了。」

我聽得出他圓潤宏亮的聲音，急促的說話方式。他的誇張語法正是烏爾都語詩賦當中的誇張修辭，聽來尤其讓人窩心，因為我早就對他的流年災噩稍有理解了。

報社的危機

而今，他們編輯部辦公室形同荒廢。不過幾個月前，這裡才剛剛上演過一場嚴重衝突。《晨間報》在婦女版面上栽了個筋斗。他們從《阿拉伯新聞報》上抽取了一篇有關某個偉大阿拉伯女性的故事，重新刊載在《晨間報》上。故事中的女主角正是先知的曾孫女。由於各種原因，那篇文章激怒了什葉派信徒社群，信徒聚集在報社門口示威抗議，揚言威脅，以致政府不得不採取行動，出面調停。當局下令報社關閉三天，同時進行官方調查。

那是一段危險艱難的日子。倘若政府不曾出面，做出當時種種舉措；倘若《晨間報》的編輯不是這般硬頸有擔當，報社恐怕就要大難臨頭了。古理是《晨間報》的編輯，他一肩扛下版面上所有報導的責任，自始至終表現出他的勇氣與榮譽感。方其時，他已經病入膏肓了。雖然他年紀只有坐四望五，樣貌卻比實際年齡蒼老許多。幾個醫生輪流照料他好幾個月，他的病害得他每天晚上睡不安枕。當我去見他的時候，他忍受著肢體上極大的痛楚，幾乎連坐也坐不直身子。可是他還是發揮了堅毅的人格力量，引導著報社渡過危機重重的許多個星期，一直到調查終了，塵埃落定。

這樁公案，至今也算是結案了。可是在努斯拉特心中卻永遠沒有了結的一朝。負責編排婦女版面的就是努斯拉特。捅出這個樓子的，不巧也就是他，就是他從《阿拉伯新聞報》抽取了這樣一則報導加以重新刊載的。連著幾個月來，努斯拉特一直活在危險與內疚當中；編輯看得出來，他日漸消沉，沉默寡言，退縮到個人的小角落裡。

《晨間報》究竟是刊出了什麼如此冒犯眾怒的文章？要了解其中緣故，就得話說從頭，回顧一小段伊斯蘭教的歷史。什葉派信徒認為，照理講，先知的女婿阿里應當在先知歸西之後，擔任首位臨時繼任者（或可稱為哈里發）。可是他三度遭到僭越，只有擔任第四任哈里發，不久（只在他統治帝國五年之後），他就遇刺身亡。阿里有兩個兒子，兩人都未能繼任哈里發大位：長子遭人下毒殺害，次子則在企圖爭奪哈里發大位的戰役中捐軀沙場。這位次子胡賽因有個女兒，即阿里的孫女、先知的曾孫女，那篇惹禍冒犯什葉派信徒的文章，文中的主人翁就是她。

這個女人，在什葉與遜尼這兩個主要的穆斯林教派之間，撩動起軒然大波與議論交鋒。阿拉伯人（抑或為正統教派）再三暗示道，她無意承續其父胡賽因或是其祖父阿里的遺志。他們說道，自從她父親死後，她就在阿拉伯都市麥地那安居樂業；而麥地那城中爆滿了阿拉伯人東征西討所搜括來的財富，逐漸崛起，成為第八世紀之間繁華與文化的世界中心：樂人、歌者、專門侍應權貴富豪的高檔妓女、奴隸、裝演奢靡的妓院等等；而胡賽因的女兒梅開多度，來去春風，以王后的身分統馭了這個大都會。

千古以來，什葉派信徒始終悼念著阿里與他兩名兒子，這個有關阿里孫女的故事，實在是大不敬，分明是在他們的傷口上抹鹽。他們拒斥這則故事。他們說，這個女兒從沒來得及長大，童稚之時就夭折了。可是，這篇抽印自《阿拉伯新聞報》，並刊印在《晨間報》婦女版上的文章，文中敘及這個女人的生涯歷史，完全應和著阿拉伯人，或是正統穆斯林版本的版本，把她描繪成第八世紀阿拉伯半島上一個工于心計、耽溺奢華、豢養了許多藝術家的女金主。

這篇文章上報時間也選得極不是時候。當時正值穆哈蘭（Mohurrum），每年此時，什葉派信徒都要哀悼弔祭阿里與他的兒子，喪期長達十天。巴基斯坦的戒嚴法中雖然不允許民眾集會聚眾，可是這個月分裡，什葉派信徒還是在清真寺、公園與遊樂場上自由集會，也就在這裡，信徒們擬定出對抗《晨間報》的行動。有一天，四、五十名學生遊行到報社大門前，報方不斷接到恐嚇電話，坊間議論紛紛，說是什葉派信徒某日將糾集四萬信眾齊赴《晨間報》抗議，順便放把火燒了這家報社。另外一個層面上，有人開始放話了，說這是國際陰謀，企圖製造分裂，對穆斯林世界不利。麥加的大清真寺才剛剛遭受到圍攻；美國在德黑蘭的駐伊朗大使館，不久前才被學生攻了進去；巴基斯坦一架民航機滿載著朝聖的穆斯林，才起飛離開麥加機場不遠就墜毀了。

那段時日，報社只有慘澹經營，度過難關。當局可能會將《晨間報》永久查禁，許多人也只有丟掉飯碗。此外，喀拉蚩一帶憤怒的什葉派信徒也從不排除肢體暴力，加害報社員工。而且，怒髮衝冠的還不止什葉派信徒而已，時值穆哈蘭，正統教派人士中，不少人也對阿里與他兩名兒子的遭遇同感悲憤。努斯拉特的日子有如夢魘，他心心念念的別無他物，唯有全心奉侍他的信仰；在這片信仰的國度上，他一定備感孤寂。世界在他眼中可能也全盤改觀了：街道的景象，群眾不知打哪兒突然都冒了出來，他隨時隨地都有可能被人卯起來痛打一頓。

古理說道——這話是出於疲憊，抑或是絕望？——「這位女士的故事其實有四種不同說法。一種說法正如我們報紙刊登的。第二種說法以為，她在九歲半那年就夭折了。第三種說法是，她死於十一歲半的年紀。第四種說法，或許也是最貼近史實的，她根本就不存在。」

苦惱的努斯拉特

努斯拉特在電話裡說：「你改變了我的人生。」可是，他的話裡還有其他的涵義。

當我們終於見面時，我一眼就可以認出他來。他穿了一件顏色鮮明、打了褶子的蘇格蘭呢外套，那是他對喀拉蚩冬季，抑或如英國人所言「寒冷氣候」的讚頌。以前我從沒見過這件外套，這款衣裝正巧符合努斯拉特的性格，大膽直爽，就如同他鼻梁上的圓形染色鏡片與海象短鬚。

他說道：「這回，我可準時得分秒不差。」

「你遲到了五分鐘。」

「沒錯，我是遲了五分鐘。」

我們搭著電梯一路直上，到達洲際大飯店頂樓的昌德尼餐廳。

「你們報社還好嗎？」

「不怎麼好，被勒令停業三天。可是，你一定也聽說過了。」

他講得生龍活虎地。恍惚之間，他好像在講某些產業工會的活動，勞方從管理階級那裡斬獲了某些勝利一樣，而我也準備就這樣帶過不多深究。

而就在洲際大飯店明亮的頂樓餐廳裡，當我們繞著自助餐餐台挑選菜餚，菜色要比我去年八月印象所及還要寒酸，就在那個時候——喀拉蚩枯黃在我們四周，氣候寒冷，迅速消解了一切，二月的天空已然空曠明亮，餐廳門一開，氣溫已經暖了起來——那一瞬間，我看到努斯拉特滿頭灰髮。五個月來，他變了好多。

「你怎麼長白頭髮了？」

「你也注意到啦？那也是難免的啦，」他說道，「沒什麼特別的原因。你可千萬別以為我頭髮變白

了，是為了什麼特別的事情。我就是喜歡白頭髮。我喜歡白頭髮的樣子。」

「其實這種髮色跟你也挺搭配的。你今年幾歲？」

「三十三。以前我頭髮就是灰白夾雜的，我們以前認識的時候就是這樣子了。那時你大概沒注意到，當時我頭髮就已經白了。」

我們就著餐桌坐定時，他說：「那天，我本來不到下午四點是不打算進辦公室的。但那天我接到你的留言。所以今天我會在這裡，還算是走了一點運。本來我還打算出城離開喀拉蚩的。本來我還有可能會錯過跟你見面的機會。這樣難道不會讓你覺得冥冥中自有天意嗎？」

「你工作太辛苦了。」

「我確實做得很苦、很累，壓力也很大。前幾天，娛樂版面上，你知道我又出了什麼狀況嗎？我竟然在版面上登了一張某個印尼女演員穿著他們傳統服裝的照片。要不是有人跟我點了出來，版面就送印刷廠了。那張照片裡頭，女演員的身材玲瓏有緻、一覽無遺，而我竟然沒看出來。我只看她穿著他們的傳統服裝。我該怎麼辦？我不曉得自己還能在娛樂版面上做多久。我甚至連在伊斯蘭社會中，娛樂版究竟會不會抵觸到教義都不知道了。」

他打住話頭，等著我給點意見。而我什麼也沒說。

他又說道：「這樣實在很要命。這實在是個應該拿到我們社會上來共同討論的議題。而且，女人的位子又該怎麼改變呢？她們也應該出門上班嗎？還是她們應該待在家裡？男人應該教導女人嗎？還是該由女人來當男人的導師？這些都是重要的問題啊。」

「這些問題為什麼很重要？」

「因為我們一定要創造出一個純粹的伊斯蘭社會。我們不能走上西方世界的老路子，來開發我們的社會。只要我們圓滿架構了伊斯蘭社會，開發進步自然就水到渠成了。」

我們八月的時候就談過這個了，他也知道我的立場。一、兩秒之間，我納悶著，他是不是故意跟我講反話？可是他滿懷真誠。那圓鼓鼓的兩頰、短髻與身上那一領「出沒聲色場所人士」的外套，這一切表相所顯示的生龍活虎、精神氣爽都是假的。他已經華髮早生，而且飽受折磨。五個月之間，他所經歷的改變，就跟喀拉蚩的景致所經歷的季節變化一般。

八月，洲際大飯店後方的花園裡，我看到一個男人駕著小公牛拖的割草機，來回除草。而今，庭園地上已經無草可除，可是那個男人依舊工作不輟，推著一具沉重的壓路滾筒，來回平整石楠一般的地面。

我說道：「這天氣會下雨嗎？」

「要到六月，或是七月。下個月開始，天氣就會熱起來。接著，喀拉蚩就要缺水、鬧水荒了。現在每個人開口閉口談的都是阿富汗，可是等一開始缺水，大家第一個談的就是水源的問題。」

這話聽起來才比較合乎他的記者身分，專欄作家的職責所在。可是，他接著又說了：「當然，我們還有銀行和利息的問題，這就是要經濟學家好好動動腦筋的事情了。這可是我們亟待解決的困難，我們該如何開拓出一套不收利息的銀行體系呢？現在，每次我從銀行收到兩百四十八盧比的利息，我就好開心，這完全是不勞而獲的不義之財。而我太太就說了，『我不曉得你有什麼好開心的。』她說得對，我這樣是不對的。我太太真是個好穆斯林。至於我，你也知道的，我就是個不像樣的穆斯林。」

「話不能這麼說啊。我們初次見面的時候，你說過，你認為全世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伊斯蘭教與來生了。你還記得嗎？」

「可是，我是在世俗的學校裡受教育的，有時候我也會忘了要禱告、要做禮拜。」

稍後他又說：「我想，他們一定也覺得我沒有什麼問題的。」

「他們是些什麼人啊？」

「公務員，官僚。他們改朝換代，每一批人都不一樣，這我也是知道的。可是，檔案紀錄一直都會留著。所以，我想檔案，我的檔案，絕對是優良紀錄。真主賜福有他獨到的方式。某些事情要是發生了，你就非信不可。想想看，我有多幸運，上次能跟你見面，這次又可以跟你重逢。那一天，本來不到下午四點，我是不打算進辦公室的。可是現在我能跟你共進午餐，跟你聊天。你想想，這命運的鎖鏈真是環環相扣啊。」

我望著他苦惱憂慮的臉龐，說道：「我覺得你實在有必要出門遠行一趟，離開這裡一段時間，去國外待上一陣子。你快要開始胡思亂想了。」

「不，不，要是我走的話，我就不會再回來了。」

「你應該好好休息一段時間。」

「你說的對。我確實工作過度了。今天早上我還在思索著，『要是你一直像這樣下去一定會病倒的。』現在，最叫我操煩的是，我不喜歡見人，不喜歡跟外人往來。你知道的，我是誰也不見的。我會來這裡，完全是因為要來看你的關係。我討厭陌生人，對他們不耐煩。就像前天早上，我去克里夫頓的貧民窟，就在離布托家房子不遠的地方。長久以來我一直想採訪他們，寫些跟他們有關的報導。他們怎麼能夠在那樣的生活條件下，一過就是三十二年呢？他們住的地方離布托先生家不過兩分鐘的路程，他們為什麼不遊行到他家門口去示威呢？因此我的火氣就上來了，而我不喜歡自己動怒發脾氣。我進到辦公室，接到你的留言時，就是在那樣的情緒之下。所以那個時候收到你的留言，感覺就像是交了好運一樣。」

他帶了一只資料夾，裡頭蒐集整理了最近這幾個月來他寫的專欄稿子。他固定每個星期都要幫《晨間報》撰寫一個八卦與評論的專欄。他希望將來能集結成冊，方便出版，要我幫他看看他的文字。他心想，這是一段重要時期的紀錄。

偏偏，稿子的內容不是這麼一回事；偏偏，這些稿子還是出自一位專業新聞從業人員筆下。專欄中，他隻字不提那段時間他闖出來的禍，他寫的都是些社交往來的大小事情；他寫到自己如何卸下他的蘇格蘭呢外套，徜徉在喀拉蚩寒冷的氣候中；他寫到前些日子缺糖的困窘。這都是些適合「女孩」雜誌的軟調東西，卻不適於誌念「這段動盪變遷的時光」，那也是他最趨近自己麻煩的一些文字記述。

如此專欄文章，一開頭先以公開鞭刑破題，到後來卻轉而討論大眾運輸系統之不足。民眾無法踴躍前往觀賞鞭刑，肇因於缺乏公共巴士。努斯拉特確實是有感而發，這話一點反諷的意味也沒有。努斯拉特的文章當中，風格即人格，跟他本人一樣，表面上雖然歡天喜地、輕鬆愉快，深入其中，才發覺毫無幽默的成分，那也是他的真誠、他迷人風采的一部分。無庸置疑的是，努斯拉特下筆為文，一定都事先自我審查過了。努斯拉特是個全盤接受者，他順服地活在他的國家與國家的信仰之下。而今，巴基斯坦誓言要走上最符合伊斯蘭教教義的路線，是個專門講究意識型態的國家。努斯拉特接受這樣的意識型態。他身在一個意識型態治國的國家，身為該國公民，他也是個虔信者，他正是那種人，只要遭到大夥兒排擠、斥之門外，就已經夠他折磨苦惱的了。同僚對他的缺乏信任，對他就已經造成足夠嚴重的懲罰了。

再次跟他見面的時候，我對他說，我認為他的文章沒辦法集結成一本書。他聽了感覺很不順耳。

我說道：「你的文章遺漏的東西太多了。」

「可是像包可華」那樣的人，都會把他們寫的文章集結出版的。」

1 包可華 (Art Buchwald)：包可華是美國知名的專欄作家，擅長諷喻體的幽默文章，他的專欄每週見報兩次，自從一九六二年以來，即獲美國各大主要報紙聯合刊載。他也曾經於一九八二年與一九八七年兩度獲得普立茲獎肯定。包可華至今已出版了三十本書。

我問起他的太太。我還記得八月時，她身體不是很舒坦。

他說道：「她動手術切掉一塊潰瘍。我盡量不要跟她談起人生存在的負面劫數。舉例來說吧，我就沒跟她講起你不喜歡我專欄的事情。」

「那些文章是很適合發表在報紙專欄上的。」

「假如今天我在街上被人家揍扁了，攤在地上，我就無法回家去跟她說了。當然啦，要是我被人家揍扁了回家，血流不止，我也只能坐在椅子上歇著，什麼話也說不出來。回到家裡，我是該說些什麼的，可是通常我什麼也不能說。我太太實在比我更容易擔心憂慮。」

所以，從頭到尾，在他經歷如此嚴重危機前後，他連回到家裡也沒有傾訴的對象與管道。而且，沒錯，正如他的編輯特別強調的，他也未曾崩潰。他不曾動用他所熟識的高層人士替他關說，他只是如往昔地埋首工作。一直到最後，整個事件告一段落之後，他才心防潰堤。編輯古理在官方調查結束、這樁公案終於可以擱置一旁之後，邀請努斯拉特到他家裡共進晚餐。

古理跟他說道：「現在一切都塵埃落定了，報社會繼續經營下去。可是請你老實跟我說，你究竟不是故意捅出這個糗子的？我向你保證，不論你說什麼、怎麼回答，這話都僅止於你我，我絕對不會拿來對付你的。我只是想搞清楚而已。」

起先，努斯拉特不明白，編輯說這話究竟只是玩笑，還是認真的。等他確定古理是認真的以後，就嚎啕大哭起來，淚如雨下。他承受不了如此沉重的意念——編輯甘冒如此巨大的風險，一路為他辯護，全力強挺著他，可是就連編輯對他都還有一絲懷疑，不能嫌疑盡釋，他實在再也承受不起這樣沉重的包袱了。古理並未再三追問；努斯拉特已經回答了他的問題。古理太太還得過來幫忙安慰努斯拉特。

我看了那篇冒犯信眾的文章了。文章之外，還附上一張插畫，十九世紀的歐洲畫作，出自某個不知名的畫家之手，畫面上描繪一位阿拉伯仕女，未蒙面紗，卻衣著完整地傾躺在一張靠背長椅上。這張插

畫與文章都是從《阿拉伯新聞報》上擷取抽印的。可是，當今阿拉伯世界可以通過審查的，卻在巴基斯坦碰壁了。文章內容其實了無新意，都可以在菲力浦·K·奚提的《阿拉伯史》中找到，這還是本標準的教科書呢。可是爭議中的這位仕女，不巧正是先知的曾孫女；而不分遜尼與什葉，巴基斯坦有些人以為，即使你只是提到這位曾孫女姿顏美麗，都褻瀆了她，對她大不敬。

這種信仰驅使信眾走上極端。穆斯林唯有遵從《可蘭經》與傳統，誰也不敢說自己究竟算不算得上是個夠格的穆斯林；誰也不敢確定自己已經全心全意地順服阿拉，達到完全無私無我的境界了。像努斯拉特這樣的人，對自己的要求也越來越高。這個世界，對於那些焦慮無措、只想順服阿拉力求淨化純正自己心智的人而言，隨時隨地都布滿了陷阱地雷：正如努斯拉特歡喜地收到銀行支付的利息兩百四十八盧比；又好比他不滿困居在貧民窟的穆斯林同胞一樣。

我說道：「努斯拉特，你總是禍不單行，不是嗎？」

我一定是在無意間碰觸了他的心弦。他說道：「上個星期，我去清真寺參加一場婚禮。我一個朋友的妹妹嫁人。新郎遲到了。當時正好碰上昏禮。我朋友就說了：『咱們就直接先做禮拜吧。』於是我就先去盥洗。那天晚上氣候挺冷的，水溫更低。我隨手就在清真寺拿了一頂草帽或是什麼帽子的，反正一頂遮陽帽就是了，戴在頭上，接著開始昏禮。當我躬著身子往下拜的時候，草帽就從我頭上掉了下去，我心裡就想著：『真主知道，我今天本來是沒打算昏禮的。』我看到一隻手在移動，還以為有人要打斷我的禮拜。可是沒料到，這隻手不過是將我的帽子拾了起來，放回我頭頂上。我再次跪下去禮拜時帽子又掉了，這次，我看著帽子一路朝著角落滾去，我就跟自己說道：『只要我心意純正，就算沒戴上帽子，真主也會接受我的禱辭。』誰也沒注意到這樁小插曲，可是這些事情為什麼總會發生在我的身上呢？我到現在還沒在路上遇到車禍，這也真夠驚人的了。所以我想，這一定是真主慈悲，或是在冥冥中保佑著我，或者是什麼其他的。」

我提起拉瓦平第那個記者，當局逮捕了他，判他一年有期徒刑，問他對那位記者的觀感如何。他的反應冷淡，令我詫異。

他說：「說不定他話講太多了。說不定他不應該供稿給外國的報紙，寫些那類的東西。有些事情寫在地方性的報紙上是絕對沒有問題的，但上了外國報紙就會出問題了。倒過來說也一樣。」

他依舊計畫出國念書，攻讀大眾傳播學位。可是，現在他講的就跟以前不一樣了。他現在可是待罪之身，他期望能報效國家，將功贖罪，為國家的意識型態服務。

「我們正在重新建造我們的社會，媒體也應當適應其所地配合改造。我們一定要探索清楚，西方自由解放的媒體觀念，究竟能跟一般開發中國家，尤其是穆斯林國家，整合到什麼程度。或許我們可以將西方觀念帶進來，也或許西方那一套在我們這裡是行不通的。」

然而，在他的新人格底下，還是深藏著那個閱讀包可華的人，他不但看包可華的書，還希望能夠有為者亦若是，集結出版像包可華那樣的書。

我們最後一次見面時，他說道：「誰也沒注意到我長了一大把白頭髮，要不然就是他們沒跟我提起。」就在我們即將分手時，他又跟我說：「你可以幫忙安排，幫我找個可以讓我讀書、寫作、研究五年的地方嗎？因為五年之內要是你再見到我的話，我恐怕就已經轉業去賣水泥或是經銷成衣了。那樣的話，我就沒時間像現在這樣，跟你一塊兒坐著聊天，跟你分享我心裡的話了。」

二 伊斯蘭之冬

八月，倫敦機場，預備飛往德黑蘭的伊朗旅客，肩上攜裹著各式各樣的歐洲商品。稍後，同樣在那個八月，德黑蘭機場，趕著搭機返鄉的巴基斯坦移民，同樣大包小箱地滿載著歐洲與日本的商品。商品，通有運無，世界也隨之運轉。而今，隔年二月，喀拉蚩機場，則呈現出另外一種互補的景象：巴基斯坦移民帶著一家老小離開這片信仰的國度，奔向金錢的國度。他們手上握著無異議證明，以及移民保護署核發的憑證。然而，他們依舊無憑無恃，惶惶如喪家之犬。他們只知道，身處大批群眾之中，唯有拚命向前推擠，不然只有遺落無著；於是大家就盡力推搡，一面高舉著他們珍貴的證明文件，政府官員則慢條斯理地逐一檢查。某個女人牽拖了五個孩子。許多女人蒙著面紗，有些白色面紗已經骯髒發黑（雙眼部分釘上一塊橫格柵條相間的透光棉布網），有些面紗則是黑色的。

波音七四七客艙裡的禁菸區擠滿了婦孺孩童，感覺像是坐在吉納納（Zenana，婦女專區）裡面一樣。吸菸區反而乏人問津，幾可羅雀，於是我就移座過去。

八月，從空中鳥瞰，俾路支與伊朗一帶的荒地一片棕黃暈黑，卻在高熱氣溫蒸烤下泛白。如今逆向飛行，當我醒來，飛機窗外一片白雪皚皚，積雪覆蓋了山峰，平原荒瘠，可是每一處微小的凸出高點都蒙上一層細雪。我們飛過覆雪冰封的起伏峰巒，就到了德黑蘭。隆冬之際，觸目所及，依舊一片黃沙色

澤。有個女孩說道，機艙外面空空如也。

誤會一場

入境大廳一張手寫的海報上：歡迎各界弟兄、嘉賓蒞臨黑蚩拉（Hira，伊斯蘭歷紀年中的新世紀）與伊朗革命。大廳裡還是掛滿了大幅波斯古董的攝影作品，這些相片打從伊朗國王時期就張貼在此，有些顏色都淡褪了。入境辦公室門口懸掛的許多幅照片中，阿亞圖拉何梅尼的彩色照片就釘在某一幅相框上。

我們排成一小列人龍。我們當中沒幾個人是一路直奔德黑蘭的。排在我前面的日本人，職業欄上填寫著「特派記者」，這三個字可給他招來不少麻煩。另外一位官員向他招手，點名要他離開入境辦公室。接著就輪到我身陷泥淖了。我是個「作家」，依照規定，我需要事先取得簽證才能入境；沒有簽證，我不能待在伊朗。

他們先拿走了我的護照，還叫我到入境大廳一邊的一個小房間裡靜候發落。小房間坐滿了政府官員，有些官員穿著軍裝外套，肩上釘著幾顆星星；有些則衣著散漫，連外套也沒穿。他們都很和善。我的護照就跟其他三、四本護照一同擱在桌上，房間裡好像沒人打算加以處理。穿著和沒穿外套的官員們在房間裡四處閒晃，磨牙串門子，他們的談興正高呢。

那個日本特派記者還在跟某人辯稱：「可是你們是革命者。在日本，我們對於革命者最有興趣了。」另外還有一個高頭大馬、留著短鬚的男人，穿著一件黃色的套頭毛衣，他跟兩、三位伊朗官員說道：「你不能送我回敘利亞啊。他們不會讓我在敘利亞落地的。」

某個伊朗人說道：「你搭第一班飛機回去。」接著又說：「全世界的人都想擠進伊朗來。」

「可是他們不會讓我入境敘利亞的。他們會直接再把我踢回來。」

一個年約四十的女人，穿著緊身牛仔褲，古銅色的皮膚，泛紅色澤的頭髮（膚色與髮色都是用黑娜染色的），她高聲喊道：「我是土耳其人，我是土耳其人。」彷彿想要訴諸穆斯林的團結一致。

我即將陷入遭人遺忘的窘境。我跟某個取走我護照的官員交涉了一回。他站在辦公桌後面，顯然無所事事。他面帶笑容地要求我將雲雀牌行李袋拎出辦公室，辦公室裡實在是有點人滿為患。我就將行李袋扛了出去，擱在潮濕的地板上。一旁有個男人在清洗地板，經過先前我讀過所有相關伊朗的報導後，機場還有人在擦地板，讓我挺驚奇的。這個國家裡的人民竟然還在工作，還在進行維修事務。

我發楞出神，一籌莫展。這六個月來的旅程，就像是一連串的賭博一樣，旅途中會碰上什麼，就是躲也躲不掉。一路上，泰半時候我都輾轉難眠。這班航次屬於早班飛機，前一晚我在喀拉蚩又熬夜晚睡。我本來還挺挺滿意的，覺得這趟旅途即將如此結束也挺不錯。

拿走我護照的男人跟在我後面出來，他問道：「你是搭哪一家航空公司的飛機進來的？」

「巴基斯坦國際航空公司。」

巴基斯坦國際航空的代表，某個伊朗女孩，握著她的寫字夾板，就站在入境大廳的遠處一角。那班飛機帶進了幾個問題旅客。跟著我出來的男人向她招手示意，她就走了過來，他們兩人密談了一會。

她對我說道：「你得回去。」

「我一定會走的。」

「你是個作家，而且你沒有簽證。」

「我知道，你可以幫我安排班機回倫敦嗎？」

「今天沒有飛機了。你可以先回到喀拉蚩去。」

「我不想再回去喀拉蚩。喀拉蚩沒有房間可以住宿了。今天在洲際大飯店有一場小兒科醫生的年

會，所有的房間都被包了下來。」

那一天我還可以上哪兒去呢？哪裡還有免簽證的都市可以讓我搭機前往呢？

「你可以讓我飛雅典嗎？」

我並不是真的特別想要飛雅典。我突然會想到雅典，只是因為過去這六個半月來，我一路上強迫閱讀著航空公司的廣告，每家航空公司似乎都有飛機飛雅典。

那個女孩似乎也挺喜歡飛雅典這個主意的。她將寫字夾板抱緊在胸前，說道：「星期四有一班日航飛機飛雅典。」

「請幫我在那班飛機上訂個位子。」

「那是明天的飛機喔。」

「可是，今天不是星期四嗎？」

她斬釘截鐵回道：「今天是十三號星期三。」

「我今天還有什麼地方可以飛嗎？」

「今天已經沒有飛機了。現在只有飛喀拉蚩的班機。你真的不想回喀拉蚩嗎？」

我乾脆直言無諱，碰碰運氣算了，我說：「你也知道的，我去年八月進來伊朗的時候，沒有簽證也沒問題。」

她表現得彷彿我解決了她的困難一樣。「你去年八月的時候，沒有簽證也可以入境？你有跟他們說嗎？」

「入境紀錄都寫在我的護照上面啊。」

她走進那間擁擠的小房間，不消多時，又轉身出來，嘴裡嚷著：「他們搞錯了。他們會讓你入境的。」而當我聽得召喚，再次進入那小房間時，每個人都滿心歡喜，他們欣然樂見針對日來頒訂相關記者

與簽證的指示，大家終於能找到合乎法令的解套之道。

可是一名官員對著那位日本特派記者說道：「不過，你，」日本特派記者兀自嗷嗷辯解不休，「你非回去不可。」

紅頭髮的土耳其女人也允許入境。他們怎麼會以為她也是記者呢？她去到海關櫃檯前面，提著大量的商品，台灣和日本製的產品，許多都是全新的物品，還紮裹在防震的保麗龍球裡，好端端地擱在卡紙紙箱裡頭。

我排進另外一條長龍，仔細端詳海關官員的背影，這位官員是位妙齡女郎，穿著厚重的毛線裙與套頭毛衣，那是她私人的精心打扮，不是海關制服。她意態慵懶地坐櫃檯，檢查通關時，雙腿交疊在桌下。她的套頭毛衣緊致貼身，短裙緊箍著她的大腿，實在是有形有款。

我只有手上那只雲雀牌手提式旅行袋需要通關。有個男人跟那個女孩咬咬耳朵，似乎建議她說，可以讓我入境。女孩轉過身來——哎呀，可惜不是個美女——一眼掠過我手上的護照，隨即又讓我注目欣賞她的背影。

終於輪到我受檢時，海關女孩說了：「你是英國人嗎？」

「不是。」

「可是你拿他們的護照。」

「這是我的公民證。」

「打開袋子。」

行李袋中，有我的馬莎彩色織棉法蘭絨睡衣睡褲。這是不符伊斯蘭教義規定的「蠟染」服裝，當吉隆坡的亥魯爾與其微仿阿拉伯人舉止穿著的一夥弟兄，出乎我意料地來到我下榻的假日飯店房間拜訪我時，這群小阿拉伯人紛紛表示礙難苟同我的服飾選擇。看到這套睡衣睡褲，革命之女的態度隨即溫和軟

化下來，這幅景象或許令她想起自己的父親與手足吧。

「你就這些東西嗎？」

「是的。」

「你沒帶酒？」

「沒有。」

「你可以過去了。」

相同旅館，不同服務

機場外面，寒風刺骨，圍聚著「機場計程車服務中心」一群腦滿腸肥的豺狼虎豹。自從伊朗國內風波不斷，層出不窮的鬧上國際版面，各國記者就像蒼蠅見血一樣，成批成群的飛來，計程車司機的生意要比去年八月興隆多了。原本只需五百里亞爾進城的車程，現在他們索價八百里亞爾。我跟司機討價還價，偏偏理直氣弱；最後，他們答應折價一百里亞爾。

一人說道：「你要去的那家旅館已經關門了。」

「關門了！」我猛力回想，確實去年八月的時候，旅館就已經在慘澹經營了。於是我說：「好吧，那我就改住洲際大飯店好了。」

「你先預定過房間了嗎？」

「沒有。」

「那樣子的話，對你來講，洲際也關門了。整個德黑蘭只有五家旅館對你開放。」他口若懸河地講了幾個名字。

我終於了解到，原來關門跟開放在他嘴裡，有著不同的意義與用法，他不過是打算將客人與車流引導到某幾家特定旅館而已。我堅持要去我的旅館，他似乎也不介意。他已經完成他的旅館交代的責任了。天寒地凍的，他又鑽回他的小亭子裡去。

交通阻塞依舊，廢氣霧霧依舊，車輛依舊橫衝直撞，司機開車跟頂著手推車衝鋒陷陣一樣；寒冬時分，這個混凝土與磚瓦堆砌的城市還是跟夏日一般，呈現一片漫漫黃沙的色澤，光禿禿的路樹，就像路上的車輛一樣，積塵厚重，冬日泥塊乾涸，攤子與店面展售的水果，橘子和淡黃果皮的蘋果，讓我雙眼為之一亮；五顏六色的標語跟牆上蠟紙油印的字樣與海報，林林總總地混雜，像是打翻了的調色盤，淪入泥濘的總體印象之下。陷在車陣裡動彈不得時，我看著一個穿著厚重冬衣、神情爽颯的男人，擎著樹枝編成的掃把，將街道上的塵土清掃到一旁的混凝土側溝裡。再一次令我驚奇，清道夫足以佐證德黑蘭的都會生活持恆運轉著，顯然遠離在鬧上國際新聞頭條的諸多事件之外。

去年八月，我在某個選舉投票日來到德黑蘭，當時適值星期五，也是安息日。當時街上不見一般工作日的車潮，店家休市，德黑蘭看來像個即將永久歇業的地方。可是當天傍晚，我就看到選務人員將票箱一個個般進車裡，一邊持槍荷彈人士在旁全程監視。經過先前公投複決，全民贊成建立伊斯蘭共和國體制之後，那一天的選舉主要是為了選出專家會議的成員，專家會議將制定出一套伊斯蘭憲法。何梅尼曾經大力疾呼，請民眾賜票給神職人員。果然，神職人員也紛紛上榜。

專家會議隨即召開，委員們商討協議出一套伊斯蘭憲法，同時賦予何梅尼凌駕所有人之上的權力，其位階之高，甚至連總統都無法與之相提並論。何梅尼成為真主的攝政，第十二順位伊瑪目（近千年來一直「大隱隱於世」）派駐人間（或是伊朗）的代表。接著，針對這部憲法，伊朗再次舉辦公民投票，選舉官員和總統。代表神職人員角逐總統的候選人輸了大選。去年八月，油印在伊朗市井牆上的肖像，泰半都是何梅尼一人；而今，牆上多出另外一張臉，此人數個星期前才獲選為伊朗總統。再過幾個星期

之後，伊朗還要再舉行一次選舉，選出組成國家議會的立法諸公。

就在這大小連番不絕的選舉活動期間，美國大使館被攻了下來，轉眼間，革命已屆週年，伊朗全國歡慶。就在各式慶祝活動當中，週年紀念當天，有些人死在坦克車之下。德黑蘭人的生活中不能缺乏高亢激情。美國大使館淪陷後三個月，館員遭暴徒挾持為人質的故事，就像是一則廣受歡迎、偏偏情節步調過於緩慢的連續劇，德黑蘭市街上倘若沒有好戲可看，熱鬧可湊，市民就可以拿美國人質開講，消磨時光¹。

旅館並沒有關門。穿堂入口還是有人服務，車道上仍停有車輛。旅館前方的花園因為草木過冬而綠灰泛黃，橢圓形的草坪已然枯黃，灌叢與喬木下方的草皮卻依舊鮮翠碧綠，突兀得像是樹木的投影一樣。雨雪煤灰沾污了月桂樹與其他常綠樹及杉樹，枝葉樹幹都染上一層泥漿；冬天的陽光與德黑蘭高原的乾冷空氣，進一步將市區裡的泥巴蒸發碎解如蘆粉。可是旅館人員還是沒放下手邊的工作，車道清掃得乾淨清新，玫瑰樹叢也修剪得整齊有致。

旅館大廳溫暖得窩心，將我載到八樓客房的電梯運作也比去年八月時順暢。走廊一邊令人不解地擺著一張鐵床。可是客房女僕不再私下替住房客人洗衣服賺取外快，不像去年八月，我的客房女僕為我提供的服務；走廊上，空房門把不再晾曬著剛剛清洗過的萬國旗。

我的房間卻未曾清潔整理。一邊窗簾上落了幾個簾鉤，悵悵地垂墜。客房裡不再擺設菸灰缸，旅館文宣也不見了，服務項目一覽也拿走了，信紙便簽也找不到了；再也看不到電視機上頭那張載明各項早已勒令停播的「國際」服務卡紙節目表。可是家具還是一應俱全，狀況良好，房內各項設施也還堅固結實。六個月以來，這家旅館還是維持了相當水準，不致每況愈下。

只是那個中年的旅館人員高瘦禿頭，戴著一副眼鏡，神情之間還是絕對的愁慘抑鬱。彷彿這家門可羅雀的旅館，以及他寄託其中的家計生活，已經令他難以承受了；彷彿他身心惡化的程度遠比這家旅

館，以及他身上那襲雜役小廝制服來得慘重。我給了他一百里亞爾當作小費。給的太多了，可是他並不為之動容。他說道：「給我些別的。我頭痛死了。你給我些別的。」我給了他幾片頭痛藥錠。藥錠和關注反而他想要的，而非里亞爾。

稍後，我下樓到旅館的中層樓飲茶室。八月，這裡尤其像是一處廢墟，侍應服務的人員，因為飽食終日無所事事而昏沉疲憊，看來對他們自己也失去了信心。現在，飲茶室裡還是乏人問津，許多張茶桌上擺置著茶杯、茶盤和紙製餐巾，可是座上無人用茶，或是啜飲咖啡。

有個穿著黑色長褲與灰色外套的男人，占著一張沒有擺上茶具的餐桌，顯然在補眠養神，趴在雙臂上打盹。他顯現出某種怪異的絕望，像是某個厭倦了德黑蘭街頭戲碼的人。他也是個服務生嗎？還是個用餐食客？兩種揣測都有可能。他趴在桌上的腦袋頭頂禿了一片，兩頰上的落腮鬍子卻茂密叢生。這幕景象混雜著哀愁與浮華，令我低迴無語。

他並沒有睡著。他抬起頭來，一雙惺忪紅眼深藏在凸出的高額頭下方的眼窩裡，驚奇地望著我，好半天才聚焦在我身上。他白襯衫最上面的釦子鬆脫，黑色的領帶歪鬆在一邊。他的兩隻手臂依舊拱著，最後終於說話了：「你好嗎？你都没事吧？你從哪裡來的？」

1 自從伊斯蘭革命之後，伊朗與美國的外交關係日益惡化，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四日，五百多名暴徒攻進美國駐伊朗大使館，挾持館內人員九十餘人，其中五十二人一直拘禁到危機結束才獲釋放。當時的美國總統卡特，曾經對伊朗施以經濟制裁，斷絕伊朗原油進口，並凍結伊朗人在美資產，企圖逼迫何梅尼政府釋放人質，卻徒勞無獲。一九八〇年四月二十四日，美國派遣八架直升機進行救援行動，三架墜毀在沙漠塵暴當中，機組人員撤退時，八人慘遭不幸，國務卿范錫也因此辭職下台。一九八〇年，伊朗遜王巴勒維二世病逝於埃及，再加上伊朗遭到伊拉克入侵，伊朗人比較能夠接受國際斡旋，於是在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日，雷根總統就任典禮當天，借助阿爾及利亞居中協調，美方解凍先前凍結的八十億美元伊朗人在美資產，伊朗同意放人，美國人質在拘禁四百四十四天之後，終得釋放。

我一一回答他了。

「你要點什麼吧？」

語音聽來，簡直像是我有義務非吃些什麼不可。他急於表現出自己的服務熱忱。咖啡端了上來，滋味竟然不錯。

「咖啡好嗎？服務好嗎？」

「都好，都好。可是，你好不好？」

「我不好。感冒了。我染上感冒了。」

他患上的不只是感冒而已。他拚命渴望著再找一份工作，他以為我幫得上忙。到後來，我還得躲著他。

這家旅館可以招待四百名住客，八月卻只住了二十七名客人。當我走進電話機房，看到轉接台前的女孩們，伸手探進粉紅色的塑膠袋子裡拿出瓜子來嗑，同時又可以從容不迫地應付那架美國國際電話電報公司的設備——此時，旅館上下還住了四十二名客人。住房人數差異不大，可是還是可以看出旅館人員的用心努力。大廳裡，一條長桌上牽著一具免費電話，電話上還高張著一幅看板，寫著：歡迎記者！下面再分別以英文、法文與義大利文寫著：記者專用直撥電話。接待櫃檯後面，一處吧檯附近擺了一台蒸餾咖啡機（這個區域在去年八月是不對外開放的）。此外，還有人試著營造出一些歡樂氣氛，從天花板上吊著一小面手寫的招牌，招牌懸空搖晃，說是可以為客人供應波斯茶。

就像移民局的官員及機場海關的那個女孩一樣，現在，這家旅館的服務人員也同樣散發出一種遊戲營業的印象。每個人都不像先前那般粗率，而是比以前友善愉快多了。去年八月間，旅館裡野渡無人舟自橫，只有一個革命科米塔負責看管。每逢星期五安息日，餐廳裡的收音機就轉大音量，轟轟隆隆的播送德黑蘭大學校園裡群眾聚集禮拜的演說。可是除了無人管束的自由與高昂的宗教激情外，旅館上下瀾

漫著面對現實的焦慮。同坐櫃檯的接待人員當中，一人——古老的波斯技術在他身上死灰復燃——兼營起古董銅幣交易。接待櫃檯上的另外一人，一貫粗魯無禮，有一天（那一天，他分身有術，還兼差開起旅館的計程車）曾經聲色急切地跟我談起他孩子的前途。他徵詢過我的意見，我們談到印度大學的品質良莠不齊等等。可是，當我再提起這個話題時，他卻說不干我的事，將我頂了回來。奇怪，現在他小孩的教育又回復為私人事務了。

這座旅館上下不再由某個科米塔監督，大家不但習慣了危機，同時也習慣了自由；旅館裡的自由與旅館外的自由。他們就像回歸本我的人一樣。我給了某個侍者五十里亞爾，請他端一壺茶上來我房間。不消多久，他就將茶端了上來，托盤上還附贈兩個杯型蛋糕，他操著英語說道：「您是我的客人。」

八月時，旅館的玻璃前門上張貼著一張彩色的革命海報：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雅瑟夫·阿拉法特站在一邊，復仇者何梅尼站在另一邊。現在，玻璃門上不再見到海報，改而在大廳裡懸吊著一幅加框的大幅何梅尼彩照，這是官方統一發布的肖像，相框中人擁有比一國元首更高的權力。他的雙眼不再因為怒氣橫溢而不可預料，現在，他這雙老人家的慈眉善目裡裹藏著勝利，不再蹙眉怒視，不再比出挑戰的姿勢，不再握緊復仇的鐵拳；那雙手現在是一個愛好和平之人的手，一雙屬於心平氣和之人的手。這雙手現在平放在他的膝蓋上，十指修長而優雅。

革命後的德黑蘭

德黑蘭北部山峰上積雪厚重。晨光落在積雪上，顯露出每一道峰脊的走勢與稜線。接著，機動車輛匯集都會，排出廢氣塵霾，冉冉上升，遮蔽了天光山景。夏季時光，塵霾的色澤近乎山色，當時看來，感覺好像只是這片風塵僕僕的高原遮蔽了群山；而今，塵霾高升，積雪襯托於後，就像是一團烏雲。不

到日中，山峰與積雪就統統看不見了，直到天黑前幾分鐘，火紅夕陽映射在山脊層峰的雪帽上，高山山巔就像是血紅的峭壁，浮升在烏雲遮蔽的都市上方。天黑得快，三三兩兩的電光燈火穿透山景，接著霓虹燈竄起霸占了前景，昔日的光輝，叫人驚異地保留了下來。

德黑蘭市雖然已獲解放，卻仍然保存在伊朗國王的各項開發與建設當中。革命結束一年後，這個城市還是抓不到重心。對許多人來講，就像旅館的工作人員，聚在無人進住，半調子服務的房間裡，閒晃扯淡；就像內建著美國電話電報公司通訊設備的電話機房裡，地板上睡著一個男人，身上蓋著一條毛毯，從頭頂到腳趾包裹得密不通風，猶如睡在沙漠上——對許多人來講，這個都市還是像個露營地一樣。

走在這個城市，三不五時就可以看到小規模的建築工事。可是，起重機架在尚未完工的建築物頂樓上，文風不動。雨雪交加之下，金屬製的研磨機都已經生鏽了；磚縫間粗糙地敷以灰泥接合的石牆，牆面還沒來得及塗上牆泥，現在看起來已經歷經滄桑了。商店裡滿坑滿谷的進口商品，伊朗的金錢就是灌注到這裡，出產原油換取的金錢，日復一日湧出，就像在變魔術一樣。驟然崛起的暴發財富創造了同樣也是進口了現代的都市，同時也滋生了貧富差異與種種警示跡象，最後終於匯流催生了革命。同樣的財富，也為革命爭取了醞釀的時間。

德黑蘭大學南端的革命大道（先前原名為國王大道）上，販賣海報的攤子依舊兜售著瑞士湖泊、森林的景致，以及動物的圖像；小男孩幼稚地拉上他的長褲拉鍊，小女孩試穿母親的高跟鞋；孩童與美麗的女人，珠淚晶瑩滴落兩頰的海報。美景與戰爭並肩同行，殺戮的主題還是蔚為大宗。卡式錄音帶的攤子上，播放著何梅尼過去的演講錄音。有些店家還在賣革命時期的相片集錦：處決、停屍間裡一具屍體、血流成河等。現在，街上也有人在賣切·格瓦拉的照片了，還有標榜各種型號的機槍彩色海報。而且每隔幾碼的距離，就可以看到一疊疊厚實的蘇聯共黨文宣，英譯本與波斯文譯本都有——儘管一幅漫畫將伊朗描繪成一個粗壯的赤腳農民，抵禦著兩條毒蛇進襲，一條背上標著蘇俄兩字，另一條背上注明

美國兩字；儘管另外一幅漫畫中，畫面上具骷髏頭，頭上戴著鋼盔，骷髏頭代表了伊朗面對的複合式頑敵：蘇俄在一個眼窩裡，美國則出現在另外一眼，鋼盔下一縷領巾上，領巾一端如英國米字旗飄揚，另一端則飛舞著以色列的國旗。

要不是伊朗確實發生過革命，確實殞消了真實的生命與血花，這一切，感覺都像在看戲。血腥場面似乎遠離了這所校園的氣氛，逸散在這處冬季街頭商展之外。街角人行道上雲集著甜菜根糖葫蘆的攤子，洋溢著滾燙焦糖的暖香；尖細的木籤穿過甜菜根圓塊，在放進一鍋滾滾燒融的焦糖漿裡，焦糖就牢牢地裹在甜菜根上，糖漿鎖住的溫暖熱度專屬冬季的食物，色澤香味一等，吃進嘴裡就不是那麼一回事了，焦糖下的甜菜根幾乎淡而無味。

德黑蘭大學星期五的禮拜聚會吸引了好大群人，但人數絕對湊不到百萬信眾的邊，也遠不如我在八月第二個安息日所見來得壯觀。當時，我跟著我的伊朗翻譯兼嚮導貝札德一同前往，兩個小時之內，我們看到無數男人與圍著黑色頭巾的女人，排成多條人龍，興奮狂喜，魚貫進入德黑蘭大學校區，占滿操場，並堵塞了校區外的每一條街。在某些人眼中，這是完美的伊斯蘭信眾大團結，但如此狂熱並無法持久。而備受愛戴的阿亞圖拉塔立卡尼，他創辦了這一連串聚會，而今也不在人世了。時值寒冬，要坐在冷硬的操場上，聆聽位階較低的阿亞圖拉掄槍舞刀就跟牧師揮動權杖一樣，發表沒完沒了的革命勵志演說，實在是不容易啊。

這個隆冬嚴寒的星期五，大學校門口還是有相關革命的活動在進行著，義工在這裡糾集即將運往伊朗西南部產油省分庫吉斯坦，救援水患災民的各項支應物資。義工站在路上，揮舞著雙臂指揮交通；其他人則不斷拋投，或是排成長龍，人手相接，將成捆包裹傳遞到小型巴士與卡車上。其他義工，人數實在太多了，就守在小巴和卡車上，等著堆疊包裹。整體來說，太多義工了，太多人喧囂叫嚷，太多人試著管制交通，太多人忙得跟無頭蒼蠅一樣，偏偏窮忙無著。

那一車車滿載的扁平波斯麵包將運到什麼地方去呢？麵包烘焙當然要花錢。趁著麵包剛出爐的時候送來，義工扛在肩上時，麵包散發著熱騰騰的香氣，暖香飄進冷空氣中。而當義工七手八腳慌亂地將麵包層層堆疊塞進塑膠袋裡，彷彿事態緊急，攸關生死，再拋進一輛裝滿了毛毯與衣物的卡車車斗中。難道麵包運抵庫吉斯坦的時候，不會轉涼發硬，硬梆梆的跟磚塊一樣嗎？

可是，麵包並不打緊，真正要緊的是姿態與激情。這些義工穿著車棉保暖的卡其外套，外套裡再罩著套頭毛衣，他們當年都是革命分子，一年過後，他們還是企圖力挽狂瀾，重溫革命時光，他們還是急著上路去指揮交通（只為了跟警察輪誠，讓這些現在是人民的保母、而非伊朗國王鷹爪的警察，感受到他們力挺團結的熱忱），他們仍舊急著身體力行伊斯蘭教義中的「團結一致」，革命能夠成功，靠的還不是團結一致？他們正是一群革命分子，正如那些攻陷美國大使館、挾持館員當人質的暴民，只是這場革命的正當性正逐漸褪淡縮小。

再訪德黑蘭

八月，貝札德置身於廣大群眾湧聚的禮拜集會中，他曾經說道：「這不是個宗教的場合，這是個政治的場合。」

作為一名遭到迫害的共產黨員父親的共產黨員之子，貝札德對於伊斯蘭教義中的團結，自有其獨到的解讀方式，也以他自己的看法，解析什葉派的勝利與憤世嫉俗；他也了解，一波革命可以推波助瀾地引發令一波革命。而這些穿著切·格拉瓦裝的伊斯蘭革命分子，確實也將他們自己視為二十世紀末期的革命分子。

什葉派信仰在伊朗，一千三百年以來，嚴謹奉守著阿里（其人於俗世應享的至尊大位屢遭僭越，稍後又死於非命，其子同樣也遭到奸人殺害）已然失落的正當性，這種信仰是專屬於遭到侮辱與傷害的人民的。「世間畜牲只有獵吠獒犬與可厭野獸。牲畜彼此嚎叫，強噬弱，大欺小。彼等率皆役畜，某些受人馴服，某些猶逍遙野外。」這是從《阿里箴言集》摘錄出來的一小段話，這本書是一位居住在巴基斯坦拉瓦平第的溫和醫師送給我作紀念的。這本書是他汲取慰藉的來源，而他以為，我同樣也可以在這本書中獲得寬釋。

不公不義、人性之邪惡、塵世凡俗之了無價值、雪恥復仇的一刻即將到臨，浸浴在「團結」當中的喜悅。貝札德雖然信服共產主義，可是什葉派的激情卻與他的熱忱近似。八月時，貝札德就像個什葉派信徒一樣，同樣不斷拾掇他自己眼中的不公不義：何梅尼的革命轉而壓制這群左派人士。

我們結伴同往德黑蘭以南一百哩外的聖城科姆，遇到幾位伊斯蘭神學學者；我們也曾經與革命時期，本著伊斯蘭律典判案的法官阿亞圖拉哈爾哈里見過面。我們開車穿越沙漠，返回德黑蘭的回程，車上的收音機播送出新聞：當局下令關閉一份貝札德每日必讀的左派報紙《阿言迪更》，報社辦公室也由革命衛隊進駐占據。

稍後，我們又去到遠在伊朗東北部、緊鄰著阿富汗邊境的另一座聖城麥什德。回程，我們跟貝札德的女朋友一同搭乘火車回到德黑蘭。她同樣也心繫共產主義，是個舊日大地主家庭出身的女兒。旅途當中，她曾經矜誇地翻閱一些當地共產黨發行的宣傳小冊子。接著，她就跟貝札德玩起撲克牌，一直玩到革命衛隊敲門進入我們的車廂，警告他倆齋月期間禁止玩牌，當天尤其特別，這是悼念阿里的大日子，玩牌更屬褻瀆之至。革命衛士離開之後，貝札德怒不可遏，他可不認為那個革命衛士也是人民中的一員，他將他視為統治階級的爪牙。

而他回到德黑蘭之後，等待處理的麻煩更多。革命衛隊襲擊了貝札德所屬的共產黨總部。稍後，我也見識到類似畫面：沙包、機槍、年輕人、伊斯蘭革命分子、身著游擊隊服裝穿梭在繁忙街道一側；另

外一邊路上，遭到驅逐、手無寸鐵的左翼分子，穿得跟學生或都市建築工人一樣，只是等著、守著。那天下午，貝札德自己也加入守候的行列。

長久停留在我心中、隨著我接續旅程的景象，則是貝札德與他的女朋友步出從麥什德開出的夜車，一同走上德黑蘭火車站月台的一景。女孩的朋友們早在火車站裡等著接她，而她與貝札德兩人走在我前面。他高挑、修長，滑雪與登山練就了運動員般的體格；她則嬌小，一腳不良於行，一側的臀部還萎縮了。她是個大膽衝撞禁忌的女孩，臉上不蒙面紗，有意無意間還將共產黨的宣傳小冊子封面朝上的擱在坐墊上，這樣子，不論是誰經過車廂走道時，都可以清楚看到小冊子黃色封面上的紅色鐮刀與榔頭。他則是個保護者，兩人同行時，他還會微微地向她那一方傾身，有她同伴，他顯然異常歡喜，然而與他相處，她卻缺乏愉悅感。

貝札德搬家了，而且這個時候他正忙著準備考試。我好不容易跟他接通電話，我問他最近好不好。他諳悉我關懷的焦點，直接跟我說：「你放心，什麼事都沒發生在我身上。」

翌日，距離他那場為時六小時的大考只剩下兩天，他來到我的旅館接我，帶我到 he 與一個朋友合租的公寓。我記憶中的貝札德是個大男孩，在火車廂裡咯咯傻笑，跟女朋友反覆玩著極為單調的牌戲。可是，跟我在旅館大廳裡見面的貝札德，卻是個成熟男人了，嚴肅持重。他穿了一件夾克外套，而我還記得八月時，他跟我說，他連一件外套也沒有。他的頭髮也比先前要長、要茂密多了。

「貝札德，你把頭髮燙捲了嗎？」

「我頭髮一直都是這個樣子啊。」

「你看起來老了。」

「我二十五歲，也不年輕了。」

我們步出旅館，走向伊斯蘭共和國大道。

我說道：「旅館裡的工作人員似乎比以前開心多了。」

「每個人都逐漸了解到，日子還是會繼續下去的。」

「我覺得他們已經習慣不受管束的自由了。」

「或許吧，他們享受到自由。可是，像我們這樣的人卻沒有自由可言。我們還需要再發動一場革命。」我們穿越馬路，貝札德跟在八月時一樣，再度領著我通過車流，然後我們在路邊等著定線計程車到來。車上還有空位的計程車一輛輛駛來，等到貝札德向司機說明過我們要去什麼地方之後，隨即絕塵而去，留下我們獨立暢飲西北風。天候冷冽，我身上沒穿套頭毛衣，也沒有大衣禦寒，我們就這樣站在路上，距離川流車潮只有兩、三呎的近距離。我們背後就是德黑蘭市的一條深水溝，溝裡現在流動著泥濘的污水。

我說道：「我們還是先回去，搭乘旅館的車子去你家吧。」

他說：「我們住在德黑蘭的人都這樣搭車往返的。我們一定招得到計程車。」

等了半天，終於有一輛橘色的計程車停了下來。一個穿著一身黑衣的胖女人，原本等在距離我們幾呎的前方，現在也移步趨近，準備搭車。

我說：「我們該怎麼坐進車子裡呢？」

「我會坐她身邊的。」

計程車終於開動時，我問道：「你女朋友還好嗎？」

「她已經不再是我的女朋友了。你離開後沒多久，我們就分手了。後來我只跟她見過一次面。」

「從麥什德回來以後嗎？」

「自從我不再跟她見面以後。我聽說她已經有新的男朋友了。」

「可是你們究竟是為了什麼原因分手？發生了什麼事情嗎？」

「那是我的決定。主要是性格問題，我們個性不合。」

我們陷在德黑蘭近晚時分的車陣中。街上店家燈火通明，閃耀著大都會的璀璨光華。八年前，我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德黑蘭跟這個城市略有幾分近似，同樣在交通顛峰時間，有個阿根廷人語氣中不乏酸楚地對我說道：「你說不定還會以為我們是個已開發國家呢。」而今，我坐在貝札德身邊，心中反芻思索著這幾個字眼，感受貝札德近來蒙上的沉重陰影，試著以他的眼光重新審視這個城市。

隔了半晌，他開口說道：「可是，我還是愛著她，我還是會想她。」

「你經常會想起她嗎？每天都想？還是偶爾一個星期想一次？」

「我只要心裡一空下來就會想起她。現在我事情好多，可是還是會想她。」

我們在菲勒斯坦街下車，菲勒斯坦，也就是巴勒斯坦，這條街道因為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將辦公室設在這裡而得名。街道不若來時路上光亮，也比較僻靜，兩旁遍植著懸鈴木路樹。

我說：「你所謂的兩人個性不合，跟你們的政治意見有關嗎？」

「那也是其中之一啦。我想要開始組織一些政治活動，她卻不以為然。她覺得我們應該繼續我們當時的抗爭，抓住一切機會，盡可能的對抗當今政權。」

「跟游擊隊作戰一樣？製造效果，鬧得越大越好嗎？」

「差不多。」

這倒挺切合她身分的。她是地主的女兒，同時也是個革命分子；一個受過教育的女人，生長在穆斯林國家。這個女人背後受到多種原因的驅策，必定要誇大她的主張；她想要嗜血尋釁，一點也不介意撩起戰火。

貝札德說道：「可是我們之間會決裂，不是因為政治理念不合。政治理念方面，我們其實沒有什麼差異。只是我們性格不合而已，你應該可以了解的。」

我們先拐進一條側街，再轉到一條小巷子裡。這是個充斥著低矮建築的地區，車子直接停靠在樓房外邊。街燈疏疏落落，公寓窗簾深掩，半點不透光線，這條街寂靜而晦暗。

黑暗中，貝札德意味深長地說：「我恐怕自己沒法子完成學業了。要是我現在找得到工作的話，我一定早就放棄了。可是問題就在於，哪裡會有工作啊。」

「你這個學位已經念幾年了？」

「五年了。」

「你還要再念幾年才能修業完成？」

「一年。」

「而你現在想要半途而廢？一年快得很，一下子就過去了。」

「可是就算是我畢業了，還是找不到工作啊。」

「就業情況不會永遠像這樣子的。將來不管發生什麼事情，不管你發動了什麼政治活動，你最好還是要能夠掌握特定的科學技能。」

「你說得對，不然，前面的五年不就都白費了。」

這碼子事，他好像已經反覆琢磨了千百次。

我們來到貝札德的公寓門口。他的房間在樓上，照明明亮，窗簾開敞，還傳出熱門音樂的聲響。

「貝札德，我們現在算是在哪個區域？中產階級住宅區嗎？」

「不，不，我們現在正好在德黑蘭中心。這是上層階級的住宅區。你說奇怪不奇怪？我竟然住在上層階級的房子裡。」

（只是，真有什麼奇怪的嗎？鄉村教師一手調養長大的革命之子，就讀於首都的大學；女朋友，或是前任女朋友出身地主世家；他不斷擴大自己的交際圈子，又跟異國有所接觸。倘若貝札德想要與自己

平起平坐的人往來的話，除了現在這個方向之外，他還有其他路線可以選擇嗎？)

他住在上層階級住宅區裡，可是租來的公寓卻說不上裝潢，看起來就像是兩個光棍分租兩間雅房一樣。公寓中央的起居間儘管也有家具擺設，卻隱隱暗示空間有待補足；公寓一邊是一間臥室，只是一間放了張床鋪的房間；廚房就在另外一邊。公寓一角立著一張桌子，桌面攤滿了貝札德的書和講義，書桌旁邊一只小書櫃，塞滿了大部頭的教科書及字典。房裡並不溫暖。

貝札德進到廚房裡沏茶，他的語音從廚房裡傳出來，高聲說道：「最近才發生過一次罷工，結果我們就沒有暖氣用油可以取暖了。住在伊朗竟然沒油。昨天一整天，整整二十四小時，我們都沒有暖氣。直到現在才恢復供應。」

可是，電暖爐還是冰冰涼涼的。我們在巷子裡聽到的音樂，似乎是從樓上直接播放的，音量之大，震耳欲聾。

貝札德說道：「樓上是一對離了婚的夫妻，他們每天晚上都找朋友來狂歡。」

「一對離了婚的夫妻？」

「他們起先是結了婚，後來離婚了。然後他們又住在一起，現在他們每天晚上都會開派對。我住在他們樓下，實在很難專心念書。」他從廚房裡走了出來說道：「最近這幾個月，我都忙得不可開交。發生好多事情，我只是在一邊觀察思考，什麼也不插手。我不想攪和進去。」

「你的意思是說政治活動嗎？」

「到處亂得一塌糊塗。我花了好多時間前思後想，想理出個頭緒來。你是無法管那些事情叫做政治活動的。你要搞政治活動，一定要有個方向。你也知道，自從伊朗國王下台以後，這裡什麼也沒變。工人和貧民階級的生活條件還是跟以前一樣糟糕，政府一點也沒有幫他們改善生活的措施。所以，這是本世紀伊朗人民第三次被嚴重傷害。我每天想來想去的，就是在想這些。有時候，想這些事情還害得我都

沒辦法專心念書了。七十年前，我們一心想剷除卡筭王朝²。結果，我們也制定了一部憲法，可是卻束諸高閣，從來不曾施行過。我們的第一次就是那樣子被打垮的。第二次就在一九五三年，當時我們想要逼迫巴勒維下台，取代卡筭王朝的就是巴勒維王朝。可是，美國人搞鬼，鬧了個軍事政變，壞了所有的事情³。現在，第三次了，結果怎樣你也看出來了。經過了一場革命，可是什麼也沒改變。何梅尼只是個小資產階級。他們準備要重新推動整個系統，而且他們打算就叫這個系統伊斯蘭。就是那樣子了。」

我感覺到，這同樣也是在他心裡鋪陳推演過不知千百回的思維。

我說：「你這樣講何梅尼倒是挺新鮮的。」

2 十八世紀後期，伊朗東北部的土庫曼人卡筭部落統一了伊朗，建立了卡筭王朝(Qajar Dynasty)，不但掌控伊朗本土，勢力範圍還包括了喬治亞與亞美尼亞。卡筭王朝第四任國王納薩爾·奧丁(Nasir od-Din)任內曾經積極致力於伊朗國家之現代化，利用英國與帝俄之間的相互猜忌，維持穩定局面，卻於一八九六年遭到狂熱分子暗殺身亡。納薩爾·奧丁的兒子莫札爾·奧丁(Mozaffar od-Din Shah)繼位，莫札爾缺乏其父的治國長才，性情軟弱，被迫在一九〇六年頒訂伊朗歷史上第一部憲法，裁減了君王的部分權限。其子穆罕默德·阿里(Mohammad Ali Shah)繼位，受到蘇俄的教唆，企圖廢止這部憲法，撤銷代議政體，引起民間極大反彈，在一九〇九年遭到罷黜。

3 英國情治單位原本計畫在一九五二年策動軍事政變，企圖推翻伊朗的民選總理莫薩迪夫(Mohammed Mossadegh)，鞏固伊朗國王的統治地位。美國杜魯門政權並未接受提議，但是繼任總統艾森豪出於冷戰思維，為了防堵伊朗傾向共產主義，同意與英方合作。中情局日後流出的文件中指出，美國探員直接與保皇派的伊朗軍官合作，發動軍事政變，挑選繼任的傀儡總理，派遣特使川流不息地前往伊朗探訪巴勒維二世，為之加油打氣；收買伊朗平民，偽裝成共產黨員，四出栽置炸彈，製造社會紛擾。此外，中情局還在伊朗報章雜誌上刊載新聞評論與漫畫，譴責共產黨的暴力行徑，要求莫薩迪夫下台。然而，資料中也顯示，政變猶如臨門一腳時，中情局卻無法繼續控制局勢，伊朗軍官自做主張，糾集了大批部隊示威，一夜之間，首相下野，美國探員也急著逃離伊朗。這場政變成五〇年代期間，中情局瓦解開發中國家政權的樣板，也進一步加深伊朗國王對西方世界的依賴與順從，埋下一九七九年何梅尼革命與伊朗學生襲擊美國大使館的遠因；更不消說，伊朗民眾對美國政府的反感。

「他過著兩種生活。當初是他領導革命對抗伊朗國王的。這一點沒錯，我們也絕對不能否認他在這方面的功績。美國派駐伊朗的記者當中，沒有任何一個人真的摸得清何梅尼，他之所以偉大，是因為他領導了革命。可是，他在革命之前與革命之後，卻過著兩種生活。」

「水壺裡的水開了。」廚房裡響起呼嚕呼嚕的聲音。

「水還沒燒開。我知道這把水壺的。水真的燒開時會發出另外一種聲音。伊朗，還有那些跟伊朗差不多的國家裡，主要有三種階級：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普羅大眾。碰到剷除資產階級的革命，小資產階級就會起來參加鬥爭，成為革命分子。可是真到了國家體系即開始改變時，這個小資產階級又會倒過頭來抗拒革命。何梅尼就屬於這個階級。因為他根本沒辦法接受社會主義，所以，他永遠只能做個小資產階級而已。」

「可是，貝札德，以前你對何梅尼的看法不是這樣子的吧？過去，當何梅尼痛斥暴政、鼓吹同志互助與平等的時候，難道你不知道，他是為伊斯蘭教發聲的嗎？伊斯蘭教也可以引伸為某種政治的意識型態，難道你不曉得嗎？」

「每個人都可以用許多不同的方式，講他們想講的話。而小資產階級也可以說，『我們是穆斯林。伊斯蘭教是不贊成社會主義的。』」

「難道你不該怪自己會錯意嗎？我們在八月一起去參加塔立卡尼的禮拜聚會時，你說那是個政治場合，我卻不以為然。」

「或許，現在我的看法也改變了吧。可是當時我會那麼講，只是因為全世界的宗教都已經逐漸凋零、行將就木了。有許多人拚命要替宗教苟延一口氣，可是那是沒辦法的。就連美國人都打算讓宗教活下去，美國人還跑來跟我們談什麼阿拉的。可是，那都是沒有用的。」

他終於判定水壺裡的水確實燒開了，我也跟著他一同走進單身漢雜亂無章的小廚房裡。他沏好茶之

後，就拿水壺當俄國人傳統中的銅製暖壺用，他將水壺蓋倒轉，再將泡茶的茶壺放在上面保暖。走在伊朗，時時可以看到他們如此接近俄國生活的痕跡。

我們將熱茶斟在玻璃杯裡飲用⁴。

貝札德說道：「現在，我們一點自由也沒有了。」他指的是他那群共黨同志，「八月的時候，他們先是關閉了我們的報紙。你還記得我們從科姆開車回來的路上，車子裡的收音機正播出這條新聞嗎？接著，他們又占據了我們的總部。你還記得我們一塊兒從麥什德回來的那天早上嗎？我的女朋友——我以前的女朋友——有些朋友到車站去接她，他們跟她講了那個消息，就帶著她走了。那天下午，我也去參加了抗議政府襲擊我們總部的示威活動。」

「我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替你擔心的。」

「那次示威維持了三天。第三天，他們召集了一場公共示威來反制我們。他們那場示威規模很大，聲勢很壯觀，我們根本不是對手。他們就這樣驅散了我們。現在，我們什麼也不能做。」

「可是你們大學外面的書攤上，還是堆了很多宣揚共產主義的書，好像也沒人去管制他們。而且，多少電影院都在上演蘇聯出品的電影。」

「販賣共產主義的書根本不算什麼。你愛看多少，愛寫多少，都沒人管你。可是，你要想化理念為力量，做點什麼事情的話，他們是不會允許的。他們把我們攆出我們在德黑蘭的總部之後兩個月，庫吉斯坦就出了大狀況。你有沒有看到相關報導？何梅尼上電視公開聲明，政府的軍隊會盡一切力量，打垮當地居民搞的運動。他們派出坦克、直升機、一〇六毫米口徑加農炮，殺了至少五百人。結果呢，何梅尼說他搞錯了，有人害他誤判情勢，提供該事件不正確的資訊給他。你知道那裡處決了多少人嗎？你要

不要我拿新聞照片給你看？」

「謝了，不看也罷。我在伊朗實在看過太多這種血腥照片了。」

他充耳不聞，起身走到臥室去——樓上的熱門音樂逐漸隱沒消聲——回來的時候，手上拿了兩張照片和一本影印的波斯文小冊子。照片畫面倒不如我原先憂懼的恐怖驚悚。其實，這兩張照片我以前就看過了，這是官方公布的照片：十個蒙上眼罩的男人等候被處決，負責行刑的革命衛隊就站在他們身後幾呎不到的地方。這一幕曾經被拍下了兩張照片，一張從右邊取角，正對著即將受死的人犯，另外一張則從左邊取角。第二張照片中，一個已經身亡的男人橫躺在地上；離屍體幾呎之處蹲著一個革命衛士，還端著方才瞄準過靶心的槍枝：這是個立場鮮明的姿勢，對這一場殺戮絲毫沒有惻隱之心。同樣矯揉造作的是那張十人蒙眼、準備受刑的照片，畫面右邊一個受刑人昂首挺胸，將下巴抬高。面對槍決，這倒是個絕佳的赴死之道。可是，這樣死又有什麼意義？難道他的目標已經達成了嗎？

貝札德說道：「你在相片上看到的這些人，都是左派分子。有些人遭到逮捕之後，四個小時內就槍決了。何梅尼派了哈爾哈里進駐，他把每個人都抓了起來。」

法官哈爾哈里，也是革命的劊子手。這個快活矮胖的赤腳貧農，出身亞塞拜然，對自己從來不曾有任何懷疑。這人從小牧羊（卻從來不覺得自己貧窮），一路攀升到權力顛峰，伊朗國王的總理哈維達也是他殺的。

我說：「去年八月你跟我說，哈爾哈里不過是個小丑，一點實權也沒有。」不過那是去年八月的事了，當時貝札德對於革命後續走向如何的看法，跟現在也有所出入了。

「我當時看走眼了。你還記得他跟你說，他還保留著槍斃了哈維達的那把槍嗎？你知道究竟是誰殺了哈維達的嗎？那是個毛拉下的手，某個留著鬍子、圍著頭巾的人。那人很年輕，不過三十出頭，現在他已經很有名氣了。」

這兩張處決的照片算是官方檔案，可是貝札德所保留的那兩張翻拍，卻有如神聖的證明文件，或許有朝一日，還將收錄在未來的伊朗革命與殉教烈士寫真集裡。官方照片中，這十位蒙眼準備槍決的人，各個都是無名氏，只是一群叛亂分子罷了。可是貝札德手上的照片，每個蒙眼人犯上方都標了個阿拉伯數字，他們都是有名有姓、有頭有臉的人，他們都是中產階級的城市居民。此外，雖然貝札德沒有告訴我，他們（稍後我從其他管道探聽得知）與貝札德都屬於同一個共產團體，只是彼此派系不同，這十人的派系比較傾向游擊戰鬥，並且與許多少數民族運動進行串聯。該派系的幾位領導幹部已經遁入地下，隱匿行事；其中一位領導同志還是位女性。

朋友喪命，而貝札德在跟女朋友分手之後，留在德黑蘭繼續學業，盡力賺取生活所需的費用。自從去年十月以來，貝札德不斷地苦惱著，厭恨自己竟然潛伏靜止了這一大段時日。

他指著波斯文寫就的小冊子說：「現在，伊朗境內總共收押了一萬五千名政治犯。我告訴你，印行和販賣共產主義書刊根本算不了什麼。」

窩在這個冷冽的公寓裡啜飲熱茶，實在窩心。他再進到廚房，又給自己斟了一杯茶。他往茶湯裡丟了一顆方糖，再攪和個幾下。

我說：「你不會把糖含在嘴裡，再張嘴喝熱茶，讓茶汁通過糖砂嗎？」

他微笑說道：「偶爾偶爾。」

「你女朋友在知性上是個怎樣的人呢？」

他停頓了半晌。看樣子，他並沒搞懂我在問些什麼。可是他還是勉強回答道：「她還好。我們都還好，每個方面說來都還好。就跟我對你講的一樣，我們只是性格不合而已。」

「你跟我說過，她的家人都是非常虔誠的穆斯林。」

「只有她哥哥才那樣。他跟我處不來。他是個做生意的。不過，他一點也不討厭我。他只是覺得我

挺無聊的，整天只曉得關心政治。」他的臉龐開朗了些，微微笑著，「她父親倒是喜歡我。我想，其實我非常喜歡我。」

他指著我們中間一張矮桌上的小書說道：「你還記得我們談過這個嗎？」

那本波斯文寫的小書，封面上印著一張史達林的肖像，扉頁上還以俄羅斯寫實主義的手法，再以鉛筆描繪了一張史達林畫像。我曾經看過這本小書，只是沒興趣翻閱。這本小冊子和大學校園對面革命大道上販賣的許多書籍與小冊子，委實太過相似了。

我說：「這書是在哪裡印刷的？」

「泰柏里茲。」那是遠在西北方亞塞拜然境內的城市⁵。

「你現在對他的觀感怎樣？」

「我愛他！」貝札德說道，「只要我讀到他的東西越多，我就越愛他。他稱得上是全世界數一數二、最偉大的革命家了。你聽說過他在戰爭起始期間所發表的演說嗎？」

「一九三九年的演講，還是四二年的？」

「德軍入侵蘇聯的那一仗。」

「那就是一九四二年了。」

「就是『祖國在呼喚……』那一篇，你沒聽說過他那篇演講嗎？」

「你為什麼會說他是全世界最偉大的革命家呢？」

「因為他在蘇俄架構了社會主義。那是獨步全球、首開先例的社會主義革命，也是人類史上最偉大的轉捩點。或許他也犯了一些錯誤，可是我敢說，他是最能夠勝任他所肩負的使命的人了。他在蘇聯所做的一切，正是我們在伊朗應該效法施行的。同樣的，我們也該殺掉許多許多人，一大堆人。」他臉上逐漸浮現微笑，彷彿他還會擔心我或許會以為他失心瘋，語無倫次，受困於現況的無助，夢想著如此巨大

大浩瀚的工程。「我們非得殺光所有的資產階級不可。所有統治階級上的資產分子。」而他的微笑，就像他提起他前任女朋友的父親如何中意他一樣。

他無法陪我走到伊斯蘭共和國大道，跟我一起等候定線計程車，再送我上車。他得待在家裡看書。他撥電話幫我叫了一輛計程車過來。

他說：「明天，我有個朋友要開舞會，我知道我以前的女朋友會去。準備要開派對的那個人打電話給我，要我也去。我說，『可是你知道我已經跟我女朋友分手了。』她說，『就是這樣，我才一定要你也來呀。』你說，這算什麼啊？」

我讓他重新專注在他的書本與講義上。他用細緻的波斯文寫著數學作業，筆跡工整的波斯文字，夾雜著西方（抑或是阿拉伯、或是印度）數字。他有許多教科書都是美國輸出的。他接受了多少文明的灌輸，這許多文明匯入，造就他現在的人格與思想。可是現在，就在他知性生活的開端上，他就像他自己所反對抗爭的穆斯林一樣，將自己切斷隔離在文明啟蒙之外。

貝札德，還有其他伊朗學生，以及根據統計放洋在外、人數高達三十萬的伊朗留學生，其實都是伊朗國王所孕育的孩子，巴勒維國王辛勤灌注、為國家培育的第一代智慧果實。可是他們過於青澀，過於粗糙，缺乏知性傳統以資憑藉。他們人數太多，不論是他們自己，或是這個國家，都窮於應付。

解放後的街景

德黑蘭皇家希爾頓大飯店 (Royal Tehran Hotel) 聳峙在德黑蘭市區北端，地上還堆著積雪，現在改

名為國際德黑蘭希爾頓大飯店（Tebran Hilton International）。去年八月，這家飯店只是不再頂著皇家榮銜而已。東方字體寫成的「皇家」兩字——已經從車道上的招牌以及飯店入口的大理石圍牆上拆卸下來；可是不論是車道看板還是飯店圍牆上，還是留下了一道欲掩彌彰的鬼影痕跡。現在情況可就改觀了。飯店入口處的大理石牆已經粉刷一新，填補上新的飯店名稱；至於車道上的白色看板，冬雨綿綿，早已將舊名稱下方的積塵暗影清洗潔淨。

飯店現在起用了一套新的大寫花押字圖案。可是，T H I 三個大寫字母疊在一起，形狀如此近似舊的 R T H，我費了半天功夫才端詳出來，原來咖啡廳供應的紙餐巾上的花押字體依舊是 R T H。這些紙巾一定是當年積留的大量庫存，就跟現在的伊朗通貨一樣，雖然改朝換代，大部分不同面額的紙鈔上還是印著伊朗國王的頭像。

去年八月，希爾頓有如鬼城，現在業務顯然已經回春了。飯店還標榜著一小時的快洗服務。我交付了一件待洗襯衫，半個小時後就可以到飯店的咖啡廳（桌上的杯盤碗盞還是羅森泰（Rosenthal）出品的盜器）取回，襯衫不但洗淨、熨整，還整整齊齊的包裝起來。

貝札德曾經跟我說過，自從一群學生占據了一家頗為知名的飯店之後，德黑蘭的飯店業者無不風聲鶴唳。過去不斷抱怨空房率過高的人，開始四下打轉，裝出一副窮忙的樣子，一到晚上就點亮空房裡的照明設備，正如我自己投宿的那間旅館，大致上就是要營造出局勢無礙生意，他們業務蒸蒸日上。的表相。

可是，像是希爾頓這樣的飯店，還是湧進了住房客人。光顧這些飯店生意的，絕大多數是飛到伊朗來採訪美國大使館挾持事件的新聞記者與電視攝影人員，美國各大新聞網出動的機組人員尤其壯觀。這種場面實在離奇：美國人在這個城市某處遭到挾持，作為人質；同樣一個城市的另一個地方，卻張開雙臂極力歡迎美國人蒞臨。而且受到歡迎的不單是美國人而已，日本、法國、英國與西班牙各大媒體的特派員，同樣穿梭在德黑蘭各個角落。他們其中有些人，例如替報社撰寫新聞稿的人員，被挾持事件後

的僵持，還有什麼看頭可言呢？

續發展釘住了，不得動彈。電視新聞的製作單位每每出動，總少不了各式攝影器材與隨從助理，看來比他們所報導的新聞還精采。就好比有一天我在洲際飯店前面，湊巧碰到一名法國記者對著攝影機侃侃而談，當時，我剛在餐廳裡用過自助午餐，走出飯店就撞見這一幕場景，感覺實在是無厘頭而不搭軋。

美國大使館遭到攻擊，以及被深鎖在圍牆裡的人質，這場好戲是你絕對無法錯過、想避都避不掉的。開車過去只有一小段路程，受僱駕駛的司機似乎隨時準備載你過去觀賞。而且就像某些過於知名的觀光勝地一樣，第一次前往參觀，感覺還挺差級的。熱門熟道的老先覺根本就過門不入了；經過三個月

的僵持，還有什麼看頭可言呢？

一道紅磚長牆，牆後就是低矮的美國大使館建築，襯托在積雪皚皚的群峰層巒之前。從德黑蘭市北端的此處看過去，山色清晰，輪廓明顯，沒有塵霾與高樓大廈阻障視線。大使館周圍那道長牆上，塗滿了各式波斯文與英文標語，書寫著標語的棉布條幅更掛得滿坑滿谷，標語高懸三個多月後，都已經沾污灰黃了。人行道上用繩子圍了起來，標示著禁止進入，繩索圍繞過一棵樹幹，再拉長繞過下一棵路樹。每個門口都有全副武裝的年輕人站崗，身上穿著卡其長褲、黑色皮靴與車棉的卡其夾克。大使館主要出入口的大門之外，鋼管鷹架就取代了人行道上的繩索。擺置鋼管鷹架的用意，似乎控制群眾的考量還多於安全顧慮。

我去的第一天，夕陽無限好，時值昏禮，大使館門口聚集了一小群示威群眾，群眾眾口一聲，有如他們在清真寺裡聽從毛拉的領導，吟詠著回應的禱詞；而他們的回應混雜著許多收音機的呼聲，收音機裡正播放提醒虔誠信徒即時禮拜的喚拜聲。寒冷的天空，近晚的雲層迅速堆積，黃昏霞光落在積雪的山頭上。示威跟著收音機播放的昏禮同步結束，抗議群眾開始飲茶話家常。

除了政府公營的手工藝品店之外，大使館對面街道上的商家似乎都關門大吉了，有些窗戶還從室內塗上灰泥或油漆，讓人無法窺探。說來奇怪的是，政府的手工藝品店卻還舉辦了為期一週的降價特賣活

動。這一邊的人行道上洋溢著一股園遊賽會的氣氛，甚至連馬路邊都被占用了，有書攤、小吃攤（多半是賣些甜麵包），還有飲茶攤子（茶袋浸泡在一杯玻璃杯裝盛的滾燙開水裡）。

越過主要出口前面的鷹架，大使館圍牆上還懸掛了許多幅蒙上透明塑膠布保護的攝影作品，相片的主題全都是革命與暴行：越南、非洲、尼加拉瓜等。這些穆斯林學生顯然想將二十世紀末期的諸多動盪肇因，附會在他們自己的正當性之上。圍牆角落裡堆著沙包，學生堵住了緊鄰著大使館街區的巷道，還有人駐守。

穿過巷道，又有一處書攤，接著一個展售畫報的攤子，再度陳列著淚光晶瑩之美，無法解釋的盈盈淚珠，滴落在美女和稚童純真的臉龐。然而，那一層波斯人專屬的濫情善感，什葉派憤世嫉俗的另一面表現，而今都轉而為革命效力；其中一幀畫作全以棕色調處理，畫著一個衣衫襤褸、嚎啕哭泣的小孩，淚水模糊了他的雙眼，小孩的襯衫袖口磨破了，外套手肘部分也穿洞了，伸出一隻小手，按住何梅尼的肩頭。而何梅尼緊蹙眉頭，眼神似乎掠過那個小孩，望向遠方；他就像是個冥想策畫復仇步驟的人。那是一幀強而有力的作品。夜幕低垂之際，天也即將全黑，一個裹著黑色頭巾的中年婦女，眼神無意間帶到這幅畫上，楞了一下，舉手安在她左胸上壓驚。

那天晚上，何梅尼心臟病突發，電視新聞播出他在德黑蘭醫院病房內休息的畫面後（攝影畫面長達五分鐘，卻不帶任何旁白與評論），隨即結束當天的各項節目。何梅尼坐在一張安樂椅上，雙腿雙腳都裹在一條黃色的毛毯下。攝影機緩緩地先聚焦在何梅尼身上，鏡頭再從病人帶到病床，再帶過病房裡樸實無華的裝潢，再回到病人身上。攝影機鏡頭一度還膠著在他左手上；手指修長，對於一個八十高齡的人來說，他手部的肌膚異常平滑。他的小指頭曾經微微地翹起過一兩次，接著又平復下去，或許只是無意識的反射動作吧。除此之外，五分鐘的鏡頭中，他別無其他動作，臉上一絲情緒反應也沒有。他不再是個尋思復仇的人了，他是個已經完成了使命的人。此外，從入鏡到出鏡，背景音樂裡的一團男聲合唱

團，自始至終反覆吟唱著八個字：「何梅尼就是伊瑪目！何梅尼就是伊瑪目！」駕臨萬萬人之上的統治者，代表了隱居遁世的第十二順位伊瑪目，也就是真主的攝政人。

我二度步行經過美國大使館時，那裡聚集了一小群民眾，可是沒有示威活動。大使館大門不遠處，學生搭起一頂綠色帳棚，一個年輕男人和一個年輕女人穿著車棉的軍裝，正在義賣許多四色海報；伊朗人民的雙手，緊緊扼住卡特總統的脖子，總統的嘴巴張得老開，半吐出一個小號的巴勒維，巴勒維冒出卡特總統的嘴巴，上身前傾，懸空雙手各握著一個裝滿現金的錢袋。

一個高頭大馬的外國攝影師，穿著一件棕色的皮夾克，肩上架著他的攝影機，杵在大門口跟一名衛兵絮絮交涉不休，顯然是在拜託衛兵讓他進去拍些獨家照片。大門開了，卻只是放另外一名衛兵進入而已。沒有戲劇效果，除此之外，再也沒有什麼看頭了。

稍後，在我踱步回到旅館的路上，革命大道再往下一個街口，走到一度優雅的商店街區，這裡曾經是伊朗國王在德黑蘭北部擊建的中產階級大都會的一部分，一個小男孩坐在人行道上，不遠處，堆著一袋袋包裹著店家垃圾的塑膠袋。他利用塑膠袋裡的垃圾，就地在人行道中央生起一把火。

火苗新起，火星和燃燒的紙片隨風揚起，飛沾到過往路人身上。那個男孩年紀約莫十歲上下，直著腰桿，坐在他放的這把火邊上。不過，他生火不是為了取暖。小男孩滿臉憤恨，不住地撕扯著他的襯衫；他腰部以上已經打起赤膊了。天氣非常寒冷，朔風野大。男孩幾乎是坐在這把火當中，身邊還放著兩盒火柴，他只是不斷地撕扯。他一雙沒穿鞋的赤腳骯髒污黑，臉龐也污穢不堪。路人停下腳步，向他探問；他眼神抬望，柔潤精巧的臉上，一雙眼睛眨也不眨地凝視著，接著又回頭去扯爛他的襯衫，駐足探問的行人也就移步離去了。一個顯然已經心智受損的人，從人行道上的群眾中鑽了出來，繞著男孩和那堆火打轉，兩手空懸著，大嘴翕張著，踉踉蹌蹌，手腳不協調的繞圈子走著。

交通尖峰時段，人潮來往的繁忙大道旁，突兀地生起一把火。這是個極度苦惱無助的景象，可是卻

沒有人能夠應付。孩童珠淚漣漣只有在畫報裡才美得讓人心疼。人行道上這個孩子的歇斯底里，已經延伸擴及崩潰邊緣，或許正適足以表達許多疾步前行的路人的心境。這一幕委實太過驚駭懾人了。

我同樣也為之驚駭莫名。然而，語言不通，我甚至無法跟某些路人一樣，在男孩剛開始生火時，停下腳步跟他談話。我只有沿著革命大道快步行走，轉下海飛茲大道，避開十字路口的車潮（交會路口的這兩條街道，一條原名為法蘭西街，現在已經改標為「諾福雷堡」(Neauphle-le-Chateau)，以茲紀念何梅尼於流放法國期間，客居遙控革命的城鎮)；我走過蘇聯大使館長長的磚牆（建得就像一座水塔裝置在一棟現代化的公寓建築上，使館區裡進駐了十九世紀的諸多強權，英國、蘇聯、法國與土耳其等，占用了德黑蘭市中心大片土地)；最後，經過精品店、打字機店、法國書店與陳列了大量電子商品的電器用品店（一個小女孩裹著花色斑斕的四角棉布，手上捧著一小盒口香糖，坐在門口兜售），走進一座巨大的高架車行陸橋，橋面下的巨柱巍然標誌了海飛茲大道中線，道路地面大幅挖掘翻開，體無完膚。終於回到我的旅館，躲回旅館高牆之後。

倘若當時依照我的原訂計畫，假如當時生了一堆火的小男孩沒耽擱了我的腳程，我就會沿著革命大道一路走到德黑蘭大學。那樣的話，我就可以躬逢其盛，目睹當天最重大的群眾事件了。德黑蘭大學操場上聚集了六萬名穆加悉丁（Mujahidin）學生。穆加悉丁，「信仰的戰士」，雖然也是穆斯林，卻專走左翼路線，因此就像過街老鼠一樣，各方喊打。德黑蘭街頭的群眾分子，所謂的「人民」，拳腳相向地痛扁了穆加悉丁一頓，雙方人馬掄著木棍、短刀互毆，亂石飛擊，混戰了半天。塵埃落定時，共計三十九人掛彩。

我住的飯店距離群鬥現場不過幾步路的距離，卻波瀾不興，沒引起任何騷動。而且要不是那天稍晚，從一位國外特派員那裡聽來，我絕對不會知道這附近發生這樣一場風波。第二天是星期五，也是安息日，英語報紙《德黑蘭時報》照例是不會出刊的。

信徒的困境

那齣大戲——美國大使館被挾持的戲碼——將數百名記者從四面八方吸聚到德黑蘭來，卻非常諷刺地打垮了當地的英語報紙。去年八月間的《和平訊息》雜誌，其鬥志如此高昂，通篇高論著信仰之正義無敵，數落所有其他人事物的墮落邪惡，而今安在？還有《伊朗周刊》（封面字樣模仿著《新聞周刊》的字體），當時他們的辦公室如此新穎，工作人員各個都因為革命成功而略顯洋洋自得。為什麼現在要找一本《伊朗周刊》就難如登天呢？《伊朗人》（仿照《新政治家》設計）一般以為是編排得比較好的周刊，可惜我的這一本湊巧也是他們壽終正寢的最後一期。關門歇業的決定必然是倉促間定奪的，雜誌封底還強力呼籲讀者多多訂購，而開天窗的評論專欄上已經向讀者說聲珍重再見了。

每日出刊的《德黑蘭時報》也縮版了，現在只剩下單張對摺，四個版面。去年八月，《德黑蘭時報》還有八個版面，排滿了廣告與作者及宗教特稿，繽紛多彩。這份報紙曾經是一份標榜著革命與信仰的日報。他們的辦公室一度紛亂繁忙，社裡甚至還請了幾個歐洲人或是美國人幫忙（其中一個美國人，據聞是個改宗後的什葉派信徒，可遠比打小就信奉什葉派的穆斯林熱中信仰多了）。當時帕維茲先生忙著校閱稿子，我們見面晤談之時，還以為我是來跟他求職的。而且這個好人如此仁慈寬懷，他好像就打算要聘我替他們寫稿了。

現在，這種誤會就無從發生了。現在已經沒有如此繁忙的業務需要僱請幫手了。帕維茲先生桌前也不再堆滿了待校稿樣，他漫無頭緒地在近乎空曠的辦公室裡來回踱步。他不記得我了，可是他好像還是樂於見客，樂於開講相談。他轉身坐回空無一物的辦公桌後面，請我直接坐在辦公桌上。

帕維茲先生喟嘆著，情況很差啊，非常糟糕啊。自從學生攻下美國大使館，許多國外公司都趕緊撤資大吉。《德黑蘭時報》的廣告和讀者都沒了，而今報紙的發行量只有一萬三千份，他連印刷的成本都

補不回來。每天出刊一份報紙，他就得倒貼三百美金。所以星期五，報紙不得發行的日子，對他和他的同事而言，真是名符其實的安息日，可以稍微喘口氣，少虧一天。

我說：「你為什麼不暫停發行，等到時局穩定以後再出發呢？」

「不，不。我說過，只要我們停刊一天——」

他欲言又止，就讓殘句停頓。隨意災難掛口頭，難保大難不臨頭。

他今年四十九歲。去年八月，我了解到他是來自印度的伊朗人。現在業務不再緊迫，他的心情也比日前要懷舊的許多。他說，他老家在印度中部的博帕爾（Bhopal）。他的文學生涯是在那個國家開展的，起先他是個詩人，用烏爾都語寫詩，這種半巴基斯坦、半印度的語言，印度裔的穆斯林讀來備感親切。帕維茲就是他在印度那段時期所採用的筆名。到了伊朗，他在這裡歸化入籍，成為國民，就轉向投身英語新聞寫作了。革命之後，他將早期投資生意獲利的資本，一股腦兒的全都灌注在《德黑蘭時報》上了。至今，他一毛錢都還沒賺回來。「我連一個里亞爾都還沒摸到。」現在宣告停刊，投資失敗，就等於一切心血付諸流水。

「我們還會再借一些錢，想辦法再找出一點錢來，繼續撐到新年。」

伊朗人的新年，起始於每年三月的第三個星期，距離現在還有五個星期。這是個神奇的日子，也是許多德黑蘭人念念不忘的。大家都感覺到，在那樣一個美好的日子裡，情勢一定會改觀。對峙的兩造一定可以協調出什麼來，美國人質也可以釋放回家，伊朗整個國家也可以重新來過，開啟新的一頁。革命所引發的革命已經拖垮了這個國家。挾持人質的穆斯林學生現在自成一套法律體系，他們自稱為「追隨伊瑪目何梅尼路線之穆斯林學生」，可是外界看不出來，他們的首腦究竟是什麼人，他們下一步又打算要做什么。他們看什麼人都不順眼，對誰都有意見；他們利用大使館裡的文件資料，「揭發」每個人的詭詐意圖，他們同樣也「揭發」了《德黑蘭時報》。

帕維茲先生說道：「他們可能會挾持人質長達一年。」他的語音逐漸轉弱，「他們說不定也會殺害這些人質。」

他坐在椅子上，姿態相當僵硬。可是他的臉龐雖然不總是面向著我，卻因為微弱的神經牽動而隱隱顫抖：灰白的眉毛、兩眼、嘴角。他言語輕柔，語氣中卻接二連三地發出喟嘆，彷彿隨著一分一秒的流逝，他漸漸清楚醒悟到自己身陷泥淖，浩劫大難即將覆頂而來。

他說：「我們曾經想要將報紙擴增到十二個版面。我們在去年十月開過一個會，當初決定，今年元月一日開始，報紙就增張發行。結果卻發生了這樣的事情。」

面對街道的窗戶上，還是貼著海報：《德黑蘭時報》人人愛看。隨時隨地要看《德黑蘭時報》。我們竭誠為你報導。

幾張辦公桌空盪盪的桌面上，仍擺置著沒套上罩子的打字機。辦公室另一端，賈福瑞先生去年八月使用的標準式打字機還是閒置一側。當時帕維茲先生一明白我原來不過是想找人談談，就將我推給賈福瑞先生。而賈福瑞先生，即使他面前打字機上的專欄稿子才剛剛寫了一半，還是撥冗跟我談了一小段時間。

「賈福瑞先生還好嗎？」

「我不得不請他走路。我得請他們統統離開報社。我們報社以前有二十幾個人。」

賈福瑞先生跟帕維茲先生一樣，也是來自印度的什葉派信徒。之前，他還曾經先在巴基斯坦住過一段時間，再搬家到伊朗，移民到什葉派的心臟地帶。也是拜賈福瑞先生之賜，跟我解釋了一個詭異離奇的邏輯——如此離奇，一直到現在，我的旅程即將結束，我還是沒參透其中玄機——那就是伊斯蘭教復興的邏輯。在我們講到伊朗國內不公不義的冤枉事件時，賈福瑞先生曾說，他逐漸感受到，甚至在伊朗國王時期：「伊斯蘭就是解決一切的方案。」這我怎麼想也想不通。宗教上的主張，怎麼能夠挪用來解

決政治上的問題呢？為什麼不改而致力於制定公平工資和法治系統呢？為什麼光是鑽研伊斯蘭教以及提倡完整的正信呢？

可是，當下賈福瑞先生就吐露出他一世為人最深沉的渴望，他把這渴望隱藏在一開始關於政治現況的抱怨之下。他說，身為一個什葉派信徒與穆斯林，他畢生始終期望能夠見到 *Jamé Towhid*，而他把這兩個字翻譯為「信徒的社會」。

那樣的社會已經來到伊朗了：真正的伊瑪目降臨塵世，舉國歡騰狂喜，大型信眾聚禮不輟，完美的伊斯蘭教大團結。可是，這樣完滿的信眾社會並沒有導出法律、機構與體制，這些事務還是跟過去一樣遙遠而不可及。那個信眾的社會只帶來了無政府混亂、歇斯底里，以及這間空曠無物的辦公室。此時，賈福瑞先生那台曾經敲打鍵入宣揚伊斯蘭教義專欄文章的打字機，依舊沒套上罩子，斜斜地閒置在了無他物的辦公桌上。（現在，辦公室裡再也沒有跑腿小廝將一盤煎蛋送到案牘勞形的記者桌前。）打字機、現代化的辦公室、印刷機具、廣告客戶、配送系統、讀者，在在都需要一個複雜的、「物質拜金」的社會，而賈福瑞先生不自覺地正是這個社會的一員。這個複雜的社會，自有其不可違逆的強硬規範。這樣的社會，需要的不只是信仰；除了信仰以外，還需要些別的。

我對帕維茲先生說道：「賈福瑞先生現在的日子也不好過嗎？」

「他的日子確實難過。可是，大家還不都一樣。」

「他的打字機還留在這裡。」

帕維茲先生環顧辦公室四周。他的眼臉顫抖著，說話的語音沙啞刮耳：「那——那是個具有特殊意義的角落。」他緩緩地以印度人特有的方式搖頭，再度開口時，彷彿在追憶著一段非常久遠、非常甜蜜的回憶，或許是足以寫入他烏爾都詩篇的主題，他說：「以前，我們的市政版就在那裡編的。而那個房間——」意指他背後的房間，「是我們記者的辦公室。現在我們報社只剩下兩個人了。」

「現在社論是誰寫的？」

「都是我寫的。」

「那些文章都很優秀。」而且還發表在伊朗這種處處埋有地雷的社會，確實是難能可貴了。

「我無法專心寫。財務困難實在太大、太複雜了。」

「這個關卡，才是你最需要信仰的時候。」

可是這撐不了三個月。自從美國大使館遭到挾持以來，每一天都有些聲明或事件，透露一線曙光，鼓勵他正面思考，或許人質危機很快就會結束；每過一天，他的希望就挫折破滅一次。此外，他家裡也有問題。他有個兒子現在在美國念書；還好，這孩子前一陣子寫家書回來，說他錢還夠用，家裡不用急著匯錢。另外一個兒子在美國大使館遭到挾持前夕，正準備要去拿他的學生簽證。

我說：「不過，帕維茲先生，你既然是個好穆斯林，又是個優秀的什葉派信徒，你的報紙過去批評物質文明總是不遺餘力，你為什麼還要送你的小孩到美國念書呢？」

我的問題提得不是時候。他說，他已經心力交瘁了；他指的是他第二個孩子，晚了一步，結果沒拿到美國學生簽證的次子。「那是他的前途。他念的是電腦工程。去英國念的話，實在太貴了。」

這麼說來，其實他內心深處還是無法一致協調的；一方面，他全心順服信仰，信仰之外的一切人事物都是他批評反對的標靶。世界演變得越加詭譎，光怪陸離，他只想盡可能地找到自己的歸屬，緊抱不放；可是，另一方面說來，他又確認肯定外面那個世界如此卓越、傑出，也是他的兒子應當去締造前途的世界。而伊朗的伊斯蘭革命就萌發在這種心智區隔與人格撕裂之上——這方面與他們厲言抨擊伊朗國王暴虐無道、窮奢極侈是不相上下的，而革命也就停頓在這道區隔之上。

翌日，《德黑蘭時報》刊出一篇專訪，訪問某個前來伊朗觀摩的印度裔穆斯林。這位訪客說了，只要你對非穆斯林大致勾勒出伊斯蘭教的系統，他們往往都會深深嚮往著這個「包羅萬象的伊斯蘭教系

統」；可是接下來，他們總會疑惑問道：世界上有哪個穆斯林國家是真的按照這一套系統運作呢？「伊朗就是最適於回答那個重大問題的國家了，」根據《德黑蘭時報》引述這位訪客的箴言指出，「因為伊朗人民揭竿起義，發動了人類史上最為獨特與勇敢的革命運動，締造了一個由伊斯蘭教統御的國家。」

依舊陳義過高；可是，不論是在伊朗，還是世間上任何一個角落，每個人都要跟這個他們深知超越在信仰之外的世界相處。

伊斯蘭教的生命活水並不從內部湧現；伊斯蘭教的活力來自於外在的事件與環境，意即世界文明的傳播。直到二十世紀末期，伊斯蘭教才貼上一紙革命運動的標籤，重新詮釋伊斯蘭教義中諸如平等與團結的古典理念，撼動了停滯不前或是倒退的社會。只有與時並進，從二十世紀末期的架構、立法與經濟制度上尋求答案，而不是信仰。弔詭的是，趁著伊斯蘭教的復興，順勢重新崛起的伊斯蘭基本教義派，表面上一意要求信眾回顧歷史，回到過去，骨子裡卻藉由信仰先知所導引出的高昂激情，變身為現代的革命理念，還魂長存於許多穆斯林國家之中。貝札德這個共產主義者（對他而言，俄國人的革命，而非伊朗人的革命，締造了「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轉捩點」），伊斯蘭教對他的潛移默化與人格養成，遠比他所意識到的還多。而今，不論在任何伊斯蘭國家，像貝札德這類的年輕人都在逐漸增加當中，他們將轉移伊斯蘭的激情，營造出他們心目中理想的社會願景：一個被滌淨的、純粹化的信徒的社會。

一九七九年八月—一九八一年二月